

陈映真 著

陈映真文选

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 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

美国统治下的台湾 台湾内部的日本

被出卖的“皇军” “台湾”分离主义“知识分子的盲点”

“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

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 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

《人间》杂志发刊辞：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陈映真是）海峡两岸第一人。

——徐复观

映真不仅研究文学，也注意政治经济现象……映真在文学上、思想上、因而在政治上，致力于批评台湾分离主义。

——胡秋原

陈映真是台湾三十年来的作家之中最配得上“知识分子”称号的人，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历程本身就值得我们重视。

——吕正惠

在世变日亟，倒错、淆乱、残暴等充斥的这个时代，具有乌托邦信念的人已成了空谷足音。陈映真在我们这个时代受人推崇，它的最真实的原因不是别的，或者正是他源源不绝的信念给予人们的召唤吧！

——南方朔

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

——王安忆



ISBN 978-7-108-03303-1



9 787108 033031 >

定价：49.00元



陈映真文选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映真文选 / 陈映真著; 薛毅编. — 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9. 12
(当代批评)
ISBN 978-7-108-03303-1

I. 陈… II. ①陈…②薛…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0524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 / 16 印张 34.5
字 数 306 千字
印 数 0,001 — 6,000 册
定 价 49.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关于陈映真

试论陈映真

——《第一件差事》、《将军族》自序 3

关于陈映真 12

后街

——陈映真的创作历程 18

鲁迅与我

——在日本《文明浅说》班的讲话 29

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 33

祖祠 55

父亲 58

生死 68

第二辑 乡土文学论战

现代主义底再开发

——演出《等待果陀》底随想 77

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 83

最牢固的磐石 88

知识人的偏执 96

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 100

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 112

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118

回顾乡土文学论战 131

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

——七十年代文学论争在台湾文艺思潮史上划
时代的意义 137

七十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

——以《莎哟娜啦·再见》、《小寡妇》和《我爱玛莉》为中心 169

第三辑 分离主义的盲点

“乡土文学”的盲点 193

原乡的失落

——试评《夹竹桃》 199

台湾长老教会的歧路 209

追究“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论 224

西川满与台湾文学	231
美国统治下的台湾	
——天下没有白喝的美国奶	244
从台湾都市青少年崇日风尚说起	256
从一部日片谈起	
——论《联合舰队》	260
台湾内部的日本	
——再论日本战争电影《联合舰队》	265
“台湾”分离主义“知识分子的盲点”	273
精神的荒废	
——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	276
被出卖的“皇军”	291
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	
——批评陈芳明先生的《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	308
论“文学台独”	345
警戒第二轮台湾“皇民文学”运动的图谋	
——读藤井省三《百年来的台湾文学》：批评的笔记	354

第四辑 消费社会和文学问题

色情企业的政治经济学基盘	371
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	380
大众消费时代的文学家和文学	388
《人间》杂志发刊辞	392
新种族	394
大众传播和民众传播	398

第五辑 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

- 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 431
- 反讽的反讽
- 评《第三世界文学的联想》 448
- “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
- 评渔父的发展理论 453
- 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 492
- 同一个民族，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斗争
- 台湾新文学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联系 506
- 天高地厚
- 读高行健先生获奖辞的随想 512
- 中华文化和台湾文学 520
- 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 529
- 从台湾看《那儿》 537
- 编后记（薛毅） 545

第一辑 | 关于陈映真

试论陈映真*

——《第一件差事》、《将军族》自序

总的看来，陈映真的作品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是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头，他显得忧悒、感伤、苍白而且苦闷。这种惨绿的色调，在他投稿于《笔汇》月刊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间最为浓重。一九六一年迄一九六五年，他寄稿于《现代文学》的时期，还相当程度地保留了这种青苍的色调，但同时也表现出这个时期底趋向终结以及另一个时期的开始。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八年他暂时息笔，是另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他的感伤主义的结束，而呈现出一种比较明快的、理智的和嘲讽的色彩。

基本上，陈映真是市镇小知识分子的作家。

在现代社会的层级结构中，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是处于一种中间的地位。当景气良好，出路很多的时候，这些小知识分子很容易向上爬升，从社会的上层得到不薄的利益。但是当社会的景气阻滞，出路很少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向着社会的下层沦落。于是当其升进之路顺畅，则意气昂扬，神采飞舞；而当其向下沦落，则又往往显得沮丧、悲愤和彷徨。陈映真的早期作品，便表现出这种闷局中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浓重的感伤的情绪。他的父亲一代出身于农村的败落的家庭，因着刻苦自修，成为知识分子而向市镇游移。一九五八年，他的养父去世，家道遽尔中

* 本文刊于《第一件差事》、《将军族》（台湾：远景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十月），署名许南村。后收录于《陈映真自选集九·鞭子和提灯》（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

落。这个中落的悲哀，在他易感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种由沦落而来的灰黯的记忆，以及因之而来的挫折、败北和困辱的情绪，是他早期作品中那种苍白惨绿的色调的一个主要根源。当我们读《我的弟弟康雄》、《故乡》、《死者》和《祖父与伞》便感到这种贫困的哀愁、困辱和苦闷的情绪，弥漫在故事的背景。他不曾理解到：市镇小市民的社会的沉落，在工商社会资金积累之吞吐运动的过程中，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一种宿命的规律；他不曾懂得从社会的全局去看家庭的、个人的沉落；他也不曾懂得把家庭的、个人的沉落，同自己国家的、民族的沉落联系起来看，而只是一味凝视着孤立底个人的、滴着惨绿色之血的、脆弱而又小小的心，自伤自怜。于是他成了退缩的、逃避的人。他逃避一切足以刺痛他那敏感的心灵的一切事物，包括生了他、养了他的故乡。他把自己放逐了，放逐出活生生的现实生活：

……故乡便时常成了我的梦魇了。

——《故乡》

跳上列车，我感到的不是旅愁，而是一种悲苦的、带着眼泪去流浪的快感。……我家的衰颓，在他们都太熟悉。我的心开始剧烈地绞痛起来。

我用指头刮着泪。我不回家。我要走，要流浪。我要坐着一列长长的、豪华的列车，驶出这么狭小这么闷人的小岛，在下雪的、荒脊的旷野上飞驰着，驶向遥远的地方，向一望无际的银色的世界，向满是星星的夜空……没有目的地奔驰着……

我不要回家，我没有家呀！

——《故乡》

因着中落的挫辱而把自己关闭起来的陈映真，竟至于连母亲似的故乡也拒绝了。这种不健康的感伤，正显示出市镇小知识分子的那种脆弱的、过分夸大的自我之苍白和非现实的性质。

闷局中的市镇小知识分子，因着他们的沉落和无出路，有时也有改革世界的意识和热情。

……即欲对恶如何、必需介入于那恶之中。

——《家》

务要使这一代建立一种关乎自己、关于社会的意识，他曾热烈地想过：务要使他们做一个公正、执拗而有良心的人，由他们自己来担负起改革自己乡土的责任。

——《乡村的教师》

改革是有希望的，一切都将好转。

——《乡村的教师》

《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祥、《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故乡》中的“哥哥”和《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中的犹大，都曾怀抱过献身于建造一个更好、更幸福的世界的热情。然而由于市镇小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中间的地位，对于力欲维持既有秩序的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于希望改进既有社会的下层，又不能完全地认同，于是他们的改革主义就不能不带有不彻底的、空想的性格了。康雄的理想主义便是这样的：

那时候我的弟弟康雄在他的乌托邦建立了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接着便是他的逐渐走上安那琪的路，以及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等待。

——《我的弟弟康雄》

《故乡》里的哥哥，是另外一个空想的改革论者。他的改革论，是以基督教的信仰和热情为基础的：

过了不久，哥哥便在焦炭厂里做着保健医师……白天在焦炭厂工作得像个炼焦炭的工人，晚上洗掉煤烟，又在教堂里做事。他的祈祷像一首大卫王的诗一样。

——《故乡》

市镇小知识分子的空想的不彻底的、空想的性格，又表现在他们的认识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他们所想的和所做的往往很不一致，甚至于互相背反。这种矛盾，首先导致他们在行动上的犹豫、无力和苦闷：

……终其十八年的生命，我的激进的弟弟康雄连这样一个遂于行动的快感都没有过。“我这虚无者，却没有雪莱那样狂飙般的生命。雪莱活在他的梦里，而我只能等待一如先知者……”我的弟弟

康雄的日记这样说。

——《我的弟弟康雄》

像康雄，像《唐情的喜剧》中夸大其谈的读书界，像吴锦祥、《故乡》里的哥哥和《一绿色之候鸟》中的赵如舟，都表露出市镇小知识分子往往是行动的无能者。言行之间的背离，不断地刺痛着他们的犹豫、敏锐的良心，使他们痛苦，使他们背负着惨绝的愧疚，使他们深深地厌恶自己，终而至于使自己转变成为与始初完全相背反的人。他们堕落了。天使折翼，委落于深渊而成为恶魔，竟而终于引至个人的破灭。自以为否定了一切既存价值系统的、虚无主义的康雄，在实践上却为他所拒绝的道德律所紧紧地束缚着。他无由排遣因这种矛盾而来的苦痛而仰药自杀了；曾经自以为向往社会正义的费边社会主义者赵如舟，在现实生活中却曾残酷地遗弃一个旧式婚姻中的妻子和一个叫做节子的东洋女人，其后又一直在麻木不仁、腐败肮脏之中生活，而终于因老人性痴呆症走向颠狂的末路；乡村的教师吴锦祥始而幻灭，继而堕落，再继而发狂自杀；《故乡》中，试图在基督教义中寻找正义的哥哥也变成了一个耽溺于赌博和情欲的恶魔，毁去了一生。

市镇小知识分子在社会的中间的地位，在历史的转型时期，往往使他们比谁都早而敏于同时预见一个旧有事物的枯萎和新生事物的诞生。在陈映真的早期作品，例如《那么衰老的眼泪》、《死者》、《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和《一绿色之候鸟》等，我们看见一个世界在一寸一寸地崩解着。而在这绝望的、灰黯的世界中，陈映真又似乎偶尔要十分吃力地试图划燃一根小小的火柴来照明和取暖。《凄惨的无言的嘴》里的精神病患者，梦见了“一个黑房”，“没有一丝阳光，每样东西都长了长长的霉”，而一具女尸身上许多致死的伤口幻化成为人类的嘴巴，呼啸着：“打开窗子，让阳光进来罢！”结果黑暗被划破了，“阳光像金黄的箭射进来”；在《将军族》中，两个饱经挫败和凌辱的卑屈的人物，把光明和幸福的人生寄托在一个神秘的渺不可知的未来世界——来生；《一绿色之候鸟》的世界，是一个“在逐渐干涸着的池塘里的鱼们，虽然还热烈地鼓着鳃、翕着口，却是一刻刻靠近死亡和腐朽”的世界。然而陈映真却

这样描写绝望得一如槁木死灰的季叔城的幼儿：

孩子在院子里一个人玩起来了。阳光在他的脸、发、手、足之间极灿烂地闪耀着。

——《一绿色之候鸟》

和他所描写的风雨冷冽的长夜比较起来，陈映真所看见的“阳光”又显得多么无力、多么突兀可笑，仿佛一个惊于自己设色之惨苦的画家，勉强地加上几笔比较明快的颜色一样。诚然，身处社会的中间地位的市镇小知识分子，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时代，因着他们和那社会的上层有着千万种联系，无力使自己自外于他们预见其必将颓坏的旧世界。另一方面，也因着他们在行动上的无力和弱质，使他们不能做出任何努力使自己认同于他们在懵懂中看见的新世界。结果，他们终于只能怀着自身的某种宿命的破灭感去瞭望新的生活和新的生命。《凄惨的无言的嘴》中的精神病患者固然梦见阳光划破了黑暗，使黑房子里“所有的霉菌枯死了，蛤蟆、水蛭、蝙蝠枯死了”。但连带地，那幻见这“光明”的异象的“我”也随着“枯死了”；在“兀自照耀着的太阳”中，神秘地象征着希望和良心的小淳，也在旭日初升的时刻，静悄悄地死了；在《将军族》中，无力和巨大的现实对决的两个卑微的人物，以其生命的破局去寻求“来生”的幸福；在《一绿色之候鸟》中，有人对饱经惨变的季叔城说他的孩子长得标致，像他，也像他的病死的妻子时，季叔城忽然这样说：

——不要像我，也不要像他的母亲罢。一切的咒诅都由我们来受。加倍的咒诅、加倍的死都无可。然而他却要不同。他要有新新的、活跃的生命！

——《一绿色之候鸟》

陈映真小说中的小知识分子，便是怀着这种无救赎的、自我破灭的惨苦的悲哀，逼视着新的历史时期的黎明。在一个历史底转型期，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唯一救赎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实践行程中，艰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们无限依恋的旧世界作毅然的决绝，从而投入一个更新的时代。但陈映真世界里的市镇小知识分子，却没有一个在实践中挺立于

风雨之中、优游于浪涛之间的人物。这也许是客观上并不存在着这样的人物罢，而其实也是陈映真自己和一般的闷局中的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无气力的本质在艺术上的表现。

安东·契诃夫是表现这种社会转型时代中，自由知识分子的那种无气力、绝望、忧悒、自我厌弃、百无聊赖以及对于刻刻在逼近着的新生事物底欲振乏力之感的最优秀的作家之一。陈映真早期小说中的衰竭、苍白和忧悒的色调，是很契诃夫式的。但是，在表现上的优美和深刻来说，陈映真当然不及契诃夫远甚了。

一九六六年，陈映真开始寄稿于《文学季刊》，此后他的风格有了突兀的改变。实则，如果我们仔细地去看他第一时期的末尾，即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他投稿于《现代文学》的时期，我们将可以看见他向着一个新风格过渡的痕迹。

一九六六年以后，契诃夫式的忧悒消失了。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拨；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发抒。当陈映真开始嘲弄，开始用理智去凝视的时候，他停止了满怀悲愤、挫辱和感伤去和他所处的世界对决。他学会了站立在更高的次元，更冷静、更客观、从而更加深入地解析他周遭的事物。这时期的他的作品，也就较少有早期那种阴柔纤细的风貌。他的问题意识也显得更为鲜明，而他的容量也显得更加辽阔了。然而这个时期对他还只是个开端，还只是一个摸索和实验的阶段。我们只能说陈映真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漫长的忧悒的时代突破而出。此外任何过早的评价都恐怕不容易正确的罢。

从题材上去看，陈映真的小说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对于寄寓于台湾的大陆人的沧桑的传奇，以及在台湾的流寓底和本地的中国人之间的人的关系所显示的兴趣和关怀。

新的和旧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袭，数百年来，在中国发生了长远而复杂的影响。作为东南中国门户的台湾省，更是尖锐地经历了东洋和西洋殖民体制的毒害。她历经殖民主义的局部的或全面的、暂时或长期的霸占，使她常常在历史上因而和中国隔绝了。而其中尤以日本人五十

年的殖民统治最为长久。在这长时期的霸占中，日本在台湾进行了为使台湾纳入日本帝国主义经济的市场圈所必要的改造，使她早早地脱离了当时前·近代的中国社会。在这个背景下，一九四五年的光复、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的播迁来台，使海峡两岸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台湾发生了广泛的接触。三十年来，这个接触还在进行着不断的相互调整、再编成和共同发展的过程。

这样的过程在人的生活上的反映，陈映真首先对于侨居的大陆人过去的传奇发生十分浓厚的兴味。从《那么衰老的眼泪》开始，在《文书》、《将军族》、《最后的夏日》和《第一件差事》等一系列大陆人和本省人同时登场小说中，陈映真捕捉那些令一九三七年生于台湾、嗣后便过着停滞不波的生活的他着迷的各种传奇。在陈映真的世界中，大陆人有牵萦不断的过去的记忆。他们在那个渺遥阻绝的故乡，有过妻子；有过恋人；有魂牵梦系的亲人故旧；有故乡的山河底记忆；有过动乱的、流亡的、苦难的经历；有过广袤的地产、高大的门户；有过去的光荣和现在的精神底或物质底沉落。交织着侵略和革命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在她从历史的近代向着历史的现代过渡时所引起的剧烈胎动，怎样地影响着游寄台湾的大陆人——这无宁才是陈映真对于这些传奇怀抱着传奇以上的兴味的一个原因罢。

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前·近代的中国同在日本帝国主义一定的殖民政策下资本主义化、近代化了的台湾省的接触，在大陆人和本省人之间产生了一些难题。在本省人方面，由于长时期受到东方/西方、新/旧帝国主义的阻隔，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从前。近代跃向现代国家、从近代史向着现代史发展而来的阵痛所必有的混乱、落后和苦难所掩蔽的中国的真正的面貌，从而他们的小市民的单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便在中国走向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地动天摇的过程中幻灭了、挫折了。这种在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历史急流中迷失了自己原有的位置和方向的结果，便在部分人心中产生了所谓中国历史的孤儿、弃儿和受害者的意识，因而走向分离主义的道路。在大陆人方面，则因某些人承继了前近代的大华夏主义的恶遗留，也助长了分离主义的成长。

陈映真在处理大陆人和本省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是将他们置于一个从来不认识大陆人、本省人的社会规律下，以社会人而不是畛域人的意义开展着繁复底生之戏剧的。《将军族》中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便是因为同是社会中沦落的人而互相完全的拥抱着；《那么衰老的眼泪》中康先生和阿金（也如《第一件差事》中的胡心保和许香）间，以及《兀自照耀着的太阳》中一群生活在帷幔深垂的天地中的台湾市镇小有资产者与帷幔之外广泛的生产者之间，那种有产者的倦怠、衰竭与乎生产者世界的不可思议的生活力之对比，都因陈映真之着笔于社会底根源，而消失了畛域底差别。

在中国走出前·近代的社会，从历史的近代向着历史的现代冲刺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期望借着为在台湾的中国人所共同关切和喜爱的当代文学、音乐和艺术，使分离或有相分离的危机的中国人重新和睦，为中国的再生和复兴而共同努力。我们也深切期望：在台湾成长的年轻一代新锐的、革命的中国文艺工作者——不分什么大陆人和本省人——能够同时克服和扬弃落后的大华夏主义和新旧殖民主义所残留的受害者意识、孤儿意识或弃儿意识，重新建立我们在中国现代史中的主体的地位，昂扬地前进。

在每一个历史期中，人们总是在各种艺术作品中寻求他们生活中最急切的诸问题的解答；寻求指导他们的人生的理念；寻求他们在起而变革生活和世界时所能信赖和认同的人物底形象；寻求经过各种艺术形式集中起来的民众自身的愿望和心声。因而文艺工作者就应该有自觉的自己批评的意识，谦抑谨慎，同一切愿意为更好、更合理的明日贡献力量的文化工作者，一道工作，一起进步。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陈映真做了初步的批评。七十年代以后，我们的新锐的、革新的文坛，有了一定的成长。在现代诗论战中，文学的社会性、民族性被提出来了；以黄春明等为代表的、拥抱了广泛生产者的小说出现了；以《文季》季刊为指向的社会的、批判的、爱国的文学道路划出来了。这些文坛的新事，说明了我们的一些优异的革新的文艺工作者，有足够的青春和生命去超越某些陈映真早期作品中所表现的

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忧悒和无力感。我们希望这个批评不但有益于陈映真，也有助于必将涌现出来的更年轻、更优秀的作家们。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关于陈映真*

初学写作的几年，用了许多的笔名，差不多是一篇文章一个笔名罢。也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才开始固定用陈映真做小说的笔名，以许南村做论说、随想的笔名。

我有过一个形貌、心灵都酷似的双生的哥哥。我们曾在共同编织的幻想中驰骋；曾在上学的途中，蹲在一块，讨论田埂上一朵清晨的、方开的小野花；或者一块追逐在稻田里飞跃的、翠绿色的蚱蜢，而往往都得迟至早晨的第二节课，才到达那所古老的莺歌国小。我们也曾在墙上、地上画满了图画，互相评判；曾把捡到的，死了的昆虫和鸟雀，埋在门口的菜圃边，用竹枝、树叶和碎石，搭盖小小的墓园，并且日日去供些采来的野花……

由于形貌的酷似，幼时另一个深刻的记忆，是不断地有亲戚和长辈，打断我们正热中着的游戏，睁着好奇的、兴味的眼睛问：

“告诉我，你们哪个是阿真、哪个是阿善？”

我们于是只得停下游戏，耐心、或者竟不胜其烦地做一番解释和说明。幼时这种对于自己的认同不断的、意识的说明、解识和确认，似乎使我对于名字和其所指谓的实人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兴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使用一个又一个笔名；为什么每次要为故事中的人物取名的时候，总是感到盎然的兴味的缘故罢。

* 本文刊于《知识人的偏执》（台湾：远景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署名许南村。后改名《鞭子和提灯——〈知识人的偏执〉自序》，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九·鞭子和提灯》（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

我的小哥，在九岁上，病死了。

两岁许的时候，我过继给我的三伯父——父亲的三兄。光复前的一年罢，生家和养家都疏散到莺歌。我们这一对双生兄弟，便一块儿玩、一块儿上学，在那小镇上和国民小学中，成为诧奇的、有趣的话题。

有一个清晨，我正要到生家去邀小哥上学，却在路上看见比我早到，想要到养家来约我上课的小哥，青苍着脸，蹲在人家的廊下。

“肚子疼。”

他细弱地说。路上的行人还少。远远地有叫卖油条的恹弱而颤抖的声音，在小镇清晨凉冽的空气中传来。我大约陪他回生家，便径自上学去了。

其后的几天，我一个人上学、下学，一个人默默地玩耍。我还记得几次到生家去探望小哥，看见他沉睡在榻榻米上。有一回，榻榻米上没有了，说是送了他到台北住院去。

记不得又过了多久，当我眺望着养家门口通向车站的大街，远远地看见父亲捧着白色的骨灰盒子，逐渐走近，又沉默地走远。有些人伫足，有些人噉噉地耳语，有些人小心地叹息。

小哥死了。

我始而流泪，继而出声哭泣。那时，还记得谁在说：

“唉唉，难为他也知道悲伤呢！”

那是我一生中初尝死别之苦的。这以后，我一步一步地成长。但数十年以来，依稀总是觉得他的死，遽而使我失落了一个对等的、相似的自我，同时却又仿佛觉得，因着形貌、心灵的酷肖，那失落的一切，早在我小哥病死的一刻，与我重叠为一。这或者是无稽的幻想罢。我曾一半出于怀思、一半出于青年的恶戏，使用过好几个族中已经亡故的人们的名字作笔名。直到有一回，我用了小哥的名字，竟也蓦焉感到满足和安定的情绪，就此沿用了下来。

“为什么要用真儿的名字作笔名呢？”父亲曾问过。

“不知道啊，”我说，“我只是想，这样，我们就一起活着。”

父亲笑了笑，便不复说什么。

我真不知道，如果小哥尚在，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人。前不久，家人闲谈，说起我前此的一次久客远行，父亲沉思地说：

“要是真儿也在，怕不也跟着你去走那一遭……”

我沉默不能语。

如果小哥是个与我全然相同的人，那么，我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为了躲避盟军的轰炸，养家和生家都疏散到小镇莺歌。村镇的童年生活，即使是战时，也是充满着欢乐的。忽而有一天，我看见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喧天的锣鼓，令人目瞪的舞狮队，张灯结彩、焚香祭祖。大人们哄传：“日本仔打输，台湾光复了！”

两个驻在附近的日本老兵，和邻人闲谈着。其中有一个抚摸着隔壁小孩的脑勺子。

“想家啊，”他说，“出门的时候，我的娃儿也这般大。”

“你们就要回去了，高兴罢？”有人问。

两个日本兵沉默着。然后，那另一个日本兵，像是说给自己听似地啾啾着说：

“日本已经残破了，回去也难于生活罢。”他于是哼哼地笑了：“军部，家伙！早说过没有好下场的！”

问他以前干什么，他说：

“我是佃农，他是木匠。”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愿意留在台湾种田、做工。对罢？”想家、想儿子的那个日本兵说。

另一个日本兵没说什么，两人默默地走了。

动 乱

小哥死后几年，屋后迁来一家姓陆的外省人。陆家小姑，于今想来，是二十上下的年纪罢。直而短的女学生头，总是一袭蓝色的阴丹士林旗袍。丰腴得很的脸庞上，配着一对清澈的、老是漾着一抹笑意的眼睛。她不懂台语，养家的大姊不识国语，但是借着手势和有限的笔谈，

她们竟成了闺中膩友。

她陪我为一小畦我所种植的绿豆浇水；几乎每日，她看着我做功课；她教给我大陆上的儿歌……。曾几何时，她成了我生活的中心。放学回家，扔下书包，就找到屋后去看陆家大姐，唠唠叨叨地述说一日间的种种。

一个索漠的、冷冽的早晨。我大约因为发了高热早退。回到家，高烧已使我昏昏沉沉的了。但扔下书包，几乎习惯地往屋后跑。

陆太太怀抱着那方甫出生的婴儿，哀哀愁愁地哭着。陆家大姐在一边絮絮地、温婉地劝慰着些什么。然后，她跟着两个陌生的、高大而沉默的男人走出房门。就在她跨出门槛的时候，她看见了我。她的丰腴得很的脸，看来有些苍白。然而她还是那么迅速地笑了笑，右手使劲地按了一下我的头，走过幽暗的走廊，走出屋子……

这以后的几日，我再也不曾看见陆家大姐。接着，陆太太也搬走了。

有好长一段日子，我一个人默默地蹲在绿豆畦边，看着它们一寸一寸地在竹架上攀援。小哥死后，这是第二次感到深刻而无从理解的寂寞。

大约是快升上六年级的那一年罢，记不清从哪里弄来了一本小说集。其中有一个故事，说着一个可笑的乡下老头的可笑的冒险经历。当他被人家揪着辫子，在冷硬的墙上捣打，待人走远了之后，他就对自己说那凌暴的人是他的儿子，然后认真地为一个儿子忤逆的时代，摇头叹息，于是他的屈辱便得到了安慰。

那时候，对于书中的其他故事，似懂非懂。惟独对于这一篇，却特别的喜爱。当然，于今想来，当时也并不曾懂得那滑稽的背后所流露的、饱含泪水的爱和苦味的悲愤。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

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取“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

曾有一个时候，面目黧黑的，饱受风霜的，贫穷的，忧愁的，愤怒的，经常和罪人、穷人和被凌辱的人们为伍的，温柔的耶稣，以及那位对生命怀着肃穆的敬意，对于周遭世界的不幸，怀有苦痛的同情，并在原始的非洲建造兰巴仑医院的史怀哲医生，成了我青少年时代的偶像。这以后的几年，我耽读的书，相与的朋友，像一个又一个紧密相扣结的环节，构成了现时的我，也打成一条命运的链条，使我拴锁其中。

我时常怀着深切的、谦卑的感谢，回忆这些曾经这样、那样地点燃了我内里的，并不辉煌的火光的人、书本、事物和经历。陈映真的一些小说，许南村的一些议论，便是这样卑微的我的形成过程中，所留落的足踪。

初出远门作客的那一年，父亲头一次来看我。在那次约莫十来分钟的晤谈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

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

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

我把这些话送给你，摆在羁旅的行囊中，据以为人，据以处事……。”

记得我是饱含着热泪听受了这些话的。即使将“上帝”诠释成“真理”和“爱”，这三个标准都不是容易的。然而，惟其不容易，这些话才成为我一生的勉励。

回到故里，深刻地感到故旧、新知，以及许多遥远的，不曾谋面的朋友们所加予我的温暖的友情、关怀和激励，使我感激，使我羞愧，使我惶恐。让我对这些错爱于我的人们，表示无言的、最诚挚的感谢。但是我着实不愿意他们不知道：我是个平凡的、充满了许多矛盾和缺点的

人。但愿他们的关切和他们对我的，超乎我所能驮负的预期，都成为严厉的鞭子和脚前的提灯，使我用功些、谦卑些、诚实些、勇敢些……

一九七六年九月

后 街*

——陈映真的创作历程

[1]

陈映真生于一九三七年的台湾竹南，后设籍台北县莺歌镇。到了他十岁的一九四七年春天，发生“二·二八”事变。他的孪生小哥在前一年死去，留下他一个人恹恹然地、孤单地玩耍。但他仍然记得五六个故乡复员原日本兵，穿着破旧的、并不齐套的皇军军服，唱着日本军歌，在关门闭户的小街上，踩着军步，渐行渐远；他记得在莺镇的小火车站前，一个外省客商被人打在地上呻吟，穿着长袜和黑布鞋的脚踝，浆着暗红的血渍；他也记得大人们噤声谈论着国民党（廿一师）军队横扫台北，眼色中充满了恐惧和忧愁。

一九五〇年夏天，他上六年级。级任老师在升学辅导自修课上，捧着《中央日报》看朝鲜战争的消息。那年秋天，一个从南洋而中国战场复员、因肺结核而老是青苍着脸、在五年级时为了班上一个佃农的儿子甩过他一记耳光的吴老师，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带走，留下做陶瓷工的白发母亲，一个人幽幽地在阴暗的土屋中哭泣。冬天，他家后院住的外省人陆姊姊兄妹俩，分别在莺镇和台南糖厂被人带走……白色恐怖肃

* 本文原题《陈映真的创作历程：后街》，刊于《中国时报》（台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九—二十三日，署名许南村。后收录于《陈映真自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〇年三月）。

清的寒流弥漫在四面八方。

一九五一年，他到台北上初中。每天早晨走出台北火车站的剪票口，常常会碰到一辆军用卡车在站前停住。车上跳下来两个宪兵，在车站的柱子上贴上大张告示。告示上首先是一排人名，人名上一律用猩红的朱墨打着令人胆颤的大钩，他清晰地记得，正文总有这样的一段：“……加入朱毛匪帮……验明正身，发交宪兵第四团，明典正法。”

人们以悸动的静默，涌向告示。有时候，他会看见农民模样的人，因为在告示上看见亲人的名，突然在人群中失声，瘫倒在地上。

他的初中生的生活，便是在那白色的、荒芜的岁月中度过。寒暑假，他从莺镇的养家到邻站的桃镇生家去做客。一次在书房中找到了他的生父不忍为避祸烧毁的、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他不告而取，从此，这本有暗红色封皮的小说集，便伴随着他度过青少年时代的日月。

而就在成功中学的隔壁，台湾省警备总部看守所就在青岛东路上。上课、下课，他总会看见不知来自什么地方的农村的老妇人，卑躬地带着衣物食品，时而也带着幼儿，在守卫亭等着传呼入内，接见重重政治天牢中的或者丈夫，或者儿女，或者叔伯、兄弟。从看守所高高的围墙下走过，他总不能自禁地抬头望一望被木质遮栏拦住约莫五分之三的、阇暗的窗口，忖想着是什么样的人，在那暗黑中度着什么样的岁岁年年。

该初中毕业的那年，他竟留级了。在学校公告栏上确认之后，一个人顶着暑天的太阳，从济南路走到今日中仑一带，去找他的慈爱的养父。

“没关系。你先回去吧。”

一向语言不多的他养家的父亲，这样对他说。他于是又走到火车站，搭车回到莺镇。养家的姐姐正忙着做裁缝。对于他的留级，没有半句责备。

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开始比较仔细地读《呐喊》，到大汉溪游泳、钓鱼，觉得留级其实并未见得就是极大的灾难。

越一年，他考上了同校高中部，开始并无所谓地、似懂非懂地读起旧俄的小说。屠格涅夫、契诃夫、冈察洛夫，一直到托尔斯泰……却不

期因而对《呐喊》中的故事，有较深切的吟味。

五六年春天的一日，养父忽然和他说起要把当时赁居的房子设法买下来的事，他自然什么主意也没有，只是诧异养父竟把他当成一个大入，同一个高二的儿子合计像要不要买下房子那么大的事。那年夏天，他的养父病倒了，而后，终于在他瘦小的怀中死去。本已并不富有的家，乃益发衰落。次年五月，纯粹出于顽皮，他打造一个抗议牌参加“五·二四”反美事件。不数月，他被叫去刑警总队，问了口供，无事释回。

[2]

一九五八年，从贫困的家中，带着昂贵的学费，他到淡水当时的淡江高专注册，心情愁悒，却完全不曾知道生活的旅程上，一个全新的阶段在等候着他。

就在这小镇上，他不知何以突然对于知识、对于文学，产生了近于狂热的饥饿。远远超前于老师指定的进度，他查英语字典读着英国文学史而不能满足，开始把带在身边的、从父亲的书架上取来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不记得什么人写的《西洋文学十二讲》，津津有味地啃着，写一本又一本的札记。

在文学上，他开始把省吃俭用的钱拿到台北市牯岭街这条旧书店街，去换取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书，耽读竟日终夜。但这被政治禁绝的祖国三十年代文学作品的来源，自然有时而穷。而命运不可思议的手，在他不知不觉中，开始把他求知的目光移向社会科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这文学青年的生命深处点燃了激动的火炬。从此，《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斯诺《中国的红星》（日译本）、莫斯科外语出版社《马列选集》第一册（英语）、出版于抗日战争时期，纸质粗粝的毛泽东写的小册子……一寸寸改变和塑造着他。他几乎日日觉得自己在不断地蜕化，不断地流变，却不知道自已终于要蜕化成什么，深深恐惧着不让即使父母朋友察觉到自己不能自抑的豹变。

一九五九年，朋友尉天骢为其主编的文学同人刊物《笔汇》向他拉稿。从来不曾做过小说的他，把当时大二因作文作业写的故事，加以改写扩充，付邮寄去。不久，短篇《面摊》竟而神奇地印成铅字，刊在《笔汇》上。

一九六〇年，二十三岁。他在这一年一口气于《笔汇》上刊出了《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和《祖父与伞》。

感谢这偶然的机缘，让他因创作而得到了重大的解放。在反共侦探和恐怖的天罗地网中，思想、知识和情感上日增的激进化，使他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激忿、焦虑和孤独。但创作却给他打开了一道充满创造和审美的抒泄窗口。他开始在创作过程中，一寸寸推开了他潜意识深锁的库房，从中寻找千万套瑰丽、奇幻而又神秘、诡异的戏服，去化妆他激烈的青春、梦想和愤怒、以及更其激进的孤独和焦虑，在他一篇又一篇的故事中，以丰润曲折的粉墨，去嗔痴妄狂，去七情六欲。

他从梦想中的遍地红旗和现实中的恐惧和绝望间巨大的矛盾，塑造了一些总是怀抱着暧昧的理想，却终至纷纷挫伤自戕而至崩萎的人物，避开他自己最深的内在严重的绝望和自毁。而于是他变得喜悦开朗了。自我封闭的藩篱快速地撤除。他更能锢守他思想的隐秘，同时又能喜悦地享受着因《笔汇》而逐渐开阔起来的动人的友情和文艺的网络。文学创作像一场及时的、丰沛的雨水，使他因意识形态的烈日剧烈的炙烤而濒于干裂的心智，得到了浸润，使他既能保持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知识与原型的信从，又能对人类心灵最幽微复杂的存在，以及它所能喷发而出的创造与审美的巨大能量，保持高度的敬畏、惊诧与喜悦……

一九六一年，他从改制后的淡江文理学院毕业的那年，他写《猫它们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泪》、《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和《苹果树》。他把抑压到面目暧昧不明的马克思主义同对于贫困粗粝的生活的回忆，同少年时代基督教信仰的神秘与疑惑，连同青年初醒的爱欲，在创作的调色盘中专注地调弄，带着急促的呼吸在画布上挥动画笔，有时甚而迷惑了他自己。

六二年，他到军中服役。军队里下层外省老士官的传奇和悲悯的命运，震动了他的感情，让他在感性范围内，深入体会了内战和民族分裂的历史对于大陆农民出身的老士官们残酷的拨弄。一九六三年的《文书》和六四年的《将军族》和迟至一九七九年才出土发表的《累累》，是这种体会的间接和直接的产物。

一九六三年，为了养活他自己和亲恩如山的养母，他在退伍不久，就到台北市一家私立中学执英语教鞭。次年，他结识了一位年轻的日本知识分子。经由这异国友人诚挚而无私的协助，他得以在知识封禁严密的台北，读到关于中国和世界的新而彻底（radical）的知识，扩大了仅仅能从十几年前的旧书去寻求启发和信息的来源。也经由这可纪念的友谊，他第一次生动地体会到，对于建立一个真正和平与进步的世界深信不疑的善良的人们之间，真挚又严肃热情的超国境的团结与友谊，是完全可能的。

一九六四年，他的思想像一个坚持己见的主人对待不情愿的伙计那样，向他提出了实践的要求。命运是这样的不可思议，竟然在那侦探遍地的荒芜的时代，让几个带着小资产阶级的各样软弱和缺点的小青年，不约而同地、因着不同的历程而憧憬着同一个梦想，走到了一起。同一年，除了《将军族》，他还写了《凄惨的无言的嘴》和《一绿色之候鸟》。一九六五年，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和大正末年一个著名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写的入门书《现代社会之不安》，为他的读书小圈（circle）增添读物。然而在实践上的寸进，并没有在文学上使他表现出乐观和胜利的展望。被牢不可破地困处在一个白色、荒芜、反动，丝毫没有变革力量和展望的生活中的绝望与悲戚的色彩，浓郁地表现在六五年的《兀自照耀着的太阳》、《猎人之死》，和一九六六年的《最后的夏日》。

六六年，他写了《最后的夏日》（发表于同年的《哦，苏珊娜！》）事实上是写于服役的一九六〇年顷），六七年，他写《唐情的喜剧》和《第一件差事》，六八年被捕前不久，他发表《六月里的玫瑰花》，都明显地脱却了他个人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相对地增添了嘲弄、讽刺和批判的颜色。究其根源，他受到激动的“文革”风潮的影响，实甚明

显。而正是在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他和他亲密的朋友们，受到思想渴求实践的压力，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组织的道路。

[3]

一九六八年五月，他和他的朋友们让一个被布建为文教记者的侦探所出卖，陆续被捕。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被判决徒刑十年定讞。七〇年春节前，他被移监到台东泰源监狱。在那里，他头一次遇见了百数十名在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全面政治肃清时代被投狱、幸免被刑杀于当时大屠的恐怖、在缱绻中已经度过了二十年上下的政治犯。

在那个四面环山，被高大的红砖围墙牢牢封禁的监狱，啊，他终于和被残酷的暴力所湮灭、却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值了。他直接会见了少小的时候大人们在恐惧中噤声耳语所及的人们和他们的时代。他看见了他在青年时代更深层人静窃读破旧的禁书时，在书上留下了眉批，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签上购买日期，端正地盖上印章的那一代人。在押房里，在放风的日日夜夜，他带着无言的激动和喟叹，不知履足地听取那被暴力、强权和最放胆的谎言所抹杀、歪曲和污蔑的一整段历史云烟。穿越时光的烟尘，他噙着热泪去瞻望一世代激越的青春，以灵魂的战栗谛听那逝去一代的风火雷电。狱中多少个不能成眠的夜晚，他反反复复地想着，面对无法回避的生死抉择、每天清晨不确定地等候绝命的点呼时，对于生，怀抱了最渴切的眷恋；对于因义就死，表现了至大至刚的勇气的一代人。五十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籍不分大陆本省，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对于他，再也不是恐惧、神秘的耳语和空虚、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他会见了早已为故乡腐败的经济成长所遗忘的一整个世代的人，并且经由这些幸存于荒陬、孤独的流放之岛的人们、经由那于当时已仆死刑场二十年的人们的生史，他会见了被暴力和谣言所欲湮灭的历史。

[4]

七〇年，他即使在泰源监狱，他能从《中央日报》看见“保卫钓鱼台运动”的风潮在岛内外激动地展开。他更从在狱中订购、由他日夜怀念的文友所创办的《文季》季刊、从《中外文学》中，惊讶地闻到一股全新的、前进的气息在围墙外的文学圈中，带着难以自抑的激越，强力地扩散着。作为一代显学的现代主义诗，遭到岛内外新起的评论家猛烈批判。文学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问题；文学语言应该让广大群众普遍理解的问题……文学是什么、为什么、为谁……这些文学观的基本问题被提出来了。他像是听到了人们竟然咏唱起他会唱又因某种极大的威胁而不敢唱的歌那样地激动。他在那些论战者的名字中，看见许多他的朋友和他所知道的人们，在前进与反动的双方，鲜明地站上了立场。他感到囚壁以外的故乡，不知如何而来的一阵春风，是怎样开始要煽动星星之火……

[5]

一九七五年，他因蒋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减刑而提早三年获释。台湾社会在他流放七年中经历了“独裁下经济发展”的高峰期。重回故园，他颇有沧海桑田的感慨。但台湾的思潮已一反五〇年以降冷战和内战思维，更使他吃惊。他于是知道了保钓运动左翼的思想和文化影响。大专校园的社会意识萌芽发展。高信疆主持的时报《人间》副刊在世俗水平上不断地激起新的知识和文化的涟漪。朱铭和洪通的艺术使人们对深蕴于民间的强力审美发出了惊叹。《云门》的集结与创作，让人们感受到创造性的舞的语言照样深深地使人们的灵魂骚动不已。

七六年，他为杂志《夏潮》的编务，尽一些打杂写文章的义务。同年，他的小说由远景出版社集结成两本集子，其中的一本，于出刊不久遭到禁止发行。七八年，他在出狱后第一次发表小说《贺大哥》、《夜行

货车》与《上班族的一日》。

同一年，在余光中发表《狼来了!》、彭歌发表的点名批判《没有人性，何来文学?》之后，乡土文学论战在反共法西斯恐怖中登场。乡土文学系的同人作家在大恐怖中勉力抵抗。国民党全面动员学者、文特、党团刊物对乡土文学进行恐怖围剿，至召开国军文艺大会而达到高潮。而今日在台独文学论坛上无任意气风发的作家、理论家，在当时似乎一致采取了识时务的缄默。经历了国民党白色镇压的他，敏锐地感受到形势的险峻。

就在此时，胡秋原、徐复观和郑学稼公开发表文章支持了乡土文学，形势一转，保卫了乡土文学。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早晨，他突然遭到调查局以“涉嫌叛乱，拘捕防逃”拘捕令逮捕。三十六小时之后，他奇迹般地获得保释。他被前来具保的妻带回到被恣意搜查得凌乱不堪的书房，在地板的一隅，他捡起了一本他为《夏潮》工作时的采访笔记。笔记上竟记载一个被压杀的工会运动的始末。虎口归来，读着数年前的采访笔记，不禁眼热。他突然悟解，当他生活在随时可能被逮捕的日月中，写作竟是惟一的抵抗和自卫。他把采访笔记的材料小说化，就是八〇年发表的《云》。

一九八二年，他发表《万商帝君》。八三年，他回应了早在一九六八年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坊对他的邀请，平生第一次获准出国赴美。同年，他发表了以五十年代的反共肃清历史为题材的两个短篇小说《铃铛花》和《山路》。后者竟获选为那一年时报推荐小说奖。

[6]

一九八五年，他和几位共同谋生的年轻朋友经一年余的筹划，创办结合了报告摄影和报告文学、深度报道的月刊杂志《人间》。在“从社会弱小者的立场去看台湾的人、生活、劳动、生态环境、社会和历史，从而进行纪录、见证、报告和批判”的宗旨下，他惊叹地发现生活和劳动的现场本身是何等深刻善诱的教师，让一个个从来只知道生活的肤浅的

表皮的年轻人快速地成长，在文字与摄影报告上很快取得不能不叫人刮目相视的进步，留下至今叫万千读者难于遗忘的作品。《人间》在一九八九年深秋因不胜财务亏损而休刊，但至今受到读者历久不衰的评价。他知道这一切全都源于当年茹苦共事的青年们喜人的创意、大量艰苦工作和学习直接的结果。

八七年，他发表《赵南栋》。

[7]

从政治上论，他认为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在日帝下是帝国主义的侵夺，在朝鲜战争后是美帝国主义干涉的结果。台湾的左翼应该以克服帝国主义干预下的民族分断，实现民族自主下和平的统一为首要的顾念。对于大陆开放改革后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和阶级再分解，他有越来越深切的不满。但他认为这是民族内部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它从来和反对外力干预、实现民族团结与统一不产生矛盾。

在文学上，他认为不论是台湾社会史上的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一八九五—一九四五），是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一九四五—一九五〇），是新殖民地半封建阶段（一九五〇—一九六三），还是一九六三年以降的新殖民地边陲资本主义阶段，反对外来干预，反对封建主义，克服民族分断，是台湾文学思潮的主流。二十年代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旧文学的斗争，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的第一次乡土文学论争、三十年代台湾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和文学运动，都是作为帝国主义从中国割让出去的台湾针对帝国主义和与之相为依存的封建主义，在文学领域上进行斗争的文学。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台湾新现实主义文学论争”，实际上就是如何开展台湾的新民主主义文学的论争。一九五〇年，反共、亲西方的现代主义一时支配台湾文坛。但横贯七十年代的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战，明明白白地是批判西方影响、具有强烈中国指向的文学论争。八十年代以降，反民族、反共、亲西方的台独文学论有所发展，但尚不足以和二十年代以降回应台湾殖民地、新殖民地条件下反

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克服民族在外力干涉下的分断这样一个巨大文学传统抗衡。八十年代开始，他从反省和批判台湾在政治经济与心灵的对外从属化的“华盛顿大楼”系列，转轨到以五十年代台湾地下党人的生活、爱与死为主题的《铃铛花》系列，是他把当代台湾人民克服民族内战、克服民族分裂的历史——台湾地下党的历史加以文学化的营为。

[8]

从二十几岁开始写作以迄于今，他的思想和创作，从来都处在被禁止、被歧视和镇压的地位。一九七九年十月他被捕侦讯时，知道有专门对他的作品和言论做系统的思想检查分析和汇报的专业思想侦探。八十年代中后，台独反民族学术力量在台湾的政坛和高等教育领域扩大了可观的影响力，成为当前台湾既成政·学体制的组织部分。在这新的情势中，和他二十几岁的时代一样，他的思维和创作，在一定意义上，一直是被支配的意识形态霸权专政的对象。

他大体上是属于思想型的作家。没有指导的思想视野而创作，对他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他认识到、并且相信，创作有一个极为细致而有一定程度自主性的领域。真正的创作之乐，也在这个神奇的领域。和一般的印象极为不同的是，他并不特别喜好理论和社会科学。一个搞创作的人去搞理论、搞社会科学，对一贯读书不求其甚解的他，是一件无味的苦事。而他之接近理论，是由于他必须求思想出路，又没有一群进步优秀的社会科学队伍作为他的依靠之故。

他自知只有中人之智。命运却像是紧紧相扣的一个又一个环节，选择了他的，驱使他在四五十年中，走过台湾当代历史的后街。正如他为《人间》杂志采访时，他看到的是饱食、腐败、奢侈、冷酷、炫丽、幸福的台湾的后街；环境的崩坏、人的伤痕、文化的失据……他走过的历史巷道，是小学吴老师的失踪；是枪决政治犯的布告；是被带走的陆家姐姐；是禁书上的署名和印章；是禁书为他打开的激进主义的世界；是他在政治监狱中相逢的五十年代残酷肃清的大狱中一段激烈、哑、

抑压着一代青春和风雷的历史……

如果要他重新活过，无疑仍然要选择去走这一条激动、荒芜，充满着丰裕无比的，因无告的痛苦、血泪，因不可置信的爱和勇气所提炼的真实与启发的后街。对于他这半生，他基本上无所悔恨。但如果他能一切重来，他但愿更用功些、对待自己更严峻一些，想得更深一些，从而写更多、更好一些的作品。当然，对于盛年而初老的他，这一切并未为晚。

鲁迅与我*

——在日本《文明浅说》班的讲话

同学们，晚上好！为了使你们听得清楚，我说话慢一点。有同学不用说得慢。那好！

语言是彼此互相了解的很重要的工具。中日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有过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曾经有过非常好的关系，也曾经有过非常不幸的关系。而如果中日两国人民能够理解彼此的语言，通过语言来增进彼此的理解、彼此的友谊和彼此的团结，那么我们便能够使这两个伟大的民族携手并进，为两国的和平、东亚的和平和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所以看到你们这么认真地学习汉语，我心情充满了喜悦。因为你们可能是将来我们两个民族和平与友好的最尖端的战士。

刚才横地先生要我介绍我读鲁迅的经过。不必我介绍，鲁迅是中国非常了不起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可是在旧中国，鲁迅被反动的、专制的国民政府看成是危险的作家。他的书不能自由地流通，不能自由地贩卖。这种情形到了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以后更加严重，很多人仅仅因为书架上有鲁迅的书，就可能被抓走，判刑坐牢。

我接触鲁迅是在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能接触到鲁迅呢？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光复以后，因为台湾曾受到日本统治，所以很多知识分子不能读汉语，也不能说汉语，可是他们有一种很大的愿望和喜悦，要学习祖国的语言。过去，是日本人统治的时候，汉语被强迫地夺走了，被强迫去学习日语，现在台湾解放了，光复了，大

* 本文刊于《鲁迅研究月刊》（北京）二〇〇一年第三期。

家都很高兴。可是因为几十年没有学过汉语，所以大家很热心学习汉语。

这个时候，台湾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做杨逵。他是台湾的一个进步作家，在日据时代他不但写小说，也参加了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台湾解放以后，也就是说光复以后，为了要使台湾的知识分子能够很快地学习汉语，他出版了鲁迅的《阿Q正传》。我还记得那本书，是这样长形的，每页上栏是汉语吧，下栏是日语，这样地，知识分子能够读日语，也能够对照起来，跟汉语互相对照，用这样的方式，去认识汉语、学习汉语。

我的父亲也非常热心学汉语，所以他买了很多这样的书。可是到了一九五〇年的时候，国民政府开始镇压在台湾的地下的共产党，镇压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所以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发动了国家的暴力（白色恐怖），抓走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很多的年轻人。大约有四千到五千人被枪毙，大概有八千到一万两千人被判徒刑。在那样的时代，很多人被抓走了，很多像《阿Q正传》的书被没收了，很多没有被抓去的人，凡是家里有鲁迅或者其他进步作家的书的人，都偷偷地把许多书烧掉了。

我的父亲也一样。他烧了很多很多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把《阿Q正传》这个小小的本子烧掉。他还有一本鲁迅的《呐喊》，你们知道这个小说集吧？我父亲把《呐喊》压在书架上成排的其他书本的背后。有一次，我偶然地发现了深压在群书背后的这一本《呐喊》，坐在那儿看。那个时候我才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我当然读不懂《呐喊》，可是我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阿Q，因为那个老头很有意思，很滑稽，所以我记得阿Q。

后来我上中学，有一次就把父亲的《呐喊》偷偷地带走了。后来，我差不多每年至少都要读一次。随着我的年龄渐渐增大，我对阿Q、对鲁迅的理解也渐渐地多了。阿Q或者鲁迅给我的影响很大。作为一个文学家，作为一个思想家，我想鲁迅先生一定没有想到，他死了以后，在遥远的台湾，有一个少年读了他的书，不知不觉地就走上创作与思想的

道路。

后来，鲁迅的思想、鲁迅的文学，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使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到旧书店去找别的鲁迅著作，他还有《彷徨》，还有《朝花夕拾》，还有一大堆，我去找。当然，找不全，找不齐。可是就在找的时候，我发现了别的作家，像茅盾，像巴金，使我在台湾与大陆已经分断的情况下，透过鲁迅和别的三十年代的作家理解了中国，理解了中国的革命，理解了中国的道路。

可是这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在一九六八年被国民党抓走了，因为我跟我的朋友一起看鲁迅的书，一起谈论鲁迅的文学。他们判了我十年徒刑。一九六八年我三十一岁，还没有讨老婆。好在没有讨老婆，要不然就很麻烦，这样到了一九七五年，国民党办大赦，我才又回到社会。

所以一直到今天，有一些评论家认为：我的文学的语言比较特别。我就想：如果我的语言，写的语言，果真有一点特点，大概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受到以鲁迅为主的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的影响。它是我接触的最早的文学的语言。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当时也在旧书店找到很多日文书，也是关于社会主义呀，比较进步的思想。为了想要知道、认识、理解这些书，我拼命地查辞典。所以我的语言有一点受到日语的影响。日语跟中文之间有一个很有趣的关系，凡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汉语，都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是吧？我读了一点日语，也开始会用日语来思维、思想，所以它会影响到我的语言，我的写作语言。

第三个原因，可能是我读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外国文学系，所以外文特别是英语，就是西欧的语言，可能也对我的语言产生关系。总而言之，一直到今天，我非常尊敬也很崇拜鲁迅，虽然他让我吃到苦头。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我看来，早在一九一八年，鲁迅就能以极为成熟的白话汉语写这么好的小说了。文学的语言的成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总是从比较不那么流畅，不那么成熟的语言经过几代作家的尝试，才逐渐变成成熟的优美的文学的语言，这是一般

的例子。可是鲁迅，早在一九一八年，忽然之间像一座高山拔地而起。他的语言非常的完美，作为白话文，我的看法，甚至今人都很少超过他。我不懂这个道理，因为跟鲁迅同时代的其他的作家写的白话文，并不是那样成熟。甚至像巴金和其他的人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可是只有鲁迅，在我看来，他的文章至今一个字也不能改，一个逗点、一个句点都不能改。这真是我们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奇案。

我刚刚听说我们的课程，就曾以鲁迅的短文作为教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比我小时候学习汉语的时候更好。我记得我的汉语课本里只有一篇鲁迅的散文，叫《鸭的喜剧》，短短的。除那篇以外就再也没有了。一个民族的语文教材，一定是收集了很多自己民族最优秀作家的作品，和这种最好的作品来教给自己民族的后代。可是台湾因为政治关系，中国三十年代文学作品从语文教材中消失禁绝了，所以我们整整好几代人，都跟中国的新文学传统断绝。我非常赞赏我们的课用我们中国最好的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当作教材。我觉得你们比我幸福。

好，就说这些吧。谢谢你们！

二〇〇〇年七月十八日星期二，于妇人会馆

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

今天我受邀到台湾的最高研究机构来谈我自己，一方面觉得很荣幸，另一方面也觉得很惶恐，因为你们不要看我块头这么大，其实我挺害羞的。特别是要讲自己的时候。我写了不少文章，很少写自己，很少说我的小说如何如何、我的小说是要表现什么……我的小说是怎么怎么样的，我等一下还要说到。我有个大毛病，就是对我自己的创作很不重视，不重视到很少把刊出来的东西剪贴整理。我有时候看到别的作家的年表可以写到他在幼儿园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被老师贴到墙壁上（笑），我一方面觉得很羡慕其自信，一方面觉得我应该是比较缺少那种所谓的“作家意识”的人吧，或者说是“作家意识”比较脆弱吧。所以今天坐在这里，我就想起一幅名画——我已经忘记那画的作者是谁，画的是一个解剖学的场面，中间有一个尸体，好几排的学生在那坐着见习。今天我坐在这里也罢了，还要自己解剖自己。（笑）我觉得很有点为难。不过如果我的自我解剖能够对于台湾文学的研究有贡献，不是对我的研究，而是对台湾文学的研究有贡献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尸体也是很有点用处吧。所以我前两天开始想了一下，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我的文艺思想的形成，就是我成长的过程。第二个就是我的作品的几个母题的归类。我的知识学问所限，我只能讲这些，也不可能讲很多很大的道理。

众所周知，我在二十几岁时偶然闯入了大陆上一世纪三十年代文学的禁区，读了鲁迅、茅盾和巴金，还有旧俄作家的作品，而且是由于偶

* 本文刊于《上海文学》（上海）二〇〇四年第一期。

然的原因，我受到鲁迅很深刻的影响。我的父亲那一代——到现在很多人说，台湾的知识分子在光复以后就进入到国民党统治的新的殖民地时代了，光复以后，台湾人就跟大陆闹不好——其实从我家庭的历史来看并不然。我爸爸小时候是一个很优秀很聪明的孩子，可是家里非常穷，跟那个时代的很多穷小孩一样，他要追求出路的。他从公学校毕业（公学校就是专门供台湾人读的小学），毕业以后，因为成绩很好（这种故事在台湾好像还不少），老师就舍不得他不能够再上中学，就跑到我爸爸家去，想对我祖父母做工作，一看家徒四壁，实在没办法上学，这个老师就送给他一本字典，告诉他，以后可以翻字典、工具书，自己求进步。就这样，他一辈子很善于学习，很会自己想办法学习，讲学习的方法。他年纪大的时候，比较有福气，我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美国，生了孩子要跟爷爷通信，可是写来的信都是英文，这下把他难倒了。他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就把好几本英文、日文跟中文的圣经排比起来，他对《圣经》很熟，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学了一段时期，写了第一封英文信给我看。我看了大吃一惊，当然难免有一些小错，可是爷爷跟孩子交流感情的内容却都表达了，他居然就一句一句地这样用英文接着写下去。说到我的父亲，是因为他给我的影响实在是很大，就是这个父亲，光复以后，他当桃园国民学校的校长，我曾经在一篇散文里写到我的父亲。我是我三伯父的养子，因为我是双胞胎，真正的陈映真是我哥哥的名字，他在九岁的时候就没有了，现在我哥哥比我有名，幸而还能够让我哥哥这样跟我一起活到现在。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记得很清楚，五十年代的时候，我爸爸的那个小学就失踪了很多老师。后来我爸爸跟我讲，当时的年轻老师总有点幼稚，常常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夹到腋下，表示他很进步，我爸爸因为是穷人家的孩子，所以他也受到了三十年代左翼思想的影响，可是他力劝这些年轻的老师不要这样做，太危险了，但还是有好几个老师失踪了。我爸爸是那样一个坦诚的人，那时当有人被抓的时候，什么人都不敢走近，可是作为校长，他常常去看被捕的老师的家庭，去看他父母，看他的妻儿，以至于引起当局的怀疑。还有一点，我父亲因为很会找办法学习，所以那时桃园国民学校国语文的

教育是非常有名的。他用表演唱歌、说唱、演戏的办法教国语文，他那时演了一出戏，我当时还看不太懂，我只记得很奇怪，那些人物怎么都会用重量的名称当名字，什么七斤嫂等等。后来才知道是鲁迅的作品《风波》。他当时为了教好中国的白话语文，到处去找外省人、能够说标准白话汉语的老师来协助教学。所以那个学校的语文教学全省有名，教案也受到很大重视。

我讲得太多了，大概年纪大了。我要说的是我的父亲跟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怀着很高的热情学习中国普通话。他们看杨逵先生编的那套书，长长的，我还看过那个版本，分成两栏，是中国三十年代著名小说。上栏是中文原文，下栏是日文译文，有很多的故事，其中包括鲁迅的《阿Q正传》。我的父亲就是用那种方法来学习国语文，学得很好。因为他对音乐有兴趣，所以他的发音特别准，这就引起了国民党的怀疑，说这个台湾人国语怎么这么好，他一定去过大陆，有问题，就从旁边调查很久，最后证明无事。我们不要忘记光复以后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间，大陆跟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现在的人无法想象。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当时也有所谓民主刊物，像《文粹》、《观察》，台湾都买得到。黄荣灿先生还曾经筹备在台湾设立三联书店，这对当时台湾知识分子的左倾化都有很大影响。我们研究台湾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一九四七到一九四九年一年多，在台湾《新生报》的副刊《桥》上，有过“如何重建台湾新文学”的热烈的、有思想深度的争论，在这个争论中有外省籍的知识分子也有本省籍的知识分子，在三月屠杀以后，还热情洋溢地带着悲愤的、带着力争同胞团结的决心，带着重建台湾文学、使它成为中国文学不羞愧的一部分的这样一种志向。《人间》出版社已把这个原始材料都搜集出版了。所以我的父亲以他的好学一定读过很多这样的东西。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幕是五十年代的时候住在学校宿舍（日式），我半夜上厕所，好几次在厨房里看见有幽幽的火光，我知道爸爸妈妈又在那里烧书了，他把书拆成一页一页烧了，就是所谓三十年代的禁书。这以后，我家里别无长物，就是我父亲一大堆藏书，什么《夏目漱石全集》、《芥川龙之介选集》呀，大正年代以来日本出版界

就一套一套出版的世界名著的全集。我就拿来看，我不懂日文，就看插图。有一天我在翻书，有一本红皮的小书，还不到25开的小书，就是鲁迅的《呐喊》，我就不告而取，看了半天，老实说，当时我才小学六年级，快上成功中学的那一年——看不懂，只有一个故事，给我印象很深，是写一个老头的故事，当有人打他的时候，他就诅咒，说，这个年头变了，儿子打老子，那就是《阿Q正传》。随着我年龄的成长，我差不多每年都会读那部《呐喊》，而且随着年龄的成长，我越来越了解《呐喊》的每个故事的思想内容，这就影响到我上大学后到台北牯岭街去寻找三十年代的旧书。有鲁迅，还有别人，我就在那儿找，差不多三十年代重要的作家我都找到了，茅盾啊这些人的都找到了。有时买不到了，他们就拿什么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啊什么的给我看。我心里想，我看这种书干什么？有一次他们给我看一本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任何青少年都认为他自己一定会懂得哲学，所以我就买回来了。买回来一看，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好像一夜之间这个世界都改变了。我的青少年时代当然已经开始喜欢写，不是写故事，而是有几个好朋友，喜欢写文章的朋友，常有书信来往，每次写的信都有七八页或八九页，总是写：“当我看见一片落叶从我的窗前飘落的时候，我的心是多么的酸涩。”但自从看了那些书以后，我接到这些朋友的来信，就觉得很无聊。我也不敢说“你很无聊”，所以回信就变成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不断地用我做家教挣来的钱在牯岭街的旧书摊上买书。这是我的命运，也是偶然。我觉得人生是一连串的偶然串成的，不是我这个人天生的怎样，其实我是个很平庸的学生，由于偶然的时机，从鲁迅、巴金、茅盾然后进入——他们没有三十年代文学旧书卖了，就给我《大众哲学》看，我就好像把眼睛揩明亮一样，觉得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我就开始买我以前不想买的，什么《政治经济学教程》啦，《联共（布）党史》啦。在六十年代我又买到一本英文本，叫 *The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Lenin*，第一卷。然后我看到目录的第一篇就是《共产党宣言》，吓了一跳，我知道有这么一篇文章，可是我觉得我一辈子也看不到这篇文章。我记得我找到那本破破烂烂的书的时候，手都在发抖，一看是莫斯科外语出版社出版

的。我的世界开始很大的转变。我看到那些旧书——台湾的知识分子常常有种习惯，在购读的书上会签名、盖章，购书年月什么的——我看着那些书就想着那些人。我那时已经知道，有一个时期，这些旧书的主人可能早被肃清，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那时年纪小，不住地一个人想象这个人可能早是怎样的。有些人读得很用功，有眉批。有的人前面的二十页看得很用功，二十页以后就没有了。

旧书就这样地改变了我的一生。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如果我是生长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看到这些书，我觉醒了、觉悟了，我就会看到无数的影子在那儿奔跑，无数的影子在那儿呼号，奔向读书会，奔向延安。可是在台湾。我越是读这样的书，越是变得跟别人不一样，我就变得越来越孤独。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把以前热情洋溢地互相写信的朋友都丢掉了。我感到危险，感到害怕，也感到思想成长的亢奋和兴奋。最近好像有一个研究生的论文——有人寄给我，我还没有读——研究台湾现代小说里关于死亡的主题，其中列了一个表，说陈映真的故事里死亡的次数最多（笑），我也常常被问起“为什么你动不动就把你的人物弄死”？我想我今天可以说——可是作家说的不一定是研究的标准，不能说：人家陈某人这么说了，你还能扯什么。——我想最大的原因来自我自己的觉醒——孤独——绝望——幻灭的思想经验，我常常写一个怀着一种非常暧昧、模糊不清的理想的人物，终于自杀或是死掉，我想这就是台湾特殊的条件下——我现在讲话比较自由——找不到党吧，找不到同志吧，找不到一种隐秘间新生的力量，所以我越是有理想的火花，越觉得绝望，越觉得我为什么生长在这里。我绝不是“不爱台湾”，但为什么我不生在大陆，参加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运动？这样一种挫折感成为我少年时代和青年时期作品里死亡意象的一个根源。我刚刚讲过从鲁迅、茅盾、巴金，一个偶然的机，就碰到左翼政治经济学，碰到马克思主义，碰到左翼文艺批评，像卢那察尔斯基，像普列汉诺夫，都是日文本——顺便说一句，我的英文日文都不好，外面有一些谣传，说我的英文日文很好，其实不然，不是我谦虚，可是我查字典还可以看书，其原因不是老

师教的，是我渴望看懂这些禁书。我当时找到很多日文岩波文库的书，像列宁的《国家论》、《帝国主义论》。日本的检查制度很有意思，书让你出版，可是很可能一页两页的连续打叉叉，我手里就有那种版本，很奇怪的“言论自由”。为了看懂那些书，就硬着头皮，有的略读，看上下文大概懂就算了，实在有一关过不去了，我就乖乖地查字典，就这样，我把日文、英文稍微学好了。就跟所有的思想过程一样，思想发酵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一种实践和运动的饥饿感，就是觉得老这样读书，什么都不做，很可耻。然后我又不敢把这样的思想告诉别人，但每一个青年都有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我就跟最要好的画家吴耀忠（已过世），形成了一个很小的读书小圈子，后来当然被国民党特务渗透，很便宜就把我们卖掉了，坐了几年牢。我要讲的是，这都是偶然性，不是我的天资特别好。你们可以考察我学生时代的成绩，特别是数理，一塌糊涂。我曾经热烈地想过，要当一个医生，不是想赚钱，是那个时候，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史怀哲自传》什么的，那本书虽然不好读，但影响很大，我想我不能到非洲当医生，至少可以到台湾山地原住民部落当医生。但是有一件事情阻挡了我，就是我的数理太差，每次考试都十几、二十几分，我知道是绝望了，可是如果数理好一点，我的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那么这就是决定我以后的文艺思想、文艺创作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是我这个人又不是真正的横眉怒目的那种革命型的人，我这个人很懒散，读书不求甚解，我的文学青年的个性可能是比较强的，我后来想，比起现在能自由读马克思的年轻人来说，从文学出发的左倾，从艺术出发的左倾，恐怕是会比较柔软、而且比较丰润，不会动不动就会指着别人说，是工贼、叛徒，是资产阶级走狗，说鲁迅的阿Q破坏了中国农民的形象，像那种极“左”的。我想我比较不会走向枯燥的、火柴一划就烧起来的那种左派，所以这一连串的发展我只能说是一种偶然。我到坐牢的时候起就想到一个问题，人生其实是一个圈子，偶然性的一个又一个圈子，互相扣在一起。如果扣上的圈子是别的圈子，我也有可能变成一个买办阶级，因为我曾经在外围公司上过班，不料从总部来的一个老外，对我特别欣赏，破格提升我为 sales manager（销售经理），把

我吓坏了，那一年刚刚好聂华苓女士那边的“国际写作工坊”让我去，我就心里有一个底子，我反正不能接受你这个销售经理，我要到爱荷华去，可还没去，就被抓到外岛蹲着了。

影响我比较大的有三个作家，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芥川龙之介，一个是契诃夫，这三个人除鲁迅后来变成一个很有战斗性的作家以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性，他们都不是那种横眉怒目式的、“四人帮”式的作家。芥川有一种神经质，一种说不出的鬼魅的味道，都不是正牌的、左翼的青年所应该向往的作家。契诃夫也是一样，他绝对不是一个革命作家，虽然他是属于那种很苦闷的俄罗斯年轻的知识分子，远远地听到革命的动静声在响起，他还是坐在客厅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的知识分子同僚在聊，写尽了革命前夜俄罗斯自由知识分子的彷徨和苦闷。我非常喜欢他这种风格。说到鲁迅，他是中国革命文学里一面很大的、大到可以蔽天蔽日的旗帜，可是鲁迅迷惑我的，除了他的思想，他的对于旧中国的人民的关怀、对国民性改造的热情以外，他的现实主义的魅力，不仅来自于他的现实主义本身，还来自于他早年受到的俄国象征主义的影响，像《狂人日记》那样的小说，成为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很大的奇迹。我一直到今天都是鲁迅迷：他不但文字好，连他的标点符号，我都觉得充满了生命力。除了他的现实主义、革命主义之外，还有他的散文诗，在他的小说里面，那种象征主义的手法，使他的现实主义更加丰润，在审美上更加丰富。

其次我就谈一谈，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三十年代的文艺思潮，像文学为谁、文学为什么、文学怎么写，这些问题深深影响了我。所谓民众、民族的文学论，一直到今天都是我很深的关怀。所谓民众文学和民族文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革运动中，民族民主社会变革的主题，用洋人的话说就是革命，民主，为了要把人民从封建枷锁中解放；民族，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当然我也反省到，即使包括鲁迅在里面，巴金茅盾在里面，他们的作品要给真正的、直接生产劳动者来读，还是读不懂的，可是我觉得，重要的是作家的志向、思想、态度。他的创作是为谁创作，要创作什么，要写什么，要用什么样的语言

风格形式来写。凡此，对目前的时代来说是老掉牙的问题，可是对我一直还是个重大的创作信念，虽然我写的东西肯定所谓的大众也看不懂，不要说大众看不懂，大学生研究生也不见得喜欢我的作品，读的人也很少，但我仍然相信，文学不应按外来的处方笺来开药，就像我们经济按别人的订单出货。文学的根本性质，我觉得，是人与生活的改造、建设这样一种功能，我非常希望我的作品能给予失望的人以希望，给遭到羞辱的人捡回尊严，使被压抑者得到解放，使仆倒在地上爬不起来的人有勇气用自己的力量再站起来，和恋爱快乐的人一同快乐，给予受挫折、受辱、受伤的人以力量，那样的文学才有意义。台湾战后文学有一个很大特质，就是过分受到外来思潮的影响，在台湾战后资本主义远远还没有发展到所谓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五十年代，它就跟“反共抗俄”的文学当做双生儿，以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形式出现在台湾的文坛。一直到现在，很多的命题，像后现代，像身体，像性别，像情欲，像多元，这些东西，我觉得作为一种知识，加以研究，当然是有价值的，可是我也注意到，我自己喜欢画画，连我们的艺术界，也有大量的留美的老师回来，带来了一大堆观念，现在的画家，可以画不好素描，他可以把一千个可口可乐空瓶怎样弄起来，布置成一个艺术品。这样的作品，我当然愿意承认它的存在，可是我一直觉得所谓的多元、自由绝不是没有原则的多元，是在各有各的主张的基础上，允许别人的主张存在，而不是什么主张都没有的一种虚无的状态。现在的台湾文学界的批评都有一种定论，说陈某人的早期作品是现代主义作品，对这个，在各位面前，我不敢班门弄斧，可是我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我不认为现代主义是一个羞愧，他们的根据大概是在早期的作品中我用了比较多的象征手法，有很多的死亡意象，有很多绝望、虚无、苍白的东西，实际上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年轻时有过几个很聪明的同学，后来都读哲学系了，后来怎么样，我也不清楚，他们中的一两个，常常会有一段年轻时期，很害怕自己会自杀。一种死亡的内在驱动非常强，强到不敢看到刀子、不敢看到绳子的地步。这是青年期的哲学思想的一种发酵吧。可是我从来没有那样的时期，我调皮、捣蛋、喜欢玩，可是为什么我的青年期的

小说里出现那么多死亡的意象呢？我刚刚也说出了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呢，特别是大陆对台湾文学的评论常有的一个问题，就是“现代派作家”跟“现代作家”好像分得并不很清楚，用洋人的话说是 modern writers 和 modernist writers 应该有一个区别，前者是文学史分期概念，后者是创作方法的概念。所以用大陆的分法，白先勇、聂华苓都被归成现代派的小说家，这个我有点意见。当然丛苏、王文兴、七等生那又是另外不同的讨论了。实际上在座的各位也知道，对所谓现代主义的艺术、文学的讨论和辩论，时间的跨度是很长的。二十年代或者三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我看的书这样告诉我，地理的跨度包括苏联、旧东欧、英、美、法、德、中国、中南美洲、东南亚甚至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韩国，都有现代派文学、现代主义文学跟“参与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以及第三世界的用自己的土话写的相等于“乡土文学”的文学之间的长期争论。我个人觉得，是不是现代主义，不能仅仅看技巧的问题。比方说，我刚刚所讲的，中国的第一篇了不起的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实际上就有很多所谓的现代主义的质素在里面。比方说潜意识，或者不正常的心理学，特别是他的很多散文诗是如此。可我们绝对不能说鲁迅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小说家。

我查了一下我自己手边的资料，对于现代主义采取反对或者批判态度的、指出现代主义的几个特色，我这里很快地把它说一说。第一点，现代主义往往把人和他的个性与社会对立起来，个人跟社会的断绝和对立，把个人的福祉跟群体的福祉对立起来，就是极端的个人化。第二点，现代主义沉湎在极端的个人内心的心理的世界，夸大了官能、肉欲的重要性。以官能和肉欲证明个人的存在，强调极端化的个性跟极端化的自由，以悖德的描写、反社会的描写为前卫、为革命，其实他自己不见得有自己新的道德论和人与人关系的理论体系。现代主义对于人、对于劳动、对于生活、对于社会和历史完全冷漠、给予嘲笑，把文学艺术与具体的生活在分工上完全对立、割裂起来。把生活和社会的联系完全切断，现代主义基本上主张人的本然的孤独和非社会性，用存在主义的语言来说，人是被抛弃的一种存在。除了他自己——艺术家自己，没有

别的现实，现代主义认为生活是没有条理、没有意义的，不可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人不能改变和改造世界，世界也不能改变、改造人。由于现代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生活，带来了人精神上的颓弱，因为精神的颓弱，而耽溺在各种各样的迷幻药剂和毒品里。对于音感、色觉、味觉、肉欲的混合和颠倒，从一个声音感觉到一种欲望、从某一种颜色感觉到一种味道。他们认为这个才是真实的现实，而现实主义所描写的那种生活上的现实，是表象的。现代主义嗜好恐怖、恐惧、焦虑、孤独、死亡、尸体、血，甚至腐臭这样的意象，加以夸大和变化，等等。所以我一直认为，现代主义的判准不仅仅是从技巧上来看。我觉得首先要看这个作者讲不讲作品的“意义”，有没有一个意图、意旨。现代主义是追求艺术、文学的绝对的纯粹性的。他们嘲笑任何作品企图要表现的“意义”或“意念”。五十年代搞现代派的朋友告诉我，一幅抽象画，就像一曲音乐一样，你不要想从那个抽象画里面去理解，而是要找寻一种自然科学似的“纯粹”。它排斥意义，当然什么使命啊解放啊改造啊，就更不在话下了。虽然这么说，我觉得现代主义有它的合理性。第一个合理性来自它的社会根源，我想评论界、文艺社会学上的评论大都认为现代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个时期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化的资本、社会化的劳动、社会化的消费，这样的社会变成现代的社会，现代的城市，人口向城市拥挤，那么对于人产生了强大的逼迫，使人想要逃遁、想要回避，憎恶这样的城市和人群。这是精神上的空虚、消费社会对于欲望的满足、与满足以后的空虚不断地反复循环所造成的。所以，从西方发端的现代主义有它的合理性。我们把现代主义引介过来就很值得讨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现象，我个人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东方主义，是以帝国主义偏见的眼睛所看到的东方——落后的第三世界的意象或描写；另外就是描写自身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里面受到挤压的精神上的伤害。现代主义的第二个合理性是，我个人认为，现代主义也分两种。一种是进步的现代主义，特别是像聂鲁达、阿拉贡和毕加索，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虽然手法是现代主义，可是他对于佛朗哥的批判、对共

和军的同情，以及他的《战争与和平》（一九五一年还是一九五二年的），标题我忘了，描写了中国知识分子所不熟悉的韩战时期发生的美军对韩国平民百姓的集体屠杀，是一种抗议性的作品。我想你们应该记得那幅画，有人射击、有人抱着小孩子。虽然他手法上不是古典、传统意义的现实主义，可是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画，因为有意义、有关怀、有对正义的企图与企求，有对于人的尊严的一种信念，所以我不认为他们是现代主义。可是一直到最近以前，我看了郑树森的《小说地图》以后，有点大吃一惊。我原以为现代主义大都是以西方世界的作品为主，没想到在辽阔的第三世界现代主义也非常之多。我企图为这个现象找个答案吧。第一个我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或者是殖民地的世界史去考察，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我也碰到过几个，南韩的黄皙瑛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黑人作家索因卡。索因卡算是对西方很批判的一个作家，可是他的创作不能不用英文，而且他的手法也相当“现代派”。我想有几个原因，因为他们殖民地的历史很长，从十六世纪开始。我们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才沦为西方半殖民地的。我们中国，特别是台湾吧，有很深厚的中国文化文学的底子，五十年的统治或者一百年的统治，要把原来的文化文学消灭掉是很不容易的，可是对于一个在帝国主义世界有四百年历史的殖民地呢，当然就培养了不少的，即使是反对派的殖民地精英。他们用宗主国语言写作，用宗主国来的方法写，面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学园和文学精英写作，所以他们的读者极大部分恐怕是西方校园里的精英。很显然地，历史原因造成他们用现代主义的手法表现。我问过索因卡：像你这样的小说，你反对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那你的同胞看得懂你用英语写的小说吗？他给我的回答是很有启示的。第一，他说：看得懂，因为他们读英文的在地精英知识分子不少；第二，他们的文学有另外一块，就是给文盲或者英文不是那么好的人，专门为他们写的作家的作品。我说那是什么？他说就是各种土语写的作品。另外一块就是“广播文学”，那就是诉诸听觉的文字。因为他们有很多文盲人民不能读。这使我想到一个故事。我在一九八三年到爱荷华的时候，第一个会是让来自各地的作家说说他们自己的文学。有一个

非常优雅的南非老太太，在我眼里看来是个白人。她不断地说明她是南非的作家，不断地说明她不能像别的地方的作家那样写作，不能仅仅为了早晨盛开的玫瑰花而去写一朵玫瑰花，她不可能为了一个像花朵一样灿烂的婴儿的笑容去写一首诗，她写的时候，不能只考虑这个字跟那个字，这个词跟那个词所结合起来的效应，她必须考虑到，当她在一个秘密的集会里朗读给那些群众听的时候，他们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她说他们这些人的作品在南非没有一个出版社敢出版，倒是外国人偶尔来拿他们的作品翻译成别国的语言，在外国的校园、外国的讨论会里去讨论，可是他们的同胞完全不知道。我听了感动得很，我说哪里有白人有这样的胸怀。所以她讲完了以后，我第一个上去跟她握手，我说，我非常受到您的话的启发，我没想到南非有你这样一种白人作家。老太太非常优雅、慈祥地对我笑一笑，她说：我不是 white，我是 color——她说 color 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是她是介于有色人种和白人之间的混血，在南非他们都不算是白人。在那么早，一九八三年，她说，Chen, I can tell you, 我们一定会胜利。我说我希望你们胜利。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悖德、这样的压迫是没有继续存在的道理的。一直到南非解放以后，我都还记得这个老太太。我才知道我自以为很激进，却其实也很讲究这个字跟那个字，这个词跟那个词结合起来的效应。可是有一些地方，有些作者，为了写给她的民众，不是为了指向外国的校园和精英，而是为了她自己受践踏的老百姓，从她的诗里面得到力量，她必须用听觉去思考，然后在秘密的结社里面，读给他们听，然后群众流泪了，或者握起拳头，重新站起来。我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种作家，给我的冲击很大。

这里也说一说我（在爱荷华）第一次看到的一种矛盾。我不会喝酒，可是他们都很有会喝啤酒。那时我第一次看到中国大陆的作家，茹志鹃王安忆母女，还有吴祖光，我当然是很兴奋。我也第一次看到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可是一谈起来就觉得不太对，完全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还有一个来自菲律宾的、比较左倾的作家，跟他们谈，东欧的作家很羡慕西方的作家能够自由地描写性啊、个人的生活啊、某种

颓废啊什么的。这种说法让我们大吃一惊。我那个菲律宾的朋友简直是破口大骂，说“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搞得东欧的作家说：“你好像我们的政治局委员。”（笑）反正争执是非常激烈的。他们喜欢偷偷地看好莱坞的电影，我们说好莱坞的电影是垃圾。反正就是这样。可是到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人用他自己的语言唱起《国际歌》，这个《国际歌》立刻引起了共鸣，不同国家的作家用不同的语言，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一起唱《国际歌》——好在那个时候我已经会唱中国版的《国际歌》了——唱得大家满面热泪。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刚刚还争执得那么厉害。

最后一点，我要讲我的文艺思想。我刚刚说过，我很不重视我自己的文学，这是我的一个缺点，不重视到有点说不过去。其不重视的原因可能也受到少年时代的影响，以为文学其实也没有那么伟大，文学其实是表达我自己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包括政治在里面）的一个工具。文学工具论是很多人不能忍受的一种说法，可是我要在这里很坦白地说，我是文学工具论者。既然说是工具，首先是因为我有所思，我有话说，所以我写成论文，所以我跟人家打笔仗，所以我写小说，办《人间》杂志。不管用什么形式，只是我自己的思想的表达。不过话虽这样说，我还是觉得玩各种球有各种不同的规则吧。你说你在打篮球，你总不能抱着个球满场跑。那么你说你这是小说，就要尽全部的力量把它写成像一个小小说。在艺术上要能过得了关，要不然像三十年代的“恋爱+革命”的那种文学，是行不通的。我不写那样的文学，是因为那样不能达到我的目的。举个例子来说，《铃铛花》吧，我在写《铃铛花》的时候，踌躇甚久，因为当时还没有解严，我的坐牢的经验里面，听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以前年纪小的时候，只从耳语听到的那些被抓走的人物，到了监狱里面看到时他们都已经坐了十八九年的牢，本省人有，外省人有，少数民族也有。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同志，他们的妻子，他们很年轻时就离别的爱人。甚至我活生生地看到十几年含辛茹苦带着孩子、凑一点钱跑到绿岛来看丈夫的妻子。我有一个朋友叫 TAKE（日本名字），他因为是少数民族，十几年从来没有人来送东西给他吃。有一天我们的牢房门打

开了——因为是铁门，所以声音很刺耳——“某某某，有接见！”他不相信，就没有站起来，继续想要下围棋，班长就生气了，说：有人接见！他就很奇怪。因为牢房里面热嘛，都没有穿衣服，只穿短裤头，他就穿了衣服、裤子出去了。我们都很好奇，不到三十分钟，他回来了，拎着一个小小的包裹，装着水果啊饼干什么的。他的身体非常的好，那时候他年纪大概四五十岁，是那种倒三角形的体格，牙齿是雪白的，他那样子进来，眼睛含着泪水，可是嘴角却笑得很开心。他用日本话骂人，“BAKAYALO！他妈的，没有爹在家的孩子竟然也能长这么大！”他的孩子终于当完了兵，找到了事情，第一次来接见他的爸爸。他就很高兴把东西跟我们分享。牢里有一种文化，就是分享的文化。不能说是共产主义吧。（笑）很多外省人——特别是外省人——所以有人说外省人对本省人如何如何是没有道理的话。外省人都是军工教，再好的朋友都很难来看你，因为看你就要登记，一登记在机关里的升迁就有问题，极少的有两肋插刀的朋友——反正我干到上尉，我不想往上升了，我可以来看你，过年过节来看你——那是极少数的。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就会成为问题，比方说，卫生纸、肥皂，还有调味品啊、味精啊、辣椒酱啊，我们可以买，因为大锅饭煮出来的面像浆糊一样，你不弄些调味料不好吃。可是政治犯，真正的政治犯都有一点自尊——“我这个给你”，我也不好说，你也不会接，所以就形成一种文化，我就故意说：我怎么糊涂了，填单子填错了，多买了一包卫生纸，你拿去当枕头垫着吧。这个还得有很好的交情，他才会接受，他懂。然后他用什么来回报我呢？我们牢里有时候吃包子，他说，老陈，你喜欢吃馅——世界上还有不喜欢吃馅的人吗？——我不喜欢吃馅，我就喜欢吃这个面皮，我是北方人。我就赶快说：馅都给我。用这样的方式来交换，使他能自由无愧地接受我以后要买给他的东西。所以当我要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指《铃铛花》），是一九八三年，还没有解严，远远还没有解严，我的顾虑很大，可是心里面的写作的呼唤很强。我看过德国关于纳粹集中营的很多艺术作品，这样的苦难除非变成一种艺术作品去升华去反省，我们共同的受伤害的历史，才能够得到疗愈。何况我在里面听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

动人到没有人相信。我写《山路》的时候，很多人说，你这个故事太理想化了。因为他用现在的生活来看，那样的感情是不可理解的。可是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历史里面，这样的故事多得不得了，在越南、在中国、在朝鲜半岛，多得不得了。于是我第一次考虑到艺术性的问题，尽量地把它写得艺术一点。艺术一点有两个目的，第一个越是艺术性高，它的歧义性越大，它解释的空间越多。哪一天有人来找，说你哪一段这一句话什么意思的时候，我就可以解释得更多一点。第二个是艺术性越高，它就变成一种糖衣——这个听起来很工于心计——让人家能够接受这故事。不过后来很安慰，虽然我不太相信，有读者说他看我的《山路》、《铃铛花》都哭了，我一看他才几岁，他怎么会为这个东西哭。当然不是很多，可是我听到了两三个。起先怀疑，其次我就有点安慰，即使写给他一个人读，我觉得值得。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家要言之有物，要有思想，要有主张，可是呢也要有审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里很早就说过，对于那些“革命+恋爱”的作品也提了很严厉的批评。他们说：一定要尊重艺术品本身内在的、非常细致的、相对的自主性，不能用套公式的方法，不能教条地去创作。这句话我读到的时候并不早，可是我读到的时候是晴天霹雳，我觉得这两个人太了不起了，我为他们两个坐牢好像有点值得。

那么另外再讲一个，你要搞现实主义，难免要搞一点调查研究。比如说我写《忠孝公园》，我做了一点调查，读了一点资料，读了一点日本军在菲律宾的暴行，读了台湾军人、军夫在日本编制里边的所作所为，读了关于情报局、保密局跟整个满洲国、国共内战结束然后变成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一直到台湾之后的资料。我读了不少大陆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被关起来的人写的回忆录。因为是搞现实主义，不能凭空杜撰，那么我写小说，特别是后期的，总是要写笔记，我要表现什么，角色甲是个几岁的人，哪一省的人，他是干嘛的，等等，写了很多笔记。后来我参观中国大陆现代文学馆，非常惊讶地看到茅盾的笔记，比我要详细得多。他是要批判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软弱性啊什么的，都写得很清楚。可是我要告诉大家，这种写作方法是非常枯索的，按照药单子

开药、按照订单出货。可是非常非常奇妙地，每次我写完小说，再跟这个笔记本一对呀，大概只留了三分之一左右，我准备了很多，本来要大显身手的却被完全丢掉了。写的时候——我不愿把写作神秘化，什么天才啊，神来之笔啊，不过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它会忽然之间来，忽然之间来了一段对话，忽然之间告诉你故事的方向，忽然之间觉得故事应该怎么安排。这样的突然，以至于你必须赶快在稿纸的旁边把它记下来，怕待会忘掉了。我想写作的乐趣对我来说就在这里，就是那种突然来的火花、灵感。我一方面很不愿意把写作神秘化，一方面我必须证实写作过程中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存在。而且往往别人比较赞赏的部分，不是我写笔记的那个部分，而是突然来的那个部分，比较受到赞赏。我不研究文艺创作，研究文本啊什么的，可是我必须说，它太迷人了。有人说我与陈芳明论争，其实“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而且论战了半天也没什么用，主要是语言不一样，我所使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词语不但读者不懂，陈芳明更不懂。实际上那些知识都是三十年代的高中生用功一点的都滚瓜烂熟的知识，可是我们在这里的大教授看不懂的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这个也不是说不好，这是历史的结果。这是一个民族分裂、历史割断的结果。白色恐怖不止是抓了人、杀了人，它摧毁了整个时代的思想、哲学、社会科学、审美体系。所以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写实主义不见得要横眉怒目，在写作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很奇妙的经历，这是我常常有的体验。所以我其实不喜欢理论，不喜欢论争，比较喜欢创作。可是为什么要搞那么多的理论和论争呢？实在是不得已。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科学界没有一个队伍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台湾社会的性质，social formation 即台湾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体的问题，或者没有人解决战后台湾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分期的问题。像这样的理论问题在八十年代的韩国、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一大批人在做。我就看他们的书就好了嘛。可台湾没有。我又是一个在思想上没有出路的时候，没有办法写作的人。所以就皱着眉头，找一些书苦读了半天——当然也有乐趣，可也浪费了我不少时间。

最后我要讲的，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就说我非常缺少作家意识，特

别缺少大作家的意识。有时候我常常读到对我的小说的评论，因为对方很客气，正面的评论比较多，但那种比较正面的评论文章，我读了三分之一就觉得很别扭、很不好意思，就很少去看完。不是说看不起的意思，而是说——这个理由有几点：第一个，我也知道中国跟世界文学史里面的一些巨匠，他们，一尊一尊的巨匠站在那里，我抬头的时候，如果我戴帽子，帽子一定要掉下来——那么伟大的作家，想起这些作家，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就觉得我怎么斤斤计较要跟人家说我这段在写什么、为什么这样写，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因此呢，也不是矫情，我就不怎么太喜欢忙着把自己的作品翻成外文。我想我们的青年都不太看你的作品，你翻成德文又怎么样？怪没意思的。所以对于得奖啊、翻成外文啊，我基本上不太热衷，这不表示我谦卑或者是什么美德，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不要相信这些，就是我的个性吧。

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第二个部分，如果有时间我就讲，如果没有时间就算了。可以啊？这样吧，我把第二部分以最简单的方式在二十五分钟内讲完，时间到了你就把我打断。……喝水，啊，对对，渴死了。讲一讲也好，可以节省等下发问的时间。

就讲主题。我是个——“主题先行”是骂人的话，可是我公开承认我是个主题先行的作家。我刚刚讲过，我有话要说我才写小说，很多人认为搞文艺创作不应该这样，应该为了艺术而艺术。第一类主题我刚刚讲过了，童年时代的思想觉醒和伴随这觉醒而来的绝望和幻灭的感觉。我常描写一些理想主义者的幻灭和堕落，比方说《故乡》里的哥哥从南洋回来了，他是个医生，你说那个时候医生有多值钱啊，而他跑到一个炼焦炭的工厂去当医生，后来居然堕落到开赌场之类的。这理想与理想的颓废、虚无，甚至幻灭、绝望这样的题材，像《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教师》、《苹果树》、《故乡》、《一绿色的候鸟》，那个时候隐隐约约觉得好像象征某一种不知道什么东西。你可以说是理想，是一种梦想，说不清。太阳照耀着屋子，一群人围着快死的女孩子在忏悔，然后那女孩子静静地死掉了。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对大陆来台的族群，就是我们所说的外省人，一直到今天我都非常关怀。这关怀的故事，我已经大

概在文章上说过了。光复不久，我们家后院搬来了一家人，租一个日式的小房间，一个哥哥、一个嫂嫂、一个小姑、一个刚刚生的小婴儿。来了不久——他姓陆，我记得，大陆的陆——哥哥就跑到南部糖厂去上班了。记得有天我上学发烧，所以早退回家，觉得街上非常冷清，几乎每个墙角站着一个人，一个陌生人。进家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因为那个小姑姑没有工作，整天就跟我那个姐姐笔谈，变成很好的朋友，而且她也很疼我，我平生学到的第一个很深奥的词，就是“神态”，她指着我跟我姐姐说：“他神态很好”，写在报纸上面。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神态”。就是这个大姐姐呢，被带走了。我每次回来一个习惯动作就是跑去找她，这次当我跑去找她的时候，我家人就用很小的声音说“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当时我有点发烧，所以迷迷糊糊地就去了，正值她要出门的时候，摸摸我的头，就被带走了。过了不久两兄妹都被枪毙了。我讲这个就是说明，第一个是从大陆来的这些人和我们很不一样，讲话也不一样，上榻榻米也不知道要脱鞋子。所以我常常写关于他们的事，像《文书》的人物是一个来台湾镇压“二·二八”事变的宪兵队的老士官。当然在那个时代我没有敢明写。另外《猫它们的祖母》，就写一个台湾的老奶奶跟孙女住在一起后来就招赘了一个外省的下级军官，他们的生活情况，跟一堆猫生活的故事。《那么衰老的眼泪》就是写一个外省籍的人，雇了一个台湾籍的女佣，虽然他们已经圆房了，可是因为各种原因老不娶人家。她娘家里有个兄弟就很不满，就把她带走了，带走了以后，那个老先生就掉了眼泪。《将军族》就不用说了。《一绿色的候鸟》也是写一群知识分子——教授的社区里面，也是有人把女佣收来做妻子，非常要好，后来这个女佣忽然死掉了。《第一件差事》描写一个大陆的流亡学生千辛万苦往上爬，事业有成，跟另外一个台湾的有钱人家的女孩、在跨国公司做事的女孩的一段情人关系。那个人忙了半辈子，觉得没有路走了，就自杀死掉了。《某一个日午》描写楼上一个没有出场的老头子，凶得不得了，动不动就用拐杖撞地板，楼底下一个儿子和台湾籍的媳妇，很害怕他。他整天梦想着要乘一座船回到大陆去。这种比喻太明显了，所以姚一苇老师力劝我不要发表这篇作品，结果我坐

牢以后，我的朋友尉天骢兄就为我换了一个笔名在香港发表了。《累累》是我当兵的时候，第一次进入全部是男性的一种粗犷、野性的世界，看到的外省老兵的故事。

第三个是关于中落的家庭——说中落不对，因为我们家也没什么钱，有钱才能说中落吧。我的养父死了，在我高中那年，我就留在台北，全家就迁到台中——我的生家，为节省开销。留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在台北过着非常贫穷孤单的忧愁的青少年的生活。那个时候我就会回想起自己的老家，乡村的老家啊。所以像《家》啊、《故乡》啊、《祖父和伞》啊，这样的故事，我想都有这样的色彩。

第四，我回顾起来，我对精神病患好像也很有兴趣。我估计是不是受到鲁迅的影响。《凄惨的无言的嘴》、《文书》其实也是。后来那个人疯掉。我想世界上有个通例，写疯子呢，往往是疯子比正常的人更正常。“救救孩子”这话是从疯子的嘴里讲出来的，没有人把它当回事，而讲出来的道理之批判、启蒙，是非常大的。《凄惨的无言的嘴》写一个在精神病院里的一个人看到一个被杀的妓女的故事。《苹果树》、《贺大哥》是我坐牢以后写的，那是我看到整本的关于美军在越战的美莱村大屠杀以后，我也用精神病学的方法写。可是我坐牢前，有一个《六月的玫瑰花》也是写越战的。在当时，我们台湾的知识界受到美国的影响比较大，认为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是为了“捍卫一个自由、民主的越南政府”。当全世界都在批判越南战争的时候，台湾很少有批判的声音。我要指出一点，台湾的文学作家往往在一些问题上比较敏感，比方说，写越战的，还有我的好朋友黄春明，写跨国公司也好、洋买办也好，反映了六十年代台湾经济跟外来投资关系所形成的人的关系。在当时台湾的社会科学界，很少人谈到现代化和新殖民地化的问题和新殖民经济这类问题，越战也是一样。黄春明的《我爱玛丽》，还有，王贞和的好些作品也写美军到台湾来度假玩女人的题材。我觉得台湾文学家的敏锐性是很值得佩服的，除了我以外。

另外就是对于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讽刺吧。这种讽刺也不痛不痒。在《唐情的喜剧》里，我以唐情来讽刺当时台湾知识界流行的各种外来

流行论述，什么存在主义啊，逻辑实证论啊，唐倩就像是一个工具一样，周旋在几个流行的派别之间，跟不同的派别的泰斗谈恋爱，最后跟一个在美国做生意的谈，就把从前一堆情人一脚踢开，变成美国公民了。像《最后的夏日》也提到了在中学教书的老师的思想、心理状态。《某一个日午》、《上班族的一日》也描写一些知识分子精英在跨国公司的钩心斗角。

有一篇我倒很想说一说，我对于基督教的看法。我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每天在找自己的错，然后百般地求耶稣赦免我，我想这样的体验对我是有好处的，就是省视自己软弱一面的习惯，虽然我已经几十年没有上教堂了。随着我思想的转折，我逐渐用不同的眼光去看问题。《加略人犹大的故事》，耶稣出生于拿撒勒那样一个被耶路撒冷人所鄙视的、贫穷的、最没有文化的底层的社会，出生在那里，并且在那里向低贱的劳动者传道，向妓女传道，跟被别人所排斥的麻风病者、瞎了眼的人、税吏传道；对那些有知识有学问有财富的法利赛人却大声地斥责。这使我觉得耶稣不是圣诞卡上那个大大的眼睛看着你的“温柔的耶稣”，而是一个“激进的耶稣”，所以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然可能有神学上的意义，可是我觉得他是作为一个颠覆了一个时代思想的思想家的身份被处死。在那个时代，当一个人敢说上帝爱每一个人——这个是现代的基督徒说得像顺口溜一样的，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时代当一个人说神爱每一个人的时候，除非他是个神经病，否则那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叛逆的语言。神应该只爱那些神拣选的人，神只爱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有正统的宗教特权的人，怎么可能爱每一个人，怎么可以爱一个麻风病人，怎么可以爱一个税吏、人人憎恨的税吏——罗马帝国在以色列行包税制度嘛，税吏是众人所瞧不起的——怎么可以爱妓女，让妓女用她的头发洗耶稣的脚？我从绿岛回来有机会看到那个著名的歌剧、电影 *Jesus Christ, Super Star*，非常地激动。*Jesus Christ, Super Star* 里面的耶稣是非常懦弱的，可是犹大的形象跟我所写的形象很像，是一个改造者，一个想要解放人的人。但我终于按照《圣经》的文本去写犹大，因为我非常爱我的父亲，我怕我父亲看了这个故事难过，说这

个儿子离经叛道。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是我很大的关怀，就是基督教跟社会主义的关系，跟人的解放的关系。这个就不在这里讲了。

其次一个主题，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跨国企业中的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的扭曲，如《上班族的一日》、《云》。我想第一次写工会、女工的斗争，这些都是在戒严时期写的，还有《万商帝君》。另外一个我已经讲过了，是我对越战的关怀，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的关怀，所以我对这次伊拉克战争也非常关心。有《六月的玫瑰花》、《贺大哥》，贺大哥因为在美莱村犯了他永远没有办法释怀的罪，所以他就得了精神病，换了一个人一样跑到台湾来做善事，后来被他的豪门的家找回去。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关于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我不是要写共产党员的伟大，其实不是的。我想见证，就在那样苛刻的时代下，有一群年轻的人，把他们的一生只能开花一次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他们的信念和理想。这样的一种人性的高度是事实上存在过的。这个运动后来的堕落、后来的变质，就像基督教会后来的堕落、变质一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我想就是这样的一种历史的伤痕，应该有艺术作品把它升华起来，不应该变成一种族群的仇恨啊，或者对国民党的仇恨啊，问题不在这里。因为五十年代的肃清共党 red purge，老实说，五十年代以后到八十年代，美国为了维护它的冷战利益，在全世界犯下了比台湾更为严重的人权蹂躏的罪恶，酷刑拷打、暗杀、集体屠杀、失踪、政变，不可胜记。有人研究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〇年间美国对外出兵干涉大概有四五十次。干涉不要紧，常常是为了支持一个反共的独裁政权干涉人家内政，所造成的人权问题非常的严重。所以这是个世界史的问题，不只是国民党一个党的问题。那么知识分子应该关心。我有个主张，就是历史主义。国民党犯过这个错误，一部分外省人也不能不参与。我想我后来写戒严体制的反省，比如说《夜雾》、《忠孝公园》，想说的是，那是历史所造成的，可是我们应该正视这个历史，当历史过去的时候，我们应该清理这个历史，然后从这个历史里面学习经验和教训，并且超越之，让我们不要重新犯这个错误。

最后我要讲一点是，我十分关怀今天可能是比较多的人不表赞成、

或者觉得奇怪的一点，就是我对于我们民族内部，因为内战的构造和国际冷战的构造所造成的民族分裂对立，同民族之间的仇恨、同民族之间的憎恶。我最近看到网站上面有人把中共写成“支那共匪”，“中”变成“支那”，“共”变成“共匪”，散发着一股纳粹的臭味。我没有愤怒，我只觉得有些悲凉，一个民族在外力的干涉下，因为历史的缘故，国共的纠葛、东西冷战的纠葛，为了维护“美国秩序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来逼着一个民族自相仇恨、憎恶——日本人叫做“近亲憎恶”——这种悲剧，而且更大的悲剧是很多人不以此为悲剧或者荒谬，这一点是我很大的关怀。作为一个作家，我想直到我们民族和解团结之日，我会常常怀着这样一种关怀的。这是我的文学主题里总的一个结，一个母题群。谢谢你们的耐心，对不起，我讲得不好。

祖 祠*

我有一个如今已经过世的大伯父，很受我父亲的敬重。那是因为我祖父早亡，家道十分贫困。作为长兄的大伯父，自小极其孝顺祖母，友爱兄弟，很小就辍学到山垵里做苦工补贴家计，让两个弟弟完成小学教育。

就是这位大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要我背诵一个神奇的地址：

大清国，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石盘头，楼仔厝……

没有比能在他老人家跟前背诵这个地址更能讨他欢心的了。

后来，年事渐长，知道“大清”早已亡了。这个地址非但遥远，而且几乎不可企及。在海峡绝对性对峙下，怕是一生一世也去不到这个地址所指涉的地方。

我家一系来台开基，到我已经八代。非但是我这位大伯父，即便是我的祖父，曾祖，怕都没有再回去过罢。父亲的家穷，不若地主豪门的家，还能隔几年或者竟而每年回到原乡祭扫。但这神奇的地址，却一代又一代，在并不识多少字，甚至于全不识字的我的几辈父祖口中，代代相传。

一九九〇年三月，我带了“中国统一联盟”的代表团，平生第一次踏上祖国大地。结束在京紧张繁忙的拜会活动后，趁着代表团去拜谒黄陵的几天时间，一个人脱队飞到福建，探访我的父祖所从来的原乡。回到祖地，才知道那我自小就能朗朗成诵的地址，除了“大清国”已经改

* 本文刊于《中时晚报》(台湾)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后收录于《陈映真散文集·父亲》(台湾：洪范书店，二〇〇四年九月)。

成了人民共和国，其他竟至今一字不易！

几十年来，在我的大半生中一直是一个虚幻的、遥不可及的，似乎永远也到不了的，仿佛童话、小说中一个虚设的地址，在踏上祖地祖乡的一刻，竟成了和自己踩着的，和万古千年而来的坚实的质感的中华大地一样确实的地址。

我立刻想起了终其一生对这神圣的地址念念不忘，却无缘亲自回到这儿印实的我的大伯父，我的祖父，我的曾祖父……，心情激荡，感慨万千。

我的祖家，是一块宁静、美丽、纯朴的地方。“楼仔厝”早已只剩下一些依稀不辨的废墟。祠堂也塌了。一路上的红土、相思树和竹林，像极了安溪人在台湾聚居的三峡、莺歌、柑园、坪林、新店一带，到了叫人惊叹的程度。我于是尤其相信，渡过大海移居台湾的我的父祖，在寻找新的家园时，竟是按照在他们心中热烈而执拗地召唤的原乡的山水树木，寻寻觅觅而后定居的。

一九八六年，台湾还没有开放探亲的时候，我的父亲和母亲就取道美国回到安溪祖地。曾经听父亲说，从年轻时代，他就向往能够有朝一日到祖国北京，一睹“北京弥天风沙中的落日”。长年来，父亲花了不少心血，重修祖谱，却总是弄不清楚某一代人的系谱，无法续好。虽然早有亲自到原乡祖地续妥那一段系谱之心，却因为担心大陆之行，会为被列在国民党列管户的我受到无端的罗织，而迟迟没有成行。一九八六年，自恃身体日衰的父亲，终于在旅居北美的妹妹和妹婿陪伴下成行。近乡激动，父亲急出病来，陪同的人终于顾及他的健康，没有让他踏上近在眼界内的村子。“老人家望着祖村，热泪盈眶。”接待过父亲的乡长老说，“我们把整本祖谱捧来，本子翻开来，他老人家立刻找到他要的部分，祖谱就续上了。老人家高兴的。我们一旁看着，好些人感动得要掉泪。”

两百多年之间，我家一系，自从三个兄弟（据说是一个农夫，一个厨子，一个代书先生）带着老母亲渡台开基以来，直到父亲回乡认祖，就从来没有一个子孙回去过。“谁回来过，什么时候回，带什么人回，回

乡何事，谱上都得记载。”乡长辈说，“谱子翻开来，清清楚楚。这不就是两百多年，八代人，没人回来过。”

贫困，异族的统治，内战的长期化让这一系人两百多年回不了家，也就两百多年代代传诵着那刻骨铭心的地址：大清国，福建省，安溪县……

因为父亲的建议，祖乡的人们开始在祠堂的原地筹建新的祠堂。那时正在福建省负责省政的王兆国先生对我说，安溪是福建省的“重点贫困县”，每年接受政府的各种补助。但祖乡的人还是凑了一点钱，没钱的出工，打花岗石、整地、挑石。今年我又回去看了，石墙已经有四、五条石材高。我们家捐了三回钱，惜乎在台湾算是穷人，杯水车薪，心意固诚，无奈帮助不大。

有形的祖祠终于是要盖起来的。从这安静的“石盘头”去到台湾的子孙，光是我知道的，就有不少人。然而，那无形的祖祠，那两百余年代代口传，铭心刻骨的祖祠，却一直巍然矗立。而中华民族的千秋万世，正是千百年来亿万素朴的中国人民心中那不朽的祖祠所凝聚下来的罢……

父 亲*

我有一双皮鞋，特别好穿，但两脚的鞋跟都磨坏了。想着无论如何也舍不得丢弃，便央妻拿去换上鞋跟。

“没见过人像你那样走路的。”妻说，“怎么就老是拖着脚后跟走。”

我看着拎在自己手上的我的皮鞋。右脚的鞋跟向右刀削似的磨掉了。左脚的则向左削去。

我想起了父亲的皮鞋。

推算起来，一九四九年，小学五年级时的夏天，在桃镇当国小校长的父亲来了莺镇的我的养家。几天来，我都以复杂的心情盼着这一天，让父亲带我回生家小住。少小的我，既舍不得和疼爱我直如己出的养父母——父亲的亲三兄，我的亲三伯父、三伯母——小别，又顶不住和生家的一个大姊、四个弟弟玩耍的诱惑。

父亲和他自小手足情笃的三兄，在暗暗的客厅里说了老半天的话，养母却早已让我换好了浆过的学生服。我蹲在井边看着养母洗菜，时不时和她说些话，极力不向养母透露我对稍别的不舍、和回去生家的难抑的喜悦，很知道两者都会引发她的伤怀。

时候终于还是到了。

“三兄、三嫂，那我就走了。”父亲说。

我拎着小小的包袱，迅速地瞥了养母一眼，看见她微笑着，一边用围裙擦干手上的水渍。我向她摇了摇手，安心地跟在高大的父亲的身

* 本文刊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台北)二〇〇〇年一月二十一二十三日，后收录于《陈映真散文集·父亲》(台湾：洪范书店，二〇〇四年九月)。

后，走出养家的大门。

父亲带我到不远的莺镇的火车站，坐一站车到桃镇去。记忆中，我只顾去看火车窗外旋转而去的田野风光，父子竟沉默无语。

下了火车，出了桃镇的火车站，我依旧跟在穿着老旧不堪的西装外衣的、身体颇长的父亲的身后走着。正是在这时候，我看见父亲一双陈旧、满是土尘、都走了模样了的大皮鞋的两个后跟，刀削似地，分别向左、向右磨掉了。

父亲突然在车站附近的一家食堂前停了一下，用眼睛示意我跟着他上了食堂的二楼。父子俩隔着一个大圆桌相对而坐。不久，父亲要的两盘炒米粉就分别端到我们跟前来。

直至今日，我一直认为，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曾吃过炒得那么香的米粉了。在略暗的食堂里，散发着猪油的亮光和香味、想来是因为没有加酱油而呈米粉原本的白色的一盘美食，竟而被我贪婪地、一口一口吃干净了。

食后，父亲和口口声声亲切地叫他“陈校长”的食堂的主人说了一回话，我又拎着小小的包袱，跟在父亲的身后走向桃镇国小的校长宿舍。这回，我一路上专注地盯着父亲的老皮鞋的后跟走，研究着何以竟能把皮鞋穿成这样。

“拖着脚后跟走路，才能把鞋后跟磨成那个样……”妻说。

我没有说话。想着遗传竟连走路的姿势也管，不免惊叹。

父亲在一九〇五年生于中庄，一个介于溪镇和莺镇中间的寒村中一户十分穷困的人家。父亲上日制“公学校”五年级的时候，祖父去世。为了料理父丧，竟不能不以一爿世居的破屋为抵押，举高利贷以葬父。父亲的三个哥哥聚议，葬父以后，无论如何都得尽快挣钱把老屋赎回。站在一旁的公学校尚未毕业的父亲，立即知道了毕业后再升中学，已是奢望。

公学校毕业的那年夏天，父亲的级任老师爱惜他资质聪颖，特地从莺镇走了几里路造访父亲的家庭，希望说服家长无论如何让父亲升学。

但及至看到父亲“家徒四壁”的状况，老师沉默了。“这时老师才对我说，不要紧，独学照样成材。”父亲回忆说，“他教我查字典、查工具书自修的方法，而后怅然地走了。”

夏天过去，眼看着村子里一、两个成绩远远不如自己的同学穿上了中学制服，脚着皮鞋，父亲只能躲起来吞声。

这以后，父亲白日里劳动，夜夜挑灯苦读，凌晨始休。几年后，父亲在那些上了中学的同学尚未毕业之前，通过了检定考试，取得日政下“高小正教员”的文官资格。

少小因贫失学的创痛，使父亲以教育家竟其一生。取得高小正教员资格的父亲，以教育和帮助像自己的少时一样、受到贫穷的桎梏而无法充分发展自己才智的学子为职志，辗转在桃园、竹南任教。一九三五年，父亲在竹南的成人教育班上遇见了腼腆美丽的我的母亲，结为夫妇。

在日本对外扩张的年代，父亲先后在新竹郡役所户政部门、茶叶统制会社和台湾放送局（广播公司）工作，迎来了台湾的光复。

不久，父亲受到甫从大陆还乡的、战前台湾的农民运动家刘启光昔日的同志所物色，应荐到刘所主持的桃园县政府，负责高等教育股的工作。

父亲从县府里调派到台北的“省训导团”接受短期集训的期间，发生了不幸的二月事变。数日之后，我突然在家门口远远地看见披着风衣的、高大的父亲，踏着火车轨道的枕木，绕着小路，向莺镇的我的养家走来。

当时南北铁路交通已告停顿，父亲竟从台北顺着铁道徒步走来，顺便探望在莺镇的他的三兄。兄弟俩在榻榻米上忧戚地谈着些什么。而后，父亲留在养家用过了饭，又披上他的灰色的风衣，踩着枕木回去桃镇。

“不能到外头乱跑哦。”父亲临走的时候，和蔼地看着我，这样说。

我一个人默默地目送着一直不曾回头的父亲的背影，消失在铁道转弯处一丛漂亮的相思树影。我深深地向着我的养家父母，是由于他们对

我百般疼爱。生家对我的召唤，却是骨肉的血潮。只有在像父亲来到跟前时，那血潮才开始逐渐骚动。一等他走了，那骨血的波纹，也逐渐归乎宁静。而在少小的我的心湖中，这宁静的过程，往往也是一段刻骨的寂寞。而我便怀着那寂寞，凝望着父亲在料峭的春寒中隐去。

有一回，父亲回忆着二月事变以后的生活。父亲说，二月事变以后，台湾人对于光复的解放彻底幻灭了；对于战后台湾政治的前程，感到切肤的绝望。“然而这大绝望却使桃镇的人寄极殷切的希望于办教育。对自己这一代看不见前途的人们，竟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下一代人。”父亲说。当时四十几岁的父亲在教育界受到桃镇父老的推爱，几度向县政府要人，让父亲接桃镇国小的校长。

接掌桃镇國小后，父亲逐步交涉驻军撤离学校，使学校恢复正常的空间。在家长会全力支援下，父亲建议家长募集了一笔基金，使当时全省军公教普遍欠薪、断薪的情况下，桃镇国小的老师得以正常支领月薪。光复不久的台湾，语文、中国史地的师资奇缺。父亲坚决以为，中国语文和史地，最好请熟达语文，对史地有具体学养的省外老师担任为好。于是他四处求贤寻才，找到了几位能说、能教标准汉语，受过史地教育的省外老师来。受到父亲教育热诚的感召，老师们和校长共同推出富有创意、生动活泼的教案，在那沉闷的时代，在校内激起了舒畅、快乐的教学热潮。桃镇國小不久便成了全省国语文教育最优异的小学。以游艺会、话剧演出、演讲比赛等形式推行的语文教育，很快地使桃镇國小成为全校师生都能流畅地说写普通话的小学。

记得就是父亲来莺镇带我去生家的那一回，我赶上了学校的游艺会。有一出短剧，当时只鲜明地记得舞台上演着几个农民在屋外乘凉吃饭，但他（她）们的名字竟是“七斤”、“六斤”和“九斤”之类的重量名，而且还有一个演老太太的小朋友，不断地在台上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以夸大的叹息说，“……我，活够了……一代、不如——一代！”

许多年以后，我才恍然明白，那竟而是根据鲁迅著名小说《风波》改编的小小戏剧。怎样改编了《风波》里深沉的嘲讽，才能使小朋友明

白，至今想起，都觉得疑惑。然而，在普通话还一般地生硬的当时台湾环境下，桃镇国小的语文老师竟能编导《风波》去让小学生演出的教学创意、意气和热情，已经远远不是今日千疮百孔的汉语教育所能想象了。

有升学竞争体制，就会在教育的中下游生产“升学班”和“不升学班”（“看牛班”）的不平等教育。至于今日而愈演愈烈的这种教育歧视，是在受教育权利和机会“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为蔽障所掩盖的、教育之社会、经济和阶级的压迫。少时贫困而深深地体会过失学之痛的父亲，既无力颠覆社会既成的教育差等体制，便以他自己的遭遇，切切要求老师们，虽然校内升学班、不升学班的划分，请老师们能从思想上、教学实践上以平等对待学生。父亲要求，教升学班的老师，要以同等的教育之爱和教育责任去对待和教育非升学班的学生。此外父亲为非升学班同学增开了简单珠算、簿记的课，以利就业。父亲也要老师教会非升学班同学查字典和其他工具书，为将来有心自修、自学的学生准备条件。父亲对非升学班的生徒，总是抱有一份不舍的关切，时不时到教室去看看他们，恳切地告诉孩子们，校长小时也是个家贫而无法升学的苦孩子。“但是，只要有志气，肯加倍努力，一样能自学成材。”父亲对他们说，“千万、千万不能自暴自弃……”

有一年的夏天，唱过毕业骊歌，升学班的家长热热闹闹地为老师们摆上了谢师的宴席。当宴席收散，老师们回到学校，发现非升学班的毕业生已经自己凑了钱，在教室里煮了一大锅绿豆汤等待着。孩子们怯怯地到教员办公室来，邀请宴罢的恩师们到他们的教室接受感谢的宴请。“老师们都去了。孩子们毕竟认识和相信了学校和老师们不曾歧视过他们。”父亲在回忆中说，语声哽咽，“好几个老师都含着热泪，高兴而又心疼地喝了那一茶碗终生难以忘却的绿豆汤。”

先此，父亲在一九四六年突然丧失了爱儿——我的双生哥哥映真。他一个人和丧子的猛烈的伤痛苦苦挣扎了四年，直到一九五一年因皈依了基督，才能把自己从伤怀中释放出来。

信仰为父亲的智慧和心灵丰富了新又深邃的向度。一九五一年秋，他以喜悦的心到台中协助创建一所神学院，担当总务和教员的职司，一直到一九七六年退休。

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我在思想上逐渐走上激进的道路。我时不时回到当时在台中的生家，增加了和父亲谈论的场合。我从不曾明言我的所思所行。但从日治下的三十年代走来的父亲，无疑已经察觉了我的倾向。但父亲却不像在那个政治恐怖时代的一切父亲所应当的那样，疾言阻止和责备。在一九六八年我被捕入狱之前，和父亲的谈论中，有几个方面至今印象深刻。

我们谈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当过穷人家的苦孩子，具有三十年代左翼知识的父亲，对于社会主义有不止乎口耳之学的理解。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他有深的同情，也有一份期许。但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看着当时文革的骚乱，他有很深的宗教的忧虑。父亲说，他皈向基督以后，才认识了人原有的罪性。而这人的罪性如果没有解决，终究会朽坏了人出于最善良愿望的解放和正义的运动。父亲曾几次表达了他对于日本、“无教会主义”杰出的基督徒学者矢内原忠雄的崇敬。父亲说，为避免体制化教会必有的软弱和败坏，矢内原寻求没有教会组织和职司体系的、个人得以直接借由读经、思想和祈祷与上帝交往的信仰。但在学问上，矢内原却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矢内原科学地揭发了日本在台湾的糖业帝国主义掠夺体制的秘密，给予台湾反帝抗日运动很大的启发和激励。但作为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在日本军国主义最猖狂的四十年代，矢内原以孤单的先知之姿，公开反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公开祈祷上天使日本战败，以拯救日本于犯罪和疯狂。矢内原终究被日本法西斯投狱，至战后始得释放。

父亲对于台湾的教会一般地忌恶社会主义，以为是信仰认识上的一个缺口。父亲举使徒时代的教会，信徒们将变卖自己田产之所得，“放在使徒的脚前”归公，凡物公用，由使徒“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父亲说这是侧重公平分配，“各得所需”的社会主义公社。父亲以为，初代教会固然因不曾看重公有基础上的生产，无法持久。但《使徒行传》

中的这一段记载，描述了“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非拉”在献出自己变卖产业所得时，起了私心，隐匿了若干，存为私有，从而招致上帝极其严厉的惩罚。父亲以此为例，说明基督教不必忌恶社会主义，而应该更加警醒于人的罪性。人基本的罪性若不得解决，再好的设想、制度和运动都不免败坏。

父亲注重改革运动的道德性质，还表现在不止一次地说到所谓“堕落干”（日音 darakan）的问题。三十年代的日本迅速地奔向了军国主义。在法西斯蒂酷烈的政治压力下，不少日本的左翼各派知识分子、文化人和党的干部，纷纷公开宣言背弃自己的思想，而“转向”（思想、政治上的投降）之风，把当年被穷人和青年们奉为导师的革命家纷纷扫下神坛，灰飞烟灭。人民遂斥之为“堕落干部”，又因日语中的省略，谑而称为“堕落干”。父亲说，青年时代的自己，就看到过自己心仪的左派文化人大刺刺地宣告转向，而受到沉重的打击。在父亲看来，政治高压下容有不得已之处。但有一些理直气壮的“堕落干”，较之一个向来的“反动派”恐怕是更其不堪了。

父亲的这些话，在当时就让我留下鲜明的印象。但是真正吟味了其中深意，是我在一九六八年入狱之后。蹲在囚室的角落细想，才逐渐明白父亲对眼看着不能回头地走向险路的儿子，是怀着怎样的忧虑，强忍着失去孩子的恐惧和痛苦，百般叮咛：追求世上的正义，不能忘记人原有的软弱，不能失去灵魂的洁白；像矢内原忠雄那样，变革实践和真实的宗教信仰非但没有矛盾，甚且互相丰富——一切莫因倾向于变革而舍弃了信仰……

事实上，父亲甚至曾对他怎也放心不下的儿子苦心地劝告过。有一回，父亲说，一个人应该有智慧判别自己真正的能力。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要选择做他最擅长的工作来完成他的事功。也许父亲深怕愚拙的孩子听不明白，他甚至以鲁迅为例，说鲁迅以他的小说，在中国的改造中发挥了顶得上多少个军团的力量。当自己和同伴全部被捕，幼稚的组织破灭，在巨大无比的“国家”机关的暴力前，感到脆弱和渺小时，父亲的话，才以深刻的回音在反省的心中响起。

一九六八年秋，入狱后第一次获准和家人会面时见到了父亲。看见父亲的白发，感觉到给父亲造成这么大的忧虑，深为歉疚，不觉泪下。但父亲神态安详，没有一句责难怪罪的话，却要我牢记我在狱中生活的三重自我定位。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最后，你才是我的孩子。”他说。

第二年夏天，父亲在一次接见中提到外面有一本杂志刊载了我的事，并请求政府“从宽”处理。接见都在严格监听下，父亲语焉不详，事后我也把这件事忘了。一九七五年我释放回来，一次闲谈中父亲说起当时有某杂志以寥寥数语要求“从宽”处理一位“本省年轻作家”（大意）云云。父亲没有说明何以他要在监听下设法让我知道，但我忽然明白，父亲担心的是我因而被迫“转向”，成为一个令人不齿的“堕落干”吧。父亲对他囹圄中的孩子的祈祷是明白的：作为“上帝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父亲希望我以洁白的良心，坐完囚系的日子！

终其一生，父亲都不曾是政治上世俗的反对派。但当一九六八年，他的两个儿子——我和六弟遽尔同时被秘密逮捕下狱，在严峻的政治和社会的考验中，父亲表现为一个信仰根基稳固的基督徒、一个慈爱而又对于思想人文具备了绝不同凡响的认识力的父亲，和一个满有智慧和尊严的知识分子。

走过日帝统治下的崎岖，父亲既因过人的才华和才干受到一些日人的器重，又常因为职场中的民族歧视和日人争执，拂袖而去。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我的祖父告诉过他，大清的国旗是“五色旗”，比日本的“红膏药”旗强多了。一八九五年日本侵略军登陆台湾，父亲的小叔和寒村中的青年赶到三峡，拿到清兵遗留、不知道如何使用的洋枪，“一上阵就被日本人打死了。这是你祖父说的。”父亲说。消息传到我的祖父家，祖父连夜赶到三峡战场，在清晨的曦光中找到叔祖父的尸体，一个人掬回来安葬。“你叔祖父的墓还在中庄，他没成过亲，没有后嗣。”父亲说，“适当的时候，和各房亲人商量，把你叔祖父的墓重修起来。”

我还记得，早在我的初中时代，父亲就四处找资料修族谱。由于我们这一支系来台肇基后历世寒微，无力修谱。父亲走访了同宗中较有门第之家，参酌族中口传，竟大抵修成了一个骨架。但对于我系南来入闽后的某一代人无法确认，留下一个谱系上的缺口，多年来成为父亲的挂虑。一九八〇年开始，父母亲开始往来北美和台湾之间居住，受到两地儿女尽心孝养。这期间父亲亟思到内地原乡续上族谱的缺口，却总因深恐因犯禁到内地，连累到刑余的两个孩子，始终勒马不前。一九八六年，他自以为身体衰退、再不入闽，谱系的破绽永难修补，便在幺妹、妹婿陪同下从北美兼道访问大陆，回到我系七世前所从来、而七世以来从未归省的原乡——福建省安溪县。父亲近乡情怯，心情激动，竟引发心脏不适。陪同的人力劝不再进入近在咫尺的原乡金狮石盘，请人到祖家捧来幸而未曾被“文革”毁弃的大族谱，一经比对，就把断层完全续上了。为此，父亲大喜过望。他的喜悦，也使内地陪同的人深受感动。

在中国的二三十年代一股非议基督教的风潮中，有一句不无过激的话：“中国每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公民”。这句沉痛的话能不能说明今日台湾的基督教界，姑且置之不论，但绝不能适用于父亲之所信。对于内地的“三自教会”，父亲有同情的理解，而对于台湾教会到内地扩建“地下教会”，父亲抱着无法搁置的忧愁。正如一九八九年父亲出版的唯一文集《在基督里的一得》里所表达的那样，父亲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应该和中国的文化、人文传统、民族心性、社会和伦理体系等具体条件相糅合，从而探索和建立有中国独自性的神学和信仰的话语。父亲绝不是一个社会福音派，但他深信人比礼仪为贵重（“安息日是为人所设，而不是相反”）。父亲也信，热爱正义，使人得以从精神和物质（制度）的枷锁中得释放，是“父交给子，要子成就”的使命。父亲相信，上帝最大的祝愿，是“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水滔滔”。

像这样，父亲于不知不觉中，在我们儿女的心中守住了一个祖国。当祖国丧失的迷雾滔滔而来，我真切地发觉到，正是父亲，重新给了我们儿女一个实在的祖国，让我们的心稳如磐石，幸福而又满足。

对于我来说，父亲还有另一个榜样，就是一份自在真实的谦抑。毕

其一生，父亲固然绝没有因家世的寒薄而来的、任何形式的自卑，尤其没有常见于刻苦自学成材的人难免的骄躁与刻薄。他从未因自己的知识见解比别人深刻而得理夺人。即使他的孩子在文学上粗有虚声，父亲从来不曾在我跟前扬揄他所喜爱的一些我的作品，更从不曾在外人对我的文学的褒声中附和。他毕其一生从容而自在地隐藏着他过人的资质、识见和高洁的心灵。他为自己写下了这墓志铭：“这里睡着一个无可隐而隐的老人”，谦冲地概括了他一生的风格，让我们终于把它镌刻在他的墓石上。

当然，父亲决不是没有缺点的。容易发脾气就是其一。脾气发作的时候，往往会一时遮盖过父亲对儿女打自内心的慈爱。但即便是这样，做他的儿女，总觉得一生也无法活得同父亲的风范相称。

一九九六年，父亲九十一岁，他的身体开始在各方面呈现衰退。十一月三十日，父亲终于在他所笃信的上主的怀中安息。

现在母亲也在病中日形衰弱。养父和养母的墓木早拱。在六十方过的初老之时，才遇见风树之悲，本也算是一种幸福吧。而无如遗世独立的、至深的寂寥竟涌泉而来。回忆父亲，才知道他对我一生的影响之深。从俗世的眼见看来，父亲从不是达官显贵、富商大贾。父亲也不是世俗所称的硕学鸿儒，教会中的大牧。但对我们儿女来说，父亲的形象高大、挺拔，远不是凡世名位功业可拟。父亲没有留给我们任何屋宇田园，却留下了世间的财货所不能交易的、丰盛而永不朽坏的精神的产业。

生 死*

出于思想和现实间的绝望性的矛盾，从写小说的青年期开始，死亡就成为经常出现的母题。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却从来不曾有忧悒至于嗜死的片刻，反而是一个迟钝于逆境、基本上乐观、又不惮于孤独的人。

然而，日历刚翻开到二〇〇二年的第二天，我竟闯过了一场技术和理论上的死亡，却终于走过死荫的幽谷，重返于阳世。

我罹患“突发性心房颤动”(A.F.)已逾十年。长期服药，基本上无大碍于生活和工作的品质。但到后一两年，不正常心律发作间隔和频度增加，几经思量，决定接受一位在这一特殊领域上颇蜚声于岛内外的医师的意见，施行叫做“射频消融”(又称“电气灼烧术”)的心脏内科手术。

在局部麻醉状态下，记得还能听见医师和助手间的对话。术前知道手术时间大概需要三个小时左右。至今还记得的医师和助手间的对话是：

“如果这次再通不过，就停止不做了。”

接着就是沉睡一般的知觉和意识上的空白。

第二次听见人的声音，是妻的声音。

我恍惚中发现自己仰躺在被快速推动的病床上。

“手术已经做过了……现在要送你去做另一个手术。”妻在我的耳边说，“你要坚强。要加油哦……”

* 本文刊于《陈映真散文集·父亲》(台湾：洪范书店，二〇〇四年九月)。

我张开眼，看见妻的鼓励的笑脸。抬起手想摸摸她的脸，却觉得怎么抬手也够不到。妻边走边俯下身来，我的手才碰到了她的脸颊。这以后，迷迷糊糊间，觉得病床推进了电梯，推出了电梯，听见妻时不时轻声说，“你要加油，啊！我在外面等着你。”

接着便又是长达十数日的意识的空白。没有痛苦，但觉如在暗室中最深沉、甚至舒适的酣睡。

一直到两个礼拜后出了加护中心，推进一个单人用一般病房，妻才断断续续地告诉了我这两个多礼拜来“出死入生”的经过。

安全几率再高的手术，也有一定比率的各种甚至于致死的风险。据医师说，我的心脏构造竟异于常人，手术时间因此多花了近三个小时。

主持这次心脏内科的医师终于把妻叫到心导管区，告诉她手术做完了，但发现病人血压在快速下降，疑心有内出血情况，正密切观察中，有可能需要开刀抢救。

又俄顷，医师来叫妻进导管区，告诉她我在手术过程中出现“并发症”，需要开刀抢救，请手术团队中的一位心脏外科医生来说明。

“外科医生简捷地告诉我，陈先生的情况很危急，需要立即开刀抢救。但开这刀也很危险，而这个刀不开不行的。你明白吗？”妻回想着说，“我回答：明白。那好。医生说，我这就去准备，立刻把人送上三楼的开刀房。他匆忙地走了。”

“我向心脏内科医师要求手术前能跟你说几句话，医生匆匆赶回手术室。没过多久，我听见你的手术室中一阵医师、护士和技术人员慌忙杂沓的骚动声。”妻回忆着说。她说她侧身探望手术室。“我看到你已经给插上了呼吸管，有大夫正用小手电筒照看着你的瞳孔，许多人忙成一团，就像我们偶尔在电视上看到医护人员对待濒死的病人一个样。”

妻说她霎时双腿发软，使力扶着墙，才能免于瘫倒在地。一个女技师见状，出来劝妻离开心导管区，到外面等待。

“我深怕我的不支，分散了医师们抢救你的努力，咬着牙走出心导

管区，坐在手术室的正对面，全身颤抖，睁大眼睛逼视着手术区空白的、冷酷的长廊。”

做内科手术的大夫走了出来。“方才回到手术台，正想告诉陈先生你会同他说话，不想他血压骤降，呼吸和心跳都停了……”他对妻说，“现在我们把人救回来了。等一会人要送去开刀。你还是可以同他说话，估计他应该听得见，但他已经插上管，不能回答你了……”

那是个冷冽的仲冬，即使是在有暖气的病房里，也飘着一丝寒意。妻喁喁的追忆，是在住进了一般病房后约莫十天不到的时候告诉我的。我记起了从心导管室推出时，我睁开眼睛看见妻以鼓励的笑容，俯身让我触摸她的面颊，柔声要我“加油”的片刻，竟是我初初挣脱死亡的第一步，也是妻一个人挨过了锥心裂胆的、不可置信的恐惧和焦急的近六个小时后的片刻！

进了开刀房后的记忆和知觉只是一片空白，却经历了开胸、缝补心耳、大量输血，和送进加护病房后，长达五、六天的高危险性感染引起的高烧……而在病房外面，每天每天，是妻和许多亲人、长辈和朋友在湿冷的气候中忧愁地守候、探望、向妻致意。由于高烧不退，终于不能不婉谢亲朋进入加护病房探望。这是至于今日想起，都深为歉疚的。而妻却在没有为院方病人的眷属准备可以御寒过夜设备的空间，在弟弟和忘年的朋友小林陪伴下，度过守候的两个多礼拜的日日夜夜。

而在病房中的我，却终日沉睡，一无所知。听着妻的梦魇般的述说，我感到震骇、惊异和对于妻的从未有过的感激。神奇的医学固然抢救了我，在一个意义上也差一点让我滑落到死亡的深渊去。我感到是身边这劳苦地陪伴了我近二十五年的妻，奋不顾身，竭尽心力，把我从死亡线上硬生生地拖了回来。

“为什么到今天才告诉我？”

我紧握着她的手，凝视着消瘦了的她的脸，这样说。

“怕你知道了骇怕。”

“现在知道了，觉得震动，觉得怕……”

妻说好不容易从加护中心移到一般病房，她还是暗暗地不曾放下空悬着的心。

“有一个也是做过心脏外科手术的病人，恢复得又快又好，面色红润，还发光。”妻说，“他时而从加护病房同一楼层的病房那边过来，和病人家属拉家常，为家属们打气。”妻说，“就在我们出加护中心的当天，忽然就听说他竟在病房里猝然死了。”

我沉默地握紧她的手。

“我天天暗地里看你的气色，尖着耳朵听巡房大夫的意见。”妻笑着说，“看来，一切噩梦都要过去了……”

但妻的笑脸难掩连日来积累的疲乏。为了消除在我脚背上的水肿，医生加开了利尿剂。术后身体虚损的我，还无力自己上厕所，以致每夜必须用电池门铃叫醒白日已经精疲力尽地照料我的妻从酣睡中跳起达五、六次，拿夜壶让我用。她素患椎间之痛，看着她日夜为我的病身操劳，我才体会到照料病人远比卧病的人更加辛苦；也才深深体会夫妻同命相依背后的爱的力量与真谛。

妻说做完抢救的心外科手术，医生对她说过，“有人是能在这种手术后完全恢复脑力的。这就是说有人会在术后表现出脑力的损伤了。”她说。但随着体力的恢复，每次妻陪伴我偶然的座谈，看我写文章，就会高兴地说，“你已经一次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脑袋没有受伤害。该感谢医生。但是不是也该感谢上帝……”

受到父亲的影响，我的少年期曾是虔信的基督徒。到了今天，我的大姊、三弟、四弟、幺妹们的全家大小，都是虔诚笃信的基督徒。我猝然病倒，他们和他们的教会，都日日为我迫切祈祷。我也记得姊夫来加护病房探视时，抓着我的手，切切为我的痊愈祈祷……

在普通病房听着妻连日絮絮地谈起我病笃的经过，我开始想着我“出死入生”的体验和意义。呼吸停止、心脏停止搏动，是不是就是

死亡？我为什么没有经验过一般人都会读过的、从死里还阳的人的体验谈：在黑暗中看见远远的、仿佛隧道彼端的光亮的去处；看到被哭泣的亲友围绕的自己的尸体……为什么我的生死的界线只是暗室中深沉的酣睡？如果在心导管室的抢救失效，我的生命是否就如灯灭一般归于无有。而如果有上帝，祂让我从死荫的幽谷走出，有什么用意和目的？

于是在哲学上信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自己，在病房中开始生涩地在每晚入睡前向“上帝”诉说。我认罪；我赞美、感谢；我思想着基督走向各各他的十字架的漫长苦路时所受的百般凌虐、拷打和羞辱，而那无罪者所受的鞭打和糟践，却无不是为我的一身重罪的代赎……让我这软弱卑污的罪人活下来的祢的旨意是什么？鲁钝的我毕竟不能明白……我固执地追问。

然而回答我的总是一片无边的静默。没有“圣灵”的火热。没有回答。

我想起在知识上相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但在信仰上相信摒弃作为社会机制（institution）的教会组织，直接通过阅读圣经（甚至是希腊语圣经）和祈祷直接听取上帝的意旨和教海的“无教会论”，一方面以马克思经济学揭发日本在台湾的糖业帝国主义机制，一方面又为日本帝国“开明”的殖民地统治政策服务的矢内原忠雄在知识和信仰上的贡献、矛盾和极限。我也想起从重商主义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一直到独占资本主义时代西方不同阶段向非西方世界贪婪、残酷的殖民扩张和掠夺、杀戮历史中，教会史上无法饰辩的共犯角色……

——主，我如此弩钝，如何让祢再拥我入祢怀抱？我无助地喃喃倾诉。但回答我的，依旧是那无垠的沉默。

我也想到了戴国辉先生。

如果没有记忆的错误，戴先生在二〇〇一年元月三日谢世。如果我在二〇〇二年元月二日没有被抢救回来，我和“老戴”的“忌日”只差一日。在戴先生临去的最后的一年，我有几次和他见面相谈于吃茶座。

他已经察悟到他受到权力诡诈的欺骗。在病体无情地催迫下，抱病匆匆和王作荣先生作了一次揭发权力的欺罔的对谈发表，而终于抱着大遗憾和大焦虑离世。

我自然远远没有可敬的戴先生的大学问和大抱负。但一场大病，却深切地教育了我“生也有涯”的道理。而生既有涯，又无大学问、大抱负，今后但愿能从容地做一点力尚能及的该做的事，并且陪伴妻子珍惜地过完晚年。

二〇〇四年七月四日，深圳

第二辑 | 乡土文学论战

现代主义底再开发*

——演出《等待果陀》底随想

我对于文艺上的现代主义，抱着批评的意见，已经数年了。这次“剧场”演出《等待果陀》，跟了几天班，遂有机会对于这长年的意见做了检查。结果一方面纠正了自己的意见里的若干错误，一方面也益觉得现代主义实在已经临到再度予以开拓的时候了。——特别是此地文艺上的现代主义更是如此。

“文艺是一时代的反映。”是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情况，产生一个特定性质和内容的文艺。所以，“现代”的这么一个复杂而且未曾有过的时代和社会，产生“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毋宁是十分自然的一件事。

因此，“现代主义”文艺，在反映现代人的堕落、背德、惧怖、淫乱、倒错、虚无、苍白、荒谬、败北、凶杀、孤绝、无望、愤怒和烦闷的时候，因为它忠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是无罪的。

然而我一直对于“现代主义”文艺抱着批评态度的理由，至少有下几点：

第一，艺术家是一个人，而且应该是一个有思想、有观点的人。作为这样的一个知性的人，当他面对、而且生存于这样一个被庞大的物质文化所非人化了的人和社会时，他是应该跟一切被病毒了的人们一样，将这非人化的病的感情浓缩了，又放回给无数苦难的心灵？还是该指

* 本文刊于《剧场》(台湾)第四期，一九六七年三月。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八·鸢山》(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

谄、批评并唤醒人们注意这一切非人化的倾向，鼓舞着作为人的希望、善意和公正，以智慧和毅力去重建一个更适于人所居住的世界？很明显，台湾现代主义文艺，在性格的根本，便缺乏这样一个健康的伦理能力。

第二，现代主义文艺，比起文艺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是一种意识的创作。无数的现代主义派别发表无数的现代主义宣言。他们用一种做作的姿势和夸大的语言，述说现代人在精神上的矮化、溃瘍、错乱和贫困，并以表现和沉醉于这种病的精神状态为公开的目的。现代派的批评家，又千方百计的利用既成的科学知识，为这些表现在现代主义文艺中的精神状态找根据，进一步予以合理化。现代主义文艺在许多方面表现了这种精神上的薄弱和低能，在一种近乎自怜、自虐狂和露出症的情绪中满足各个人的自我。现代主义文艺的贫困性，不能包容十九世纪的，思考的、人道主义的光辉，是很明白的。

第三，一半由于精神和感官倒错的加剧，一半由于消费社会的流行风气，现代主义文艺产生了目不暇接的文艺形式。再加上内容在先天上的贫困，使内容和形式已经失去了浪漫主义以前的长时期的契合与发展。结果，形式主义的空架子在现代主义文艺中到处充斥。形式主义不但欺骗了广大读者，也欺骗了大部分低能的现代主义文艺作者自己。十八世纪以来，一层广大的城市民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文艺表现形式。文艺也便前所未有的负起了喂养、丰富这些广大市民读者的任务。但是，当今现代主义文艺的诡奇和晦涩的形式，使它远远的离开了读书群，将原有的任务遗落给作为消费品之一的通俗市场文艺。现代主义文艺已经史无前例地从民众中孤立起来，史无前例地舍弃了丰富民众精神生活的文艺任务。

差不多便因为上述的几个观点，我批判了现代主义。这种批判的态度，使我自己的创作生活具备了某种免疫能力，一直没出过“现代主义”的疹。但是，到这次跟在末后看见《等待果陀》的演出以后，我才感觉到这些观点固然是对的，但持有这观点的我的态度，却一向是很机械性的。

这种感觉的第一步，是在于演出条件不好，演出实质也不见完全的这么一次演出中，我仍然不禁感到一种极其深在底感动的事实。这种感动的经验，是一点也不亚于其他艺术作品所给予的。我于是初次感觉到：现代主义作品竟也有这样满足了艺术需要和知性需要的能力。现代——这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物质样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人类一般的个别情况、为主者的情况和为奴者的情况等等，在这出剧中，那样有力地做了解剖和展列。现代人的忧悒、的无力感、的惨楚、的孤独、的绝望，被一种诙笑的悲剧语言给传达了出来。没有疑问，《果陀》是一出对于现代人的精神内容做了十分优越底逼近的少数作品之一。它和现代人一样，是惨苦的，是行动上的阴萎者，是孤单，恐惧，和不快乐的。——至少没有像此间以“现代”当作一种时装去穿的现代派的表兄弟们那么快乐。《等待果陀》以它特殊而生动的艺术方法，反映了现代人类泛在的矛盾的事实，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评价。

其次，是它的内容与形式的契合感。汗牛充栋的台湾现代主义作品，往往只给予一些市场性的、架空的、奇癖的以及病的形式。然而在《果陀》里头，内容和形式差不多已经取得了见于一切伟大艺术中的统一，以至于使我们能把它当作一个有机体去接受它。贝克特（Beckett）使用他的特殊的语言，对我们忧悒地讲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一下子就给迷惑了，而且深受感动。我们在一个片刻里不能不为我们自己的命运和面貌觉着忧愁、觉着惧怖和某一种愠怒。但我们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贝克特的声音、语法、表情和手势是如何的不同。我们受了感动了。

于是，作为现代主义的炫人的红背心底“形式”，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的那一刹那消失了。“现代”的这个标签消失了。问题不在于“现代”或“不现代”，不在于“东方底”或“国际底”，不在于“禅”，不在于“观静”，不在于……。问题的中心在于：“它是否以作为一个人的视角，反映了现实。”文艺是现实的反映；而反映现实的制作者，是人；是一个具备了思考、爱和批评能力的人。文艺的形式历有变革，但作为思

考的人的那种追求人的完全的心灵，却永未间断，而且——因为我的某种乐观——应该奔向一个更高的层界去的罢。

因此，走进形式主义的空架以及思考的贫困的现代主义之错误，之不足取，固然十分明显，但对于这种错误采取机械性的批评，也是错误的。现代主义文艺，因为要反映“现代”这一个未曾有的特殊现实，而必须要求适当表现这现实的特殊形式。当内容和形式完全统一的时候，被商业化了的、硬变了的、迷信化了的“现代”，便消失了。现代主义文艺，便在这一个视点上，被承认了它一定的存在价值，对它做无分别的、教条式的攻击，是不正确的。

在台湾的现代主义，至少在下述的两点上是应该批评的。

第一，在台湾的现代主义，在性格上是亚流的。促成这种亚流的性格的条件有：（一）客观基础底缺乏。现代主义文艺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在程度问题；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虚像和实像间的超离，即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性质问题，在在都说明了何以此间的现代主义缺乏了某种具有实感的东西；何以徒然具有“现代”的空架，一片轻飘飘的糊涂景象，就连现代人的某种疼痛和悲怆的感觉都是那么做作。土壤贫瘠，又偏偏要学别人种一些不适于这个土壤的东西，长的当然也就一片焦黄，而且斑斑虫蚀的了；（二）台湾的现代主义，不但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末流，而且是这末流的第二次元的亚流。从时间上说，台湾的现代主义晚了将近半个世纪；从实质上说，不但缺乏在（一）中所说的自然基础，而且缺乏与它的西方母体之间的脐带联系——即真正反映了现代西方人精神状态的文学底、音乐底、绘画底作品。结果，台湾的现代主义文艺，像所有西方的文化在一切后进地区，一切前殖民地区那样式一般，只看见它那末期的、腐败的、歪扭了的亚流化的恶影响。

第二，思考上和知性上的贫弱症。在台湾的现代主义文艺里，看不见任何思考底、知性底东西。文化人在思考、知性上的阴萎症状之普遍，实在找不到第二块土地可以和台湾比较的罢。这样的结果，我们的现代主义者们，只是在那儿玩弄语言、色彩和音响上的苍白趣味，只是

在那儿幼稚地堆着形式的积木，只是在那儿絮絮不休地缠着一些形而上的——连他自己都给唬得昏头转向了的——“理论”和“哲学”。

总之，我们的现代主义文艺，变成了一种和实际生活、实际问题完全脱了线的把戏。更可惜的是这种把戏又都是一些知性贫弱的少数人在耍着。这样一来，我们的现代主义文艺，不是徒然玩弄着欺罔的形式，便是沉溺在一种幼稚的，以“自我”那么一小块方寸为中心里的感伤，不是以现代主义最亚流的东西——堕落了 的虚无主义、性的倒错、无内容的叛逆感、语言不清的玄学，等等——做内容，就是蜷缩在发黄了的象牙塔里，挥动着废颓的白手套。在客观上，台湾的现代主义先天的就是末期消费文明的亚流的恶遗传，在后天上，它因为一定的发生学上的环境，成为一种思考上、知性上的去势者。结果，我们的现代主义便缺少了一种内的生命力，缺少一种自己生长、自己纠正自己和接受新事物等等的能力。

本篇短文的作者认为：台湾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们，必须真切地面对这一问题：即此间现代主义文艺的贫困性。只有当他们了解了这一向之间的欺罔的薄弱、的幼稚，才是走向一种复兴，一种自我改革的起始。若说我们的现代主义者一无是处，也是不正确的。好几年来，他们以他们的样式，在语言的开拓上，在某种对于现代的反映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拒绝承认：现在样式的我们的现代主义，足以代表现在的、将来未死的、以及将生的数万代中国的文艺底方向。我们深切地认为：我们的现代主义，已经到了停止自欺欺人，到了深刻反省，到了诚实地做对自己批评，到了重新予以再开发的时候！

基于我们对此间现代主义的特殊相的认识，即：（一）性格上的亚流倾向；（二）思考和知性的贫困性，我们认为：我们现代主义之再开发，至少应该基于下列两个磐石之上：

一，回归到现实上。我们目前的现代主义之亚流化的现象，表现在它的移植底、输入底、被倾销底诸性格上。这些性格，当然使它失去现实基础。我们看见的，是梵谷、马蒂斯、毕加索、马拉美、波特莱尔、萨特……的残缺的、被歪曲了的模仿。回归到现实底意义，具有两方面

的意义：（一）因为文艺是现实底反映，文艺是先天上离不开现实的。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上，才产生一定样式的文艺。现代文艺也不能在这一规律之外。定根在现实，从现实中吸取了养分的文艺，才是有生命的文艺。否则，只作为外来文化的亚流，便仿佛氧气罩里的生命，虚弱而且不健康。（二）有人说：离开现实，逃避现实，是现代主义的主要性质之一。但是，必须明白：即使是逃避或离开现实，也必须先有一个实在，这种逃离，才是有根据的，才是可理解的，才是真实的。

二，知性与思考底建立。事实上，现代主义常常表现一种诡异的知性。如庞德，如爱略特，在古典底、学院底知性上，有他们的贵族的姿势。抛开对这种姿势底批评不论，我们底现代主义者们，似乎对于他们的列祖底某种深的知性方面，太过于无知了些。一个思想家，不一定是个艺术家。然而，一个艺术家，尤其是伟大的艺术家，一定是个思想家，而且，千万注意：这思想，一定不是那种飞马行天不知所止的玄学，而是具有人底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的人底思考。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温暖的人，是一个充满了人味的思索者，然后他才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切人的良善与罪恶的艺术家。以现代派们颂扬最力的费里尼、卡缪、莎特的艺术说，他们不但深刻地反映了、解剖了、哭泣了现代人精神的被虐的情况，也用他们个人的爱情和悲愤，用他们的行动和锐利的思考，生活在现实的最中心——甚至纳粹德国的地下——使自己不断地飞跃、不断地前进。

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

在今天，对于台湾现代诗坛抱着批评底态度的，大约有这三种人：

第一种，是保守派的残渣。属于这一派的人，早在启蒙的五四时代起，就竭力反对白话文了。他们在思想上，是旧的、后进的、农业的中国底意识形态之最后的代表人。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看见他们发表许多复古的论调，比方说读经，写毛笔字，反对节育，等等。然而，毕竟由于他们只是一小撮远远地掉在中国近代化历史底背后的人们，因此尽管他们之中有的还占着高位，他们的意见，一般地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这一点，只要看白话文之通行，以及节育之普遍，就很明白了。

第二种，是所谓“三十年代”文学的孤儿。差不多很少人注意到，所谓文艺的现代主义，也发生于欧战后的“三十年代”的这个事实。然而何以它没有在中国的三十年代文学中起主导的作用，而迟至今天的台湾才有了发展，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这个原因，按着我粗浅的想法，至少有这两点：一方面是流行在当时全世界思想生活中的“左翼”热病支配了中国的文学思想；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当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而来的、全国性的民族主义浪潮。这两个因素，先天地就和具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性质的“现代派”文艺相对立的。我们实在不能想象：当东三省陷落的时候，诗人会有兴致去写：“你见你的影，于成熟之水上，终于解脱了年龄/而你让锚制作法律于海底之牧歌中”这样的句子。在那个年代，人们总是在诗章中寻求当代最迫急、最感动人心的诸

* 本文刊于《草原》杂志（台湾）创刊号，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八·鸢山》（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

问题底解答，他们总是在诗章中鼓舞别人，也受别人的鼓舞；他们总是在诗章中传达一个悲壮的信息；他们用血、肉和眼泪去写诗、读诗。

习惯于这种“三十年代作风”的读者，没有法子接受“现代诗”，是很容易了解的罢。因为这个缘故，这批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便遽而完全失去了读诗的生活，至今也有二十年了。他们对于新诗问题，泰半都采取了冷漠的态度。他们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了三十年代文学遗落的孤儿。这固然也是世代的问题，但是，这两种反现代主义论之间，是并不一样的。后者是共同在新文学肯定论的基础上，做新文学的方向、内容和形式问题上的争论；而前者，是新文学和旧文学之间的、根本性的争论。新文学在五卅之后，将成为中国未来文学的主导方向，已经是一个定论；然而，现在的“现代派”，是否就是将来中国文艺的主要形式，一如以白话文为基础的新文学取代了以文言为基础的旧文学，却决不是可以遽加断定的罢。

在第一种反对论之薄弱，第二种反对论又默不作声的情况下，加上其他极为特殊的条件，使得现代主义文艺——特别是现代诗——在台湾有了一度蓬勃的发展。据诗人们说：现代主义在台湾的成就，首先是诗，其次是（抽象绘）画，然后是小说。这种欣快感，我记得，以四、五年前的一个所谓“新诗论战”后，达到了高潮。但是，现在想来，新诗坛的无政府状态，恶化的形式主义，恐怕也正是那个时候开始的罢。到了今天，虽然在表面上仍然有热闹的朗诵会，和各种诗刊的出版，但在骨子里却日深一日地感到一种危机。据说有的人停笔了；有的人想把这个本质上无法大众化的现代诗带到“农村、学校、部队、矿山”而不可得，于是，苦闷着；有的人则歇斯底里地拿着棍棒到处打“伪诗”的老鼠；有的人把自己关在玄学的诗论（比如说：主张诗所表现的是什么“当代一种超脱时空的意识感受状态”，即所谓“心象”的）里自我陶醉，要求读者应当“承认自己的无知”，等等。不论反应有几种不同的样式，都说明了一个迫切的需要：现代诗坛应该做一个诚实的、勇敢的、深刻的反省。这样的反省运动一天不在新诗坛发生，另外一种反对论就不能不存在一天。这第三种反对论者，包括曾经一度写过现代诗，而今

天正废笔沉思的少数；包括相当多数的、曾经一度狂热于现代诗，随着他们理性的成长和对于文艺更多的要求而开始怀疑、批评现代诗的读者；也包括像我这样毕其生和诗毫无瓜葛的人。

第三种反对论者和第一种、第二种都不一样。他们和保守派之间，连教育上的、启蒙时代的联系都没有。他们这种和传统完全的疏隔，当然，并不是什么可以称道的骄傲，反而竟是一种悲哀也说不定。另外一方面，他们几乎完全和什么“三十年代”的风风雨雨，毫不相干。如果某些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可以把“××主义当做婴儿时代的鞋子”一般地抛弃了，则这些人的“婴儿时代”，是连“鞋子”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当然也没得脱去以“抛弃”之的东西了。至于抗日的，争取民族自由战争的往事，对于这些年轻的、大部分成长在台湾的世代，差不多只是一种古谈罢了。也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疏离，他们才一度把他们那极度空漠的，贫弱的心膺，开向以虚无、背理、丑陋和非人化为重要本质的现代主义文艺。西方的虚无主义，以不同的音程，在台湾发生了共鸣。

按着这样的逻辑，现代主义应该在台湾生根开花，而且也应该像他们（现代派们）自己所期许的：成为真正中国文学的主力罢；然而却又不然。诗人停笔；真伪诗之争的莫衷一是等等的事实，到处都说明了现代诗正面对着一个严重的存续问题。现代诗可以不要第一种或第二种反对论的读者；而倘若连一度是现代诗最主要的读者的第三种反对论者也可以不要，拼命想把他们的作品译成英文，企图在西方一炮而闻各天下，那么，这个人除了是一个没有药救的夸大妄想症患者外，什么东西也不是的。

然而，何以一度是现代主义的拥护者的文学青年，会发展成为现代主义底对立物呢？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了。

可以用最一般性的意义这样说：现代主义是一种反抗。能够对于现代主义稍做发生学的考查的人，就能明白：现代主义如何是对于被欧战揭破了的、欧洲的既有价值底反抗，又如何是对于急速的工业化社会所强施于个人的、划一性底反抗。台湾的现代派，在囫圇吞下现代主义的

时候，也吞下了这种反抗的最抽象的意义。我说“抽象的意义”，是因为在反抗之先，必须有一个被反抗的东西。然而，与整个中国的精神、思想的历史整个儿疏离着的台湾的现代派们，实在说：连这种反抗的对象都没有了。

他们的愤怒、的反抗，其实只不过是思青春期少年在成长的生理条件下产生的恐怖、不安、愤怒、忧悒和狂喜底一部分，在现代派文艺中取得了他们的表现形式罢了。我的这种说法，当然有点偏激罢。但基本上，是大约不会错罢。我的论证在于：如果现代派的道路，现代派的反抗，能够从青少年时期不断地向成年的成熟期延伸，那么，它便有了一个强固的意义。但事实并不然。众多在青少年时代狂热地拥抱过现代主义的文学青年们，在他们大学毕业以后，逐渐对于一度热爱过的现代诗的一般，发生了怀疑，甚而至于批判的态度。这正说明了他们自己的成长，也说明了在台湾的新文学毕竟具备了自己矫正自己，向前不断发展的、可贵的能力。

第三种反对论者，一般地说，还在摸索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文学观，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主张。但是，我想，这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文学思想自浪漫主义以后，便不曾有过一个独块岩似的党派，如拟古典主义一般。但是，这也并不是说新的诗运还完全看不到面貌。以一个最机械的了解来看，作为现代诗的反动而新生的新诗，可以在旧的现代诗，即它的母亲那儿找到：倘若现代派的诗是暧昧的，那么将生的新诗一定是走向清楚的白话；倘若现代派是苍白的个人主义，那么将生的新诗或许要走上比较涉世的道路，去拥抱整个社会和人生罢；倘若现代派的声音是没有出路的苦闷、绝望和不信，则那将生的新诗也许要以他们步入成熟时代的信心，去建造、去追求一个全新的信仰，也说不定；倘若现代派一直苦于精神和思想上的大疏离，那么，将生的新诗或者将要以一个全新的视点，找到他们的定向罢；而倘若现代派堕落到使他们的作品成为形式主义的游戏，则在将生的新诗中将只见生动活泼的内容，使形式因溶化在内容中而不见了。

我但愿这不至于成为一个愚蠢的预设。但是，不论如何，有一件事

实是越来越明显了：调皮的，台湾的现代派，竟在不知不觉中，怀了一个新的胎儿。这胎儿顽强地胎动着，使她的母亲感到妊娠恶阻所带来的恶心、呕吐、焦虑、恐惧和不安。但一旦新生的婴儿坠地，这一切都要过去，只留下新生的欢乐。目前最切要的事，是应该开始尝试着去写出作品来，虚心地自我检讨，忍受顽固的现代派必然而来的嘲笑，为新诗重新开辟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作品本身是一种最有力的雄辩。新生的诗人可以一面创作，一面检讨，然后逐步把经验归纳起来，再以之运用在创作上。让心怀恐慌的现代派咒骂罢！他们所走的，已经是一条苦闷的死巷。而我们，却有一大片未知的、丰腴的处女地等着我们去开发呢！

后记

我一向不曾在诗的范围工作过。因此，有关诗文学问题的发言权，不但有它的限制性，也不免有一些行外人的错误罢。但是，就文艺范围来说，单只做一个读者，由于长年没有过诗的温饱，便不免不自量力地参加了这个议论。我固然很担心我的这种由于长年的诗饥饿而来的造次不被了解，但，不论怎样，我对于一切认真的诗工作者们的好意，以及基于这好意而提出来的浅见，实在不愿意他们不知道。

另外一方面，特别在最近的作品上，看见某些具有无比潜力的诗人，发表了充分表现出他们在寻求一条新的道路的、可敬的努力的诗章，使我对他们满怀着敬意。从他们的作品中，我固然发现了他们对于我的外行话之大度的宽容，但我仍然要对他们因为我先前的造次和无知致最深的歉意。

最牢固的磐石*

丰富中的贫乏意识

鲍勃·狄伦 (Bob Dylan)、琼安·贝滋 (Joan Baez) 和彼得·西格尔 (Pete Seeger) 的民歌唱片, 虽然一直不曾引起此间读书界比较广泛的注意, 但是, 据我所知, 一小撮爱好音乐的青年, 断断续续地倾听着他们的歌声, 也有四、五年了。以我自己来说, 因为粗陋寡闻的缘故, 在今年八月以前, 是一直不曾注意到它的。九月间, 为了满足关于这个极有意义的歌谣运动底知识之渴望, 请了白中道、戴文博二先生做了一次十分精彩的对谈。这对谈的记录, 已经在本期的《文学季刊》上发表了。

就以这个对谈做根据, 倘然将三十年代的第一次民歌复兴运动和民歌六十年代的第二次复兴运动做一个比较, 至少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地方: 每当美国人民开始对于既存的信念和价值发生疑惑的时候, 他们就去倾听那些俚野中的歌声。但是, 在这一个共同点里, 因着不一样的历史背景, 自有一些微妙的差异: 三十年代的美国的怀疑运动, 具有全球性的背景。欧战后的大不景气, 使西方的智识界对于因工业主义、殖民主义而膨胀起来的整个西方的价值体系, 发生了全面性的疑惑, 也便引起了极为尖刻的自我批评。在这样的条件底下, 被聪明的罗斯福总统雇

* 本文刊于《文学季刊》(台湾) 第五期,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九·鸢山》(台湾: 人间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四月)。

用的知识分子，便以一定的意识形态，去发掘和整理那些流荡在荒废的山间、疲败的农场和瘫痪的城市里的民歌，并且也以这一定的思想，从事民歌的再生产。

但是第二次民歌复兴运动开始的时候，正是美国的社会最富足的时期。特别是对于那些成为第二次民歌复兴运动最主要的听众的大学生，更是如此。他们出身于富裕的中产以上的家庭，在学费昂贵、校誉优良的学府中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在这富足之中，也开始了一种批评意识。中产阶级生活中的恶俗、虚伪、罪恶和人与物的倒错，仿佛在那些俚野的、辛酸的、愤怒的歌声中，显得更无法忍受了。攻击虚饰而堕落的中产阶级生活，是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的特色之一，以富裕的出身为耻，为罪恶，并且把穷人和穷乏本身理想化，又是旧俄时代民粹运动的主要精神，也曾影响了有岛武郎的文学和当代的日的思想界。

这种中产阶级的自我厌恶和犯罪意识的、理想主义底、浪漫主义底色彩，是第二世代的民谣复兴运动的特质之一。在我们的读书界，似乎很流行着一种对于“群众社会”的无限恐惧和憎恶的思想。对于把群众偶像化的观念，怕是要轻蔑地说：“太理想主义了！”对于我们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简直就是幼稚、愚蠢和感情冲动的意思。不错，群众有他们的愚昧，甚至于罪恶罢。但是，倘若不晓得从环境和发生上去了解这些愚昧和罪恶，而一味自封为一个何等高级的智识分子，那么，他便永远也不能享受群众的社会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惊人的智慧和美德。这，单单看这些民谣唱片中的歌辞，就很明白了。

为了逃避中产阶级的现实，各种“精神溶涣剂”在中产阶级中被前所未有的广泛使用着，引起了美国立法和卫生当局的重视。据这种“另文化”的地下小群的理论家们说：服用这种麻醉药剂，非但不是消极的避世主义，反而有积极的意义。这些药剂所带来的幻想世界，使人们了解到：在日常的现实底背后，还有一个更炫美、更其广阔、更其丰富的世界。他们于是开始怀疑真实世界的真实性，也怀疑日常自我的真实性。他们感到自己一向被这种日常的现实和自我所欺骗了。真正的现实，便是药剂作用以后的那些迷幻的宇宙！这个药剂所给予他们的教

训居然是：现实问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怎样去开拓内在的“自我”，怎样去释放囚锢在自我里的“神”。

像这样，怀疑经验世界的真实性，追求所谓“真实背后的真实”，以至于用理念或精神去解释宇宙的哲学的事，在人类的思想历史中，也不是一个新奇的事。从另一方面去看，正如“理想主义”和“观念论”都写同一个字——idealism——一样，以麻醉剂为基础的观念论，恐怕正就是它所自来的中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底必然的发展，也说不定罢。

然而，这样的观念论，在美国，也并不是没有它的反论的。以我亲耳听见的，除了如戴文博、白中道那样极力拥护使用“精神溶涣剂”的，也有一个美籍犹太青年说：“我和我的妻子使用过 marijuana，但我已经和它诀别了。我不再用它，重要的是我必须做点什么。”另外一个可爱的美国女孩也说：“我用过 marijuana，但我并不着迷。我觉得人类所被赋予的条件，足够叫我们去对付这个世界而有余，而不必借着药物去刺激它。”这个可爱的女孩，却正好是戴文博现在的女友哩。

似乎从来没有过一个民族，像今天的美国一样需要用药剂来帮助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非现实底世界里。这，自然有它的许多社会的和经济的因素罢。这个大的麻醉药运动，暴露了美国电影在发展中国家里被艳称的“美国生活”底实质上的贫困，当然，也暴露了作为对于这种高粱的中产阶级的精神贫困之反动的、理想主义的贫困性。

然而，无原则地忽视或嘲笑这样一个贫困的理想主义，也是错误的。在成千的“疏外者”所建立的“嬉皮世界”中，他们以可悯的姿态去实践了他们对于爱，和平主义，宽容，正义的理念和各种乌托邦式的公社生活。就以一个人来说，在他的一定的年纪里，他会反抗，热烈地追求他自己的理想主义。这种反抗和理想主义，或者也不免于幼稚罢。但，重要的是，他是否能把这反抗和理想主义成熟化了，带到一个更成长的年代里去。跟这个一样：今天美国的迷惑、的理想主义之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她能不能克服她的贫困性，而发展一种全新的、具有建设意义的理想主义。

而倘若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此间的我们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我

们是即便这么贫困的理想主义也没有的。理想主义在此间极端的贫困，又为一种特殊的条件所不断地再生产着，至于连这种贫乏意识也没有了。则要他们对于自己有所憎恶，有一种犯罪和贫困的意识，就不知道是要几千年以后的事呢！

老掉大牙的人道主义？

在这种普遍的理想主义的贫乏症里头，黑泽明的《红胡子》，在此间智识界中冷漠的反响，也许是意料中的事罢。他们对于《红胡子》的失望，据我所知，不外乎两点：第一，在内容上，它“只不过”表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而人道主义这个东西，实在是一个老掉大牙的思想，丝毫没有有什么新奇的地方，甚至想起来都有点儿肉麻兮兮的；第二，就形式上来说，黑泽把它拍得太过于简单了：简单的故事，简单的手法，太过分明白的对话，等等。一切不用去猜想、去苦思，不能叫他们拍案叫绝。他们想去猜谜、去感受、去“发掘”俗人所不能理解的奥义的一切预备，差不多全落了空，因此不但失望，甚至有点恼怒也说不定的。

要说一种思想已经过时了，老了，至少要有两个条件。首先，就是产生这个思想的实际问题发生了新的变化，有了新的性质；要不就是这问题已经根本不存在了。比方说，“寡妇再嫁是不贞的”这个思想，在今天，确乎是一个过时的、旧的思想。因为新建立的市民社会，已经从根本上改造了农业社会时代的两性的伦理。倘若今天有谁还站在过去的道德观点，描写寡妇再嫁的问题，便是一件可笑的事。其次，就是更新的、更进步的学问或思想，修正了或否定了旧有的思想，则原来的思想，便可以说是过了时的、不切实际的思想。比方说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认为是天体在运动而地是永远静止的思想，早已被更为科学的天文学说否定了。倘然今天还有人公开宣传着天动地静之说，这人便值得嘲笑。

然而黑泽所表现的思想和问题性，不管从哪一个观点去看，都没有

什么“过时”之处。正相反，贫困、饥饿、愚昧、不正和压迫，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一直都是、而且愈来愈是一个急迫而深在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我们不能想象之多的人口在营养不良、恶性的饥饿、永续的贫困、无知、医药缺乏和道德堕落中挣扎着。我们也无法想象多少惊人的掠夺和压迫，正在甚至以国际性的范围进行着。除非是谁能证明这些早已不复存在，或者说认为提出或批评这种泛在的罪恶已经是过时的思想，那么，黑泽提出的问题性，便不但不曾“老掉大牙”，而且具有无限生动的现实性。

诚然，在这个现代人的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的现实，比方人的物质化，疏隔的悲哀，虚无和颓废的必要性，个人的、安那琪的悲愤，对于定命的死亡底惧怖，等等。这些，或者是我们的比较高尚的，教养良好的，神经纤细的智识分子所关切的罢。然而，倘若不能够把这些同整个现存的根本辄铄连起来想，他便不算是一个真正懂得这一切的不安的人。他只不过是一个把悲愁放在嘴唇边玩弄着的、造作的 Stylist 罢了。

问题还不仅是这样。当世界瞩目的黑泽，花费巨大的努力去制作这一个“前-乔哀斯”风的 (Pre-Joycian) 作品的时候，正是日本文艺思想最热中于颓废的、夸张肉欲的、绝望的现代主义的时候。日本的智识界，在一九六〇年的大挫折以后，便又掉落到极为巨大的彷徨里。黑泽的这个努力，尤其在这样的背景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我来说，从阅读剧本所了解的安东尼奥尼，和以《8½》为代表的费里尼，比起黑泽的这个制作，实在是为之黯然失色了。从《齐瓦哥医生》和《红胡子》看来，“前-乔哀斯”的艺术路线，实在是还潜藏着丰富的可能性的。

倘若连黑泽的理想主义也要嘲笑，那么，就嘲笑罢。他们还是要轻蔑地说：“黑泽这个家伙，太理想主义了！”是的。连被知性的贫困和金钱贪欲堕落得不像样了的台湾的医生们也会说：“黑泽这个家伙，太理想主义了！”那些在还没有考进医学院就满脑子“颜如玉、黄金屋”的医学学生也轻蔑地说：“黑泽这个家伙，太理想主义了！”那么，我们的读书社会对于黑泽的这一制作的冷漠，岂不是很自然的吗？

在旧约圣经上，曾经记载着所多玛和峨摩拉两个荒淫、败坏的城市，因为天谴而遭毁灭。在“嬉皮世界”中追求爱和真理的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当谋杀和败德的阴影开始笼罩了他们的理想之国时，悲怆地说：“你永远没法在所多玛和峨摩拉城寻见神和爱。”

我们还不曾有类似美国那样的物质的所多玛和峨摩拉。但，倘若我们的心灵世界都像这两个败坏而麻木不堪的城市，这该是多么叫人寒冷而又寒冷的事呵！

真理的伦理条件

理想主义受到犬儒式的拒否的理由之一，便是说理想主义具有极大的欺罔性。一个美丽、崇高的理想常常带来丑恶而寂寞的幻灭；一个美丽而动听的理想，又往往成为压迫者或劫夺者借以施行压迫和劫夺的糖衣。朱力·达辛的《勇者之死》里的牧羊人，因为受到扮耶稣而来的理想主义所崇，在证实郊外的难民同胞染有霍乱之说只是毁谤的时候，欢欣鼓舞地来到主教那里。结果，他的满腔爱心换来的，只是屈辱的掌掴、悔改和痛苦地承认一个明白的谎言。同样一本圣经，却被这小镇的权力和财富的所有者作为他们自己存在的神圣的凭据。

理想主义否定论者还可以在历史上、社会上举出成千上万的类似的、而又真实的例子来。但是，倘若因为这样阴惨的事实而拒绝了理想主义，其结果比因为现在的医师、律师之不道德和堕落而整个否定了医学和律师制度，还要可怕。因为，倘若这世界上的恶者连理想主义这么一个敌人也没有了，则他们的恶德，便不知道要以多么凶狠的姿态去吞噬这个无告的世界。

事实上，这些悲愤的、极端的理想主义否定论者，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首先，他们不晓得理想主义是没有绝对的、永恒的性质。理想主义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换句话说，各个不同的历史的、社会的背景，有其不同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相应于这个不同的需要，便产生了各

一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理想主义。比方说，在农业社会的古中国，在从比这个社会更落后、更原始的社会发展到农业社会规模的时候，便有了适应于这个特殊历史阶段之需要的理想主义。比方说：孔子的一切教训所建立的理想主义——一个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男、女之间上下秩序整然的社会，以及维系这样一个社会所必要的孝、悌、忠、信、慈、仁、和等等的道德体系。这种理想主义，对于那个时候的社会，是一套完美、智慧的发明，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但是，正如我们所熟知，这些在古代完美的理想主义，有一大部分已经不适合现代化了的中国底需要。而我们今天还用得着的一部分，也须要予以新的解释。倘若现在有人以为孔子的理想主义欺骗了他，这个责任，当然不在孔子。《良相佐国》里的汤麦斯·慕尔爵士，便是不明白经过海外商业殖民而大大地发展了的商人中产者的英国之与旧的天主教会决裂的必然性，徒然地做了悲壮的反抗。他的悲剧不在乎他的诚实与谦冲的优美性格，也不在于野心勃勃的君王与现实而有些败德的新权贵，以及“见风转舵”的英伦教会，而是在于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

这样，理想主义自有它的历史的、阶段的性格。一种理想主义在一定的历史的阶段中，具有推动、发展当时的整个社会与文化的使命。

其次，倘然明白了理想主义的非绝对性与非永恒性，便能明白理想主义的双重性质。所谓理想主义的欺罔，便在这个关口上。在一个时候，理想主义是发展、推动人类社会与文化的无可打败的力量；但是在另外的时候，同一个理想主义，却成为阻止、压制人类社会与文化向前发展的力量。这种所谓理想主义的欺罔，大约有两个十分贴近的原因罢：

第一，某种理想主义既然有它一定的历史性，则历史改变了，由过去的、旧的历史条件所创造的理想主义，便失去了它成为“理想主义”底条件。而倘然有人要用一切政治的、权力的巨大力量，强行将“旧的理想主义”套在新的、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便有了所谓理想主义底欺罔。在我们的父亲一代，多少“孝行”、“贞节”的名目被用来压制年轻的、富有创造性的世代，便是极为浅显的例子。

第二，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总有一小群随着那个历史阶段底发展而掌握了地位、权势与财富的人。这些人，为了不愿意失去他们这一切既得的利益，便一方面不愿意足以使他们这些既得利益失去的一切变化发生；另一方面，他们要千方百计地为他们的既得利益，与保持这利益所必要的秩序，找最有力量的凭据。小镇上的神父与财主制造了谎言，诬称他们那些流浪的同胞患有可怖的霍乱，免得这些人破坏了既有秩序。神父不在圣经中寻找“爱人如己”和施舍的这么一个简单福音，却强调财富的祝福是神所分配与应允的教训。“爱”、“正义”、“怜恤”是世界一切宗教至极浅显和直接的、共同的理想主义。然而，一直到今天，世界上依然存在着因为肤色而拒绝一个人进入教会团体的事。

但是，理想主义否定论者，在这一切事实俱在的黯面里，没有进一步去看见，正在这一切黯面底背后，存在着理想主义底得胜底凯歌。

正因为拥有既得利益者，由于至死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既得的这个贪欲，他们已经注定了不能正确地接受不断发展中新的事物。他们因而不愿意或不可能明白压迫与劫夺是不对的，他们不愿意或不可能明白历史向前发展的规律是不可抵抗的。举个例子说：满清的当权者不愿意或不可能了解民主主义的潮流是不可抵挡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愿意或不可能了解殖民主义的罪行是必然要成为一种永远不再存在的噩梦。小镇上的神父与财主不愿意或不可能明白压迫、掠夺与欺骗是行不通的。也因为这样，专制思想、“大东亚共荣圈”与“财富是神所分配”的口实，一定会被揭穿的。

这样，在所谓理想主义的欺罔中，便有了一个立场的问题。只有同财主的父亲作了坚决的诀别的儿子，才能明白整个的真理。至此，真理便有了伦理的条件；真理只对于那些站在正确立场——正义立场的人说话，就如真理只面对起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却背向日本军国主义劫夺者一样。

真理本身或者并没有伦理的因素罢。但了解与掌握真理，却有了明白的伦理条件。是的，真理的伦理条件，这便是理想主义得胜的最牢固的磐石！

知识人的偏执*

[1]

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所发生的偏执，大约有两种：第一种是由于无知而来的偏执，比如硬说摄影机会把人的灵魂摄去之类；另一种却正好是由于知识而来的偏执，比如一定要主张绘画之不再现自然、不模写自然的抽象派艺术。知识分子的偏执，便是属于第二种。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虽然往往是消除某种因袭的、约定的偏执最为得力的人，但是他自己又很难于没有另外一种所谓知识分子的偏见。而且，或者简直可以说：知识分子也者，就是有其特定的知识上的偏执的那种人罢。知识人按着他们既有的教养、知识和癖好，去解释世界，去评断一切的事物。而这些教养、知识和癖好，又无不有其强烈的阶级和党派性。这样，在知识的范围内，就划出许多的派别来，各有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语言。而当这些不同的派别相互对立的时候，所谓党派性、所谓知识分子意识，就紧张了起来。而这紧张起来的党派性和知识分子意识，恐怕正就是知识人堕落成为各种样式的教条主义者的最根本的原因罢。

因为这样，只要是各种知识上的偏执和党派性存在着，所谓知识人的偏执和派性就不能不存在着。而且，人类在知识上的进步，恐怕就是在这种派性上互相辩论、互相冲激而来的罢。像哥白尼、像伽利略、像

* 本文刊于《文学季刊》(台湾)第六期，一九六八年二月。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八·鸢山》(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

达尔文、像弗洛伊德等等，没有一个不是孤独地面对着全世界知识的法利赛人的迫害、攻讦、嘲笑和排斥，为整个人类知识的领域，开辟了又丰富又辽阔的世界的。正就是他们所发现的真理所带来的勇气，使他们能够择善固执，独排众议。

但是，正就在每一个真理在监狱、火刑、放逐、教会法庭和保守主义的巨大逼迫中备受分娩之苦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另一种知识上的派性和偏执所造成的罪恶。当知识上的偏执和派性，为了有意或无意地保卫一个既有的秩序——一个既有的所有权秩序、社会秩序，等等——而膨胀起来的时候，它就必然堕落为各式各样的教条，有时更纠集他们所掌握的一切强制力量——如舆论、如警宪、如政府、如法律和军队、如法庭和监狱——来加强他们的阵容。我们只要想起有多少真理的先知们，曾怎样因为“危险思想”的罪名，遭受了各式各样的逼迫，就很明白了。对于这种迫害的最古老、最优美的记叙，可以举出记载哲人柏拉图之死的《克利陀》(Crito)来。知识的教条化，不但严重地损害了它接受新事物、往前发展的能力，也成为整个人类往前进步的绊脚石。

[2]

因为这样，该如何使自己的知识上的偏执和派性免于教条化，实在是我们的知识生活中十分重大的问题。我个人是个极其不学的人。不学再加上性格上的多少偏执性，则堕落为一个最肤浅的教条主义者的危险性，就尤其之大了。两年前罢，我曾在《剧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现代主义底再开发》的文章。其中的一部分，便是说到我如何在《等待果陀》的演出中，发现了我的现代主义反对论中的若干构成部分，显然地犯了机械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发现而且承认了这个错误，对我个人来说，不但使我对于现代主义的批评观点较为活泼，也使我能够怀着一份前所未有的同情和了解的意愿，去看“现代派”们的东西、去批评“现代派”们的作品。

去年十二月下旬，电影导演李行先生租出了他自己的六部片子，

让《文学季刊》的同人作家做了一系列的观赏。今年一月，同人作家们和李先生一块，就他的一系列作品做了诚挚、坦白和热情的讨论。

这个观摩和讨论，又一次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我的另一个错误的偏执。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我向来对于国产影片毫不关心。我一直拒绝着国产影片，到了柯俊雄是什么长相也不晓得的地步。但是，在这个观摩会里，我们不但看见导演李行在这十多年来所付出的动人的努力，也看到国产电影在各种限制——行政上的、人才的、制度的限制——中，在漫长的十余年里所走的步迹。我们实在不能不为某种悲壮的氛围所打动了。在这个为我们所毫不关心的领域里，十多年来，有些人在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限制下，惨淡经营，为国产电影吃力地献上他们的努力。这些努力所带来的一点成绩，一方面可以是导演李行个人在来日更进一步的创造生活底基础；而这个成绩也同样是将来的整个更高水准的、更富于创造性的中国电影所自发展的共同基础。

国产电影在编剧、导演和演员水准上比较的低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知识分子对于这个低落的事实，向来不是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就是采取毫无建设意义的、恶评的态度。我们惯于一方面饥饿地耽读着从没有看过的、国外著名电影的报导和翻译脚本，一方面夸大着一些在台湾上映的外国电影在“艺术性”、“现代”创意上给予我们的深刻“感受”，一方面就对于国产电影相对地表露着某种自暴自弃的、一竿子打尽的、怀有敌意的批评，嚷着要革国产电影的命。

然而，终于有一天，我们会成熟到足够去了解这样的事实：我们所采取的、无批判地向西方电影一面倒——而且往往只是倒向他们最其渣滓的《8½》或《幸福》等；我们对国产电影的不负责任的、非建设性的批评，都比起我们所瞧不起的、不屑一顾的国产影片在十余年来所做悲壮的努力，要轻省得多。我们在这同样的十多年来为国产电影所做的，只是一些安那琪的，夸夸其谈的，不切实际的议论；而他们所做的，却是虽然令人辛酸但是异常实质的，建设性的贡献。

借着这个观摩会，同人的朋友们才有了重新估价自己、重新认识国

产电影的契机。我们深切地相信：当目前的电影艺术工作者，和广泛的其他范围的艺术工作者，能够在一个共同把中国文艺弄好的基本愿望上团结起来，互相讨论、互相观摩的时候，不只是国产电影，连带地是诗、绘画、戏剧、音乐和小说等等，就要有一个崭新的发展。而导演李行先生在讨论会上所表现的坦诚、虚心和热情，正是一切负责的艺术工作者应当学习的。

[3]

一个撑竿跳的运动员要跳跃到一定的高成绩，也得有一个所自跳起的地面。凭空地腾云驾雾，是没有的事。要把我们的文艺向更高的地方去发展，也得首先从现有的低水平中做起：同情它、了解它，并给予新的评价。架空地要搞什么高等的艺术，是办不通的。而且，去了解这些现有的我们的文艺，不但不会使我们懊丧，使我们自弃，使我们“庸俗化”；正相反，却使我们更能宝贵别人步履艰辛地带来的成绩，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无限的鼓舞，增加自己工作的热情。向西方无批判地一边倒，对自己做不负责的恶评，却只会一步步把我们带到虚无和绝望里。

知识人的偏执，或许是永远不能避免的罢。就以力倡认识底纯粹性的某些学派做例子：他们对于认识问题之追求某种近乎化学上的纯粹底努力，一方面由于认识的非绝对性——人们总是因着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的不同的条件，只能不断地向真理逼近——一方面由于把认识当做化学中追求某些纯净的物质那样，不得不把某种“人底”(humane)的东西除去了，而堕落成价值中立的，没有人味的工作，终于也不免于自囿为一个反对派性的派性；一个反对偏执的偏执罢。

倘若派性和偏执是知识人的属性，则这派性或偏执有没有在随时自省和自我检查中纠正自己的错误、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就更形重要了。在百废待举的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否具有这个能力，是否能在建设的基本愿望上，互相讨论，互相了解，存大同而去小异，实在是比一味放纵艺术家的派性和偏执，是更有其积极的意义罢。

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

〔1〕文学和社会

我总觉得，文学像一切人类精神生活一样，受到一个特定发展时期的社会所影响，两者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以欧洲的浪漫主义时代来说，它在文学方面有各别国家和民族的不同，但和前一时代——即所谓的“拟古典时代”的文学相较，浪漫主义文学有一共同的特点，即个人的苏醒和解放。文学中奇诡的幻想；对于神秘、恐怖的激情；叛逆的热情；对于肉体的、活跃的“人”底苏醒；夸大的感伤主义；对于传统道德、纪律、观点等诸束缚的反抗和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等，风靡了整个欧洲。如果从全局去看，浪漫主义时代的宗教寻求个人与神之间直接的交通——即通过读经和祈祷直接从上帝求取灵感，而不是通过层层的神职阶级体系；在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博爱”，乃至经由革命而打倒封建贵族专制，建立现代市民民主政体；在经济学说上有了以个人为社会幸福最高裁判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其他在音乐、绘画、哲学、法律理论上，都浸淫了一种新的精神，即所谓浪漫主义的精神。许多思想史家都说，这种精神，是某一个年代，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人——例如法国的卢梭，喊出某一个主张——例如卢梭的“回归自然”，引起共鸣，成为强大的风潮。然而，如果有一个用功的学生问：为什么这个精神

* 本文刊于《仙人掌》(台湾)第五期，一九七七年七月。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十一·中国结》(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

不早一天或晚一天发生，为什么在“拟古典”时代和“浪漫”时期之间的所谓“前浪”时期，也同样有思想家表现出同样深刻、同样敏锐的个人的苏醒和解放的思想，却未蔚成气候？那么，这些思想史家，怕是难于解答的。因此，另外有些思想史家，便在每一个思潮背后，找社会和经济的根源。于是他们发现到：就在浪漫主义思潮昂扬的时代，已是欧洲在产业革命之后，工业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代。现代工业生产，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财富，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兴城市，以及一群新的人类——产业资本阶级。这些人和过去的封建的、贵族的传统毫无瓜葛，他们以新的生产手段，创造了一个充满发展前途的、富裕的新世界。物质财富的开发和生产、科技的发展，对于前所未知世界的不断征服……，使他们以新的态度肯定了人的能力和价值。他们敢想、敢做，而且想了、做了，就产生空前巨大的成果。对于新兴的工业资本阶级，“人”苏醒了、解放了。一切封建贵族的价值和成就，相形见绌。于是他们像甫进入青春时期的少年一样，内心充满了热情、好奇、自信、反叛、创造、幻想、感伤等情绪。这便随着新兴工业资本阶级在经济社会上的领导性，而领导了整个欧洲的精神生活。它表现在文学上，就有了文学的浪漫主义；在政治上，有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在经济上，有了亚当·斯密的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指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在宗教上、音乐上、绘画上和哲学上，也都有同一个浪漫精神贯穿其间。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一定有它作为时代精神的基础的根源的，社会的和经济上的因素。我这样讲，绝对没有要告诉大家：社会或经济是文学绝对的唯一的影响因素的意思，就好像数学上的变数一样，比方说 $X = 2Y$ 这个函数的关系，只要 X 值改变，Y 的值一定也变。文学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并没有这么机械，这么呆板。我们只是说：社会或经济是思想的或精神生活（当然也包括文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2〕三十年来的台湾社会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三十年来的台湾的社会与文学，让我们先谈谈三

十年来台湾的社会经济，也许可以找出一些特点。我们知道，一九五三年是美援正式参加我们国民经济的一年，一九六五年是停止美国经济援助的一年。只要研究台湾经济的人都知道，美援对于台湾经济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以前，有意要把台湾造成日本帝国主义南侵的基地。从那时开始，它才在传统的“农业的台湾”、“工业的日本”政策上做了一次修改，于是台湾的工业开始有了比较大规模，比较重要的工业设施。但是不久，第二次大战到晚期时受到盟国的轰炸，经济封锁和通货膨胀的结果，整个地残破了。光复之后我们政府来到台湾，当时台湾的经济可以说几乎完全瘫痪，快到破产的阶段。当然，一些基本的工业设施和工务工程还在。为了使社会安定，为了提高经济，以免和许多战后国家一样，受到共产主义在贫穷地区滋长，美国即根据这个政策，援助台湾以及战后的西欧，其目的就是在稳定经济，防止左派力量成长；另一目的就是创造一个有购买能力的市场。我们晓得美国在第二次大战里愈打愈有钱，生产力愈来愈高，所以他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就必须用经济性的援助来帮助他，一方面稳定当地的政权，使得不被赤化，一方面创造一个有购买能力的市场，来买美国的东西。同样，美援在台湾整个经济和财政上有非常重大的功能，甚至于在决定台湾哪一种工业应如何做，都得经过美国同意和审核才能动用他的钱。可是，事实上，这十几年来，台湾地区从公营事业慢慢地开始成长了，特别是韩战以后、越战之后更是蓬勃发展。而在这十九年来的台湾国民经济生活里面，美国的资金、技术、资本、政策和商品，对我们台湾经济有绝对的支配性影响。一九六五年美援停止，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因素对台湾影响的终止，就好像他所宣称的一样，他认为台湾已是一个在经济上可以“自立”的地区，当然，能否自立是另一个问题。他的意思是说，台湾已经可以自己生产一些比较初级的东西，而且有了相当的购买力了。一九六五年以后，美国对台湾在经济上采另一种参与的方法，即投资的方式，就是资本上的输出。银行一家一家地设立，美国资本的工厂亦然。美援停止之后，日本资本也来台湾了。一直到今天，日本的资本、技术和商品对台湾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中华杂志》一直如此大声疾

呼：我们和日本的关系每年都是入超。一直到这两年，我们才开始进行六年经济计划。此一计划有一基本精神，就是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开始有了十项建设的设施，开始有资本密集工业的筹划。这一切目的都是为了摆脱过去三十年来太过于偏重外来资本、外来技术影响而做的努力，也许这努力很困难，可是值得我们支持。这是一条好的道路。不错，三十年来，台湾的国民经济即使像今天这样，已经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成长，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展的呢？就是：开始是美国，后来是日本的资本和技术的一种绝对性的影响之下成长出来的。这是三十年来台湾社会经济非常重要的特点。

〔3〕西化——三十年来台湾精神生活的焦点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特点下，我们来回想一下，三十年来台湾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可见到一个特点，就是——西化，受西方的影响或东方日本的影响很大。首先，我们看政治上的影响，我们所要讨论的不是我们政府的政治设施，而是政府以外的政治上的运动和想法。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交接时，有一个自由化运动，那时候有一家被禁止了的杂志——《自由中国》杂志，是“在野党”和党外政治运动的机关刊物。它的方向是西方的议会民主主义，他们所要求的是政治上的西方式自由民主，他们想依照西方的样式组织在野党，他们的理想和目标完全是西方的议会政治路线。当然，这也反映了刚刚在台湾随着经济成长而成长起来的、新的台湾的民族工商阶级在政治上的要求。这是我们政治上的目标，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人要求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化。我这样说，并不在对这个运动作什么价值的判断，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运动和整个三十年来的西方经济对台湾的支配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其次，从一般思潮来看，我可以举出一家“自动关闭”的《文星》杂志。那时有一位作家，一连串地写了许多文章，其中表现的思想，无非是个人主义和对权威的怀疑和反抗，在中国未来的方向和道路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口号——“全盘西化”，甚至于大声疾呼：为了要全盘西化，我们应该

不惜牺牲、连西方的缺点也照单全收之。从思想内容上看，这并没有新奇的地方。我们知道中国在一九二〇年或三十年代，就有过这种“中西文化”孰优的论战，而且讨论得很深刻、很广泛。从全局去看，基本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由于台湾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由于各种因素，和整个中国近代思想传承发生了断绝，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上，必须把这些老的，似乎在中国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在台湾再绕个小圈。从台湾的整个历史看来，这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和台湾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大陆分离有很大的关系。比方在早期，台湾也有白话文的论争，但在时间上距中国的白话文问题的讨论已延迟了好几年，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白话文已经辩论过，在基本上，问题已经解决，而且在白话文已于中国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开花结果的十年之后，台湾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还有像中西文化论战也一样，七十年代以后的新诗论战也可作如是观。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对权威的反抗，对自由的向往或对西方倾倒的心态，是三十年来台湾革新思潮的主流。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三十年来台湾的学术界和科学界是怎样的情形。在谈这问题之前，我介绍同学读一篇文章，即第一〇五期的《大学杂志》里头，李丰医师写的：《把医学从殖民地的地位挽救回来》。这篇文章是这么开始的。她说：她是一个医师，台大医学院是个教学医院，每个礼拜要举行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三十年来，这个讨论会中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以中文语法夹杂英文语汇的特殊语言，由于行之已久，大家习以为常，早已不觉得奇怪了。可是，有一次，来了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李治学医师，他很努力地用中文在这个讨论会上做报告，结果引得全场哄堂大笑。原来在这二、三十年来，大家习惯于那种中不中西不西的语言，如今突然换成中文，讲起来可能反而显得蹩脚，于是大家竟然引为奇怪而笑了起来。可是，在场的李医师觉得很沉痛，她说：“中国人在中国的地方，因为使用中国的语言来讨论中国人的病情，而引起哄堂大笑，却没有人以为是很大的笑话；也没有人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中国人在中国的地方，替中国人看病，却要用别别扭扭的外国文字来写病历；中国人在中国的地方，使用中国的材料做研究，却要用似通非通的外国文字来写论

文，也没有人视为是笑话，也没有人认为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接着作者又举出我们邻近的日韩，很远处的欧美，指出这些国家中，没有一国的医生是用外国的语言文字来讨论他们本国的病例、写论文的。惟独香港是例外。但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而我们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他说：我们学生苦读了十几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第一件最令他迷惑的是外文的教科书，如海浪滔天而来，搞得昏头转向，天天翻字典。如此整个台湾的教育变成了外国高等教育的预备教育，台湾有些学子好不容易挨到了个博士，报纸上偶尔也登载一下，但是，在整个学术市场上，就绝对比不上在外国绕了一圈回来的人。这个问题我们一点也不陌生，我想大概除了中文系之外，没有一系的教科书不是外国人写的，甚至有些学校的系主任和很多老师也是外国人。在基本上，我并不是反对外国的东西，我一直认为外国的经验中好的东西我们要接受，外国的东西我们要有批判地分别地加以吸收。然后用到我们民族的具体情况上。我们要了解：什么叫教科书呢？教科书就是一个国家的学者专家，用他在学术上的成就，面对他们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的具体问题，提出解答的方向，然后把他的解答和方向，交给他的下一代，使他的下一代能按照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成就去面对自己的问题，然后一代代地承传下去。没有一个国家的教科书是用别的国家的语言写的。就拿医学来说吧，也许我们想：全世界的癌症一定都一样，所以美国人治疗癌症的经验，一定也会变成我们的经验。可是，外国有色人种在鼻咽癌和肝癌上的病例很少，但在台湾却很多。假如你是医学院的学生，你读了外国的内科学，那么在肝癌那一章，也许你就发现书上说这病例很少见，他们没有多少资料研究。关于肝癌的解答，你在这本以外国情况为基础的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的。实际上，在台湾，我们在鼻咽癌和肝癌的研究上已有相当的成就。可是，我们的有关研究论文并不是写给我们看的，而是用别别扭扭的英文发表在别的国家的医学杂志上。对于外国医生，他看了只是了解有这么回事，对他们没什么实际的价值。但是对于台湾的医学教育却是一项不可饶恕的损失。这个问题值得每个同学想想，如果开始的十年我们从没有变成有，需要借重外国人的经验，外国已有的成

就，这是我可以同意的。然而三十年来我们整个学术界和大学教育，读的是别人要他们的子弟解决他们自己特殊问题的教科书，二、三十年来我们的老师很少用中国的语言，以中国的材料，针对中国具体条件写成教科书给我们读。你们应有权利要求老师写这种教科书。“对西方的附庸化”，是台湾学术界或者说是科学界的一般情况，至于其他的社会生活更不用说了。尤其最近十年来台湾学生生活普遍有了显著的改善，家庭生活富裕化，甚至在台湾正景气时，有学生自己搞起贸易来了。这并不是年轻人的错误，是这个客观而具体的环境所造成的。再说我们的音乐系，在二、三十年来的教育界，没有培养出一个真正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音乐家，音乐系的学生成天和外国的音乐为伍，充其量只培养一个外国音乐的很好解释者，那就是演奏家。可是，他们花那么大的力气，那么多的心思，经过那么痛苦的煎熬，学的竟都是外国的东西，从来没有自己民族的声音。我曾听过一位教授说：没有一个音乐上具领导性的国家不是音乐上的民族主义者。他以德奥为例，他们的音乐教科书从小学到专门大学，多半都是他们的民族作家。愈低层的音乐教育，愈多是他们自己的民族音乐，他们的民谣，他们民族几千年来的歌声。绘画更不用说了，我们可以从我们学生的画展中看出纽约、巴黎、东京的影子，毕加索的影子，许多我们在画册上熟悉名字的影子。文化上精神上对西方的附庸化，殖民地化——这就是我们三十年来精神生活突出的特点。这一认识也许使我们惊愕，但却是不争的事实。此无他，唯一的解释，我想，是由于我们整个实际社会生活就是笼罩在别人强势的经济支配下的缘故。我们的附庸性文化，只是社会经济的附庸化的一个反映而已。

〔4〕文化附庸中的台湾文学

在这样的精神环境，让我们回顾这三十年来台湾文学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在台湾年轻一代文艺工作者成长的时期，我也参与了一点，所以我可以就这个问题做一回想，和大家做个探讨。首先，我要介绍的，当然是标示文学运动最重要的标志——文学同人杂志。先说当时由夏济安

主编的《文学杂志》。它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介绍西洋的东西，西洋的思潮和西洋的作家；第二部分是因为当时来台不久，新一代的台湾作家尚未成长，而当时的几个作家都是以回想在过去大陆上的经验为创作的题材，所以我替它起了个名字，叫“回忆的文学”。《文学杂志》中主要的这两个部分，并没有现实上台湾生活的反映。但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是西方东西的介绍，用很大的热心加以评介。另外一本《笔汇》杂志，虽然和学院离得较远，却依然被笼罩在一片西化的潮流之下。“五月画会”的一些成员，当时，还只是师大艺术系的学生，整天在《笔汇》上搞“康定斯基”、“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在文学上，《笔汇》也花不少力气介绍外国的作家、批评和理论。主要的真正指导他们文学道路和思想的是西方的东西。《现代文学》更不用说了。它可以说是私人办的当时台大外文系的习作杂志。《现代文学》的同人，把学自课堂和阅读的西洋文学，以中文实践。五四新文学的传承中绝了，他们就在西洋文学中找传统，去模仿西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从事创作。这样说，绝不是批评或嘲笑他们，在社会经济全面附庸于西方的时代，文学艺术不向西方“一面倒”，才是不可能的。《现代文学》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像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等。再说一九六六年创刊的《文学季刊》。如今看来，西方的东西在这个杂志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支配力。我们也曾花过很多力气，把还看不太懂的西方文学评论很吃力地翻译出来，然后登了出来，同时又介绍作家和流派等等。当然，我们也培养了许多作家，如大家非常喜爱的黄春明，产量较少但非常卖力精工的王禎和，还有现在作风已改变的施叔青。不过，《文学季刊》和《现代文学》毕竟有些不同之处，后者是全心全意的往西方走，而前者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或者主观上愿意走自己的路，而这寻找的工作在一九七〇年以后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在《文学季刊》开始写些随想的东西，当时也曾把一些不必要的英文字眼夹在文章里，显然是崇洋媚外。当时，我对西方的影响已经有了反抗的意思。可是，即使如此，我还是乐此不疲，甚至到今天，有时候和人讲话偶尔还有几句英文单字。这是一种心态，是整个文化空气之下，我们的处境。

〔5〕七十年代的变化

在一九七〇年代的开始，客观事物和我们精神生活都有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国际政治上的撞击，一九五〇年代开始的“自由世界和共产世界两分”的世界冷战的年代，已经慢慢结束了，趋向于多元化世界。在一个时代结束，另一新时代在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受到很大的撞击。我们自动地退出了联合国，然后是一连串的外交挫折。我们过去一个劲往西方看，一个劲往东方日本看，总觉得人家好，所有美好的名词都和美国、日本连上关系。可是，到了七十年代以后，我们突然发现这些我们奉以为师、视以为友的“自由世界”重镇，竟冷酷地背弃了我们。一些本来似乎还很遥远的事，似乎跟我们没关系的事，忽然一下子都来到我们眼前了，使我们措手不及。这是国际上的变化。再说经济方面：经六十年代末到一九七四年，由于世界性景气，我们遭逢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一方面也显示出工商经济体制内部的问题：显著的是财富分配的问题，工人的工作条件问题，工人的职业疾病问题，农村、渔村、矿区的社会问题等，引起了青年和社会深刻的关切。再加上“钓鱼台事件”的勃发，首次启迪了战后年轻一代爱国情绪和民族主义的情感，真切地感觉到依附于强国下自己民族的危机。过去，我们对中国的感情和认识，是地图上像秋海棠的一片叶子的中国。我们只在中国现代史的课堂上，读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时，悲愤一番，过会儿就忘了。“保卫钓鱼台”的运动发生之后，青年同学才真正在实际运动中参与了自己民族的命运。

（一）“保钓”后的思潮和文学

这一切的变化，使年轻的一代，从原本只知引颈“西”望，反过来看自己的本身、自己的社会、自己的同胞和自己的乡土。他们喊出了一个口号，“要拥抱这个社会，要爱这个社会”。于是，有了社会调查的运动，到山地、渔村、矿区等去调查当地的实际生活情形，他们也展开了

服务运动；青年们带着一颗赤诚的心，到孤儿院、老人院去慰问。总之，他们开始关心自己校园以外的事物，关心实际的社会生活，当然这些关心也许还欠深入，但从发展的过程说，这是三十年来第一次在台湾的青年字典中有了一个新的词汇——“社会意识”、“社会良心”和“社会关心”。在这样的思潮下，台湾文学也有了转变，那就是以黄春明、王桢和为代表的“乡土文学”。这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家，全面地检视了在外来的经济、文化全面支配下，台湾的乡村和人的困境。他们不再支借西方输入的形式和情感，而着手去描写当面台湾的现实社会生活和生活中的人。在文学形式上，现实主义成为这些作家强有力的工具，以优秀的作品，证实了现实主义无限辽阔的可能性。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表现在一个论战上，即“现代诗论战”。在这个论战中，相对于“现代诗”之“国际主义”、“西化主义”、“形式主义”和“内省”、“主观”主义，新生代提出了文学的民族归属，走中国的道路；提出了文学的社会性，提出了文学应为大多数人所懂的那样爱国的、民族主义的道路。他们主张文学的现实主义，主张文学不在叙写个人内心的葛藤，而是写一个时代、一个社会。

（二）“乡土文学”

说到“乡土文学”，有趣的是：一般所称“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如黄春明和王桢和等，都不同意将他们的文学称为“乡土文学”。中国新文学在台湾的发展，有一个过程。经过六十年代晚期以前的“西化”时代，在七十年的前夕和七十年代初年，作家开始以现实主义的形式，以台湾社会的具体生活为内容，检视西方支配性影响在台湾农村所造成的人的困境。七十年代以后，杨青矗的工厂和王拓的渔村成了小说的主要场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题材，找典型的人物，在现实的生活语言中，调取文学语言丰富的来源。在这一个意义上，王拓说：台湾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对“西化”的反动和现实主义，是这时期文学的特点。

从历史上看，“乡土文学”是抗日文化运动中提出来的口号。由于深

恐中国文学在殖民地条件下消萎；由于中国普通话和闽南话方言之间的差异；由于日治时代台湾和大陆祖国的断绝，当时，伤时忧国之士，乃有主张以在台湾普遍使用的闽南语从事文学创作，以保中华文学于殖民地，而名之为“乡土文学”。

当然，今天情况已有大的不同，但相对于过去“乡土文学”有强烈的反日帝国主义的政治意义，今天的作家，也在抵抗西化影响在台湾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支配，具有反对西方和东方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意义。毫无疑问，由于三十年来台湾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其特点，而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也有其特殊的精神面貌。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台湾新文学在表现整个中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精神历程中，不可否认地是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学的一部分。

(三) 殖民地时代反日抵抗文学的再评价

也就在七十年代的前夜，一些优秀的、年轻的文艺史学家，如张良泽、林载爵和梁景峰，开始着手整理日治时代台湾抵抗文学的历史。一直到今天，《文季》、《中外文学》、《夏潮》、《大学杂志》等，陆续不断地有介绍和评介日治时代台湾抵抗文学的文章。这和三十年来，文学性杂志上一味评介西方文学的事实，有多大的对比，多大的不同！这些前行代民族文学家，在过去近三十年中，由于文艺界以洋为师，“西洋”挂帅，竟被湮没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现代诗论战”、“乡土文学”同时，开始了对先行代抵抗的民族文学家予以再认识和再评价，是有它的必然联系性的。

先行代抵抗的民族文学家给予我们的教育是什么？首先，是他们有明显的历史意识，他们的文学，强烈表现了整个近代中国抵抗帝国主义的历史场景；其次，这些作家表现了勇于面对当时最尖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问题，不逃避，不苟且，在抵抗中，正面表现了人类至高的尊严；再次，他们毫不犹豫地采取具有强烈革新意识和倾向的现实主义，作为他们文学表现的工具。对于台湾先行代民族抵抗作家的再认识和再评价，无疑地将成为新一代在台湾的中国艺术家最好的教材，

承传这一伟大而光辉的传统，发扬而光大之。

〔6〕 结 论

七十年代以前，台湾不论在社会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受到东西方强国强大的支配。在文学上，也相应地呈现出文学对西方附庸的性格。

七十年代以后，因着国际政治和岛内社会结构的变化，开始了检讨和批判的时代。“保钓”运动激发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热潮，掀起了社会服务和社会调查运动；社会良心、社会意识首次呈现于战后一代的青年之中。在这个变化下，文学在创作上以现实主义为本质的所谓“乡土文学”的文学思潮，展开对西方附庸的现代主义的批判，提出文学的民族归属和民族风格，文学的社会功能；在文学史上，前行代台湾省民族抵抗文学的再认识和再评价，使日治时代民族抵抗文学中反帝、反封建的意义得到新一代青年的认识。从文学长期向西方一面倒到文学的民族认同；从逃避主义、现代主义、“国际主义”和主观主义，到文学的民族归属，到文学的社会功能，到文学的现实主义；从评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先行代民族抵抗文学的再认识和再评价，是一条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有一定的历史、社会、经济的基础。而我们也从而可以肯定，新一代青年，将沿着这一条曲折迂回的道路，开发一种以台湾的中国生活为材料，以中国民族风格和现实主义为形式，创造全新的文学发展阶段，带来中国新文学在新阶段中的一次更大的丰收！

（整理：杨丰华）

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

一个民族的文学青年，总是首先、而且主要地从自己民族的过去和当代的文学家及其作品中，吸取滋养，受到鼓励，逐渐成长为那个民族新生一代的文学家。

一个民族的文学教育，总是首先、而且主要地把自己民族的文学，当做主要的教师和教材，使那个民族的文学之独特的民族风格，得以代代传统。

然而，在我们这一代，外国的、别的民族的作家和作品——特别是现代美国的颓废的文学作品，成了大多数文学青年的榜样和范本。

我们的民族，是富于文学资产的民族。然而，在大部分我们这一代作家还是文学青年的时候，却只能在一大堆外国的、世纪末的作家和作品中，如饥如渴地把别人的东西，当做自己的“传统”。

每次想着这些，总是感到无由言说的怆痛。而这怆痛，因着眼看今日的青年朋友大抵依然过着文学的亡国者的生活，而仍旧或者益加深沉。

也正因为这样，我曾在一篇简要地讨论三十年来在台湾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学的文章中，给予一些和我属于同一时代的文学工作者以肯定的评价。这些作家，都是我所尊敬和信赖的朋友。我知道他们的谦虚和诚实，足以使他们自知他们都还没有写出最伟大的作品；然则，在他们已经发表的作品中，他们使用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字形式、美好的中国语

* 本文刊于《中华杂志》(台湾)第一七一期，一九七七年十月。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十一·中国结》(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

言，表现了世居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生活中的欢笑和悲苦；胜利和挫折……这些作家也以不同的程度，挣脱外国的堕落的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扬弃了从外国文学支借过来的感情和思想，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形式，生动活泼地描写了台湾——这中国神圣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民众。正是他们的文学，使三十年来台湾的中国文学，头一次有了生动的、具体的社会生活，和亲切、感人的、为生活而辛勤工作着的同胞的面貌。这些作家们，更以描写外来经济和文化支配性影响下农村中的人的困境，和被外来经济和文化所“国际化”了的都市中的人的诸形象，批判了台湾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殖民地化的危机，从而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上，高高地举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鲜明旗帜！

“你们有偏狭的地域性！”

对于这样的批评，我们回答以庄严的、铁一般坚定的“不！”

台湾的生活，对于目前生活在台湾的一切中国人，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中，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的生活。但是，有些人，不论在台湾生活了多久，但在他们灵魂的最深处，从来就没有把台湾真正地视同自己国家的一块宝贵的土地；也没有把广泛的、在台湾为生活而辛勤工作着的民众，看成自己骨肉相连的兄弟同胞。一个对于每日生活于斯的自己国家的土地不抱有一丝情感；对于衣之食之、日日相接的民众不怀有一点点同胞的爱情的人，怎么能从心灵的深处真正地关切整个苦难的中国，又怎么能真正地爱七、八亿伟大的中华同胞？而正就是这些骨子里对台湾和生活在台湾的中国同胞没有一丝一毫感情的人——不论其籍在大陆或本省——每每于全民族都在为自己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做着最艰苦危难的奋斗的时候，争相脱产逃亡。而当他们指责“你们有偏狭的地域性”时，他们自己早已不把台湾当做中国自己的土地，也早不把这土地上的民众当做中国自己骨肉相连的同胞。

然而，一个中国人要当中国人，是他神圣不可侵夺的权利，是不假手别人的认可和批准的。同样，在台湾的新一代中国作家，要以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形式，在台湾这块中国的土地上，描写他们每日所见所感的

现实生活中的中国同胞、中国的风土，并且批判外国的经济和文化之支配性的影响，唤起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精神，是断然不假手别人的批准和认可的。

“你们搞写实主义，写社会上的小人物，是揭发黑暗面，搞阶级文学，搞工农兵文学！”

比起前一种指控，这是用心最为阴狠，最能暴露出指控者心灵之黑暗的罗织和诬陷的。

黄春明、王祯和、王拓、杨青矗和其他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家们笔下的人物，散落在广泛的农村、渔村、学校、市镇和工厂，勤劳地生活，殷勤地工作。借着这些作家的作品，我们看见了这些人们素朴、正直的面貌；看见我们自己民族最真切的喜、怒、哀、乐。正好是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教育了作家自己，教育了知识分子，教育了更广大的读者：必须首先和我们所日日居息的土地、和我们所日日相与的同胞有心连着心的感情，我们才和自己的民族血脉相通，才能在弥漫的外来影响中，为淡漠、漂泊甚至失丧的民族感情，找到一个稳固的、中国的归宿。

然而有人竟然说这样的人物是“小人物”；说他们的生活是“黑暗面”！让我们问：有什么样的污秽、什么样的羞辱比这个更大、更粗暴？

事实正好相反：这些“乡土”的人物，集合起来看，尤其是当他们在启发我们从他们身上贴切地看见几千年前同其素朴、正直、勤劳和勇敢的中国民众伟大的容貌时，这些人物，便有了巨大而庄严的形象；他们的生活，也成了激发我们不断创造和革新的、光辉而极具启发性的生活。

至于什么“阶级文学”、什么“工农兵文学”，让我们问问：是哪一个作家，什么时候，在哪一篇文章中的哪一个部分，主张或宣传了什么“阶级的文学”，什么“工农兵文学”？让我们再问问，这些文学的哪一篇作品里，表现了这些内容？

杨青矗，一个在自由的社会里自学有成的，专写“工人小说”的作家，曾在《写作人权——兼谈知识分子的过敏症》中勇敢而沉痛地说：

“……中共提倡农、工、兵文学，我们的作家就过敏而忌讳写工人的作品，不去关心工人生活的苦乐，好像一沾上写工人的东西，就是共党似的那样令人恐怖。好多朋友警告我，你专写工人的东西，你要小心。甚至在某些文学座谈会上有人公然叫嚣‘某某人专写工人的东西，我们要注意他居心何在？有何企图？’……讲这种话的人，不乏有人故意借有关单位和知识分子因忌讳而患过敏症来戴人帽子，……为要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不管别人的疾苦，……借机戴人帽子以求表功……”他还说：“有些人动不动就以‘会落入敌人口实’的大帽子扣人，吓唬得一般人只好歌功颂德，掩饰真象。”“一味以会落入敌人口实为借口，贪官得以掩护，民瘼难于上达，民怨难伸”，这才真是容易为敌所用。

“你们不谈人性，何来文学？”

在一个强国欺凌弱国的时代，在一个大约有五分之三的人口还生活在长期、慢性的贫困、饥饿、无知和疾病的地球上，在跨国性产业和银行集团支配缺乏生产资本和技术的弱小民族和国家，从而斲伤了这些民族的心灵、污染了这些民族的自然环境、掠夺了这些民族的物质资源的时代，人性的问题，集中地表现在人怎样挣脱这一切的枷锁，夺回失去了的、被创伤的人的尊严，以释放在创造和革新上最大限度的能力，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有人味的、自由、公正而幸福的世界。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有多少志士、多少仁人，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其中最为杰出而伟大的一位。在这一时代中的中国的文学家，也个别地用他们的笔，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而，如果当代的年轻一代的作家没有刻意去歌颂“繁荣”、“国民所得”和舞台歌榭等，不因为别的什么，而是因为在冰冷的经济指数、繁华但寂寞的城市建筑和颓废的夜生活中，看不见温暖的人性。他们描写在激变中的台湾农村、渔港和无数的厂矿中，为生活而奋斗的人们；描写处在社会转型期中乡村同城市中的困境；描写外国的经济和文学的支配性势力下中国人的悲楚歪扭反抗和胜利，不为别的什么，而为的是他们在这一切之中，看见了人性至高的庄严，从而建造了以这庄严为基础的自己民族的自信心。

关心民众的疾苦，与自己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重要的传统操守之一。这一代在台湾的中国作家，谦虚地、严肃地秉承了这个传统。他们相信，中国的文学，和世界上一切伟大的文学一样，侍奉于人的自由，以及以这自由的人为基础而建设起来的合理、幸福的世界。因此，中国的新文学，首先要给予举凡失丧的、被侮辱的、被踏践的、被忽视的人们以温暖的安慰，以奋斗的勇气，以希望的勇气，以再起的信心。中国的新文学，也要鼓舞一切的中国人，真诚地团结起来，为我们自己的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努力奋斗。

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有过一段悲壮但却光荣的历史。在一九三〇年代，在日本铁蹄下的中国作家，用中国自己的语言，写下在异族凌辱下中国同胞的生活。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便是在这样悲壮的条件下诞生在宝岛上。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以无比的民族尊严，面对面和庞大的、不知以暴力为耻的日本帝国主义对抗，产生了一些优秀的、抗日的民族主义文学。日本侵华战争扩大，这些爱国的文学和文学家，横遭禁锢，一时只剩下侵略者的文学、汉奸的文学和唯美的文学。

光复以后，中年代的台湾文艺作家，从头学习了祖国的语言，立刻拾起自己的笔，写下甫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中取得自由的台湾。感谢三年来自由写作的环境，光复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能使用优美的中国话，初步写出他们献给中国文学史的，比较好的文学作品。

对于这样的文学，应该予以全面的肯定。少数几个人粗暴的、政治性的诬陷和攻讦，应该立刻停止。这些攻讦的文章，很不得人心，使一大片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心怀伤忿。让我们安慰这些受到委屈的作家：除了那么几个粗暴、无知的打手，全部已经读过你们优秀作品的海内外同胞，都衷心地为着你们坚持在自己的文学中表现中华民族的灵魂；为着你们选择在自己的土地和同胞中汲取永不枯竭的创作泉源；为着你们在滔滔而来的外来文化、外来文学的支配性影响中，树立起中国文学自立自强的精神；为着你们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使我们惊喜地、感动地重新去认识、重新去爱自己的土地和同胞，并且经由文学的快乐和

感铭，在我们的心中，栽种了对自己民族又轩昂、又自在的信心——为了这一切的一切，让我们深深地感谢你们……

从中、外、古、今的文学史去看，向来没有一个或一派作家，可以借着政治的权威，毁灭、监禁别个或别一派的作家及他们的作品，而得以肯定或提高自己在文学上的地位；从来没有一种有价值的文学，可以因杀害或监禁了那个文学的作者，禁止那个文学作品，而铲除他在文学上的价值的。毁灭一个作家、监禁一个作家或用行政命令禁止一本文学作品，都非常容易，但这毁、这监、这禁，为一个民族所带来的在心灵和元气上的断伤，却要以长远的时间中民族心灵的荒芜和枯滞，作为不易补偿的代价。

然而，我们永远不会让那些对“乡土文学”做了不幸的、粗暴而无知的诬陷的文章，使我们悒忿忧滞，而不当地产生分裂主义的情绪。

正好相反，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享有过的这样的经验：当我们读完黄春明、王贞和、王拓、杨青矗，以及许多其他富于才华的作家作品后，掩卷感动、心怀激荡的时刻——在那个光辉的、温暖人心的片刻，我们忘记了什么省籍的分别，忘记了一切平时的分别，而融合为一。

是的，让一切海内外中国人，因为我们在对于台湾的中国新文学共同的感受、共同的喜爱、共同的关切的基础上，坚强地团结起来，从中国新文学在台湾自立自强的精神中，进一步带动我们在思想上、文化上、科学上，连带地在社会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展开一个中国的、自立自强的运动，来战胜一切的艰难，为我们自己民族的自由，和国家的独立，做永不疲倦的奋斗！

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1〕相对于外来文学的“民族文学”

今天“民族文学”的提起，如果离开二、三十年来西方文学在台湾的支配，怕是无法理解的。

“民国五十年以后，随着美国影响之深入，日本‘技术合作’之扩张，加工出口区之积极拓展，经济上一时有一面的发展，于是西化主义速渐抬头。”（胡秋原：《中国人立场之复归》）台湾在文学上极端的、恶质的西化，可以喧嚣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的“现代诗”为样板。在“现代诗”中，没有中国的、民族的语言；没有任何现实生活的反映；没有当代中国的——更遑论世界的——历史的脉搏，衰烂时期的西方文学之颓废主义和形式主义，被他们大量地“横的移植”了过来。“现代派”文学，越来越只成为一小撮诗人们在他们小小的天地中互相标榜、互相温存——偶然也互相攻讦——的东西。它远离了民众，远离了一般的知识分子，当然，更远远地离开了激变中的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以及这个历史中的人和人的生活。

这样的文学，大抵上和五十年代后半以迄六十年代前半的世界冷战背景下，有“深入”的“美国影响”地区之诸条件相合致的。历史到了七十年代的开始，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世界权力的再组成明显地表面

* 本文刊于《仙人掌》（台湾）二卷六号，一九七八年八月。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十一·中国结》（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

化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中，我们骤然地面对了一连串的风暴：“一是中共进联合国，尼克森宣布要访问大陆；二是日本人趁机劫走钓鱼台”，为“在台湾的本省人和外省人都给予大陆‘沦陷’以来最大的冲击”，而“民族主义之起来，是自然而必然之势”。（胡秋原：前揭文章）

在这一切急遽的变动中，以现代诗为代表的西化文学，完全失去了表现问题、从而对激荡人心的当代诸问题提出解答的能力。要求政治的民主化，呼吁中央级民意代表扩大改选，主张学生、知识分子关心民生疾苦、参与政治自由的声音，在逼面而来的危机感中不断高扬之际，现代诗和西化文学的沉默、冷淡和无所作为，彻底地暴露了这种文学脱离民众，脱离历史和脱离民族的根本性格。

因此，当前民族文学应是相对于外来文学的“移植”的性格，而复归于文学的中国特点和风格；相对于外来文学对中国命运的冷漠和无作为，民族文学应该和自己民族的命运，血肉相连；相对于外来文学的极端形式主义，民族文学应该逐步寻求生动活泼的民族形式，以表现自己民族的生活和劳动，民族的理想和奋斗的勇气等具体的内容。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成长起来的乡土文学，便在此一意义上，成为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文学底主要形式。离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时期提出的各种抗日的民族文学口号、运动和作品，就没有意义可言。同样，今天要提民族文学，首先就要认识到与东西方大经济帝国主义之商品、资金、技术、文化以俱来的外来文学对台湾文学生活的长时期支配，以及反抗这个支配的乡土文学成长的整个过程。胡秋原先生说当前的乡土文学是“继抗战之后重新复归中国人立场之努力”，便是着眼于乡土文学之反抗帝国主义文化和文学支配的特点上说的。

〔2〕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学

勃发于十七世纪以后的西方民族主义，一般地说来，和经由新航路的发现而扩大的商业所造成的商业中产阶级的兴起，是相一致的。他们要求有一个由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所统一的国家——统一的、不受许多地

方的封建壁垒所分割的国内市场；一个商业、贸易取向的政府。在思想上，他们不受一切封建的过去所束缚。他们对于自己，对于未来，充满了信心、憧憬和火热的历史使命感；将自由、博爱和正义行于全地。于是从英国开始，民族主义的火焰向北美、向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延烧，烧出了目前整个西方民族国家的边界。

然而这西方商业贸易的中产者之国，到了十九世纪，发展了工业和金融资本帝国主义。一度曾以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为战斗旗帜的西方民族主义，终于发展成为亚洲、中南美洲和非洲各民族最残酷的压迫者和掠夺者。

这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以及唯一崛起于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广大落后地区各民族的压迫者——而非解放者——于第一次大战之后在这些地区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火焰。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使中国产生了中山先生，以及他所领导的，绵延至今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同样，正是英法帝国主义的压迫，教育了土耳其、中东、印度半岛和非洲各民族，让他们高高地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为自己民族的自由，国家的独立，进行漫长、坚定的奋斗。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民族主义，便是这样地在它的发生上，带着鲜明的反帝国主义性质，而有别于西方的民族主义。一直到今天，只要东西方帝国主义一天还通过跨国企业、国际性银行集团，挟资金和技术上的独占性优势，对广大的第三世界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支配；只要第三世界中各民族一天不能在民族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得着完全的自由，反帝的民族主义就依然是他们永不过时的，激励人更坚定、更勇敢地战斗下去的伟大而不可取代的旗帜。

就在这历史的视野上，我们更清晰地看见：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亚洲文学，是如何必然地组织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民族主义运动之中。中国文学，也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看，从东北作家的《八月的乡村》一直到台湾作家的《送报伙》，再一直到《莎哟哪啦，再见》、《小林来台北》，便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效劳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巨大民族主义运动的文学作品。

有一位作家曾这样说：

……我始终认为：我们的文学将来一定会对中国文学有积极的贡献。所以我们绝不能自外于民族主义的主流。乡土文学是民族文学的重要一脉。但我们不必划地自限。除了关心我们的社会，关心我们的乡土，我们也必须有关心全中国的胸怀。我们必须能在文学上统摄全中华民族的共同经验。能有这样的胸怀，才有正确培养民族意识的可能……。

就这层意识讲，我认为有再度提出民族文学主张的必要。……再度提出民族文学，并不会损害乡土文学的地位，只会使它的内涵更丰富、更充实。在民族文学的大范围内，无论乡土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现代文学、海外华人文学，都能各行其所。

——张系国：《民族文学的再出发》

在文学上“关心全中国的胸怀”，“统摄全中华民族的共同经验”的提法，令人敬佩。但是由于不曾由中国近代史的场景上去看中国近代文学之抵抗帝国主义的特点，从而也不曾看到当前在台湾的乡土文学之批判和反对外来经济和文化的强大支配，而具有“继抗战之后，重新复归中国人立场之努力”的重要意义，隐约间认为乡土文学有缺乏“关心全中国胸怀”的顾虑。即使是不读尉天骢、王拓等人的评论文章中，以及黄春明在一个座谈会上严肃而恳切的谈话中，三复斯言地表达乡土文学之爱国、民族主义的性质的人，倘若能抓住乡土文学中以中国为取向的民族主义，这顾虑是不会产生的罢。必须强调：乡土文学，是现在条件下中国民族的重要形式，它从来没有“划地自限”，也从来不曾“自外”于民族文学。正相反，乡土文学一开始就明白公告了它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爱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

另外有一位评论家这样说：

（乡土文学）……与天地相断，是萎缩的。乡土主义的论评家也有的有此感觉，便拿来比附民族文学，还又翻出帝国主义侵华的老账，说乡土文学可以恢复民族自信。今如欲以乡土文学的“小传统”（金耀基语）来倡民族主义，是否将有重蹈义和团的悲运之虞？

若非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一切民族本位的民族主义，将都是步后尘于愚枉的纳粹民族主义，日本军阀之大和族和苏俄的大国沙文主义……

——朱西宁：《若要乡土文学浩荡，宜先免于提倡》

乡土文学是否“与天地相断”，尤其是否和这评论家的新玄学中的，天玄地黄的“天地”相接，其实并不重要。乡土文学不能说没有缺点。事实上，乡土文学家之中也没有一个宣称过自己已经是一个完成了的艺术家，已经写出最好的作品。他们还在不断地、认真地、谦虚地、充满信心地写着。因此，说乡土文学是“萎缩”的，恐怕咒诅得太早了些。最近一段时间中，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等年轻的、新的小说家的作品，展现了深厚的潜力和无限的发展前途；吴晟、詹澈、叶香、施善继和蒋勋的诗，也宣告了一种平白易懂，既有生动的社会生活和真挚的民族热情内容，又有将要逐步提高上去的艺术形式的，新的诗歌的诞生。倒是似乎已经有好几年不见了“乡野文学”的新作，令人偷偷地有些儿为他们担心。我们祝望他们早日有新作问世，一来可以救救“寒蠢”、“与天地相断”而又“萎缩”的乡土文学，二来也可以仔细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是要怎样地“兴起民族文化天道的王者之气”，领会领会毕竟什么叫做“文学之灵的天意和世境的常道”。

这位评论家对于乡土文学之民族主义的性质，有刻骨的仇恨。因为对于他，“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笔“老账”罢了。遗憾的是，我们同这位评论家有不同的想法。我们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只要帝国主义侵略有理之论，以及这侵略有理之论的外国的或中国的宣传家还存在一天，“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永远是我们最新鲜的创痛，最生动的教科书，最苦味的悬胆。不，对我们来说，只要帝国主义的支配——不拘形式之新旧——存在一天，“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就一天不只是一笔“老账”而已。

黄春明的《莎哟哪啦，再见》所描写的台湾观光卖淫问题，是和日本资本对台湾的浸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任何从内心将沦为观光娼妓的妇女视同自己的骨肉姐妹的人，应不会说黄春明的抗议是“‘小传

统’的民族主义”，“有重蹈义和团的悲运之虞”。而任何把王赉和的小林当做自己的骨肉子弟的人，也不会说王赉和的嘲讽，是“功利主义”的，甚至会“步后尘于愚枉的纳粹之雅利安族，日本之大和族和苏俄的大国沙文主义”罢。

如果当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受到强国的支配，而我们用文学的形式提出我们的抗议，就会使这文学“落入功利主义里”去，那么，让我们高呼：“功利主义的文学万岁”！如果把“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看成一笔“老账”；如果主张“宜先免于提倡”文学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才是“与天地相接”的文学，我们就不假思索地高喊：“打倒与天地相接的文学”！

这位评论家也提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然则他并不了解什么是“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此无他，是因为这评论家根本把三民主义玄学化了。他说，“三民主义有一个绝对时空的无限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有一个世界大同的无限在，它自是无穷无尽的天行健。而又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行在相对时空里，积相对为绝对。”（朱西宁：《回归何处，如何回归？》）而据说这又是什么“绝对时空至相对时空的统一”的法则（朱西宁：前揭文章）。玄学的特点之一，是它之建立在一个自我证明，自我解释而不假验证于客观的事实。按照上述的“法则”来解释，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也是一个“绝对的时空的无限”，而“冀东自治政府”，“满洲国”和汪政权也成了“相对时空”，向着“大东亚共荣圈”“迈进”了。

十九世纪亚洲的民族主义，是回应同时期西方帝国主义欺凌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反帝国主义性质。离开反帝的特点谈论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一味夸大自己的种族优越意识——例如说西方的科学只重分析而“不感天道的至理在”；说西方人“只见历史其形，不识其象”；说别人的文化是“直线运动，……与天道无亲，失去向心力的挣脱，自此循环的圆上切线出去，违反循环律，必然有绝有尽”（皆见朱西宁前揭文章）云云——才真正会落入大国沙文主义。任何熟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的人，都知道中山先生教导我们要一方面发扬自己民族物质的和精神

的传承，同时也要认真、老实地学习西方的长处，使西方物质上、精神上的优点，为我所用。但是对于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帝国主义，则批判之、反抗之。

乡土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正是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正是亚洲式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有帝国主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帝的民族主义，何况乡土文学家全是读三民主义长大的；全是含泪悲愤地读完列强侵华的中国近代史长大的，用不着“比附”。说到“义和团的悲运”，那是十九世纪西方列强肆意侵侮中国，当袞袞王朝的官僚、滔滔天下的士人在帝国主义淫威下战悚、下跪的时候，中国农民决然而起，以血肉向“文明”的暴力抗议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民族运动。“义和团的悲运”，不在它反抗外来的压迫，以中国农民的方式表达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尊严。“义和团的悲运”，首先肇因于帝国主义本身，其次，在方法上，是由于中国农民运动普遍存在的前近代的、“迷信”的性质，再其次是由于这个农民运动在方向和反对农民的清王朝相结托，而造成了民族千古的悲怆。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乡土文学家和台湾一切爱国的中国新生代，再也不是十九世纪的中国农民。他们从小过分地受到西方式的教育，他们也继承了“义和团事件”以来，一切波澜壮阔的中国反帝民族运动的精神遗产。拿“义和团的悲运”来吓阻他们新的民族主义热情，就未免太看小了他们了。像抗日时期无数的抗日民族文学激起了全中国抗日的热潮，像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民族抵抗文学，使抗日民族精神昂扬不断于殖民地的台湾，乡土文学在文学、文化的恶质西化，在民族自信心崩丧、麻木，脱产逃亡者如过江之鲫的时代；在强国恣意干预我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的历史时期，投眼于自己的土地和人民，批判狂澜般的西潮，为民族的认同寻求自在、轩昂的归宿。

〔3〕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

所谓沙文主义，意指极端化了的，盲目的民族主义热情。沙文主义

对别民族怀有偏狭的见解，对于别的民族及其文化显示轻视、厌恶、不信任的情感。沙文主义者常常认为自己的民族在种族上优于别族，相信自己上是上天的选民，负有特殊的历史任务——例如英国人以“白种人的负担”——即宣扬基督教，传播文明，开发世界的富源——为其帝国主义饰辩；美国人常常自认有推广美式民主体制的历史使命，等等。

亚洲式的民族主义，都含有对自己民族既有成就的荣耀感；对自己民族历史的宏伟，抱着深刻敬意……。但这是针对着被西方帝国主义的打击、摧残而苏醒的民族自尊心。健全的民族主义者反对其他民族的统治阶层所发出来的帝国主义本身，却不以种族优越感去反对那个民族的人民。民族主义者在自己民族的历史传统中汲取民族自信心，却不惮于承认和学习别民族——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各种长处，勤俭刻苦，老老实实地努力使自己民族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迎头赶上。民族主义者绝不躲进玄学里去寻求安慰——例如说什么：“……西洋文化则短在只见其形，不识图像；唯中国文化从最日常的时令节气，孝悌忠信，至最幽微深邃的革命创造者天道好还的历史观，无一不是既形且象的合一：核子的涡状旋转，电子绕核而转……这些至微至大的有形现象，还只是今世纪物理与天文学的新发见，新知识，唯中国人是远古即知。”（朱西宁：前揭文章）有现代知识的民族主义者懂得：玄学的所谓“循环”说，和核物理学上“核子的涡状旋转”之论；和“电子绕核而转”，是完全两回事。他们更懂得：要自己的民族得自由，国家能独立，就要老老实实地学习现代科学和技术，依照中国的具体条件，为己所用，绝不以“古已有之论”，或者像清末的迂儒说：“彼美利坚者，固何‘美’之有，何‘利’之有，又何‘坚’之有乎？”来补偿自己的民族自卑情绪。

沙文主义，是法国民族主义在拿破仑的军队横扫西方，耀武扬威时的产物，有近代史的性质。但是在前近代史的时期，已经有规模较小的，地域的，种族的沙文主义。例如在由许多民族组成的中国，突出地强调汉族在种族和文化上的优越性，对其他组成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怀有轻视、偏见、甚至厌恶的感情。这就是所谓“大汉族主义”，或

者“汉族沙文主义”。对于团结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以共同进步，一致对外，这是极为有害的。汉族沙文主义还有一个形式，认为中原的文化高于中国边陲地带，对于分布于边陲或海外的汉民族自身，怀抱封建的偏见。例如明、清两代的王朝，把移居海外刻苦奋斗的中国人，视为自愿出于圣王化育之外，所以当被海外土著民或者西洋殖民者欺凌甚至大量集体地残杀的时候，不但不予以保护，而且斥责他们咎由自取。这种心态，不妨称之为“中原沙文主义”。它对于民族团结，当然也是极为有害的。

批评乡土文学的重要论点之一，是说它有“地方主义”倾向，说它格局小，意境窄。我们的评论家说道：

乡土文学是“地方主义的，方言的，农村渔村都市后街陋巷的‘民间低层次文化活动’之混合体，这便小得太多太多了”，说乡土文学“给弄得小成这样，已是寒蠢”。

——朱西宁：《若要乡土文学浩荡，宜先免于提倡》

所谓“地方主义”，是特别突出地强调自己所在的地理区域之特殊性和利益，并且把这利益拾得比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高。如果说，乡土文学只取材于台湾的风土和人物，就是“地方主义”的，我们不明白何以一些以大陆特定地区的“乡野”风土和人情为材料的小说，就从来没有指责过是“地方主义”的。光复后在台湾成长的一代作家，其生也晚，没有在大陆生活的经验，终其半生只在台湾这个地方长大。我们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以台湾的风土人情为材料写小说，就犯了这么大的罪过。至于说以方言入小说，最突出的例子只有王禎和的《嫁妆一牛车》。可是论者却从来不因王文兴的《家变》也是以福州话入小说的而指其为方言的、地方主义文学！《嫁妆一牛车》和《家变》，都是作者有意实验方言在文学表达上的可能性，和政治或文化的地方主义扯不上关系。然而说乡土文学以“农村渔村都市后街陋巷”写进文学，却是事实。不同的只在于乡土文学家不以“农村、渔村、都市后街”和其中的人及其生活为“不可接触”的贱民。正相反，乡土文学家在这些被某些人视为下贱的同胞中，看见整个中华民族的庄严、勤劳、勇敢的形象。

至如谓乡土文学太“小”、太“寒蠢”，乡土文学还有一条长远的、光明的
发展前途，他们只懂得谦虚、努力地创作下去，从来不与人争大小，
争奖金，争文化官儿的位置，争出国开会的机会。因此，现在如果有人
出来主张写乡野，用另一种方言写的文学，才不算“与天地相断”，才
不“寒蠢”，才是伟大得“太多太多”的文学，乡土文学工作者是一点儿
也不在意的。

其实，问题的根柢还不在此。说乡土文学“视野和气度的有限”，
“规模不大，难望其成气候”（朱西宁：《回归何处，如何回归？》）或类似
的话的人，基本上是出于“中原沙文主义”思想。评论家说道：

“乡土文艺是很分明的被局限在台湾的乡土，这也还没有什么
不对，要留意的尚在这片曾被日本占据经营了半个世纪的乡土，这
也还没有什么不对，要留意的尚在这片曾被日本占据经营了半个世
纪的乡土，其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度和精纯度如何？”“……中国文化的
生态之一，是文化随着移民自中原流迁至边疆或海外之后，其衍生
即告缓慢或停滞，民族文化的变易还是有赖黄河长江流域的东部
发祥。”“……台湾之被日本占据，即令未受日本文化的任何影响，
但半个世纪的隔绝，又正值中原文化骤变之际，尽管台湾省的乡贤
们如何为保卫民族文化而尽力，甚至流血牺牲，仍不能免的这期间
要与继续新生的民族文化主根有所脱节。”

——朱西宁：前揭文章

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有台湾人是“庶子”，是“孤儿”之叹。
读了评论家这段文字的人，应该能更深切地同情和理解这“庶子”、“孤
儿”感的棘心、怆楚的情怀之由来。评论家的这一番言论，恰好给予近
世台湾分离主义运动以理论的根据。他们会说：“看吧，他们从来就不曾
把台湾人看做自己的同胞。任你怎么‘尽力’想要向中国认同，‘甚至流
血牺牲’，你的‘忠诚度’和‘精纯度’依然受到猜疑，不被接纳的。”

东北，啊！祖国丰富的宝库，也曾经一度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
儿国。难道说：东北人、东北的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度和精纯度”
就因而应该受到猜忌？南京，啊，祖国历代的帝都，也曾建立起一个卖

国的政权。难道说：南京人和南京的文化就因此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度和精纯度”就有了问题？台湾五十年的陷日，其间与大陆公开的、私人的、商贸的、文化的联系一直不绝如缕。今天大陆和台湾的隔绝，水泄不通者已近三十年。这难道就会使台湾对以“长江黄河流域”为“发祥”、为“变易”的主体的民族文化失去“忠诚度和精纯度”吗？如果说因为中国文化之正统今在台湾，那么就“文化随着移民自中原流迁至边疆或海外之后，其衍生即告缓慢或停滞，民族文化的变易还是有赖黄河长江两流域的东部来发祥”之宏论发生矛盾。而况近二十年来的在台湾的中国文化，是历史上最受外来文化摧残的时代，这大约是“古已有之”论的评论家所不能否认的。

一种文化原初的形态，总是在它流布的末梢较完整地保存着。这其实是文化史的一般常识，未必只是“中国文化的生态之一”。例如本省山地的少数民族，保存了马来一波里尼西亚民族最古老、最原始的语言、工艺和其他文化。闽南语、粤语和客语中保存了唐音，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而宝贵的遗产和不可切割的组成部分，不能说几经北方外族的人侵和掺和以后的“黄河长江流域的本部”文化才“精纯”。若然，万一汪政权如果能扩及全“黄河长江流域的本部”，“中日亲善”地经营个几十年，则民族文化的“变易”和“发祥”岂不更为彻底？至若海外华侨和侨居的文化，按照评论家的理论，就更难登上“黄河长江两流域的本部”文化族谱之嫡系了。必须指出：台湾的沦陷，是近代化了的日本帝国主义，欺凌尚在历史的前近代的中国时，被迫割让的；东北和南京的伪政权区域，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甫欲振起的中国的弹压，在敌人的枪尖和汉奸的出卖下成立的。这是全体中华民族共同的羞辱，千古不易抚平的伤痛。评论家中原沙文主义的言论，肯定不是团结的言论，而是分裂的言论！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对内“五族一家”，“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抵抗外来的侵略，“中国民族自求解放”，“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权民生之解决，以与外国奋斗”，“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俟中国强盛以后，不灭人国家，不学列强的帝国主

义，而且更要进一步负起“扶弱济倾”的“大责任”。（中山先生：《三民主义》）而我们的民族文学，便必须不折不扣地以类似这样的民族主义为实践的纲领。除此以外，一切不讲反对帝国主义，以沙文主义破坏中国各民族团结的理论，都应受到严肃的关切和应有的批评。

〔4〕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乡土文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出了反对西方文化和文学支配性的影响；提出了文学的中国归属；提出文学的社会关怀，更提出了在民族文学的基础上促进团结的主张，事证历历，不容湮灭。

尤其令人鼓舞和振奋的是：乡土文学的方向，自令人忧心忡忡的诬陷和谣诼四起的时候以迄于今，得到具有远见和真知的爱国学界——胡秋原、徐复观、侯立朝以及何欣、刘绍铭、水晶等许许多多的人毫不犹豫的、正义的声援和支持。这是怀抱着“庶子”、“孤儿”之悲怆的胡太明的作者吴浊流，以及在作品中为民族认同而苦闷、忧愤的钟理和，在生之时所愿一见而不得的事。今天，如果他们地下有知，将要怎样地欢跃啊！胡秋原先生等诸人正义的声援，不但肯定了乡土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台湾目前阶段中的重要形式，肯定了乡土文学爱国的、民族主义性质，更清楚明白地意味着在自己民族共同喜爱和关切的文学上，不分畛域省籍的坚强、无私和热情的团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胡秋原先生等诸人的正义声援，彻底批判了破坏团结的中原沙文主义，从而也批判了分离主义。

乡土文学还在它的少年期，它还要成长，还要发展，然而它在批判和抵抗外来经济、文化对于台湾的支配这个特点上，是中国民族主义文学在台湾目前阶段中的主要文学形式，殆无疑义。当然，它还要不断地发展和进步，正如民粹主义文学唤醒了俄国人民的自觉，而茁壮为照耀千古的、光荣的伟大现实主义文学，今天的乡土文学，也要在负起“继抗战之后，重新复归中国人立场”的任务之后，虽“乡土今以此处之乡土始”，而“终必以到大乡土之大陆终”，成为将来光辉的、伟大的中国

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

总之，在现在时期提出民族文学问题，应该对立于恶质西化了的文学而提出，从而具有中国的、真正的“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性质。在强权称霸，透过绵密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独占而支配弱小，落后的民族和国家的时代，中国在将来一段长时期的历史中还要面对许多困难。因此，中国文学，必须继续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同胞要求改革创新，我们的民族要求从一切外来的压迫中求得自由，以及我们的国家要求完全的独立和尊严的主题。离开这些主题，民族文学便失去具体的内容。让我们在海内外爱国的中国人所一致关切和喜爱的，在台湾成长起来的民族文学上，共同克服中原沙文主义和地方分离主义，团结起来！

回顾乡土文学论战*

一九七〇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提起，是针对一九五〇年以降支配台湾文学二十年之久的、模仿的、舶来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批判和反论。因此，没有先对于一九五〇年以迄一九七〇年的台湾“现代派”文学做分析的认识，就不能充分理解一九七〇年代的乡土文学运动。

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〇年，台湾文学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沉重压迫中苏醒，陈仪政府以超额的掠夺，支应中国大陆内战无法满足的财政需要。陈仪集团在政治、财政、经济、司法上的独占支配，沉重的税负、苛酷的米糖收夺、社会终结期普遍的腐败……使台湾作家和渡台大陆进步作家，以短评、短文、诗歌、随笔、评论的形式描写和针砭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阅读，热情清算殖民地文化的残留和学习祖国语言、思潮，成为当时台湾作家、知识人和文化人的热潮。一九三一年以后被日本战争当局镇压的现实主义、干涉生活、(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传统快速恢复。就在这一个时期中，渡台大陆系文学评论家和本地作家、评论家之间，进行了一次“新现实主义”文学的论争。这论争的哲学、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水平，今日视之，有四十年来不及的思想高度，尤其显示四十年间台湾文艺思潮在极端冷战荒废历史中的退婴。

*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北京)一九九四年第二期。

冷战和“现代主义”

一九四九年国府退据台湾。一九五〇年，韩战爆发。美国断然决定武装干涉台湾海峡。在第七舰队封禁海峡的同时，国府放手进行一次彻底、坚决、全面的反共肃清（red purge）。从一九五〇年以迄五十四年，估计枪决了四千人，并且以不等的刑期监禁了另外的四千人。其中最后释放的终身刑政治犯，仅仅在五年前获得释放。进步的文化人、作家、剧作家、评论家在这次肃清中悉数被杀或被囚。著名作家杨逵在五〇年被捕，判刑十二年。

为了美国西太平洋反共战略利益，美国以强权由外而内、由上而下地在本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两皆衰微的台湾，设立反共国家安全体制下高度权威主义“国家”。内战和冷战的双重构造，在海峡分裂和对峙下使反共意识形态无限上纲。另一方面，美国经由强大的对台湾经济援助，透过教育体制的美国化改革和美新处的强力文化渗透，美国意识形态迅速取得霸权地位。台湾文学思潮至此发生巨变。

现实主义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一切文艺思潮、文艺作品和创作实践，彻底遭到残酷的打击和禁绝。中国现当代文艺和文艺思潮在台湾完全断绝。

五十年代初期由政府 and 军部推动的“反共抗俄文艺”、“战斗文艺”虽然不了了之，但极端的反共主义支配了一切，遑论文坛。

在这个背景下，从美国新闻处，从香港，从精英大学的外国文学系，从大陆流亡来台汪伪时期的“法国象征主义”，从欧美画坛的画册，汇集成一股“现代主义”风潮。这个风潮主张文艺的绝对纯粹性，反对意义、反对具象、反对情节、反对故事。意义即内容的消失，相对地使形式不断地膨胀，在表现形式上（语言、叙述，构图、颜色）不断地晦涩化、怪异化。在艺术作品中历史、时间、人、社会随意义的消失而消失。外在一切约定俗成，可以沟通的符号被取消，作品流于人类最混沌的心理世界的、无政府的进流。

《现代诗》、《现代书画》、《现代音乐》、《现代小说》、《现代（实验）电影》，在五十年代成为文坛显学。《五月画会》、《东方画会》、《现代诗》、《创世纪》、《笔汇》、《现代文学》、《文学季刊》、《欧洲杂志》……纷纷在五十年代以降结社和创刊。一九五〇年到七〇年，是台湾经济由进口替代工业发展到依赖美日资本主义在太平洋分工中的加工出口基地的时代，是劳力密集的、加工轻工业的时代，却在美国意识形态统治下输入作为成熟期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文艺思潮“现代主义”。这和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化进程一样，有深刻的冷战政治意义。

现代主义的反历史、反意义、反政治性格，一方面和左翼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主义文学针锋相对，一方面也符合大肃清时期恐怖气氛下不敢干涉现实的需要。现代主义也是崇扬欧美“自由世界”先进文艺的一个思潮。肃清的政治恐怖；土改中地主的消失；独立佃农农村的形成；农村女工流入城市；农业衰退……这些台湾社会重大的变化，人们不能在同时期“现代主义”文艺中找到蛛丝马迹。在反共富国强兵政策下，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的累积过程中，没有工人的可以感知的、意识化的反抗，正如没有现代主义文艺作品对充满变化和矛盾的社会和人，加以揭露与纪录一样。

西方校园的左倾和“现代诗论战”

六十年代末，受到中国大陆“文革”的影响，连续二十年世界景气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积累的矛盾，发展成北美、法国、东京知识分子的“反叛”潮流。反对美国对越南的干涉战争运动；黑种人民权运动；言论自由运动；民歌复兴运动；教育改革运动；对中国、越南和古巴革命的高度评价，激荡了美国、法国、欧洲和日本的校园和文化圈。校园思想和社会科学的激进化，启蒙了台湾和香港留美、留欧学生。

一九七〇年，美国片面宣布将钓鱼台诸岛于一九七一年连同琉球群岛划归日本。留美港台学生和台湾的大学生不约而同地掀起反美、反日、保卫钓鱼台运动。国府慑于美日支持其联合国主席位，不但对美日

示弱，反而对爱国学生施加政治恫吓。至此运动左右分裂。左翼的运动奔向“认同运动”和统一运动；右翼发展为“反共爱国”、“革新保台”运动。七一年国际外交形势陡变，中共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引人注目，台湾遭受重大震荡，台湾知识界以“大学杂志”呼吁改革，并在“民族主义座谈会”中发生左右斗争，几位民族主义派在“台大哲学系事件”中遭受镇压，保钓风潮落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四年，台湾文坛开展了一场“现代诗论战”。在六十年代末接受了激进社会科学洗礼的海外知识分子，对于支配岛内文坛二十年的“现代主义”文艺的中心——现代诗，展开了强烈的批判。

一九七〇年，任教于新加坡大学的关杰明，发表了三篇论文，对于台湾现代诗提出了苛烈批判。现代诗中思想焦点的丧失、语言的荒废、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不在等，成为批判的焦点。接着有许多论文提出文学关怀社会、文学描写民众的生活、文学为民族的命运发言，反对晦涩，主张文学应该人人能读。总之，文学的民族性、文学的民众性等五十年反共肃清恐怖以来不曾被提起的现实主义、民众文学、民族文学等问题首次被提出，并以之批判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买办性、模仿性的“恶质西化”。而被批判的现代派，很快地以政治指控回应，指责对现代主义的批判观点有左翼、“唯物主义”，为中共统战的嫌疑。现代主义批判的旗手有唐文标、关杰明、尉天骢、高信疆和蒋勋等。在同时期，蒋勋、吴晟已有深刻描写生活的诗创作发表。

一九七六年，有一小股学术上、思想上的反帝民族主义的，并不强烈的波澜。吴明仁的《从崇洋媚外到民族意识的觉醒》；林义雄的《知识分子的崇洋媚外》；江帆的《现代人与现代化》，批评了战后台湾文化界、知识界的买办化和“崇洋媚外”与“人心向外，人心媚外”的现象。一九七六年，“使医学说中国话”的运动产生了《当代医学》杂志。这些年轻医生并刊行《健康世界》以推行医药卫生知识的普及运动。

乡土文学论战：现代诗论战的延长

一九七七年前后，王拓、尉天骢、黄春明、蒋勋、江汉、张系国、舒凡和陈映真纷纷发表文章，讨论文学的社会基础、文学的发展方向、台湾文学的乡土意识、民族文学等问题，并且引起彭歌、余光中、司马中原、银正雄、朱西宁和大量党团作家和杂志的围剿、批评、反驳甚至政治指控。总地说来，七七年的乡土文学论战，思想内容上是七〇到七三年“现代诗论战”的延长，然而在台湾社会分析上，台湾经济的“殖民地性”的提起，有新的发展。由于国民党和一些“自由主义”的批评家公开对乡土文学论者打棍子，彭歌并公开搞“点名批判”，指控乡土文学既有台独之嫌，又有“工农兵文字”之嫌。乡土文学批判被党和军方扩大到“国军文艺大会”上，一时风声鹤唳，形势恐怖，但也因此使“乡土文学论战”比“现代诗论战”远远有名得多。

这时身经中国现代文字学几次重要论战的胡秋原先生，和徐复观先生、郑学稼先生出面公开维护了乡土文学。日本学界也介绍了这次的论战。旅美长期研究台湾文学的学者也为乡土文学辩护。论战虽无从自由、深入发展，却幸而免去了一场文学争论的文字之狱。

极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以乡土文学界和西化派文学界（余、彭）伙同党、政、团、军的批评家之间的论争，另有文学界以外的“自由主义”学者也参加了争论。现在可以查到的文献有：张忠栋《乡土、民族、自立自强》，孙震的《台湾是殖民经济吗？》，董保中《谈工农兵文学》和《我们当前的一些文艺问题》等等。一般而论，论旨在担心乡土文学“被共匪利用”，中共工农兵文学在过去曾造成如何重大危害，当前台湾文学存在着各种危害、有害的政治问题，台湾社会没有对外依赖和殖民地的问题等等。

论战的缺失

七十年代台湾文学界的两次论战中，乡土文学阵营有两个重大的

缺点。

缺点之一，是理论发展的不足。“乡土文学”、“民族文学”和“民众文学”都不曾有科学的界定。对于“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分析，理论上也嫌贫弱。对于为什么以民族文学、民众文学为主张，缺少进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论证与开展，王拓提出台湾经济的殖民地性，有重大意义，但限于当时以政治经济学分析台湾社会的文献不足，台湾社会科学一般地美国化和保守化，无法做出更深入的台湾社会构造体论和台湾战后资本主义性质论。此外，由于政治上严苛的反共禁忌，争论无法有系统地纵深发展，使乡土文学论、现代主义批判无法发展成体系性的理论构成。理论的发展不足，对于其后台湾文学迅速的商品化和荒废化，以及运动的不曾持续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

缺点之二，尽管乡土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有发展不足之处，但基本上批判了现代主义，使现代主义基本上失去了文学理论霸权的地位。但是，理论争论以后，乡土文学一般地在创作实践上没有很好地跟上来，一般而言，没有或很少创意上好，思想上深刻的巨构。创作实践上的严重落后，使乡土文学道路一至八十年代就比较容易地被都市文学、消费文学和新的模仿舶来文学（例如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学”）所淡化。

新的阅读和论述

现代诗论战以后，匆匆已二十年。二十年间，台湾社会、政治、思潮有巨大变化。重读、总结、批判地、科学地分析一九七〇年代的文学论战及其思潮，时机应当成熟。目前的环境和条件，是比较有利于科学的、理性的论述。没有这些总结，就不能做好对于当前台湾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讨论，从而从这讨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当前台湾文学诸问题的新的讨论的论坛。

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

——七十年代文学论争在台湾文艺思潮史上划时代的意义

整整二十年前（一九七七）的四月，银正雄在《仙人掌》杂志上发表了《坟地那里来的钟声》，针对王拓的小说《坟地钟声》提出乡土文学从“清新可人”、“纯真”和“悲天悯人”“变质”为“赫然而有仇恨、愤怒的皱纹”；有“变成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危险”，打响了从政治上、思想上攻击乡土文学的第一声炮火。同一期的《仙人掌》也刊出朱西宁的《回归何处？如何回归？》，讽刺乡土文学“流于地方主义，规模不大，难望其成气候”。同月，王拓发表《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五月，王拓（以李拙为笔名）又发表《二十世纪台湾文学的动向》，为台湾乡土文学发展历程和性质做了一番整理。同月，叶石涛发表《台湾乡土文学导论》，提出了他的日据台湾文学性质论。六月，陈映真以《乡土文学的盲点》，就教于叶石涛。七月，彭歌在《联合报》副刊上发表的连续专栏《三三草》中，刊出要做戒“赤色思想渗透”的杂文多篇。同月，陈映真发表《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对战后台湾当代文学的政治经济学背景、性质和发展做了概括。八月十七日开始，彭歌一连三天发表了对王拓、尉天骢和陈映真长篇公开点名的思想政治批判。八月二十日，余光中发表《狼来了！》控诉台湾有人提倡中共的“工农兵”文学，一时风声鹤唳，对乡土文学恐怖的镇压达到了高潮。

* 本文刊于《联合文学》（台湾）一五八期，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后收录于《两岸文论史的反思：告别革命文学？》（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台湾：人间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文坛的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到当时的文学界和文化界。八月，南亭（南方朔）发表《到处都是钟声》，登高望远地为乡土文学的发展表态支持。九月，王拓公开发表《拥抱健康的大地》，十月，陈映真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对彭歌的攻击提出驳辩，并要求立刻停止对乡土文学诬陷和攻讦。此外，从八月到十月，文艺界如尉天骢、黄春明、齐益寿和其他许多人，都发表文章、参加座谈发言，热情、勇敢地支持了乡土文学。但在同年十月，一贯以“自由民主”派的面貌示人的台大留美教授张忠栋、孙伯东、董保中都纷纷对乡土文学论扣政治帽子。

九月，胡秋原先生发表《谈人性与乡土之类》，公开驳斥官方打手白色恐怖各论，为乡土文学辩护。十月，徐复观先生发表《评台北“乡土文学”之争》，批判文坛的侦探和密告者，至此恐怖的阴霾渐开。十一月、十二月，陈鼓应发表批判余光中诗作的长文。同月，胡秋原接受访谈，整理成《谈民族主义与殖民经济》，在理论上深化了乡土文学派。十二月，王拓发表《“殖民地意识”还是“自主意愿”》，就台湾社会经济问题，向孙伯东提出驳论。

翌年元月，国民党集党政军特，召开“国军文艺大会”，会中对乡土文学大肆挞伐之余，受到胡秋原、徐复观和郑学稼等老一辈理论家、学者的劝阻，据说最后这样地定了调：乡土思想“基本上是好的”。但动机要纯正，尤其切勿为中共所利用，云云。而一场剑拔弩张的肃杀之局，至此渐为缓解，幸而没有以逮捕、拷讯与监禁终局。

二十年后回顾，特别在八十年代以降台湾文学批评和台湾文学论的豹变条件下，七十年代的文学论争——包括七二年以迄七四年的现代主义论争——在台湾战后文艺思想史上，显示了划期性的意义。

这篇小论的目的，在整理七十年代文学论争留下来的文艺思潮的标高，并思考当年留下来的突破性文艺思潮对当前时代依旧生动犀利的启发。

一、在战后台湾公开树立现实主义旗帜的重大意义

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强国、大国凌掠弱国和小国的时代，第二世界

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学艺术，大多采取抵抗、批判的现实主义手法。半殖民地的中国文学如此，作为中国半殖民地构造之一部分的日本殖民地台湾的文学，亦复如此。

但是，尤其在民族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严峻的时候，往往就会发生坚持批判、抵抗和反映严厉现实现实主义路线，和声称主张文学艺术的纯粹性、艺术性与非政治性的唯美主义之间的路线斗争；三十年代的大陆发生过围绕着“文艺自由”问题的广泛论争。朝鲜的三十年代，据说也发生过唯美文学和使命（工具）文学论之间的争论。

一九三一年，台湾的抗日民族、民主运动遭到日帝当局全面镇压，台共和农组溃灭。从崩坏的战线上四处奔窜流亡的党人，涌向台湾左翼文学和文化战线，艰苦奋斗，发行刊物、成立组织，一面推展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化思想运动，一面伺机恢复组织生活。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杨昌炽等人组成“风车诗社”，搞起现代主义。一九四三年，台湾时已纳入日本侵略战争的战时体制，一些诗人组成“银铃社”，搞起现实主义。

必须着重指出，“风车”和“银铃”，都不曾公开地与抵抗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派发生理论斗争——像在大陆和朝鲜的三十年代发生者那样。而且，确实有进步的文艺青年，曾在日本战败前夕直到光复的一九四九年间，在“银铃社”活动，并且深受杨逵的影响参与了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间《新生报·桥》副刊上关于重建台湾新文学的理论斗争，而虽然“银铃社”的一些诗人在五十年代和纪弦的“现代诗”社合流，也是事实。

然而日据时代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斗争仍是激烈的。一九三九年，日本在台殖民地皇民派文学家西川满组成“台湾文艺协会”，成员以日本籍文艺人士为主，发刊《文艺台湾》，提倡殖民地异国情调的“唯美主义”文学，消磨志气，规避三十年代末期台湾战时体制中严苛的现实。一九四一年，随着日本“南进”战争扩大，西川满进一步露出法西斯蒂真面目，要把台湾文学组织到日本侵略战争体制，发扬杨逵所说的“勤王”的任务。“台湾文艺协会”的机关刊物《文艺台湾》，并掲載皇民文学周金波、陈火泉的皇民文学作品。

但即使在法西斯气焰逐日高涨的一九四一年，抵抗的现实主义作家仍然不惮于反抗。他们纠合并组织了以台湾籍作家为主的“启文社”，发刊《台湾文艺》，杨逵等人在一九四三年与西川满等日本皇民派作家在一场“狗屎现实主义”论争中交锋，针锋相对地捍卫了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坚守民族主义立场，反映台湾人民在战时体制的非理下呻吟苦闷的生活，在赖和谢世的日治末期，公开组织哀悼集会。《台湾文艺》成员杨逵、吕赫若和简国贤在战后仍然奔向实践的火线，遭到投狱、逃亡、路死和刑杀的命运。

这样一个在严酷的台湾民族、民主运动史中发展起来的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惨烈的异端扑杀运动中彻底瓦解，一直要等到一九七二年保钓运动的左翼，才重新把这反对帝国主义、主张民族文学与民众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论再次公开地，作为一种文艺理论在台湾宣扬起来，意义自然重大。

此外，从文艺思潮的世界史看，七十年代的台湾文学论争，在并不自觉情况下，参与了从二十世纪初期以迄七十年代的、世界范围的、文学思潮的左右斗争，亦即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斗争。

这场论争的地理范围，包括旧苏联、旧东欧、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中南美洲等地。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受到各国各民族的文艺批评、文艺思想界左翼的批判，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在思想学术上有丰富的收获。

以最粗略的概括，现代主义受到左翼的、现实主义一派的这些批评：

——现代主义文艺（以下简称“现代派”）把人的个性和社会对立起来。把个人的幸福同群众的幸福对立起来。

——现代派脱离社会和生活，钻进极端个人的世界，夸大官能和肉欲的重要性，极端强调“个性”和“自由”，以推翻一切既有道德、逻辑为“前卫”与“革命”，却没有自己的新道德和人与人之间新关系的信念。

——现代派对人，尤其是对勤劳的民众、对社会和历史全然冷漠。

他们把精神生活（文学艺术）与具体的生活在分工上分离开来，对立起来，把艺术和生活、历史与社会完全割裂。

——现代主义的甄别，不在形式与技巧，而在于内容和世界观。现代派的世界观，表现为认定人的本然的孤独与本然的非社会性。人是一种被抛弃的存在。人除了他自身，再没有任何与他发生联系的其他现实。

——现代派相信生活毫无意义可言。生活不可理解。人不能改变世界，世界更改变不了人。

——现代派崇拜在现代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下精神衰弱的现代人依靠麻醉药物扩大官能和肉欲的刺激，推崇音感、味觉、色感、肉欲之相互倒错与混乱，摒弃客观世界，宣传唯能、唯心的“另一真实”世界。

——现代派以病态和主观的恐惧、焦虑、绝望和孤独的世界，取代现实与生活。他们把这变态的、病态的认识和感受加以夸大和美化，对人性、人道主义、人类解放与发展的可能性加以公开的嘲笑和否定。

——现代派不相信任何生活的目标和理想。他们对生存极为厌烦、深觉空虚。他们因而追求败德与肉欲来镇静自己想象的痛苦……

批判现代主义的西欧左派文论主张对待现代主义，不采取全面、机械地否定，争取以现代的形式和技巧表现进步的、人的内容，争取现代派回到群众，回到社会和历史现实。

七十年代台湾的文学论争，首先从现代诗——即现代主义批判展开。二十年后回顾，七十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批判论，基本上也提出了和世界范围内的讨论议题“不谋而合”的批判观点——指出台湾现代主义的逃避现实、没有社会意义和历史方向、个人主义、绝望、腐败、败德、虚无等等。当然，在立论的论证上不够深刻。事实上，台湾的文学批评界基本上至今还没有深入讨论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争论这个宿题。但是，从台湾文艺思想史的视野看，七十年代现代主义批判，在世界范围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大论争背景下，自有十分重大的时代意义。

而其意义之重大，尤在论战当时争论双方皆不自知的这个事实：即

战后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是冷战体制下美国用以对抗社会主义的、在全球领域推行的“文化冷战”（culture cold war）之意识形态工具之一！台湾的现代主义批判，竟是在极端反共/法西斯环境下对美国主流冷战意识形态的公开的挑战！

理·阿皮革纳内西（Richard Appignanesi）指出：三十年代以降，“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成为旧苏东社会的主流文艺思潮。这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文艺方针，又以强烈的敌忾心批判现代主义的“资产阶级腐朽”性，于是仿佛是依“敌之所恶我好之”的原则，在战后世界文化冷战体系中，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竟成了“自由·民主世界”的主流艺术意识形态。“美国以它自生自长的新兴抽象艺术迎合了此一确认”，阿皮革纳内西写道，“战后美国新兴抽象美术界把一九一九年苏联康定斯基的‘抽象表现主义’半途掠夺而去，在国际上广泛宣传为百分之百的美国货，纯粹形式的抽象艺术”，盖因“如果共产主义政权官方禁止‘形式主义’，那么形式主义必定是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要素”。阿皮革纳内西说，特别是在五十年代美国麦卡西主义白色恐怖时期，“冷战时代的战略，要求一种‘真正美国’的认同，以截然有别于欧洲共产主义瘟疫”。现代抽象主义成了这“真正的美国”的认同标志。它透过美国广泛设立在其势力范围的第三世界社会中的“美国新闻处”一类的机关；透过人员交换、基金会、人员培训、国际学术会议、留学政策、资助展览出版和讲座、特邀访问，广泛推销。现代抽象主义于是很快成为美国势力范围下第三世界的文化（文学）霸权论述，而现代主义也成为这些社会的一代显学，从而和各当地的反帝·反美·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艺术运动互相抗衡，让青年离开祖国在（美国）新殖民主义和本国半封建精英支配下阴暗的现实，在美式现代主义、抽象主义病态的个人世界中消磨意志、逃避现实——从而巩固美国制霸下的冷战秩序。

由于不学和不敏，小论的作者一直要到九〇年初才知道了战后现代主义和美国文化冷战意识形态的联结构造。回想目睹过的五十年代台湾现代绘画和文学兴起的过程，我有了恍然大悟的理解。

从这意义上看，七十年代台湾文学的论争，自现代诗论战以至乡土文学论战，竟是一场对美国战后全球性文化冷战意识形态的斗争，意义之深长，不言可喻。

在前文中说过，七十年代的台湾文学论争中现实主义问题的提起，意味着因五十年代白色恐怖而被彻底镇压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复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地条件下，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的斗争，意味着保守的和进步的文艺哲学的争论。这争论表现为这些古典的论述构造：

- 现实主义主张文艺的社会性，具有解放和改造的使命与功能。
- 反现实主义力主文艺的“自由”、“纯粹”和“自主”。
- 现实主义重视人和生产人的社会与历史间的联系。
- 反现实主义文学把个人与社会、与群众对立起来，除却个人，没有其他的现实。
- 现实主义相信为民众、民族、祖国的改造和解放和实践的价值。
- 非现实主义不相信生活有任何意义，不相信任何改造和实践的可能。

在七十年代的台湾的具体条件下，上述“古典”的对立概念，在乡土文学现实主义和官方的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中，相应地延伸而表现为这些针锋相对的争论：

——乡土文学派认为文艺反映现实，呈现生活中存在的矛盾，为社会和生活的改造做出贡献。反对文学的个人主义、逃避主义和腐化堕落。

——反乡土文学者认为文艺应该“清新可喜”、“温柔敦厚”，不应该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不应被“共匪”所利用，危害社会。

——乡土文学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主张民族主义，为社会的弱小者代言，拥抱土地和人民。

——反乡土文学派主张反共高于反帝反资，指责乡土文学有“工农兵”文学的危险性，应该警戒、打击。

——乡土文学一派坚持，在中国民族分裂的现实条件下，台湾文学刻划和表现台湾的民众、生活和社会，正是刻划了当前台湾的中国人民、中国民族、中国的生活和社会。乡土文学，是祖国分断条件下当前主要的民族文学形式。反乡土派对乡土派文学的指控是沙文主义的、分裂的言论。

——反乡土文学一派认为乡土文学只写台湾地方性人物及其生活，有地方主义或分裂主义之嫌……

七十年代乡土文学论的现实主义论，便是这样地结合了当时台湾的具体现实，和现代主义的、官方的反现实主义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从而继承了日帝殖民时代反帝解放运动的文艺战线所积累的、左翼的、批判的、抵抗的现实主义文论的传统，而有文学思想史的重要性。

二、乡土文学和左派民粹主义

近年以来，所谓“热爱、认同咱这块土地”、“咱台湾人民……”这些话语，已经成了台湾分离运动的咒语。“会不会说”台湾话，“认不认同”台湾“这块土地”、“爱不爱”台湾和台湾人民，几乎成了判别一个人的全部价值的标准，驯至这种“土地/人民”论，成了分离主义修辞的专利，仿佛世上只有讲台独的人提爱台湾“土地/人民”，而主张反帝、主张反资本主义、主张中国统一的人则一贯“不认同、不爱台湾土地和人民”。

但历史的事实却与此成见完全相反。

有一种“定见”，认为七十年代现代诗论争和乡土文学论战，起源于当时一连串国际外交上的重大冲击，岛内要求改革和反省的呼声纷至，导致中国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高涨而来。但事实上，七十年代初台湾遭逢外交变局引起危机，也引起“革新保台”，“联蒋反共”，以继续和强化既有体制的保守思潮和行动，与前述同因政治外交变局而主张反帝反资，寻求两岸终极的统一者，形成左右对立。历史地看来，最早以高度热情提出热爱台湾的土地/人民的，恰恰是后者，而不是力言在危机

下“革新保台”、“联蒋反共”的右派知识分子和精英，后者连同今日以“本土论”为言的文学的分离派，当时不是直接、间接地打击乡土派，就是明哲保身，龟缩逃避。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在台大“民族主义座谈会”上，陈鼓应和王晓波首先展开了对于美日帝国主义在台“经济控制”、在台湾进行“武器、经济和思想侵入”的论证。为了抵抗强国对台湾的支配，他们力言大家“要有同胞爱”、“照顾好渔矿农工的生活”，并且表示在国际性危机下，誓与“台湾命运共存”的决心。

而这种台湾“土地/人民”的思想联系和统一；对中国大陆/台湾的忠诚之统一和联系，遍见于一九七二年以降保钓运动左翼海内外的文章、宣言和论文。中国统一、反帝民族主义论和拥抱台湾“土地/人民”、热爱中国和热爱台湾，对他们而言，自始就是互相联系和互相统一的思想与感情。而正是这种反帝统一论和拥抱台湾人民/土地论的统一，和中国/台湾的联系性与统一性，贯穿于一九七二年现代诗论战和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之中。

在七十年代两个文学争论中，尤其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中国和台湾在民族、民众、社会、文学和文化上的联系性和统一性，被许多今日已向台独派转向的评论家和作家不约而同地、以十分特殊的辞语表现出来：

叶石涛

台湾独得乡土风格并非有别于汉民族文化、足以独树一帜的文化。它乃是属于汉民文化的一支流。台湾一直是汉民族文化圈子内不可缺少的一环，因为台湾从来没有创造出独得的语言和文学……

“台湾意识”——帝国主义下在台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焦点。

……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共同经验，不外是被殖民的、受压迫的共同经验。在台湾乡土文学上反映出来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经验，以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跟大自然搏斗的共通记录。

（台湾）旧文学方面所代表的是传统的封建思想，而新文学方

面所代表的是反传统的新思想。这和国内的“五四”运动如出一辙。

日据时代的文学始终是和台湾的现实环境息息相关的。它属于（中国）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不可割裂的一环。

王拓

（小说中）如果太过强调（台湾方言），便很容易使人陷入一偏狭的、分裂的地方主义观念和感情里。

台湾……在历史虽然曾经有过被荷兰人侵入殖民、和日本军阀割据占领的惨痛经验，但是，她之与中国同文同种，并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那么，作为反映台湾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与社会的（台湾）文学，也自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廿世纪在台湾发展起来的文学”……亦即在台湾发展起来的文学。

（日据下）在台湾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与当时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采取着一致的步调，并且也是与祖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展开的反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国内封建剥削的一切运动相一致的。

台湾的中国作家在文学上所反映的特色，是以台湾这个现实环境下的人和事为主的。

巫永福

（台湾的）乡土文学即中国文化之一环。……归根结底，中国诗要有中国特色才能被承认。

（在皇民化运动下）……在精神上，他们还是认为是台湾人，心系祖国，不因皇民化而变成了日本人。不像现在，有些人唯恐不变成外国人，两者的精神真是天渊之别。

如果清文学是中国文学……光复前的台湾文学也应是中国文学，不能因为台湾被日本人统治就不能算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如果光复前的台湾文学不被承认是中国文学的一环，那么清代文学也

不能承认是中国文学，因为他是异族入主中国。

李魁贤

当然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为有与其他各省不同的特质，故乃形成独特存在的事实。

真正的人，是切实地踏在自己的土地上，付出真正的爱，和这块健康的大地拥抱在一起。

另外，至今日坚持反对台湾分离主义文学的作家和评论家更是强调两岸文学的历史联系性：

南亭（南方朔）

五十年来台湾的新文学一直是六十年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它的发展主流在不断的自觉中，从未乖离过中国共同的民族经验。它是与中国民族认同的。

（七十年代以来台湾文学的作品与理论）是中华民族本位的、理想主义的、充满了批判精神的新写实文学。

黄春明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用中国的文学语言来写自己周遭环境的生活和问题，这是我们民族的文学，即台湾本地土生土长的文学，也是我们中国的文学，所以当然我们要爱护它。

……台湾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问题。台湾地区以中国的语言文字来写自己的问题，有它的特殊背景。因为自从马关条约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但是在文化上、政治意识上，它并没有和中国割断……

陈映真

（当代台湾文学）使用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学形式，美好的中国语言，表现了世居台湾的中国同胞具体的社会生活。

……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上，高高地举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鲜明旗帜。

……台湾的生活，对于目前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生活……

中国新文学在台湾的发展，有一个过程。

由于深恐中国文学在（台湾）殖民条件下消萎，由于中国普通话和台湾话之间的差异，由于日治时代台湾和大陆的断绝，当时伤时忧国之士，乃有主张以在台湾普遍使用的闽南话从事文学的创作，以保存中华文学于殖民地，而名之为“乡土文学”。

……由于三十年来台湾史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其特点，而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也有其特殊的精神面貌。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台湾新文学在表现整个中国追求国家民族自由的精神历程中，不可否认地是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学的一部分。

乡土文学，是现代条件下（台湾的）中国民族文学的重要形式。

中国文学……从东北作家的《八月的乡村》一直到台湾作家的《送报伙》，再一直到《莎哟哪啦，再见》、《小林来台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奉仕于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巨大民族主义运动的文学作品。

台湾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人者，“在台湾的中国人”也。台湾的社会和生活，就是“在台湾的中国社会与生活”。“台湾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台湾作家是“台湾的中国作家”……众口一辞，不避拗口，三复斯言，莫不是在说，虽然两岸在内战和冷战构造下分断，七十年代当时台湾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一仍深信台湾和中国的历史的、文化的、认同上的以及事实上的联系性和统一性。和中国文学对立的、分离主义的“台湾文学”概念，在七十年代几乎是没的。以已经发表的文学为凭据，则即便是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导论》都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分离主义的台湾文学论，也还披上“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之一环”的外衣。而且从论争的文献上看，自现代主义诗论战以迄政治上肃杀阴霾的乡土文学论战期间，今之台独派文学界大佬、作家、诗人、评论家和理论家，几乎没有一个人有站在分离论的台湾文学上出来发言的直接或间接的记录。不少今日英姿风发地成为台独系文学英雄的大佬、评论家、作家和诗人，倒是在七十年代留下了和他

们今日的主张完全相反的白纸黑字，已见上文所征引。

对于努力要建设“台湾文学本土论”系谱的人来说，这个事实是很难加以说明的。难于说明而又必须说明，就不能强辞夺理。而强辞夺理，就难于不立论矛盾了。兹举数隅：

一种说法是把文学的中国认同和文学内容上对台湾具体生活的关注对立起来。于是对于七十年代乡土文学认同中国民族主义，在创作内容上表现台湾现实社会生活和乡土人物的深切关怀，解释成“(民族)意识上回归中国，(文艺)创作上回归台湾社会”。

这种解释的第一个破绽，是乡土文学和在七十年代的具体主张不对头的。王拓说“台湾的中国作家”作品里反映的“中国特色”，是以“台湾这个现实环境下的人和事为主”。众所周知，王拓是主张文学表现现实中的台湾生活和人民最力的作家，但同时也是最鲜明、最多次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对台湾经济与政治的支配，公开指出台湾社会经济的“殖民地”性——即台湾(新)殖民经济论的作家。不仅如此，王拓甚至还有意识地反对过文学的“本土化”即台独化。他说作品语言一旦太过强调台湾方言，便会“陷入一种偏狭的、分裂的地方主义观念和感情里”。此外，南亭(南方朔)也认为，七十年代乡土文学是“爱国主义的、反地域主义的新浪潮”。这样的主张，和同中国认同对立起来的“本土”论，是统一的还是互相矛盾，不言自明。黄春明也说，用中国的语言文学“写自己周遭环境的生活问题”就是“台湾地方土生土长的文学，也是我们中国的文学”。对黄春明而言，文学的中国认同和文学关怀与取材于台湾的“周遭环境”和“生活”，是相互联系与统一的，而不是相互对立和矛盾，就很明白了。他们都没有从不同立场“回归”民族、“回归”本土的记录。至于陈映真类似的主张，兹不赘言。

在社会科学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和改革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关心民众的生活与疾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密切相互联系和相互统一，而绝非互相对立和矛盾的。台湾文化协会一九三一年的章程所示“行动纲领”，把“支持反帝同盟”、“打倒一切反动派”、“打倒台湾总督政治”这一类上位纲领，与类如“废止日台人歧视待遇”、“减

免自来水费”、“责由国家负担青少年义务教育”具体关心生活、改革生活的纲领相提并论。一九三四年，中共号召“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而欲达到此目的，中共同时要求充分注意和重视“群众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食衣住行、柴米油盐、合作社、农村对外贸易，等等。这理由极为浅显：帝国主义的支配，使民族经济停滞瓦解，经济剩余出血外流，政治上和民族上的歧视……都使民族的成员体——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遭到严重的苦害。资本主义对利润不知餍足的贪欲，使社会的成员体——民众遭到不公平的剥削和压迫，带来生活的破产。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学艺术家，当然要形象地取材、描写帝国主义下和资本主义下作家生活周遭民众的被害和生活中日常性存在的民族与阶级的矛盾，唤醒民众，改造生活，改造社会和历史。

因此，把台湾文学的中国认同、反帝反资的立场，同关心台湾社会、民众的创作态度对立起来的命题，在知识上和逻辑上都无法成立。而在七十年代台湾文学争论中，乡土派作家和批评家莫不热烈高举台湾土地/人民旗帜的事实，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事实：

在七二年到七四年的现代主义诗论战中，尉天骢批评现代人支借外国的情感写诗，呼吁诗人深入台湾的工厂、盐村、农村，体验生活；高信疆批评现代派诗人“失去了根植的泥土，淡忘了此地的生活”……劳为民主张文学家要为大多数的社会民众而写作，表现人民的观点、价值和愿望。

在一九七七年展开的乡土文学论争中，乡土派作家和批评家则进一步扩大了七二年提出的拥抱“土地/人民”的逻辑。对王拓而言，七十年代初台湾遭逢的外交挫折，使人们产生关注帝国主义——从而反对殖民经济、买办经济和岛内资本主义经济下“一群被牺牲、被鄙视的”、“收入少、生活水准低、工作辛劳”的人们。因此，王拓主张乡土文学植根于“现实社会的土地上”，反映现实，也“反映人”。他赞美日帝下台湾作家“顽强地、固执地坚守在他们生长的泥土上……真诚地反映了他们所熟知的社会与生活现实”。他甚至充满激情地说，“我们是两脚深扎在

这块土地上的一群人，死了也还在这块土地上，和这块土地合而为一。”他呐喊：“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对这块土地深情厚爱是坚定的、不可撼动的。”陈映真则认为在台湾的文学和文化全面劣质西化、在外交危机中民族自信心崩坏，“脱产逃亡者如过江之鲫，在外来势力恣意干涉的历史时代”，“投眼于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为民族的认同寻求轩昂自在的归宿”。

热爱和信赖人民群众、歌颂土地和祖国，自认对勤劳人民有各种亏欠的知识分子，热情洋溢地奔向农村、海滨等劳动现场，呼喊“到人民中去！”（与七十年代初台湾有大量青年上山下海，到厂矿访问调查的运动颇为近似。）这是民粹主义的思想与实践。民粹主义也主张艺术文学要有民族和民众的特质，更要有启蒙、教化和改造的功能。

七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争论和运动，便带有这强烈的进步的民粹主义的性质。然而，辩证地看待，人们容易发现，旧俄时代的民粹运动成为一些人奔向科学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接待站。而在三十年代，一些头脑发热的民粹派纷纷投身到纳粹·法西斯蒂阵营。同样，七十年代主要在民粹论的左翼推动的乡土文学论战中受到启蒙的青年，形成了五十年代异端扑杀恐怖后新生的民族统一派。而八十年代的民粹论，包括对立于中国文学概念的“台湾文学”论，则沦为右翼的台湾分离主义——反共，把台湾“民族”、语言、“文化”无限神圣化，高唱没有阶级分析的“台湾人”意识和“台湾命运共同体”论，以塑造并圣化“台湾国民国家”，以“中国人”为台湾万恶之源，传布对“中国猪”的憎恶——从而呈现出一种“拟似法西斯”（pseudo-fascist）性格。

或谓：七十年代的文学论争中总还有一位叶石涛，在历史上头一个公开提出“台湾意识”和“台湾立场”作为评断台湾乡土文学的重要条件。但“就文论文”，叶石涛所提出的“台湾意识”和“台湾人的立场”论，受到他自己同时着重提出的若干“中国条件”的制约：

首先，叶石涛说，由于台湾历史上的一些独特的过程，“台湾本身建立了不同于中国大陆文化的浓厚的乡土风格”。然而，这“台湾独得的乡

土风格，并非有别于汉民族文化的、足以独树一帜的文化。它乃是属于汉民族文化的一支流”。因而，台湾“浓厚、强烈的乡土风格”，“仍然是跟汉民族文化割裂不开的”。也就是说，台湾的文化固然有其不同于大陆文化的、浓烈的“乡土风格”，但在根本属性上，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密切不能分割的一部分。这样的文化认识，当然是叶石涛“台湾意识”、“台湾立场”论的重要基础和参照体系。

其次，叶石涛提出“台湾意识”这个词时，是以这副题加以界定的：“帝国主义下在台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焦点”。以“在台中国人”来指谓一般所说的“台湾人”，当然就不能是今日台独人士所通用的，和中国、中国人对立意义上的“台湾人”，其理易明。而所称“帝国主义下在台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焦点”，正如叶石涛在文章中清楚指陈，是在帝国主义下台湾“被殖民、受压迫”的历史经验所形成的“反帝·反封建”，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与大自然斗争以开发台湾的，站在台湾民众立场的精神。重要的问题是：叶石涛的“反帝·反封建论”，包不包括中国治台的历史呢？就文论，答案是明白的否定。叶石涛所理解的历史上“蹂躏”过台湾的“侵略者”，只有“荷兰人和日本人”。“明郑三代及满清二百多年”治台历史清楚地被叶石涛从外族侵台史中“除去”，十分明确。“明郑三代”和“满清二百年”治台的矛盾，是同一民族内部的阶级性——而不是民族性矛盾。看来叶氏认识历史的高度，远非今日台独“本土论”者可望其项背。

而在当时他的这种历史认识下提出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的立场”论，和今日成为“主流”论述的“台湾意识”、“台湾立场”论，相去何啻云泥。

此外，这篇重要文章中以“祖国大陆”称中国；以“反抗割让，冀复归祖国”的高度去认识割台前夕在台仓促成立的抗日临时政权“台湾民主国”，等等，都显示叶石涛在一九七七年的思想和史识，与今日许多标榜、征引（断章取义地）这篇文章者脑袋里的东西，至少从白纸黑字的材料看来，是完全不一致的。

小论的作者在一九七七年发表《乡土文学的盲点》就教于叶先生。

近来有论者说我自己文章中一方面“承认”台独派的“台湾人意识”，并指责我以“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议论”构陷叶石涛。然而，文章俱在，我以“有过这样的立论”来转述台独派的“文化民族主义”论，引述之后，我指这种议论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这一段文字以海外的、日文材料为对象，我不但未曾“承认”其议论，而且给予“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议论”的评价。二十年后批评《乡土文学的盲点》的人，如果不是读书略欠细密，就是有意歪曲了。

在七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论争和乡土文学论争中，文学和民族的中国归属；反帝、反资论和热切拥抱台湾土地和人民，走向人民的左翼民粹主义，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是互相紧密联系、互相统一的。因此把台湾七十年代“文学意识”分成“本土论”、“民族主义论”和“改革论”，在知识上，逻辑上也难于成立了。

三、对内战意识形态和冷战意识形态的重大挑战

一九四七年以后，国共内战形势急转直下。一九四九年末，代表中国旧社会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国家在一场人民革命中崩溃，退守台澎。一九五〇年六月韩战爆发，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战，派遣第七舰队封断海峡，占据台湾为围堵新生中国的美国军事基地。美帝国主义对“国府”政策转为以其霸权支持国府在国际社会的“合法性”，悍然抹杀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强使“国府”在国际上“代表”全中国。为达此目的，美国支持“国府”透过白色恐怖的组织性暴力，炮制国民党“国家政权”，以为实现美国在远东冷战战略利益的代理人。

“国府”假借美国给予的“国际合法性”，取得了国民党军事流亡集团原所没有的“岛内统治合法性”，恣意施行长期的反共、国家安全体制下的绝对独裁统治。于是在美国强权干涉下，国共内战冻结。在两岸分立长期化的条件下，台湾被纳入西太平洋反共冷战体制。而相应于国共内战——两岸分裂的构造与国际冷战构造之重叠，形成了内战/分裂意识形态和国际冷战意识形态的叠合架构，透过“国府”反共，国家安全

体制严密的独裁，特务体系，密密实实在地支配和控制台湾的政治、思想、知识、文化和文学等方面的生活。

内战/民族对立/东西冷战意识形态体系，在政治上将中共、中国大陆连同社会主义圈整个加以妖魔化，透过教育宣传制造对中国、中国人的憎恶和丑诋。在文化上，把左翼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知识、文学、艺术、哲学和社会科学，说成危险而有毒害性与欺骗性的异端，加以社会的、文化的与政治的迫害。在政治外交上，世界首先分成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或“民主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家集团或“极权世界”。前者代表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经济上的繁荣富足，社会上的安详和乐。而“自由世界”“公认”的盟主美国，有超强的武力，科技先进，“对别国无任何领土野心”，却为了防堵“邪恶的共产主义”，在全世界驻扎美国正义之师，有时为了吓阻“共产帝国主义”的扩张，保护自由企业体制和民主价值，无私的美国总是一马当先，四处出兵干预，义无反顾。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圈，那是集邪恶、独裁、对别国怀有永不饱足的领土野心的恶棍，它派遣“赤色第五纵队”以各种伪装潜伏在各国，伺机颠覆自由体制，恶毒而又危险。官僚主义和经济上的不自由，使共产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无法改善的贫困中。因此，美国是全世界自由、民主与和平的带路人。台湾、美国和日本是最重要的“反共盟友”，只有“共产第五纵队”才会丑诋和攻击美国和日本。共产党常常伪装爱国、爱人民，其实皆包藏祸心。青年“往往因为爱国（爱人民）太过热切而有了偏差”，容易受阴险的“共匪”所利用，云云。

前文说过，从台湾新文学在二十年代的殖民地台湾呱呱堕地以迄一九五〇年，指导思想一直是批判的、抵抗现实主义。战后一九五〇年到五二年的异端扑杀运动，彻底消灭了这个在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历史中累积起来的伟大现实主义传统。自此，代表美国冷战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和创作，从五〇年与“反共抗俄文学”孪生后以迄七〇年，支配了台湾的文艺界，成为台湾文艺界的霸权和主流。

一九六〇年代末，美国干涉印支半岛的战争师劳无功，美国资本主义经过战后二十年全面、快速发展，开始因种种复杂原因，使世界资本

主义体系遭遇慢性的不景气。一九六六年大陆“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反帝反修”的精神，因缘际会，在北美、在法国和东京，激发了新的激进思潮，美国的帝国主义、对外军事扩张主义和美国的建制（establishment）受到广泛的怀疑和批判。青年学生要求重新认识中国、越南和古巴的革命，要求彻底改造以美国资产阶级价值为准绳的美国高等教育，要求解除对进步思想和学术的禁锢，开放言论自由……

一九六〇年代末，来自台湾和香港在北美的留学生，或自发、或受美国进步思潮的影响，开始隐秘而兴奋地寻找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寻找有关中国革命的本质和过程的知识，寻找四九年成立后新中国的实体……在这过程中，他们体验了思想、价值、哲学、知识的革命化、进步化的巨大蜕变。一九七二年，保钓爱国运动以北美和台北为大小中心爆发。运动前在北美各地自然形成的左派读书小圈和独自探索的个人，逐渐汇集而形成运动的左翼，并在运动过程中与运动的右翼（例如“反共爱国联盟”）发生左右斗争。

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探索，带来世界观、人生观的彻底（radical）改变。这意味着对人、对生活、对历史、对社会——当然连带地对文学艺术看法的改变。没有这个思想、价值上全面的改造，就不能很好的理解一九七二年的现代诗批判和一九七七年的乡土文学论争。在北美、香港展开的思想的改造与进步，透过保钓运动和影印设备的进步，流入台湾，对七十年代初一代台湾知识分子冲破二十年内战和冷战思维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举手边现有的资料看，香港保钓左翼著名刊物《抖擞》上罗隆迈写的《谈谈台湾的文学》，就对王拓在三年后的一九七七年四月发表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中有关美国和西方意识形态对台湾知识分子的影响等各论，有直接影响。

于是在一九五〇年到五三年的恐怖政治和长期反共戒严体制中遭到彻底破灭的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审美思想体系，竟然在七十年代保钓左翼重新寻访中国、连带地寻访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系谱的运动中，重新复苏，在内战/冷战意识形态叠合构造支配

了台湾二十年的七十年代，在两次文学论战中直接向这内战/冷战意识形态体系挑战的斗争——并且在森冷的反共国家安全体制眈眈虎视之下，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领导了七十年代两个论争中的左翼取得胜利、突破了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支配的枷锁者，至少有下列的几个方面——

美·日帝国主义论的提起

在战后的亚洲和辽阔的第三世界，反对美国和日本新帝国主义的运动，是美国势力范围下第三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对各该国扈从美国的反共法西斯的斗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各国人民看清了这事实：顶在他们头上的、(半)封建的反共独裁政府，是美国所豢养的、为美国战略利益和美国资本的利益的服务的代理人。于是，在战后的二十年间，反对美国在各地的军事基地，反对美国对各地经济和文化的侵略，反对美国干涉各国内政，反对美国在各地支持腐败、反动、反民族“法西斯压迫性国家政权”(fascist repressive states)的斗争，风起云涌。“美国佬滚回去”的呼声，响彻云霄。

但是在台湾，除了一九四七年元月一场集结了三万青年学生抗议北京大学沈崇事件的反美示威，几十年来，几乎没有过任何反美性质的社会政治运动。特别在五〇年开始连续三年的白色恐怖之后，反美、反日立刻就会被扣上“匪嫌”的帽子，遭受企图破坏反共“邦谊”，“为匪统战”的致命指控。(一九五七年五月“刘自然事件”引爆的台北市反美群众运动事件，虽出于民族主义情感，但毕竟是单一、偶发、孤立事件。)但除了国民党严厉的不准反美(日)的政策而外，五〇年以降台湾的资产阶级民主化运动，基本上不但不反美，而且一贯以美国势力为奥援、为依靠。台湾革命家谢雪红早在一九四九年表达了打倒国民党统治和驱逐美帝国主义在台湾的侵略势力的决心。但是只反国民党独裁，在极端反共意识上不反美反日的台湾战后民主运动的局限性，也强化了以美(日)为友、为师，进而媚美亲日的思想。

正是在这样一个长期反共保守，亲美媚日的背景下，七二年保钓运动的左翼，斗胆地揭起了声讨美日帝国主义论的反旗！

前文说过，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台湾大学的民族主义座谈会上，陈鼓应和王晓波率先展开了反对美日帝国主义的论述。陈鼓应说外国人借着工业合作，在台湾役用人力和物力，实际上是对台湾的“经济侵略”。台湾应当倡言民族主义最首要的理由，便在于台湾“被强国侵略，被经济控制”。王晓波倡言抵抗帝国主义的“武器、经济和思想的输入”，力言“对外抵抗侵略、对内铲除外国的‘第五纵队’”。这看似泛泛的一般之论，在五〇年后二十年极端反共亲美（日）的思想环境中发言，可谓石破天惊。在海外，保钓左翼对台湾政治经济的性质，普遍认定国府统治下的台湾“外有新殖民主义（经济渗透，从而政治控制）的榨取，内有为外来殖民主义者效劳的买办政治的压迫”。到了一九七七年乡土文学论战时，乡土派的作家、评论家进一步发展了美日对台湾的（新）殖民地支配论、台湾社会性质为殖民经济论，并以素朴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台湾社会经济对外隶属，来说明台湾知识、文化、文学和思想等上部构造的西化——即对欧美之隶从。

叶石涛迭次明白地以“反帝·反封建”来规定台湾乡土文学的传统精神。南方朔认为七十年代台湾文学在理论上和创作上，“不论省籍，一致强调”“以发扬民族尊严对抗帝国主义……”。

王拓认为美日两强间将中国领土钓鱼台私相授受，使人们“认清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真面貌”，“看清了美国与日本相勾结侵略中国的丑恶面孔”，从而认识到在“日本、美国的经济殖民主义下，以廉价劳力和低廉农产品”换得台湾经济成长，却造成社会不公，工人、农民和弱小者的贫困化。王拓认为：先进国以先进的资本、技术，配合后进国的政策，以跨国公司的形式，以“经济合作”之名，来“控制落后国家的经济”，这就是殖民经济。虽然缺少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纵深，王拓在那白色的一九七七年，公然规定台湾经济的“新殖民地”/“经济的殖民地”论，公然规定美日帝国主义为“新帝国主义”，当然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陈映真指出，一九五〇年美国对台湾经济和财政援助，有鲜明的帝国主义的冷战战略意义，造成台湾经济对美国 and 日本的紧密依附构造。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中，陈映真认为当代的世界，是一个“大约

有五分之三的人口还生活在长期、慢性的贫困、饥饿、无知和疾病”的环境，是一个“跨国性产业和银行集团支配缺乏生产资本和技术的弱小民族和国家，从而斲伤了这些民族的心灵，污染了这些民族的自然环境，掠夺了这些民族的物质资源”的世界，用以说明在古典的帝国世界史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冷战下“新帝国主义”世界史的展开。

当然，这些论证，从今日眼光看来，还缺少更深刻的政治经济学的纵深、但从文学思潮史看来，无疑是意义重大的。

素朴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之应用

历史唯物主义相信，“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中由法律施设和政治施设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结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所称“社会经济结构所形成的基础”，一般略称“经济基础”，涵盖比较复杂的内容，指的是同物质生产力之一定发展阶段相应的、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占领导地位的诸生产关系的总和。例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包括私有财产制度；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和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与消费关系等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系。而在这“经济基础”之上，形成政治、法律、道德、艺术（文学）、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系统。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相应上层建筑的性质与内容；经济基础的变化，牵动上层建筑的变化。

七十年代台湾文学争论中，尤其是在乡土文学论争中，很多作者都以台湾社会经济的变化来说明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的变化。

尉天骢在《民族文学与民族形式》一文中，说明《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出现，是同乾隆中叶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濒临崩坏，有了批判封建豪门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思潮有关。而“只有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初有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才能开展起来”。

王拓说他“一向主张文学研究应该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与社会的客观条件上加以思考”。于是，在讨论七十年代乡土文学思潮之前，他对七〇年到七二年的台湾社会作一番分析。指出一九七〇到七二年间台湾

资本主义的高速成长，是以工资和农产品价格之低下换来，也就是对台湾工农的残酷剥削所取得的。社会不公，引起社会意识的发扬。青年学生发动了社会服务和社会调查，探求民瘼的运动。这时，人们才发现二十年来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如何长期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人民群众，而历史上一贯描写生活、干预生活的乡土文学，至此才有客观的社会条件，受到广泛的爱读。

陈映真的论文题目：《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就提示了上层建筑的文学与经济基础的社会之间的关联。他从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移行的历程，说明同一时期中欧洲文学、艺术、政治、宗教思潮的推移，来说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接着，他以极为概括的方式，说明战后台湾社会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形态的性质，得出战后台湾资本主义的依附性发展的结论。继之，他以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的依附性发展，来说明台湾在医学、教育、音乐、学术思潮各领域的极端西化，得出这结论：“文化上、精神上对西方的附庸化、殖民地化——这就是我们三十年来精神生活突出的特点。”“我们的附庸性文化，只是社会经济的附庸化的一个反映而已。”

再继之，他进一步从台湾文化的附庸化来解释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西方化的性质。七十年代初台湾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开展，使社会矛盾浮现。而保钓爱国运动点燃了战后世代最真切的爱国的民族主义思想，从而引发了对现代主义诗的批判，和“具有反对西方和东方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意义”的乡土文学论。

今日读之，这种的文论，毕竟是历史唯物论的简化、机械化甚至庸俗化表现。但在两岸分裂、台湾左翼文学理论的历史积累薄弱、在现实上进步的文学理论受到全面禁断、五十年代以后台湾本地原有的、虽然积累薄弱的进步文论完全溃灭条件下，七十年代文论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评论的再登场，在台湾文学思想史上，当有重大意义了。

民族文学论和民众文学的提起

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艺术文学，为经济基础服务。而在一个阶级社会，不同阶级有不同的艺术文

学，各自反映不同的社会内容。占社会多数的，被收夺、被压迫，从而极思改变生活和历史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是直接生产者阶级——的艺术文学，一般地要反映社会变革发展的要求，揭发和控诉社会和生活的丑恶阴暗，同时激励人民群众为变革生活而崛起，歌颂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和高尚的品德，呼唤对更合理、美好社会的憧憬。这样的艺术和文学，在文学目的、文学写什么、写谁等诸问题上，便自然有明确的答案。在怎么写的问题上，也就自然采取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所容易理解的形式、语言、思想感情来表现。这就是“文学的民众性”。一九五〇年以降，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拒绝社会和民众，专事刻划个人最内面的、浑沌的心理世界，并且，作为反共冷战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现代主义视民众文学为共产党的“工农兵文学”。

王拓指出，七十年代乡土文学思潮，为了反对台湾的“寡头资本”，对于“社会上比较低收入的人赋予更多的同情与支持”，因此刻划“一群被忽视的人，他们收入少、生活水准低、工作辛劳”。他认为乡土文学绝不仅只描写农村、工人和农人。它同时也“刻划民族企业家、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公务员、教员以及在工商社会里为生活而挣扎的各种各样的人”。

台湾鲁凯族的生活和困境，吸引着黄春明深情的关注，并且要“站在山胞他们立场上”去写。

陈映真则认为，乡土文学所描写的、散居在“广泛农村、渔村、学校、市镇和工厂，勤劳地生活、殷勤地工作”的人们，表现了“中国民众伟大的容貌”，也表现了“巨大而庄严的形象”。

严格意义的民众文学论，必须建立在“民众”的定义上。这就涉及社会性质理论了。社会性质理论中有分析一个社会的阶级构成的部分，从社会生产关系中分析一个社会的剥削者和不同程度的被剥削者、统治者和其他位序的被统治者。于是以广泛直接生产者，因其被掠夺的痛苦最大，最富于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愿望，而被界定为“民众”（或“人民”）。

七十年代的民众文学论，因为台湾社会性质论付之阙如，故而也没有为“民众”定义加以理论支柱。但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论，却不约而

同地在创作实践上选择了社会上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农村无产者、工人、小职员等社会低层弱小者作为描写叙述的对象。当然，这些社会低层的人物，不用说都是没有被意识化过的“自在的阶级”，还不是经过意识化、觉醒到自己阶级在创造历史中的使命的“自为的阶级”。然而，在那连作家都鲜有意识化者的时代，这种要求，又岂只是奢望而已？

前文说过，在现实生活中承受最大的不公与苦痛，对改变生活和历史意志最坚定，对公正美好的社会向往最热情的民众的文学艺术，自然要反映社会和历史向前进步的要求，因此对现实生活中不正义、不合理的方面要求予以揭露和批评，要求鼓舞勇于改革的热情，要求歌唱勤劳人民奋勉勇敢、光明高尚的节操。在表达形式上，要求用广泛民众所喜闻乐言的语言、感情、思想和艺术文学形式。广泛民众是民族主要成员体。因此他们所喜爱的文艺语言、思想、感情和表现形式，也是一个民族文艺的风格与特点。民族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不同民族的文学艺术也就有不同的民族特色、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因此，文学有民众性，同时也有民族性。正如文学民众性联系着民族性，民众文学也紧密联系着民族文学。

其次，在古典的和新的帝国主义时代，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社会，文学艺术要求揭发和打击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压迫、操纵和掠夺、支配，要求高举民族和祖国固有的光荣与尊严，要求勇于抵抗和批判外来势力，要求打击与殖民者勾结合作的精英阶层，要求歌颂敢于向新旧殖民主义斗争者的勇敢和光辉的形象。这就要在文艺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自觉地主张民族文学。

由于民众文学和民族文学在本质上的联系性，七十年代台湾文学论争，几乎自始就主要地聚焦在民众文学和民族文学论。

颜元叔在主张“社会写实的文学”的同时，呼吁一种“民族文学”。他说民族文学要“发掘民族意识，传递民族意识”。但近来因“外国文化之侵袭”，“外国人的观点和看法”左右了我们的观点与看法。他主张以民族文学表达民族意识，要求中国文学“负起塑造”中国民族意识之大责任。

赵光溪试为民族文学下一个界定。他认为，“民族文学……描述当前的或历史的民族际遇”，及其中“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的欺侮……弱小民族对强大民族的反抗”。民族文学要“暴露反民族主义者的丑态，排除一切阻碍民族进展的思想，一方面要唤醒民族情感和意识，促进民族向上的意志……”

南亨（南方朔）认为七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理论与创作，都一致强调以民族尊严的发扬对抗帝国主义。

陈映真赞扬战后台湾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使用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学形式、美好的中国语言”，“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和形式”“生动活泼地描写了台湾”，从而“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高高地举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旗帜”。

这些论说一方面显示了在两岸分裂现实背景下台湾文学强烈的“中国指向性”，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科学的弱质，对于在内战·冷战双重结构下民族的处境、美帝国主义干涉下民族分离架构的本质、以及克服这分离架构的展望，都没有条件做纵深的理论展开。然而，在白化的七十年代，公开以美国、西方为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帝国主义，在几十年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支配下，公然倡言反对帝国主义，抵制帝国主义，从而主张文学艺术之中国民族形式、语言、风格与特色之复归，其战后台湾文学思潮史上的重要性，十分明白。

在台湾文学论中提出台湾社会形态论

所谓“社会形态”，一作“社会构成体”（social formation），是一个社会之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发展阶段相应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马克思又认为，社会构成体非但是具体的而且是历史的，都有萌芽、生长、成熟、衰败并且向着更进步的社会构成体移行发展的运动。

社会构成体性质理论，对于新旧殖民地社会，有两个定准。一个是政治经济上的独立性程度。另一个是社会经济结构在“五阶段”中的定位。一九三〇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结束后，一般地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政治经济上独立性程度），“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介于封建社会与资本制社会之间而又比较偏于封建社会的这么一个发展阶

段)的社会。这样的分析,就规定了要克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中国社会向前进步,就得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封建主义。在中国,因为特殊的条件,规定了以“新民主主义”而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去克服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毛泽东的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在实践中打倒了国民党,驱逐了帝国主义,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因此,左翼文学的方针路线——写什么,写谁,为什么和为谁写、为谁服务,以及怎么写,都取决于社会构成体论的结论。叶石涛常常说台湾日据时期新文学的指导思想是“反帝·反封建”,便是相应于日治下台湾社会的“殖民地·半封建”的结论性来的。

历史地看来,台湾的民族·民主斗争的历史中,有关台湾社会构成体论的理论积累比较薄弱。一九二八年台共第一个纲领中,虽然没有对台湾社会结构给予具体称谓,但在实际分析上已认为台湾社会中“高度的资本集中及……非资本主义经济”,即所谓“封建的残留物”并存,而置于“日本国家权力——台湾总督府的高压”统治之下。这就是对于一个“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描写了。

台共的纲领,把二十年代末台湾社会构成分为八个阶段。而打倒日帝统治而求从日本殖民地枷锁中获得独立的革命的性质,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台湾资产阶级性质”的独立革命。但由于台湾资产阶级在日帝压迫下不得发展,力量薄弱,没有能力领导这个“台湾资产阶级的革命”,终须要以台湾工人为核心,团结贫农,形成“严密的联带”,领导其他“有革命性且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工商阶级”,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简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台湾版了。

台共成立后,不久陷入分派斗争之中。一九三一年,台共“改革同盟”以新纲领另立新的中央。新纲领对台湾社会构成体的分析,大抵上也做出当时的台湾社会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受到当时中国革命“左”倾路线的深刻影响,在阶级分析上,分成六个阶段,并且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对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与民族改良主义深具戒心,对反对民族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有紧迫感。另一方面,对

于当时共产国际所宣传的“资本主义第三期”——即其烂熟的末期的来到显示热情的信心，相信“革命的高潮将在无可避免的情势下来临”。

由于篇幅的关系，对三十年代陈逢源与许乃昌间所进行的台湾资本主义论争，和远在大陆的李友邦对日据下台湾社会的分析，皆略而不论。历史地看来，日据下台湾左翼运动留下了台共两个纲领中的台湾社会性质理论。一九四六到一九五三年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实践，留下了四七年到四九年新现实主义文学论争中骆驼英的台湾文学性质与发展的方针论。而一九七〇年代保钧，也留下了极为粗疏，但意义重大的台湾社会经济论，即台湾殖民地经济论。

为了对彭歌的点名批判提出驳论，王拓在《拥抱健康的大地》一文中，对他的台湾“殖民经济”论提出比较详细的看法。

王拓首先强调台湾从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七〇年初，“二十年内顺利完成了五期经济计划”，使“台湾工商业有长久的进步和繁荣”。这是在说明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的发达，使台湾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但王拓认为，台湾资本主义的发展，付出两样代价。一是工农阶级的贫困化，二是在贸易上、工业上对外国资本依附。工农贫困化，系于低米价政策，以维持低工资，俾发展劳力密集工业化。在压抑农业发展工业政策下，工农成为被牺牲的阶级。其次，日本贸易商社独占台湾对外贸易渠道，又在美日台三边贸易中对台大量出超，说明台湾经济的对外依附性严重。这是新殖民主义的压迫。于是说台湾经济是买办经济。

这种说法当然在理论发展上过于粗疏。虽然可能当时王拓尚无“依附性经济发展”的理论认识，但既说台湾经济又依附外国，又有所发展，倒也碰上了“依附发展”论的最通俗的轮廓。但也仅止乎此。王拓当时还没能提出跨国公司在贸易、技术转移上广泛的支配，以致使台湾经济高度依存资本与技术进口，结果削弱了台湾本地资本的积累，致台湾工业难于升级，更难于达成经济自主化。王拓自然也无力提及世界体系中不平等的国际权力关系，以及岛内畸形、不公正、不合理而又无从加以改造的社会构造，是台湾经济无从摆脱外力控制的重要原因。

王拓，连带是当时提出台湾殖民经济论的评论家们，对台湾经济的

新殖民地性不曾、也无从掌握理论知识的事实，孙柏东之流的体制派经济学家很容易避重就轻地抢白一番。但无论如何，即使是粗枝大叶，指出台湾社会经济的依附性（或依附下的经济发展）、提出了外国经济对台湾经济的支配这个结论，在七〇年初，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留给今后的台湾社会学者继续充实台湾性质论以广大空间。

四、倒退与发展——代结论

小论的作者以为，七十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在台湾战后文艺思潮史上有至少三方面划期性的意义。

首先是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提起。现实主义文学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文学史中，一向是左翼文学和其他偏向斗争的旗帜。截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著名论争，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左右对峙。此外，在战后世界冷战结构下，现代主义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对抗旧苏东世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意识形态武器，也成为反对在广泛美国势力范围下第三世界反帝的、本地革命现实主义的先锋。在这三层意义上，七十年代台湾批判现代主义，高举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在那冷战犹殷的时代，有重要意义。

其次，七十年代台湾的两次文学论争在多方面直接冲破了中国内战和国际冷战双重意识形态的压制，做了突破性的挑战。台湾新殖民地经济论；美日帝国主义论；民族文学和民众文学论的提起，以素朴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识和评论台湾文化和文学发展史的方法等，都是向七十年代内战/冷战思想的禁区之大胆的冲刺。

第三，虽然实质成绩还比较粗疏，但历史地看待、七十年代的文学论中提出了台湾社会经济性质的争论。社会构造体性质的争论，是标志一个社会的左翼之社会科学、和科学地自我认识能力的重要指标。马克思主义的文论，也基本上离不开社会构成体论。台湾是不是“殖民地经济”的争论之重要性，不在争论双方在知识上的贡献，而在问题提起本

身的历史意义——以及它为今后的台湾社会科学界和文学评论界留下来广阔的探索空间。

在七十年代的文学论争中，人们看见两个政治上方向相似、性格不同的转化。先是平素表现为自由主义、开明、现代、前进的某一些现代主义者和自由派言论人、大学教授，在争论——比较剧烈的阶级斗争在文化上的表现——中露出反共法西斯的本来面目。在王昇主宰的反共国家安全体制下，彭歌一改向来的慈眉善目，从一九七七年七月开始在他的报纸专栏上给乡土文学扣帽子，八月，展开全面总攻，对王拓、尉天骢、陈映真展开凌厉的公开点名批判，为政治迫害制造舆论。同八月，一贯以留美学人兼大诗人面貌出现的余光中不但公开呼喊“狼来了！”，而且私下写密告材料给王昇，指控陈映真的文艺评论思想来自“青年马克思”主义，手段之卑下，令人齿冷。在现代主义诗论争中，以军中政治作战为专业的洛夫，公开写文章称控诉和批评现代主义诗的文学是“意图诡秘”，其“价值判断建立在唯物论社会主义”。他指责批判现代主义诗的唐文标是“赤色先锋队”，企图在台湾社会撒播“普罗文学毒粉”。

在二战前后，不少现代主义诗人、艺术家投入欧洲极端反共的纳粹营垒，是众所周知的。台湾的现代主义，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刻，毫不犹豫地露出了反共法西斯的狰狞面目。为了反共，写密告信，帮国民党法西斯蒂打棍子，丝毫不见手软。他们这丑恶历史，是什么洗洁剂也清洗不掉的。

经过一九七九年高雄美丽岛事件后，在历史上与台湾殖民地时代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没有人的、组织的、历史的以及意识形态联系的台湾战后新兴资产阶级民主化运动，在“反蒋（反独裁）不反美（新老帝国主义）”、“民主反共”、“为反共而民主”的宿疾上，到了七十年代台湾的国际合法性全面崩溃，造成资产阶级岛内支配合法性的高度焦虑条件下，台湾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逐渐走向反蒋而民族分裂的途程。政治上的统独争议，反映到台湾文学、文化的领域，就表现为八十年代中后台湾文学分离论，即所谓“本土文学”论、和中国文学对立的“台湾文学”

论，而有长足的发展。从八十年代中后开始，叶石涛、王拓、巫永福、宋泽莱、李魁贤和不少原台湾文学中国性质论者，在没有做任何负责任的转露表白条件下，转换了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方向，从他们原来的原则立场，全面倒退。

依靠帝国主义的奥援偏安台湾的国民党，在其支配台湾的意识形态中就孕育着民族分裂固定化、永久化的分离主义的胎儿。国民党“胜共统一”、“政治反攻统一”云云，仅仅只是塑造其对台统治合法性的欺罔。战后数十年的极端反共宣传，在台湾造成了普遍歧视、憎恶、卑视中国的思想感情。而且在与大陆内战/冷战对峙形态下，将之组织到美、日、台三角贸易中，并在因独裁资本快速积累而“繁荣”的条件下，台湾社会发展了脱中国、脱亚洲和向美日的思想感情。一九八七年，在没有革命、政变，没有对历史和社会的构造性变革的条件下，台湾资产阶级由上而下地接续和接受了一九五〇年以降旧国民党的权力。随着时日，台湾朝野资产阶级共同继承了国民党尸骸所遗留下来的遗腹儿，即反共、亲美亲日、反中国、两岸分断的固定化的政治和政策。

七十年代达到高潮的、反内战·反冷战意识形态的突破，不旋踵到了八十年代遭逢了全面性的挫折和转折。这是中国的反帝民族解放的“本土论”创造了它的异己物——反中国的本土论而异化，抑或内战·冷战意识形态（肯定）与反内战·反冷战意识形态（否定）的对立斗争过程中，由于一些不利的条件（左翼传统的溃绝，进步理论、思想积累的弱质，等等），使否定的否定中挫，无法否定超克肯定，完成新肯定（否定的否定）的建设——这虽是有待深化讨论的课题，但小论的作者以为，台湾左翼传统的弱质，和战后台湾左翼在知识、理论——从而在实践上的贫困和极端艰难之处境，是造成八十年代以降大反动和大倒退的主要原因。

七十年代的台湾文学论争，在弹指间竟过去了二十年。环顾今日，新的外来的理论——后现代论、结构·解构论、后殖民论、女性主义论、同性恋……依旧是台湾文化、文艺和思想的主流和霸权论述。相对

于七十年代强烈的中国指向，八十年代兴起全面反中国、分离主义的文化、政治和文学论述。“台湾民族主义”代替了中国民族主义。反帝反殖民论被憎恶和歧视所取代。民众和阶级理论，被不讲阶级分析的“台湾人”国民意识所取代。

历史给予台湾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以将近二十年的发展时间。但看来七十年代论争所欲解决的问题，却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迎来了全面反动、全面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

现在，摆在深切关怀历史和生活的的人们面前的，就有这些急迫地等待解答的问题——

- 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问题的，结合了台湾文艺历史的具体现实的探索；

- 对自西方高教校园倾泻而来的货色——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同性恋论述的、全面的、结合了台湾具体议题的总检点；

- 展开台湾社会构造体性质的讨论，以深入解决帝国主义、台湾新殖民经济、八七年以后台湾“国家政权”性质和台湾社会变革理论等诸问题；

- 从台湾政治史和台湾社会史论的展开，对台湾统独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果而如此，这将是台湾的社会科学的一次跃进，从而也是对乡土文学二十年的最有意义的献礼。

七十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

——以《莎哟娜啦·再见》、《小寡妇》和《我爱玛莉》为中心

前 言

一九七〇年代，台湾文艺思潮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一九五〇年韩战爆发，“国府”在台湾发动全面性的政治异端扑杀运动^{〔1〕}，美国则强力干预中国内战，以巨大军经援助和政治、外交支持在台湾树立军事波拿帕政权（Bonapartist state）。正是在这个国共内战和东西冷战交叠构造形成的过程中，自日据时代以来艰苦积累的台湾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人脉、组织、哲学、社会科学和审美体系全面瓦解。于是冷战和内战的意识形态长期支配一切。在文学艺术上，作为冷战时代美国审美意识形态、美国势力范围下第三世界文艺思想霸权的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

*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北京）一九九九年第二期，后收录于《乡土文学论战三十年——左翼传统的复归》（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台湾：人间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一月）。

〔1〕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共地下党在基隆中学的组织被侦破，至一九五二年重建后的洪有樵核心投降，据最近省文献会调查，至一九八七年解除戒严令前，总共涉入三万人以上。五十年代被处决者应接近四五千人之谱。而遭拷讯、投狱者也在一万人左右。

等泛称为“现代主义”的文艺〔2〕，支配了一九五〇年以迄七〇年的台湾文艺界。

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受到美国侵越战争师劳无功、大陆“文革”激进主义和美国和平主义运动、种族平等运动、校园言论自由运动的影响，一部分出身港台、在北美的留学生开始寻找长期被妖魔化了的中国革命历史的真相；开始从美国大学图书馆借阅长期在台禁阅的中国三十年代文学作品，而逐一形成一种思想和文化运动，在哲学上、文学艺术上、人生观和社会观上逐渐进步化，终至冲破了五十年代以降在港台形成的极端冷战/内战意识形态枷锁，在七十年代到七四年台湾的现代（主义）诗批评、七七年的乡土文学论战，如果离开保钓运动左翼文学艺术思想的影响，就无从全面理解。总结地看，七十年代台湾文学艺术思潮的根本性改变，有三个方面：

一、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复权：一九五〇年到五二年的白色肃清，使自日据时代以来艰苦积累的台湾批判性现实主义文艺道路全面非法化。在这基础上，透过在台美国文化机关、留美政策、人员培训和交换和去美参访体制，不但培养一代又一代亲美知识菁英，在文学艺术上，使现代文化快速取得了自五〇年起迄七〇年间的支配地位。现在看来，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争斗，在第三世界，甚至在苏联东欧起迄西欧广大范围内，是一场从三十年代延续到七十年代的、文艺理论上的左右争论。台湾七十年代文学论争，在反共戒严时期，勇敢地为台湾文学现实主义光荣传统复权，批判了作为美国冷战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意义重大。

二、左翼文论的提起：素朴的历史唯物主义文论，即文艺社会学方

〔2〕 阿皮革纳内西 (Richard Appignanesi)，《后现代主义》，傅信勤主编，黄训庆译，立绪文化出版社，页三一—三二，一九九七，台北。

法的比较广泛的使用〔3〕，大众文学论〔4〕、民族文学论〔5〕的提起，在中断了二十年之后，在现代诗批判和乡土文学论争中重新被新一代人在极端反共意识形态支配一切的环境下展开，在台湾文学思潮历史中，自有重要意义。

三、美日帝国主义论和台湾殖民经济论的提起：在极端反共的七〇年代，美国和日本被宣传为自由世界的盟主与盟邦。美日私相授受我国领土钓鱼岛的事件，揭露了美日的帝国主义性质，使港台知识界和市民开始以帝国主义时代的认识，看待中国与台湾的命运。美日帝国主义论的具体化，又发展为美日（新）帝国主义对台湾社会和经济的控制论〔6〕。台湾经济（社会）性质是不是“殖民地”性质，引发了争论〔7〕，从而在一个意义上，形成了台湾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性质的讨论。由于当时理论水平和政治环境的限制，争论不曾往纵深发展，但在台湾社会形态理论史中，有一定的重要性。

以明白的语言，做出“美日两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台湾施加（新）殖民主支配，而台湾社会经济的性格，是殖民地经济”这样的论断，不但出现于七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出现于七二年台湾大学的“民族主义座谈会”，更出现在从六十年代晚期到八十年代初的，

-
- 〔3〕 尉天骢，《民族文学与民族形式》，收《仙人掌》杂志，一九七八年六月；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收尉天骢《乡土文学论战集》页一〇〇—一〇九，远流，长桥联合发行，一九七八，台北：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收前揭《乡土文学论战集》，等等。
- 〔4〕 王拓，同〔3〕王拓项，页一一九；黄春明，《当前中国文学问题》座谈纪录黄春明发言；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收《乡土文学讨论集》，等等。
- 〔5〕 颜元叔，《谈民族文学》，收同名评论集，台湾学生书局，一九八四年，台北；赵光汉，《乡土文学就是国民文学》，收《乡土文学讨论集》，页二八六；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同〔4〕陈映真项；南亭，《到处都是钟声》，收《乡土文学讨论集》，等等。
- 〔6〕 北剑，《论民族主义——第一次民族主义座谈会纪要》，收王晓波《尚未完成的历史》，海峡学术出版社，台北。
- 〔7〕 王拓，《拥抱健康的大地》，收《乡土文学论战集》；张忠栋，《乡土·民族·自立自强》、孙伯东，《台湾是殖民经济吗？》皆收《乡土文学讨论集》。

几个主要的小说家的作品中〔8〕。其中，黄春明在七十年代的三篇小说——《莎哟娜啦·再见》（一九七二）、《小寡妇》（一九七四）和《我爱玛莉》（一九七九）〔9〕，丰富、深刻地表现了对于新殖民地化的台湾生活深刻的反省和敏锐的批判。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台湾经济

一九四五年，台湾从日本帝国主义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地统治下解放，纳入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大陆社会。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形势急转直下，四九年，在内战中失利的“国府”东迁台湾。一九五〇年韩战爆发，东西冷战对抗达于高峰，美国以军事、政治、外交全面干涉中国内战，把台湾纳入东亚冷战围堵大陆的战略体制。中国大陆和岛屿台湾的民族分裂构造，在外力干预下固定化。

一九五一年开始，为了稳定风雨飘摇中的台湾经济，强化台湾的反共军事实力，美国以平均每年一亿美元的额度，对台施行截至一九六五年的经济援助。在这十五年中，美国经由货币经济机制的各项援助，支配了台湾的经济过程。美援一面支持台湾军事性、政治性消费，巩固军事波拿帕政权的统治，一方面支援台湾公营和私营企业，形成“美国帝国主义特殊的双重介入方式”〔10〕。美援的使用和实践过程，深入台湾政府的金融、财政和经济部门，发挥深入干预、监视、控制和督察机制。而五一年到六五年间台湾贸易输出，几乎全部依赖美援，并且以美援原料和生产设备推动进口替代型工业化，一方面依靠美国剩余农产品制造余粮，从而对日输出农产品（及农业加工制品）。在本质上，早在五十年代，台湾就恢复了对日输出农产品、自日输入轻工产品的殖民地性质质

〔8〕 一九六七年的陈映真，一九七二年至七三年的黄春明和王禎和，一九七四年和七七年的黄春明，一九七八年至八二年的陈映真，八四年的王禎和。

〔9〕 皆收入《黄春明小说集（三），莎哟娜啦·再见》，台北皇冠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10〕 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页三六二，人间出版社，一九九二。

易。而台湾的美援经济体制，加上贸易上对日本的殖民地经济性依赖，确立了六十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对美日深度附庸化的关系。“而美日对台湾的新殖民主义支配，因而成为现实。”〔11〕

六十年代中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进行重组。由于国际劳动成本上扬，使中心国劳动密集工业产品失去市场竞争力。美日独占资本为了降低成本，以跨国企业的形式，利用现代交通、通讯和国际金融银行体制，纷纷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密集部分的生产程序，转移到超低工资的地区，进行资本的积累。这就带来一九六六年后美日资本大举进入台湾，使台湾加工出口工业化进程得以迅猛发展〔12〕，从而造成以美日独占资本为首的外来资本和高度威权主义政权的同盟所推动的经济发展。于是低工资的台湾、韩国和香港编入了战后新国际分工的低层，至七十年代，美、日和东亚低工资国家与地区之间，形成了类似台湾从日本进口设备、半成品，在台湾以超低工资进行加工，而后向美国出口的“三角贸易”垂直分工构造〔13〕。这新的国际分工不但造成台湾对美日市场、技术、资本、原料的依附，也使资本有机结构和技术结构停滞落后，使对美顺差和对日逆差相为因果，经济剩余过多流向日本。而低工资政策的强行，终使台湾农业凋零不起〔14〕。

在上述战后新的国际分工中，处于边陲的、包括台湾在内的“四小龙”，承受劳力密集、高耗能、低附加价值产品的生产以出口，而中心国则一仍保有高资本（技术）、高附加价值的产品的生产，中心/边陲不平等的分工，与旧殖民地时代无异。类此，以外部需要为动力的经济发展，在资金、技术及经验皆呈短缺的情况下，就不易发展出独立、成熟、自主的资本主义〔15〕，长期地难以摆脱“依赖性发展”的水平。这种

〔11〕 刘进庆，前揭书，页三五—。

〔12〕 段承璞，《台湾战后经济》，页三，人间出版社，一九九二。

〔13〕 隅古三喜男、刘进庆、涂照彦共著，《台湾之经济》，页四八一—四九，人间出版社，一九九三。

〔14〕 段承璞，前揭书，页一二八。

〔15〕 同上书，页一二八—一二九。

情况，在台湾的七十年代尤为真实。

著名的台湾经济史学者刘进庆，早在一九六五年就直截了当地以实证的研究得出这结论：美援经济的本质在于美国独占资本培育其在台湾的买办性资本（即“官商资本”）。而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以这买办性官商资本为基础，美国独占资本大举侵入台湾，以合办企业、外资企业的形式在台湾展开。至此，台湾社会形态的性质——新殖民地·边陲资本主义的性质便一览无遗了。

物质的、经济的依附化，带来政治、意识形态的扈从化。台湾在政治上对美扈从，即使在双方没有正式邦交的时代也依然如故。个中实况，不必辞费。而至于在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知识上的对美庸从，尤为显著。长年以来，通过人员交流、留美体制、人员培训、参访计划，台湾早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由美国养成的博士、硕士、专家和技术人才，安置在台湾社会各领域的“领导高地”，对台湾文化、价值、意识形态起到重要影响。在文学艺术上，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现代主义”、九十年代而大盛于台湾的后现代主义各论、后殖民主义等论述霸权的形成，可为佐证。而五十年代以降美日资本、设备、半成品、消费商品在台湾的登场，独霸了“现代性”的意义和表征，自然在民众中形成对美日资本、商品、人、思想及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倾向。

而黄春明在七十年代所写的三篇小说，离开上述台湾六十年代中期以至七十年代的具体社会和经济条件，就无法深入领会其中丰富的反省和批判的意涵。

黄春明对新殖民地性台湾社会与生活的批判视野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全世界有近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生活在西欧（和日本）的殖民地体制下。苏联成立后的二十年代开始，民族·民主运动在各被压迫民族中展开，并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茁壮。二战结束，前殖民地纷纷地在民族独立斗争中获胜，英国、法国在战后复辟旧殖民地主义的努力遭到失败，许多前殖民地宣告独立，西方前宗主国

的利益受到巨大损害。

为了防堵作为世界殖民地解放运动总根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蔓延；为了继续维护和延长前殖民地宗主国的帝国主义利益，帝国主义改变了策略，放弃了对殖民地直接、暴力的统治，支持自己培养出的殖民地时代土著菁英在独立后掌握政权，借以维持前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利益，世称“新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是政治、军事的直接统治，对殖民地进行经济垄断和收夺，强使殖民地承受对宗主国供应工业原料和食品，供应超廉劳力和作为宗主国工业制造倾销市场的分工体制；文化上强迫同化和渗透；殖民地被迫接受宗主国的价值、习俗和生活方式；并且被迫丧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意识与自信，并依照西方片面的现代性论，把自己装扮成殖民地菁英，成为宗主国殖民统治的代理者和共犯者。

在新殖民主义下，宗主国资产阶级无法完全控制新独立国家的国家机关，对前殖民地进行直接统治。但除此之外，通过新独立政权中的前殖民地菁英资产阶级，旧宗主国列强，经由垄断经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文化上的渗透，并借扩散西方价值、风俗、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造成新兴国家心灵的殖民化，瓦解土著民族的民族文化认同……这些都与传统殖民主义所造成的荼毒几无二致，从而引起战后的前殖民地知识分子对于西方以战后新殖民主义的形式延长其影响于后殖民时代的诸问题，进行深刻的反省。

然而，在七十年代的台湾，深受美国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交了白卷。但有一些文学家却以他们对生活敏锐的思维，在小说创作中进行了深入而丰富的反思。黄春明就是其中一位。

《莎哟娜啦·再见！》

台湾是日本的前殖民地。日本在二次大战中彻底战败而把割让的殖民地归还了中国。战后残破的日本，不像英、法那样力图重建其在前殖

民地的新殖民支配于台湾。代之而在冷战秩序中深入支配台湾者，是战后纵横东亚的新霸权美国。

韩战爆发后，美国极力复兴日本资本主义，俾为东亚反共的干城。而日本在战后也死心塌地地扈从美国的战略目标与利益，紧紧附从美国的政治外交路线，以大陆为日本的假想敌，遵从美国意旨，在日台旧金山和约中拒不明言将台澎明确归还中国。而如上文指出，早在一九五〇年开始，日台在美国中介之下，恢复了台日间的殖民地性质贸易关系。六十年代中后，在新国际分工下，日本资本、设备、半成品长期对台高顺差输出，从而结构性地巨额收夺了台湾的对美顺差。于是而日本资本、商品、商社和商人，沿着旧殖民地时代的人脉和历史因缘，向台湾渗透。因此，战后二十五年重登台湾的日本商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还是把台湾看成他们的殖民地”^[16]，而且在台湾商场“趾高气扬”，如同“在他们的殖民地上昂首阔步”^[17]，自有原因。

黄春明所描写的这些日本商人，对于前殖民地台湾抱持着殖民者中心的偏见和歧见。如果萨衣德以“东方主义”说明西方对中、近东前殖民地根深蒂固的偏见，那么日本人对其前殖民地台湾也抱持“南方主义”的偏见。日本以“南方”称台湾和东南亚诸殖民地，殖民地作家西川满等以椰树、芭蕉、妈祖、艺姐、土著女性等殖民地异国情调和性想象，掺和着“缺乏日本精神”、“体臭”、“操粗鲁的台湾话”、“嗜吃豕肉”、“使用充满文法错误的日语”这些极端鄙视的定见。黄春明小说中的日本人马场，对从农村到礁溪卖身的“很俗气”（皮肤晒黑，小腿上有蚊蚋咬过的疤）的台湾妓女发动色情的想象^[18]；对于可以在花莲狮嫫台湾原住民妓女，感到兴奋^[19]。西方涉及描写东方殖民地的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中，对殖民地妇女、妓女、舞娘的肤色、神秘、野俗和逸淫的描写和想象，充满了白人中心的歧视和偏见。在“东方主义”、“后殖

[16] 黄春明，前揭书，页三七。

[17] 黄春明，同注〔16〕。

[18] 黄春明，前揭书，页四十。

[19] 黄春明，前揭书，页五三。

民主义”批评还没有在台湾读书界流行的七十年代，作家黄春明早就以小说的形式提出了台湾社会中日本新殖民地的文化、种族歧见，而加以批判。

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文学中往往以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出现，而以男性对女性的狎淫和压迫呈现殖民地的压迫与剥削的复杂关系。小说中的“千人斩俱乐部”，形象地、批判地描写了日本新殖民主义在其旧殖民地地区的复权。随着六十年代中后新的国际分工展开，日本独占资本以贷款、投资、赔偿、援助的名目，在美国的庇护下，深入韩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等四十年代日军占领区。于是“日本人放弃枪杆，却改用杀人不见血的经济侵略”^[20]行动，随着日本跨国公司、技术合作、贸易商社在前殖民地的扩张，日本商贸人员和观光客在贪欲地狎淫前占领地的女体中，宣泄新殖民主义的种族优越和君临支配的意识。而以剑谈喻殖民者的男根，以“千人斩”引起日本旧帝国军人在辽阔的亚洲大陆疯狂屠杀的历史纪录，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丰富的象征，诙谐中增强了痛苦的批判。

殖民统治为宗主国独占资本主义的利益，在殖民地进行一定的社会构造变革。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殖民者在殖民地开展有种族歧视、有学科限制、有教学体制差别的现代教育，培养土著现代知识菁英，为殖民制度服务。历史地看来，土著知识菁英有三条道路：一是彻底同化而背弃同胞，憎恶自己的民族，对殖民者百般输诚谄笑；第二种则因殖民者的教育而觉悟，矢志抵抗殖民主义的现代论，为自己的解放，寻求另类的民族解放、自力更生的现代性。第三种，也是人数上居大多数的人，逡巡于同化与抵抗之间，对殖民者面从腹背，在现实生活上委曲求全，但在内心隐秘的角落暗藏抵抗。这些人苦闷、矛盾、妥协、悲忿的处境和心灵，在日据时代的台湾小说中多所描写^[21]。

在新殖民主义时代，这些菁英知识分子，个别地见于新殖民地社会

[20] 黄春明，前揭书，页八〇。

[21] 例如赖和《赋子宴回来》和《棋盘边》，等。

的官、政、商界和高教教坛，不必细说；也见于贸易、企业的管理层，当然也见于涉外公司的中下级职员，如《莎哟娜啦·再见》的叙述者。这些新殖民地菁英的出路，大抵和旧殖民地菁英无异，或恭顺同化，或批判抵抗，又或者又妥协又不满。黄春明对新殖民地社会买办菁英小资产阶级有细致敏锐的观察，七十年代他所发表的三篇小说，就讨论了新殖民地小资产阶级买办知识分子的处境、思想和感情。

《莎哟娜啦·再见》中的第一人物叙述者“我”，属于上述的第三种。看来他是六、七十年代台湾中小企业贸易部门的中级职员。由于他熟谙日语，临时被公司指派充当日本客户带来的“观光买春”团队的淫媒。

这个临时差事带给“我”极大的困难和矛盾。

“我”和另外一类留学美日，语言、思维、生活习惯上和美国或日本人更能水乳交融，在企业中地位更高，薪俸更优渥的一层不同。“我”的生活一贯不安定，多次改变工作和职场，妻儿饱受他失业、经济窘困之苦。来到目前的公司，算是初步得了温饱^[22]。

在另一方面，由于“我”所处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不属于更高层、积极与殖民者（日、美资本的意志和意识形态）同化的菁英，因此还保有强烈而坚定的我族认同。他对日本人有基于“一个中国人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所引发的批判态度。在个人体验上，这个“我”有一个在殖民地时代被日本人殴打致残的祖父；有一个素所敬仰、思想上“抗日爱国”的历史老师，也有阅读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画报而悲忿不已的经验。

这样的“我”，竟而受命充当殖民者的淫媒，和现实上无力忿然拒绝这可耻的差事，使自己和妻儿重蹈失业、不安和饥饿之苦的情境，产生尖锐的矛盾，而形成某种紧张和动力，推动着小说的发展。

民族自尊和迫于生活而充当淫媒的矛盾，至礁溪的场景达到高潮。让日本人挑选同胞妓女，为嫖客与妓女间的调情充当舌人；为夜渡花资

[22] 黄春明，前揭书，页一九一二〇。

协商……这些具体行为，都对“我”的民族自尊造成沉重的伤害。和殖民者同化，协助殖民者残害被殖民者同胞，就是对同胞的拒绝、剥离和背叛。因此当“我”知道了旅馆女侍的女儿竟是“我”当教员时代对自己崇敬有加的女学生，“我”的羞耻、惶恐、犯罪感更加沉重。“我”虽然以诓骗日本人的手段为妓女多争取了花资，为妓女分到更多的玻璃丝袜，借以近于自欺地缓解对自己的憎恨和羞耻意识，但最终也只能借酒烂醉，避过思想和良心的苛究。

日本人集体狎淫台湾妇女，是日台间新殖民地剥削关系尖锐的文学形象。而“我”的处境，也形象地表现了新殖民地底层小资产阶级买办性知识分子的苦涩和矛盾。

当然，黄春明也让这个“我”抓住了机会，做出了反击。在奔向花莲的火车上，他利用日本人不懂汉语，而青年学生又不谙日语的情境，向日本人提出战争责任的痛切的诘问，又向那个对日本的现代论怀抱着艳羡的青年，提出了辛辣的批评，对新的殖民者揭发五十年不曾解决的战争责任，对小小年纪就遭到殖民者的价值所伤害的心智发出启蒙的怒声，晓以意识和心灵的去殖民化的重要。

《小寡妇》

写在一九七四年的《小寡妇》中，也有一个买办菁英知识分子马善行。马善行“大学毕业后到美国读市场学和旅馆经营”，“在美国有四、五年”行销和管理的“实际工作经验”^[23]。马善行满口英文，喝不加糖的咖啡。他是七十年代以来台湾商界尤其是在台外资的宠儿——美国留学回来的“工商管理硕士”（MBA），满脑子都是经营、行销管理的教条。他把面向来台“找乐”（美军当局把越战美军休假到台湾找女人发泄性欲的制度性行为称为“找乐子”，即 Recreation）的越战美军开设院（酒吧）当老鸨，正经八百地当作一种产业，以西方行销理论，将同

[23] 黄春明，前揭书，页九一。

胞妓女当作物质商品，做起了生意。他以资本主义管理知识，去分析市场现况（美国反战运动使越战美军心灵空虚^[24]），分析目标顾客的心理（用钱买酒和女人填补空虚^[25]），为商品创名（以“小寡妇”替换一般的西洋式店名^[26]），为商品定位和包装（利用美国大兵“东方主义”的偏见和想象，把酒吧女装扮成东方小寡妇^[27]），搞模糊推销（教几个洋人朋友在开张前来酒吧，测验销售效果^[28]）。借此，黄春明对类若马善行之流迷信行销企划的新殖民经济下的买办知识分子，极尽讽刺的能事。

黄春明以大量的篇幅，表现了新殖民地买办菁英的“自我东方主义”（self-orientalism）^[29]，即被殖民者（依靠、接受）利用西方或殖民者对自己的“东方论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偏好的想象或论述），塑造自己，在西方世界中立足。但马善行以白人偏见眼中的东方，装扮旗下的妓女，毕竟不能与“脱亚入欧”的日本，与西方共创“东方日本”的形象以“自我东方主义”而求自立于西方者，同日而语。

马善行以“中国寡妇”的“异国情调”“吸引外国人（嫖客）”^[30]，让妓女穿着清末民初仕女的头行^[31]、带上假发、脚穿绣花鞋、窝肢里塞着一条香绢^[32]，要“外表像冰山”似的冷，“里面像火山”似的热^[33]，要和洋嫖客大谈中国妇女缠足历史、谈贞节牌坊和处女膜崇拜，大谈金

[24] 黄春明，前揭书，页九二。

[25] 黄春明，前揭书，页九三。

[26] 黄春明，前揭书，页九六。

[27] 黄春明，前揭书，页九九等。

[28] 黄春明，前揭书，页一一七等。

[29] 岩渊功一，《共犯的异国情调：日本与它的他者》，李梅侣等译，收《解殖与民族主义》，页一九四，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文化/社会研究译丛编委会，一九九八。

[30] 黄春明，前揭书，页九九一一〇〇。

[31] 黄春明，前揭书，页一〇九。

[32] 黄春明，前揭书，页一一一。

[33] 黄春明，前揭书，页一一三。

瓶梅、素女经上的床功^[34]……买办知识分子把这些西方对于中国女性和文化腐败、下流、充满民族偏见的想象加以夸大和固定化，借以求财、出卖同胞的灵肉。和《莎哟娜啦·再见》中的“我”相较，马善行就显得完全没有批判意识，为了挣钱，不但不惜有“理论”、有“知识”地出卖妇女同胞的灵肉，从而有意识地成为西方对中国东方主义论述的帮凶。

此外，黄春明以文学的形象的思维，批判了美国侵越战争。

前文说过，二次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西方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利益遭受到严重损失，英国和法国都在战后企图重返旧殖民地，却遭到坚强抵抗而失败。法国在战后重返越南，遭到越南人民坚强的反抗，在五十年代奠边府一役打败了法国。为了围堵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了维护西方在越南的殖民主义利益，美国在六十年代武装介入越南内战。当“一九六八年，美国总统詹森，叫驻（南）越美军的人员创了最高纪录，高达五十多万人”，“台湾被美军当局增列为美军远东地区的休假中心”^[35]——面向美军的妓女供应基地。

美军以强大的现代化武器，陷身于为自己民族的解放而战的、越南的人民战争的泥沼中。黄春明写一个在越南的人民战争中草木皆兵的拉锯战环境下一度狂乱、罹患精神性阳痿的美军路易，透过他的受伤的心灵，揭发美军在越南对平民的强奸和滥杀^[36]；透过少不更事的比利和汤姆的醉酒谰语，揭露越战战场上美军对越南平民恣意的屠杀，而且以杀人数目向酒女们炫耀^[37]。

美国侵越战争的不正义性，激起美国青年、市民的反弹和平运动。侵略战争使美国社会在和战问题上分裂。酒精使年轻的汤姆想起了他在“旧金山预备营”时，为了执行警卫任务，开枪打死了反战派的嬉皮好友荷西的往事。黄春明以鲜明生动的形象，对美国战争机器的国家伦

[34] 黄春明，前揭书，页一四二。

[35] 黄春明，前揭书，页八五。

[36] 黄春明，前揭书，页一五三。

[37] 黄春明，前揭书，页一八六——一八七。

理迫使人在白日下杀死好友的悖理，提出了控诉。

而描写美军滥杀越南平民和汤姆在荒谬的国家伦理下杀人的这几页，在叙述、描写、对话上，优美、简捷、生动，感人至极，是黄春明作品中最好的部分之一。

故事的结束，是被国家战争机器拨弄、在战场上失臂致残、九死一生的比利，和沦落在烟花酒馆的妓女菲菲之间，两个受尽权力与社会践踏的弱小者真爱的结合，发出了人的微小的胜利和不可稍悔的抗议。

越战以美国的败北，印支半岛的统一，在一九七〇年初结束。终整个六十年代到越战结束，台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冷战意识形态支配下，对越战始终抱着类似“美国为保卫越南的民主自由制度与生活方式而战”的看法。世界性反越战，反美帝国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的文化和知识风潮，在台湾知识、思想界毫无反应。另一方面，批评越战，在当时的台湾政治上是危险的。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春明的《小寡妇》在政治和思想上的重要性（以文学形式优秀地表现出来的政治与思想重要性），至为明显。

《我爱玛莉》

黄春明发表《我爱玛莉》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一九七七年九月，著名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进入高峰期。远的不说，彭歌恶名昭著的《不谈人性，何来文学》就发表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七日到十九日，余光中抛向乡土文学的血滴子《狼来了！》发表在八月二十日。胡秋原先生批评彭、余的文章《谈“人性”与“乡土”之类》，发表于九月号《中华杂志》；王拓反驳彭歌的文章《拥抱健康的大地》发表于九月十日到十二日的《联合报》副刊。在论战中，乡土派认为台湾经济是殖民地经济的主张，被彭歌等人当作小辫子揪着猛打棍子。而黄春明则以文学的形式，狠狠地讽刺了新殖民地政治经济关系中台湾买办阶级知识分子的荒谬与丑恶。

在殖民体制下，被殖民者，特别是受到殖民者片面的现代性蛊惑的

殖民地菁英，亟思同化于殖民者来改变自己卑下的处境。用弗·范农的话说，就是要在自己黑色的脸上戴上殖民主子白色的面具。他们全心全力学习和模仿殖民者，而在模仿的过程中，急切地否定、拒绝、唾弃自己的种性、文化和传统，以背弃和否定自己，全心倾慕、谄媚和崇拜殖民者，否定真实的自我。

这些试图以改变自己的肤色（在对黑种民族存在着现实歧视的美国社会，日常中就有黑种儿童拼命想用肥皂洗白自己的肤色，想办法把卷曲的头发拉直的事）改变命运的被殖民菁英阶级，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知识系统和意识形态上唯西方殖民者的马首是瞻，以殖民者的是非、善恶、美丑为自己的是非、善恶与美丑，终于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为落后、丑陋和羞耻。到了最后，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民族、家族和自己民族、家族所由立的本民族一切传统、文化都使他憎厌，无法忍受。在四十年代的台湾，由周金波、陈火泉所写的“皇民文学”，就吐露了殖民地菁英疯狂的同化于殖民者的、尖锐的嘶喊。

然而，归根究柢，用尽全力离弃和憎恶自己的父祖和同胞，希望受到殖民者完全的接纳的营为，历史地看来，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焦虑谄笑的奉承以求乞同化，反而遭来殖民者的更深的鄙视、不齿、厌烦与不安。被殖民者向往同化于殖民者，背弃自己的同胞，但自己的同胞也以敬远和不齿回报，而最后那同化之门依旧冷峻、倨傲地紧紧关闭，殖民地买办菁英乃陷于众叛亲离的孤独。

旧殖民地菁英如此，改变策略后的新殖民地诸关系下的菁英资产阶级又何尝不如此？《我爱玛莉》以生动的形象说明了台湾买办阶级的处境。

《我爱玛莉》中的陈顺德，洋名“大卫·陈”，就职于某“台北的外国机构”。随着六十年代以降到外国留学，或在台湾的外国机构、（跨国）公司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台湾菁英知识分子取洋名就蔚为风潮，致习而为常。这使人漠然地想起日据殖民地时期四十年代的“创氏改名”（“改姓名”）运动。黄春明在陈顺德改洋名的问题上，做了诙谐辛辣的

文章^[38]。

把自民族和家族的名字改为殖民者式的名字，当然是同化的象征。但在汉语汉文环境中，David 讹为“大卫”甚至“大胃”。现在流行一时的“后殖民”论述指出，被殖民者在“复制”殖民者的文化、语言时，往往掺入土著文化的“异质”，使殖民者文化走样变质^[39]，其此之谓乎！然而“改姓名”确实使陈顺德忘乎所以，丧失自己的认同。被殖民者被迫用殖民者的语言（名字）表述自己的身份、历史、传统和文化时，被殖民者终致丧失了表述自己独立主体和历史的意识。当别人在生活中以“陈顺德”招呼他，竟已回不过神来。“通常第一声是听不见，第二声的时候他会在心里想一下，第三声，他会因厌烦而焦急，但仍然装着听不见。”^[40]终于，他会神情不悦地说，同他叫“陈顺德”的人太多了，“好久就没有人叫我陈顺德，（都）叫我大卫。”^[41]

黄春明写到，自从改用洋名字，陈顺德“脱胎换骨”，“着实地扎根在”洋机关“工作环境里了”。但这彻底的同化并没有使他获得洋老板真正的欢心。洋人只觉得这个标准买办好使，“有多角性利用价值在”^[42]。卫门夫妇在私底下始终以猪狗指谓陈顺德^[43]，并且丝毫不忌讳对陈顺德的嫌恶^[44]。殖民者和力求同化的被殖民者之间，毕竟存在着无法填平的鸿沟。

在黄春明的笔下，陈顺德是典型的洋奴买办。他极尽奴颜媚骨之能事，其目的在使“生活往上跳升”^[45]，即进一步使生活更加美国化。他梦想在台北外侨住宅区天母拥有自己的房子；开着一辆二手欧洲轿车。

[38] 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一五一二一八。

[39] 张京媛，《前言》，《后殖民理论与文化认同》，王德威主编，张京媛编，页一七，麦田出版公司，台北，一九九五。

[40] 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一六。

[41] 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一六。

[42] 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一七。

[43] 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三三。

[44] 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二五。

[45] 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三八。

他处心积虑要把即将调回国的洋老板家的洋狗接回家里养，想象着有一天他像在台北的洋人那样，带着狗开着轿车，让洋狗玛莉在车窗外伸出半个头，招摇穿市。陈顺德留下老板的洋狗，还有一着棋，即一旦老板再调回台湾，洋狗玛莉就是他和洋老板间的黏着剂，继续巩固主仆关系。

黄春明创造了洋狗玛莉，使小说对新殖民地主义文化宰割的批判更显生动。在洋老板卫门家英语环境中养大的洋狗，只能在英语语音下做出反应。只能依殖民者的语言反应的一条狗，由于殖民与被殖民的客观上的主奴关系，使被殖民者的人，也不能不役于殖民者豢养的畜生。当玛莉情绪不稳，陈顺德必须使用英语轻声细语地抚慰它。作为家庭生活物资的供应者，陈顺德君临自己的妻小，妻子玉云对陈顺德尤为驯畏。但这样的陈顺德，却对象征着殖民者优越生活的“洋狗”玛莉曲意奉承，而陈顺德一家，对洋狗就尤为畏怖。

洋狗玛莉是陈顺德力求同化于殖民者的手段和进阶。陈顺德越是积极要求同化，就越是以玛莉的情绪、好恶、舒适与否为中心，而将妻儿的价值和地位视若无物。到头来，不是洋狗玛莉统治着包括陈顺德在内的一家人，而是殖民者的价值、生活方式和殖民者片面的现代性，竟而通过一条狗，役使和宰割着一群人。

在殖民地关系中，被殖民者被剥夺了自己的语言。而殖民者语言和文化的强权统治，使被殖民者噤声失语，无从形容对自己的表述和定位。不谙英语的玉云，时常遭到丈夫的嘲笑，玉云因为不谙殖民者的语言，莫说在洋人面前，即使在买办阶级丈夫陈顺德、甚至一条洋狗面前，也噤声失语，无法表述自己、界定自己。而所谓洋犬玛莉，其实不过是土洋杂交的半土狗罢了，殖民地关系使人变成奴隶，使人和畜生的价值颠倒。而这极端的矛盾和颠倒，终于使玉云觉悟，带着孩子离家出走。

新殖民地状况和后殖民地状况

黄春明发表在七十年代的上述三篇小说，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提出

了“东方（南方）主义”问题，提出了新殖民地底层菁英知识分子的矛盾、苦闷和抵抗；提出了“心灵的去殖民化”问题；提出了“自我东方主义”的共犯性问题；提出了被殖民者的企图之“改变自己肤色”——以积极同化来解决自己卑下的处境的问题；也提出了殖民地关系中被殖民者因殖民者语言文化的强权统治而失语噤声的问题。

在台湾，这些问题是今之显学“后殖民论”的重要议题，但是一直要等到九十年代，才由一些只会跟着西方学园的议题和本子说话的学者开始议论，但也似乎还没有人以后殖民论，结合台湾的具体条件，去论说春明的这几篇小说。实则，早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蓬勃于当时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早就有相应于运动的新殖民主义批判。范农、恩克鲁马、毛泽东、卡斯特罗……都对新殖民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支配做过深刻的分析。

但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台湾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界，对于当时以美国霸权为主的世界冷战秩序，一般地只高唱反共民主的赞歌。提出反殖民批判者，除了七十年代的乡土派的批评家，绝无仅有。但从台湾文学史来看，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一九六七年，陈映真发表了嘲讽紧跟着美国学园的议题学舌的台湾知识圈的《唐情的喜剧》；同年，发表批评越战的《六月里的玫瑰花》。一九七二年，黄春明发表《苹果的滋味》，写新殖民关系下都市贫民的悲喜剧；一九七三年，黄春明发表《莎哟娜拉·再见》，同年，王禎和发表《小林来台北》，写来自一个贫困乡下、一头钻进一家跨国性航空公司的青年的眼睛所看到的假洋人的世界。一九七四年，黄春明发表《小寡妇》；七七年，发表《我爱玛莉》。一九七八年，陈映真发表《贺大哥》，继续诊察美国侵越战争的精神病灶。同年和次年，发表探索台湾跨国企业下的人和文化处境的《夜行货车》和《云》。一九八一年，王禎和发表尖锐批判台湾新殖民地菁英知识分子的《美人图》。一九八二年，陈映真发表批评跨国企业公司的《万商帝君》。一九八四年，王禎和发表《玫瑰玫瑰我爱你》，和黄春明前此十年发表的《小寡妇》异曲同工地批判了台湾买办性菁英知识分子出卖灵魂的历程。

这是个文学创作所呈现的思想超前于同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政治思维的时代。文学家从具体的社会生活的实践，即具体、客观的新殖民地社会生活中认识了新殖民地诸关系的本质。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却在新殖民主义西方的文化、知识、论述和意识形态中酣睡，在一时的冷战和内战意识形态中，脱离生活，喁喁独语。

今天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基本上是揭发西方（北方）怎样通过其知识、文化、语言和论述体系控制东方（南方），维持西方的知识和文化霸权，持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殖民主义的议论。但是后殖民批评对具体的、至今活生生存在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性质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构造了无兴趣。而台湾的追随者更是如此。他们对台湾经济史、社会史毫无知识；对战后台资本主义依附的·半边陞化的过程也缺乏兴趣。他们对殖民主义或殖民地社会的社会科学界的定也没有起码的认识。

因此，有不少的学者凭空想象着一个自古就独立存在、一个自古就生养盈岛的“台湾人民”，在历史上受到荷兰、明郑、清朝、日本跟（国民党）中国的“殖民统治”。

但他们不知道荷兰人据台前历代来台打渔生活的少数汉人外，一六四〇年迄一六六一年间，荷兰人在中国东南沿岸招徕前后合计只有三万人上下的贫困农民来台垦殖。当时汉人基本上也还不曾形成稳定、定居的社会。在荷兰人官书上，这些农民称为“中国人”，只有当时在荷人治下的六万余原住民（总数约十二万），才登录为荷兰“国民”。被荷兰人殖民统治的今日意义上的“台湾人民”，在当时并不存在，荷兰统治的是在台湾的中国贫困农民。

明郑据台，台湾初有豪族封建土地关系，立典章制度，施文教，在台汉人的社会初初形成。但明郑在台二十一年间，至郑氏政权末年，汉族人口多达十万余人。这当然主要是郑氏军队、豪族、部将和相继渡台的大陆移民造成移民性人口增长。明郑并不是对既有“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而是对于它自己带来的大陆汉族移民进行以“郑氏皇族→文武官僚、部曲、宗室、地主士绅、海商→军垦佃农、佃农、渔夫、手工业者、雇工和原住民”为阶级构造的豪族封建性的阶级统治。

从一六八三年到一八一〇年的清代前期，台湾的人口快速增长到近一百九十万人，这快速而年龄、性别构造不平均的人口增长，当然也是移民性人口增长，是以大陆“中国人”移民形成的社会。清代台湾一直是汉族拓殖的社会，不存在异民族间的“殖民统治”。鸦片战争后，台湾进入定居型社会，却与中国社会同时沦为西方现代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性和中国半封建社会。而台湾社会同全中国一样，受到清王朝半封建社会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的统治。

马关割台后，台湾在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总过程中被割让而沦为现代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殆无疑议。但光复后的台湾，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〇年间，因复归旧中国而社会性质一变，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部分。一九五〇年以后，因为在世界冷战体制下，在“对美援及对日贸易的依赖关系发展构造性定型过程中，台湾经济也必然地确立了对美日依赖体制。而此一依赖，与冷战体制下的军事、政治依赖同时决定性地影响了台湾的政治经济。同时美日对台湾‘新殖民地主义支配’也因而成为现实”^[46]。正如本文开端的政治经济分析所扼要指出的那样，“新殖民地，边陲资本主义”性质的台湾社会的外来支配者，从社会科学上看，不是国民党政权，而是美日独占资本。“国府”充其量也无非是美日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罢了。

其次，还要简单地说一说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有前资本主义时代扩大疆土、在政治上直接统治，经济上敛收苛税的收夺的古典的封建殖民主义，元帝国对外族的征伐类之。但殖民主义主要的是指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主义，这又分十六、七世纪重商主义时代以资源和劳动的掠夺与贸易为主的“旧式殖民主义”，和十九世纪中叶后由独占化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对外输出资本，占夺殖民地，取其原料，倾销其工业产品的“现代殖民主义”。二战以后有新式帝国主义，前文已见分析。另有学者为了区分前资本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主义，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两种殖民主义通称“帝国主义”，而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新的帝国

[46] 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页三五〇—三五二。

主义，称为“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

准此，前资本主义漫长封建社会阶段的中国对台湾拓殖，不存在“殖民统治”问题，但当然不能否认对台湾原住民原始社会而言，确实存在着汉族对原住民施加“殖民统治”的问题。如何清理这民族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一直是严肃的课题。明代中后，中国东南沿海也存在过幼稚期的海上武装贸易集团。但在老大、封建土地资本厚实的中国社会，远远尚未形成强大的贸易商人资产阶级，在王室支持下，发展海上舰队，对外扩张，掠夺资源奇货和奴隶劳动，建立商业资本的庞大帝国。而终清朝之世，中国是一个晚期封建社会，在鸦片战争后为帝国主义豆剖瓜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经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东渡台湾的“国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残余的武装集团，根本谈不上“独占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对台湾“殖民统治”。至于一九五〇年后台湾新殖民主义的支配者是独占资本，已见前论。说到中国大陆，在社会性质上，自称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单就眼前而言，资本是从台湾向大陆输出，而不是相反；经济剩余是从大陆大量流向台湾，而不是相反的。“明郑、清朝、中国对台殖民论”的虚构，可见其荒谬乃尔！

从这错误的历史认识和政治经济学上的误谬出发，有一些学者生硬套用后殖民论的教条，强调“台湾文化自古以来成跨文化杂烩特质”，并且把中国普通话和闽南系、客家系语言对立起来，主张“为了真正摆脱被殖民梦魇”，建立“柔和的国语、福佬话、日语、英语、客家话及其他所有流行于台湾社会的语文”^[47]……

荷兰治国，只以台南及周近点状地点为基地，统治台湾只有三十八年左右。其间，荷人开医院、设小学教荷语、强制传布基督教，有全村全部落归教者。但荷人离开后，一切烟消云散，令人甚至很难找到荷据时基督教传布及荷兰文化的痕迹，至于荷语在台湾话中的残留，尤无痕

[47] 例如邱贵芬，《“发现台湾”——建构台湾后殖民论述》，收〔39〕所揭书，页一六九——一七七。

迹。日人治台五十年，只有最近因政治上的特殊倾向，皇民一代一时在政治、社会上抬头，一时在反华脱华运动中还魂。台湾说写英语的人口，在总人口比率微乎其微，谈不上深入台湾文化、语言的肌里，人所共知。但从全体论，台湾的殖民文化影响，较之被殖民化长达一、两百、三百多年的中近东、南亚、中南美社会留着西方语言、文化残余者，不可同日而语。所谓福佬语、客家语，皆为中国的中古汉语，它不但同属汉语，不但在台湾活着，还在我国闽、粤两省，在东南亚和北美华人社会中继续使用，但在历史悠久、文化厚实的中国文字以普通话为中心的统—性上共存。让台湾社会与因殖民者异族语言、文化长达数世纪的统治，方言杂多，没有机会建设民族共同语言的其他第三世界“后殖民社会”（postcolonial society，但其“后殖民”概念与“东方主义”论者不完全是一个概念）相提并论，就不免于错误百出。

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在台湾新殖民地、边陲资本主义的社会诸关系中，作为生活实践，表现了台湾社会的生活中存在的矛盾与本质——新殖民主义，边陲资本主义的矛盾与本质，以形象的思维，杰出的小说艺术形式，表现了出来，弥补了同一时期只顾沉浸在冷战中、保守自由主义思维中哲学、社会科学、文艺批评界的空白。在这一方面，小说家黄春明做出了思想上重要、艺术上杰出的贡献。

今日在台湾的半生不熟的后殖民论，遮蔽了台湾社会史中的殖民化历程的本质，湮灭了当前美日新殖民主义对台湾社会的支配构造及其所造成的重大矛盾。而没有台湾社会经济史论、没有新殖民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台湾战后资本主义性质论的台湾当前的后殖民批评本身的后殖民性，则等待着深入的分析和批评。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第三辑 | 分离主义的盲点

“乡土文学”的盲点*

最近拜读了叶石涛先生的一篇力作：《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深觉得这篇文章是近两年间出现的、自五十年代以来已不得一见的、运用了新的历史科学以讨论文学的好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叶先生指出台湾由于它的地理的、历史的条件，在精神生活上，自有台湾的特点，同时也有中国的一般性格；叶先生也从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台湾社会经济史上，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一直是在台湾的中国人民现实生活上最大的压迫。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一直是过去台湾作家最当关注的焦点。叶先生也从而指出历史上“台湾文学”之现实主义的传统——有别于堕落的、为写实而写实的自然主义——应是具备明显的改革意识的现实主义，以及具备类如巴尔扎克作品的、带有强大的、自发的、倾向性的现实主义。

但是，文章里有一个重要的论题，即作者对于“台湾乡土文学”一辞，尚没有十分明确的界定。从“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的篇名去看，令人有一个印象，即台湾还有别的文学，例如“民俗文学”、“城市文学”等等，而作者是为其中特定的范畴内的文学——“乡土文学”写史，从而序之。可是就导论的内容去看，作者把从郁永河到吴浊流之间的，即四十年代以前的台湾重要的文学作家和作品都包罗进去，其实便是一部近·现代的、在台湾的中国文学的历史。那么，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史”，其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史”。至少，就叶先生看来，一九

* 本文刊于《台湾文艺》(台湾)革新二期，一九七七年六月，署名许南村。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十一·中国结》(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

四五十年以前的台湾的文学，是“乡土文学”吧。

台湾的新文学所发生的社会环境，是一个殖民地、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成和发展阶段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方面是旧式封建的土地关系趋向终结，一方面是半封建的、小农的土地关系和日本现代化垄断资本同时并存。日本在台湾的垄断资本，以糖业资本为主要。制糖工业和农业有深刻的关联。当时台湾农民的三分之一，就是为日本制糖会社提供剩余劳动的蔗农。其他的工业，能集结工人达五百名以上的工厂，几乎没有，而且大多和农业生产部门，有紧密的关系。因之，农村和农民，便成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下台湾社会物质的——从而人的——矛盾之焦点。叶先生所说，日治时代台湾作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农村和农民，便正好反映了这一个具体的现实。

那么，如果日治时代的台湾的文学家，大都以农村和农民为创作题材，并不是出于当时的作家主观喜好，而是出于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的具体条件下的文学任务。如果叶先生是以日本殖民时代的台湾的文学，有农村、农民的特点，而据以称台湾的文学为“乡土文学”恐怕不能表现出“乡土”以上的、更具实质性的东西吧。

“乡土文学”一辞，沿用已有数十年，如果从连雅堂算起，已有五十多年了。近来，文学思想界正在对于“乡土文学”的意含，展开厘清的工作。钟肇政在去年说：“……没有所谓‘乡土文学’”。他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乡土的，……因为一个作家必须有一个立脚点，这个立脚点就是他的乡土”。倘然有人以“乡下的”、“很土的”眼光去看，钟先生就“不能赞同”了。另外，石家驹以为，“乡土文学”在取材于农村的时候，“反映了尚未完全被外来文化吞食的、或者正在向广大农村地带伸展巨爪的外来文化，作着痛苦的……抵抗的农村中人的困境……”但是他却认为在“反省、考察和逼视‘落后’地区中的人，在泛滥而来的外来强势的、支配的社会底、经济底冲击下的处境”这个主题上，“乡土文学”和“其他成长于整个六十年代的许多杰出的台湾年轻文学家的文学主题，有共同的地方”。那么，就在这个“共同的地方”，“乡土文学”便消失了它的独特性。

王拓把“乡土文学”和二十多年来台湾的“西化文学”对比起来看。相对于“西化文学”之没有民族风格，脱离台湾的具体社会生活、文学语言和形式的西方化，乡土文学表现了中国的民族情感，表现了台湾具体的社会生活，并且从民众所广泛使用的语言中，求取语言丰富的宝藏。王拓并且进一步把乡土文学和其所产生的时代，即六十年代末期以至七十年代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的条件，联系起来理解，从而扩大地视为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

是的。放眼望去，在十九世纪资本帝国主义所侵袭的各弱小民族的土地上，一切抵抗的文学，莫不带有各别民族的特点，而且由于反映了这些农业的殖民地之社会现实条件，也莫不以农村中的经济底、人底问题，作为关切和抵抗的焦点。“台湾”“乡土文学”的个性，便在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学的个性中消失，而在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个性中，统一在中国近代文学之中，成为它光辉的，不可切割的一环。台湾的新文学，受影响于和中国五四启蒙运动有密切关联的白话文学运动，并且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有着绵密的关系；也是以中国为民族归属之取向的政治、文化、社会运动的一环。抵抗时代的台湾文学之中国的特点，应该也是叶先生所关切的，但却令人觉得在这篇优秀的文章中着笔不力。

除非强调台湾抵抗时期文学之中国的特点，文中所提出的“台湾立场”的问题，就显得很暧昧而不易理解。

“台湾立场”的最起初的意义，毋宁只具有地理学的意义。它在近代的、统一的中国民族运动产生之前，相应于中国自给自足的、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经济条件，而普遍存在于中国各地。

然而在日本人占领台湾，使台湾社会变成一个完全的殖民地社会之后，“台湾立场”，有了政治学的意义。台湾的社会矛盾，和殖民地条件下的民族矛盾，互相统一。在社会经济上被榨取的当时台湾的农民、工人和市民阶级，在民族上绝大多数是在台湾的汉民族；而在社会经济上居于榨取和支配地位的资本家，在民族上又压倒性地是日本人。在被压迫者的一方，则以“台湾（人）立场”和“日本（人）立场”对立起来。

有过这样的立论：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之后，日本在台湾进行了台湾社会经济之资本主义改造。台湾从陷日前的半封建社会，进入日治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台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中，近代新都市兴起，而集结在这些新的近代都市中的，是一批和过去的、封建的台湾毫无联系的市民阶级。他们在感情上、思想上和农村的、封建的台湾的传统没有关系，从而也就与农村的、封建的台湾之源头——中国，脱离了关系。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市民阶级的文化，相应于日本帝国对台湾之资本主义改造过程；相应于这个过程中新近兴起的市民阶级而产生。于是一种新的意识——那就是所谓“台湾人意识”——产生了。立论者将它推演到所谓“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倡说台湾人虽然在民族学上是汉民族，但由于上述的原因，发展了分离自中国的、台湾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义”。

这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

让我们先看日治时代的台湾资本主义改造的实体。日本领台后地籍的整理，山林沼泽的国家管理，赋税的法律改革，土木工程的兴建，农产品——蓬莱米、甘蔗和番薯——的商品化改造；地主阶级纳入中央集权政府之下而打破其封建权力——即收夺了地主在地方上政治、法律和经济上独立的权力；制糖工业的日资垄断，农民的雇佣劳动者化……确实使台湾的社会进入了“不同”于同时代大陆中国的社会阶段。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一切变化的殖民地性格。基本上，日治时代台湾的资本主义化有一个上限，那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圈中，台湾必须以属于“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限制之下，而存在、发展。因之，在日治时代，台湾的工业一般地不十分发达，而且又一般地和农业生产部门分不开。例如当时最大的工业，即日资的制糖工业，工厂规模不大，而且离开广大的甘蔗生产部门，台湾的制糖企业是无由想象的。

再就当时台湾籍的资本家来说，据矢内原的研究，大都是从过去的封建土地资本转化而来。和土地资本无关的资本家，只有汉奸分子和股票投机分子。更重要的是，台湾籍的资本家只有分得利润之权，而无直

接经营和管理之权。

这样看来，在日治时代的台湾，是台湾的农村——而不是城市——经济在整个经济中起着重大作用。而农村，却正好是“中国意识”最顽强的根据地。再就城市来说，由于台湾籍资本家也同受日本殖民者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有反日的思想和行动。而这些城市中小资本家阶级所参与领导的抗日运动，在一般上，无不以中国人意识为民族解放的基础。这是只要熟悉日治时代台湾民族运动和文学运动的人所深刻理解的。因此，在这个阶段中的“台湾意识”，除了叶先生所不惮其烦地、坚定指出的“反帝、反封建”的现实内容之外，实在不容忽略了台湾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社会、政治和文学运动不可分割的、以中国为取向的民族主义的性质。如果叶先生的“台湾意识”论，是以台湾这一地区，在其殖民地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台湾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追求国家统一、民族自由的各种精神历程为内容，那么，它便首先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追求中国的独立和中华民族彻底的自由的运动中的一部分。只有从局部的观点看，在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层面上去看问题时，有反抗日本的、反抗和日本支配力量相结托的台湾内部封建势力的“台湾意识”；但从中国的全局去看，这“台湾意识”的基础，正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了。

也许叶先生的论文，是以台湾的文学之中国性格为一种“自明的”认识，而未着意加以申论。但笔者有鉴于国内外对于台湾的文学寄予日益深切的关怀，乃就读后的一点粗糙的感触，引申成文，盼望一切真诚关切台湾的文学的各界，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在荆棘中顽强地茁长、开花。近二十五年来，新一代台湾的中国文学作家，在暂时的受支配于倾销而来的美日文学之后，在最近开始了对殖民地时代台湾先辈作家之再评价和再认识的工作。先辈作家的历史责任感，他们和野蛮而黑暗的现实毅然对决的气魄；文学题材的社会性、民族性和现实性的传统，糅合新一代作家对中国语言和方言语言的较为熟练的把握，我们可以十分乐观的态度肯定台湾的文学必然会有更大的丰收，为整个中国文学贡献

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很不能理解叶先生对“新一代台湾乡土文学”作家的将来，何以抱持着那么语焉不详而又怵目惊心的悲观的态度了。

原乡的失落*

——试评《夹竹桃》

《夹竹桃》是钟理和在民国三十三年，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一年的作品。作品所描写的，是北京的一个大杂院里，像“是生长的硃瘠的砂砾间的，阴影下的杂草”的几家人的生活。但是，钟理和并不曾孤立地描写这个大杂院，他说：

这所院子，典型地代表着北京城的全部的院落。（《钟理和全集》卷①《夹竹桃》页一）

实际上，钟理和不止藉着这所大杂院写整个北京城，他实在是也藉以写当时整个的中国罢。这只要读到《夹竹桃》的后半，曾思勉和黎继荣议论中国需不需要法律和道德（页十二），议论所谓“历史的重担”沉重地压着中国，使中国宿命地无可逃于“贫穷一破灭”的命运（页五十七）云云，已不难明白。

在这个“比喻”的条件之下，钟理和以嘲讽、怨怼的语气，以台湾前行代作家中少见的洗练、精微的语言，描写了这个大杂院里悲惨、落后的生活：

这里洋溢着在人类社会上一切用丑恶与悲哀的言语所可表现出来的罪恶与悲惨……（页三）

他们是生长在硃瘠的砂砾间的，阴影下的杂草。他们得不到阳光的抚育，得不到雨露的滋养……（页十一）

* 本文刊于《现代文学》（台湾）复刊第一期，一九七七年八月，署名许南村。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九·鞭子和提灯》（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

他们如此在浓烟、尘土、不洁、贫血、缺乏、臭虫、昏暗、忍耐中过活……(页四十二)

具体地说，在这大杂院充满着不堪的贫困和道德的颓败——吸毒、自私、偷窃、幸灾乐祸、卖淫和懒惰。

如果这就是大杂院；就是当时的北京城；就是当时的中国，没有人应该对它的现实性有丝毫的怀疑。因为，这一切落后的悲惨的景况，一直到今天，还广泛地存在于被称为“落后国家”的广大地带。在印度次大陆，在巴基斯坦，在印尼，在中亚细亚，在古老而幽暗的非洲，在辽阔的中南美洲，到处都是贫困、饥饿、道德“败坏”、愚昧、迷信和疾病。而描写这贫困、这饥馑、这道德的“败坏”，这迷信和疾病的文字，素来也不少，不过似乎可以大别为三种。

头一种是帝国主义者。他以人种和文化上的优越意识，不惮其详地记载被他自己的民族所压服的民族的种种落后情况。类如英国诗人吉卜林的作品，是怎样地满足了伦敦高级社交圈中的仕女们对传奇的需求；满足了他们大英帝国的光荣意识，喟然而叹，说：“可怜的、野蛮的印度人，让我们把你们当做上帝课于白种人的负担，勇敢地背负教化的责任吧！”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论”，也大率类此。

第二种是殖民地丧失了自信的知识分子。在殖民者以枪炮压服，继之以“教化”之后，有些殖民地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在殖民者“光辉灿烂”的文明的照耀下，自己的民族不论在生活上、精神上，显得千疮百孔。他们始则羞愧，继则恼怒，再继则产生深重的劣等感。于是，他们也对祖国的落后，发出辛辣、毒恶的批评。在这个批评中，看不见他自己的民族的立场，从而拒绝和自己的民族认同。

在《夹竹桃》里，我们就看到这种令人疼痛的民族自我憎恶意识。在抒写大杂院里颓败残破的居住的条件之后，钟理和以嘲笑的口吻说道：

幸而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他们得天独厚地具备着人类凡有的美德：他们忍耐、知足、沉默。他们能够像野猪，住在他们那已昏暗、又肮脏、又潮湿的窝巢之中，是那么舒服，而且满足。

于是他们沾沾自喜，而美其名曰：像动物强韧的生活力啊！像野草坚忍的适应性啊！（页三）

钟理和也指责中国人的“自私”、“怕事”（页十四）、“懈怠”、“虚荣心”、“好面子”、“无理的嚣叫”（页十八—十九），仿佛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恶癖。在论及女性的时候，钟理和写道：

是幸是不幸，不知道，事实上这样的女人，要算中国最多。吝啬、自私、卑野、贪小便宜、好事、多嘴、吵骂……（页九）

钟理和并且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大杂院里的妇女对儿女的残暴，主妇间相互的偷窃、缺乏怜悯的心，为了极少的代价出卖身体……

在中国面临帝国主义鲸吞瓜分的时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也成篇累牍地吐露过他们对旧中国的失望、悲哀甚至愤怒。但这一切的悲愤，有一个下限，就是这悲愤源于对中国的深切而焦虑的爱；就是不丧失批评者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立场。但钟理和的批评，却似乎逾越了这个下限，对自己的民族完全地失去了信心，至于“深恶痛绝”起自己的民族。

曾思勉是从“南部故乡”（台湾？）来北京的人。他和另一个知识分子黎继荣，是这个大杂院里唯一理性的观察者。对于生活在贫困和悲惨的最低层的大杂院居民，曾思勉“对他们深恶痛绝。……他看见了宇宙间一切恶德的堆积；看见了滚转在生物的生存线上的人类的群体。他们恰如栖息在恶病菌中的一栏家畜，如果不发生奇迹，那么，他们的结果只有破灭，而从世间消逝了他们的种类”。（页十四）

尖刻的语言，有时正好表达作者最辛苦的爱。但，在这一段话里，我们感受不到一丝一毫作者对残破而黑暗的旧中国里的同胞的爱。

曾思勉对于中国人的知足和勤劳，视为与中国人的“无知、不洁与贫穷一样”值得惊异之事（页十七）。如果他恨的是中国人太知足，不知道起而反抗，从而改变他们的命运；如果他恨的是中国人只知道“像牛一样孜孜地劳动”（页十七），而不知争回自己的劳动成果，反抗别人的掠夺，那么，他对于中国和中华民族是怀抱着希望的。但钟理和似乎不是这样，因为：

他（按：即曾思勉）不由得对此民族（按即中国人）感到痛恨

与绝望。(页十六)

痛恨与绝望的顶点，使曾思勉开始深刻地感到自己与那些素来曾信以为是同胞的人们，发生了人种学上的疑惑：他发觉自己和“他们”有“截然不同的思考方法与生活观念”，并且发觉“他们”已“差不多丧失了道德的判断力与人性的美丽和光明”，从而“一变其向来的信仰与见解”。“他们对他们深恶而痛绝”。不仅是这样，“他几乎为他自己和他们的关系，已抱起绝大的疑惑。他常狐疑他们果是发祥于渭水盆地的，即是否和他流着同样的血、有着同样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历史与命运的人！”

钟理和在《原乡人》和其他作品中，曾清晰地表露了他对于中国的血缘的情感。但这种情感，在惊愕地发觉到祖国的落后之后，逐渐消失于视域中的盲点。《夹竹桃》中用了第三人称的多数总称“他们”，来把曾思勉隔离开来。曾思勉是个旁观的人。他虽则实际上生活在大杂院中，但他自始不曾涉入过。在认为“历史的重担”和“贫困”是中国无可抗拒的命运之后，曾思勉对黎继荣的“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做了这样的事不干己的回答：

“我的目的，只在说明事实罢了。至于他们须怎样才好这个问题，只好让他们自己去研究……”

曾思勉，这个旁观的、犬儒的、恹恹然欲自外于自己的民族和民族的命运的人，他所“说明”的“事实”，又是什么呢？

首先，他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民无法保障自己的生存。在极度的贫困下，人的生命仿佛蜉蝣。生死是他们最重要的，第一意义的事件。对于在饥寒、生存中挣扎的中国人，要适用法律和道德，是“可笑而无聊的”。(页十二)

因此，中国的要务，不在于研究和推行道德，而在于“怎样来维持我们的生命，并且怎样来排除能够威胁我们生命的障碍”。(页五十六)

旧中国的破产，来自帝国主义者的掠夺，和来自与帝国主义者相勾结，以鱼肉同胞的各种势力的摧残。要“保障中国人民的生活”，不使他们永远“劳碌于生死的歧途，死与饿”(页五十六)，只有起而战败帝国

主义者以及它在中国的仆从。

但在钟理和，中国的厄运，是不可改变的。任何努力，都不足以改变中国宿命地被诅咒了的命数。

“是的，（中国人是）命运的傀儡！”曾思勉不耐烦似的重复说。至此，他又回复了那冷冷的讽刺的语调：“他们在命运的圈子里走着，摸索着。他们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有时候相反地想逃开这个圈子，不管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总之，他们从很早就想挣脱它……，最近则有辛亥民族革命、五四运动、识字运动、对妇女的关心、农村解放、劳动保护、家庭制度的改革……等等。但是悠久的历史，使这个圈子扎得极度坚牢。……我们可以从现状看出他们挣扎的结果，所得的功绩与成就是那么的渺小。最明显的例子，则是，他们还饿着肚子。

“这样子，他们负着历史的重担，像网底游鱼。他们在这里或生或死，或哭或笑；后母虐待前妻的遗孀；秽水倒到邻院的门口；为两个窝窝头，母子无情，兄弟争执；窃盗、酗酒、吸毒、犯罪、游手好闲……。虐待者和被虐待者，即生者与死者，他们俱同样受着命运的播弄。何谓命运？拆开来说便是贫穷、无知、守旧、疾病、无秩序、没有住宅、不洁、缺乏安全可靠的医学、教育不发达、贪官污吏、奸商、鸦片、赌博、嫉视新制度和新的东西的心理……。这些，便是日日在蹂躏他们、践踏他们的铁蹄；是他们负的祖先所留下的遗产！”（页五十七）

原来中国人并不一直是懒惰、自私、不洁……，他们还想过“逃开这圈子”——“不管是意识或无意识的”。他们有过“辛亥的民族革命、五四运动、识字运动、对妇女的关心、农村解放、劳动保护、家庭制度的改革……等等”。但是，在曾思勉的眼中，这些都是徒然的挣扎！如果钟理和竟不能从“辛亥的革命、五四运动……”和“农村的解放……”看见它们在中国人民于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自求解放之历史过程中的意义，那么，他看不见这些运动所播下的种籽，如何在抗日战争中逐渐茁长、开花，汇成一股强大的新生中国的力量，也不足为奇了。中国

的“贫穷、无知、守旧、疾病、无秩序、没有住宅、不洁、缺乏安全可靠的医学、教育不发达、贪官污吏、奸商、鸦片、赌博、嫉视新制度和新东西的心理……”，对于钟理和，是上天以“历史的重担”、“祖先所遗留的遗产”的形式，课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万劫不复的咒诅和命运。地主阶级出身的，从一个殖民地——台湾——漂泊到另一个殖民地——“满洲”——的知识分子钟理和，浑然忘记了：在日本统治者的眼中，包括钟理和在内的台湾同胞，也是充满“贫穷、无知……”，乃至“嫉视新制度和新东西的心理”的可笑又复可憎的怪物。钟理和不幸地在贫病中倒下以后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台湾的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如今，我们常常可以听见从台湾到比较落后地区旅游回来的人，以轻蔑、鄙恶的语言，述说别的民族是怎样地“贫穷、无知……”，甚至也“嫉视新的制度和新的东西的心理”，仿佛他们一切的悲惨，无非是那个民族的下劣的禀性，那个民族所流血液的混恶卑下所致。

有“民族性”之说。说大和民族、日耳曼民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天生优越的民族，也就是说“支那”民族、马来民族、印欧民族、印第安人、黑种民族是天生下贱、劣等、“不洁”、“愚昧”的民族。然而，持此说的人们，似乎无视于那些“优秀”民族的国家中被孤立、被掩埋、被慢性化的贫困；由庞大的财团、军方和中产阶级所结成的“守旧”势力；无视于由类如“非美委员会”、“特高组”、“中央情报局”的顽强而凶狠的“嫉视新制度和新东西”的组织，不但抑压本国的新生力量，更透过国际性政治和经济的支配，粉碎和制压别的国家追寻民族自由、国家独立的运动；无视于类如洛克希德丑闻之类的国际规模的贪污和腐化；无视于国际性产业垄断、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对广大“劣等民族”国家的经济榨取等有组织的“奸商”行为；无视于企业化的“赌博”、“娼妓”、“毒品”事业……。至于“无知”、“疾病”、“无秩序”、“没有住宅”、“不洁”、“缺乏安全可靠的医学”，在“优秀民族”国家中的庞大贫民区、少数民族区、贫瘠的山区中，更是司空见惯的悲惨事实。

民族性之说，是支配者民族为了支配这个世界所炮制的最可恨的谎

言。它不但为“支配有理”创造理论的根据，更在被支配者民族中，造成“被支配有理”的劣等感，视自己的悲惨命运为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命运”。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有钱的人，就有教化，就看起来富豪、可敬……穷人就得不到教化，就肮脏、自暴自弃、愚昧、疾病、迷信、酗酒、赌博……于是有人说，富人之富决非偶然，因为富人是优秀的种类，无往而不富，是上帝所拣选以管理世上的财富。穷人之穷，也不是偶然，因为他们是根性卑下的种类，无往而不贫，注定要受役于富人……这种“一以贯之”的“支配有理”论，只有一个目的，即在于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民族的、社会的悲惨生活，来自一个不合理的制度，而这个不合理的制度，正是少数“优秀”的人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刻意制定的。

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三八年，钟理和生活在日治时代的台湾的一个地主之家。在这一时期的台湾，日本对台湾的资本主义改造已有了相当的成果。一个中央集权的殖民政治支配，透过殖民地官僚体制和警察系统，坚强地屹立于台湾。旧时代台湾的地主——封建势力基本上消灭。铁路、邮电、公共土木工程的完成，教育在一定范围内的普及，卫生设施的建设，蓬莱米的商品改造，都市的兴起，都为了建设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圈内一个殖民地资本社会所要求的“合理化”运动而臻于成立。台湾从一个前近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日本的统治，而转变成一个近代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成长的钟理和，便具有一个现代社会中的人的一些价值观。然而，殖民地的孩子，毕竟对传说中的“原乡”——祖国，怀着一份感伤的恋慕。他奔向东北沈阳，并不完全是为了反抗封建的残余影响对他追求自由的爱情的压迫，而也为了“……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

但是当他抵达初为殖民地的“满洲”，他从一个比较近代化、比较合理化的社会，进入一个前近代的、半封建的、甫为日本殖民地的中国东北，“原乡”的乌托邦幻灭了。中国的悲惨和落后，给予他至为沉重的打击——尽管“老太太”一家，一个工人的家族，给予他永难忘怀的温暖

和呵护（见《门》）。原乡人的血，原想在原乡求一个安居的归宿，却不料非但“停止了沸腾”，简直为之冰封霜结。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钟理和不曾了解到，如同台湾史学家戴国辉所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正值她由前近代的历史阶段，向着近代的历史阶段做着苦痛的冲刺的时代。在这一个时代中，充满着多次的革命和反革命；多次的侵略和反侵略。旧的、落后的中国，和新的、前进的中国，正在互相激荡、翻滚。一个新生的、近代的中国，正在和外来帝国主义、内在的旧势力做着最艰苦的搏斗。而钟理和所看见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天翻地覆、一片混淆的中国；是那正在承受迎接一个自由了的、独立了的民族和国家所必要的阵痛的中国。然而，在中国生活了六年的钟理和（以作品写成的民国三十三年计算），并没有在一片令人作棘心之痛的落后和悲惨的中国生活之内，看见隐藏在其中的中国的正体。于是他的单纯的，因“原乡人的血”而来的，单纯的民族感情幻灭了。他不知道，要认识这一个历史时代的中国，光凭感伤的热情，是注定要失望的。他必须对十九世纪以来，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世界弱小民族所共同面临的命运和问题，有理性的认识；他也必须弄清楚：在帝国主义者和国内旧势力结成坚固的阵线以鱼肉同胞的时代，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伙同国内的那些人，团结奋斗，取得胜利……

这里，就有了第三种描写自己祖国的残破，自己民族的落后的文学。对于这些残破和落后，它怀有同样或更深的痛恶，但它知道这一切残破和落后底根源。它以挚热的爱，和基于这爱而来的愤怒，揭发那残破和落后。它更明白地看见那正在涌现和壮大的、明白的、光明的、前进的中国的潜流。它具有积极介入、求革新、求实践的雄心大志……

然而，不幸地，钟理和没有或缺乏这些重要的认识。他在中国大陆所看见的是数百年来帝国主义和国内旧势力在中国所造成的可悲的落后和贫困。他对这一切的贫困“深恶痛绝”，以犬儒的、嘲弄的语言浴之以恶言。更进一步，他怀疑，甚至拒绝承认自己在民族、人种上和中国人有相同的地方。

在此，钟理和的民族认同，发生了深刻的危机。

但是，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特殊的案例。当殖民地的知识分子，被殖民者所给予的“现代”教育开启了智慧以后，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自己祖国的残破和落后，自己同胞的“贫困和无知……”于是有一部分人拼命地使用殖民者的语言，穿着殖民者的服饰，模仿殖民者的生活方式和一切的文化，鄙视和轻贱自己的同胞，一意要按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有多少人在国内、国外，表现出这种民族自我认同的失落。

钟理和的一生，代表着那个时代部分知识分子一生的历程。钟理和的民族感情，也是一定历史过程下的产物，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代表了在光复前后的一部分台湾省知识分子的整个痛苦的心灵的历程。在日人统治下，他们的“原乡人—中国人”意识尚有一个归托。原乡中国，代表着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代表着同胞间骨肉般的热情；代表着一切未来的光明和幸福。然而，一旦面临了前近代的中国，他们吃尽苦头，受尽挫折。他们和钟理和一样，在整个新生的、近代中国的分娩期所必有的混乱中，所漫天揭起的旧世界的灰尘中，看不见中国的实相，从而也不能积极地、主体性地介入整个中国复兴运动之中。正相反，他们寻求原乡的心灵顿时悬空，在苦难的中国的门外徘徊逡巡，苦闷叹息。在这些受创的心灵之中，有些人由悲痛而疾愤，走向分离主义的道路。

我们怀着深刻的心灵的疼痛，去读，去了解钟理和。《夹竹桃》所呈现的是具有无比现实意义的问题。际此新生代的台湾省知识分子正在开展着对前行代台湾文学家的再认识和再评价的当前，我们应当一方面善于正确地、科学地给予这些前行代作家的劳作以肯定的评价，从而吸收之，发扬光大之。但同样重要的是，也要以正确的、科学的态度，批判和分析他们可能有的错误，将他们的错误做出历史的分析，当做我们在台湾的全体爱国的、革新的中国人底共同的经验，以便在未来的脚步中，走得更正确，更有力。因此，我们的批判，是针对钟理和一部分作品中的一部分思想而发，却无丝毫的损折于对钟理和作为一个人、一个

艺术家的敬意。他以可敬的坚毅和正直忍受一生难以置信的厄运；他对文艺工作不渝的忠谨和辛勤的工作；他为整个五十年代的台湾农村留下了珍贵的记录，特别是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孩子，他心灵所受的，歪扭了的苦痛，都引起我们对他深刻的怀思。我们相信，对他的这个批判，正是使青年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背景下，正确地理解钟理和类如《夹竹桃》、《门》、《白暮的悲哀》、《逝》、《秋》、《地球之霉》之类的作品的途径。透过这种批判的欣赏，新一代生活和成长于本省的知识分子，才能正确地领会钟理和一代的挫折的经验，进一步超越之，以鹰扬虎啸的主体意识，介入新兴中国的建设。

一九七七年四月

台湾长老教会的歧路*

台湾长老教会在去年发表八·一六“人权宣言”，呼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经《夏潮杂志》首次向政府和长老教会以外的公共舆论披露，并加以批评之后，引起社会上广泛的关切与注目。今年三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第卅一届北部大会，在淡水工商管理专科学校召开。会议中以压倒性多数反对了陈溪圳、吴清镒、黄六点、廖恩加等十七名倾向于顺应既存体制派的牧师所提，要这次“北部大会”发表声明，指诉八·一六人权宣言为“少数人之意见”，且“危害教会及国家安全”的议案。长老教会“北大”的决议，一时引起社会更为热切的关注，这不仅由于报界充满主观好恶的报导；更由于“北大”决议初步表现了八·一六“人权宣言”背后长老教会少壮、革新派核心在领导上的力量。

三月廿八日，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第廿五届通常年会举行于台南神学院，聚集该教会来自全省十五个中会的代表，展开为期四天的“廿五届通常年会”。年会又以压倒性多数，选举了长老会，目前引起谈论的一系列“宣言”的首脑人物高俊明牧师，连任长老教会总会的总干事，并且也以压倒性多数票议决接纳和承认八·一六“人权宣言”。此外，据长老教会全省性机关刊物《台湾教会公报周刊》第一三六一号所载：“本届年会以空前多数的议员召开，参加人数有三三六名，表示全体中会对总会的向心力，以及对本教会目前处境之关心。”至此，台湾长老教会在

* 本文刊于《夏潮》(台湾)第四卷第六期，一九七八年六月。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十一·中国结》(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

积极介入本省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步调上，有令人震惊的跃进。

〔1〕宣言的“背景和动机”

台湾长老教会“年会”后，对外发表了一份文件：《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澄清有关对“人权宣言”之误解》（下文简称《澄清》）。这文件分成三个部分：（一）发表“人权宣言”之合法程序，叙述八·一六宣言在教会内部程序上的合法性；（三）“人权宣言”之信仰依据，说明该宣言在基督教神学上之依据。至于（二），即“发表‘人权宣言’之动机与精神”，是这样写的：

长老教会面临国家危急之际，应响应政府呼吁人民团体贡献国是意见，表达心声。在出于诚心爱国，爱同胞的心情下，呼吁美国不要因急欲与中共关系“正常化”，而将台湾一千七百万同胞之人权出卖。同时主张国家的前途应由我们人民自己决定。少数人指责我教会不顾及大陆同胞之人权，违反国策，并加载“台独”、“匪谍”之罪名，完全是恶意中伤，根本不了解发表“宣言”之背景与动机。

本“宣言”所提“新而独立之国家”完全与台独无关。于此国际情势危急之际，长老教会乃本乎爱国的热诚，并“促请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来建造理想的国家。身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必须积极支持并实践民主自由与法治的理想，协助国家建设安和乐利的社会。因此，我们要时时革新，改造社会符合此一理想。

目前，我国家正遭受国际政治的危机，我们不愿因为美国外交政策上的转变使我们陷入困境。我们处于此困境中，更应积极争取世界上更多国家来支持承认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坚持宪法第一四一条所载外交应“独立自主”的原则。此为我教会发表“人权宣言”真正的动机与精神。

这样出于爱国、爱同胞、拥护宪法之纯正动机，绝不容误解，更不容任何人歪曲事实，肆意攻击。我们抗议不实之报导，并谨防

破坏分子制造教会分裂，离间政府与教会之团结而损害我国在国际上之声誉。

去年八月，当美国范锡国务卿访问中共前夕，此间因迫于“国际情势危急”，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向美国总统“呼吁”其不要“出卖”“一千七百万同胞”的行动很多：有大报社发起的“一人一信运动”，有各报刊杂志的社论等。长老教会的八·一六宣言，是这些行动的一部分。对于这种“呼吁”，有些人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这种“呼吁”，是丧失“国家”尊严的事，而有公开的批评。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其他具体的事证，长老教会只因参与这种呼吁而被任意诬为“台独”或“匪谍”，显然不利于强化和保障言论的自由。

其次，关于“主张国家的前途应由我们人民自己决定”，据美国国务院所“明了”（详情见下文），“即台湾的将来应以人民自决之原则来决定之”，也是“宣言”的“主旨”。

查所谓民族自决权，是指着各民族有权为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从而自己决定其政府之形成及政策之权而言。因此，“民族自决”的提出，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提出这个主张的民族是处于被他民族压迫的境况中，无法取得国家的独立，从而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政府的形式——如殖民地民族或主权独立而弱小的国家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长老教会的八·一六宣言的“主旨”，便是在美国和中共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我们有被“卡特总统”“出卖”给中共的危险，从而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并且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政府的形式和政策。因此而向美国和“世界上更多国家”呼吁“自决”的权利。然而，长老教会所欲其独立之“国家”是哪一个国家；所欲决定之政府形式及政策，又是何种形式和政策呢？从这次《澄清》文件中一再以“诚心爱国、爱同胞”、“拥护宪法”为言来看，显然是“中华民国”这个“国家”，“中华民国政府”这个政府形式，和以中华民国宪法为最高指导原理的政策，是毫无疑义的。

这样，在保卫“中华民国”及其政府形式、施政政策的基础上，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又显然认为：在美国和中共建交的背景中，台湾

的“外交及经济”不够“独立自主”，受到“他国牵制”（见《台湾日报》四月二日所载长老教会谢禧明牧师谈话）。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外交和经济”不能独立自主，当然是政治上、经济上不能独立自主的意思。那么，这“牵制”我们的“他国”，又是哪一个国家呢？显然是长老教会认为有足够的力量和影响力“出卖一千七百万同胞”的美国。如果这推论是正确的，长老教会其实应该本乎自己的信仰，向美国提出激烈而强硬的抗议，领导二十万教友团结“一千七百万同胞”，抵制美国对“中华民国”主权的“牵制”，而不只是软弱地恳愿。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据《台湾教会公报周刊》第一三五五号有这样的记载：

美国国务院保证驻台美国大使馆
将继续关怀本教会人士安全问题

【本刊讯】我教会于去年八月十六日发表人权宣言后不久，美国国务院“人权与人道问题”助理国务卿德立安女士（Patricia M. Derian）以书信表示：“关于该（人权）宣言之主旨，本（国务）院是很明了的，即台湾的将来应以人民自决之原则来决定之。”德立安助理国务卿并表示“虽至今还没有该宣言起稿人士被官方逮捕或拘留，你们仍然被保证在台北的美国大使馆将继续密切观看事情”的发展。

这封信显示长老教会和美国的关系，并不是“被牵制”者与“牵制”者的对立关系，而是密切的“被保护者”与“保护者”的关系。而且美国国务院的这封写给长老教会的“书信”，对于教会矢志效忠的“中华民国政府”构成明显的内政干涉。那么，其中的微妙，真是扑朔迷离。我们希望长老教会和政府双方，能尽早对此间密切关心这一事件的社会大众，做尽可能清楚的解释。

此外，《澄清》文件中另一个被关切的问题，是台湾长老教会第一次以清楚的语言，公开表示了该教会“完全与台独无关”。一个世俗政党常常因一时的权宜、一时的战术战略的必要，而做出与真实意愿、企图和目的相对反的公开宣言。然而长老教会是一个具有严肃宗教信仰——并且不辞为此信仰承受重大压力——的宗教团体，因此，长老教会的这个

宣告，是在全体长老教会宗教信仰风格和品质这个严肃的基础上所做的政治“告白”，而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宣告“完全与台独无关”的台湾长老教会，对于现实政治，有两项重要主张：

首先是“促请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并实践民主自由与法治的理想”，“协助国家建设安和乐利的社会”。为达到此目的，教会主张“与时俱进，改造社会”。

其次是主张在“国家正遭受国际政治的危机”中，争取外交的独立自主，而如上文所引谢禧明牧师的解释，是要争取“外交及经济独立”，“不受他国的牵制”。

不走“台独”的路、台湾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反对大国的“牵制”、争取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台湾长老教会的这些政治主张，虽然在细微的部分上（例如“两个中国”论的倾向；一面对影响“外交和经济独立”，具有强大“牵制”力量的“他国”，缺乏深刻的批判，一面与那个“他国”有特殊密切的关系，等等。）有待进一步的“澄清”之外，基本上是一条好的主张，值得支持。但是长老教会对于这些政治主张，向来是书面的“声明”、“呼吁”和“宣言”多，实际行动少。书面的东西，容易引起争论（尤其是长老教会当局在中文语言上的表达，常常不很通畅，不免有欠精确和明白），实际的作为才是向社会证明长老教会上述“动机与精神”，免除“误会”的明白有效的途径。

〔2〕“后进国家中教会的角色”

许多责备台湾长老教会的评论中，指出教会不应该在传教之外，参与现实政治。其实，做这些指责的人，对于近代基督教面对激变中的世界所引起的各种挑战所发生的部分变化，有欠明了。

近年来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主张：在《圣经》中到处充满了对现实做出强烈批判的经文。他们认为，人类都是上帝所造，在上帝之前一律平等。特别在《旧约圣经》中，有许多话语，都是对于把人

当做压迫、榨取对象的事，发出严厉的揭发和控诉。《圣经》上记载了许许多多先知，不辞一死来为被压迫者的利益，而向强大而狠毒的现实，提出义正辞严的批判的事。

他们认为，耶稣是为了释放被压迫者而降生的。他们引用《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一至五十三节圣母叙述耶稣降生的原因：“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新的神学家发现：终耶稣之一生，大半是在犹太的加利利地方度过的。而这加利利，正是当时全犹太中最贫困，最落后和受歧视的地方。除了少数与罗马统治者相勾结的撒都该系（犹太人的地主、豪商之代表）和法利赛人（代表当时犹太人中的城市民），大多数的犹太人属于小农民、佃农、佣工和娼妓、残废者等受人贱视的人们。而耶稣短短的一生，便是与这些受人轻贱和逼迫的人相伴。对于这些苦难的人民，耶稣并不只照顾他们灵命的拯救，耶稣也同样关切他们在世上现实生活的福祉。他以五块饼两条鱼喂饱四千人的神迹，以及他在所到之处为人医病的神迹，便因此具有重要的神学上的意义。

因此，他们指责只顾问穷乏劳苦之人宣扬“灵魂的满足”为已足的神学，斥其为虚伪的宗教。他们认为今日教会中的多数，已经和权势妥协，为了保有宗教上的特殊权益，而故意麻痹人心，转移人们对现世的不平不义之忿懣，从而违背了耶稣的教训。

他们在《新约圣经》上的许多地方，看见耶稣毫不留情地揭发和批判撒都该人与法利赛人的文士和律法师，指出他们的贪欲、伪善。耶稣公然地抗拒和指斥那些被文士和法利赛人恶用为威吓、榨取和压迫广泛穷困、受逼迫的民众之工具的传统律法，以及相关的传统仪文。

这样的耶稣，终于被看成政治上的危险分子。耶稣为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但是在形式上，是作为一个反抗和批判罗马殖民体制，以及与这殖民体制相勾结的犹太圣殿统制体制，从而当做政治犯而遭到磔刑。在死前的片刻，耶稣犹以贫困、劳苦和受尽逼迫的生民为念。《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三十四—四十六节）记载着耶稣在赴死前不久叮咛再

三的话——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喝；我作旅客，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作旅客，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旅客、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作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留下这样的谆谆叮咛的耶稣，终于被挂在十字架上。然而，现代神学家认为，现代的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已经把耶稣的教训，把初代教会的精神完全遗忘了。基督教会在过去的历史时期中，不但不扶持、安慰和坚强被侮辱、残虐和贫乏、哀愁、无告之人，反而勾结、庇护过去的封建王侯和现代的工商资本主。上帝兴起新教，以警醒那些和世俗封建贵族相结托，鱼肉农奴，堕落败坏的天主教。而共产主义运动在西方的兴起，应是基督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完全无能的最大指控。

现代神学，发生于贫困的、充满尖锐社会问题的第三世界。他们看见教会在这类地区向来和当地的殖民者势力、军事专制体制、庄园主、资本家等权力层相结托，真正沦为麻醉被压迫者的鸦片。他们也看见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深刻而普遍的民怨而滋长。面对教会的腐化和共产主义对教会挑战的，良心的神职人员，遂重新在《圣经》中寻找新的

神学基础，认为教会必须坚决地负起古代先知的职责，使教会像耶稣一样，成为被压抑、被侮辱的民众最忠实的友人，也做他们在起而改革不正的社会时最坚强的战友，不辞一死，以实践基层的大爱来否定“宗教是贫穷人民的鸦片”这句话。

〔3〕台湾长老教会的歧路

以这一“参与的神学”为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台湾长老教会的这些言论：

“……它关心人类一切生活，包括精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我们告白耶稣基督为全人类的救主，他的拯救包含人类一切的生活。”（《澄清》）——这是说基督教不能只以精神的、灵的安慰，作为画饼，来钝化人们在现世中的苦痛。教会要参与“社会、政治……”各面。

“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祈求上帝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教会最大之愿望。我们遵从上帝旨意，秉着我们的信仰，高举上帝仁爱、公义、和平、自由的旗帜。”（同前）——这是说教会不能只等待死后的天国，而要积极地建造地上的乐园，使仁爱、公平、正义……这些“上帝的旨意”也“行在地上”。

“政府若无视于上帝所托付的责任，滥用权力做少数权力阶层的工具时，教会应站在人民的立场，发出人民的心声、敬戒政府。”（王南杰牧师语，见《台湾教会公报》一三五五号。）

“……后进国家人民……受剥削、受压制及歧视。且由于政治权力的斗争，……往往沦为专制统治、个人统治。后进社会中教会的角色，应在参予同胞受压制的现实，站在受压制者的立场发言。”（王宪治牧师语，见《台湾教会公报》第一三五五号。）

“……我们确信‘人权’是上帝所赐予人类的基本权利。当我们的人权受到威胁时，我们教会有责任呼吁政府维护保障人权。因此，教会处于任何时代的环境下，应该勇敢的面对现实，告白我们的信仰。”（《澄

清》)

目前台湾其他基督教宗派（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的各派）的信仰生活，绝大部分都有三个特点：（一）只顾多多引人入教，然后将人们拉进教会围墙内，献金、祷告、读经，只顾教友间彼此和善亲热，而对“罪恶的”、“堕落的”、“外邦的”、“世俗的”教会外社会，不予闻问，从而自外于活生生的社会，以及那社会中的同胞和民众。（二）在信仰上，只强调个人与上帝的垂直关系，注重精神和“灵性”的安慰：富足的人要感谢上帝挑选他“管理世上的财货”，感谢丰盛的祝福；不幸的人要相信“试炼”中有上帝的“美意”，顺服上帝“美好的旨意”，不作不平之鸣；贫苦的人要以灵命之富足为满足……（三）牧师世俗化、贪求商品财货、贪求世上虚名，处心积虑潜取“赴美深造”、“受聘到国外牧养”、“神学博士”之名，对教会中的地方“有志”（即地方上的财力、权势人物）奉承谦恭，对教会中贫困无力者冷漠……相形之下，长老教会对现实社会的参与、献身的神学和实践，在台湾基督教思想史中，有极为重大的、前进的意义，允为基督教反省运动在台湾的先声。

宗教的力量，来自深刻的内省生活。我们中国人也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李廷福议长在长老教会北部大会开会礼拜和圣餐礼上的讲道，也要求教会“像彼得跪在主前说：‘主啊！我这个罪人！’藉着反省激发力量、发挥恩赐，以实际工作、行事为人见证基督”。认真而严肃的反省，正是近年来“参与神学”的发足所在。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在参与台湾现实社会和政治的步调趋于更加坚决的当前阶段，让我们对长老教会的信仰和实践之间，做一次概略的检讨。其实，下面所要举出的诸问题，普遍地存在于当前台湾的各基督教会中。但是我们求全于长老教会者，在于长老教会是台湾各基督教会中高举参与神学的，富有革新和实践之勇气和热情的教会，肩负着沉重的道德负担，也处于各种微妙的压力之下。因之，它比任何教会都需要“藉反省”所“激发”的“力量”。谦卑、严肃、认真的反省，“藉反省激发力量”，善于从教会外，无神论的、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诚意的批评中寻找有益于自己的批评，还是自以为义、甚至依恃强大外国的势力，而不团结在台湾一切愿

见更民主、更自由、更公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教外民众和知识分子——在这两条途径的歧路上，站立着今天的台湾长老教会。

〔4〕“主啊，我这个罪人！”

台湾各基督教会有一个共同倾向，即教会文化的极端西化。长老教会不但不能例外，而且特别在教会高层次长执集团中，西化的倾向尤为显著。在许多教会高级会议中，许多牧师竟非以英语发言不足以做充分的表达。在外国神学院获取的学位和名誉，在应该有超世俗价值体系的教会社会中，成为夸耀（天主教会的神父，一般而言在文化上有较深的素养，但也最不以俗世的学位、知识为夸口）。整个《圣经》释经学中，看不见依据中国社会、文化等具体现实条件所做的新的发展，而是依照西方的东西照单全收。基督教中国化的工作，过去在中国大陆的中国（和一些外国的）传教人士做了一些。但三十年来在台湾文化大西化的环境下，教会中国化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而“台湾主义”色彩较为突出的长老教会，就更无意于此。近年来长老教会所做一系列“宣言”、“声明”，除了在教会参与论的提出上有重要意义外，文件在语言表达上的拙劣、文化内涵上的贫穷，都说明了长老教会因为缺乏本色文化，从而模仿西方教会文化也无从有较实质性的成绩。教会参与的实践，是一个艰巨的使命。如果教会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深刻的文化、思想内涵，是绝对无法带动全教会、全社会去推动这个运动的。

由于教会在精神、文化上的西化，教会一般地不能和中国近世反帝民族主义运动相提携，为全民族共同为民族解放的事业，贡献一份心力。正相反，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中的中国各派基督教会，都间接、直接地，消极、积极地为帝国主义所用。此间基督教大专团契，甚至还写专书为教会对帝国主义附庸的历史申辩，便是一个例子。

在这样的背景中，王宪治牧师所提“后进国家教会的角色，应在参与同胞受压制的现实，站在受压制者的立场发言”，实在是教会与帝国主义相温存的立场的突破，值得重视。但也存在着不彻底的一面。

所谓“后进国家”，指着广大的、曾为十九世纪东西方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即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而言。帝国主义对这些地区的殖民地地带的罪恶支配中，基督教会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帝国主义的理论家曾振振有辞地说，他们要使异教民族皈依基督。在“为基督传扬救赎之福音于普天下”的这个“为上帝所喜悦”的理由下，帝国主义的扩张、残杀和蹂躏，便合乎上帝的旨意了。帝国主义在所到之处，设立了教会。西方和土著教会，在帝国主义时代，便与帝国主义本身合而为一。

针对着帝国主义的侵袭，“后进”民族崛起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对帝国主义展开惨烈的、不屈的抵抗。这个民族运动，深刻地渗透到广泛落后民族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甚至日常感情的生活。然而和帝国主义相依存的教会，一直到参与神学兴起的近几年，都是和外国支配者及其国内的仆从相勾结，而立于“后进国家”中反帝民族主义敌对的位置。

反帝民族主义的蜂起，使帝国主义改变了策略。有些殖民国家经过“协议”而给予殖民地以形式上的独立，以换取继续维持该新“独立”的国家提供市场、原料、劳力的榨取关系；有的支持“专制统治”的军事专政政权，以控制和支配那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达成掠夺的目的，这便是主倡人权、民主、自由的某些大国在国内、国外政策上可耻的二元论道德标准。因此，主张“后进国家教会”的参与神学的人，应该清楚明白地认识到“后进国家受剥削、受压制及歧视”——如南美军事政府和菲律宾马可仕政权等——的重要根源，是帝国主义。王宪治牧师的“后进国家教会的角色”论，缺乏对于帝国主义明白而深刻的批判性，这如果不是王牧师对近年参与神学中强烈的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性（即在宗教上视帝国主义为罪恶）没有充分的理解，就是有意回避它，而单独地倾向于对现实政治做表象的批判。

必须认识到：如果今天某一个大国看起来主张人权，支持“后进国家”中民主、自由人士及他们的运动——而有异于五十年代之支持专制独裁者，只是达到同一目的的不同手段。各“后进国家”民族内部争取

民主、自由运动的迅速成长，使“专制统治”……的国家内部，产生深刻的冲突，使政权的稳定性降低，从而使那个国家的市场随着趋于不稳，影响帝国主义资本对那个国家的渗透。帝国主义出手支持后进国家的民主运动，并非有所厚爱于那个国家的民主派，而是为了：一、警惕现在当权的“专制”政府，促其做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以安定政权，从而安定市场；二、万一民主派在“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则因在他们胜利前的支持，而继续密切的关系，以维持大国在那个国家中的政治、经济上的利益。过去授“专制国家”以镣铐、皮鞭、各种镇压武器和各种精密侦防电子器材的，和今天手拿着蜡烛、橄榄树枝，高倡人权的，正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集团。

还必须认识到：“后进国家”民族内部的民主、自由派，往往是作为对“专制统治”的反动而产生和发展的。而“专制统治”，是由于它和帝国主义的依存关系，当面对着国内日益壮大的反帝民族运动的勃发，不能不逐步走向“专制统治”和“个人统治”以镇压之。因此，没有对帝国主义采取断然的批判态度——甚至于受帝国主义豢养的——“后进国家”民主、自由甚至人权运动，总是向着它的对立的方向——独裁的、镇压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这是二次大战后“后进国家”历史所教给我们的经验。

对于后进国家教会在十九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时代中，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史实，做坦白的、严肃的自我批判，是新近参与神学的重要精神。用耶稣基督反对过罗马殖民体制，以及反对过那与罗马殖民体制相勾结的犹太祭司、长老、文士、律法师专政体制，从而与被虐待和侮辱者相与，并为他们的自由和正义高声抗议的行传中，找寻新异象和亮光的参与神学，严厉地批判了教会一向对待后进国家的傲慢、自以为义和为帝国主义之虎作伥的历史。基督教便在这个新的反省运动的具体实践中，和各“后进”民族的反帝民族运动结合，获得生动、丰沛的力量。台湾基督教长老会最近果敢的言论和行动中，却明显地缺乏这种反省和批判。

其次，如果面对激变中的世界，从而展开后进国教会的角色问题的

理论，是为了想藉着新的实践来抹除“宗教是贫困人民的鸦片”这个来自无神论革命派对基督教的论断，长老教会也同样必须做出自觉的努力，以破除“教会是世俗权力的反映”这个指责。由议会民主体制组成的长老教会，在各级教会中产生自己的长老执事团。而这些长执，绝大多数是经济上、社会上有既有地位的人。由地方上经济的、社会的“有力者”形成的长老教会体制，便这样地成为“有力者”信徒的教会。这些“有力者”的意识形态，以及依照这意识形态所解释的《圣经》和神学，小之可以对满怀新异象的年轻传导人的讲章，横加阻隔，大之形成西化的、对帝国主义不加批判的、短见的、马基维理式的国际政治观点的教会，而与广泛教内底层信徒及教外广泛爱国知识分子和民众脱离。

最后，在长老教会的言辞之外，找不到较多的实践“见证”自己的主张。当无神论的、教外的良心舆论为外资公司对台湾女工的职业病不采取应有的事先防治和事后医疗及补偿而抗议时，包括长老教会在内的众教会是沉默的；当无神论的、教外的良心为山地奴隶性童工而呼吁时，听不见包括长老教会在内的台湾诸教会关切之语；在生命线、失意人专线的社会工作上，长老教会无宁只提供“精神”的安慰，而没有“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和“人类一切的生活”中具体的条件。此外，在政治民主化的促进上，长老教会并不曾如其所宣言者那样“勇敢面对现实，告白”他们的“信仰”。

〔5〕“偏激批评”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对长老教会求全的责备，未免失之于苛严。但是，这些求全和苛严的要求，是因为教会的伦理较诸世俗的伦理尤为求全、尤为苛严之故。新约的特点之一，是以“生命”替代或胜过律法的这一点上。我们不是不知道利用大国的政治压力来遂行自己国内“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极为微妙、错综的情况。但是，如果从基督教所说的“生命”或者教外良心所主张的民族自尊来看——而不是单纯的政治权术去看，无宁应该用自己的、独立的努力——哪怕这需要更长的

时间、更大的代价——来争取自己民族在政治、社会生活上的民主化、自由化和人权化。至少至少，在“不得已”而“利用”外国强权的“影响力”时，也应有一份哀伤、羞耻的祈祷，而不是以被大国的大使馆“继续密切观看事情的发展”为夸口。

八·一六“人权宣言”首次被从神秘、奥妙、隐蔽的状态中公之于世以后，舆论界有“偏激”的批评。在这些批评之中，当然也不乏蓄意“歪曲”、“不察明事实，随便报导不实的信息，危害个人名誉及安全，欲置人于死地”的评论，为广大明眼的群众所不取。但是，如果长老教会将一切对八·一六宣言的批评一律视为同一性质，则教会若非缺乏精密的分辨力，就是想用简单的、概括的方式，逃避教会对自己言论所应敢然、坦然向社会负起的责任。

“后进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往往有“偏激”的反宗教——尤其是反基督教倾向。这是因为如上文所指出，“后进国家”的近代史，是一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这个侵略所引起的民族战争和革命的历史。在这汹涌澎湃的历史中，教会一般地和外国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相结托的国内势力相结托。广泛地组织到“后进国家”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运动中的“后进国家”知识分子，不能不对基督教和它的教会怀抱应有的不信任、怀疑甚至仇恨的态度。这些“后进国家”的知识分子，由于近代史中苦痛的见证，站在无神论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立场，追寻政治的平等、社会的正义和“人权”的实现，并且在诸教会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甚至新殖民地条件中普遍存在的“剥削”、“压制”和“歧视”沉默不语，甚至与剥削者、压制者和歧视者相与比周为恶之时，教外的、无神论的、爱国的知识分子早已挺身而出，高声抗议，甚至团结自己民族广大的民众，为政治的民主自由，为社会正义，为“人权”的伸张而奋斗。对于这些教外的、无神论的、爱国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反省的、认罪的，并且在这深刻的反省和悔改中新新奋起的、参与神学的教会，应该心怀谦卑，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并以本身出于新的参与神学而来的、视帝国主义的“剥削”、“压制”和“歧视”为宗教信仰所忿怒的罪恶，而绝然地和帝国主义相断绝，依照

各“后进国家”民族的具体条件，建设独立自主的、有自己民族特点和风格的教会，并和全民族一道投身于“后进”民族追求民族自由、国家独立，从而政治民主、社会公平、“人权”伸张的反帝民族运动和民主运动，以实际的行动，取得当地知识分子们信赖。轻易地、不加甄别地将一切对批评八·一六宣言的言论，视同御用知识分子、牧师和新闻记者“不察明事实”、乱戴帽子的“言论”，而不提出耐心的，具有深刻历史的、文化的和神学深度的讨论和解释，不是一个反省并“藉反省激发信仰能力”的基督教会反省运动的参与神学的好见证。

最后，我们对于承受着各种微妙的“压力”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表示深切的关怀。我们对于这个教会的言行，有肯定的部分，更有批评的部分。但我们坚决主张一切讨论应在诚恳、正直、坦率和民主的原则上行之，并且反对以任何政治敏感性的指控，加诸对方，俾使这个讨论对教会和教外关切同一问题的民众，同得深刻的造就。

追究“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论*

为什么党外叫“台湾一千八百万”人的共同愿望？国民党也叫“一千八百万”人的自由与幸福？美国也说台湾“一千八百万”人的和平与幸福云云？为什么……

一般地说来，一个人的看法，和他对生活 and 世界的观点，常常因为他在一个社会中所居的地位而有不同。比如说，有钱的人，收入不错的人，觉得自己是幸福的，觉得明天会比今天好，对于未来有信心，对于现存的大部分法律、制度和其他现状满意的，总是居大多数。处于收入不好也不差的人，往往觉得目前生活还差强人意，但也有不满之处，一方面希望将来过得比今天好些，一方面也对于生活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特别是和自己的发展有关的缺点，很觉得不满。另外有更多的人，收入永远只是差可温饱，终日劳动，却似乎永远没有改善的一天。对于这些人，生活和世界总是暗淡的，没有展望，也没有保障。他们觉得一切繁荣、奢华和幸福，都与他们无关。他们辛劳、疲倦，生活永远是那么拮据。生活上一碰到较大的变化，例如生病、结婚或丧葬，立刻就得负债。对于他们，最大的关怀是希望老板生意好，工厂多加班，多发些加班费，希望工作有保障，不要说裁员就裁员，希望物价稳定……但即使这些起码的愿望都无法获得。因此他们的心中永远蕴藏着一股不安、焦虑、自卑、自暴自弃和对于茫茫的前途的挫折感。

* 本文刊于《夏潮论坛》(台湾)一九八四年三月。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十二·四川满与台湾文学》(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五月)。

中等以上阶层的政治要求

在政治要求上，这三种人也各不一样。富裕、幸福的第一种人，基本上希望维持现状。他们希望社会安定、有秩序，学生和工人都不会闹事，以便他们可以放心开工厂、做外销，外国公司肯来台湾投资、买东西。当然，他们也希望改革，希望政治“民主”些、“自由”些，以便自己也能参与政治，从而开工厂、搞外销、做生意都更为方便些，可以自己创造法律，改革政府组织，以便对外对内的生意发展有更合理的环境，或者至少可以通过参与政治，获得企业经营上的特殊方便。他们当中有人支持党外，但只愿暗地里送钱，绝不肯公开，因为他们怕万一国民党知道他们支持党外，会在生意上找他们麻烦，整个企业就垮了，财富就泡汤了。有些人从纯生意眼出发，拈一拈党外，觉得不成气候，干脆参加国民党，以金钱力和自己企业的组织力，出来竞选，果然光荣当选，一手做官，一手得国民党当局的欢心，一手以特权做生意，超额利润滚滚而来。当然还有一种人表面上不问政治，骨子里大把大把送钱支持国民党，买倒各种上下大小机关，俨然企业大君，顶着大企业家之名，大肆盘剥。

小市民阶层的政治愿望

不富不穷，对生活和社会现实又贪好又埋怨的人，比起第一种人牢骚多。拼命做生意，资金老是不足，在银行借不到钱，却眼看着大户连骗带诬借得大把钱。他们在商场上不是大户和外国厂商的对手。经大户转包了一点工作，利头低，辛苦备尝。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论在企业、学校、文化和政治上都很想出头，却无奈一个老大架构压在每个人头上，出路和空缺有限，使每个人都觉得怀才不遇，觉得说话、思想、做生意、搞事业都不自由。他们确想改变现状，希望有一个做生意、搞文化、搞个人事业都比现在更为自由自在的环境。他们之中支持党外

者，占很大比例，有少数一些人很勇敢，事业、职业砸了，也要搞党外，支持党外。另外更多的人心中支持，行动上则又兴奋又骇怕。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人，支持国民党。他们对当前社会和生活的现实，虽常常怀抱着困惑与不满，却更惧怕“党外”、“台独”、“共产党”惹出更大的乱子，危及自己的财产和安定的生活。到头来，连目前仅能掌握的一点点都会保不住。

社会下层和工人的政治愿望

社会上的下层，最想改变现状。因为任何改变，他们都没什么东西可丢，最坏顶多是“改变”后他们过得跟今天差不多，除此而外，改变或许可能带给他新的机会、新的希望。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收入能多一点，不要每到月底就捉襟见肘，希望有钱使儿女受到较好的待遇，希望有自己的独立的工会，保障职业上的安定和安全……在政治上，他们往往是台湾中产阶级党外最忠心、勇敢的支持者。他们对党外的希望和忠心，比台湾中产阶级本身更没有保留。他们寄望这些说话、办杂志都会讲出听起来很“爽”的话的党外英雄贤士，能改革社会，改善政治，改变他们的生活。因此，选举一来，在党外竞选办公室中跑腿最勤、最不怕警察特务威胁的，都是他们。但是，有时，被党外候选人激起一股改革的怒情，激昂起来，毫不踌躇地肯为党外候选人在选举中遭受到不公平待遇（例如做票）而跃起，决心去砸党部，打选委会时，却又往往看到那位候选人早已自己溜得无影无踪了。

“一千八百万”论的三个市场

由此可见，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想法、看法和愿望、利益并不一致。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所居的地位不一样，利害当然也不同，价值观念也跟着不一致。

可是却偏偏时常有人会喊出一些口号，好像说全社会上大家都拥护

这个口号。例如最近两三年来有一个最流行的口号，是说：台湾“一千八百万”居民如何如何。台湾“一千八百万”居民的幸福，台湾“一千八百万”居民的福祉，台湾“一千八百万人”的愿望等等，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例子。

最好玩的一件事是：不但党外叫台湾“一千八百万”人的共同愿望，国民党也叫“一千八百万”人的自由与幸福。尤其有趣的是美国也说台湾“一千八百万”人的和平与幸福云云。人们比较容易区分国民党、党外和美国之间在价值、角色、力量上的不同点，却一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因此，这国民党、党外和美国间异口同声的“一千八百万人”论，应该引起我们的兴趣和关切。

其实只有六百八十万

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个“一千八百万人”论的具体意义。一千八百万这个数，当然是从台湾的总人口数而来。依据一九八一年的统计，台湾的总人口计为一千七百万九十七万零二百八十人。

当然这个数目包括一岁到七十岁以上的人口。但在政治上有意义的人口，就是说政治上有意见、感情、立场和重要性的人口，当然应该是“经济上活动”的人口。那么扣除十五岁以下，以及满六十岁以上的人口，据一九八一年统计，大约只有六百八十万一千人上下。这么一来“一千八百万人”的“愿望”、“意志”、“幸福”或“福祉”论，在政治口号上就是个明显的夸大了。

从人口学上再分析

其次，在这六百八十万一千人中，其经济活动的范围、类别与性质也很不一样。按照人口学上的分类，起码就可以再分为“雇主”类、“自营作业”类、“无偿家庭劳动”类，和受雇（有偿劳动）类等四个不同的范畴。

所谓雇主，指公司行号的老板、股东而言。这些人一共是只有二十九万一千人，占前述经济活动人口六百八十万一千人中的百分之四二。自营作业者，指的是自由业、小生产者，共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人，占经济活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无偿家属工作者指一般家庭管理，有七十一万七千人，占百分之零点五；有偿受雇者，指受雇于私人企业和公家机关，企业的体力劳动生事者和脑力劳动生产者而言，人口最多，计有四百三十六万人，占台湾经济活动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一。

这百分之六十四点一中，当然包含中等程度的受薪阶级。但和人数占绝大多数的工资劳动者相较，当然是为数甚少。因此可以说，在六百多万经济活动人口中，中等以下的工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占着绝对的多数了。

又“革新”又“保守”的中上阶级

一般而言，雇主和部分自由业、小生产者和中上等薪水阶级是前文所说的一、二类，属于社会上的物质上或精神上的上层阶级。他们最主张维持现状、固定现状。他们主张“自由”和“民主”，基本上是为了这“自由”足以促进和发展私人工商企业。大部分的自由业者、小生产者和一部分中上等薪水阶级对现状基本上满意，但他们要求不被目前在经济、社会上占尽优势的大企业阶级和外国企业垄断一切利益，并且有平等经营和竞争的机会，因此他们要求改革，主要是把他们自己的处境改得和第一类人一样如意和称心。

这第一类和第二类的“革新”派，就是三十年来台湾中产阶级党外运动的基本力量。因而，他们在性格上是既“革新”又“保守”的。

由于他们要向国民党争更多的和他们在经济地位相应的权利，他们批评国民党，要求民主，提倡自由，以便更多更广泛地参加政权，这种要求造成他们“革新”的一面。

但为了保持现状，他们绝不主张比较广泛的社会、法律、经济等制度的变革，以使分配更平均，使工人得到更合理的经济权、议价权、组

织权。立法院讨论有关基本上改善和保障工人的工作权、组织权和经济权时，党外和国民党一样不积极，一样或明或暗地杯葛、打击。党外许多杂志中，登了许多文章，在全比例中，不到百分之一。更极端的一些人反共反到带着法西斯味道，反中国反到使用帝国主义的语言。凡此种人，充分表现出他们和国民党、美国的高华德与雷根一样的“保守”倾向。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国民党、美国和台湾中产阶级党外常有相叠合的共同利益，从而有共同的语言。

“一千八百万人”论是谁搞出来的幌子？

中产阶级的党外，对台湾没信心，但又亟思维持台湾现状。他们深知自己没力量、勇气和决心“保卫”台湾，因此主要地向美国人以“一千八百万人”的意愿为借口，提出“自决”以“救台湾”的口号。但大多数工人和社会里中等以下人民，“自决”与否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比较上远得很。他们比较关心的是自己当前生活的改善和保障。至于自由与民主，工人和社会中等以下阶层的人们最关心，最不吝于支持，但希望党外真正关心他们的需要，问题和愿望。不希望党外英雄们忙着打破头颅争“主流”、说空话、出风头。他们也希望党外在议会中，在党外杂志上多谈谈，多反应他们的问题和他们受忽视、践踏的权利和愿望。

因此，您瞧，占着我们“经济活动”人口中约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的人们（中等以上阶层）的思想和主张，却以“一千八百万人”的名义，强加在于“经济活动人口”中约占百分之六十（中等以下阶层）左右的人的头上。而且国民党也以这台湾“一千八百万人”做幌子主张这、主张那，党外也以台湾“一千八百万人”做幌子说这、说那，美国国务院和少数一些参议员也以台湾“一千八百万人”做借口干涉这、干涉那，但我们人人以为常，从来没有人认真问问这“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一千八百万人”，只是一个空洞而无意义的数字。人口学上的数据，有各种不同的具体含意。特别是涉及政治上的主张时，更应该将人口数字择在台湾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里去评

估和思想，才有确实的意义。这么一来，我们才清楚知道了：在台湾，是什么样的人占大多数，那些人的利益和愿望最应该受到重视。否则，不论国民党、党外和美国所提的台湾“一千八百万人”云云，就是一个假话，至少也是一个空话。

要求党外扩大社会基础！

在去年大选败北后，台湾中产阶级党外运动，应该是睁开眼睛，看清自己一贯扮演过来的角色的时候了。人民终于要向台湾中产阶级党外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正如党外一向对国民党提出的一样：党外的先生们，请你们好好看清楚台湾的社会和人民，正确地扩大你们运动的社会基础吧！

西川满与台湾文学*

吉甫林和泰戈尔

最近读到张良泽先生两篇有关在台湾的日本人殖民地文学作家西川满的论文：《西川满先生著作书志》（一九八三）和《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一九七九）。和他同样发表于一九七九年的《苦闷的台湾文学》对照起来读，对于晚在一九三八年出生，日本战败的一九四五年才六岁大的张良泽先生，何以在思想上表现出对日本新旧战争体制万般温存的性格，感到极端的诧异。

张良泽说，在尝试对台湾文学做历史的考察时，他时常“被一巨大的难题所困扰，弄得毫无办法”，这“巨大的难题”，据张良泽先生说，是这样的：

在战前半个世纪中，当台湾犹是日本“领地”时，台湾人完全受着日本教育。其中有一部分台湾人以纯净的日文，并且以完善的日本人式的发想写出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写到即使日本人读了，如果竟被误信为日本文学，也无足怪的程度。对于这一类的作品，我们应该怎样予以定位呢？相反地，有一部分日人作家，在台湾住过一段长时期或者短时期，从而写出对台湾的乡土怀抱深刻的关怀和深刻爱恋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是用日语写成，但如果作品的内

* 本文刊于《文季》（台湾）一卷六期，一九八四年三月。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十二·西川满与台湾文学》（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五月）。

容、发想、以及全作品的气氛是不折不扣地具有台湾性格，对于这些作品，又要怎样定位呢？

——张良泽《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一九七九年）

以同样是大殖民主义国的英国而论，吉甫林，尤其在张良泽先生的眼中，应该是不论在“内容、发想及全作品的气氛不折不扣地具有”印度性格的英国人和英语作家。但在“定位”上，却好端端地被列在英国文学史中。再以泰戈尔为例。他以“纯净”的英文，并以“完善的”西方对东方的想法写出文学作品，到了可以让西洋人误以为出自西方人之手的程度。但尽管英国人再傲慢，无论如何，是不会有把泰戈尔编到英国文学史中去。然而，对于这样简单的“难题”感到“困扰”的张良泽，终于道出了这困扰的核心。原来张良泽先生翻遍战前和战后出版的日本文学史之后，有这发现：

……当时日本“臣民”之台湾人作家固无论矣，即活跃在殖民地台湾的日本人作家，在这些日本文学史中皆没有记载……对于长时期促进了台湾文学，又为日本文学开拓另一分野的住台日本人作家受到忽视，实在令人感到遗憾。……为什么上述跨越了两个时代、交会在两个文化圈的边境的日本“外地文学”作家们，会受到日本文学史家的忽略呢？他们（译注：即日本“外地作家”）不是在日本文学的延长线上工作的尖兵吗？我禁不住这样发问。

——张良泽：前揭文章

张良泽先生要为这些令他极端苦闷的问题寻求解答，其实不应是一件困难的事。首先，他应该评估日据时代在台湾的日本人殖民地文学家（即所谓的“外地文学”家），在文学专业上，有没有足以入祠于客观的日本文学史的条件。吉甫林即使如何地为印度人所憎恶，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能不让他英国文学史中占据一个小小的位置。问题是：大约没有一个真正的印度人对吉甫林是否对英国的“外地文学”有没有贡献，对于英国文学史是否正确对待了英殖民主义文学家吉甫林，表示有若张良泽先生似的深刻关怀。对于西川满文学，张良泽先生似乎很不吝于给他极高度的评价。但战后世代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近藤正己先生，

对于同一个西川，却有同张良泽先生甚不相同的评价。对于早期的西川，近藤先生认为西川文学内容是“没有实体的，西川式的幻想的台湾”。要之，西川所写的台湾的风土和人物，都是以在台“二世”日本人的心灵为中心而虚构的台湾，除了皮相的异国情调，“引不起台湾人的兴趣”和“评价”，根本缺乏对“台湾人所处状况之深刻考虑和解释”。（近藤正己：《西川满札记》）

其次，张良泽先生应该从历史的层次上去寻求答案。除非日本战争体制再度确立，日本总督府的军事体制和情报体制再度支配台湾文学，在文学专业上没有起码的成就的西川满们，恐怕是永远无法进入日本文学史吧。战后因着韩战和越战景气崛起的日本，即使深感确有“将作为日本文化一环的日本文学，以新的观点，向着国际化前进”（张良泽：《战后的日本文学史》）的必要，无如以日本国际企业的国际“进出”为主要性格的日本新殖民主义，已然大有别于西川时代的日本殖民主义。今天日本的资产阶级毋宁更有兴趣听取市场国的反日论，并据以用企业行销中对市场当地文化管理来加以解决。张良泽先生苦口婆心呼吁日本人重视战时日本殖民地文学之研究的美意，恐怕即连当今最右翼的日本人都会觉得尴尬吧。

西川满的“台湾意识”

西川满最为张良泽先生啧啧推崇的，是西川的台湾观。据他说，西川满是把台湾当做他自己的故乡的，理由是因为西川曾在他一本书的跋中说过这样的话：“一闭上眼睛，眼前立刻就浮现出台湾的光景来。我谨以无限的慕情和赞美，将这本书献给宝岛”，西川也在另外一本书的后记中说过：“把这本书献给从我内心最深爱的台湾”。而且，据张良泽说，一直到一九七九年西川满古稀纪念出版的长篇小说《台湾纵贯铁道》，西川“一直没能忘却他心灵的故乡——台湾”。（前掲文章）

如果西川满深“爱”着台湾，则毋庸置疑的是，当年许多前来殖民地台湾投资、做官、探险的日本人也深“爱”着台湾的。问题在于：西

川之爱，是支配者民族以他自己为本位去理解，去看殖民地台湾，从而投注他的感情。从“第二代”在台日本殖民者看来，台湾有南国之美，有古台湾历史的神秘感，充满着叫人向往的“华丽”的异国情调。但是对于殖民地的儿子杨逵，台湾充满着殖民地内部矛盾，是一个一触即破的脓疮；是疲惫破产的农村；是充满着民族压抑和荒诞支配的地狱。但对于西川和他的老师吉江乔松，台湾是“南方，光之源，赋予我等以秩序、欢喜和华丽”（近藤正己：《西川满札记》）的人间乐土，是精致的个人情趣（例如西川满在台出版的杂志、书刊的封面设计和装帧设计）。西川满的台湾，便是这样一个“人工的、空想的、幻想的”、“二世”殖民者心目中的乐园（近藤正己：前揭书），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真实的台湾生活和台湾人民，对于西川满，是视而不见的。至于张良泽先生所顶礼颂赞的西川满小说《台湾纵贯铁道》。据近藤正己先生指出，“可以说是皇民化时代的代表作”，是一部“‘二世’（日本）作家以日本人殖民者之原点——一九八五年日军侵台作为主题而写的一本小说！”（近藤正己：前揭书）张良泽先生这样没有分析地就断定西川满是一个充满“台湾意识”、热爱“乡土”的人，而引为知己，不要说是从中国人立场，即使从所谓“台湾民族”的立场，怕都难于过关吧。

西川满的“台湾文学”论

因西川满的“台湾爱”而兴奋过度的张良泽先生，在他议论西川文学的“四大意义”时，劈头说西川对台湾文学意义之重大，在于他在“台湾人的心中，坚定地种下一种叫做‘台湾文学’的意识”（张良泽：《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他说道：

……但是在西川氏的杂志或著述中，时常堂堂然使用着类如“台湾文学”、“华丽岛文艺”的辞语。尤有进者，西川也经常对于“台湾文学”的存在，做明确的主张。例如他在论文“台湾文艺界的展望”中这样说——

“从今而后，再不要胡乱以东京文学为范本吧。（中略）南方就

是南方，北方就是北方，既然身在明亮澄澈的南国生长，还不时思念着北国阴暗的雪空，这算什么呢？日本终于是要向着南方伸展下去吧。我等携手于文艺道路上的人，若无深刻的自觉，将何以面对我等后世之子孙？以华丽岛文艺，建设应乎南海、擎乎高天的巨峰，这就是我们大家的天职啊！”

经由这样的想法，西川满清晰地主张了台湾文学的独自性，从而使台湾人觉醒了起来……

——张良泽：前揭文章

类似“台湾文学”的辞语，是因着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对于不同的政治、民族立场的人，有不同的内涵的。例如一九四〇年的《华丽岛》诗刊，其实是在台湾第二代日本人文学家思有以推展“外地文学”的团体“台湾诗人协会”的机关刊物。而所谓“外地文学”，正是英国的 Colonial literature，是法国的 Lit'érature Coloniale，译成中文，就是“殖民地文学”。依当时在台湾的殖民地文学家岛田谨二的说法，这所谓“外地文学”，其实是殖民国与殖民地接触，产生“风土、人和社会”的差异，从而产生异于“内地”母国的、有特异性的文学，但一言以蔽之，是殖民者在殖民地写出来的，以不同程度歌颂了扩张中的帝国，讴歌新领地的“华丽”云云的文学。思图在日本南疆殖民地的台湾，为日本文学扩张新的、富有异国情调的文学的西川满的豪言壮语，毕竟是日本人本位——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本位——的语言，非但并不是“主张台湾文学”的“独自性”，其实更是主张附庸于日本文学的，有别于其他领地如朝鲜之朝鲜文学的“台湾文学”的“独自性”吧！令人疑惑不已的是，张良泽先生绝非不知西川的日本中心的台湾文学观。因为他也知道西川主张台湾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应占特异地位”，认为西川的努力，是要“把台湾文学作为日本‘外地文学’（即前指殖民地文学）的一环而加以开拓”，并认为西川对日本文学“新领域”开拓有所贡献（张良泽：前揭书）。那么，张良泽先生是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看台湾文学呢？还是站在台湾文学的立场看问题呢？观乎其文，答案是明白的。

至于相对立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台湾文学”（一九三三）、“福尔摩

沙”(一九三二)、“台湾文艺”(一九三四)、“台湾新文学”(一九三四)这些语辞的用法,远远地比西川满在一九四〇年为日本侵略体制服务的“文艺台湾”和一九三九年为日本殖民地文学掌旗的《华丽岛》诗刊早很多,怎么能说“台湾文学”的概念,是西川满坚定地栽种在台湾人的意识中,从而促成台湾人的觉醒呢?张良泽这样的提法,即使连战时曾和西川相与过的几位本地作家都羞于赞同吧。

总之,以西川满为代表的在台“二世”日本人的“台湾文学”,和自赖和以迄杨逵、吴浊流的抗日、反日的“台湾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日本殖民主义的文学观念,而后者恰好是批判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学概念,张良泽先生却荒谬地将二者相提并论了。

张良泽先生对西川满推崇备至的另一点,是说西川“把台湾的民间文艺提升到芬芳的文学境界”。张良泽先生说道:

观西川氏之杂志和著作,就知道其内容殆为充斥台湾民间的卑俗的故事·传说·风习等,取之为文艺,从而把素来被忽视的素材,因西川浪漫的情绪和艺术性技巧,一变而升登文学的殿堂。

——张良泽:《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

在殖民地中,对于文化,一贯存在着两个标准。从殖民支配者的文化以观,殖民地的“故事·传说·风习”,莫不“卑俗”。但从被支配民族自身的立场以观,这些故事、传说和风习,尽多优美而堪足自傲之处。即使从更激进的革新的立场去看,殖民地反抗的知识分子固然也在自己的文化中看到其鄙陋、落后之处,并且进一步为了图强而对自己文化中黑暗、落后的成分痛加撻伐,但这又与以日本人立场,以事不干己的态度,从爱殖民地神秘,异国性的趣味,既连腐朽、衰败的东西也大加叹美,两者之间,有迥然不同的意义。

而所谓西川通过“浪漫的情绪”和“艺术性的技巧”所表现的台湾,直如前文所说,是以在台“二世”日本人的立场去形构出来的“人工的、空想的、幻想的”西川满自己的“台湾世界”(近藤正己:《西川满札记》),与日据时代台湾的具体现实之间,自然有巨大距离。根据研究西川的学者近藤正己先生的意见,西川的早期作品中的台湾,是没有

实体的、西川自己幻想的台湾，他的后期作品中的台湾则多笔记、史料中古台湾的神秘，幻觉为多。而在这样的作品中，人们如果想从中找出西川“对当年台湾人所处状况之深刻思考、解释等描写”，是“极端困难的”。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多年，却永远不能不“以日本人价值观的尺度”来看台湾的生活的“二世”日本人西川满，无从真正深刻地理解台湾的“故事·传说·风习”，自是十分明白之事，则西川又如何能把这些“卑俗”的台湾“故事·传说”和“风习”，点石成金，“升华”为“芬芳的文学”呢？

压抑还是“促进”了台湾文学？

张良泽先生还认为：西川满对于促成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盛况，有莫大的作用！在《西川满先生著作书志》一文中，张良泽先生满怀着感激说道：

如果没有西川满的存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必不能那么盛况（译注：昌盛？），那么丰收。他的存在之正面作用，是确立地方文学的地位，培植台湾作家及日人作家。负面的作用，是刺激台湾作家纷纷背离他的独霸文坛作风，而各立门户，反而形成台湾文学的多彩多姿。

查西川介入台湾文坛的主要活动，约在一九三四年以后。从台湾文学史的编年看来，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就有赖和、杨云萍、杨守愚、克夫、杨华、一吼，和三十年代初的杜辉崑、赖庆、陈镜政、徐坤泉、张文环等这些人。即使是在一九三四年以后，日据时代台湾文学进入它的高潮时期的作家郭水潭、吕赫若、苏维熊和杨逵这些人之辈出，和西川满的“存在”是怎么也扯不上任何关系吧。事实告诉我们，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战鼓逐渐昂扬，台湾新文学逐渐受到日本在台湾战争体制的弹压，终至消灭。以西川满为首的日本殖民地文学乃快速地向着战争协力的文学飞跃，代之而兴。西川的崛起，至于在战争文学的呐喊中享尽荣华，其实是以在西川协力下蛮横地弹压台湾文学为重大代价的。近藤正

己先生说得好：

……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之后，日本的侵略战争更形具体化。而此种作为运动的文学（译按：指以杨逵《送报伏》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优位”的[反抗]运动的文学），在总督府更进一步的压制下，已不能再展开，复加上禁止使用中文，遂几陷于窒息的状态。“第二世”日本人文文学在此背景下，相对地也就蓬勃的登场了。

——近藤正己：《西川满札记》

一九四一年，“台湾文艺家协会”正式编入日本战争体制，西川满出任协会的“事务总长”。一九四二年，西川率团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年底发表战争协赞的黠武演说“一个决意”，四三年，抨击抗日的台湾文学主要传统精神现实主义为“狗屎的现实主义”，同年九月，西川提议“撤废结社”，废刊《文艺台湾》，翌年并以《皇民学塾》代之，终于将他自己说比粮食还珍贵的文学，献上战争的祭坛。至此，“浪漫的”、“唯美的”西川满，肆无忌惮地暴露了他原本极右翼、法西斯的战争性格，在台湾文学仆倒在日本战旗下受到严苛的检举与弹压之同时，西川满却享尽了皇民战争文学的荣华。张良泽先生竟何所据而谓西川满昌盛和“丰富”了台湾文学呢？

至于说西川满“提拔”、“培养”了作家，日本在台作家中有几个是西川满所培养的，不得而知。至于台湾作家，除了张良泽一再提及的某评论家，并未列出其他的名字。郑清茂教授向张良泽先生质询：除了某评论家之外，究竟西川还栽培了哪一个台湾作家时，张良泽先生说那些受到西川栽培的台湾作家，光复后都“绝笔”了。如果张良泽先生所说的那些作家，是一直跟西川从《台湾日日新报》到大东亚文学奉公会一路鬼混的作家，“绝笔”至少是知所羞恶之表现吧。至于张良泽先生不惮于一再提到的某评论家，除非某评论家自己出来承认是西川的弟子；否则，事关名节，别人是不便妄评的。

头号战争协力文化人西川满

在为西川满饰辩和遮掩其战争协力的罪恶责任时，张良泽先生已经到了不惜抛弃学问、历史和民族的立场，到了不惜空言狡辩的地步。张良泽先生这样说：

在（西川手著的）那么多书卷中，只有一卷《一个决意》是歌颂“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品。且此卷出版于战争末期，全国动员令下之时局。处之今日，台湾作家哪个不写“反共必胜，抗俄必成”？

——张良泽：《西川满先生著作书志》

对于西川在战争末期之言论，凡被统治者都不会有好感的。但揆诸当日台湾文坛，除少数反骨作家，余者不论日人、台人，大多数作家皆不能不顺从统治者之指挥……

准此以观，协赞“皇民化运动”者派请西川氏一人之缺点。且以一人之一项缺点，来否定这一个作家的全面，不能谓为公平。

——张良泽：《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

先说西川满在战争末期到底发表了多少协赞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文章。除了张良泽先生提到的《一个决意》之外，根据近藤正己先生所做更为详尽的年表看来，一九四一年，他受台湾总督府的嘱托执笔写小说《郑成功》。一九四二年，“台湾文艺家协会”在台湾军报导部、总督府情报课、皇民奉公会的协助下搞文艺活动，西川在会上朗诵《泳于大海》；同年，西川和滨田隼雄率团（与团台湾作家姓名姑讳）参加在日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主张“日支文学交流”，并以《文学也是战争》为题发表演讲。一九四三年，西川发表《邻坊组织（注：一种战时街坊组织）也要文学》，五月，抨击作为台湾抗日文学主要传统的现实主义为“狗屎的现实主义”（《粪写实主义》）。七月，在总督府情报课皇奉中央本部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协助下，召开“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会中西川竟积极到提倡废止结社之自由，率先决定停刊《文艺台湾》作为镇压其他结社的样板。一九四四年，西川自设“皇民学塾”，召

前《文艺台湾》同人至西川的宅中讲授《古事纪》、《日本书纪》等皇民史观。五月，西川写《几河山》、《战争与胜利的结晶石》、《斗六国民道场》等。此外，西川并写了《新加坡陷落》、《兰印无条件投降》，时间在《一个决意》发表时稍前。

这些辉煌的记录，清晰地说明西川满根本不是在日本战争体制胁迫之下从事战争协赞的言行，而是西川满从青年期以来作为二世日本殖民者右翼反动的历史所形成的、真正的西川满性格的表现。

西川满，是日本殖民地技术支配者西川纯的儿子。而西川一家，又是日本豪门秋山家之后。在日本资本主义奔向扩张的军帝国主义过程中，若秋山—西川这种日本阀族，起了重要的作用。西川一家是来殖民地台湾经营煤炭企业的，先天地带有榨取和支配殖民地的性格。三岁渡台，十四岁回日本求学的西川满，看到他的祖国日本本土上竟有日本农民和工人在艰苦劳动，原以为农民、工人、苦力皆为台湾人的少年西川，才知道日本竟也有工人和农民！一九二六年，试场失意的西川，干过台湾殖民地官僚，任基隆税关监吏。一九二九年，西川二十二岁，在早稻田第二高校中参加了当时右翼团体“国体科学联盟”，最早表现其右翼的思想倾向（近藤正己：《西川满札记》）。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之后，这右翼的、战争协赞的西川本性逐渐发露，使西川满为日本皇民化运动尽了最大的力量。关于这一点，即使张良泽先生在向日本人极力推荐西川过去的爱国行谊时，也不加隐讳。他说：

一九四一年四月，台湾“皇民奉公会”成立。翌年九月，作为“日本文学奉公会”台湾支部的“台湾文艺家协会”改组。十二月，同协会由西川满、滨田隼雄、龙瑛宗、张文环四人为台湾代表，派往参加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一九四三年二月，设“皇民奉公会文化奖”，西川以小说《赤炭记》获第一届文学奖。

西川氏原为具有浪漫、耽美的本质和士族家风的传统的诗人，因此，他的文学性格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中所隐压的幻想性，有其一致之处，遂使西川积极协赞了旨在强化日本帝国殖民

政策的“皇民化运动”：

显著的例子，是西川满氏在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不久，初次发表了歌颂大东亚战争的诗集《一个决意》和小说《生死之海》……

——张良泽：《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

这些资料，在在都无法用被日本战争体制裹胁为由，来为西川的帝国主义性格辩护和开脱的。其实，根据近藤正己先生的研究，西川的右翼的、反动的皇民主义思想，早在日本发动战争前就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近藤先生说道：

……若要想从他（西川——译注）的作品中，找出对台湾人所处状况之深刻考虑、解释等描写则极为困难。以下（所引用之）片段，是较明显可见的：“在以高度国防建设为国家急务之今日，并非回顾个人自由平等的时候。个人无论如何要坚固职守，继承祖父之遗业，以为社稷。”（《赤炭记》）“沙棠（现在的梅里尚德）已睡了吧！那个孩子让他进台南国语学校吧！这以后，不能不学国语。如此一来，如果我这一辈无法奉公，那个孩子、或孙子，过了两代、三代，只要是流着我的血，便使之尽皇民之赤诚，为乡土尽力吧！”（《云林记》）

以上二节，均非（西川）就执笔当时，亦即现实之背景来写，而是以台湾历史为题材所用的片段……

——近藤正己：《西川满札记》

至于把责任推卸给西川性格中的“耽美、浪漫的文学性格”和“士族家风的传统”，就更为无稽了，真正的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应该以扩张主义和军帝国主义为丑恶，甚至以一切现实政治为俗恶吧。西川满的极右翼反动性格的发展过程，正好说明了他的所谓唯美主义，他的所谓浪漫主义，其实是虚伪的外观，骨子里嚣狂的皇民军国主义才是西川的基本的、真实的性格。

不清算，可以；翻案，不准！

回顾日本逐步走向战争的历史时期中，殖民地台湾遭受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和物质的伤害。在那个疯狂的时代里，数百万台湾人民固无论矣，即使是加害者日本的侵略当局，也成为他自己所犯的严重罪恶所侵蚀和堕落的受害者。在残酷、严苛的暴力下，多少人的良知和心灵为了隐忍偷生，受到重大的羞辱和伤害。这就是人们一直不忍对于即使在日据时代至极明显的协赞日本军事侵略体制的一些台湾作家、文化人加以无情揭发和清算的原因。但是，也正好是在举世屈从于狂恣的淫威的时代，一些敢于坚守原则，不惜以自身的破灭为代价，挺身抗争，敢于为人性的尊严面对施暴者的锋镝的人们，才更值得后世之人格钦仰和尊敬。张良泽先生那种“谁都不可能不投降”论，是对于正气、公义、原则和勇气最令人遗憾的侮辱。如果张良泽先生还要进一步以这“投降有理”论，去为被一个曾经高踞协力日本侵略战争的文化人榜首的西川满翻案，则即使不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就是站在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的立场，也是值得震惊的疯狂罪恶态度吧！

张良泽先生曾引用日本文学史家奥野健男的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战争期中日本）文学家当中，虽然有一部分人丑恶地向当局靠拢，以告密出卖朋友，做出狂信的、皇国主义的、法西斯的言行，但是大多数其他文学家，态度一般是消极的。……（当时日本）不曾有过冒死以积极地主张反对战争或反对军国主义的文学家这个事实，虽然可以看成日本文学家的弱质和日本民族与社会的宿命的性格，但也不能不因而引起吾人深刻的反省。

张良泽先生引用这一段话的目的，原是用来作为“投降有理”论，为西川满开脱的。但是日本人奥野健男先生和近藤正己先生深刻的反省、知耻的态度，和台湾人的张良泽先生之一味为日本侵略罪行展辩的态度，形成一个令我深为羞耻和悲伤的对比。在日本军、帝国主义最猖狂的时代，多数日本作家的消极退缩，不肯正面挺身而出反对当时的战

争政策和帝国主义路线，奥野健男称为日本文学者的弱质。则受尽日本帝国主义侵夺，身为前殖民地出身的知识分子，迢迢到过去的殖民者之国日本去发表类若《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的论文，我几乎可以想象到当张良泽先生朗朗地宣读他的论文时，举座日本学者尴尬俯首的窘状了。

学术研究受到研究者个性、立场、思想的影响，毋宁是自然的事。但像张良泽先生这种毫无学术、良心和民族立场的态度，真是绝无仅有。如果张先生研究的，是绿豆芝麻一类的题目，倒也罢了。不幸的是，张良泽先生是在日本的国际学界，谈论有关台湾文学史和思想，则忝为台湾文学界的一员，就不允对张良泽先生的千古未有之奇的错误，保持缄默，从而有必要提出纠弹，否则整个台湾文学界岂不贻笑于国际士林，对于殖民时代歪扭了的历史下歪扭了的人，如何协助日本帝国主义加害者为虐，不加追究，是可以的，因为全体而论，莫不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如果有人处心积虑的为奸佞翻案则断断不准！为的是为人间后世留下起码的正气啊！

美国统治下的台湾*

——天下没有白喝的美国奶

美利坚：超级的帝国

作为一个帝国，美利坚共和国在二次大战中和二次大战后，有急速的扩张和发展。她远远地压倒了欧洲，成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雄长。美国一国的总消费量，等于全世界其他各国总消费量的总和。美国一国所使用的铜、铁、重要稀有金属、石油和能源，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或十数个民族和国家所使用的总和，她的陆海空军基地遍布全世界，和四十多个国家订立军事同盟条约，只有另一个霸权苏联可以匹敌。她的投资遍布全世界，不论在西欧，在第三世界，星条旗总会在地球的某一个地方上的基地和企业大楼上，迎见不没的太阳。她的大学吸引来自全球的知识分子，世界上不论富国贫国，都有受过美国大学、研究所、研究机构训练的知识分子，位居政、经、学、商和军界要津。美国制的武器、弹药、制服、军事编制，作为美国对各该国的军事控制和影响力的明显象征，遍布全球。美国的政治贷款、经济压力、国际特工，控制着好几个民族和国家。

以美国为母国的国际性企业，垄断和支配着全世界的资源、市场、政治和外交、军事。美国的“工业、军事”复合体对于世界上反对美国

* 本文刊于《夏潮论坛》(台湾)一九八四年六月。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十三·美国统治下的台湾》(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

经济、外交利益的国家，施行残酷的镇压。美国的国务院、五角大厦、跨国企业、新闻处、中央情报局、军事顾问团和学术基金会，所执行的环球策略，基本上与旧式殖民主义政策性格相同，但范围极大、内容极精巧，即所谓的新式殖民主义。美国的新闻社、电影、电视、全球性企业公告和遍布各国的美国新闻处，对全世界进行思想和文化的美国化工作，制造对美国和世界体系的优美形象，相对地消灭、破坏其他民族悠久、优美、深厚的传统文化……代替了过去的“白人的负担”论、“文明的使命”论等，今日美国以“大国的责任”和“自由”、“民主”的“信念”，向全世界进行不知脛足的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经济上之扩张。以无数原料国的贫穷、文盲、疾病、政治不安和内战为价，美国支配全球各地的资源，以维持美国的“富强”；美国也以颠覆、暗杀、镇压为手段，支持许多第三世界的军事独裁政权，以维护美国的外交、经济的利益。美国不惜支持她的傀儡政权，对各国要求民主和自由的政治运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之血腥的镇压，来保障美国在各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

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深远、广泛地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人民、民族和国家。在有些国家中，美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政策，简直和自己的近现代史分不开。而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战后美国和台湾的关系

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军方为了接运来台接收的国军和遣返在台日本侨民和军队，美国海军舰队进驻高雄港。当时，由于台湾当局对美国海军的骄横作风有所不满，不予合作，美国竟派遣数千名陆战队非法登陆台湾沿岸要地，完成遣送日本侨民的任务。

为了让台湾作为美国空军不可或缺的中继站，战后，美国迅速修复了台北、新竹、台南等地的军用机场，并在林口和松山建立航管雷达站，进驻美国第十三航空队。早在国共战争在大陆结束之前，台湾已经成为

美国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了。

美军在战后的对台任务，是在台湾建设美国在台湾的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当时驻台“陆军顾问团”在台湾当局的排拒下解散，另行组成美陆军“驻台办公室”。美国的台北领事馆成立后，这些军人转隶这领事馆的武官处，继续活动。在同一时期，美国驻台军事和情报单位，并完成对台湾地理、水文、人文、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调查。

在国民党于大陆节节失利的情况下，美国原先支持“国府”剿灭中共的政策开始转变。一九四九年，《中美关系白皮书》发表，正式宣告放弃“国民政府”，并且企图以遗弃“国府”为代价，向中共示好，以利继续维持美国在“革命”后中国的利益。一九五〇年，杜鲁门总统宣布承认中国对台湾的宗主权；美国不图占有台湾或在台湾建立基地，享有特权；美国不图在台另建亲美独立政权，并不再为“国府”提供军援，最后宣称美国不介入中国内战。至此，美国全面、彻底地遗弃了“国府”，暗地里准备向中共伸出“友谊”之手。

一九五〇年六月，韩战爆发，把东西冷战带向一个高峰。美国以缩小韩战的战争面为言，宣告“台湾海峡的中立化”政策，一方面制止“国府”反攻大陆，一方面以美国海空军力进驻台湾，吓阻中共对台进攻。十月，中共挥军渡鸭绿江与美军对阵，美国开始改变对“国府”的遗弃政策，恢复了有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军事援助，以增强“国府”三军和培植亲美政权，使台湾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组成部分。

从此以后，大量的美国军队进驻台澎和金马地区，美国的军事、经济、文化、政治和情报势力（如“西方公司”和民航公司“CAT”），随着中美协防条约、美国军援和经援在台湾的介入，大量、广泛地渗入台湾的生活。在越战之前，“国府”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在八二三炮战时达到了高潮。而这期间美国军事、情报单位直接介入国共双方在外岛上的几次炮战和海战，已是公开的事实。越战则造成美国与“国府”军事合作的另一个高潮。这时清泉冈大型军机场的建设和启用，使台湾成为美国越战的后勤基地。驻台美军激增，而对台军援也由赠与性的改为贷款和军品、军火厂销售的性质。

一九七〇年代开始，美国为了它新的全球战略，开始转变对中国的政策。随着美国与中共关系的调整，停止对“国府”外交承认，美国撤废了协防条约和台海决议案，并撤走了驻军和军援单位，但以“台湾关系法”维持美国与台湾间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利益。

“国府”的美国经验：求全与委屈

一九五〇年，在大陆战争全面溃败，美国宣布对“国府”遗弃政策下，“国府”面临着旦夕间破灭的危机，却在韩战中，全面扭转了危机。美国对“国府”也因中共的悍然参与韩战，对“国府”政策也从遗弃主义逐步转变为支持和美国化改造的政策。

于是，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今天，亲美、扬美、依美成为台湾三十年来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因此，台湾三十年间，政治上、意识上反美和对美国的批评，基本上是一个禁忌，极容易和“破坏中美友谊”、“共匪阴谋”扯上关系。三十年来，美国在台湾被塑造成自由、民主的最高榜样；美国是“自由世界”伟大的领袖，是对抗邪恶的共产主义的世界盟主；美国是富裕、有正义感、慷慨、友好的国家；美国是一切进步学术、艺术、文学的来源；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技术与科学的总本山（这一点是有部分真实性的）；美国社会是一个开放、多元、富裕、民主、自由甚至公平社会的最高榜样……

在政治上，对美国全球目标的依存，成为台湾政治的主要方针。跟随、配合美国的全球外交政策，成为台湾政治的主要性格。在军事上，台湾明显地是美国全球战略部署中的一个基地。一九五〇年以后，在美国大量军援下，“国府”军队得以存在、改造。美式军事装配、制度、管理，深深地改变了“国府”军队的面貌和品质，并且配合美国军方，执行美国在韩战、越战和其他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政策，尽了一定的任务。在经济上，美国的经援稳定了五十年代台湾濒于破产的经济，完成了土地改革。美国的援助和投资，深深地影响了台湾的经济，使美国商品、资本和技术，深入地在台湾各处扩散，造成台湾在市场、资本、技术上

对美国愈来愈深的依赖。

在文化上，美国在战后根本改造了我国教育结构，通过教科书、派遣研究人员到美留学，完成了我国教育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美国化改造。美国新闻处、好莱坞电影、美国电视节目、美国新闻社的消息，基本上左右着台湾文化，并且持续、强力地塑造着崇拜美国的意识。在六十年代，美国自由主义被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奉为经典，美国的流行音乐、美国的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艺术和文学支配台湾的文艺界达数十年之久。大量的留学生从六十年代起涌向美国，并滞留不归。甚至在台湾的英语教育，也是纯粹的美国腔调。台湾的宣传机构，甚至在七〇年后美国展开新的“遗弃”主义时，也一再悲忿地宣称台湾战略地位的美国利益的重要，宣称自己是美国再也难于找到的最忠实的盟友。

但是，在这一切前台的“中美传统友谊”的背后，却隐藏着“国府”和美国之间暗潮起伏的斗争。从一九四九年前美国军方顾问在台的专横的情报、军事行为与当时台湾当局的矛盾开始，一九五〇年重新开始的美国对“国府”军援，夹带着“国府”军队的美国化及美国支配的目的，而和“国府”当局展开顽固的斗争，传说中的美国支持下的反政府军事政变，经“国府”逮捕孙立人将军而失败；在“国府”对日本和约中，压迫“国府”接受“台湾地位未定”的条款；以中美协防条约制止“国府”反攻大陆，却同时从一九五四年起以美国 CIA 情报结构展开对中国大陆的间谍和军事行动。除此以外，从战后美国在东京的麦帅总部对当时台湾分离主义运动者廖文毅的支持开始，美国政府当局一直和台湾分离运动保持着秘密和公开的联系。此外，美国政府、情报当局对台湾三十年来各阶段反“国府”的政治运动及其中的活动人士有各种连带，其实早已是一项公开的秘密了。三十年来，“国府”就是这样地和美国过着明里握手拥抱，暗里做着艰苦的攻击斗争的生活。回想起来，台湾终究没有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沦为美国更为彻底的新殖民地，“国府”独到的政治手腕，有它的“政绩”。

然而，不论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国府”图存的政治方略间，在

暗地，在幕后，如何在三十年来的台湾进行着长久的阴谋与反阴谋的斗争，“国府”长期、公开的亲美、从美政策，在台湾的朝野间，形成了一股深远的、复杂的崇美、媚美、扬美的氛围，并且在民族的精神和心理上造成了对美国、西方的崇拜，和对自己的自卑所构成的复杂情绪。而不论“国府”当局和批评“国府”体制的党外，尽管互相批评和攻讦，却同时对美国表现出同质的争宠、谄媚和依存的态度。这无宁是一件复杂而富于讽刺的现象。

近代史中的美国对台湾政策

台湾的制式历史教育中，美国被描写成对中国没有领土、政治和经济野心的国家。在十九世纪凶恶的西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时代，据说美国是唯一主张中国的“门户开放”，制止列强在中国划地独占的国家。在台湾的反“国府”体制的民主活动中，也把美国看成真心同情和有力支持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大国，在想象和实际上，引为奥援。

“国府”和党外对于美国对台湾接触的史的本质有意、无意的无知和歪曲，其实是两者在思想、感情上形成深重的“美国结”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美国对台湾抱着领土、资源、政治、军事的野心，与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殊无二致。一八五〇年代中叶，在美国水师提督倍里叩关日本的同时，即曾奉命调查台湾资源，主张美国占领台湾，并且主张台湾在当时国际贸易与交通上，对美国有实质上的利益。同时，当时美国驻远东外交人员哈里斯，极力收集有关台湾资料，向美国外交当局力陈美国占领台湾之利。美国商人黎基敦力陈台湾对美国之利益，主张美国派兵占据台湾。一八六〇年代末，美国曾一度以应惩杀害美国水手商人台湾山胞为理由，派兵登陆鹅銮鼻。这些与当时西、法、英各国在东亚的帝国主义行径殊无不同的思想和行为，虽然因为美国对中国事务介入嫌晚，加以美国国内黑奴问题而形成分裂，引发内战而来有具体的结果，但美国对岛屿台湾的帝国主义政

策，早在十九世纪业已形成，事实俱在。

一八七五年，美国开始了对中国的外交接触。当时列强早已纷纷在中国划地独占，美国成了一个迟到的侵夺者。为了阻止列强在华继续瓜分，以便为美国找到插手中国事务的空隙，美国倡言中国的“门户开放”主义，其实只是为了能使美国在中国与列强争分一杯羹罢了。

美国和台湾分离主义运动

接着，从二次世界大战到战后以来，美国和中国，从而和台湾发生了空前密切的接触。但作为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连带地对台湾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延长，使得先是在中国后是在台湾建立和培养了一个亲美、听命于美国的政权，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主要核心部分。

一九五〇年，美国对“国府”“恢复”军经援助的同时，主动、连带地执行着台湾政权的亲美化改造政策。以军援、美援为手段，美国企图支配“国府”三军系统、企图培植亲美将领颠覆国民党政府。在此同时，美国一方面以军经支援巩固“国府”在台湾的统治，一方面早在五十年代初，即由驻东京盟军总部卵翼廖文毅在日本的分离运动。一方面对“国府”恢复军援，促成“国府”与日本和约的签定；订立中美协防条约，通过台湾海峡决议案，一方面又公开提倡“台湾地位未定论”，不但为了为美国军事力量进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制造法的根据，一方面也是用来制造各个阶段的“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政策。而正是在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的阴影下，滋长了三十年来各派别的台湾分离主义。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三十年来各种主要的台湾分离主义理论，都先由美国或日本政客和“学者”率先提倡。一九五五年，有名的赖旭和倡言协助一个“民主台湾”之发展；同年，美国曾要求李宗仁出面推翻“国府”，建立独立的台湾；六〇年，美国副国务卿倡言一“独立的中台国”之利益；六十年代，美国人柯尔抛出了“台湾人在人种上并非中国人”之论。另外，以赖旭和为首的美国“现代化”派学者，在肯定日本战后“现代化”成功之余，连带肯定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从而谓

台湾已因五十年殖民而受日本“同化”，而主张台湾与中国的分离之论，孟德尔有推翻“国府”而使台湾独立，可使中共攻台失去理由，从而可维持台湾海峡之和平论；有国共和谈将危害美国在台湾之利益，而力主台湾独立之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而最近两三年间流行于北美的“台湾民族论”，实也无非以上诸论的一个延长。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对华政策进行重大改变，在转移对“国府”之外交承认于北平前后，私底下抛出了更多支持台湾成为一“独立政治单元”以永久分离于中国的“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论。虽然一直到两年前，美国才公开地抛弃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台湾为中国之一部分，并且公开放弃了对台湾独立的支持政策，但在实际上支持台湾自中国永久分离以确保美国之台湾利益的政客、议员、商人和学者，仍大有人在。而海外，尤其是北美的台湾分离运动，其右派如“台湾独立联盟”、“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者，固然公然采取对美附庸的立场，以促成如“台湾前途决议”案之帝国主义法案以骄人，即连自称马克思派的“左”翼分离主义，对美国的对台湾之帝国主义历史和政策，也睁眼、闭眼，装聋做哑。

台湾民主运动和美国

如果“国府”是一个亲美的政权，那么，何以作为“国府”的对立侧面的台湾中产者民主运动，也抱持着绝不亚于“国府”的亲美、媚美、美国庸属的立场？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至少可以举出两个因素：

第一，在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两手主义”。美国一方面为了压制各地反美民族主义，不惜维护政治上不稳定的政权，以交换美国在各该国之政治、外交、军事及经济利益。但在同时，美国也深知这种政府不能长期稳定，为了避免被当地反美势力颠覆，美国总是同时和当地亲美的反体制运动保持密切的联络。美国一方面以军经援助支持菲律宾马可仕政权压制其反马可仕民主运动，但一旦看见马可仕政权已无法强予维持，就会转而支持像阿奎诺那种基本上亲美的反马可仕势力，就是一个

实例。因此，是台湾中产者民主运动过去的原来地主—中产阶级的属性，及今日台湾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规定其亲美性格，促成美国对他们的支持；而这美国支持的自身，又对其亲美。美国附庸性格，促成扩大再生产。

第二，是三十年来台湾在文化、宣传和思想上掩盖美国对台帝国主义政策所造成的矛盾，却同时大力提倡亲美、崇美的思想、情感和教育，使台湾知识界、文化界失去对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帝国主义因素的批判力。对“国府”体制的不满情绪，竟而不但没有造成连带地对“国府”表面所亲倚的美国之批判，反而成为“国府”争夺美国支持的竞赛。

在五十年代的台湾民主运动中，殷海光不论在民主理论、反对风格上，皆有今人尚不能超越的成就。但即使嫉恶如殷海光，尚且不能没有依据力（美国）以达成台湾的民主运动目标之想。美国对当时著名的民主反对派领袖高玉树的政治和经济支持早非秘密。一九六〇年代末，美国中央情报局公然私运当时分离主义民主运动学者彭明敏出台湾，在美国进行分离主义运动。同时期，美国使馆介入一个地下分离主义运动案件。

一九七〇年代，从“台湾政论”系开始的台湾中产阶级民主运动，基本上并没有改变对美国依恃的、亲美、崇美的性格。美国对康宁祥的支持与重视，表现在美国与“国府”断交时将消息同时通知“国府”当局和康氏一事，表露无遗。康系三议员于一九八一年访美言行，及返台后发表的声明，表现出台湾中产阶级民主运动在“美国支持台湾合于美国利益”等言论上，和其所反对的“国府”有共同的理论和语言。在近年党外内部“批康”运动中，自称在运动中更为纯粹和彻底的反康一系，在批康的内容中，也丝毫不曾触及康系的亲美方针与立场。一九八二年，以“美丽岛”系家属为中心的党外立委访美，在美遍讼支持台湾的美国“自由派”参议员如罗勃·甘迺迪、索拉兹等，回台以后，在各自的政论杂志上，大篇幅刊登自己和美国政要、学人的合照，甚至以此合照在八二年底的大选中作为竞选的号召。同年，美国参议员索拉兹访

台，为了争取参加他的演讲餐会，党外内部竟产生了争执和矛盾。几年来，党外和“国府”一样，为美国是否坚定支持台湾而心烦虑乱，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流泪。他们同为美国与中共间各种公报、文件中的措辞，各搞各的拆字游戏，各自寻找“美国人爱不爱你”的证据，凄凄惶惶，不可终日。

“美国结”——台湾结的根本大结

同在一个依附美国的社会基础上，“国府”和党外同时培养并且发展了亲美、崇美，对美国基本上没有批判意识的相同体质，并且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美国结”。而这美国结的具体情感，不论在国府或它的反对体台湾党外，都表现为下述六种心态：

一、各自认为自己是美国最忠实的伙伴。都认为自己最忠实地信仰和服膺美国反共、民主、自由的原则；都认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完全符合美国当面战略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

二、都对美国怀着哀怨却热烈的情感。都关心上海公报上“认知”和“承认”的差别；都希望美国为台湾“一千八百万居民”的“幸福”与“自由”介入台湾事务；在美国与中共眉来眼去之时，都表现出哀怨的沉默，一厢情愿地抱着美国“不会遗弃我”的热情，而不敢发出怒声。

三、都私下坚信“美国最爱我”。有人凭着在台湾实际有效的统治和三十年来各种具体合作的历史经验；有人凭着三十年来美国“暗”中伸出来的手，各自相信美国“对我最好”，死心塌地，再大的考验，都忠贞不渝。

四、都对美国的富裕、“民主”和“自由”、强大的国力，高大漂亮的形象，有发自内心最真实的崇拜。美国国会、舆论对自己的一褒一贬，都足以使自己陶醉或悲伤。与美国相接，尊崇、敬服之心油然而生；与美国政界、商界、学界相接，则欣然有骄美之色，不知不觉间，在美国人面前自动地流露出谄笑之色而不觉。

五、都对贫穷的中国大陆有鄙夷之情。有人对“匪区”的贫穷落后、专制暴政，长期做鄙夷的宣传；有人对“中国民族”传统中的落后、“残暴”、“黑暗”，怀有深刻的蔑视和敌意，甚至发展成一种反华的情感。这种对中国大陆人民、历史和文化的鄙视，和五十年代冷战时代由美国推动的反共论调，有极为密切的关联，而不知不觉间，在这种宣传下，中国大陆竟成了他国；大陆人民竟成了他族。

六、对美国文化、政治、国力的崇拜，造成了对西方文化、政治的崇拜，并且同时在对立面，都发展出对东亚邻近穷国、第三世界贫困国家的轻蔑意识。因此，不论“国府”或党外，对第三世界都不约而同地忽视、鄙视。在他们的眼中，能说欧美语、日语的人种才是高等的民族，他们都同情和支持以色列和南非，在亚洲，除了日本，他们只看得起会搞独裁、也会搞钱的新加坡……总之，崇拜欧美、轻视第三世界，成为同时并存的二重结构。

在这样的“美国结”的世界中，人们在偌大一个地球上只看见一个巨大、光辉的美利坚共和国，以及在这共和国旁边的台湾。除此而外，对整个欧洲、东亚、中东、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甚至中国大陆皆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此，虽然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这个思想体系中，很早地表现出挣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远见，今日的“国府”，甚至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对广受第三世界诟病的美国、以色列和南非的“亲善”态度。而党外的视野，在这个问题上，也决不比“国府”当局高明。把落后国家的疆界胡乱重划，恣意促成许多不必要的“独立”国家，以利对它的控制和掠夺，正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杰作。非洲大陆上无数“独立”的国家，彼此互相杀伐，正是非洲大地上从前的殖民母国一手炮制的。不认识在这“世界体系”下台湾近代史的展开，一味提倡“台湾民族”以使台湾“独立建国”的海外台湾分离运动，其实便是在“美国结”的狭小而荒谬的世界中所产生的错误认识。

事实上，认识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朴正熙、全斗焕专制体制下，勇敢地为韩国民主和自由崛起的韩国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从战后以来，一直把美国看成韩国民主、自由和人权运

动的有力后盾。特别是在卡特总统的“人权外交”时代，韩国的“党处”和青年学生，对美国有坚定的信赖。一直到美国雷根政府无情地允许全斗焕以美援武器、弹药和情报器材对光洲的学生蜂起进行毫不掩饰的血腥镇压，韩国的反对派和学生，才学会了一课沉痛的功课。

在一个绵密的、由新旧殖民主义所交织成功的现代世界体系中，东亚和整个第三世界的近现代史，至少应该使这一件事实无从隐蔽，即为了争取自己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政治的民主和自由，只有一个可靠的依靠，那就是自己的同胞。任何想援引外国——特别是强国来达到自己追求独立、解放、民主和自由的目标的企望，几乎毫无例外地会遭受到悲惨的失败的命运。时至今日，在整个辽阔的第三世界中，几乎已经没有一个地方像台湾一样，不论在朝在野，那样地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缺少批判的认识，而对于美国的一切，还怀着几近幼稚的幻想。而这一切，从台湾的反体制运动的角度来检讨，只是愈益显现出这样的事实：台湾的中产阶级党外运动，至少在目前阶段中，在历史、思想和文化上是如何的贫困和幼稚。如何在中国、东亚和第三世界的近现代史的结构中再思考台湾前去的道路，努力从“美国结”和亲崇美国、轻视第三世界这个二重结构中挣脱出来，在中国历史的现代中，在中国自己的民主、自由、独立的运动中，争取自己的地位，恐怕是台湾中产阶级党外运动今后阶段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吧。

(参考：南方朔：《帝国主义与台湾独立运动》，南方朔：《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狄纵横：《驻台美军三十年沧桑史》)

从台湾都市青少年崇日风尚说起*

最近两年来，在以台北市为首的台湾城市中，有一部分青少年，表现出对日本服饰、发式、歌星、歌曲等日本青少年流行文化的热烈模仿和学习的风尚。这一风尚，逐渐发展成对日本文化、社会和国家的，极为肤浅的倾向和崇拜，而引起部分文化评论人士的侧目和忧虑。

迟来的日本影响

台湾经历了五十年日本殖民统治。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之后，台湾许多有识之士，就展开学习中国祖国文化，清除日本文化影响的热烈而主动的文化运动。日本的政治、文化、军事势力，也随日本之战败而退出台湾的生活。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代中末期，美国对台湾经援停止，日本在战后急速复兴的资本主义，在美国安排下，开始将它过剩的资本以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再度介入台湾的国民经济中。

从理论上说，日本的文化影响，理当随着日本资金、技术和商品重新在战后对台湾再“进出”的六十年代中末期，就已重新在台湾登陆，而发挥绝不亚于美式文化和价值体系……之对战后台湾的影响的日本影响。

但事实却不然。当美式价值、文化、思想、制度自五十年代起在台湾的教育、思想、文学、艺术、经济和农业等各方面展开压倒性影响之

* 本文刊于《中华杂志》(台湾)二七二期，一九八六年三月。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八·鸢山》(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

同时，六十年代末，政府停止了日本影片的进口。日语文在文化媒体上以行政命令加以禁止，日文书刊杂志和报纸的进口，受到比英文书刊、报纸杂志更为严格的控制，而且严厉限制日本书刊的性质于理工科技方面。

政府的这一措施，一方面来自国民党在抗日期间经历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加害而来的，内化了的反日性质，另一方面，也未始不在防止日本文化与台湾民间的再温存，促成台湾民众对政府的异心。

政府的此一政策上的、有意识地防杜日本文化影响在台湾的展开，使得日本资本、技术和商品进出台湾的同时，人为地阻遏了文化在台湾的“进出”。

日本文化影响在台复活的背景

但日本对台湾的影响力，却一直强力地存在着的。在中国现代史中，国民党与日本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微妙的长期关系。这样的关系，使得“国府”与日本之间，同时存在着对日本的刻骨仇恨和对日本的千丝万缕、难于分割的特殊关系。在国共内战期间，由于日本军阀以反共、灭共为名，不但出兵中国，卵翼亲日傀儡政府，也还与“国府”相互进行过政治的和军事上的反共和防共的协力关系。日本战败，日本头号战犯冈村宁次还受到“国府”礼聘，以军事教练的地位，为国军训练反共、剿共的军事方略，是人尽皆知的例子。

“国府”迁台之后，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身份，首先是政治上仰赖美国，其次则经济上仰赖日本的援助。因此，台湾的“国府”“知日派”和日本保守派当权政治阀系，展开极度亲善友好的关系。从吉田茂、芳泽谦吉、佐藤荣作一直到岸信介这一系在战争时期为日本侵华政策力行者，从战败国的战争官僚，一变而为台湾的老大哥，受到我们极度的优礼与笼络。随着战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日本资本在东亚的扩张，到了六十年代末，佐藤首相已经公然狂妄地向世界宣称：台湾海峡的和平，对日本国防有重要关系云云。一个战败国日本，至此却公然摆出干涉中

国内部事务的姿态。在这种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特殊结构下，曾经领导过亿万中国人民抵抗日本的“国府”，失却了立场。因此，在战后四十年台湾的历史教育中，严重地忽视了对日本侵华、侵台历史教育，在政策上，对日依赖取代了对日批评，长时期不谈抗日，不举行任何纪念抗日战争的活动。另外一方面，大学或大学外的日本研究极端粗疏和落后。台北某大学日本研究所中，充斥着旧时亲日台籍学者，对日本不但没有独立、批判的学术立场，更不允许研究生对日本采取独立、公正、客观和批判的研究！

新的日本崇拜

在上述的结构下，战后四十年的今天，终于在台湾发展出一股新的日本崇拜。这新的日本崇拜论，主要表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日本战后资本主义的快速复兴的崇拜。这一倾向，尤其以 Vogel 的《日本第一》一书在台翻译发行为起点。日本的战后复兴受到欧美白人中心论的经济学者乐道，把日本的战后资本主义复兴，作为东方国家依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成功地完成“现代化”的代表，而加以过大的评价。这一派学者，有意忽略日本的资本积累与日本战前向台湾、朝鲜和中国进行军事扩张的密切关连，也有意忽视日本在战后“二体制对立”的世界结构中，在韩战和越战中争取战争财富的事实，也有意忽略日本在美国卵翼下，建设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东方的栋梁这个世界战略中，助长日本战后的经济帝国主义，以日本过剩资本向东亚各国进出的事实，而单纯从日本的文化传统、民族性、管理体制和东方商法、对西方冲击之回应态度等，附丽了日本战后成功地现代化的原因。在近二十年间，以“半边陲国家”而在出口导向经济中取得一定成就的台湾，因而掀起了对“日本式管理”、“日本式商法”的迷信与崇拜。

其次，在台湾反体制党外民主运动中，由于承继了五十年代美苏冷战的心智，产生了一股或明或隐的反华心态。他们从反对国民党，发展

成不反对国民党所反对的事物这样一种态度。四十年来，台湾官式反日、抗日言论的僵化和教条化，使我们的党外产生“只有国民党、外省（中国）人才反日”这样一种逻辑。因此，台湾反体制党外运动，成为第三世界反体制运动中唯一不批判美、日强权的一支。

第三，由于这股新的日本崇拜，由于台湾在中国现代史教育中刻意忽略抗日历史的教学，有一些青年，宣称“抛弃历史包袱，重新认识和学习日本”，以为反日、对日批评，是“老一代人”与日本的历史恩怨所造成的“包袱”，从而以反日和日本批判为盲目、无理性、不客观。于是我们的青年要“抛弃”这“历史的包袱”，重新去认识日本，向日本学习。而这认识、学习的具体内容，也无非是日本式管理、日本商法等层次低落的东西。相形之下，今天南韩、中国大陆、泰国和菲律宾的学生、青年鲜明的反日和日本批判的认识高度，是我们一些只知日本的赚钱法的青年，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小儿女的日本崇拜，是一种复杂的被害

因此，台北市西门町中青少年小儿女的日本崇拜，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战后亲日、依日结构下的，最为肤浅的反映。这些小儿女，只不过模仿日本青少年的发式、衣饰、鞋袜，崇拜日本的青春歌唱或电影明星，比起四十年来台湾在文化上、价值上、语言上、思想上的长期美国化，时期既短，深度和广度皆不能比拟。我们的文化评论家，不曾反省、批判台湾的长期美国化（尤以近年来大量美国速食工业的登场，和即将在政治压力下对美国商品大开门户后为尤然），却独独对小儿女的肤浅的日本崇拜忧心如焚。事实上，今天西门町小儿女的崇日风潮，只是具体而微地表现出台湾教育的严重缺失，使青少年失去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失去清晰的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并且使他们成为战后四十年来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亲日和对日无批评的复杂结构下被害的一代。与其责备那些醉生梦死、懵懂无知的小儿女，严肃反省崇洋媚外的台湾的文化结构和政经结构，恐怕才是当前的要务吧。

从一部日片谈起*

——论《联合舰队》

在春节前后盛大上映的日片《联合舰队》，有明显、严重的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但是我们的电影政策单位、大众传播影剧部门、电影批评界和一般文化界，不但没有给予必要的批评，反而给予直接和间接的帮助和鼓舞。

《联合舰队》讨论了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但这讨论并不是在反省和批评使日本走上军事帝国主义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上的问题，从而追究日本侵略战争对各被害民族与人民所造成严重而深刻的损害责任。《联合舰队》讨论的，是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日本吃了败仗？”讨论的结果，是当时日本缺少像山本五十六那样通谳西方政治、社会和经济力的军人；是当时日本军部尚不了解军事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是海军部南云元帅的不谳敌情；是愚昧的栗田元帅错误的判断。

在整部影片中，我们只看到地图上战事的推演，却从来没有看见菲律宾、夏威夷、中途岛和广泛南太平洋和东亚地区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攻略下，生命、财产、生活、文化和社会所遭受的至为深刻的被害。从《联合舰队》看来，整个“太平洋战争”，只是大国美国与日本的角色力，太平洋地区民族和人民的生命、尊严、愿望和权利，在《联合舰队》的思想中，恐怕比草芥都不如了。

《联合舰队》有日本帝国海军在美国强大海空武力下，受到悲惨的

* 本文刊于《中国时报》(台湾)一九八七年二月六日。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九·鞭子和提灯》(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

打击，而至于殒灭的大量镜头。有人问：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反省吗？

问题是，战后日本当局在有关二次大战中日本战争历史的教育上，一贯只偏重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受到西方重创的历史。而对于日本前此长期劫掠朝鲜、台湾、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历史，不是提得少，就是加以大肆篡改。现代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战后长年来掩饰日本在东亚的战争罪行，夸大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挨打、日本军民矢死效命，为国迎战”的一面。这就非但没有丝毫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反省与纠弹，而且把日本塑造成二次大战“被欺负”的角色。日本的战败，主要是因为日美国力、战力的悬殊；日本战败的道德因素——日本扩张主义对广泛亚洲、南太平洋地区民族和人民所造成的，至今犹未平复的严重损害，则非所顾念。像这样危险而傲慢的意识形态，不但是电影《联合舰队》的重要主题，也是日本政府和右翼文化人如藤尾正行战后四十年来猜猜不绝的论题。

因此，《联合舰队》充满了这些“动人”的情节：为帝国日本捐躯效死的光荣；“为了日本国家的存续与发展，必需有为之死命之人，和为之存活之人”；太平洋战争，是为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的生存而战；是为了“不使日本本土成为战场”而战。所有这些推进了罪恶战争的日本将领、校尉军官、军人、士官，在《联合舰队》中全部被写成充满了忠爱日本的国家，充满着纯洁、高尚人间性的人物，对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为亚洲人民和日本人民所造成的难复的浩劫，没有任何的反省、检讨和批评。

一个以长达八年的时间从事对日本抗战，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付出了重大的生命与财产的代价的民族和人民，在这受过日本五十年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土地上，竟有电影政策单位，在基本上限制日片进口的条件下，选择了《联合舰队》这样的日本帝国主义电影上映；我们的大众传播上，除了刊映《联合舰队》的电影广告，还有推介和大力宣扬《联合舰队》的“影评”。到目前为止，我们比较独立的电影评论和文化、知识界的一般，除了王墨林的一篇，也尚未出现对于《联合舰队》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严肃批判。

《联合舰队》在台湾所形成的上述问题点，具体而微地表现了元月末由四、五十个自由文化人签署的“电影宣言”（人间副刊，元月二十四日）所提，关于台湾电影环境的三项“忧患”。

如果电影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恐怕就是一种最为昂贵的艺术了。要求新台币千万元或数千万元的投资，电影不但是一种工商业，也是大的工商业。以三个月或半年，投资一千多万元，在上市一、两个星期内就见输赢，其实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豪赌。为了减少不可捉摸的投机性，为了较好地保证资金回收与利润，走行销主义路线搞企划、市场调查、观众定位、并据以进行剧本写作与影片制作，配合一贯性设计的广告宣传……成了片商的不二选择。因此，电影就像一切消费性商品一样，在操纵新的欲望（需求）和随从并扩大已有的欲望（需求）中求广泛、大量的销售。电影于是不能不诉诸比较卑下、庸俗的趣味：笑料、暴力、色情、偷窥、恐怖、嬉闹和眼泪……充斥了台湾电影的内容。

电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性格，自然也培植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意识形态的电影人：一切以“经营管理”出发，以利润、效率、生产性和票房来衡量一切价值的制作人、剧本作家、导演、影评人……他们以新时代的文化人自居，崇拜和身体力行着资本主义企管上的金科玉律，言必称企划案、市场情境分析、问题与机会分析、目标设定、诉求对象设定、策略设定、行动计划、预算编制与控制、销售计划、广告宣传策略……而于是乎志得意满、信心十足，对于谈电影思想文化、艺术和理想的人，表现出程度不同的轻蔑。对“市场性”和“销售业绩”的崇拜，到了在不知不觉间以之衡量创意、文化、知识和思想艺术之高低和存亡权利的唯一标准。

事实上，电影上存在的这些问题，以不同的规模和相同性质，存在于文学、戏剧、舞蹈和音乐上。唯一不同的，是电影的生产成本太高，从而造成了资本和政治对它的干预和独占。以写小说为例，一个小说家只要一、两刀稿纸，三只原子笔，就可以搞他的创作。在作品发表上，他至少有便宜的同人杂志刊登。这样一种形式的艺术，独占就几乎不可能了。出版社尽管可以挑通俗小说大量印行以求利，但严肃作家则另外

有纯文学甚至政治反对派的杂志会刊印他们的小说。电影就不同了。大量的资本投资要求着高额的利润保证。于是与“弘扬中华文化、阐扬国策、发挥社教功能……”不但无关，而且完全悖反的《联合舰队》，可以安全过关上市；大众传播因着独占、媒体利益和文化异化的性格，对《联合舰队》不但不加批判与讨论，还为它刊映广告，刊推介的评论，而一些“影评人”也为《联合舰队》极尽辩饰扬喻之能事。

这样的问题，从某个角度看，特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则举世无不皆然。但“电影宣言”却指出了台湾电影文化比较特殊的一点，尽管在资本主义工业的规律下，电影的商品性、庸俗性，举世皆然，但很多国家的政府与私人，毕竟在以一笔相当大的钱，在一些真正具有电影文化训练与眼界的人管理之下，有宗旨、有计划地在强烈商业主义规律下抢救和培植“另一种电影”；尽管在外国，有许多报纸、杂志、电视台……为比较消费性的、庸俗的电影文化服务，但他们的一些具有文化权威的报纸、电视台总是在鼓舞、发现和评论优秀的“另一种电影”上，不遗余力，而且绝不会用它的版面和时间去为庸俗甚至有害的电影吹捧、鼓舞；别的先进国家自然也有不少写“速食”式的庸俗电影“消费指南”的“影评人”，但他们自有他们的天地和范围，绝不会也不可能取代在文化和知识上有权威的影评人和电影文化人，甚至要求别人“反省”为什么好电影“曲高和寡”！在外国，电影生产上的行销主义，有千万倍于我，但他们却很知道两种不同的“利润”：票房现金利润和高度文化、艺术评价所代表的另一种抽象却无从以金钱翻译的“利润”。“电影宣言”发表以来，政策单位和若干导演、制作、剧本作家和“影评人”、大众媒体影剧主编的初步反应（人间副刊，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恰好进一步说明“宣言”的三点“忧虑”，有严肃的现实基础。

“电影宣言”的对象，其实是一种电影生产与再生产体制所延伸出来的文化的问题。老实说，认识和语言上恐怕都不免略嫌单薄的这一纸“宣言”，要改变傲岸巨大的台湾电影产业结构，是近于绝望的。如果赢得四、五十个文化人签名，在传统电影结构的冷眼和冷笑中不了了之，则莫若积极地想出可行的后续方案：例如成立求“新电影”工作者

的知识与文化上的组织；尝试用 ENG 或八厘米等低成本手段拍短片；筹办定期短片发表会；组织接受团体预订机动巡回放映作品的结构；设立艺术电影院；强化各大专青年电影欣赏、研究与讲解活动；发展记录电影的知识、理念、技术和实践等等。

光复以后，有四十个以上的文化人出面为一件具体的文化问题签名的事，恐怕在“宣言”外，少有别的例子。依我看，许多电影文化圈外的朋友签了名，应该理解成不单是关心目前台湾电影，而是在全面商业化、庸俗化、消费化环境下对发展“另一种文学”、“另一种音乐”、“另一种舞蹈”、“另一种传播”、“另一种戏剧”……怀抱着深刻关切。台湾电影文化的提升，基本上关连着台湾各领域文化在知识、思想和专业上的飞跃。没有这全面的飞跃，单独电影一门的提高，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电影宣言”所揭示的意义，就不仅仅是对现行文化体制的“怀疑”，而是全面的反省、再思考和批判：为了重新思想和逐步建设目前阶段的、具有当代中国民族独立风格与面貌的、批判长期依赖西方的新的知识、文化、思想和艺术。

台湾内部的日本*

——再论日本战争电影《联合舰队》

关于日片《联合舰队》的拙论，引起了两位读者来信，对拙论有所批评。现在针对其中既无署名、又无通讯地址的一封所提起的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对于让我们理解一九五〇年中期以后，日本战争电影结构性的“右倾化”历史和意义的理解，应有一些助益。

这位匿名的读者对拙论的反论，可以概括为这几点：

一、《联》片“确实是很重的军国主义色彩”。“但若不如此，实不足以纵论太平洋战争始末。”

二、《联》片的主题，“只是讨论日本对战争所持的态度，及联合舰队覆亡始末而已”，目的原不在讨论“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所以不必“和受侵略人民的苦痛扯上关系”，《联》片何尝有视人命如草芥的思想？

三、《联》片并不是日本当局制作以麻醉人民的宣导片，“它只是把日、美国力之悬殊，联合舰队逐渐陷入深渊的惨况，活生生的描绘出来而已”，绝没有说“日本不该为战争负责”。

四、“不要忘了日本当时已是骑虎难下之局，为了阻止日本本土成为战场，为了避免日本被占领、被瓜分”，日本只有战争之一途，“哪里还有选择的余地”？

五、“为了挽救国家，日本只有奋战到底”……“为了日本国魂不致

* 本文刊于《中国时报》(台湾)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九·鞭子和提灯》(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

断丧，也为了日本存续发展”，“自然‘有人必须为之死命，有人必须为之存活’”。

六、日本海军不能与日本军阀一概而论。“日本海军受制于军阀内阁”，“否则又怎愿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

这样“坦率”的反论，老实说，即连实际上思想亲日的人，都会觉得不安吧。对于这样彻底的亲日论，恐怕只能引用日本人自己对日本战争电影的“右倾化”批判代为答复，或者他才能入耳吧。手边新从友人处借得日本著名的影评人山田和夫（Yamata, Kazuo, 1928）所著《描写战争的眼光：虚伪的映像》（新日本出版社，一九八四），恰好深刻地回答了这位匿名读者的问题。

为侵略罪责翻案

山田和夫指出，在美国占领军比较自由主义的官僚们“指导”下，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电影，有迅速的发展。许多深刻而痛烈控诉日本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罪行的优秀电影不断推出（如木下惠介：《大曾根家的早晨》，黑泽明：《无愧于我们的青春》，等等）。深受侵略战祸洗礼的战后日本人民、知识分子和电影人，自然形成了坚实的民主·自由·和平与反战的文化力量。

一九五〇年，美国改变了“和平·民主·非战”的日本占领政策。一九五三年，美日双方共同声明，日本要通过“教育”和“传播”来增进“日本国民”对于“防卫责任”和“爱国心”之自动的精神，并由美方指令日本设立“警察预备队”。山田和夫接着说道：这一新形势最大的阻力，“是怀着痛切的战争体验的战后日本人民根深蒂固的反战和平志向”。

但是，一九五〇年以后的形势，使得败战只不过五年，在战后未受到批判的日本右翼和战争势力，紧紧抓住了西方的世界新战略形势而复活，开始逐步进行为日本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翻案、恢复名誉的工作。山田和夫说：

“一九五〇年代中叶以后，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的电影开始陆续登场。在这些电影中，过去的军神复活了（《山本元帅与联合舰队》，一九五六），日本天皇以明星演出而登场（《明治天皇与日俄战争》，一九五七；《天皇、皇后与日清战争》，一九五八）……在这些作品里，太平洋战争和日俄战争变成日本不得已拿起武器的‘自卫’战争，为日本侵略战争和其责任者翻案免罪。山本元帅也成了自始反对对美宣战，无可奈何地战死于前线的‘悲剧英雄’；A级战犯，被看成日本的‘爱国者’……”

进入六十年代，日本开始了电视和音响文化的时代。据山田和夫说，日本对战争的反省和控诉，至六〇年而呈全面性风化。这一时期的日本战争片，受到美国好莱坞电影西部片，大噱头（spectacle）主义的影响（例如冈本喜八：《独立愚连队》中，日军屠杀中国兵的场景，简直就是美国西部片中的白人骑兵屠杀印第安人一样的“过瘾”）。一九六七年，从《日本最长的一日》（导演冈本喜八，同年来台演出，笔者曾以《日本军阀的阴魂未散》一文，加以批判）开始，日本战争电影以大资本、“多元性、复合性”的戏剧构成演出，从而达到“使日本战争责任烟消云散，有效地把战争和战争关系人描写成爱国者，忠诚殉国，把从天皇以下的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者加以美化、英雄化、‘人间化’，而达成翻案、脱罪的目的……”山田和夫进一步指出，以《日本最长的一日》为滥觞的，以“大资本·多元·复合性戏剧构成”来美化日本过去的侵略罪案，并为之翻案的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电影，到了八十年代的《二〇三高地》、《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和《燃烧的零式战斗机》，达到它的顶峰。

我们这位匿名的读者，一再怒责我“戴上有色眼镜”，“以道德观取代（电影所）传达的主题，而后肆行加以抨击”。山田和夫已经从日本战后电影史的铺排，深刻地告诉了我们日本电影资本和日本右翼战争协力者，在五十年代冷战构造中，长期以来蓄意美化日本战争罪责，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开脱的结构性事实，则我们中国人怎能把《联》片的主题单纯地看成“日本海军如何而战，如何而败，如此

而已”呢？

隐藏战争犯罪本质的伎俩原型

山田和夫犀利地指出：七〇年后半到八〇年，日本军国主义电影掩盖其罪恶目的的几个共同的伎俩，至少有五种：

一、用“爱与死的戏剧”来掩饰侵略战争的本质。以《联合舰队》为例，它的海报上这样写：

“当巨舰‘大和’号开航时，男儿们舍弃了爱情。蔚蓝的大海哟！请为我诉说这苛烈的青春！”画面上是巨舰“大和”号，背景是一个英俊的日本海军士官正和娇美的恋人惘然诀别。小字：“请和您所最爱的人来观赏！”

《二〇三高地》、《大日本帝国》也都是用这同样的技法。

二、像美国好莱坞式的战争片一样，把日本侵略战争拍得有趣，有看头；拍成一场精彩的运动比赛，使观众有冒险、英雄崇拜的兴奋感，从而转移了观众对侵略战争本质的批评，暗中鼓舞了对过去战争的肯定与崇拜。《二〇三高地》、《大日本帝国》和《联合舰队》正是个中的杰作。

三、“余岂好战哉？余不得已也！”的遁辞，也是近代日本战争电影所最喜欢用的技法。《联》片中的山本元帅，被写成自始反对对美开战，但为了服从阁议，知其不可而为之，终至壮烈战死。我们匿名的读者不也说日本海军部发动太平洋战争是“没有选择”、不得已的吗？不也说因为势成骑虎，“为阻止日本成为战场，被瓜分”而不能不战吗？山田和夫指出，山本不肯轻易对美开战，是因为他深知美国国力之强，不愿打没有胜算的仗罢了。在中日战争中，山本就是日本海军作战司令部负责的校官。当时日本海军航空队对绝对有胜算的中国上海，施行野蛮的、不分军民的轰炸，杀人无数，山本又何曾反对过？何曾表现过一点点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的性格？至于怕日本成为焦土，被人瓜分，这位匿名读者可曾追究过：如果日本不先以他人的国土为战场，去瓜分、占领别人

的国土，人又何以焦土之、瓜分之呢？

这种“战争宿命论”的伎俩，也表现在《二〇三高地》上。片子开头，画面上图解说明二十世纪初西方列强向亚洲攫取殖民地。帝俄的魔手，先伸向中国东北，而后伸向朝鲜。旁白：“诞生不久的明治维新政府，为了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风暴中找到保卫日本的据点，开始计划取得日本对朝鲜的支配权。”换言之，日俄之战争，不是日本侵略之战，是被逼、不得已的自卫战争。在整个《二〇三高地》中，上自天皇以下，没有一个不是厌于战争的和平主义者。山田和夫接着说道：“把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说成日本‘自卫战争’，完全是历史的伪造……那只是把日本的战犯责任暧昧化罢了。日俄战争……是一种侵略战争。证据：日本战胜后，取得‘南满铁路’路权和辽东半岛，为嗣后日本侵华取得了最初的立足之地，并在一九一〇年得以因‘日韩合并’而并朝鲜为日本殖民地。日俄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明白地是朝鲜和中国人民，日本已是加害者。而《二〇三高地》完全无视于此，任意在电影中展开它的‘自卫战争’论……”

我们这位匿名的读者也说《联合舰队》是日本海军自己讨论太平洋战争的家务事，为什么“一定要……对侵犯太平洋地区人民的生命、尊严表达歉疚？”山田和夫这样回答：“……日本在中日战争中强行侵略，受到世界民主势力的非难，引起中国人民激烈的抗战而陷入泥沼的长期战。日本天皇和高级支配阶层为了打开这窘境，而向东南亚侵略，和美国发生冲突。至少，只要把日本行动回溯到一九三一年的‘满洲事变’，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日本侵华战争延长线上的侵略战争，殆无疑义。”把侵略战争看成日本海军自己内部、与人无涉的战争，这是何等傲慢而无反省的态度！

四、“见树而不见林”，以树忘林，是另一种障眼法。以战争的局部来喻说整个战争的意义，以障蔽战争之罪责，例如《联合舰队》以中途岛之战日本海军一些判断失误和战备、战略的错误，来解释整个太平洋战争，从而暧昧日本根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是，即使日本高层军部官僚英明，没有失误，打赢了“太平洋战争”，日本的侵略就会成功？战争责

任就可改写？我们这匿名的读者，很明显就中了这个圈套。

五、再一种障眼法，据山田和夫说，就是“好人被坏人拖累”说，和“人性”说。在《联合舰队》中，海军部是好人，陆军和“军阀内阁”是坏人……山本元帅是开明、和平的好人，那些阁僚是愚蠢的坏人……其实，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的海陆空军，皆在天皇统帅权下，计划和遂行整个侵略行动。日本三军间的差异，惟战略上细微的不同而已。山本五十六任海军次官时代，侵华战争正炽，山本指挥下的日本海军航空队对上海军民进行无差别的轰炸，引起国际舆论的指责，则山本何“善人”之有？

所谓“人性说”，是将天皇、山本元帅、东条英机、将校、士官、军人家属，个个描绘成富有“人性”，情操感人；个个都是良夫、孝子、兄友、弟恭。山田和夫在引用了有名的社会科学家所说的“人是社会诸关系的总合”之后，这样说道：“离开社会的、历史的观点而强调的‘人性’描写，就会不断强调人的私的侧面，而掩盖了人在公共生活中的问题点，造成对战争责任的美化、人性化、英雄化，而达到为日本战责开脱的目的。”《联合舰队》中上自山本元帅，下至每一个士官、军属，没有一个不是被写成离开社会和历史意义的，私有、个别的“善人”与“完人”。则善人与完人所遂行的战争，怎么会是罪恶的战争呢？

日本当局和日本战争电影

我们的匿名读者说，《联合舰队》不是“日本当局制作以麻醉人民的宣导片”。但山田和夫却和他有不同的意见。为日本侵略战争脱罪和翻案，决不只是个别电影公司和导演的事，而是具有整个日本战后史、战后世界总体战略和日本战后历史与社会、政治的结构性的背景。

早在一九四七年，描写日本战争罪行带给日本人民之悲剧的纪录片《日本之悲剧》，被“日本当局”强行没收。一九五〇年，日本电影界进行整肃与再编，清除一批民主主义、和平、非战的导演与电影人。一九六〇年，日本防卫厅干涉《预科练的故事》，认为该片不利日本建立自

卫队，而剪除非战镜头，并大量制作鼓舞日本建军的公关影片。日本东芝电器资本，因影片《独子》有非战思想，悍然中止合作拍片。日本政府因记录片《东京世运会》没有强调天皇莅会与自卫队仪队威仪而改编重新剪接。六七年，大型军国主义战争片《日本最长的一日》荣获文部省“青少年电影奖”！在山田和夫看来，从五十年代中期一直发展过来的日本战争影片，是由日本政府、防卫厅、独占资本各方面联手，经过巧黠的行銷研究和企划，在战后世界冷战总体制和总战略下，直接、间接地，有目标、有方法地为日本新军国主义准备思想和感情的条件。

台湾内部的日本

我们的匿名读者对于拙文的反论，恰好非常生动活泼地证明，上述五种伎俩，是如何有效地（甚至在台湾）也达成了它美化日本侵略战争，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开脱的洗脑效果。一个在日本侵略战争中被害民族的人，看过这精心设计的日本战争电影，一面口头上承认它有“军国主义”色彩，一面又忙不迭地为它辩护和开脱。这种不知以被害为被害的被害，令人感到背脊森冷的悲怆。

事实上，为《联合舰队》说话、扬喻的人还很不少。你在《联合舰队》的电影院中，整场听着一些听懂日语的中老年观众兴奋地窃窃私语；我们的影评人公然说它是“反战片”，说它对我们有教化和启发作用（我们这匿名读者也这样想）。

近年来，台湾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日本崇拜”，崇拜其管理、其商法、其“民族性”(!)——其服饰，青年以抗日为老一代人的“历史包袱”和“历史恩怨”，声言要“独立地看日本”，“抛弃历史偏见”。有少数一些人以对日批评是执政党和外省人（或“中国人”）之事，使抗日成为“顽固”、“保守”、“非台湾”的代辞！事实上，在台湾内部，已经俨然存在着超年龄和省籍的日本！这种奇谭怪事，是这个地球上，寻遍每一个角落都找不到的诧异。

山田和夫对日本电影史的批判的回顾，却也为我们台湾亲日文化找到了解说。对于台湾的战后，对于五十年建构起来的冷战文化，前进的历史，正要求着我们做出批判性的再思考！

“台湾”分离主义“知识分子的盲点”*

一心一意要按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

在台湾近五十年的历史上，有两个历史时期，在台湾的一小部分中国人，以做中国人为耻。头一个时期，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人在台湾疯狂地推行战争协力的“皇民化”运动，有一小撮台湾人，深恨自己不是日本人，以体内所流动的中国血液为污浊、为卑下，一心要使自己成为皇国日本的国民。在文学上，以小说《道》为它的典型。当时有一批台湾人以改姓名、说日语、穿日本衣饰、吃日本式菜饭为高尚，一心想摆脱“本岛人”的羞耻印记。

在漫长的旧殖民地时代，在广泛的西方殖民地，都产生过这样的人种。他们都以自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母文化、语言和种族为羞耻，一心一意要按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

日政下台湾“皇民化”运动中的部分台湾人，以中国的文化、语言、血液为落后、羞耻，一心向往日本殖民者的文明与开化。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煽惑下，一小部分台湾人反对“支那”、“清国奴”，鄙视和蔑视中国的人、文化和事物。

二十年后的五十年代，先是在日本，后是在六十年代末的北美，继之则在八十年代的台湾，产生了另外一批反共、反中国的台湾人。他们

* 本文刊于《远望》(台湾)创刊号，一九八七年三月，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十三·美国统治下的台湾》(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

也一样以中国的文化、语言和血液为丑恶、为落后、为耻辱。

在殖民地台湾，少数台湾人的“皇民”思想，是在日本资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扩张，遇着中国人民全面抗战致使战争陷于泥沼，乃急欲以速战打开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出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五十年代以降的台湾分离运动，也是战后二体制对峙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新殖民主义全球战略下的一个产物。两个历史时代中少数台湾人的反华、蔑华思想，一样都倾慕日本或美国，及美、日两国的“文明”、“进步”与“开化”，对自己的民族，却以日本人或美国白人中心的观点，加以仇视和鄙视。在台湾五十年历史上，少数台湾人的反华和蔑华运动，有着共同的特点：（一）是新旧殖民地结构下的意识形态；（二）反共；（三）反华；（四）鄙视一切中国的事物。

几十年来，这样的思潮，在台湾岛内外，形成了林林总总的暴论和奇谭怪说。最近，台湾一切支持台湾民主运动人士所寄予厚望的民进党，在机关报上刊载了一位长住美国的画评家写的有关“二·二八”的文章，正是这种暴论和奇谭怪说的一例。

这篇文章说，如果日本人继续占领台湾，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就不会发生；如果来光复台湾的祖国是个好祖国，也不会有“二·二八”。结论是：一切都是光复惹的祸，台湾其实如果没有一个祖国，如果到现在还在日本统治下，要比现在强多了。

日本人继续占领台湾，意味着日本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意味着日德意轴心法西斯对全世界的支配。这当然是一切法西斯·反共·纳粹们的梦想。该文作者不惜以寄望世界的纳粹·法西斯化来实践对中国和“亚洲大陆”的仇恨与轻蔑，这样的台湾分离主义者在知性和文化上的贫困，已经不是一般的知识可以理解了。

这篇文章，反反复复批评台湾历史上对中国不能忍的文化、感情和政治上的归向与“依赖”。该文批评林献堂摆脱不掉中国情结，批评台湾初初割让后台湾士绅地主阶级的“台湾民主国”“遥奉圣清”，割不掉中国尾巴，所以失败，却没有说明光复之初完全割掉中国尾巴，“遥奉大日本帝国”的辜振甫们的“台湾独立运动”何以也失败？文章痛诋光复之

初台湾知识分子热情提倡祖国文化，甚至于台湾《笠》诗刊某位“跨越（日、中）语言”的前辈，也遭到粗暴的攻讦，说他们由日文改习中文写作，“无异从近代社会又跨回到封建的旧社会去”，说“跨越语文的愚行”是“第一号罪首”，背叛了光复当初的广大读者，造成“文学良知的破产和文学人格的牺牲”。该文把张文环、龙瑛宗、杨逵和巫永福全列为“皇民文学家”，并且称赞这些“皇民文学”“作品的思想与技巧都是纯熟的”，改以汉文写作，则“终其生”无甚成就！

像这样的暴论，完全没有政治经济学、台湾史、台湾文学史的最粗浅的语言和知识，根本没有办法做知识上的讨论。这类的暴论超乎一切知识的贫困与混乱之上，唯有以下的观点和执意是异常明显的：“依赖”美、日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而不与之“对立”、不加以批判，对中国抱持着五十年代世界冷战心智造成的仇恨、鄙视和反对。

在战后冷战结构中二体制对立的世界现代史总的矛盾上，重新对日本、南韩、台湾、菲律宾……的“战后”与“光复”，做出全面的结算，从而对新近在美国、“国府”和民进党组成的三边构造的展开，去分析和批判不同形式的台湾分离运动，应是今后台湾前进的知识分子富于挑战的新的课题了。

精神的荒废*

——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

二月十日的《联合副刊》上刊有张良泽先生（以下敬称略）的文章《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文章虽短，值得严肃商榷的地方却有不少。

张良泽说他对于在他的高中时代编过“反共壁报”，参加过“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参加过“反共演讲”，觉得很后悔。他也对于在大学时代写过“反共文学”，以及在七十年代研究台湾文学时，因基于他当时怀抱的中国“民族大义”而批判过“皇民文学”，深觉悔恨。

五十年代的高中生办壁报，可以办得才华横溢，但是一般地绝不可能不反共一番，因为壁报是作为学校党、安全、思想工作的核心训导处所督管的。而五十年代台湾的中学，在白色恐怖政治肃清之后，根本不存在有“反反共”的左倾思想和知识的学生和他们的斗争，学生只能跟着教官和教师反共，不存在当时中学生必须在左右、在国共、在进步与反动之间做出实践选择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后悔当年的无知与怯懦的问题。

至于救国团，当年凡是高中生，都不能不是救国团的团员。救国团是以高级中学为单位（大队）全员编队的。正如初中（今之国中）生皆须编入“童子军”，凡高中生莫不是救国团的团员。因此，张良泽也似乎没有理由为此扼腕乃尔。

* 本文刊于《联合报》（台湾）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四日。后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一九九八年第四期。

然而参加了反共演讲，写过以反共抗俄为主题的文艺作品的张良泽，确实就比较突出了。这使我回想起我在高中和大学时代那么几个国民党积极分子学生。在被迫去听讲的比赛会场上，我看到过他们讲得热血沸腾、字正腔圆，尔后看着他们穿着浆烫过的青年服，上台领奖，神采飞扬。我也在大学时代的校刊上读过被排满文艺版的文艺学生的“反共文学”作品，生涩荒芜地写着“残暴共匪”的故事。如若从严肃对待自己的立场出发，对于已经具有行为、思想和选择能力的青年期，争取过“反共演讲”和写“反共文学”的荣誉的自己表示遗憾，则毋宁是一种值得推许的反省态度。但如果张良泽没有以为了苟活（“活下去”）和为了立志“当作家”而有不断发表作品（包括“反共文艺”）之必要为解辩，则在冷战和反共意识形态支配一切的台湾六十、七十年代，基本上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张良泽对于他曾以中华“民族大义”批判过“皇民文学”，深感“后悔”当初之“无知”，问题就比较复杂，应当深入探讨。

反共和皇民主义

张良泽认为，在“如今回想起来”时深为“后悔”的少时反共和批评“皇民文学”的“无知”行为，“都是三十年间接受了‘反共爱国’教育的必然结果。”办反共壁报、参加“救国团”、参加“反共演讲”比赛、写“反共文学”发表……当然和五十年代以降国民党的“反共爱国”教育有关。但是以“民族大义”“痛批”“皇民文学”的思想，却未必和这“反共爱国”教育一致。

作为一九三七年侵华战争精神动员手段的皇民化运动，是法西斯主义的日本形态。而法西斯主义的背景，在于第一次战后西欧和日本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刻化，在资本独占体利润下降，中下层资产阶级破产，农村疲惫，而林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纷扰不休，政局动荡。为了恢复和维持独占体的利润率，恢复经济发展，贫困化的资产阶级市民和农民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投向军事性独裁的国家，让国家去压迫和清除工人

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并以极端反共右翼的铁腕统治，维持资本积累所必要的秩序。强烈的反共政策和残暴地肃清、镇压各左翼人士和团体是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政策。而领导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核心力量，正是各国、各民族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民族战线。因此，作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意识形态，恰恰是极端的反共主义。因此，“反共”教育绝不“必然”带来批判皇民主义的“结果”。恰恰相反，很有一些人主张离开中国人立场，重新评价皇民文学；主张皇民化虽然不曾把台湾人变成日本人，却使台湾人变成不是中国人而予以正面评价；主张要以什么“爱与同情”去重新“认真”“解读”皇民文学，恐怕才是以极右反共论为基点的台独论的“必然结果”吧。

至于“反共爱国”教育，恐怕也要分别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集团的爱国论。杨逵被判刑十年，理由据说是“爱国过激”。彭歌指责乡土文学派“爱国过于激切”而必欲置之于死地。反对美日帝国主义之间把中国领土钓鱼台私相授受的保钓爱国运动，受到“台湾当局”彻底的镇压。日本战犯岗村宁次应蒋介石之邀，组织以日本前二十三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为中心的日本右派校佐，组成“白团”到台湾秘密训练台湾军队准备“反攻大陆”。这个由日本右翼将校组成的“白团”，在战后来台秘密组训台湾军队时，有这样的誓词：

今赤魔逐日风靡亚洲大陆。崇尚自由和平，深知中日合作之切要之中日两国同志，皆以为此乃为亚东反共而联合、为共同防卫而崛起，相互密切合作，为防共而精进之秋也。

兹日方同忧共谋，欣然应欲打倒赤魔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之招聘，期为中日恒久合作之础石也。

此外，日本战犯岸信介、儿玉誉士夫，右派政客藤尾正雄等人，一贯是蒋介石的座上客。今天，有一群日本右派学者，也是出入“总统府”的上宾。今天的国中新编教科书，充满着对日本在台殖民历史之美化、正当化与合法化的叙述。因此，愤愤不平地说国民党的“反共爱国主义”教育使人不能以“爱与同情”去评价“皇民文学”，恢复皇民文学的名誉，离开事实就不免太远了。真正的事实是，在青春期间狂热地度

过“皇国少年”的一代，自台湾光复以后，从来不曾像今天那样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言论上昂扬得意过。

作家形成和机会主义

其次，不妨谈一谈“要做一个作家”，是不是一定要无原则地“活下来”和“发表作品”。

台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五十年，在现实上，这是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开始其强权的“皇民化”运动之前，即日本在一八九五年割占台湾的一刻开始，就一直推行将台湾人同化于日本的政策。但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都以抵抗同化，保住汉族种姓来回答殖民者的同化压力。一八九五年就开始的台湾农民反占领斗争，以及坚持到一九一五年的抗日武装游击斗争，一九二〇年代到一九三〇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是台湾人民为保卫民族主体性而在高压下仍坚持抵抗的历史。从文学上说，坚持以白话汉语写作，一生坚持不着和服只穿唐装，在作品中表现出磅礴坚强的、对民族和阶级压迫的抗议，蔚为以赖和为代表的日据下台湾现代文学家光荣的历史传统。看来，“要做一个作家”的“条件”，未必一定要为了苟活而屈从，未必一定要发表违背原则、屈折于权力的作品。从赖和到吕赫若的台湾文学家，即使在压迫最苛刻的时代，都不曾稍露屈服的奴颜媚骨。说到“发表作品”，人们也会想起在压迫者严密控制下犹冒险秘密写出反抗的心声，隐而不发，迨敌人溃败后才将作品公之于世的吴浊流。台湾文学史上，不为“活下来”而失节，不为“发表作品”而写违背原则，讨好权力的文章的人比比皆是，而他们又个个都是从艺术上、思想上都能过关的，令后世景仰的真正的作家。

皇民化歇斯底里的机制

一九三七年，日本向中国发动野心勃勃的侵略战争。在此之前，日

本人没想到有朝一日必须调动台湾的人力和物力供侵华战争驱策。日本当局有鉴于据台四十余年而绝大多数台民一仍怀抱强烈的汉民族意识，而开始强化对台民的强制同化，由国家权力发动全面压服性的同化运动，收夺汉语、中文的使用，强力推行日语；禁止台湾的一切汉族系民间宗教，把日本神道信仰强加于人；禁止台湾人的传统生活惯习，提倡日本式的生活、衣食和习惯；鼓励弃绝汉民族祖先传用的姓名，提倡“创氏（姓）改名”，改用日本式姓名。在另一方面宣传皇国史观，宣传所谓“日本精神”和“大和魂”，但在具体的政治、社会、民族关系上，仍然保持甚至实质上强化向来的殖民地歧视构造。

现代资本帝国主义以其强大而残暴的现代化武装显示出来的暴力，以其现代化交通、运输、产业、教育、法政和文官制度等向其殖民地呈现种族、政治、社会经济、文明和权力上绝对的优越性，造成对殖民地强大的威慑，以遂行其政治支配和经济收夺。这种暴虐的统治，一方面激发殖民地人民的抵抗，但也更多地造成被殖民人民和知识分子深刻的民族劣等感，对自己民族种性、文化和传统，怀抱深层的厌憎和自卑，丧失民族主体意识，对自己民族的解放、进步和发展，抱持绝望、悲观的态度，从而对“文明开化”的殖民统治者表现为奴颜媚骨、卑屈驯从。这是从十九世纪末向全球迅猛扩张，统治了全球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迅速瓦解的殖民帝国主义对广泛殖民地人民造成的深刻的心灵和精神的创伤，流毒为害至于今日，是殖民主义在政治压服、暴力统治和经济掠夺之外另一个荼毒广泛久远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的“皇民化运动”，正是日本殖民统治在政治压服、经济掠夺外，对台湾民众的精神加害的著例。日本当局，一方面巧妙地利用了殖民地台湾人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民族劣等感、民族自我厌憎感和对于自己民族文明开化的绝望感（而这些都是苛虐的殖民地统治和殖民地意识形态所造成），另一方面则在“皇民化运动”中，突然开启了“内台一如”、“皇民炼成”之门，宣传只要人人自我决志“练成”“精进”，可以锻造自己成为“真正的日本人”，从而摆脱自己作为殖民地土著的“劣等”地位。这一套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大规模精神洗脑的装置，

于是促发了相当一部分台湾人“皇民练成”的歇斯底里，今日回顾，令人辛酸悲忿。

皇民文学的经纬和主题

而“皇民文学”运动的发生，有这经纬：在一九三七年皇民化精神洗脑运动的延长线上，在日本进一步准备向祖国华南和南洋扩大侵略战争的一九四〇年，成立“大政翼赞会”于日本。同年，在殖民地朝鲜、“满洲”分别成立相呼应的“国民总力联盟”和“兴亚奉公联盟”。一九四一年台湾成立在总督府领导下的“皇民奉公会”，在全台自中央以至行政末端成立支部、分会等，把报纸、广播、戏剧、电影全面组织和统辖起来，为侵略战争宣扬动员。

在文学界则先成立“台湾文艺家协会”于一九四二年，并选荐作家张文环、龙瑛宗参加“第一届大东亚文学会议”。一九四三年，进一步把台湾作家纳入“台湾文学奉公会”，推派周金波、杨云萍参加二届“大东亚文学会议”。同年十一月，召开“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以“确立本岛文学的决战态势，把文艺杂志摆到战斗位置上”为会议主题。西川满的《文艺台湾》和张文环的《台湾文学》皆废刊而统合为全面支援侵略战争的《台湾文艺》。

现代台湾文学，是在日据下台湾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二十余年的历史中诞生、成长和成熟的。一九三一年的大检举，全面镇压了台湾抗日社会运动，但文学战线一仍在镇压的火线上疏散出来的战士们坚持下，在三十年代艰困条件下，继续擎起抗争的火炬。然而到了一九四〇年以后，一切抗日运动被一扫而光，军部法西斯的“皇民化”运动，以强权和威压向岛屿的四面扩张。

在殖民地台湾，“皇民化”运动欲达到两大目标：一是彻底剥夺台湾人的汉民族主体性，以在台湾中国人的种族、文化、生活和社会为落后、低贱，而以日本大和民族的种族、文化、社会为先进和高贵，提倡经由“皇民练成”——思想、意识形态的“皇民化”改造，语言、姓

名、宗教、文化的日本化改造，从而彻底厌憎和弃绝中国民族、中国人的主体意识，把自己奴隶化，对天皇国家绝对的效忠。

上述皇民化运动的第一个目标还仅只是一种手段，以达成运动的第二个目标，那就是以奴隶化、经过彻底精神洗脑、彻底破除了台湾人的民族主体之后的台湾人，供日本侵略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圣战”驱策，鼓动以精纯的日本人，为日本侵略战争“义”无反顾地充当炮灰，为天皇国家和意识形态效死而不稍悔！因此，皇民化运动展开后约四年许，就宣告征召台湾青年为“陆军特别志愿兵”（一九四二），翌年，征“海军特别志愿兵”，四四年宣布在台湾实施征兵，四五年实施。

而为皇民化运动服务的台湾皇民文学，正是为皇民化运动的这两大目标服务。

周金波的《志愿兵》，写的是一个只有小学毕业、出身平凡、质性素朴的台湾青年高进六（自改姓名为“高峰进六”），对皇民化思想，比一般的资产阶级台湾知识分子有更深一层的体会。他深信神秘的“祭政合一”论（即神道信仰与皇国政治的一体性），深信神道的击手之仪足以使人“为（神道）诸神所引领”，从而益发“接近（大和）众神”，甚至借以触摸到“大和心”、“体验到大和之心”。和知识分子张明贵的怀疑论形成对比的高峰进六，决志要依所信而活，终于以血书明志，应征为“特别志愿兵”。

周金波主张抛弃理性，去除知识分子的怀疑论，从神秘的日本神道信仰入手，去“触摸”和“体验”大和民族的心灵和精神，借以使自己从卑污的台湾人种脱蜕而出，成为高贵的日本人，然后以血书志愿应征，充当帝国侵略的鹰犬。

为了背叛自己的民族主体，把自己改造成日本人，陈火泉的自我斗争就更加披肝沥胆了。他的长篇小说《道》（道路）表现了一个力争在天皇信仰中把自己转变成日本人时，近于哀号、呻吟的民族自卑、自我憎厌和对于“天业翼赞”的无限忠心和信仰。小说的主人翁狂热地想要戮力蜕变为日本人，但对于自身体内流动着的台湾人的血液这个自然的限

制，感到绝望和怀疑。他对自己呐喊：

菊花就是菊花。真正的花就数樱花。但牡丹花终于也能算是花吗？作为岛民的我，终究会成为皇民吗？终究也是个人吗？

因为生而为（低贱的）台湾人，因此力争通过精神的精进修炼，达到“与大和心交流”而成为日本人，但又对于身中流动着的毕竟不是大和民族“高贵”的血液而深为苦闷。在终于向日本当局提出应征为志愿兵时，小说的主人如此吟咏明志：

愿为日本臣民，而此身猥非日本骨血，伤悲宁过于此？

今为圣君之盾牌，吾辈欢欣勇猛以效死。

他并且为他战死后的墓碑上预写了这样的墓志铭：

青楠（小说主人翁的雅号）居士生于台湾、长于台湾、而以日本国民死。

青楠居士，日本臣民也。居士为翼赞天业而生，为翼赞天业而劬劳，为翼赞天业而死。

自己践踏和羞辱自己的民族主体意识，以令人震惊的民族自卑感和自我憎恶，不惜以自身为皇国的侵略战争而破碎与毁灭，来求取获得殖民者民族的认同。

以“皇民练成”为魔咒，造成人人蜕化为光荣的日本人的集体幻觉，并在魔咒幻觉的驱使下，向着毁灭性的战争狂奔。这就是“皇民化运动”的真髓。而“皇民文学”正是这邪恶道场的共犯和帮凶。

从全面看，皇民文学是日本对华南、南洋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时，作为战争的精神、思想动员——“国民精神总动员”机制的组成部分而展开。皇民文学运动，是同时期皇民教育、皇民戏剧、歌谣运动的一部分，目的在集体洗脑，使殖民地人民彻底抛却和粉碎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认同，从而粉碎自己民族的主体意识，在集体性歇斯底里中幻想自己从“卑污”的台湾人蜕化成光荣洁白的“天皇之赤子”，在日本侵略战争中“欢欣勇猛以效死”，“以日本国民死”，“为翼赞天业而死”。

愤怒的回顾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在皇民化运动下，总共有二十万七千余台湾青年分别以“军属”、“军夫”和“志愿军”、战斗员等名目被征调投入战争。战死、病歿、失踪者计五万五千余人，伤残两千人。另外因受皇民思想欺骗过头，在南洋、华南战场中误信自己是真皇军而犯下严重屠杀、虐杀罪行，在战后国际战犯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者二十六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一百四十七人！

一九四五年，战败的日本拍拍屁股走人，在台湾留下满目心灵和物质的疮痍。驱策台湾青年奔赴华南和南洋，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主凶，当然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权力。但是，对于殖民地台湾出身的少数一些文学家在那极度荒芜的岁月中，认真鼓励鄙视自己民族主体性，鼓励青年“作为日本人而死”，从而对为屠杀中国同胞和亚洲人民而狂奔的营为，后世之我辈，应该怎样看待？

从反省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立场，尾崎秀树在评论陈火泉的小说《道》之余，有这沉痛的感慨：

……然则，陈火泉那切切的呐喊毕竟是对着什么发出的啊。所谓皇民化、作为一个日本臣民而生、充当圣战的尖兵云云，不就是把枪口对着中国人民、不也就是对亚洲人民的背叛吗？

因此，重读陈火泉的皇民小说之余，尾崎有这痛苦的呻吟：

当我再读这生涩之感犹存的陈火泉的力作时，感觉到从那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作者的苦涩，在我的心中划下了某种空虚而又令人不愉快的刻痕，无从排遣。

尾崎秀树并且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对于这精神上的荒废，战后台湾的民众可曾以全心的忿怒回顾过？而日本人可曾怀着自责之念凝视过？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精神的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尾崎的《旧殖民地文学之研究》，正是怀着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深刻

反省和“自责之念”，在日本右翼至今喧嚷“自由主义史观”，指摘主张反省战争责任的史论为“自虐史论”，从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和殖民地历史的日本右翼思潮氛围中，早早敢以“春秋之笔”、“仗义执言”的力作。而正是像尾崎这样，坚决不肯以“爱与同情”为言，去美化、去正当化日本侵略历史对中国和亚洲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物质、生命和精神的加害的日本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存在，使我们对中日和亚洲人民之间真正的和平、正义与团结的展望怀抱了希望。

冷战和颠倒

怎样对待在“决战文学”旗帜下，在日本法西斯最张狂的时代，台湾文学家的思想和实践？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不是三、五年，而是五十年。长达半世纪殖民统治，是渗透到生活细节的日日夜夜的五十年。五十年间，台湾人民给日本人纳粮缴税，不少的人不能不从事日帝统治体系下的下层公教职务，尤其在台湾成为日帝南侵基地和军事要塞的四十年代，全岛岛民在严峻的战争动员体制下，更是无所逃于日本战争机器的淫威。当时的文人、知识分子，在权力下，写些配合时局的小文章，参加一些战争动员的活动和会议，在所不免。因此，国民党到台时，宣布了在台湾地区不清理汉奸问题的方针。纯就政策而言，不能不说是十分贤明的政策。但照顾到台湾殖民地化历史的特殊条件而抑止历史清算以增进民族团结，到后来成为“台湾当局”在台湾光复后急剧升高的国共内战和国际冷战态势中，改而残酷肃清台湾的抗日各派，反过来与日据下汉奸豪族（所谓“五大族系”，又皆在战争末期台湾皇民化运动的领导机关中担任要职）相温存，且以日帝下累致的巨富为基础，在战后“内战—冷战”构造中发展为庞大的集团资本，享受不能仰视的权力和财富的结果。而五十年代以降，“台湾当局”和日本旧军部、反共右翼政、商、学界千丝万缕的网络，被在八十年代末“台湾化”后的台湾当局继承和进一步发展，甚至也在少数一些台湾战后留日学界中发展成对日占台湾史

加以美化和正当化，宣传和当年伪满“建国”论如出一辙的各种建台湾为“新而独立”的“民族论”和“国家论”的运动。但这已是余话了。

抵抗者和奴隶的分际

然而，即使在疯狂的“决战”期，台湾人民和作家也绝不只是消极地在战争体制的淫威下屈从而已。以文学界为例，最突出的例子是杨逵。他积极参加日本军政当局组织的皇民剧运，却大刺刺地写《怒吼吧，中国！》。利用日帝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宣传中国农民抗击美英帝国主义的热潮。明里符合当局抗击“英美鬼畜”的国策，暗中宣传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之英勇。此外，他也写《驱逐登革热》。按日语“登革热”的“登革”，与日本传说中的恶灵“鞍马天狗”的“天狗”同音。剧本借描写台湾贫困农民扑灭登革热的运动，从而对台湾农村以高利贷和地租压迫农民的地主“李天狗”加以无情的批判。作品中浸染着鲜明的阶级意识，其在屈折中表现出来的令人会心的坚强的抵抗，今日读之，犹为之动容！

而至于吴浊流之冒险在日本军政的枪尖下秘密从事抵抗的写作，是世所周知的。

因此，对待“日据时代台湾作家”“写过……《皇民文学》的历史事实”，不能只看一个作家的一时，主要地也要看他的一生。看一时，也要分辨是积极主动地为虎作伥，还是消极的、面从腹背的言动。有人找到杨逵一篇似在呼应“时局”的短文，几乎如获至宝，大喜过望，仿佛这就足以“日据下谁不写皇民文学”找到有力佐证。然而，杨逵不惮于斗争和抵抗的一生，岂可因战争末期一篇面从腹背的短文，而与周金波、陈火泉之流相提并论？赖和不惮于在剧作、生活、社会活动上坚拒同化，力保民族尊严，不惮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光辉的一生，岂可因他临终前甫自缙绋中重病出狱、心灵一时的凄绝和软弱所写的短文，而硬将他与奴颜媚骨、“忘祖背宗”之辈同日而语！而吕赫若在皇民文学运动沸沸扬扬之际，把“时局”的主题大刺刺地摆到一边，兀自去刻划与

战争无关的台湾传统生活的风俗百相。在宣传全面同化于日本的皇民运动主旋律下，刻画台湾生活习俗和风情，就是对皇民主义的批判，有重大意义。

再次，“写过所谓的皇民文学”的台湾作家，本身对于自己成为问题的、当时的作品与思想的态度，也各有不同。

周金波始终不曾稍悔当年皇民思想。在近年一次台湾文学研讨会上，他在日本学者前，坚持以日语发言，发言内容，基本上与当年皇国青年的周金波无轩轻之分。这是坚持皇民有理的顽固态度。

陈火泉对自己的《道》，则采取辩解的态度。他说他所表现的是为当时“时代环境”所逼的言行。小说的主旨，在于促使读者对日据下“被凌虐、被损害”的台湾同胞一掬同情之泪，云云。

不论陈火泉的说辞说不说得通，战后的陈火泉的态度，和周金波者毕竟有所差别。至于为林瑞明教授认为较之陈火泉有“台湾人主体意识”的王昶雄，战后在自己汉译的《奔流》中，多处修改，声言日文版本受当时日本当局检阅时横遭窜改，以适合“时局”标准而与原作失真。王昶雄改订汉译文本的做法固然引来争议，但在对待皇民主义上，显然他是有一定的羞恶之心，视同自己的耻部。这与周金波的坚持大和主义、与陈火泉的强辞饰辩，在性质上又有不同。至于龙瑛宗、杨云萍、黄得时，他们在战后的许多言论，已足表现对那精神荒废时代的自己的言动的悔意，此处实不忍细说，但其对待自己当年皇民主义言论的懊悔态度，又与周、陈不同了。

而张良泽此次译刊杨云萍、龙瑛宗的“皇民文学”“作品”未审有没有征得当事人的同意（虽然二老目前已经相传有衰老到痴聩的程度）？否则，恣意公刊当事人或其子女未必同意公刊的旧时文章，是对二老的“爱与同情”呢，抑或是残酷的二次伤害？

十六年后的回答

一八九五年，强权割台成为定局的条件下，台湾绅商官僚组织了一

个抗日临时政权“台湾民主国”，“阳为独立，阴奉大清”。

经过五十年殖民统治，日本人培育了一批与殖民者同其利益的协力派精英豪绅。迨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一些亲日派台湾绅商豪族阴图与驻台日本军部勾结，倡台湾之独立。但这一回是阳为独立，阴奉日本帝国。

同一年，尾崎秀树有这样—个难忘的体验。一个和青年尾崎同一队的台湾人“学徒兵”向尾崎道出他对光复的想法。这台湾青年说，经过了五十年的日本统治，台湾的生活、文化水平已经高出中国，台湾已经没法儿跟着（落后的）中国走了，只有第三条道路——台湾独立，从而和日本、中国平等交往……

当时，尾崎哑然无以为对。十六年后（一九六一），尾崎在他的论文《决战下的台湾文学》中，对那位台湾籍同学做了回应。尾崎秀树写道：

……回答这问题，只能说日本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伤痕无乃太过深切。只有把日本对殖民地台湾的这一笔亏欠镂刻在心版上的时候，我才有资格回答那位台湾籍的同学。同时，我也想对我这位同学提这么一个问题：

“对于曾经作为日本军之一员的你自己，你是怎么想的？”

在我遣返日本的第二年，发生了“二·二八”事变。

过了几年之后，听说在台湾中南部武装蜂起于“二·二八”事变的民众中，有不少台湾人原日本军人。而且听说特别是曾被征召到海南岛作战的台籍原日本军人，战斗尤为骁勇。

当这些从战场上回来的台籍旧日本军人或军属，拿起武器在事变中崛起之时，到底受到多少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影响？

当我听说了有一些台籍原日本兵在“二·二八”事变中蜂起时，我痛烈地想到上面这个质问，是我们日本人必须向你们作答，却至今一直不曾解答……

殖民者破坏被殖民者的主体性、剥夺被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对被殖民者强加思想、意识形态的同化，特别有效地使被殖民精英认同、同

化于殖民者的史观、世界观、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而当殖民者离去，这些精神的歪扭依然顽强、长时期滞留下来。

五十年的殖民地统治，四十年代的皇民化运动，使一些殖民地精英妄以为自己在殖民地中现代化、蜕变成文明开化的人种，妄以为台湾的文化生活因殖民统治而高于中国，从而必欲抛却自己的祖国，企图独立。

早在六十年代初，尾崎秀树在对日本殖民主义深刻地进行自我批判时，就看到所谓台独运动正是日本殖民主义在台湾遗留下来的“心灵的殖民状态”这个严重的创伤。一九五〇年代，弗·范农以“黑皮肤、白面具”之论，早已提出了被殖民者（“黑皮肤”）在心灵上受到殖民者意识形态荼毒（“白面具”）的深刻的分析。

精神的荒废

（一）国民党长年以来的“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主义）教育，是一切基于（中华）“民族大义”“痛批”“皇民文学”的根源。

（二）然而，在现实上，“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或多或少都写过所谓的‘皇民文学’”。

（三）因此，“新一代的（台湾文学）研究者，应该扬弃中华民族主义”，不可“道听途说就对‘皇民作家’痛批他们‘忘祖背宗’”；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以“爱与同情”的“认真态度”去“解读”皇民文学作品。

这就是张良泽的皇民文学论的逻辑吧。

否定、鄙视、憎恨被殖民台湾人（中国人）的主体性，把自己改造成日本人，使自己像一个日本人那样地效忠和崇敬日本天皇，终于作为日本人而效死——这就是四十年代台湾皇民文学的主题的真髓。

而主张对这样的文学不要以被殖民者的主体性（“民族大义”）加以批判和反省，企图以“反共爱国教育”论，以“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或多或少都写过所谓的‘皇民文学’”为言……，对皇民文学无分析、无区

别地全面免罪和正当化的本身，正是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的深层加害的一个表现——长年以来未曾加以清理的、心灵的殖民地化的一个鲜明的表现。

……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精神的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每当在生活中眼见触目皆是的、在文化、政治、思想上残留的“心灵的殖民化”，尾崎的这一段话就带着尖锐的回声，在心中响起。

久经搁置、急迫地等候解决的、全面性的“战后的清理”问题，已经提到批判和思考的人们的前面。

被出卖的“皇军”*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台湾的日本殖民政府惟恐台湾人中带抵抗色彩的中国认同，会促成寄望中国的胜利，因而对其台湾臣民的言行极其警觉。为了压制这一台湾人的祖国意识，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所谓的皇民化教育，这是一种旨在“培育帝国臣民”的强制性教育制度，它的建立，是为了将被殖民的臣民同化于日本帝国。换言之，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通过剥夺台湾人的民族认同、尊严、文化、语言、信仰、习惯，通过培育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国史观，使台湾人对日本殖民的臣服合理化，从而培养“日本帝国的忠诚臣民”。而台湾和中国的历史以及二者之间的历史关联，都被排除在课程之外，以阻断学生对其共同的中国人或台湾人历史主体性的认同。这种持续的“去中国”教育的效应，在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之后的很长时间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从中日战争这一历史脉络看，皇民化制度的目的十分明显：日本意在调动台湾的人力与物资资源，驱使台湾人陷入一场悲剧性的战争——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根相煎。本文涉及十一个台湾人的经历：他们在日据时期被征入伍同中国作战，曾直接在日据下将台湾置身于殖民主体性的矛盾之中。这些士兵的经历以及他们对这些经历的态度之所以各有不同，原因很多，而与他们最终是否回返台湾尤有关系。这里没有单个的有代表性的故事。然而，正是这些各不相同的故事，生动说明台湾后

* 本文原为英文，题为“The Imperial Army Betrayed”，刊于 *Perilous Memories: The Asia-Pacific War (s)*，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后译为中文，刊于《华文文学》（广东）二〇〇五年第六期。李娜译，黎湘萍校。

殖民历史的复杂性和反讽性：那就是，紧随着“光复”而来的，是国民党长达四十年的戒严法，而这竟是在举世欢庆战争结束、法西斯主义据称已经“终结”之后。

为了充分理解这些个人化的故事的意义，首先要明了日本对台湾人的征兵政策以及一般台湾史在中日战争中的整体情况。一九三七年七月，台湾人组成的军队开始被送上战场。最初，他们是作为被征募的军夫，从事翻译、物资运输、农业劳动以及其它非战斗职位的工作。台湾人可以志愿参军的“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直到一九四二年才实施。很明显，这一迟延源于日本人的犹疑：台湾人在与中国作战时会不会忠于日本帝国。不过，制度一俟确立，连台湾原住民族也被征募编成“高砂义勇队”，厮杀于南太平洋战场。一九四三年七月，“帝国特别志愿兵制度”开始实行，一九四五年，征兵体系最终完成。

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超过二十万七千的台湾人被送入日军服役：将近十二万六千人作为军夫，八万人作为军人。这其中，有六万一千人被送往菲律宾和南太平洋的其它地区，三万三千人被送往中国大陆。阵亡及失踪者达五万人，近二千人伤残，战后有二十一人作为战犯被处死，一百四十七人被判二到三年监禁。现在，这些幸存的前日本兵和军夫被称为“台湾人原日本兵”（TEJSS）。他们是台湾殖民史、中国内战以及冷战体系的错综复杂的结果。多年来，日本政府拒绝给予任何战争赔偿，直到最近他们才得到一笔非常微薄的赔偿金。由于在战争中有过当“日本兵”的经历，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在战后回到大陆的台湾人原日本兵在中国大陆历经坎坷，尤其在一九五七年之后的一系列极左运动中。而无论是蒋介石政府还是李登辉政府，都忽视了那些在战争中侥幸生还、返回台湾的数以万计的士兵们的需要：为讨好日本唯恐不及的台湾政府，可不想为这些台湾人原日本兵的战后索赔惹恼日本。

为了帝国和天皇

本案共采访了十一位台湾人原日本兵：五位现居台湾各地，六位现

居中国大陆的天津市。以下是我收集整理于不同时期的台湾人原日本兵们的口述，他们谈到了参军的时间和缘由。他们应征的理由，一方面见证了皇民化教育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暗示，他们之效忠日本和天皇，实有经济、家庭以及地区性方面的考虑。这也说明，日本人的教育机器无论如何有效，在生产忠诚的殖民地臣民方面，并不是完全成功的。

十一位受访者中，有五位说他们并不想参军，完全是被强征的。现年七十岁的王清槐战时本是一个农民，他解释说：“那时候不可能拒绝征召”。有些人，比如现年七十二岁的谢勇，其时作为“志愿军夫”入伍，实际上，“志愿者”只是名义上的。谢勇说，“那时我在一个职业中学读书，日本教官说国家和天皇需要我们。”短期训练之后，谢勇和他的一些同学成了日军的飞机机械师。受访者林兴琳，现年七十一岁，战争爆发时驻在日本的福冈，在那里被征募入伍。他回忆道，“他们很快发现我不是日本人。一个台湾人是没有资格当日本皇军的。”结果是他被派到福冈附近的海军基地做一个军夫。“我那时很年轻，不能被接纳做皇军让我感到很丢人。”林笑了，“但我父亲很高兴，因为做军夫的伤亡可能比做军人低。”

受访者中有两位谈及做军夫的动机，认为报酬的吸引力远比军队的爱国口号来得强烈。现年七十五岁的陈根发，战时本是一个卡车司机。他解释说，“他们承诺给去马尼拉的人每个月一百二十日元。这是我在台北做卡车司机的月收入的两倍。”黄永生，现年八十四岁，他描述参军的经历，认为在战争末期，收入是一个特别强烈的诱因，因为其时台湾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战争结束前几年，日本人想让我在日本占领的那些南太平洋岛屿之间开运输船。他们说会给我很好的报酬。那时我是一个要养家糊口的渔民。一个穷得什么都不懂的渔民。我不管什么国家和天皇。我说好吧，一个月后，他们就把我送到菲律宾了。”别的受访者中，有确实将参军主要归因于对日本的爱国情感的。王清槐被征召为军夫入伍时年方十八，他决心要特别勤奋地工作，希望到二十岁时能成为皇军的正式一员。“像那个时候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我是那种被日本精神煽动的人。”他笑着承认，又说，“不过我怀疑，那个时候谁不是那

样。”现年七十一岁的周义村，当年在总督府警察署的化学实验室工作，现在是一名刻印章师傅，“那个时候，一个台湾年轻人能到总督府的部门工作，是很不平常的，”他微笑着说，“那职位是一种荣誉。你觉得比其它台湾人离‘成为一个日本人’近了一步。你的脑子里充满了国家、大东亚新秩序、帝国之类的东西——你知道，毕竟那时我太年轻了。”刘成庆，七十一岁，一九四四年在日本高中一毕业即被征募为军夫人伍。一九九五年我在天津采访他时，他大胆承认，他曾觉得自己被“大和精神”完全占据，入军中服役时，每天响彻上空的爱国歌曲感动着他。一九五三年，他没有返回台湾，而是从日本来到中国大陆寻求新的生涯。在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运动，他曾被定性为叛徒、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刘成庆说，“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承认我说日语更自在。我常想，如果四十二年前我没有离开日本的横须贺来天津，我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刘成庆现在是天津郊区的一家日本公司的顾问。关于这份工作，他说，“我教给日本老板怎样对中国工人严格要求、少付工资。”

战争经历

台湾人原日本兵的战争经历有重要的共同点，最明显的是，他们都经历了战争的结束：美军的闪电登陆和进攻、日军防线的总崩溃、全面撤退到杳无人烟的山区，最后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投降。另一个共同点是服役期的短暂，这归因于志愿兵制度直到一九四二年四月才在台湾实施。海军志愿兵制度始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但要到一九四五年才开始招募殖民地的台湾人。此外，受访者还提到了一个更深层的共同经验：被征召为军夫的，极少被派往阵地前线。这一情况并非偶然，它反映了日本军部对台湾人原日本兵的总政策。曾是两个小队的大厨师的王清槐说：“最根本的，就是日本人并不信任台湾人。我们军夫被放在第二或第三防线上，作职员、农业专家、工程师、机械师、建筑工人、司机、护士、医生，等等。”与服役期短暂、缺少实战经历有关。但或许更有意义的共同记忆是：种族歧视以及日军对中国士兵、平民所实施的暴

行。与占主导地位的种族主义的残酷迫害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有关日本人与台湾士兵真实友情的、少数的个别记忆。在此，也要谈到一个台湾人原日本兵想要离开日军加入中国抗战的并不令人惊讶的故事。

研究中日战争的历史学家一直在强调一个史实，然而这一史实在欧洲中心的二战档案中，始终被大量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记录所覆盖，那就是：日军在中国的军事行动的残酷性，接近于种族灭绝的程度。这一史实，在本文的访谈中得到活生生的证明。黄永生驾驶运输船被派往海南岛运输军需品时，曾目击一个日本军曹的恐怖暴力行为。停留海南期间，军曹要黄永生陪他“去找个姑娘乐乐”，黄永生回忆道，“我以为他要去找军中的慰安妇”，但事实是“中士在街上找上了一个女孩，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了她，就在目瞪口呆的我面前，就在大街上……”黄永生停下来，吸了一口烟，“然后，猜猜怎样？中士用刺刀插入女孩的下身……我跟你讲，那中士是个魔鬼。”卡车司机陈根发从其他司机那里听过类似的故事。在采访中，他回忆起在一个菲律宾小村庄里发生的暴行，这牵涉到一项日本兵的文件遗失的案子，“村里所有的男人都被日本宪兵集中起来，拷问，然后杀死。”陈根发还记得一个美国战俘被刑求致死，以及一个屠杀中国农民的事件：“一个从广州湾派到我们岛上的台湾空军军夫告诉我，在那儿（广州），七个日本宪兵杀了四个毗邻村庄的四百多个农民，借以报复七名日本兵被中国抗日农民杀害。”陈根发感叹：“战争中，最遭殃的总是老百姓。”

从一些台湾人原日本兵的叙述可以看到，他们在种族歧视的问题上有着共识。大多受访者证实：日本兵对他们的台湾同胞存有相当严重的歧视。陆清林，一九四五年五月参加日本海军，如此描述他所遭遇的歧视：“当他们发现我是台湾人时，就把我降级到海军航空队做军夫。”他很快被派往伪满洲国，一到齐齐哈尔，就被分派到总务办公室做一名职员，而不是到实验室做更适合他的化学师。“没有哪个台湾人能在实验室工作，”他说，“后来，铃木少校这样告诉我。”

与此同时，不是所有受访者都觉得歧视明显得难以忍受。陈春庆笑着说道：“只有在面对敌人的子弹，你和日本人是平等的。而且，这是战

争，他们需要你的绝对忠诚。”陈根发讲了一个他在马尼拉的轶事：“我当时在马尼拉采购军需，一个日本兵看见我，对我大叫‘清国奴！’（一种对中国人的侮辱性称呼）”陈根发描述着他如何站起来对着那日本兵的脸就是一拳，然后，“两个日本宪兵出现了，我告诉他们，我在马尼拉准备为国家和天皇战死，而这个狗娘养的却叫我清国奴。宪兵当着我的面揍了那日本士兵一顿。”

这里甚至还有日本人和台湾人交往的极少数个别例子，陆清林被派到伪满洲国的齐齐哈尔时，年仅十八岁，在那儿的关东军总务办公室，他遇到了铃木少校。少校待他如养子，关照、保护他不被日军的苛刻军纪伤害，还送给他当时只配发给高级日本军官的罐头食品。当陆清林被转移到哈尔滨时，铃木少校在他的行李中塞满了衣服和食品，到火车站为他送行。陆清林刚到哈尔滨战争就结束了，他和另一支队伍一起，被苏联红军带到西伯利亚。“第二年有一天，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我在一个小火车站的站台上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是铃木少校。”这个重逢时刻远远地喜出望外。这一次，陆清林倾其所有，要将口袋里红军供给的口粮、糖果和钱给铃木少校，“铃木少校取了一些糖果和口粮，但钱是一文也不肯要，‘你是我的孩子，’他说，‘钱是父亲给孩子的，不能倒过来。’铃木少校就是这么说的。”在一九四六年的寒冷秋天、在西伯利亚的旷野中，他们从此分别，再不曾相见。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军人在中国战场上度过的岁月，却使陈春庆从皇民化教育的欺骗中彻底觉醒。他对日本的爱国主义情感破灭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他试图离开日军，去加入那些开始与中国同胞并肩作战的台湾士兵。一九四三年，二十岁的陈春庆怀抱打败“英美鬼畜”、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奋斗的愿望，自愿参军。“那时我太年轻了，”陈春庆说，“我什么都不懂。我只是一个从台湾北部的偏僻小村庄来的贫穷农民。”一个月的集训后，陈春庆被送往中国大陆。沉默、淳朴、在贫困中挣扎的大陆农民，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那个贫困、偏远的小村庄。陈春庆惊讶地发现，中国大陆人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甚至是宗教信仰，都和台湾如此相像。“为什么共荣圈的理想要通过抢劫、掠夺

和杀害这些农民来实现？”陈春庆问自己。没有答案的疑虑日渐扩大，陈春庆无法停止思考。

一九四四年初，陈春庆的疑虑更深了，其时他被转派到浙江金华，在一个关押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奴隶劳工的集中营做看守。他亲眼看到，苛刻的劳作、饥饿、刑罚、暴力，以及杀害，是集中营每天上演的日常事件。同年五月，陈春庆和其他二十名台湾人原日本兵、军夫，被火车和卡车辗转运送到浙江的北部防线。一路上，他们看到野地里、街道上、路旁、河中，到处是尸体。“虽然是一个士兵，我也被亲眼看到的情景震惊了：中国已经被战争破坏成什么样子了，”陈春庆说，“我也是头一次看到废墟墙上据说由台湾人李友邦将军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写的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在采访中，陈春庆强调，即使现在，他仍清晰记得当时他的心如何狂跳不止，因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台湾人已经正在大陆组织起来，与中国同胞并肩作战，反抗日本侵略者。从那时起，陈春庆开始积极寻找台湾抗日义勇队，但遗憾的是，他的努力落空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那一天……

受访者提到，战争的终结极大冲击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意识。不过，冲击的表现形式因境况差异而不同。比如，由于军队驻地偏远，有的台湾人原日本兵甚至数月后才知道战争已结束；得知日本战败，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陈清霖就是如此。一九四四年秋天，陈清霖因病重被送回台湾。同年十二月，他在病愈后再次被征做军夫，到菲律宾的一个偏僻小岛上驻防。美军同时占领了这个小岛，在陈清霖到达的第三天，发动了一场“超乎想象的猛烈”的攻击。陈清霖和其他的零散日本兵撤退到岛上的山地，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十四个月。陈清霖解释说：“因为在森林深处，直到一九四六年九月我们才知道日本战败了。”当被问及得知战败是否感到高兴时，他回答：“并不是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他和几百名日本兵离开山地，被美军押送到战俘营。关于美国人管理的战

俘营，他说：“食物很难吃，而且没多少。劳动难以忍受，我们每天干十个小时的活……比日本人在中国大陆建的集中营好不了多少。”一九四六年底，陈清霖被遣送回台湾。

对战争的结束、日本的投降以及中国收复台湾，别的前台湾人日本兵一样有矛盾的情感。许多人目击了日本兵和高级军官对战败消息的极端反应。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陆清林听到战败的消息时，正躺在伪满洲国的哈尔滨的野战医院里。他回忆说：“日本人打开粮仓，拼命大吃大喝，好像世界末日到了。”刘成庆得知消息时正驻扎在日本的横须贺。他的长官告诉他，美国人在日本丢了“一个超级大的炸弹”，为了让日本人民渡过劫难，“善良仁慈的天皇”决定结束战争。他回忆道：“我来到横须贺的大街上，看到日本人跪在道路两旁，号啕大哭。”此外，一些受访的台湾人原日本兵谈到，他们无法想象脱离日本统治、回归中国对台湾意味着什么——既然自己曾站在日本这边与中国作战。傅大生听到天皇的“玉音放送”宣布投降时，驻扎在伪满洲国的长春（吉林省）。“八月十五日那天晚上，几个军官剖腹自杀了，”傅大生说，“转天早上，一个少将在脑袋上开了一枪。”傅大生也听到一些故事，有的下级士兵为过去受到的虐待趁机报复他们的长官。有的日本兵告诉傅大生：他们认为战败的是日本，与像傅大生这样的台湾人无关。“但是我整个傻掉了。”傅大生回忆，“我完全想不出，摆在我和台湾面前的将是什么。”

受访者陈根发说，随着战争的结束，他意识到，尽管自己是一个被殖民者，参与战争却使他成了菲律宾和其他东南亚人的敌人。他们的国家多被战火烧得满目疮痍。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他所在的部队正式向美军投降，他知道日本帝国的“圣战”失败了。陈根发描述投降后的遭遇：“我们台湾军夫被火车送到马尼拉城几里之外的集中营。一路上，几乎在停靠的每一站，都有愤怒的菲律宾人用大石头砸我们的车厢。”陈根发记得，不少台湾人原日本兵受了伤，有几个甚至被砸死了。“美国看守显然并没有认真阻止那些愤怒咆哮的菲律宾人。”陈根发说，“第一次，我看到了菲律宾人燃着怒火的眼睛。我自己，一个台湾人，原来也是日本人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的一个组织部分。”

战争的结束，也使得曾被日本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压抑的中国认同浮出水面。周义村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他的日本少尉告知他和几百个战友美日“临时停战”了，并且说，为了保持战备状态，他们要驻扎到距广州（广东）几英里之远的山区，进行军事训练。周义村说：“少尉这么撒谎，是怕军队受不了战败消息的突然刺激。”周义村还回忆起，最终，他是从美军飞机撒下的传单上得知日本已无条件投降的真相。“传单上说，台湾将回归中国，朝鲜将从日本统治中独立。昨天，我还在竭诚做‘天皇的赤子’，今天，我却记起了祖父曾经告诉过我的——我是一个中国人。”

回 家

战后台湾形势的错综复杂让台湾人原日本兵难以安身：因为曾与同胞敌对作战，他们不能被看成战胜国中国的士兵。然而，他们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日本皇军。他们既无法分享中国胜利的光荣，也无从哀悼日本帝国的战败。下文将为后殖民时期的台湾勾勒一简要历史脉络，当有助于理解这些台湾人原日本兵在日本、中国大陆以及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尴尬处境。

一九四五年，根据《波茨坦宣言》和《开罗宣言》，刚刚解放的台湾被归还给中国。然而，内战很快在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爆发，且迅速扩展到全国范围。一九四九年末，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几天，美国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美国在其所谓“太平洋岛链”中，将台湾重编为它的冷战战略军事基地之一，试图将台湾从中国版图中分离出去，以此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通过给予蒋介石政府外交承认、保留台湾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席位，以及军事、经济援助的方式，美国赋予国民党政权以国际合法性。这种国际外交上的合法性，反过来，为合法化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统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日本对美国的战后外交政策亦步亦趋，实际上是分离大陆和台湾的帮凶。在十五年侵华战争和五〇年台湾殖民结束之后，

日本开始支持国民党专制，仇视新中国。总的来说，台湾后殖民时期的专制，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如同在朝鲜战争之后，日本统治当局联合战时的法西斯主义分子以对抗共产主义一样，国民党残酷镇压了台湾的民族—民主力量，同时，将一些殖民时代曾与日本统治者合作的台湾本土的大地主、士绅、资产阶级吸收到权力阶层。第二，一九八七年蒋家时代的军事戒严令解除之后，那些殖民地遗老——以李登辉为代表，却通过台湾的“民主化”（这是广为西方观察家赞誉的）登上了权力宝座。

台湾、日本、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的政治局势复杂暧昧、变换迅捷，美国默许国民党和日本政府拒绝承担对这些台湾人原日本兵应负的战后责任。比如，日本甚至在战后不肯运送他们回日本或台湾，还扣留他们应得的军饷。“台湾人原日本兵、军夫暨遗族协会”的主席，七十一岁的陈俊清，在采访中这样谈到这一问题：“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所有前线上的台湾人原日本兵和军夫——从中国大陆到南太平洋——都被日本政府轻易地抛弃了。”陈俊清自己曾被征召做日本海军的军夫，一九四三年五月被派遣到海南岛（广东）。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战争结束时，招募我们的天皇连一个解散的命令也没给。我们就那么被遗忘在阵地、丛林、岛屿和高山上，不得不自己挣扎求活，而日本军队早已被美国战舰送回家去了。”

当台湾人原日本兵们终于能够离开驻地时，他们要面对新的难题：他们该回中国、日本，还是台湾？大多数人回到了台湾，但战后历史的风云变幻，使得相当多人留在了大陆，至今已四十多年。例如，陆庆林在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之前被送到伪满洲国，战后被苏联红军带到西伯利亚内地强制劳动四年，接着，一九四九年，陆庆林被当作日本兵遣送到日本。“我回到了我被征召入伍的地方，福井，”陆庆林说，“工作非常难找。那个时候，日本人认为从西伯利亚被遣送回来的人都有‘赤色分子’的嫌疑。没人愿意雇用一个共产党。”他还说起一九五〇年他如何给他在台湾的兄弟写信，告知他的艰难处境。“我弟弟到日本来见我。”但是陆庆林的弟弟坚持要他别回家，因为台湾正在进行残酷的“匪谍肃清”。“我弟弟给我讲了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失

望的台湾人揭竿而起，反抗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这个事件在台湾的中国人和大陆来的中国人之间留下了血的伤痕，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猜疑和仇恨。”弟弟还给他讲了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的白色恐怖。陆庆林解释说，“那个时候的台湾，一个‘西伯利亚遣返回来的人’就是‘共产党’的同义词，意味着死亡和毁灭——不仅是他自己，还有他的家人。”因此，当一九五二年日本经济恶化时，陆庆林决定回中国大陆。“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再加上，那个时候，周恩来总理正呼吁有知识、有技术的海外华人回国参加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

回忆起他们最终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津（河北）的过程，傅大生、陆庆林和刘成庆的故事很相像。当他们到达天津时，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们分配了工作，最后还结了婚。刘成庆谈及后来形势的变化，“在大陆最初的几年，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很好，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开始了，然后是一九五八年的反右。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几乎每次政治运动，我们这些台湾人原日本兵都是被攻击的目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目标是打倒阶级敌人、修正主义者、走资派、官僚主义还有党内腐败——他们作为日本兵的历史不断地遭到审查和批判，大多数被贴上叛徒和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的卷标，说他们潜回大陆企图颠覆社会主义祖国。一九五六年，在那场波及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动乱中，毛泽东宣布了他那著名的一九五七年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老百姓、知识分子和非共产党员批评、讨论和思考政治问题。然而，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和意见远远超出了毛泽东的期待。一九五七年六月，共产党开始反击，把大部分批评定性为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共产党的反击发展成一场群众性反右倾运动，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在中国大陆的人，包括台湾人原日本兵都成了反右大批判的对象。

不过，那些安全回到家乡台湾的人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国民党对这些台湾人原日本兵的漠视和偏见是不足为奇的。“这很好理解，”王清槐说，“就在几年前，我们这些人还属于日本皇军，去侵略国民党的中国。”在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事件中，皇民化运动宣扬的仇华论复苏了，

情况变得更复杂。有报告指出，有极少数一些战争遣返人员穿着日军的制服、戴着军帽，唱着日本的军歌穿越街巷，痛打碰到的外省人。王晓波，世界新闻与传播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如此解释：“在那个时候，这些少数的台湾人原日本兵又变身为皇军，再一次和中国人打仗了。”事件之后，他们遭到了清洗。

一九八〇年代，海峡两岸的台湾人原日本兵的处境开始有所好转。在大陆，转变发生在一九七九年以后。关于这个时期，傅大生说：“我们的‘反动’卷标摘下来了，再没有人有权指着我们骂我们是祖国的叛徒。有些受到严重迫害的人还得到了国家的赔偿。”在台湾，一九八八年李登辉上台之后，台湾人原日本兵们的处境也开始得到改善。一九九三年五月，“台湾人原日本兵、军夫暨遗族协会”正式成立。在一九八八年以前，在蒋家王朝炙手可热的威权时代，这样一个台湾人原日本兵的组织，是不可想象的。同时，从一九九〇年代初开始，许多在大陆的台湾人原日本兵回到台湾探亲。有些人就此永久留下了，但大多数还是返回了大陆。陆庆林微笑着说，“能够死里逃生，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终于又看到了家乡，我魂牵梦绕的台湾，多么好。”

中国共产党

在十一位受访者中，有两个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一个是在谢勇，现在在大陆，另一个是陈春庆，仍在台湾。

谢勇入党的一个因素源于战争的结束，当时他是高雄岗山空军基地的一个机械师。光复带来的喜悦很快被国民党暴政引发的愤懑所替代；谢勇回到故乡，和一帮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广泛议论台湾日渐恶化的社会状况和压抑的政治环境。一九四七年二月事件发生时，谢勇作为一个暴动组织的成员，冲击了嘉义郊区的国民党空军基地。“我不曾知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对我发生兴趣，一直在观察我。一九四七年六月初的一天，我被带去见李妈兜。他那时很有名，是台湾南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那天，谢勇入了党，那是他永远忘不了的一天，“李妈

兜亲自在那儿祝贺我。”

然而，一九四九年末，国民党开始“肃清地下党”，在那段时间里，全岛的党组织都被摧毁了。四千个“共匪”嫌犯被枪杀，另有六千一八千人被判十到十五年的监禁。将近一百人被判终生监禁。谢勇还记得，“李妈兜被逮捕、刑讯，最后在一九五一年初夏被杀死。”同年十二月，谢勇取道香港逃往中国大陆。

像谢勇一样，陈春庆战后回到台湾，却发现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已经让本地人忍无可忍。在二月事件的前夕，陈春庆运用他的战争经验，帮助激进的学生寻找战时日本人留藏在一些山洞里的军火。他就这样积极参与了反国民党的活动，一九四七年三月，事变被武装军队镇压，陈春庆逃离了台北。途中他遇到陈文农，“陈文农教给我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借给我看进步书籍和杂志，让我眼前一亮。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在初级学校时陈春庆很喜欢历史和地理，却因为贫穷辍了学。“陈文农借给我的书和杂志塑造了一个新的我，”他回忆，“我开始明白，刚刚过去的战争的本质，其实是日本和美国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阅读激发了陈春庆，他加入了地下党。在读书会里他勤奋工作，在台北北郊的山区“鹿窟”他们建立了一个游击基地。一九五三年，这个基地被武装宪警破坏，一百多个党组成员和山地农民被包围，有二十多个被射杀了。陈春庆是极少数逃出来的一个。但逃脱之后紧跟着长期的躲藏和逃亡的日日夜夜，挨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他终于被发现、逮捕，判了十年监禁。如今的陈春庆已是一个癌症患者，当被问及对今日中国的看法时，他回答，看到中国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他感到非常安慰。同时，对海峡两岸的政治局势他不抱任何幻想，但是，他仍然担心一件事：中国大陆的“腐败”。

心 寒

在台湾的台湾人原日本兵组织起来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努力，同时遇到日本人和台湾当局的阻碍，在在说明：形塑了台湾人原日本兵们

之民族认同的历史，是何等的复杂。同时也折射出这一问题的跨国性：无论是他们经受的艰难，还是国家应对他们负的责任，几方居然都拒不承认。比如，早在一九七二年，台湾的一群台湾人原日本兵试图为他们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组织正式登记，却没能成功。现任“台湾人原日本兵、军夫暨遗族协会”主席的陈俊清，谈到这一早期努力为什么失败：“一九八七年以前还是戒严时期，人们想有自己的民间组织，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他进一步说，戒严并不是他们得不到官方承认的唯一理由。“国民党政府有很好的理由不为这些台湾人原日本兵的利益费神，他们在战争中是日本兵，和中国打仗。再加上，一九七二年日本的外交从台北转向北京，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使得日本和台湾之间有关战争赔偿的谈判更加困难了。”

一九九三年，协会终于正式成立了，并在台北的长沙街上有了一间办公室。在办公室，一些和陈俊清一样的人们目前正在为向日方索取赔偿，包括未付军饷、未清偿的军事邮政储金、未清偿的军事保险金，以及战争意外和伤残的赔偿金等而工作着。然而，日本政府只同意付给每个申请人不超过二百万日元。陈俊清说：“这一点钱只够办一场寒酸的葬礼。”他和多数台湾人原日本兵都特别愤怒：对于未付的军饷、储金和保险金，日本坚持按原文件数目的一百二十倍赔偿。“如果未付的军饷平均是一千日元，一百二十倍就只有十二万日元，只折合四万新台币。”四十年前，一千日元能够让一个人在台北最繁华的地段买两套房子，房子到今天的价值会超过一千万新台币。陈俊清和他的伙伴们提出，合理的赔偿金应该是原始资料的七千倍。“我们的算法很简单，”陈俊清声明：“目前，日本自卫队一个二等兵的月薪是十五万五千三百日元。四十年前，我们台湾人原日本兵是每月二十日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七千倍是公平合理的。”

然而，日本政府不承认这些计算，而且，在清偿战争债务时，坚决拒绝考虑生活消费显著增长的因素。这个态度震惊和伤害了多数台湾人原日本兵和军夫。陈俊清谈到他一九七三年日本之旅感受到的震撼和失望。那时，台湾人原日本兵开始发起向日本索取赔偿的谈判。在陈俊清

的想象里，他会得到日本政治家、日本老军官和战友的热情接待和欢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同样，据林秋潭说，一些代表以为他们会被看作“流落的天皇的赤子”，因为他们曾为天皇英勇作战。“但我们完全错了。我们要求与日本的日本复员军人享受一样的赔偿及年俸，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真的以为我们曾经是日本天皇的赤子，而非中国人。但几乎所有日本朋友都对我们的要求感到为难。他们说，无论如何，早自一九五二年日本和台湾签订和平条约的时候，我们已失去了日本国籍。”周义村也表达了他的失望：“那是我们自己的钱。我们用血汗换的钱。日本人应该还给我们，因为是他们欠我们的。我们不是求他们好心施舍。”

陈根发和陈俊清都特别强调了他们对日本人的响应的失望。陈根发说他之前很喜欢日本人，他补充说，这是因为“一些愚蠢的理由”，比如“大和精神”和皇民化教育，那曾经让他相信，日本人是绝对值得信任的、诚实的、有强烈的责任感，信守所有说出的诺言。“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震惊：日本人竟能翻脸不认人，”他说，“哪怕我们曾经作为日本兵服役，为日本人打仗，为日本人民死伤，还把我们的钱借给日本政府——用军事邮政储蓄的形式。”对日本人的冷淡，陈俊清的反应更为强烈。陈俊清一直积极从事索赔工作。利用他较好的日语说写技能，他领导同日本的谈判，包括游行示威，抗议日本拒绝台湾人原日本兵的要求。这一正在进行中的工作带给他更深的失望。“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我们在东京举行要求战争赔偿的示威游行。我们用麦克风在东京街头喊话，直接对日本公众呼吁，但让我们震惊的是，日本人对我们几乎全不在意。我们试图散发写着呼吁和要求的传单，但街上几乎没人愿意接下来读。我们感到了心寒，这是余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

有一点很重要，要承认：这种失望和愤怒源于他们对日本难以抗拒的感情。这一点，从“台湾人原日本兵、军夫暨遗族协会”的出版物的名字上也可以看出：《皇军通讯》，封面来自日本国旗图案：一轮升起的旭日。协会的会标模仿日本的皇族纹章。而且，一些台湾人原日本兵喜欢戴日本战斗帽，不但在参加他们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时，也在日本观光时仅仅为了高兴戴。王清槐想起，有一次在协会的年终聚会上，他看到

一个上了年纪的台湾人原日本兵，头戴日本军帽，唱着日本军歌，甚至用日本国骂开骂：“当他骂着‘八格亚鲁’（混账），骂日本抛弃了他们这些台湾人原日本兵、歧视他们时，他眼里流着泪。”

然而在大陆，台湾人原日本兵对战争赔偿问题的态度很不一样。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他们一再被强制要求、深刻反思这一段历史以及他们自己在战争中的思想和行为。“我们听说了在台湾，台湾人原日本兵一直在要求战争赔偿，”谢勇说，“但我们极少想到用钱的形式赔偿。我一直想的是，当我还是高中毕业生的时候，战争的爆发是怎样激烈地改变了我整个人生道路。”

创 伤

台湾人原日本兵的故事生动展现了台湾的后殖民伤痕，这是台湾岛的当代历史和政治留下的永久遗物。对这些台湾人原日本兵来说，这创伤在文化和政治领域产生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他们自己的国家认同意识；冷战导致的离散放逐状态——有的人仍然生活其中；以及东亚的冷战架构——这是日本和台湾漠视这些前殖民地弃民、推卸应负责任的原因。

台湾后殖民历史对这些台湾人原日本兵的民族认同作用是复杂的。日本人多年的皇民化教育，加上其它思想控制机关，对他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们常常拒绝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或台湾人，坚持声称自己是“裕仁天皇的赤子”。因此，日本政府在战争赔偿问题上的冷酷拒绝和漠视，对他们是极度苦涩和伤心的体验。由民族认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日本对台湾的殖民，不仅剥夺了这些台湾人原日本兵的身体和语言，还让他们失去了民族的自尊和认同。

其次，作为冷战的一个后果，台湾和中国大陆分断，这使得一九九〇年代之前许多在大陆的台湾人原日本兵不能回台湾探亲。当他们终于能够回家的时候，许多人发现他们的父母和老年的亲人已离世多年。与这种冷战造成的家族离散状态有关的，是美国和战后日本的保守势

力——后者与战时法西斯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结成了一个反共联盟。在这种状况下，日本作为美国最喜欢的孩子，对他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和给亚洲人民造成的伤害，竟能傲慢地坚持拒不道歉和赔偿。而台湾，另一个在冷战时期誓死效忠美国的政体，在蒋介石和李登辉的统治下，都毫不犹豫地出卖了台湾人原日本兵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以换取日本对台湾的政治支持。

一九九五年，在世界和亚洲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台湾在批评日本的战争罪行方面仍保持着相对的沉默和克制，与韩国相比，显得尤其软弱。未解决的和未承认的日本的战争责任，给后殖民台湾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它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台湾—日本的范围，还包括中国和美国之间不公正的、正在持续变化的政治、经济关系。放在东亚冷战体系这一地缘政治背景下来看，台湾在日本二战罪行问题上的沉默与国民党近似法西斯主义（虽然二战宣称了它的终结）的专制统治，都获得了新的意义。就像战争本身，台湾人原日本兵的困境是一个特别生动的写照，它说明层层累积的殖民历史仍在发生影响，这影响的复杂性以多种形式呈现，既表现为“美日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的二战，又表现为目前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资本主义政权在后冷战时代的联盟。

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

——批评陈芳明先生的《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

一、离奇的社会性质论

去秋，陈芳明先生（以下礼称略）发表了《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联合文学》月刊，一九九九年八月号），宣告他要以“后殖民史观”去“建构台湾新文学史”，并进行台湾新文学史的分期。他主张“要建构一部台湾新文学史，就不能只是停留在文学作品的美学分析，而应该注意到作家、作品在每个历史阶段与其所处时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并且说，他在“建构”这部新的台湾新文学史时，要以“对于台湾社会究竟是属于何种的性质”的问题之究明为“一个重要的议题”。陈芳明于是把结论说在前面。他认为台湾社会的总的性质是“殖民地社会”，“则在这个社会中所产生的文字，自然就是殖民地文学。”

这就牵涉到关于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性质理论和殖民地社会理论了。小论的目的，只限于审视和批评陈芳明据以为台湾新文学“分期”之基础的“台湾社会性质”论，至于陈芳明依其台湾社会性质说所造成的关于台湾新文学史论的全面错谬，则等待以后的机会加以批评。

* 本文刊于《联合文学》（台湾）第一八九期，二〇〇〇年七月。后收录于《复现的星图》（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台湾：人间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及《反对言伪而辩：陈芳明台湾文学论·后现代论·后殖民论的批判》（台湾新文学史论丛刊三，台湾：人间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八月）。

社会性质论，又作“社会形态论”或“社会构成体”（social formation）论，指的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中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和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发展之独特的性质、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之独特的形态与性质的总和。马克思据此以说明人类社会依其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演化，一般地、平均地把资本主义以前的诸阶段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推论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虽然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目前在现实上受到挑战，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及前此各阶段社会的分析之科学性，仍有强大的威信。

马克思的这一概括的五阶段社会发展理论，当然主要地以西方先进、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史为言。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以资本输出，掠夺他民族/国家的工业原料，并强占其市场以倾销其工业产品，来扩大其资本的积累与再生产，这就形成了帝国主义。而为了在帝国主义各国竞逐原料和市场的斗争，帝国主义往往又以暴力强占亚、非、拉广泛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施加直接的、强权的政治统治与经济榨取，使这些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于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以迄于今日的帝国主义时代，沦为殖民地的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的社会，在社会发展阶段中，便多出了一个外铄的社会性质，即“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性质，说明这些社会在世界史的帝国主义时代所处的地位。这些社会的殖民地化和半殖民地化，又对于这些帝国主义支配下前资本主义各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复杂、深刻、负面的影响。

以中国社会史为例。秦汉以后，中国社会从贵族封建社会（农奴附属于土地，土地以贵胄家族世袭而不能自由买卖，以农奴的力役与实物地租为榨取形式等等）转化为私人地主封建体制（私人主佃封建关系，土地可以买卖，佃农对地主、土地的半农奴依附，地主经由封建地租和力役对佃农进行剥削，等等），并经历了两千多年停滞反复的、独立的地主封建制。直到一八四〇年，以鸦片战争战败为起点，包括台湾在内的

中国封建社会在列强欺凌下，从独立自主的传统地主制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因为清帝国毕竟勉强维持着残破的主权政府在形式上的“独立”，但全中国则早已分别被列强分割成各国的势力范围、租界地和殖民地（如香港和台湾），国防瓦解，海关为外国所把持，国已不国。半封建，是因为帝国主义强开中国的门户，以强权通商，使资本主义生产、商品和金融资本破门而入，相对扩大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自给自足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而促其瓦解。

然而，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的目标，绝不在彻底扬弃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例如本地封建社会），从而催促其资本主义现代化。帝国主义的目的，是使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其附庸，限制殖民地经济自然、独立发展，把殖民地改造成成为帝国主义独占资本掠夺原料、独占市场的基地，并且以其强大的金融资本控制殖民地银行、厂矿、交通工具和相关贸易及商业，打击和压抑当地民族资本的正常发展，一方面又与殖民地半封建势力如地主、买办、官僚和军阀相勾结，通过巩固和利用本地半封建、或封建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对广泛的殖民地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夺与压迫。总之，帝国主义一方面相对性地带来资本主义诸关系，促成殖民地传统封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瓦解，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借巩固和利用殖民地传统封建势力如地主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物质基盘，以遂行帝国主义独占资本的积累与再生产。如此，一方面是传统封建体制的动摇与瓦解，一方面是本地资本主义发展受到构造性的阻碍与压迫，成为停滞在从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移行之半途的、“半封建”的畸形社会。

因此，在马克思社会形态发展理论中，就绝没有一个单独称之为“殖民地社会”的社会阶段。原因无他：“殖民社会”不是一个单独、固定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必由的阶段。殖民经济是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先进资本主义以金融资本的形式向前资本主义社会输出，掠夺其原料、强占其市场而形成的经济，使殖民地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

方式与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故“殖民社会”的概念，离开了这些变化后的具体的社会性质或形态的描写，就空洞而无意义了。此所以殖民地下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形态）都是以“殖民地·封建社会”（例如商业资本主义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荷据台湾招募中国东南沿海贫困农民进行东印度公司下的封建榨取的体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鸦片战争后的大陆社会和鸦片战争后直到日本统治前的台湾），以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殖民地化以后的朝鲜和台湾）为表述。

则陈芳明的“殖民社会”论，在社会形态论上是毫无根据的。陈芳明说，甲午战败，“台湾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岛上的原住民社会与汉人移民社会，在一夜之间，被迫迎接一个全新的殖民社会”。“原住民社会”与“汉人社会”，是种族概念，而“殖民社会”则是政治经济学性质的、是社会科学的概念。于此，尤见陈芳明“社会性质”理论的混乱了。

二、日本殖民地下的资本主义问题

基于他自己关着门炮制的“台湾社会是属于殖民地社会”的“史观”，陈芳明“建构”了一个把台湾社会史——从而是台湾新文学史——分划成“殖民时期”（一八九五〔新文学则始于一九二一〕——一九四五）；“再殖民时期”（一九四五——一九八七）和“后殖民时期”（一九八七年迄今）这么一个三阶段论。前提既错，在这错误前提上“建构”起来的全“史观”的谬之千里，是自然不过的了。

仅仅说日据台湾社会是“殖民社会”之不通，已见前述。在这新写的新文学史中，陈芳明不惮于一再描述日本殖民地台湾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扩大，谓“日本资本主义在台湾奠基与扩张”，使“日本资本主义”为台湾带来“现代化”，又说日本统治者所引进进来的“资本主义与现代化”，为“台湾社会造成最大的冲击”。而据说“没有殖民体制的建立，就没有现代化生活的改造”。在别的地方，陈芳明也不惮于宣传“日

本资本主义在台湾社会的深化与扩张”。总之，陈芳明认定了日据台湾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相当“扩大”与“深化”的殖民社会。这就得考察殖民地台湾的资本主义的具体情况了。

日帝据台之后，立刻展开了为日本独占资本在台湾顺利发展所必要的“基础工程”，如众所周知的土地林野的调查、土地所有制度的改革、货币度量衡的统一化、排除鸦片战争以后来台的西方资本势力，等等。这些基础工程，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身，却为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在台湾扩张和超额榨取，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形成了母国日本与殖民地台湾之间的不平等分工，使台湾在经济上固定为对日本供应原料与农产品食粮的基地，台湾经济丧失其主体性，而庸从为日本帝国主义经济积累的工具，并被迫形成日本的米—糖单一性种植（monoculture）的基地。台湾本地传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糖廊作坊和台湾人现代资本主义制糖资本被迫解体。一九三〇年以后的军事工业化，在军政统制下，台湾人工商业资本与土地资本进一步萎缩。在日帝统治下，以制糖工业为中心的日本籍资本有所发展，但本地台湾人资本则遭受强权的制度性抑压，豪族资本也只能依附在日本独占资本中，无权独立组织公司以发展。

此外，一直到日本治台四十四年的一九三九年，台湾的农业产值皆高于工业产值，说明尚未资本主义工业化。一九三九年到四五年，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但考虑到工业产值中制糖工业（及其他农业加工业）占其中之大半以上，复加上战争工业化的夸大性，实不能加以过大评价。

而在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保护和巩固了台湾的半封建地主·佃农体制，并在这半封建的土地关系上，建立了以糖与蓬莱米为中心的殖民地剥削经济体制。日本将台湾殖民地化，并没有使台湾土地关系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大农场经济，而是以强权保留和强化了小面积佃耕和现物地租等半封建剥削体制。

因此，陈芳明的日据台湾社会为“殖民社会”之论，显然不曾理解到帝国主义下台湾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复杂的变化，即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变化，从而过高地评价了殖民地台湾的资本主义化即“现代化”

程度，而对于殖民地台湾社会半封建性的侧面，则完全没有估计到。对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社会中资本主义成分的估计，向来富于争论，但从现在看，高估半殖民地中国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因素（如托派和矢内原忠雄），早已被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台共对台湾社会分析所扬弃。今天，大部分台独派和自由派学界一般地把日本对台殖民统治视为资本主义化、“现代化”而加以美化与合理化已成通论。但这又与托派中国社会论和矢内原台湾社会论有本质的不同。

看不见殖民地台湾的半封建性，就无法解释许多殖民地台湾历史中的重要问题。从文学上说，除非认识到殖民地台湾的双重矛盾，即帝国主义异族支配下的民族压迫的矛盾，和与帝国主义相苟合、以半封建地主佃农体制为核心的半封建剥削与压迫的矛盾，就不能说明何以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思想和题材，鲜明地集中于“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和题材。描写日本警察横行乡里，鱼肉台湾人民的《一杆秤子》、《不如意的过年》、《惹事》；描写日本独占资本在台湾的掠夺，农民工人被驱落贫困深渊的《丰作》、《一个劳动者之死》、《一群失业的人》、《送报夫》和《牛车》；描写与日本当局勾结、刻毒同胞的封建地主豪绅的《善讼人的故事》，写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多重压迫下呻吟之女性的《薄命》、《谁害了她？》、《青春》和《老丫头》等。离开了日据下台湾社会“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形态），就不能有科学性的说明。日据下台湾新文学作品，从来不曾把殖民地台湾社会写成幸福、进步、“现代化”、高度“扩大”的“资本主义”社会！

三、“殖民地革命”论的杜撰

另外，由于陈芳明完全不懂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懂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性质（形态）理论，所以在他另外的文章中论及台共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一年纲领时，简直荒腔走板，不知所云了。这当然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他对台湾社会形态史的错误认识。

兹举一例。基于同一个错误，即陈芳明以日据台湾社会为没有经济

内容的“殖民社会”的错误，陈芳明说，因日据台湾是一个“殖民社会”，所以台共在其政治纲领中关于台湾革命的主张，是“殖民地革命”的性质。而陈芳明又说当时中国大陆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其革命的性质是“社会革命”！继之，陈芳明以他今日台独派思想和意识形态，编造出了台共党史中台湾的/谢雪红的/日共领导的“正确”路线，与中国的/翁泽生“上大派”的/中共领导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个荒唐的剧本。而这两条路线之矛盾，据陈芳明说，在社会性质论与革命性质论上，就表现在翁泽生等“亲中共”的“上大派”要将他们的“社会革命”路线强加于谢雪红的、日共的、台湾派的“殖民地革命”路线上！在他的《台湾共产党的一九二八年纲领和一九三一年纲领》（陈芳明，《殖民地台湾》，麦田出版社，一九九八）和其他文章中，陈芳明以此忿忿不平，不惮于三复斯言，使他在社会科学上的严重无知与错误认识更加突出了。

早从一九二八年开始，我国社会科学理论界就展开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争论。这争论的源始，是基于对一九二七年北伐革命挫败的反省，而自重新摸索中国社会性质着手，检讨中国社会形态与中国革命的性质、敌我关系、阶级构造和革命的方针政策。第三国际指导下各国共产党的纲领，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性质）理论，对自己当面社会进行了分析，并根据这分析来决定革命的性质、目标与方针。中共如此，日共如此，当时隶属于日共的“台共”（“日共台湾民族支部”）和鲜共（日共朝鲜民族支部）等莫不如此。中国社会史论争，其实先是集中在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继而又发展为中国历史上各阶段社会性质、即社会史的争论，再发展为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兼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争议。

即便在左派内部，不论在国内或共产国际内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从而对中国革命性质的主张，也有针锋相对的不同。有一派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半殖民地的矛盾，要求进行反帝的、民族（主义的）革命；半封建的矛盾，要求进行（由工农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另有一派则力主中国早已在帝国主义

义下资本主义化，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应该静待自己力量之壮大，准备进行一场无产阶级性质的、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而具体的历史实践证明了一个路线（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正确与胜利，和另一个路线（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错误与否定。在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理论中，只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由现代工资劳动阶级主导的、推翻资本主义、最终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和帝国主义下广泛第三世界前资本主义社会形形色色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之由工农阶级的同盟所领导、团结同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帝爱国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扈从——大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以发展资本主义并最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根本没有“殖民社会”的“殖民地革命”这种怪说。犹记在六十年代，台湾的报纸报导第三世界反美独立运动时，常常把外电中的“民族·民主革命”（national-democratic revolution）误译成“国民民主革命”，就是不懂得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主义（反帝）的、民主主义（反封建）的变革理论所闹出来的笑话。陈芳明的错误类此。

因此，陈芳明一点也读不懂台共纲领，是理所当然的。再举一例。台共一九二八年的纲领中，有一段批评当时台共同志汲汲于要在台湾一味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错误认识。纲领认为，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当时的同志们不曾注意到“一、台湾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台湾本身还存在很多封建制遗物”，即不理解台湾社会的“殖民地·半封建”性，而陈芳明竟而据此大发奇论。他说道：

“……由于资本主义在台湾未充分发展，封建制度的残余仍然深深根植于社会内部，台湾革命自然也具备了克服封建残余的任务，其性质也是属于社会革命。”

陈芳明接着说，日共纲领上认为日帝的性质是封建地主与资本家混

合的政权，则“台湾的独立运动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已，并且在社会内容里也是民主主义的革命”。

对于陈芳明而言，台共到底是主张台湾革命是“社会革命”还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从上引文字，足见其认识、知识之错乱。社会革命，是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达的社会，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深刻无可缓解之矛盾，由新兴现代工资劳动阶级领导，进行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实现后资本主义阶段的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即“社会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在封建或半封建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制度的残余仍然深深根植于社会内部时”，当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中既萌芽成长、又备受压抑；当封建或半封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了无从调和的矛盾，则新生资产阶级或工农阶级的同盟联合其他支持革命的各阶级起来领导推翻（克服）封建或半封建体制，建立后封建（或后半封建）阶段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即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亦即“民主主义的革命”。

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的性质，根本不是什么“社会革命”，更不是什么“殖民地革命”，而是反对殖民地统治的民族解放的革命，亦即“民族革命”和反对封建（半封建）统治的、为发展而不是压抑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之统一，合称“民族·民主革命”。

但第三国际关于殖民地解放运动中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主张由各殖民地的工人与农民阶级而不是其资产阶级担负起这“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的领导任务，理由是在殖民地，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小，人数少，变革的决心弱、立场不稳，而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又因为本身兼为地主，与帝国主义关系密切，往往同时带有封建地主阶级的性格，扈从于帝国主义而积累，有买办性。所以这个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应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必须依靠在殖民地社会受压迫最深重、变革决心最坚定的殖民地工农无产阶级而不是别的

阶级的领导。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由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市民所推动的、为摧毁封建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的、“旧的民主主义革命”。二八年台共纲领所说日帝下“台湾犹残存着颇多封建遗物”，意谓殖民地台湾的资本主义有相对性发展，但同时一仍残留着封建体制的残余，所以台湾社会是一个（殖民地下的）半封建社会，以故台湾革命一面要进行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的革命，却不能以此为已足，“不能独断为单纯的民族解放运动，其社会性内容应为民主主义的革命，此即所谓的台湾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

陈芳明读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一面说台湾革命为了“克服封建残余”，“其性质”竟然“也是社会革命”，一面又引他不懂的纲领文字，说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并且一有机会就说中共将其从未主张过的“社会革命”论强加于台共也从来不曾主张过的“殖民地革命”论，让中共与台共在陈芳明的脑袋里斗得不亦乐乎。因为中共对当时中国大陆社会的分析是中国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由工农的同盟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从来就没有说过、干过什么“社会革命”。台共也因同样的分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矛盾是量的差异而不是质的不同）而主张“台湾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在这样一种革命中，“……认定根本上台湾资产阶级不唯无法领导台湾民族革命，亦不是革命的主要军队”。“台湾工人阶级”要“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工人阶级”要“争取”革命的“指导地位”，以完成“台湾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其实几乎就是台湾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也透露着都是当时第三国际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纲领在各国、各地区的版本。总之，日据下台湾革命的性质根本不是什么“殖民地革命”，更不是什么“社会革命”。从而，台湾新文学的性质也不是什么“殖民地文学”，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文学。大陆的革命当然也绝不是什么“社会革命”，这是中国社会性质理论的基础常识。两岸社会性质的近似性，规定了两岸革命的性质都是反帝（民族主义）·反封建（民主主

义)的,同时也规定两岸救亡运动之一环的文学斗争的口号和内容,势必也是反帝·反封建的。陈芳明不明白这个理论,把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的台湾社会规定为没有社会经济内容的“殖民地社会”,从而规定日据下台湾新文学为“殖民地文学”(colonial literature,日本作“外地文学”,原指类似西川满、滨田隼雄、庄司总一之流,以殖民者立场对“新附之地”台湾的异国情怀的描写的文学,足见其使用“殖民地文学”一辞之大不妥)而没有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不能捕捉到殖民地“反帝·反封建”文学的特质之根源所自。

只有从日据台湾社会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能说明日据下台湾反帝民族·民主斗争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也才能说明作为殖民地台湾的民族·民主斗争之一环节的台湾文学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与题材,才能理解分别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与台湾的新文学,都以反帝·反封建为战斗的旗帜,而前者并施重大影响于后者;才能理解在第三国际、世界无产阶级文化/文学运动影响下台湾左翼文论和组织的发展;才能理解台湾新文学主要地以(批判的)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最后也才能理解在严酷的、“皇民化”时期台湾新文学的挫折、抵抗和屈从。

四、萌芽期台湾新文学的政治经济学

陈芳明在日据台湾社会性质的问题上所犯严重错误,自然影响了他对日据台湾二十年间新文学“分期”的“理论”。

陈芳明把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分成三个时期,即一九二一——一九三〇年的“启蒙实验期”;一九三一——一九三七年间的“联合阵线期”,和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间的“皇民文学期”。

“启蒙实验期”的特点,据陈芳明说,是国际思潮的冲击;反帝抗日的思想文化运动要求“使用文学形式来唤起民众”不把“文学视为自主的存在”,而把文学“当做政治的辅助工具”,因此在这“初期阶段,较为敬业的作家还未出现”,所以“在技巧与结构方面,都显得极其粗

糙”，“大多数的作品只是停留在实验阶段”。“从现在回顾起来，显然史料价值远胜艺术价值”，“无法胜任美学的考验”。

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小说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登场→现代都市的形成→印刷工业、报刊杂志产业的发展→政治的、思想的、文学的公共领域的形成这么一个总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十八世纪英国“拟古典主义”（pseudo-classicism）时期，正是在新兴资产阶级踞居的新兴城市、城市中兴旺的咖啡馆、报刊杂志形成的文学的公共领域中，诞生了散文文体和西欧第一代现实主义小说家狄福（D. Defoe，一六六〇—一七三一）、史威夫特（J. Swift，一六六七—一七四五）、艾迪生（J. Addison，一六七二—一七一九）和费尔丁（H. Fielding，一七〇七—一七五四），取拟古典时代主流的仿古典悲剧而代兴，发展出资产阶级自己的新文类。

与西方小说发展史相较，我国的现代小说的形成与发展，有本质不同、但过程雷同的历史。不同于西方小说诞生于西欧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并以商业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时代，我国现代小说则起于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百般侵袭、民族资本主义在艰困中有所发展的时代。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强迫开港，强迫贸易，使中国北方沿岸（以天津为中心）和南方沿岸（以上海为中心）发展了买办资本主义和一定的民族资本主义。中国的现代资产阶级有相对发展，他们集中在类如天津、上海的工商城市。中国资产阶级掌握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新印刷设备和“报纸”、“杂志”的媒介形式，在国难深重的中国半殖民地条件下，新兴报章杂志成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救亡派（如康、梁）甚至革命派形成政治、文化公共领域的基盘。而康、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派，又从一开始就把改良运动与小说的推广紧密联系起来，把小说当成推动改革，宣传革命和国民性改造的工具。当时，光是专刊小说的刊物，从一八九七年的《演义白话报》到一九一〇年代著名的《小说月报》，总数在二、三十种以上，培育了介于旧说部与新白话小说间、批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谴责小说”，产生了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刘鹗（《老残游记》）和吴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收获了由林

琴南、严复译的大量外国小说，为一九一八年鲁迅写《狂人日记》而宣告我国现代小说的诞生，准备了足够的条件。

但日据下台湾地方的情况就很不一样。鸦片战争后台湾也被迫开港，强迫贸易，洋行取代了传统行郊，外国银行资本全面控制了台湾的经济商品作物的生产与贸易过程，买办资产阶级兴起，但一般地人数少，力量弱，没有集居新兴工商城市的厚实的资产阶级。及沦为日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台湾地方资产阶级受到半殖民地中国所不能比拟、来自日帝的压迫。一九〇〇年日本三井财阀的“台湾制糖厂”设立。一九〇二年，日本以法律强权援助日本现代化糖业的独占经营，给种蔗地主和蔗农带来强大压迫。一九〇五——一九一八年间，主要是日资的现代制糖厂陡增，台湾本地资本主义萌芽的糖廊作坊迅速解体。一九一一年，日帝明令剥夺台湾资产阶级独自开设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权利，从而使台湾本地资本对日本独占资本从属化。台湾地方的现代资产阶级无法健全发育，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警察强权统治，台湾人要迟至一九二七年才能在岛内发行《台湾民报》一种。其后虽陆续刊行几种杂志，但大多屡刊屡禁。弱小而备受压迫的台湾资产阶级在一九三〇年以前，要形成政治、文化、文学的公共领域，从而发展小说艺术，自然是艰苦备尝的。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内地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殖民地台湾的现代小说，出于半殖民地以至殖民地的强大压迫，反帝、救亡自然成为两岸小说最强烈的主题，正如十八世纪的西方小说表现其重商主义资本向外拓展、新兴城市猬集来自农村的各色人等的历史时代中，对外扩张，异国新天地传奇、女工、流浪汉成为当时小说主题一样，表现了（半）殖民地与帝国主义不同社会、不同政治经济构造下不同的思想感情、意识形态和主题意识。这都和是否把“文学视为自主的存在”，是否特别要把文学“当做政治的辅助工具”，我们台湾作家是不是“敬业”，是毫不相干的。

而从台湾在殖民地困难条件下，没有时间和余裕像十九世纪末的大

陆那样，从文言小说、翻译小说、谴责小说……逐渐演化成熟，然则竟而能在赖和一代人，能突然直接用白话汉语，以比较成熟的技巧表现，取得现代小说的可喜成就者，没有别的原因，而是出于殖民地台湾作家知识分子因对于祖国中国的向慕，直接继承内地的文白语文斗争的成果，以中国白话文为表述工具，以中国白话文现代小说作品为写作与表现的范式 (paradigm)，当然有密切关系。因此，对这一时期作品在美学上的评价，应该考虑到台湾白话文学省去了中国现代小说几十年在语言、表现形式上的摸索，一步到位所取得的成绩，不能过低评价。何况，一九一八年鲁迅从《狂人日记》展开的一系列杰出的新小说的伟大成就，也必须看到那是奇迹般的独一无二的高音。和鲁迅同时代的新小说，相形之下，“在技巧与结构方面”，也不免于“显得极其粗糙”。陈芳明对萌芽期台湾新文学的酷评，表现了他对台湾新文学的社会经济脉络之无知。

五、台湾普罗文学运动与共产国际文运

在谈到“统一战线”时期的特点，陈芳明指出几点：“出现了文学组织”，“发行”了“文学杂志”，作家们“开始”“以团体的力量专注文学作品的经营”，结成“联合阵线”。这时“文学运动不仅脱离政治运动阴影，而且有取代政治斗争运动之势”；另外就是台湾“左翼文学”的“崛起”。这是一段混乱的分析。

一九三〇年前后，世界资本主义体制遭逢最强烈的经济萧条之袭击，从根本震动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为了挽救日本的资本主义，日本国家强力介入，实施对通货的国家干预，日本资本主义从独占资本主义阶段，进入了国家独占资本主义阶段，同时发动侵华战争，以战争统制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日本国家独占资本对殖民地台湾的掠夺，使台湾本地人资本进一步萎缩，广泛台湾工农阶级进一步贫困化。

世界经济全面萧条，突出地暴露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深刻的矛盾。以共产国际为首的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一时之际，

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面临最后崩解的“第三期”之论，甚嚣尘世。而文化与文学意识形态的革命，又一向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重要关注，因此到了革命乐观主义高涨的三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和文学运动，成为各国各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形式。三十年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在台共建党于一九二八年的历史背景下，自亦受到世界无产阶级文化/文学运动的深刻影响。

此外，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在日本和台湾的无产阶级运动遭到重挫。一九三一年，台共连同革命化的文协、农组、甚至民众党遭到全面破坏。这时，从各个战线上流落出来的党人和同情者，涌向了左翼文化/文学战线，利用薄弱的合法性，延续革命的实践。一九三二年，诗人王白渊在东京成立了一个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组织，旨在“藉文艺的形式，启蒙大众之革命性”。同年，他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领导下结成“东京台湾文化同好会”而不久瓦解的两个月后，又结成“台湾艺术研究会”，推展无产阶级的文化艺术运动。

一九三六年，台湾共产党人王万得等创办《伍人报》，与“纳普”（NAP，“全日本无产者文化联盟”）旗下的日本《战旗》、《法律战线》、《农民战线》保持密切的工作联系，并推动关于“台湾话文”、“台湾乡土文学”的重要论争，为当时无产阶级文化/文学运动中的语言和文艺策略，进行了深入的论议。

一九三〇年，赖和、谢雪红等人创办《台湾战线》，旨在“以普罗文艺谋求广泛劳苦民众的利益”，解放劳苦大众，从“少数资本家、贵族阶级”手中，把文艺夺回到无产者的手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普罗文艺”。

《伍人报》和《台湾战线》受到日帝当局百般压迫而停刊。一九三一年，在台湾进步日本人伙同台湾进步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台湾文化人结成“台湾文艺作家协会”，除了宣传无产阶级文学，也成为台共瓦解后台湾的民族与阶级运动的据点。一九三四年，“台湾文艺联盟”成立，宣言“提倡大众文学”。

因此，必须在三十年代日本资本主义在战争政策下向国家独占资本

主义转化，世界经济危机深化，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进一步挺进发展，台湾本地资本进一步萎缩，大众贫困化加剧等的历史背景下，才能正确理解与世界无产阶级文化/文学运动相结合的台湾无产阶级的文化/文艺刊物与结社的斗争，和无产阶级性质（或隐或现）的文艺、文化结社的深层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无来由地说这时期突然“出现了文学组织”、“发行文学杂志”，无来由地“开始”“以团体的力量专注文学作品的经营”、“结成统一战线”，是丝毫没有科学性的说明力的。至若竟谓此一时期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不仅脱离政治运动的阴影”，尤其荒腔走板了。无产阶级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是公开的命题。而且既说是此时的文学“有取代政治斗争运动之势”，则文学又如何“脱出政治运动的阴影”？

六、过高评价皇民文学

陈芳明把从一九三七年以迄一九四五年间长达八年的阶段，界定为“皇民运动时期”。

对于在日帝强权威逼下，殖民地台湾作家被迫为日帝战争政策画图解的条件下写的作品，应该怎样评价的问题，尤其在台独派文论家总是把皇民文学普遍化，从而直接、间接予以合理化甚至美化（谓台湾皇民文学有“现代化”和“爱台湾”的性质）的现时代，显得十分突出。

应该对战时日据台湾的文学作品，依个别的作家和作品，依其一时也要依其一生的创作历程，做个别的分析。在法西斯高压下不惮于利用任何可利用的机会、主题和活动，孜孜不倦地从事坚强不屈的斗争的杨逵，和在忧悒、后退、苦闷中苦苦挣扎的形式中透露深层的抵抗与彷徨的龙瑛宗，以及基本上以描写台湾传统家族风俗与葛藤，漠视皇民教条的压力，写作生产力旺盛的吕赫若，以及虽然也被迫参加大东亚文学会议，基本上没有写过严重危害民族利益的作品，而且事后表现了某种悔恨，而且从其一生的表现中尚不能贸然评价其附敌和出卖民族的张文环、杨云萍，甚至在皇民主义下表现出民族认同的犹疑苦闷，事后表示

了某种修正的王昶雄，都和至死不变其皇民反华思想的周金波，以惨绝的呼喊否定自己的民族，必欲把自己改造成高洁伟大的大和民族的陈火泉，有根本性的差别。把周金波、陈火泉和杨逵、吕赫若、龙瑛宗、张文环、杨云萍和王昶雄一锅煮，相提并论，是台独派关于皇民文学普遍主义的故技，对各别作家和日据末期台湾文学，是难堪的侮辱。

在思想、精神上完全皇民化，写过严重污毁自己民族，为敌人的侵略战争涂脂抹粉的作品的作家，严格说，只有周金波和陈火泉两个人。但从其作品数量之单薄稀少，作品思想之丑恶反动、作品在审美上的粗劣而论，台湾皇民文学到底能否成立，已大有疑问，依陈芳明的“史识”和“史观”，竟将日据最后八年，在台湾新文学划期中，堂堂割给了“皇民文学”，令人匪夷所思。

七、光复初期的台湾社会是半殖民地化， 不是“再殖民地”化

接下来，陈芳明把台湾光复的一九四五年，到蒋氏家族结束了统治，台湾人李登辉接任视事的一九八七年的前后四十二年间的台湾社会性质，竟而规定为“再殖民”阶段。

陈芳明的台独派逻辑是明白的：日据五十年是台湾“殖民地社会”阶段。一九四五年以后，“中国人外来政权”国民党集团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再”次沦为“殖民地社会”。这苦难的、“中国帝国主义”下的台湾，至台湾人李登辉继蒋家担任台湾总统为分界线，在没有任何台湾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条件下，使台湾从中国帝国主义下解放，结束了“再殖民”社会阶段！

陈芳明是怎样说明战后以迄一九八七年的台湾“再殖民社会”呢？他首先说，战后国民党以其带到台湾的“强势中原文化”，贬抑日据下台湾殖民地经验为“奴化教育”；其二，一九五〇年后国民党在台湾“强化既有的以中原取向为中心的民族思想教育”；其三，国民党以武装的警备总部为“思想检查的后盾”，为“配合反共国策”，国民党政府周密地建

立了戒严体制。最后，陈芳明下了这结论：“这种近乎军事控制的权力支配，较诸日本殖民体制毫不逊色”，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将这个阶段概称为‘再殖民时期’，可谓恰如其分”。

从一到二是文化、意识形态的概念，三至结论则是政治的概念。这怎么能是一九四五到一九八七年间台湾社会性质，即台湾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总和的描写？前文说过，“殖民地社会”不是一个社会形态，不能是一切社会发展必由的阶段。那么，所谓“‘再’殖民社会”论亦然。而且，按台独派把四百年台湾史一律看成迭次“外来政权”对台湾的殖民，则依陈芳明的高论，荷据台湾是“殖民社会”；明郑台湾才是“再殖民社会”；清朝台湾是“再·再殖民社会”；日据台湾是“再·再·再殖民社会”；一九四五—一九八七年的台湾，就是“再·再·再·再殖民社会”矣。世之谬说，曷甚乎此！

而且，人们无法理解，国府统治台湾时以“强势中原文化”“贬抑”日据下台湾经验为“奴化教育”，和台湾社会性质为“再殖民社会”有什么关系？说国民党把“以中原取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强加于人是“再殖民主义”，当然是建立在“四百年”来台湾已发展出出乎中华民族的一个新民族——而这种宣传，别说在当时，既至于今日，在社会科学上也大有争论的余地。至于说反共政策下军事法西斯体制，在战后美国影响圈内的“第三世界法西斯国家”、“国安压迫性政权”（The third world fascist state, National security-repressive regimes）中极为常见，但总不能说朴正熙、全斗焕的韩国是“（再）殖民社会”，六十年代迄八十年代非洲和中南美亲美反共军事政权对自己的同胞进行了（再）殖民统治吧。

陈芳明的“殖民社会”论，在他的《初期新文学观念的形成》中，对日据台湾“殖民体制的建立”，有一套错误与破绽百出的分析。陈芳明列举了“六三法”的压迫，“内地延长”论的欺罔，为日本资本服务的现代基础教育和山林田野的调查与收夺……来说明殖民地台湾社会的性质。事实上，台湾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表现在：一、殖民地现代基础工程之推动，达成了殖民地化必要的构造改革，为日本资本的渗透准备道

路；二、殖民地米糖单一种植经济的形成；三、日帝资本主义和台湾传统半封建地主·佃农经济的苟合，以及四、法西斯军国主义下的“军事工业化”。然而，尽管错误和破绽百出，在《初期新文学观念的形成》中，陈芳明还闭门独自炮制了几点他对“殖民社会”之性质的界定。然而当他论证战后以至一九八七年台湾“再”次“殖民”化时，却以另外的、与他的日据台湾殖民社会论完全无关的、更加莫名其妙的逻辑来充数。足见陈芳明的社会科学知识之荒废！

一九四五年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台湾的统治，到底是不是“外来政权”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这就得以“殖民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界说来看。

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持续不断的扩大再生产、对市场和工业原料持续不断的饥饿，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急需向外扩张，输出资本的结果。一个被殖民地化的社会，往往被迫依照殖民宗主国独占资本的扩张、循环与积累的目的、利益与需要，遭到强行改造，在对宗主国经济的庸属性分工构造中，殖民地自身原来的传统经济瓦解，重编到宗主国帝国主义经济圈，成为其再生产运动的一环。殖民地只能从事原料与粮食生产，按宗主国的需要，进行农业的单一性种植。宗主国资本在殖民地奴隶性农业庄园、矿山、高劳力密集轻工业中进行超额利润的剥削……

而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撤退来台的国民党国家，还停留在千疮百孔、贫困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主权并未完全独立，资本主义薄弱，半封建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一九四六年后又在内战中岌岌可危——这样的社会当然离开对外帝国主义扩张期的国家独占资本主义阶段十分遥远，又如何能向台湾进行“帝国主义”性质的“殖民统治”？国民政府将日产收归国有，是当时国民党在全国施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一部分，台湾传统的半封建主佃经济没有破坏，反而与国府半封建体制结合，没有“单一种植”，台湾也没有成为幼稚落后的资本主义内地原料供应地和倾销市场……此外，国民政府从日帝手中收回台湾，是依据抗战期间对日宣战，废除马关条约，和二战结束前夕“开罗宣言”

和“波次坦宣言”收回，派遣了代表旧中国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国府”的陈仪集团接收台湾，从而把台湾纳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应忘记的是，自日治以来，台湾的小农制地主佃农体制的半封建经济，在一九四五—一九五二年的台湾，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与保护。台湾不是什么被中国殖民的社会，而在政治、经济上都是一个被编入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收复的行省，和中国内地其他各省一样，受到旧中国统治集团即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陈芳明和一些台独派学者说台湾的光复，是中国“外来政权”对台湾的再次殖民地化之说，根本禁不住社会科学的质问。

陈芳明关于战后台湾社会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述论，不值一笑。然而一九四五年以后中国的台湾地方社会的形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课题。从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依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应该进一步做科学的分期。以比较科学的社会性质的分期为主要依据，分析和说明各阶段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组成部分的文学，才能有较高的科学性。

我们以为，台湾光复的一九四五年到韩战爆发，美国封断海峡、民族分断的一九五〇年间，是台湾地方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

日本战败撤出台湾，殖民体制一夕瓦解，台湾复归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台湾作为中国的地方社会，自然也带上帝国主义下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在一九五二年农地改革完成之前，台湾一仍存在着强固的、半封建的小农地主·佃农体制，和当时代表旧中国统治阶级的陈仪到陈诚集团互相温存，对农民进行半封建的榨取。于是台湾社会性质自日据“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变而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

战争结束前夕，台湾的资产阶级（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在战时统制经济下，进一步遭到国家独占资本主义化的日本资本的挤压而萎缩，台湾资产阶级全面无力化。及至光复，一方面是战争带来的残破，一方面

是陈仪当局接收了日据下专卖独占企业厂矿，形成国家资本主义的独占体，台湾资产阶级想在光复后靠日产兴业发达的希望落空。一九四六年，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四七年中后，形势逐渐逆转，台湾经济不能不受到一个旧政权全面倾覆的总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危机的冲击而混乱化，通胀严重，财政濒于崩溃。一九四九年，“国府”全面败北的征兆益明，撤退来台的国民党武装集团开始展开对台湾的高压政治。

正是在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面倒塌的过程中，台湾在一九四七年元月爆发了大规模反美学生运动，反对美军凌辱北大女生沈崇，喊出了“美国滚出中国去”、“中华儿女不可侮”的口号。二·二八事变，是当时全中国各地人民反内战、反独裁、要求和平建国，主张地方高度自治的民主斗争的一环。一九四六年以后，中共地下党在台快速发展，经过二月事变的洗炼和全国民主革命形势的鼓舞，大量台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奔向了当时全国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火线。

因此，从台湾作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部分所面对矛盾，才能理解与说明台湾作家朱点人、吕赫若、简国贤和蓝明谷都参加了中共在台地下党，为中国民主革命最终在五十年代的白色刑场上仆倒的历史，成为当代台湾文学的重要而突出的传统；也才能说明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间新生报《桥》副刊上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热烈争论，力言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主张写人民与生活的现实主义，介绍中国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理论和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充满热情地暗示台湾新文学的建设应以新中国的诞生为远景；也才能说明省外作家欧坦生（笔名丁树南）写出强烈抨击来台个别省外接收人员薄幸台湾少女，省外不良“国府”官僚欺压台湾农民的杰出小说《沉醉》与《鹅仔》；也才能说明杨逵在《桥》副刊上的文艺争论中，以及在四九年发表的《和平宣言》中，迭次疾言反对台湾独立论和台湾托管论；更才能理解杨逵和《桥》论争中的雷石榆、歌蕾、孙达人连同台大和师大进步学生在一九四九年“四·六”大逮捕事件中被投入白色的黑狱的历史意义。

八、“美援经济”下的资本主义改造

如前所论，一九四五年以后的台湾社会性质，四五年到五〇年是一个突出的阶段，而五〇年以后的社会，性质一变。

五〇年韩战爆发，东西冷战对峙形势达于高潮。美国以第七舰队武装封断祖国的海峡，在世界冷战与国共内战双重结构下，台湾与祖国大陆分断，逐渐发展出和中国民族经济体系相断绝的、独自の国民经济，其社会发展道路和相应的社会经济性质，遂与革命后的大陆社会殊途。

先说社会经济的变化。

从韩战爆发到台湾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九六六年，是一个阶段。

韩战爆发后，台湾立刻成为美国在东亚冷战战略上的重要据点。从一九五〇年开始，以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的形式，美国向台湾挹注了巨额资金，至一九六五年美援停止，平均每年的经援高达一亿美元。这些援助稳定和改善了台湾纷乱的财政，扩大和改善了电力、教育、交通和农村建设等基础工程，分担巨大的军费，减轻、从而改善了财政，巩固了国营企业。美援在这一阶段中，在台湾资本形成中占有鲜明、重要的比重，形成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五年突出的、依附性的美援经济体制。

美援经济深入地参与台湾的财政管理和经济发展计划，使台湾经济发展目标扈从于美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目标、逻辑与利益，丧失主体性，以致一九六五年美援的停止，不是标示台湾经济的自主化，而是对美经济依附结构的完成，迎接嗣后美国的直接投资和贷款形式的资本输入。

美援经济一面以巨资扶翼和巩固作为“国府”权力基础的公营企业，一面又对“国府”施加压力，发展民间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为了根绝共产主义在地主佃农体制下贫困化的农民中发展，配合一九五〇—五二年“国府”对台湾地下化“在农村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残酷镇压，

美国推动在台湾的农地改革，一方面使几百年来台湾封建的、半封建的地主佃农体制崩解，使地主和佃农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阶级消亡，更创造了由广泛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零细自耕农所构成的新农村，台湾社会经济中半封建的性质消失了。另一方面，台湾也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下，成功地将土地资本导引向工业资本，造就了战后第一代豪族系私人资本。这些资本，一面受美国援助的扶持而有买办资本的性质，又受“国府”的庇掖而有官僚资本的性质。

一九六〇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分工重编，美国为首的跨国资本和美国制定的外资投资条例，经美援经济铺好的大道，长驱直入，使台湾编入向美输出廉价轻工产品，自日输入设备、技术、半成品这样一个“三角贸易”结构下发展加工出口工业化，在国民党反共独裁下压抑工农利益，把资本积累最大化而取得由外资主导的高额快速的、依附性的经济成长。加工出口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中小资产阶级、市民和工人阶级。从五〇年开始，台湾经济实质上的资本主义化以空前的面貌快速展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有显著的发展。但这发展是假借外铄的美援经济而不是本地长期的积累；假借美国 and “国府” 权力所主导的政策，而不是本地资产阶级的发动，带有深刻的依附性和畸形性。而工业产值正式超过农业产值，则一直要等到一九六六年。

因此，在社会经济性质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一个传统封建体制消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显著发展，一方面经济上有依附性和畸形性，在一九六六年前农业产值高于工业产值而未臻全面工业化的“半资本主义”阶段。

再从包括政治在内的生产关系来看。

国民政府在我国的大革命中，于四九年底亡命台湾。完全丧失了权力的社会基础的国府流亡集团，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但韩战爆发，美国对华政策一变，给予“国府”庞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外交上强有力的支持。美国以强大的战后国际影响力，外交上抹杀新中国，强以“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使国民党流亡集团先取得国际外交的合法性，并根据这国际外交合法性，建立了对台统治的合法性。因此，来台以后

的“中华民国”，一开始，就是美国在东亚冷战战略下一个人工的、虚构的“国家”。

九、国民党“拟似波拿帕”政权和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

而在美国强大支持下，国民党在台湾建立了“拟似波拿帕国家”（pseudo-Bonapartist state），在台湾施行高度个人专政的压迫性政权。马克思以法国路易·波拿帕个人独裁王朝为例，说明“波拿帕国家”有这些特质：一、社会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皆弱小，或势均力敌，致缺少强而有力的资产阶级出而主导国政。二、此时就会产生个人专政而不是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以高度个人独裁的国家机关维持秩序，以利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机制。三、及至资本主义在独裁秩序下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成熟，高度个人专政的波拿帕国家就会还政于阶级专政，还政于资产阶级。四、因此，波拿帕国家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的、过渡性的国家。一九五〇年以后，以蒋介石一人的一元化独裁统治，超越了一切阶级、阶层、集团和党派，让一切势力在个人威权下伏服战栗。一九五〇年至五二年台湾全面、彻底、残暴的反共白色肃清，以暴力确立了蒋介石的波拿帕统治，推行极端反共的独裁高压政治。五十年代以后，冷战体制下美国支持的第三世界反共法西斯独裁政权，多数具有这种反共的、军事性的、扈从于美国的波拿帕国家性格。由于不同的历史，比起法国波拿帕王朝，多出了对霸权美国的扈从性，没有完整的主权，故称“拟似波拿帕主义”（pseudo-Bonapartism）。美国新殖民主义下的反共波拿帕政权，这才是五〇年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而不是什么“再殖民”政权！

在经济关系上，台湾在“美援经济”体制下的对美附庸性格，已见前述。在政治、外交上，台湾也是美国反共政治和外交上的附庸和工具。在军事上，台美协防条约使台湾成为美国国防在东亚的前线，成为美国远东反共战略的前哨基地，受到和基地相关的治外法权的制约。一

九七九年美台断交，台湾在美台关系中丧失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又在美国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中成为美国的属地。

这一对美国多方面从属化的情况，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也不例外。美援体制推动了台美间人员培训、交换，在高教领域上，进行美国化改造，美国教科书至今充斥台湾高教领域。奖学金、留学制度，训练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美国化精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遍布台湾政、商、军、情、文、教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在台文化机关如“美国新闻处”（今日的“美国文化中心”）对台湾文化、思想、甚至文学、艺术都起到深远影响。至于美国大众文化的渗透，尤其不在话下。台湾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上对美从属化，已经无以复加。

二次战前，世界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生活在各式各样的殖民制度下。战后，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帝国主义（如法、美）曾分别企图在越南半岛、马来半岛、香港等地继续殖民统治，但法国在奠边府一役败走，马来亚获得独立，香港仍在英帝统治下。为了继续继续帝国主义的利益，帝国主义者改变了策略，给予前殖民地以形式上、政治上的独立主权，同时利用过去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与殖民地精英资产阶级合作，巩固前殖民地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上对旧宗主国的扈从结构，称为“新殖民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中溃败，无力以新殖民关系重临台湾。然而在冷战体制下，美国取代日本在台湾取得了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和思想文化上的全面支配。于是因为冷战和民族对峙而与中国分离的、中国地方社会台湾，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美国的新殖民地。因此一九五〇年后的台湾社会，不是什么被“国府”集团“再殖民”的社会，而是美帝国主义下的新殖民社会。“国府”不过是美国对台新殖民支配的工具而已。

而一九五〇年后，台湾的新殖民地性，至今未变。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即半独立的（也是半封建的）国家。其中，自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中国地方社会的台湾，在全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中沦为殖民地。一九四五到四九年，台湾编入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一九五〇年到今日的“中华民国”，其实从来也不曾“主权独立”过，美国的新殖民地支配是它最突出的社会性质之一。

因此，总括而言，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六年，台湾的社会性质，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

十、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台湾文学

作为这一新殖民·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上层建筑的台湾文学，至少表现出四个突出的方面：

一、和蒋介石反共波拿帕政权的树立相应，由政权组织和推动，发展出为蒋介石“反共抗俄”冷战与内战国策服务的反共文学，受到国民党及其工具“中国作家写作协会”等的统辖而发展。

二、相应于蒋介石反共波拿帕统治的巩固过程，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萌发于台湾的，表现在同时期新生报《桥》副刊上的台湾新文学论争中的、中国三十年代左翼文论在台湾的发展，在白色恐怖中中途全面控断，致一九五〇年后左翼文论和左翼文学的实践在台湾遭到致命打击而中绝，一直要等到一九七〇年代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争中才复苏。

三、在反共文学发展的同时，作为美国在世界冷战中强力的意识形态武器的“现代主义”文论和创作，相应于台湾的对美新殖民地化过程，相应于美国在思想意识形态对台湾的支配，通过“美国新闻处”，在台湾取得了全面性发展。现代主义文艺，原是西方在独占资本主义时代的创作方式。但由于美国新殖民主义性质的文化支配，在“半资本主义”的台湾和其他美帝国主义影响下的第三世界中蔓延，对各当地的反帝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起到对峙抗衡作用。于是，美式现代主义在台湾取得了自五十年代迄一九七〇年代（现代诗论争迄乡土文学论争）近二十年的统治。现代主义文艺刊物和结社蓬勃丛出，也在这一

时期。

四、台湾的左翼的、批判的现实主义遭到反共镇压（杨逵、歌雷、雷石榆投狱，简国贤、朱点人、吕赫若、蓝明谷刑死）后，一种素朴的、没有强烈政治倾向和阶级意识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以钟理和为代表的台湾本地作家中成长，后来汇合在六十年代中后吴浊流主宰的《台湾文艺》杂志旗下。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战后第二代作家如黄春明、白先勇、陈映真和其他一代作家登台，描写了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下半台湾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农村和城镇的变貌，农民的分解，和国民党没落权贵的消萎。

陈芳明把一九四五年以后的台湾社会经济性质规定为“再殖民”社会之不通、之贻笑大方，不必再论。但他把“反共文学”当成四九年到六〇年近十年间台湾文学的主要文类，也是可笑的。被他划入六〇年到七〇年的“现代主义”时期也绝不准确。在一个意义上，反共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是双生儿。五十年代初，纪弦写反共的“战斗文学”《在飞扬的时代》后不久，就以《现代诗》诗刊宣传现代主义。七〇年展开的现代诗论战和七八年乡土文学论战中，现代主义和官方结盟，以扣政治帽子、写密告信的方式恶毒打击乡土文学，就是证明。而被陈芳明划为七十年代主要创作方式的“乡土文学”，其中重要作家如黄春明等和他们的重要作品都在六十年代中即已臻于成熟，写出其重要作品的大半，绝不待七十年代才出现。七〇年到七四年的现代诗论争和七八年的乡土文学论争，主要是文艺理论和思潮的左右斗争，是和四七年迄四九年内左翼文论的、迢隔了三十年的对话，下文将有深入的分析。陈芳明历史唯心主义的“社会性质”论，和他错乱的文学分期论，丝毫没有科学性。逻辑上不通，知识上错误，其实是必然的结果。

十一、新殖民地·依附性资本主义阶段的形成

从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九六六年到初步形成战后台湾经济的独

占资本主义化的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可以划出另一个阶段。

在这一时期，从社会经济上说，有四个特点：

一、在反共独裁体制和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重构造下，借着把“国家安全”无限上纲，在政治上排除民众的民主参与，在经济上剥夺劳动三权，压抑工会，形成对外资和内资可以恣意剥削的“投资环境”（investment climate），使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夺最大化，形成外资推动的、加工出口工业化的“独裁下的经济发展”。跨国企业蜂涌而来，经济快速成长，至一九七四年石油危机而略挫。

二、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在依附化、半边陞化构造中发展的过程，在社会结构上产生了许多现代的大资产阶级和大量中小资产阶级。当然，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也使更大量的工资无产阶级登上了社会舞台。另一方面，社会矛盾也在戒严体制下不断积蓄。外资的侵入、劳资的阶级性矛盾，劳动三权的摧残、生态环境的崩坏，新兴资产阶级参政议政的要求和戒严政治的矛盾、和农村的解体等社会矛盾，都以台湾社会史上空前的规模扩大。

三、到了八十年代，一方面是资本以其对利润无穷的嗜欲，追求个别企业的增大和数个企业的集团化合并，而形成财团，形成资本的独占化。另一方面，因工资自然上涨，国际竞争力受限，环境成本高涨等原因，形成投资犹豫和产业升级压力的增大。闲置的资本流向投机市场而形成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

四、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原初公营/私营资本的双重结构，至此而形成其矛盾统一的“政商资本”，发展为政商资产阶级及其肥大化。商人攀结官、政界而特权积累，官政将商人的贿赂投资而资本化。国民党波拿帕国家形式和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因七十年代中后严重化的“外交危机”而加剧。

再从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考察：

一、蒋介石反共波拿帕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至少两个方面来的严峻挑战：1，进入七十年代，“第一次冷战”缓和，联合国因第三世界会员国陡增产生了一定的构造变化，美国只手蔽天支持的“中华民国”的虚

构，发生破绽。七〇年后，包括美、日在内的重要国家纷纷与台断交，与大陆建交，台湾“主权”的外交合法性受到沉重挑战，连带其对台湾统治合法性亦遭严重波及。2，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展开，台湾本地大资产阶级在蒋政权荫庇下成长，另广泛中小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也蓬勃发展，自然形成接管政权、要求由个人专政还原于阶级专政，还政于本地资产阶级，终结台湾的波拿帕主义，把台湾的政权机关改造为资产阶级的政权机关的压力日增。

二、一九七九年美国与台断交而与大陆建交，使这双重压力加剧，“国府”不能不加强其强权镇压，终至爆发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美丽岛事件，国民党与台湾资产阶级市民运动决裂。美国一方面把台湾人权问题与《与台湾关系法》及对台军售的实施结合起来，公开介入台湾资产阶级对腐朽“国府”的挑战。八〇年初，“党外运动”在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海外台独运动在美国“人权”大伞下潜入岛内。台湾战后民主主义在反共、亲美的传统下，在反独裁斗争中延长为反中国、反民族运动。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台独思潮在岛内蔓延，逐渐在政权翼赞下成为主流的，官方的意识形态。

三、一九六六年大陆发动文革的风火。一九六〇年底到七十年代初，以美国为中心，西方学界、校园、文化界发动了新的、进步的思想文化运动，要求反对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重新评价中国、越南、古巴的革命，反对种族歧视，要求高校教育在制度上、课程上、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自由化。中美建交的过程，使新中国的形象在美国大众传播中成为新的焦点。在这个背景下，一九七〇年在北美爆发的保卫钓鱼台运动，迅速左右分裂。左翼向国家认同与民族统一运动飞跃，并且在北美的港台留学生中掀起了重新认识中国现当代史、认识中国革命、重新认识中国三十年代以降的文学，并且重新评价台湾现当代文学的热潮。这个与五十年代以来冷战与内战重叠的主流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新思潮，穿过严密的思想检查，流入了岛内，最终影响了七十年代两次文学论战。

十二、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五年间台湾文学的特质

依据一九六六年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上述政治经济学的特质，吾人可以规定此一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为“新殖民·依附性资本主义”阶段。而与之相应的台湾当代文学，在这些方面说明了这一阶段的文学思潮与创作实践的特质：

一、一方面受到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在阶级关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矛盾扩大化的影响，一方面又受到保钓左派对中国和台湾现代史再认识，以及对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及台湾现当代文学重新评价运动的影响，在一九七〇年初，开展了批判现代主义诗的“现代诗论战”，从而引发了一九七八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两次论战，概括地说，提出了文学是什么，文学写谁和写什么，文学为谁，以及探索现实社会的经济性质，从而以文艺表现其矛盾，克服其矛盾，具体提出了台湾经济是“殖民经济”之论，文学为人民大众，文学应该有（中华）民族风格，也就是提出了民众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口号，基本上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去抵抗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经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以鲜血镇压下去的、在台湾的左翼文学理论，至此在三十多年后的乡土文学论争中引发了噤声却坚定的回声。现代诗论争和乡土文学论争，是中国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理论与实践同国民党右派反动文论的斗争史在七十年代台湾的回应，而不是什么陈芳明所说官方/中国的文论与民间/台湾文论的斗争。乡土文学论争也不是什么“中国体制的动摇”而使作家“转而关心社会现实”，而是中国左翼文艺思潮的复活，从而从左翼文艺观点认识和批评“社会现实”。而且乡土派在力言台湾及其文学是中国及其文学的一部分上，七十年代的争论，实质上是四七年到四九年争论的延长与呼应。

二、进入八十年代，主张把台湾文学从中国文学分离出来，以“台湾意识”为检验台湾文学的标准，台独派文论，作为八十年代在台湾逐渐发展起来的台湾分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巨大的发展，逐渐成为

台湾文艺论述的霸权。但在创作实践上，台独文学似乎一直没有具体的成就。

三、随着外国资本深入的渗透，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而使社会矛盾显在化，在文学上，深刻表现了外来势力在企业中，在日常生活中，在卖淫观光工业中、在劳动运动中深刻的民族矛盾。从六十年代末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黄春明、王祯和和陈映真等人，远远在今日学舌而来的“后殖民”论尚未为学界所意识之前，已经凭着文艺作家的高度敏锐，对于依附化、新殖民地化台湾生活中洋奴买办、崇洋媚外等方面，以审美的手段，提出了严峻的批评，形象地回应了历史与生活所提出的问题，表现了生活，也批判了生活。

总之，陈芳明把一九四五—一九八七年这一段漫长、复杂的社会形态，简单地收拾为“后殖民”社会，表现了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的贫困与破产。

十三、“后殖民”社会阶段论的荒谬

和绝大多数台独理论家一样，陈芳明把国民党台湾人李登辉继蒋经国出任总统，取得政权，看成台湾人从“中国人”对台“殖民统治”中解放。中国对台湾“再殖民”因李登辉继任而获致解放，从而展开了“后殖民”这样一个历史和社会转变！陈芳明这种离奇的历史唯心论，突出了在三个问题上理论、社会科学知识上的严重无知与错误：

第一个问题是“后殖民”能不能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由的社会形态。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后殖民”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社会、经济概念，例如把二次战后新独立的、社会性质不尽相同的“独立后社会”（post-independent society），概称为“后殖民地社会”（post-colonial society）。另一个概念是文化概念，是今日现实上人们一知半解，经常挂在嘴上、笔上的后殖民论（post-colonialism），但两者概念上是风马牛毫不

相涉。

先说社会经济概念。二次大战结束后独立的社会，带有形形色色的前资本主义性质，如中国和台湾的半封建性；马来亚独立后很长时间内保存着地方封建贵族制；在非洲，许多独立后的社会仍然保有原始部落共同体的痕迹。这些国家，在冷战对峙的世界秩序下，以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方针路线发展自己的经济，要之，都采取光谱不同的、依据各民族具体情况而建立的某种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在政治外交上，这些国家结成了独立于西方和社会主义两阵营的“不结盟主义”，坚持走自己的路。

这些后殖民地社会中，也有一些社会因殖民主义统治结束，殖民地时代的阶级关系瓦解，一方面在社会、经济、政治上与旧宗主国维系着千丝万缕的依附性关系，有利旧宗主国资本之长驱直入，和本地资本结盟，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相对性的发展。这种边缘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受到第三世界激进发展社会学家的质疑。“依赖理论”的提出，就是这质疑与批判的典型。而二战后独立的若干社会，在东西冷战中彻底扈从美国冷战战略利益，实行反共·依附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者，也是这个意义上的“后殖民社会”的另一种形式。

用这一意义上的“后殖民社会”看，陈芳明的一九八七年后台湾社会性质是以台湾从中国殖民体制的蒋氏统治下解放为言的“后殖民”社会之论，实在不值一驳。如果从对美扈从来看，台湾社会的“后殖民”化，也该从一九五〇年而不是一九八七年始。问题的关键在于陈芳明根本缺少关于“后殖民地社会”的科学性的知识。

第二个问题是陈芳明所称台湾“再殖民”社会及其解放而晋于“后殖民”社会的过程，在政治经济上是断裂、扬弃还是连续、统一的问题。非殖民化当然是殖民体制的扬弃与否定。但八十年代中期到今日的台湾经济，现实上并不是与过去的断裂、批判与否定，而是与过去的连续和发展。这是事实俱在的历史。

一九八五年前后，台湾资本主义因资本积累与集聚的规律而财团化、独占化。一九八八年李登辉继任总统，标志着蒋氏波拿帕国家政权

的终结，把政权归还给它历经三十多年苦心呵护培育的台湾本地资产阶级。台湾大资产阶级在李氏政权下，向国民党中央、立法院、地方议会等政权核心蜂拥而至，取得了空前的、过大的代表权（over-representation），把台湾政权赤裸裸地、由上而下地改造成台湾资产阶级的政权。八十年代下半到九十年代，台湾资本主义在新的世界分工下，扮演了电子、资讯产业的、较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较密集的、高级加工出口工业化的角色，在更高的技术、半成品和市场上，一仍依附工业上的强权。前李登辉社会与后李登辉社会，在经济性质上、阶级构造上不但看不到所谓“后殖民”对于“殖民”的否定与扬弃，反而是旧时代、旧经济和旧阶级关系的连续与发展，陈芳明的“后殖民”社会论站不住脚。

第三个问题，要问李登辉政权是蒋氏政权的否定、扬弃，还是肯定与连续。

十七、八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市民革命，或流血、或不流血，瓦解封建贵族体制，清算了封建身份制度，使农奴得以“自由”地成为资本主义的契约性工资劳动。三十年代西班牙弗朗哥的反革命，在政治、社会、宗教各方面血腥颠覆了人民的民主体制。中国革命也在阶级上、土地制度上、经济社会体制上根本变革了旧中国的秩序。

但八十年代在韩国与台湾这两个反共独裁体制下取得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对过去朴正熙、全斗焕和卢泰愚以及蒋介石长期暴戾独裁的历史都没有经过革命、政变、民众蜂起的批判，社会经济体制和阶级关系皆原封不动地、由旧政权主导地、由上而下地“民主化”了。历史的曲折未加清算，社会经济上，在独裁体制下依附嗜血的反共独裁、恣意榨取工农阶级而肥大的大资产阶级，依然位居要津，荣华富贵，实际上统治着“民主化”、解严后的韩国和台湾社会。在政治上，反共、亲美（日）、拒统、死抱着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拥护美国在东亚驻军、拥护 TMD 及美日安保新指针……的思想意识形态，自蒋而李而陈的三代政权，莫不代代相继，一以贯之。总之，在阶级结构上，在战后资本主义的独占化过程上，以及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台湾在一九五〇年以降的历届政权都充分表现了作为美国战后新殖民主义支配下的“工具”

政权，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新中国、拒绝民族统一的本质丝毫不变，甚且“变本加厉”。陈芳明视一九八八年李氏政权为蒋氏国民党政权的扬弃，现实上达到了掩饰后蒋时代台湾政权在阶级上和政治上的反动本质的目的。

十四、一九八五年以后的台湾文学

在这样一个新殖民地·依附性的独占资本主义阶段（一九八五— ），台湾文学的三个方面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台湾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的扈从化，至八五年后达到了空前的高峰。美国学园转贩过来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论述”、“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通过留学回台教师、媒体炒作，在一知半解下成为某种“霸权性论述”。知识分子、文艺评论家，一旦离开了洋人提出的问题，就不会提自己的问题；一旦不用洋人的辞语，就不会用自己的语言谈问题，鹦鹉学舌，而犹沾沾自喜。原本反对文化殖民主义的后殖民论，到了台湾，竟恰恰成为美国对台学界文化殖民的工具。而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台湾文学才表现出深刻的“后殖民”性质——但与陈芳明所称，已南辕北辙了。这样的嘲讽，在陈芳明以“多元蓬勃”歌颂台湾的鹦鹉后现代主义，又与后殖民论混淆不清的说辞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在创作上，尽管鹦鹉后现代主义沸沸扬扬，但鹦鹉后现代作品却一直没有令人注目的作品。

其次，在八十年代末至今，有些年轻一代既不理睬台独文论，也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无缘，偶尔也看见后现代论的影响的痕迹，但才华洋溢，出品了重要作品的一代作家，十分值得期待与注目。

第三方面，台湾分离运动虽然在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八日达到了高潮，但台独派在文化、文学上的论述早有趋于疲滞沉寂之势。这固然是当年的台独理论家们先后纷纷转入政界，穿起笔挺的西装，出入庙堂之上，但其本身在知识、文化上的局限性，怕也是一个主要原因。陈芳明

重构台湾文学史的雄图，雄则雄矣，但他的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局限性使他无法匹其鸿图，就是一个例子。

八五年以后的台湾文学应该还有可以提起的不少问题点，无如距离太近，难做全面、客观的观察，就略而不论。但今年黄春明以明快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新小说集《放生》，竟创造了数万册的销行纪录。这应该是标志着鸚鵡文学的破产，当然也标志着黄春明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胜利吧。

十五、结论

台湾社会性质的推演，不是一个自来独立的社会之社会形态的推移，而是中国社会之一地方社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这是台湾社会史的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日据以降台湾社会形态的推移，由于一九五〇年白色屠杀之后历史唯物论的社会科学的不在，至今尚未有全面的、科学性的讨论。拙论初步主张台湾日据社会（一八九五—一九四五）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九四五年到五〇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组成部分；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六年，是“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五年左右，是“新殖民地·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而一九八五年到目前，是“新殖民地·依附性独占资本主义”的社会。

这一初步的整理，必然有待于更深入的讨论甚至争论才能取得结论——正如一切社会性质的讨论莫不经历长期、纵深的讨论。但无论如何，陈芳明的“殖民社会”→“再殖民社会”→“后殖民社会”论之荒诞不经，已不必多论。

陈芳明投出了一个不忍卒睹的坏球。但如果因此而能展开一场关于台湾社会性质、台湾社会史、台湾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有科学性、有品质的球赛——有品质的争论，则陈芳明的此一台湾新文学分期论——虽然以负面的形象——将被台湾社会形态的讨论史所长久记忆。

事实上，陈芳明并不只投了这一次坏球。在台湾共产党史、台共纲

领、台湾左翼运动史和台湾左翼文学问题上，出于陈芳明在知识上的严重破绽与局限性，屡犯大错。对于这些错误做科学性的批判、纠弹与讨论，对于发展台湾进步的社会科学与历史学，必有所助益。

台湾当面社会形态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台湾社会史问题，是我们当前的、久悬未决的，十分重要的理论课题。在这一课题上的深入研究与展开，不但有益于对台湾社会实情的客观理解，也有益于清理已经基本教义化的许多论说——例如台湾民族论、台湾社会独特论、台湾意识论、台湾主权独立论，更有益于科学地探索新时期的反帝·民众的民主主义变革运动，包括文学的变革运动的纲领。

而对于在一片狂喜中接掌了统治权的新政权，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科学性的分析，对新的统治阶级和政权机器要怎样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清醒的认识，无疑更是当前重大课题之一。

陈芳明把他的“史识”与“史观”，不无得意地标榜为“后殖民”史观。查文化思想概念上的后殖民论，一言以蔽之，是对于旧殖民地历史，以及旧殖民历史在“殖民后”社会中的文化的遗毒，以及战后新的文化殖民主义对前殖民地社会和文化的为害，加以反省、纠弹、批判的思想。陈芳明的“后殖民”“史观”，美化日本殖民统治，谓带来高度资本主义；通篇无一字涉及美帝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以冷战辞语说中国帝国主义对台湾的统治；把美国学园对台湾思想文化的支配说成自由化和多元化……把这样的洋奴“史观”说成“后殖民史观”，其实是对真正的后殖民主义的侮慢了，并且尖锐地表现出台独论的后殖民意义。

陈芳明在开宗明义中说：“任何一种历史解释，都不免带有史家的政治色彩。史家如何看待一个社会，从而如何评价一个社会中所产生的文学，都与其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旨哉斯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确是各有各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而我们关于台湾各阶段社会性质以及相应的文学的性质，也与陈芳明在“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上南辕北辙、针锋相对。然而，理论问题毕竟主要地要通过知识的对错、逻辑的真伪，以及具体实践的严格检验。“政治色彩”和“意识形

态”毕竟不能取代科学知识，否则就是一场知识上的灾难了。

试问：陈芳明赖以“建构”“台湾新文学史”的地基——台湾社会性质论，既是一片松软的沙渚，则他所要“建构”的“台湾新文学史”大厦，又如何能免于根本倾覆、土崩瓦解的灾难呢？

论“文学台独”*

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先声。政治和社会的反革命，也同样以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开路。

在美国最大的“台独”组织“台湾独立联盟”正式公开迁回台湾、公开变身进入“民主进步党”是一九八八年。民进党将台独纲领正式、公开纳入党纲，是一九九一年。但是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斗争，则早在七十年代中晚期就开始了。

“台独”运动假借台湾文学论诸问题、族群问题、台湾史论中的各种问题、“命运共同体”问题、民族定义问题与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千方百计，要得出这些结论：在与中国大陆长期隔离的现实下，台湾已经发展出在民族认同、文学特质、自我意识上和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宣称远在台湾达成政治独立之前，在文学、文化上早已独立。

在这样一个反民族逆流下，台独派以雄厚资源拥有好几家日报、一家全岛性的电视台、几家周刊新闻杂志。台独势力并且以乡土教育之名，减少中国历史、地理甚至语文课程，加强母语（实为汉语闽南系及客家系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的教学。政府以各种“基金”和预算，支持各种“乡土文史调研工作”和“社区重建”，其中就颇有人用来强化社区意识和地方意识。当然，一九九八年教育当局强行修改国民中学历史

* 本文刊于《文艺报》（北京）二〇〇一年十月九日。后收录于《乡土文学论战三十年——左翼传统的复归》（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台湾：人间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一月）。文字略有出入。

及社会科教科书，明目张胆地经由台湾正规教科书，宣传和台湾相针对的、台湾的“国家”史观和“公民”意识，引人侧目。也必须指出：一九八八年李登辉登台以后，不惜以国家政策推行纵容和包庇“台独”的各种措施。二〇〇〇年民进党政权登上台后，“台独”系文化人、文学家、教授和新闻言论人纷纷上台，占据学术和文化机关的要津。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台独”攻势益形严峻。

“文学台独”及其发展形势

如果把在大众传播、教育阵地、社区组织等领域中的“台独”运动称为“文化台独”，那么在台湾文学论坛中长期以来的“台独”论，就是“文学台独”了。

历史地看来，“文学台独”论和“文化台独”论的发展，形影相随。但“文化台独”最早在台湾出现的面貌，却以台湾文学论的形式提出。早在一九七七年，“文学台独”论的“宗师”人物叶石涛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虽然在戒严时期还有一些伪装，但却第一次提出了台湾文学的“台湾立场”和“台湾意识”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台湾在日据下的“现代化”历程中产生了“台湾意识”的主张（当然，这种提法都源于“左”派台独“理论家”史明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台湾四百年史》）。

一九八一年，评论家詹宏志发表《两种文学心灵：评两篇联合报小说得奖作品》，指出若将台湾放在全中国的视野考察，台湾文学如果没有深厚的作品，则只能沦为聊备一格的“相对于中国中心的‘边疆文学’”。詹宏志的文章立刻招来“台独”派蜂涌而至的反论。今日成为“文学台独”重要理论家的彭瑞金、高天生和李乔等人，纷纷为文强调台湾文学自有“独特的历史性格”，抨击詹宏志以中国为中心去观察台湾文学。这是台湾文学思潮中第一次强调了台湾文学的“本土性”、“自主性”和“去中国性”的论说。

一九八二年，叶石涛在杂志《文学界》中表示，台湾作家要反

映“台湾这块土地”的“真实形象”，“不要执著于过去的亡灵，以忘恩负义的心态来轻视”……台湾的“土地与人民”，并指责“那些站在空洞神话架构上来号令她的文学”是“毒素”，是“公害”。叶石涛说的是台湾作家要有“台湾意识”和“台湾立场”，放弃“空洞”、“神话”般的中华民族主义“亡灵”……而秉持中华民族立场的文学作品是“毒素”，是“公害”。

一九八三年，陈芳明在“台独”化后的《台湾文艺》上发表文章，热烈赞赏叶石涛在《文学界》上的上述文章中肯定了台湾文学的“本土性”和“自主性”，并预言“台湾民族文学”的“孕育”和“诞生”。同年，叶石涛发表《再论台湾文学的提升与净化》，林梵发表《从迷惘到自主》，都强调台湾文学的“自主性”，强调台湾久已与大陆分隔殊途，而台湾文学自日据以来一贯自己发展，从而产生了独自の“本土性”和“自主性”。

一九八五年，叶石涛为自己的书《台湾文学史纲》写序，强调自日据以来台湾文学在与中国大陆完全隔绝条件下，吸收了欧美和日本文学的“精华”，形成“鲜明的自主性格”，发展出“强烈的自主意识”。叶石涛还说，台湾文学家应以“台湾为中心”写作，要“站在台湾的立场”……

一九八七年以后，“文学台独论”有了新的发展。随着解严后对台独较为宽松的环境的形成，逐渐把“文学台独”运动与“政治台独”纠缠起来。一九八七年，在德国一场“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国际研讨会”后，在台湾引发了“台湾作家定位”的论争，在抗议国际场合中台湾作家（文学）被“定位”为中国作家（文学）之余，提出台湾作家定位应与台湾前途定位并同思考，主张台湾文学只反映“台湾经济生活共同体”，台湾文学中的中国是一种“虚构”与“虚伪”。有人疾呼，台湾文学早就先台湾政治取得了“独立”，台湾文学应与政治及社会的“台湾人解放运动”相结合。提出这些主张的人有李敏勇、向阳、羊子乔、刘天风和林宗源等。

到了一九八八年，“文学台独论”又进一步提出“台湾新民族文学”

的主张。林央敏和宋泽莱分别写文章提出了“台湾（新）民族文学”，以和中国文学“划清界限”，建立台湾优良的“新民族文化”，并最终为台湾“独立建国”服务。

到了九十年代，叶石涛和陈芳明等人迭次发表文章，其思想内容不外乎一再强调台湾文学的“独立自主性”，不隶属于中国文学。一九九九年开始，陈芳明发表了野心勃勃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企图依照“台独”史观和“文学台独论”全面炮制合于“台独”尺码的“台湾新文学史”。

台湾文学论领域中的统独斗争

如前所述，“文学台独论”的发展，其实是“文化台独论”、“台湾自主论”、“台湾主体论”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台独”阵营有自己的广阔的言论阵地（如早期党外周刊、月刊如《前进》、《深耕》、《台湾时代》、《八十年代》，报纸副刊如《台湾新闻》副刊、《自由时报》副刊，文学杂志如《文学界》、《台湾文艺》和《文学台湾》等等），相形之下，反对和批判“文学台独”的阵营只有《夏潮论坛》和后来的《文季》（不久停刊）及当前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势力悬殊，但是台湾文学问题上的统独斗争却一直不曾间断。

一九七七年，针对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陈映真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的盲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讨论。一九七九年，旅日台独派学者张良泽发表《苦闷的台湾文学，蕴含“三脚仔”心声的系谱》于日本，主张日据台湾塑造出既非日本人又非中国人的“三脚仔”台湾人。而台湾文学就是这“三脚仔”的“心声”。一九八一年，陈映真写《思想的荒芜——读〈苦闷的台湾文学〉敬质于张良泽先生》，加以批判。一九八四年，陈芳明发表《现阶段台湾本土化问题》后，吴德山（杜继平）则写《走出“台湾意识”的阴影：宋冬阳（陈芳明）台湾意识文学论的批判》，加以驳论。针对张良泽分别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三年发表的《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以西川满为例》和《西川满书

志》，陈映真在一九八四年发表了《西川满与台湾文学》，批评西川满“有台湾意识”和“热爱台湾”的谬论。统独双方对日据下台湾“皇民文学”的截然不同的评价，也表现在张良泽于一九九八年的文章《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力言在日据战时下的台湾，写“皇民文学”既普遍又不得已，后人不宜妄加评论，而应加以谅解。两个月后，陈映真写《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加以驳斥。又不久，彭歌写《醒悟吧！——回应陈映真“精神的荒废”》，三个月后，陈映真写《近亲憎恶与皇民主义——答复彭歌先生》，加以反论。

一九九八年，《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冬季号）组织了陈映真、曾健民和刘孝春、陈建忠等人的文章，编了“台湾皇民文学合理理论的批判”和“不许新的台湾总督府‘文奉会’复辟”的专辑（一九九八·《人间》丛刊冬季号），刊出曾健民《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刘孝春《试论“皇民文学”》及陈映真前述《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也特别针对同情台独的台湾文学专业的日本学者垂水千惠、中岛利郎的谬论，加以批驳。

还必须特别提到，一九九七年（七十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二十周年之际，统独两派各自组织了研讨会。陈映真和曾健民分别发表了《向内战与冷战意识形态挑战——七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争在台湾文学思潮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和《民众的和民族的：乡土文学论战的精神与七十年代思想精神的再确认》，前者从战后冷战与内战意识形态的颠覆来认识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从而批评“台独”派文论亟欲篡夺乡土文学论战的果实。另曾健民的《反乡土派的嫡传》则直接批判陈芳明的论文《历史的歧见与回归的歧路》。

一九九九年八月，陈芳明开始在《联合文学》连载他企图雄霸台湾文学史论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并刊出其绪论性的首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号称要根据日据期迄于今日的台湾“社会性质”来“建构”台湾新文学史，从而炮制了日据“殖民地社会”阶段（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再殖民社会”阶段（一九四五—一九八八）以

及“后殖民社会”阶段（一九八八迄于今日）。二〇〇〇年七月，陈映真在同杂志发表《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依据科学性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推移的理论，彻底论破了陈芳明自己杜撰的台湾“社会性质论”。从此，双方来回交锋了三回，至二〇〇〇年十二月，陈映真发表《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及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而争论中止。

可以看到，早自一九七七年叶石涛和陈映真关于“台湾乡土文学”争论开始，一直到二〇〇〇年陈芳明与陈映真关于台湾新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争论，在关于台湾新文学史论领域中诸问题的统独争论与斗争，一直都没有间断，而且交锋激烈。这显示了“台独”运动向来重视台湾文学领域中的思想、意识形态斗争，有其理论队伍，有其言论阵地，有权力的掩护，更有思想政治斗争的长久之计，绝不可小觑。

“文学台独”论的内容

概括起来说，“文学台独派”关于台湾新文学论中的具体问题的论说，有这几个方面：

一、台湾新文学的发轫是多元的，否认台湾新文学之发生与中国五四新文学之间的血脉关系，亟言在与中国社会隔绝条件下，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也吸收了欧西与日本文学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中国新文学的、自主的台湾新文学。

二、因此，台湾新文学在属性上，绝不是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新文学是在与中国新文学隔绝近一个世纪的条件，独自发展出有台湾主体性和自主性的文学。

三、三十年代台湾（第一次）乡土文学（=台湾话文）论争，说明台湾文学“自主性”和“主体性”意识的苏醒，是第一次台湾文学范畴中“并吞派”、“汉族沙文主义”一派（主张将白话文推广为大众语，从事宣传和文艺创作的语言的一派）和台湾“本土派”、“自主派”（主张先整理大众日常语、即闽南方言为宣传与创作语的一派）之间的斗争，否认白话文派与台湾话文派之争，其实是当时台湾左翼文学阵营内部关于

不同语文策略的争论。

四、主张关于日据下“皇民文学”作家及作品，不能用“汉沙文主义”的标尺来评价，要有从“台湾立场”出发的独自的评价。主张皇民文学是台湾人对日据带来的“现代化”的反映，认为皇民文学和当时在台日籍殖民作家有“台湾意识”、“热爱台湾”。

五、认为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一场有关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也是外省人“并吞派”、“汉沙文主义”（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和“本土派”（主张台湾文学有其独特性）之间的斗争，企图独占和歪曲史料，抹杀这次争论的团结、进步的深刻意义。

六、认为一九七〇年代（第二次）乡土文学论争，是台湾文学“主体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发露，否认和抹杀论战中反帝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大众文学等思想内容，企图窃掠和变造七十年代乡土文学论争的果实与历史。

七、在当前有关台湾新文学史分期的争论中，主张台湾现当代史中“社会性质”分期是所谓“殖民地社会”、“再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罔顾台湾社会史的科学性知识。

这些“理论”的学术与科学品质固然极为粗疏，不堪一击，但是长年以来，却也自成“体系”，由“台独”派教师在讲坛上不断宣传，带硕、博士研究生，逐年增加“文学台独”倾向的论文，增加“文学台独理论”队伍中的新兵，不能不说情况是颇为严重的。

因此，有关台湾文学论领域中统独斗争的形势，就“文学台独”论的批判而言，我们以为统派有这些问题与机会：

甲、问题方面

一、资源单薄，力量悬殊。独派占有高教领域，陈政权上台后，拥有更丰富有力的资源。统派势单力薄，理论队伍、言论阵地与独派相较，悬殊较大。

二、现政权积极在高教院校中扩张、广设台湾文学系所。在当前台湾文学教员绝大多数倾向“台独”的条件下，不能不使人担忧。

三、由于独派拥有雄厚文化和教育资源，有能力推动国际性台湾文学研究活动，扩大“文学台独论”在“国际”学界中的误导和影响。

乙、机会方面

一、“文学台独”论的学术知识品质一般而论颇为粗陋，容易被彻底论破。

二、可以团结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共同进行研究，共同进行对于“文学台独”论的科学、系统的廓清与批判，摆事实、讲道理，以理、以科学知识服人。

三、台湾新文学史的新的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有助于揭发“文学台独”论的各种破绽。最近我们整理、出版了有关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的原始资料，对同时期台湾文化思潮的史料也做了初步整理，并与研究界分享，希望将资料公开化、透明化，使“文学台独论”接受实证性资料的检验。

结 论

“台独”运动长期重视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处心积虑，有长久之计。最近，在政权的推动下，有急迫性地广设台湾文学系所，强化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分殊意识，把中国文学挤压为“外国文学”，并且以台湾文学系所为“文学台独”的基地。到目前，真理大学设立了台湾文学系，成功大学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正进一步筹设台湾文学系。中兴大学据说也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而清华大学也在积极筹设台湾文学研究所。凡此，都说明“台独”运动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斗争中高昂的企图心。

面对“文学台独”的攻势，个人以为，在台湾文学研究工作上，应该学习杨逵精神和范泉精神。杨逵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关于建设台湾文学论争中表现了这些精神：一、熟达地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二、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三、坚持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以及其与中国新文学之一般性的辩证统一；四、坚持省内省外作家和

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团结；五、重视文学运动的实践——文学组织与文学领域中的统一战线的展开；六、具有对政治的敏锐的认识力，明确、坚定地反对为“台湾独立”、“台湾托管”、为美国和日本外来势力服务的文学。

范泉是从从来没有来过台湾的大陆著名编辑、文艺评论家和散文家，对于上述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论争起到敲定主旋律的作用。即一、他主张“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的一环”；二、作为一个大陆的文学评论家，他对台湾、台湾人民和台湾文学抱着真挚、深情的关注，并且带着这样的关注去研究台湾文学；三、在主张将台湾新文学重建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的同时，又坚持台湾新文学发展的主体是台湾本土作家，强调只有台湾本土作家才足以建设有“台湾气派”、“代表台湾本身”、有“台湾作风与个性”的台湾新文学。这是把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与中国新文学的一般性的矛盾统一起来；四、在思想感情上和在具体实践上，和台湾作家、知识分子维持真诚、深刻的感情联系，建立了坚强的相互信赖和团结。

杨逵和范泉都是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两岸省内外文学家、评论家共同讨论重建台湾新文学时最有领导性、最突出、也最杰出的典范。今后，在面对批判“文学台独”以重建台湾新文学时，杨逵先生和范泉先生的风格与工作、思想作风，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启发。

宣传和批判“文学台独”的斗争的新回合，正在蓄势待发。海峡两岸捍卫台湾新文学的中国属性的作家和学者，势须建立清醒的认识，准备好面向新的斗争。

二〇〇一年六月二十日

警戒第二轮台湾“皇民文学”运动的图谋*

——读藤井省三《百年来的台湾文学》：批评的笔记

近十几年来，日本有一撮研究台湾文学的学者们，不遗余力地把台湾文学“从中国枷锁中解放”出来；宣传一种“既不是日本文学也不是中国文学”、表现了“台湾民族主义”的“台湾文学”，并且明目张胆地为台湾“皇民文学”涂脂抹粉，把当时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台湾“皇民文学”说成“爱台湾”，响慕“日本的现代性”的文学，而不是彰久明甚的汉奸文学。这些学者，经由留日独派学者的中介，从台湾政府机关拿钱开研讨会，出版论文集，扩大其影响。而他们之中比较有影响者，东京大学文学系教授藤井省三是其中之一。

一九九八年，藤井出版了《百年来的台湾文学》（东方书店，东京），书中充满了力图把台湾文学从中国文学分裂出去的斗胆的暴论。

日本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割占台湾五十年，并作为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发动长达十五年对中国和南洋的侵攻劫掠作为日本“现代化”的归结，在广泛的中国大陆、台湾、东南亚留下了日本至今坚不承认和承担其责任的惨痛的爪痕。至今，这血渍的创痕仍深刻，残留在朝鲜、中国旧“满洲”和台湾的文学中。而这一撮包括藤井在内的日本学者，不但没有对这一页暗黑的历史稍有反省，甚至还以旧日本帝国“文学奉公会”的野蛮和傲慢，恣意渲染反民族的台湾文学论于今日。对我而言，这是继四十年代初“决战文学”以来第二次“皇民文学”运动对台

* 本文刊于《两岸文论史的反思：告别革命文学？》（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台湾：人间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湾文学的威暴。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读藤井《百年来的台湾文学》，随手记了一些笔记，初步整理了批判的思考。

藤井台湾文学论的“历史”的“社会意识形态”条件

藤井在序文《什么是台湾文学》中，开宗明义就引用著名英国文学批评家泰·伊格尔顿的话指出，被指谓为“文学”的文本，和指谓其为“文学”的人之间，有一定的关系。“构成文学的价值判断，受历史变化的影响”，而“这价值判断又与社会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这社会意识形态并不单是指个人的好恶，而是指有利于某特定的社会集团对其他社会集团行使权力、维持权力宰制的诸多前提……”

接着，藤井傲慢地指出，日本对台殖民时，台湾人只能讲方言，没有言文一致的语文。后来因日语的普及才为台湾带来“现代国语”。而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后，另一个“外来政权”给台湾带来了在台民而言也是“言文不一致”的“国语”北京话！“但是，不论是以日语写的或北京话写的”文学作品，只要有“与台湾等身大”（Taiwan Size）的台湾“共同体意识”，或有“台湾民族主义的价值判断的关系”，“我认为就可以称为‘台湾文学’”。藤井强调，只要台湾某文学的文本中存在着与中国分离的（台湾）“共同体意识”或（台湾）“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就能“定位在台湾文学的范畴中”！

文学的“价值判断”确乎与“历史的变化”和作为权力宰制与被宰制的“社会意识形态”关系密切。但藤井却不提岛田谨二的台湾文学论与亚夫的台湾文学论不同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根源；不提西川满、矢野峰人主宰的《文艺台湾》之台湾文学概念与张文环主编的《台湾文学》以及稍早杨逵主导的《台湾新文学》之台湾文学的概念的不同历史和社会意识形态根源——日帝殖民地历史下支配与被支配民族与阶级的意识形态。藤井更不提一九四七年迄一九四九年间《新生报》“桥”副刊关于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论议中众多论客，尤其是杨逵对“台湾文学”所做的鲜

明界定，即“台湾文学”是增进民族理解和团结、力争台湾文学提高和发展为中国文学无愧的组织部分、深刻表现台湾人民及其生活、坚决反对为“台湾独立”、“台湾托管”等国际阴谋服务的“奴才的文学”的历史和社会意识形态根源——即国共内战形势根本改变，共军渡江在即，国际上暗图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历史，和自三十年代后，继抗日战争左翼文学运动和文学理论意识形态的根源……而藤井的台湾文学论，是日本对其作为“十五年战争”之结果的“现代”毫无反省，和战后日本对美国帝国主义亦步亦趋，支持东亚反共亲美（日）扈从政权，协同压迫亚洲人民，至今坚持参与美国 TMD、“安保条约新指针”和“周边有事立法”，力图毁弃和平宪法，重新武装日本，协助美帝进攻伊拉克，并长期以新中国为假想敌，坚不正视十五年战争对中国人民的加害，长期助长台湾分离运动……的历史下，作为石原慎太郎、小森善纪、李登辉和金美龄之“学术界”代言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物。

殖民地台湾的日语：是母语的收夺还是 现代“国语”的赐与？

藤井说，十九世纪末日本占有台湾时，台湾人民讲的是互不相通的闽、客语和原住民各部族语，即依不同的“地域”（指闽客）和血缘（指原住民）使用其“方言”。而“为台湾带来现代的国语制度者，是在一八九五年以后五十年来作为宗主国的日本。台湾岛民通过全岛规模的语言同化而日本人化。而与此同时，全岛共通的（日本）‘国语’便形成超越（闽客）诸方言和（原住民）血缘和地缘所构成的各种小型共同体意识的”“与台湾等身大”的“共同体意识”。“可以说，这是台湾民族主义的萌芽”！

众所周知，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语（另作“国语” national language 或“普通话” common language）是现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的产物，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大、现代工商城市的兴起、现代市民资产阶级的登场、封建宗法体制解体、封建地方壁垒的撤废而统一市场

的形成，和为维护资本主义又积累和再生产体系所必要的现代资产阶级又集中又统一的国家机关的形成有关。因此，十九世纪末叶，不要说日帝占据的台湾——连带地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都还没有现代意义的“国语”，藤井也说明治初期前（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十八世纪以至十九世纪前半的欧洲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语或共同语。而且由于日帝占有台湾，造成台湾与祖国的分断，不能充分、完全地共有一九一〇年代伴随中国反帝民族·民主运动而迅速开展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救亡和启蒙运动，从而也不能完全共有中国现代共同语，即汉语白话文的建设和普及化运动。日本在台湾以强权将异族语的日语强加于台湾，压抑台湾母语，藤井把这视为“为台湾带来现代国家的国语制度”，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殖民者为同化被殖民者，以强权收夺和破坏被殖民民族的母语——即作为汉语七大方言中闽语和粤语下位的“方言片”之闽南语和客家语，而两者都是自秦汉以降陆续南来的中国上古及中古汉语，其中的“唐音”，还至今残留在日语文中。

然而在实际上也存在着藤井所抹杀的事实。客家话、闽南话和北京话共同语之间，固然难于在听闻上相通，但三者的语言距离绝不像藤井说的“有如英、德、法语的差距”，理由是在多方言的中国有历史悠久、语文文化巩固的共通的书写文字。而中国“殊方异语”固多，但思维和表达方式——即语文构造形式与法则、主要辞语等率皆相同，是以四五年来台的国语推行官僚采取的是维护而不是消灭方言，恢复台语（闽南话和客家话）作为中国方言的地位，恢复内在于台湾方言的汉语思维和表达方式，并以此为基础，推展汉语白话的共同语，而要消除的倒是日语——即异族语日本话的思维和表达习惯。

因此，听觉上的中国“殊方异语”的使用者，可以很快、很好地学习使用汉语白话。讲绍兴方言的鲁迅能写出绝伦的白话文共同语小说杰作，理由在此。从一九二〇年代到中国白话文遭日本当局禁绝于一九三七年之前，台湾知识分子曾广泛使用白话文从事评论和文学创作的历史，藤井不应不知。这时期台湾人知识分子已经能用白话文进行深刻的理论论说，如陈逢源和许乃昌之间在一九二〇年代中期进行的关于中国

社会经济性质，从而中国改造（革命）性质，即著名的“中国改造论”的冗长深刻的论争。而日据下台湾文学创作活动的语言，也以白话文为主。以《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和各民间文学期刊中大量的白话小说等文学作品，说明了讲客语、闽南语的台湾知识分子，通过白话文在现代报章杂志上发表、交换和传播其思想，形成了俨然的、介于个人家庭等私领域和国家机关公领域之间，臧否殖民地时政的文学和政治的、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与文学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台湾人的“印刷资本主义”。而其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想象”，恰恰是反日、抗日、以复归祖国为愿念的汉族共同体和汉民族主义意识，而不是什么“台湾民族主义”和“台湾意识”。这只要看一九三〇年代中后出版的《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中卷“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序中的一段话就明白了：

“……关于本岛人的民族意识问题，关键在于其属于汉民族系统。汉民族向来以五千年的传统民族文化为荣，民族意识牢不可拔……虽已改隶四十年，至今风俗、习惯、语言、信仰各方面仍袭旧貌”。台人故乡福建、广东二省与台湾相距很近，相互交通频仍，“本岛人又视之为父祖莹坟所在……其以支那为祖国的感情难以拂拭，乃是不争的事实。”而“改隶”之后，日本人虽对台民“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使其沐浴于浩大皇恩”，但台湾人仍然“频频发出不满之声，以致引起许多不祥事件”。而殖民地台湾抗日“社会运动勃兴之原因……除归咎其固陋之民族意识外，别无原因……”

完成于一九三五五年左右的《沿革志》透露了日帝据台四十年绝不曾借日语的“国语”化而全面“同化”了台湾人，使台湾人“以日语超越汉方言”，形成所谓“台湾民族主义”，而汉族民族主义却牢不可破。当然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和一切殖民地世界史中其他殖民地一样，培植了一批讲着破碎的宗祖国语，奴颜媚骨，充当下层殖民地警察、公务员、买办、差役之流的人。但他们一方面从不会被殖民者“一视同仁”而仍遭鄙视、歧视如奴仆，另一方面则受到本地同胞的憎恶和嘲笑。台湾日据期重要作家赖和在他著名杂文《无聊的回忆》一文中深刻而又生动地

谈到了日本在台推行殖民地“新式教育”所包含的民族与阶级歧见，指出“新式教育”在殖民地台湾培养出来的买办精英知识分子既离脱了本民族同胞，受同胞讥消，又无法真正跻身于统治民族中，从而呼吁殖民地知识分子回到本民族的群众中，批判“新式教育”的书本启蒙，而强调在形式知识之上的“人的认识”的启蒙。

但是藤井在他许多有关台湾新文学的论议中，总是一再夸大日据台湾的“日语国语体制”的形成。他说一九三三年台湾人“理解日语者”占人口中的二成五，及推行皇民化运动的强权日语同化政策后，“理解日语者”提高到人口的六、七成，使“日语读书市场扩大到三二〇万人”，从而形成了哈伯马斯所谓的日语的“公共领域”之登场。而“台湾总督府为了皇民化宣传而促成皇民文学出场”！

仅仅五十年的殖民统治，要摧毁和消灭历史、文化底蕴无比厚实的汉语系统，绝不像从十六世纪开始就陆续被殖民地化的其他亚、非、拉民族母语之强权消亡那样容易。终台湾沦日五十年，众所周知，除了在公领域或公学校围墙内之外，是一片汉方言闽南语和客家语的汪洋大海。近年完全露出亲日、反民族本色的叶石涛就曾说，受过日本教育、中小地主阶级的他，在家庭私领域中绝口不使用日语。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汉语被日帝强权禁绝，四十年代初因应“皇民化”运动急就章式的“国语讲习所”之遍设，在统计学上固然提高了藤井津津乐道的台湾人“理解国语”者的比率，但藤井心知肚明，这些“理解国语”者，除了极少数受到较高殖民地教育的精英外，其日语程度低下，助词使用错误，根本无法读、听和写知性的日本语文。曾有某研究台湾文学的日本学者私下告诉我，纯就语学而论，日据下著名、优秀、被他称颂的台湾日语作家，其日语也很少有人臻于完美圆融的水平，“但却无损于作为一个杰出的殖民地的抵抗作家”。藤井应该有来台访问的机会。当他含笑倾听着围绕在他身边的皇民遗老热情怀念日本治台的“德政”，狂妄诋毁“支那”，肆言“台湾民族主义”时，那些破碎、助词用错、发音有浓重闽、客土白基调的日语，估计藤井感受到的不是这种低水平的“日语理解”能否形成所谓日帝下台湾人的“公共领域”，而毋宁是殖

民者精英倾听被殖民者用拙劣破碎的殖民者语言——“日语=国语”时一种难以抑制的优越意识吧。

藤井把台湾现代文学史中白话汉语文学和日帝强加的日语文学等量齐观，把当下台湾语文中的中国普通话相提并论，视为台湾的两种“国语”，是不知日本对台殖民历史之罪恶之可耻的暴论。皇民化时代的日语人口（严格意义下的“理解日语者”）原就极少，今日的皇民遗老如李登辉世代即将因生命的自然法则而消失，另一方面，中国普通话、白话文早已成为今日台湾的报刊、文学创作、政论、文论的语文——即使倡言“台湾独立”的文学者、言论人都不能不用汉语白话才能充分表达其反民族文论。有人在闽南、客家方言的表音、表记和文法尚无法统一，现实上还没有以闽、客土白写出杰出文学作品、理论评论文章的当下，粗暴性地基础教育阶级以政权意识形态强行“乡土方言教育”，正在严重破坏和降低几代幼小者的语文能力，问题十分严峻。而外国人，前殖民统治者的藤井，还在为台湾的“第三个国语”（以闽客方言为台湾独自の“民族语”）出谋献策，苦恼不已。藤井的傲慢和对日本奴役台湾的历史之不知反省，令人不齿！

藤井的“二·二八事变论”之真髓

前文提及，藤井的《百年来的台湾文学》，开宗明义，就引用洋人伊格尔顿、侖克和安德尔逊的断章，规定表现所谓“台湾民族主义”、“台湾人共同体意识”的文学为独立于日本和中国的“台湾文学”，为台湾的反民族台湾文学论敲锣打鼓。

日本一些企图在今日台湾鼓吹新皇民文学的右派学界，和台湾在地反民族台湾文学论者一样，津津乐道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变造成省内外人民间的民族反目，而发展至一九七〇年代末第三次乡土文学论争之后，逐渐“芽生”了独立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概念，而且终至成立了俨然“自主”的“台湾文学”。

先说藤井的“二·二八”事变论。他说，光复后，二月事变的前

夕，百分之九十五的台湾人“因为五十年间日本殖民下的历史经验，不能不对大陆（来台统治集团）感到扞格不适（日人所谓“违和”感）。而在社会上，一九四七年的台湾教育程度、“国语”（=日语）普及率高于大陆，且“大陆是前现代色彩浓厚的农业社会，台湾是工业生产过半的工业化社会”。两岸社会、文化的不调和，加上来台统治的国民党集团的暴政和失政，引爆了二·二八全岛性反国民党暴动。

藤井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台湾大作翻案、美化文章，无非在说日帝统治为台湾带来现代化=现代法律、廉能政治、一视同仁、工业化……而“百分之九十五”的台湾人早已有以日语为国语的现代共同语，久沐日帝下“现代化”社会的熏陶，对于“前现代色彩浓厚”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不适应、心生反感……而终至于爆发了岛民的反中国暴动。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论及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时，科学地、唯物辩证地指出了殖民主义的“双重作用”——即其“文明化作用”和“建设作用”（或作“再生”[regeneration]作用）。为了改造殖民地台湾为日帝独占资本再生产机序的一部分和其工具，从结果上日帝非蓄意地为台湾带来了一部分“现代性”。但台湾人民如果不等到日帝统治被日本无产者或台湾民众推翻之前，就无法将殖民者在殖民地的“建设性”施为批判地据为己有，为我所用。而在具体历史现实上，日帝统治只能使台湾停留在“前现代”的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以为熟知百年台湾文学的藤井，应该十分清楚，日据下台湾文学中的台湾生活，在赖和、杨逵、杨云萍和陈虚谷、吕赫若等，除少数皇民化汉奸作家外的所有台湾人作家中，无不揭发殖民地台湾在物资和心灵上的被害，以企求自我解放与发展的“现代性”批判日帝凶残压迫性的“现代性”。而三十年代中后的战争工业化中，工业生产部门的价值内包着庞大的农业加工——制糖产业的产值而有虚构。一九四五年后，因为日本战败和战争的严重破坏，台湾的工业在一九四七年基本上呈瘫痪停顿状态，这只要看当时由大陆移入日常生活轻工产品，向大陆移出农业、食品产品的台湾经济，就知道藤井有关光复前后台湾经济的认识水平了。

因此，“二·二八”蜂起的原因，不是什么日本制的“现代化”台湾和“前现代”的农业的中国社会的矛盾，而是战后全中国人民呼唤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反独裁新民主主义国民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藤井应该也知道下列的编年：

一九四五年的八·一五日本战败。十月十日国共颁布“双十协定”同意力争和平建国、民主化、高度地方自治、在野民主党派与执政党平等、合法。十二月一日，国民党镇压反内战学生运动。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引爆全国各地反内战反独裁示威。七月，反内战民主诗人闻一多、记者李公朴分别遭到国民党暗杀。十二月二十五日，驻北京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引发全国性反美反蒋示威。一九四七年元月九日，沈案反美示威蔓延到台湾，两方高教学生参加。二月二十八日，发生二月惨变。五月二十日，“国府”大举在南京、苏州、上海等十六所大学镇压和逮捕反内战、要求民主改革的学生近两百，史称“五·二〇”事变……

以这极概略的编年为框架看“二·二八”事变，其实不是藤井之辈的偏见中所谓“外来政权”对台湾威暴的台湾的反拨事件，而是台湾人民与大陆反独裁、和平、民主、自治的全国民运动的共感与汇合。近两年来新资料的发现和新研究的进展，越来越明晰地显示了两岸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间进步的民主人士、群体和民众间活泼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的互动，超过了岛内和外国支持台独派者的想象。

而其中最突出的实例，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的长达年许的，在《新生报·桥》副刊上的有关重建台湾文学的论议。一九四七年，继“二·二八”事件的三月初血的镇压后的五月，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五·二〇”镇压民主学生事件。六月，武汉大学五十个民主师生被捕。十一月，欧阳明发表在《桥》副刊上的《台湾新文学的建设》，拉开了在台湾集体议论重建殖民地后的台湾新文学为中国新文学之组成部分的漫长论议。但在实际上早在一九四六年元月，上海著名编辑和散文家范泉，就发表了第一篇省外文论家的《论台新文学》于上海《新文学》，在台湾文坛上引起广泛的波纹。数日后，台湾作家赖明弘发表《重

建祖国之日》加以回应。资料显示，早在四六年，台湾的报纸副刊就有不少省外进步作家和评论家热心讨论光复后台湾新文学的建设之道，并介绍三十年代大陆左翼文学和抗日文学发展出来的进步文论，供作参考。而通过战后初期大陆期刊报纸在台湾的流通、发行（公开或秘密的）；透过光复初期岛内报刊的丛出，形成了两岸间面向全国形势和岛内情势的“公共领域”。从新发现的资料看，即使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大屠杀后，不但没有与中国割席分离的“台湾人共同体意识”，正相反，省内外进步的言论人莫不呼唤在“二·二八”创痕后力争在台省内外同胞的民族团结。很多台湾知识分子（林萍心、籟亮、吴阿文、杨逵等）力说台湾人要自觉地脱殖民化，克服日帝下心灵被“日本人化”、“奴隶化”从而力求“良性的中国化”；林曙光和杨逵等人力言台湾、台湾文学是中国、中国文学不可分的一环；台湾文学精神是中国五四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精神的赓续，颇有几个外省评论家（萧荻、姚筠、雷石榆、孙达人、陈大禹等）力言战后台湾新文学建设的主体应是台湾籍作家，台湾新文学有绝不亚于大陆新文学的先进性；只有台湾作家才能写出有台湾特色、台湾气派、台湾风格的文学作品；更有不少台湾作家和评论家（杨逵、林曙光、籟亮甚至叶石涛等）在当时都自觉反思到日帝统治下发展的台湾文学之不足和局限性，和中国新文学的成就相较，有较大落差，共勉互勉要学习、进步和发展，力争赶上祖国新文学的成就。

藤井不应该不知道台湾战后这一段重要的文学思潮。如果明知台湾战后文学公共领域存在和发展过这一中国指向的言说，而仍意图以台湾派刻板的“二·二八”论为前提，经由“第二代国语”（=北京话共同语=以日语自居台湾的“第一代国语”）论，炮制“台湾文学”=“具有台湾人共同体意识”和“台湾民族主义”的文学的“理论”，则藤井的本心，无非在挑拨台湾岛内省内外同胞的民族反目，为日帝对台殖民统治造成的民族分断及其所造成的少部皇民化台湾人的“祖国丧失”症免罪、美化与合理化，并进一步助长当前亲日、反华、反民族的台独文学论体系，从而发展台湾的第二次皇民文学！

“台湾文学”和“奴才文学”的分际

正如泰瑞·伊格尔顿指出，人们对某文学的“价值判断”，受到历史和意识形态——即支配/被支配的社会权力关系的影响。则今日藤井和中岛利郎、重水千惠们对“台湾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因此和上世纪二十年代以降至三十年代在殖民地台湾一寸寸建设起来的“台湾文学”概念，即台湾人文艺团体“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及其机关刊物《台湾文学》、文艺团体“台湾艺术研究会”（东京）及其有关刊物《台湾》(Formosa)、文艺团体“台湾文艺联盟”及其机关刊物《台湾文艺》、张文环主宰的《台湾文学》和杨逵主编的《台湾新文学》中表达的“台湾文学”、“台湾文艺”概念上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西川满、滨田隼雄等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皇民文学的吹鼓手的“台湾文艺家协会”及其御用刊物《文艺台湾》，表现了当时的旧皇民化历史时代日本殖民统治意识形态，那么今日藤井们的“台湾文学论”，是当前一贯拒绝反省和承担日本十五年侵华战争和五十年对台殖民蹂躏，坚持紧跟着帝国主义在东亚以新中国为假想敌的新冷战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产物。

而藤井们所夸饰的殖民地台湾的“教育普及”、“现代国语 = 日语普及”、广大的“理解日语”台湾人的现代公共领域之形成……经不住日据下台湾文学主题的批判。归结而言，日帝下台湾文学作品的母题——意识形态，是日本警察（日本殖民统治的总象征）的贪欲、腐化和残暴；是殖民统治者和台湾半封建地主豪绅阶级结合，鱼肉人民；是殖民地多重压迫下台湾女性的厄运和悲鸣；是殖民地台湾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反抗；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农村的破产和生活的贫困化……一九四五年日本在台殖民体制崩解，而即使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事变的恐怖之后，在台湾·台湾文学的历史属性和民族认同上，表现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四月间的“重建台湾新文学”的长时间论议中，在台湾的省内外作家无不众口一辞地强调“台湾·台湾文学是中国·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连今日向反民族·分离主义转的叶石涛都不能不承认在“二·二

八”事变前后，台湾知识分子都没有民族分离意识的事实，则藤井们常说殖民地“现代化”、日本化的台湾和半封建国民党恶政相遇合产生的民族“违和”感产生了“台湾民族主义”之论，只是他自己主观的新的“皇奉会”意识形态罢了。

然而，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关于如何将日帝劫后的台湾新文学重建为中国新文学无愧的一项的论议中，杨逵先生在《台湾文学问答》的重要发言里，特别在“二·二八”事变后一年四个月（一九四八年六月）的台湾历史状况下，对“台湾文学”提出了重要的界说，表现了他对当时“台湾文学”概念的“价值判断”与“社会意识形态”。

问题的提起，是针对当时台大教授钱歌川说，在“语文统一、思想感情又复相通”的国内，“谈建设台湾新文学（或）某省新文学，实难树立其目标”，“论题略有语病”而来。

杨逵针对钱歌川所说，在一般论上，同为中国文学，无必要再依各省份特称某省文学，表示同意。但杨逵指出，在一九四八年当时，却存在特别提出“台湾文学”之必要的“目标”（目的）。因为一，除了沦为日帝殖民地五十年，台湾自明清以来因地缘、政治的原因，长期与大陆产生半分断状态，以致产生“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生活和环境”的改变，从而一定程度上也产生“思想感情上”的变异。二、特别是光复后“二·二八”惨变，使“内外省”人间产生隔阂，“很可悲叹”。三、而稍有见识的人，都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台湾不能脱离中国”，所以都在努力弥合内外省之间的鸿沟（“澎湖沟”）。四、但弥合民族间的隔阂的良机（光复当初台湾人民的热情）已经失去，省内外的隔阂因国民党治台当局的恶政而不断在扩大。

为今之计，杨逵认为，凡欲致力于岛内民族团结的人们都要抛开本本上和肤浅的台湾认识；要“深刻的了解台湾的历史”、了解“台湾人的生活、习惯、感情而与台湾民众站在一起”。而欲达到此目的的途径之一，就是要提倡、建设（经深入台湾人民和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的苦乐、以他们为写作对象，写他们的命运和愿望及苦恼的）“台湾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杨逵在认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基础

上，特别主张上述意义上的“台湾文学”建设之必要。杨逵并且具体举出当时旅台省外作家欧坦生（丁树南）发表在上海由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上的小说《沉醉》为他心目中“台湾文学”典范性作品。（《沉醉》见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鹅仔：欧坦生小说集》，二〇〇〇年）

因此，杨逵对“台湾文学”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是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战争奔向胜利，新民主主义变革运动快速展开，中国人民和平、团结与进步势头大有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克服国民党恶政造成的民族反感，增进进步人民的坚强团结，共创新中国的“意识形态”。而况杨逵又进一步严厉指斥如果有人要搞为“台湾的托管派或是日本派、美国派”服务而“独树一帜”的文学，那是“奴才文学”，不得人心、“不得生存”！

早在二十五年前，杨逵先生就以无比敏锐的政治眼光，洞烛三十五年后今日在台湾大搞“托管派”（台独派）、日本派、美国派文学的岛内与外国团伙的阴谋。对于日帝把台湾殖民化的加害——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〇年对台湾反抗日军占领的农民武装的大屠杀，在一八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六三法”和“三一法”独断下制定的“匪徒刑罚令”的总督府独裁高压恐怖政治；蔓延全岛的警、宪之军专政体制，对台湾本地资本的强权压抑，从而将殖民地台湾经济对日帝独占资本主义从属化；教育的民族与阶级歧视；糖业帝国主义对农村、农民的残酷收夺；民族母语的剥夺和日语、日帝意识形态的强加；对台湾人民的制度性民族歧视，对被殖民人民的心灵和人格的创伤；在皇民化的法西斯洗脑下驱策台湾汉族和原住民族青年以“志愿军”、“高砂义勇队”执行战争犯罪，大批送死……的罪恶历史，藤井一派的学者视若无睹，不但没有半点历史责任的反省和自我批判，还喋喋不休地大谈日语为日帝下带来了统一的现代“国语”政策，大谈通过强权日语形成了现代的广阔“读书人口”。他把皇民化运动时期总督府情报（宣传）机关的战争宣传体制也算进去，夸大战争末期台湾在“理解日语”的台湾“读书人口”中形成了现代的、尤·哈伯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和庸克·安德尔逊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最终为“台湾民族主义”、为“以台湾

意识”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民族的“台湾文学”论，提供论述策略。白日光天下，日本学界公然参与台湾反民族的政治、思想、文学活动，协助抹消台湾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为日帝对台湾殖民历史大唱颂歌，将日本殖民主义美化、正当化、免罪化……这是一轮新的、无忌惮的皇民文学运动，是严峻的历史和思想挑战，是对包括台湾人民在内全中国人民的侮辱和挑衅！我们必须对之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坚定不移的批判与斗争。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四辑 | 消费社会和文学问题

色情企业的政治经济学基盘*

从四面向城市猬集的人口

工商业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因着工厂、企业向城市集中，或者因为工业、企业诱引了从四面八方猬集的人口而成为新兴城市，使乡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分别在工厂、企业、商店等地方以体力或智力的劳动，换取生活的资料。有人长期离开家中的配偶，有人因为薪资低下长期不能结婚。为这些男性解决性的需要，就产生城市的娼妓。这一类的色情企业，以中下收入的男性为对象，历史也比较长久。它的基础，是人的实际的生理需要。这需要因为某些社会因素——例如离家谋职而妻子不在身边；例如长时期因经济因素无法成家——而无法取得正常的满足，遂在后街娼寮中去求取权宜、暂时的安慰。

超出需要以上的色情

现代人对于商品货物的需求，已超过维持生存所必须的限度甚多。食，果腹即可，但现代人追求持续性的，近乎浪费的甘美脂肥。其他衣、住、行，莫不如此。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人类生产商品的技术与规模大增，可以产出远超人类基本生存所需的货物；第二，为了促成这

* 本文刊于《大地生活》(台湾)一卷九期，一九八二年七月。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十二·西川满与台湾文学》(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五月)。

些大量商品的消费以取得金钱形式的利益，各种刺激消费（购买）的技术、科学发达，以挑激人对商品之欲望为能事。

今日色情特点也在这里。人们已不再单纯只为了满足迫不得已的生理需求而购买性的满足。今日色情企业，虽然还没有直接、公开的广告、推销活动，来挑激人们生理需要以上的欲望，但由于今日社会，经济的独特条件，它已不再只是单纯地满足必要的生理欲望以赢利。色情，成了一种消费品。而且作为消费商品的色情，也依它的目标市场，分成上、中、下等，以不同的价格，出卖给不同收入的男性购买者。

检查制度和色情文化

在当前“先进”国家中，有公开的色情电影，在公开的场所放映。有色情书刊杂志，在公开的书店中出售。有淫具在公开的市场销售。至于文字、戏剧和一般电影中的色情，更是常见。至于商品广告中的色情或色情的暗示，更是广泛了。

每有卫道人士起而主张禁止这些色情文化的传播，总有同样严肃的人士起而反对。理由是如果海淫是禁止出版、演出、写作……的理由，将来就可能发展成对一切言论的禁压。

尊重言论自由一至于斯，对于渴望言论自由的我们，是极令人感动的。

但这种色情文化的“自由”，都是使色情成为远超过生理需要的消费品的一个刺激因素。

色情文化和肉感文字、电影的流行，和严肃的文化、知识品作品的需索，同样是“言论自由”下的产物。*Playboy*之类的杂志销行，远较（举个极端的例子说）*Monthly Reveiw*一类的杂志，同样是“言论自由”下的现象，但前者的畅销直接和间接地成为后者滞销的原因。而后者一类杂志的滞销，又以复杂的方式，造成前者的畅销，也说不定。

资本社会的消费性文明，带来犬马声色的世俗性和庸俗性生活和价值体系。消费文明上的“言论自由”——连带地是它的“民主”体

制——的问题点，便在这一点上鲜明地示唆出来。如果说得极端些，毋宁是消费文明的世俗主义和平庸主义，巧妙地防止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也说不定。如果这样来看，色情企业便具有意想不到的政治性格了。

外埠的色情

不知什么时候起——其实也只这几年的事罢了，在台北以外的外埠，坚定地渗透着台湾条件下的色情主义。脱衣舞，偷偷接回色情镜头的电影，甚至显然合法进口，却从不在台北上片的某级影片和“外国秀”等，在“励行战时生活”一类口号下，我行我素地像难治的癣疥，在外埠地区扩散。到了今天，既达僻壤穷乡，在尘沙的矮墙上，贴满着裸露大部分胴体的“脱衣秀”广告。色情坚挺地向着乡村渗透，已到了空前罕见的阶段。至此，台湾乡村，除了迷信、酒醉、赌博之外，再多出了一样色情。

色情录影带的泛滥，也浸淫着乡村，和城市不同的，是城市的富有者把录影带买回或租回家中看。在乡村，旅社、冰果室……等成为色情录影带放映场所。今天乡村的旅邸已不只供外乡商旅落脚——更多的时间和房间，“住”满了窝在那儿喝酒，看色情录影带，狎妓的本地人。

这种色情问题上微妙的“自由”与“开放”，也显著地表现在杂志、大众传播上。最近，坊间偷偷地多出了台湾标准的色情刊物，如《四季风》、《精彩》、《模特儿》等。地摊上的半折书中，尤其是色情书刊的集散场所。比起某些刊物书籍动辄因“内容不妥”而遭禁止，这些“半色情”杂志和书刊，都在台湾享有充分的言论、出版的自由。

在台湾政治条件下，和台湾清教式宣传逻辑下，这些色情上的“自由”，是富于无伤大雅的讽刺的。这固然说明了台湾消费文明进入了一个更颓废的时期底开端，或者也说明了色情的“政治价值”已开始受到政策上的考虑，也未可知。

作为酬应媒介的色情

在工商经济体制中，促销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在一切促销活动中，各机关、厂商的采购决策人，当然是最好的目标。送礼、宴客之外，色情变成了最有效的交际方法。因此，色情成了买卖交易的辅助。因应这种客观的“需要”，应招站、酒家、酒廊、色情餐厅、色情公寓等等，应运而生。女性的身体，在一定的价格下由商品的推销一方买下，馈赠给采购的一方。

据说，当前色情的存在，这种商业上的酬赠，占很大的部分。因此，色情方面的开支，也来自推销一方的商人的公司。换言之，是在生产者的开销，而不是个人的金钱下，维持着半壁色情企业。这也是现代色情在社会、经济学上的一个特点吧。

色情和医药的关系

人类性伦理的颓废时代，在过去，总有一个威力很大的“惩罚者”，那就是性病。

但是自从抗生素问世，虽然并没有完全根绝性病——有一些抗药性的性病原菌正在顽强地滋生，使医界束手——但是一般而言，性病已大大地失去了从前规约人类的性关系不至太过废弛的一个可畏的控制力量。

对于女性，怀孕是另一个节制放纵的性关系的力量。由于怀孕和传统家庭、家族、社会、道德甚至宗教上有十分复杂的关系，作为性行为的一个后果的怀孕，不但规制着女性（在过去，婚姻外的怀孕往往使女性遭到破灭的悲运），也以较轻的程度规制着男性（例如宗法伦理的不容，财产继承的家族纠纷等）。

但是，如所周知，避孕药剂的问世，消除了怀孕这一个古典而自然的对男女关系的约制。

抗生素和避孕药的问世，使人类的性生活发生了较为突出的变化：（一）性和生殖的分离。性，更多地不再是为了家族和种族繁衍的手段，而成为纯然的个人的官能上的享乐。（二）失去了社会和疾病威胁的性，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像一切其他不经约制的欲望一样，它带来人们生理和精神的残害。

向台湾的山地俯首

台湾工商业经济在最近十五年中急速而广泛的发展。平地和山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早在汉人渡海来台就已存在。作为中国大陆经济形态的延伸和复制品的台湾社会，在当时带来了中国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地主佃农的关系，在私田、屯兵田、学田、宗族田、官田、义田这些形式不同但本质基本一贯的土地关系上，建立了一个与中国农业社会相似的社会。而当时的台湾少数民族，则还停留在原始的部落共同体经济和社会情况。在西方殖民者的掠夺和汉人的压迫下，台湾少数民族日益向山地退避，使他们的社会遭到长久的发展停滞。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对山地同胞采取和平地隔离的管理政策。因此，虽然少数商品、货币、教育、卫生和行政组织进入了山地部落，基本上，整个山地的社会结构，没有受到平地经济的影响，或者虽有影响而变化较为缓慢。

但在这十五年间，平地工商经济急速发展，台湾在迅速地形成一个中产者社会，影响所及，整个平地社会不论穷乡僻壤，一变新貌。这强大的社会变化，也顽强地侵蚀着山地社会和经济。商品无远而弗届。货币积极地影响着他们的流通与交易。部落共同体的社会、经济、传统和精神急速地崩解。山地社会从部落共同体的社会，飞越应该长期发展的农业、宗族的社会，在现代资本社会强大的侵蚀下被组织成为它的一部分。在这过于急速的变化下，社会快速解体。台湾山地少数民族文化、语言在平地强势消费文化和强势语言的影响下迅速消亡，人口向平地流落，男性成为工资劳动者：运输工人、劳力、远洋渔船工人，女性则迅

速地向着平地色情企业的深渊沦落。

不愿意留在山地，嫁给自己民族的男性，而宁可嫁给较穷、较老的平地汉族，或者沦落烟花，它社会、经济的原因，是十分明白的。但这样一来，台湾山地少数民族的种族学上的母性，受到严重的伤害。种族母性的外流和娼妓化，种族语言、文化、风俗、历史、生活习惯的迅速消亡，社会体制的迅速崩溃，台湾山地少数民族正面临着种族灭亡的重大危机。

至少还可以这样说：在台湾，至少在心理上，汉民族对山地少数民族没有民族歧视和差别，或者即使有一点点，却远不如白人之对黑种人和红种人，也远不若日本人之歧视和压迫“部落民”和“爱奴人”。但长年来利用别人的“无知”和“憨直”，对山地经济和货材进行蛮横、残忍的诈欺和掠夺，是不争的事实。今日台湾山地少数民族的沦落，与其说是蓄意的种族灭绝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缺乏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科学的态度和团结心，从而缺乏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一任让浸透力极为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去破坏仍然残存着部落共同体经济和社会遗迹的社会。

如果汉人——根本不论是“台湾人”或“大陆人”——不迅速正视这个问题，尊重和保障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的充分独立，制止山地妇女向平地色情地带沦落，保护其母性；如果没有一套科学的、富于民族间团结意识的正确管理和保护政策，那么，占用了土地，消灭人家的文化，使人家的社会崩解，使别人的种族母性断伤净尽的汉人，终究会受到历史最严酷的审判，和民族良知最沉痛的指摘的。

台湾的汉人，应该为我们和祖先所犯的对山地少数民族的过失，深自忏悔。向台湾的群山俯首啊！并且赶快起来，采取必要的改善行动。

卖淫观光企业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色情有国际的政治、经济学的因素。日本反对“观光买春”的健将桥井女士指出，日本男性对韩国、台湾、东南亚

的“性侵略”，有这样的机序（mechanism）：即日本跨国企业的人侵引起各地农村妇女向日本资本的工厂集中。但由于工资偏低，转落城市而无法养活自己和家族的女工，向餐厅、饭店、旅社沦落，成为日本观光客猎取的对象。菲律宾的情况更为恶劣。日本人用日本飞机运输一大批日本男性买春客到菲律宾，立刻被接到菲律宾当地由日本人经营的饭店中住宿，并且由日本人当导游，并介绍菲律宾（由农村而日本工厂而应招站）的娼妓陪宿抽取佣金。在整个过程中，日本人买春集团吸骨食髓，一点“好处”也不留给菲律宾人。

每年七、八十万人的日本性狩猎部队，汲汲然来往于韩国、台湾、东南亚各国，这是何等“壮伟”的人间羞耻。但是这种大规模的买春观光，有一定的条件。第一，要有大量吞吐买卖“春”光的客旅的现代化飞机场；要有一流现代化饭店和舒适的餐厅、酒廊。其次，客观地存在着经济发展的差别。日本人的所得高，货币值硬挺，而第三世界各国贫苦、生活水平低，女性身体的价值低，其他旅社、饭店饮食也（对日本人而言）便宜。但第三世界男性一旦到了日本，首先吃、住的费用就成问题，遑论去购买日本的“春天”了。就在这世界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上，揭发了日本买春观光的平等、掠夺性和女性差别的特点。

第三世界的观光企业，对于当地的影响是极大的。观光饭店的富裕装潢，在东南亚、非洲、中南美洲一片贫困的大地上兀自特立。里面是酒池肉林，出此一步，便是满目的荒废和贫困。在里面承欢卖身的女郎，用她们的钱去养活农村中贫困的家庭……。第三世界的观光色情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不言而喻。

人的破落

在台湾，这种悲惨的情况，显著地表现在山地观光区中。以下是日本基督教协议会（NCC）会长岸本羊一的报告的摘要（《朝日新闻》）：

临近台北市的乌来乡，是和台北市内巴士观光成为一套的最受（日本观光客）欢迎的观光区。乌来有人口三千五百人，其中泰

耶族占一半。十多年前，乌来开放为观光地区，立刻为当地泰耶族部落带来激烈的变化。

首先，是越战来台休假的美军，来此猎取面貌轮廓深刻，大眼俊鼻，富有异国情调的泰耶族女性；而在乌来出现了卖春。越战后，日本观光客大量奔至，使乌来整个成为卖春地带。对美军基地的卖春，转化成对日本“观光客”的卖春。

在乌来细小的街道两旁，栉比着窄小的“土产店”。山地妇女在店里招呼客人，兼营娼妓，随着一车一车而来的日本观光客，经由导游拉线，日本客人用车子把她们载到台北的大饭店的房间里。

据调查，台湾山地人有八成是基督徒。在乌来一地，就有六个教会。但是，据岸本的调查，当地周遭从十五岁到三十岁的乌来山地妇女五十人中，约有百分之六十有过和日本观光客进行色情交易的经验，其中的半数，至今还在做这种买卖。易言之，卖春的收入，是整个部落村的主要经济来源。

各种各样的人的破落，相继发生。性病的蔓延，成了部落村中严重的问题。由于缺乏卫生知识，没有做性病检查，以至恶疾在村中延蔓开来。混血儿——尤其与日本人间的混血儿，加重了母亲的负担，使母子更向贫困的深渊沦落。有些成为日本人的情妇，每月一次等待日本情夫来相会。但是为了生活，在间歇的时间中，从事对日本观光客的卖春工作。

另一方面，稍受教育的村中泰耶族男性，纷纷离开部落，流浪于平地。残留村中的泰耶族男子，由于耕稼利益太低，在村中酗酒度日，过着自暴自弃的生活。自弃、苦恼的男人，和以卖春维持家计的妻子间的争吵，使一家陷入悲惨的暗夜。

村中的生活，由于观光卖春而来的身心的荒废，有早衰早死的征象。年仅三十而身体呈现病变乃至死亡的，为数不少。村中人口的七成，年龄在三十以下，五十岁以上的人口，目前只有百分之零点九。乌来部落村改为“观光地”后十几年，种族的生机立刻受到这么大的戕害。“长此以往，泰耶族总有灭亡的一日。”乌来南光教会的吕金俊牧师

忧心地说。

在日本殖民时代，日本人把台湾山地少数民族送到南洋战场中的森林里去作战，充当炮灰。今天，日本人成群结队地来蹂躏山地部落的女性。日本人的不德，固足痛恨，而容许日本人那么做的台湾汉人的良心，也应受到痛烈的苛责。

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

在工商经济的社会中，在第三世界，色情已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它显示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外来的消费文明，外来的色情意识，越战，美军基地等军事、色情结构，以及“先进”日本经济和跨国企业结构的阴影下，日本男性群集倾巢向东亚、东南亚推进性的侵略，这些，都应该在战后三十年来权力和利益分配下的第三世界这样一个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课题中，去思索正确的答案。第三世界的批判的一代，已不从传统的道德上去取得忿怒和抗议的理由。他们更不会对第三世界精神和社会的荒废，视为“进步”、“现代化”所不可分离的“必要之恶”。不，他们正要学习从全球的南北结构中，从世界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中，批判现存的世界，从中学会最好的教训，为自己的民族和世界的出路，寻求最好的答案。

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

台湾文学的定义

首先我想先就“台湾文学”作一个粗糙的界定。我们知道，“台湾文学”并非新词，它早在日据时代就有。我们应注意的是，“台湾文学”这四个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不同立场的人有不同的内容。譬如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是殖民地台湾的心声，是精神与灵魂的表达，是挫折、希望、悲哀、喜乐的交融。但在同一时期，从日本统治者的观点来看，台湾文学是殖民地文学，谈些妈祖、木屐、南国风光、椰子树等等。对他们来说，就如吉普林在印度所写的作品，在英国人眼中富有一种异国风味。

今天我们所说的“台湾文学”，也有很复杂的内容。第一，因为台湾在当前政治、历史上都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在许多名词之前都冠上“台湾”二字；如台湾社会、台湾经济，因此而有“台湾文学”。另一种定义是我最近才看到的，认为它是相对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这一派人主张台湾文学的特殊点有别于中国文学，主张台湾文学的自主性。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在此加以评论。

最近我在中央文工会办的《文讯》上，读到叶石涛先生一篇文章，他说台湾的文学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我很同意这个说法，这明显的说

* 本文刊于《文季》(台湾)一卷三期，一九八三年八月。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八·鸞山》(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

明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脉。我个人对“台湾文学”并没有特别的看法，只是认为：从日据时代到今天在台湾产生的诗、戏剧、小说、散文等，皆为台湾文学。并且，她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支流，一个部分。

我要说这题目的另一个原因是：七六年乡土文学论战之后，在台湾文学的这边，逐渐有一种自满的心态，觉得台湾文学是世界最美的文学之一，已达登峰造极之境。任何在台湾从事文学工作的人，都愿意台湾文学是最好的，但我们若把眼光稍微放大一点，不说欧美大国，即使是和邻近的菲律宾、南韩或最近出了几个诺贝尔奖文学家的中南美洲相比，我们台湾文学仍有许多地方需要检讨、反省，并在这个基础上求得更大的成绩，更充实的进步。在这个意识下，我想提出几点对今日台湾文学的检讨与反省。对一件事的检讨，往往有许多不同的角度，我今天只想从分析台湾近十年以来逐渐形成的所谓大众性消费社会的背景上，去检讨台湾文学面临的一些问题，并希望台湾文学能挑得更重，走得更远，有更恢宏的志气。

大众消费社会

从整个人类的历史看起来，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能像今天过得这么丰富的生活，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一个小小的逗点。全世界的资源物质，事实上有它的局限性，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浪费性的丰富——我是指欧美而言——可以不断地永久持续下去。

在我的幼年，甚至远溯自我的父亲、祖父及曾祖父那一代，过得好的生活的人，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少数被公认的地主、商人、官员才能享受特殊的、丰富的生活，我幼年住在莺歌，大部分的人只有初一、十五或逢年过节拜拜，才有一些豆腐块、炸过的猪肉可吃。衣服破了再补，家具常常是从祖父那一代开始用起的。这种朴实、匮乏的生活，不止是我家，而是普遍性的生活习尚。

但是今天，我们到处有满山满谷的商品，品质比过去好，价钱也比

过去便宜，它们在社会进行着密集的、持续不断的、制度化的消费。这种所谓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在西方，约在二次大战后开始。在台湾，则约为近十五年间的。一般而言，以国民所得超过一五〇〇美元为指标。

大众消费社会的四项特点

一、科技的发展：今日的科技发展是空前的，快速而且巨大的，它带动了各种工业的发展，并因而影响到企业，为社会带来体质转换性质的进步与发展。

二、大量生产：由于科学的发展，运用在各种商品的生产上，创造了大量生产的时代，使产品的量、质大为提高，在价格上大幅下降，使多数人享有各种物品为可能。生产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需要，商品成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形成了商品砌筑而成的社会。

三、企业规模的增大：工业、企业的规模增大，生产——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和范围迅速扩大。企业由小而大，从国内而国际。更庞大的人口集中在企业和工业体制之下。

四、行销的发展：为了消耗超过自然需要的商品，以实现企业的利润目标，行销（marketing）知识和技术日益发达。在强大的大众传播体制的助力下，企业的行销活动对于人的精神、文化、价值、行为等产生巨大影响，是大众型消费行为的主要动力。

“消费人”的登场和他的特质

消费人（homo consumen）是大众消费社会中的新的“人种”，他们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观念上的巨大革命：把快乐、享受及对幸福的追求，当作一种公开的正当目的。例如以邻居的高收入及留美人士的所得作为羡慕及追求的目标。相对于过去传统读书人的俭约观念，一个人求仁之心不如求

利之心，可视为道德上的堕落。但今日的价值观念已不作如是观了。

二、人的物质化：在大众消费社会中，从初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劳力的商品化，更加扩大到人的心灵、智慧、精神的商品化。例如一个有创意的年轻人到广告公司做事，一定要按市场的需要去设计广告，这种知识无形中就是一种有价的商品。由于我们是一个商品的社会，商品需以现金去获得，金钱因此变成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关系。金钱的市场关系渗透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金钱的多寡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甚至介入到友情、宗教、亲情的关系。这种关系固是古已有之，但于今为烈。为了行销广告的需要，大众消费社会大量鼓励解放传统东西方思想家、哲学家一直认为需要抑制的物欲。古来的思想家、哲学家不断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不可以放纵的世界，必须知所抑制，追求内在的精神。但今天的社会则鼓励你：欲望是好的，快乐是至上的，享乐是第一！动物学上的“人”得到最大的解放，从而有了“动物人”的形成。人的传统形象及信念完全被打破，而“商品化”得以扩大至绝大的限度。

三、制度化的消费：过去是为了需要而消费，现代则是为了消费而消费。“消费”已发展成一种客观的、新的社会制度，生活对于现代人而言，是如何消费、消费什么以及消费多少的问题。从事过行销工作的人都知道所谓“诉求目标”的问题，人不再是人，而被年龄层、月入多少所区分。行销活动操纵、扩大、制造人对商品无穷的嗜欲，来造成企业对利润的无穷需要，人变成只会消费而不会创造、自主、思考的“单向度人”，以贷款、标会、分期付款等超出自己能力和需要的方式去消费。在我们祖父时代，许多东西是有能力买而舍不得买，现在的人则是买不起还要买。消费通过大众传播等等行销技术而成了一种无形的强制行为。

四、无目标的精神荒原：在我们的祖父时代，有许多东西用了几代仍未更换，但今日的消费观念则是商品的多变；每一种商品都有它的生命周期，被标示了起点、顶点到衰落。对于尚未开发的市场推销卖过的东西；对于开发过的市场则推销所谓新产品。人变成跟随市场变化的人，张皇失措，逐波而流，永远被更高的欲望所牵引。短暂的满足与饥

饿的不断循环，是现代消费人的特质。这种循环的结果，有一天会使人落入极凄凉的境地；在一切物质都得到满足后，觉得生活茫然、虚空、无聊、倦怠，失去了对人的亲切、关爱，而只成为商品市场的工具。这是人的“异化”中最悲惨的景况。现代消费人变成一大堆有意见而无信念，有事实而看不到事实的意义，有各种复杂的规则而本身失去了原则的人。日本社会学家称这种现象为“人的幸福中毒症”。又说人就像走出森林的野兽，被囚养在各种商品所筑的栅笼中，成了一种“家畜”。人，被“家畜化”了。

五、甜美的社会控制：行销活动经由大众传播创造社会共有的思考方式、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它侵蚀、破坏、改变传统的信仰、文化，依着商品的规格化（包装、品质、形象等的规格化），塑造了规格化的文化、价值、道德、信仰等等。人在大众消费社会下，成了甜美的市场行动下的奴隶，失去批判、反抗、异议、独创性思考的能力。

现时台湾文学的问题点

在前述的台湾新社会的消费特点和背景下，我想简单的检讨当前的台湾文学，面临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文学作品中思想文化的贫困：台湾文学和菲律宾、韩国、中南美洲文学相比，这个特点非常显著。有许多作品花费大量文字只为描写一个女人的微笑或一个男人抽烟的姿势，此外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显示了思想、文化上的贫困。所以引致了思想、文化上的贫困的这个现象的原因，我以为有两种。一种是三十年来，我们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播和书籍有一定的限制，作家缺少历史的、社会的批判性思考。其次是，如前所说，在大众消费社会中，人的“动物化”和“物化”，使人的思想无能，对于历史、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缺少组织化、体系化的理念，造成很多只有意见没有信念，有很多规则而无原则、很多事实而不知其意义的作家。这是目前台湾文学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语言的荒芜：我所说的荒芜，与一般所说的文字流畅、华丽无关，而是不会用标点符号，不会使用叠声字等等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是我们三十年来汉语的传统教育失败。原因在哪里，我不甚明白，但今日的许多年轻人写不通文字则是事实。第二是因为对台湾的认同有加强的趋势，许多人在作品中加入大量的台语，造成汉文更大的灾害。第三是，因为政治上的理由，对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传统加以阻隔，这些文学虽未必都很好，但从传统的继承来说，当然会造成影响。文学是一种实验的过程，中国新文学的生命很短，必须不断的相互激励与学习，才能发扬光大。而台湾因为有此文学上的断层，现代作家无从汲取新文学在语言上的资产。第四，在现代工商社会中，资讯、电讯发达，电报、电信等的使用，使语言简化为单纯的符号，字汇、文法都尽量简化，语言、文化也就受到退化的影响。最后则是西化语言尚未被汉语的原则所消化，不成熟的西化语言对台湾文学产生坏的影响。

三、缺少独立的文学批评：三十年来，台湾文学的创作与批评的发展不均，可说脱了节。台湾文学创作的作家，有许多人在忙于应付生活之余仍努力的写出好作品，值得我们心怀感激。但评论方面的作家则未跟进。按照大众消费的规则，评论应该越来越专业化，台湾没有的原因，可能是教育训练养成的问题。并且，三十年来对社会科学、哲学、思想文化方面的漠视，或直接、间接的扼制都有关系。因为评论除了知识以外，还必须有尖锐的精神。而没有独立的文学批评，使文学得不到客观批评的指导与激荡，也就无法取得更好的发展。

四、未熟的宗派主义：文学上的宗派，一如其他思想上的宗派，只要它够得上是真正的宗派就是好的，可互相讨论、吵架、论战。对整体的进步与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但因思想、文化的贫困，批判精神的缺乏，使得宗派所需的一些基本条件（如知识、哲学、思想、文化）付诸阙如。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标榜的宗派，往往夸张、膨胀宗派意识而忽略文学创作。早熟的宗派主义，就像没有专业知识的人一起讨论知识问题一样，对台湾文学的发展没有贡献。何况，文学宗派和文学在艺术上的评价，并没有一定的关系。

五、读者、作者的精英小集团化：在大众消费文化下，文学的创作与欣赏，越来越限于文化、文学的“精英”小集团。随着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文化或小说的“明星”不如过去重要，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降低。大部分人在其专业上有丰富的知识，但在共通的人文思考上越来越幼稚，越需要消费型的文学。严肃的文学，失去了对于人生、对于生活的启发和指导的性格。人的异化，造成文学的异化。

六、文学作家面对的问题：第一是：科学、技术上的知识和学问日益受重视，文学作家的地位日渐下降，尤其非流行的作家，更是如此。第二是：在金钱与市场关系的支配下，消费型文学发达而严肃文学衰落。第三是：在大众消费下，作家急功近利，求名利先于求自我风格的形成；“消费人”的形成，使作家“单向度化”，无从有更丰富的人生，更多样而深刻的对于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多作体验与思考。

结 论

在形式上，我们已看到台湾富裕的、消费社会的形成。大众消费社会会有两种，一种是实在的，一种是虚构的，台湾即属于后者。因为作为大众消费社会重要支柱的科技，特别是精密的科技，我们还落后一大截。在享受上，我们有各种豪华的汽车、观光饭店、舶来技术与商品，但因为缺乏坚固的科技基石，所有享受的富裕现象都只是一种虚构。我这样说绝非在污蔑台湾的经济成就，而是在陈述一个真实的事实，我们不能再这样无穷无尽的发展下去了。即使是在西方许多大国，不少思想家仍警告说，世界物质、资源有其极限，目前这种浪费性的、糟蹋性的成长必须遏止。他们提出的警告是：“减少成长”。西方如此，台湾更应是如此。台湾作家在富裕社会中，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另一种作家。他不应再只靠灵感与即兴去写作，而应该积极去理解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过去读了四书五经可以治天下，现在则不然了。由于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因素，使我们面对的人文景观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的情况，要求每一个作家必须花费辛苦的代价，长期努力地去对事物

的本质和真相进行理解。他必须谦虚的做调查研究、阅读、思考、访问、做笔记、建立档案、用苦心去捕捉真理，从事写作。

最后一点是，前面谈到的人的“异化”。简单地说，人已逐渐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当我们提到所谓人道主义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时候，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人的形象有一种深刻的信念。当黄春明写那些淡淡哀愁的小人物时，他心中就有一种或者明显或者不明显的对人的信念。台湾作家目前最重要的是从人的复归出发，克服人的异化，从人文主义的回归去看台湾、中国、第三世界和全世界的人类。在所有的复归途径中，我相信没有一种东西比文学更有效、更直接。文学使那些对爱失去信念的人，恢复爱的力量；让沮丧的人得到温暖；让受逼迫的人得到反抗的力量；让失望的人有勇气重新去爱、去生活、去追求新的希望、去拥抱别人，这应是一切文学的原点。文学也应和其他有良心的知识一样，对社会、国家及全人类的团结和平、进步与正义，付出应有的贡献。

大众消费时代的文学家和文学*

消 费 人

台湾式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是晚近十五至二十年间的吧。随着这台湾型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一种崭新的“消费人”，以不分“外省人”、“本省人”的性质登场。从社会学加以观察，这“消费人”有这些特点：

相对于前，大众消费时代的人的欲望抑制，今之消费人是经过欲望解放的人，以对货财的欲求、持有和享受为人生公开的目标。

相对于前，消费社会中人之善于和易于满足，今之消费人生活在“欲求——满足——欲求”这种对于消费品不知匮乏的饥饿感的循环之中，终日碌碌砣砣，向着无止境的消费狂奔。

相对于前，消费人之保留了人的创意、冒险性、野心，甚至反抗、吃苦这些能力，今之“消费人”为各种丰裕的商品和物质所饲养，至于驯化为无梦、无力、无性的人种。

相对于前，消费人之对于他人保有丰富的人间连带——关怀、同情、为他人不幸而不平、无保留的爱、帮助、退让、牺牲、奉献……这些使人的生命更为丰裕的性质，今之“消费人”在商品和大众传播、广告业控制下，变成一群消费各种商品的工具，失去思想、创造、同情、

* 本文刊于《中国论坛》(台湾)，一九八四年五月十日。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八·鸞山》(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

爱和愤怒的功能。

相对于前，消费社会之保持一定的、地区的连带，今之大众消费社会进行不断的缘于阶级、收入、工作性质、文化传统和市场之不同所引起的细分化 (Fragmentation)。在这细分化的现状中，大众消费体制和企业的行销管理，一方面得以发挥其功能，一方面使这个细分化更为固着。因此，在这阶级、工作、文化、市场的零细化下，现代的消费人彼此越来越陌生，越不能相互理解，从而彼此冷漠和不关心。

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和消费人的登场，造成一个思想贫困、人情浇薄、趣味庸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思想、科技、人文和文学的生活，越来越局限在大学学院、精英知识分子小圈里，进行着有限度、有范围的再生产。而对于广泛的社会生活，越来越起不了作用。今天真正指导着人生的，是通过报纸、电视、杂志等强大企业化媒体加以剪裁、重组和包装过的一套套庸俗化的常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品味和风尚等等。从文学上说，大众消费社会的文学，不是流于肤浅、煽情、罗曼蒂克的流行文学，就是以细致刻划中产阶级消费人的苦闷、寂寞、空虚、私情、无聊为能事的现代西方中产阶级小说。

在台湾，从整个趋势看来，也不能例外。因此，阅读严肃文学的人口正在减少。庸俗的市民文学，有巨大的市场。最近有人夸夸然谈论“政治小说”。我担心这自称的“政治小说”，没有类如科思达·加华斯等导演的电影那种深度，也担心那些以“政治小说”为品牌的小说，终于也免不了成为一种“反体制商品”之在小说范围内的翻译罢了。

歪 扭

大众消费社会对于文学的另一个戕害，来自大众传播。由于经过作为企业体的电视公司制作人等按照市场的需要，将采访得来的资料，加以剪接、再组成，并且尽量缩短，为了节省商业社会中读者“宝贵”的时间，大事裁删，使原有的信息大打折扣，把文学家、文学作品和大众的关系，弄得面目全非，使文学原有的价值、信念和讯息，经过大众传

播的裁剪、再组和包装后，完全丧失原有的动力，从而在强烈的聚光灯下死亡。

这种危机，尤其在台湾全体性的、结构上的思想贫困下，从事大众传播工作者在文化、思想和知识上的一般的贫困，荼毒尤为严重。大众传播工具，为了增进内容的商品价值，制造文化、文学、艺术的话题，夸大或歪扭某些文化人、文学人和艺术人的价值或形象，使他们一夜之间在传播媒体中享受盛名，却因为文化、知识、才能、思想的贫困，养成这些文化人、知识人和文学人与他原来比较认真、平常、努力的自己发生了异化，认真地穿戴大众传播给予他的幻魔的彩衣，信以为真，驯至召来个人在文化艺术事业上过早的、人工的死亡。有些在高额奖金中产生的作家，也极少真能在文坛的地面上着床、生长、壮大。许多被媒体、杂志、刊物、报纸略一品题，便立刻变得虚矫、傲慢、不求长进，甚至结宗立派，令人深为惋惜。

抵 抗

文化、文学和知识，有要求有效的传播、流传的内面的需要。但是在大众消费社会时代空前有效的大众传播，却反过来主宰着文化、文学和知识。怎样、用什么动机和形式去传播什么样的文化的、知识的和文学的内容，已经远远不是作家、学者、艺术家可以自由选择和规定的。

因此，一个独立的文化人、作家、艺术家，需要有从迷人的聚光灯、水银灯、大幅的显著版面脱走的决心，在文化、文学、艺术这个自主的宇宙和天地中，真正从亲炙历代伟大的心灵，得到谦逊和辛勤工作的力量，求得在名利之前保持一份平常不动的心怀。就一个作家来说，他应该努力在生活中有意识地抵抗消费人的自私、享乐、商品狂热、对他人命运和感情的不理解，以及由之以生的对生活、对人的倦怠；抵抗人在商品中的异化，努力复归于原来的自我，恢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更为丰裕多面的生命。以对于地球上物质的不匮乏的浪掷与开发为基础的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终必有它发展和成长的限制。于人类生活史上

为不过瞬间的今日的富裕，一旦瓦解，在一片废墟之中，或者唯有在繁华时不忍随时转落的文学、艺术和文化，庶几还能发出几处闪耀的光芒吧。

《人间》杂志发刊辞*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

二十多年来，由于整个社会的勤勉工作，我们已经在台湾创造出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未曾有的、富裕、饱食的社会。这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成就，也使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那就是因为社会高度的分工组织化，造成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一个生产部门与另一个生产部门之间、一个市场与另一个市场之间的陌生与隔阂。

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往日深切的、休戚相关的连带感和相互间血肉相连的热情与关怀。此外，在一个大众消费社会的时代里，人，仅仅成为琳琅满目的商品的消费工具。于是生活失去了意义，生命丧失了目标。我们的文化生活越来越庸俗、肤浅；我们的精神文明一天比一天荒废、枯索。

《人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杂志呢？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人间》是以图片和文字从事报告、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的杂志。通过我们的报告、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让我们的关心苏醒；让我们的希望重新带领我们的脚步；让爱再度丰润我们的生活。如果您还问：为什么在这荒枯的时代，要办《人间》这样一种杂志？

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抵死不肯相信：有能力创造当前台湾这样一个丰厚物质生活的中国人，他们的精神面貌一定要平庸、低俗。我们也抵

* 本文原题《创刊的话——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刊于《人间》杂志创刊号，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八·鸢山》（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

死不肯相信：今天在台湾的中国人，心灵已经堆满了永不饱足的物质欲望，甚至使我们的关心、希望和爱，再也没有立足的余地。不，我们不信！

因此，我们盼望通过《人间》，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热络起来；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尘封的心，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和感动，共同重新建造更适合人所居住的世界；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优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团结，热情地生活。

一年多来，在筹办《人间》的过程中，我们得到许许多多台湾文化界、知识界难以忘怀的关心和帮助。黄春明先生提供了许多极有创意的指导。尉天骢先生和郭枫先生也给予我们长期的协助与关心。苏俊郎先生是最早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意见的摄影家。我们感谢关晓荣先生慨然将他的“八尺门”连作送来发表。我们谢谢阮义忠和张照堂二位先生，先后将他们的力作送来《人间》，使篇幅增光。吴嘉宝先生也长期给予我们许多指导，至可感铭。我们尤其谢谢王信小姐，因为她严肃、认真、辛劳地为我们挑选和编辑图片，训练我们年轻的工作同仁，使我们获益至深。此外，还有我们无法在此一一指名志谢的朋友，都给予我们热情的帮助。我们深知，没有这些令人难忘的支持与协助，《人间》就完全不可能成形和刊出。

《人间》是属于每一个关心人、关心生活、关心台湾——我们可爱的家乡的人们的杂志。她的园地公开，没有门派的限制。我们欢迎一切关怀的、富有希望与爱心的报导摄影家和报导文学家联手创作，寄来优秀的作品。

我们更需要全社会以订阅和爱读来支持《人间》，因为《人间》是您自己的理想，您自己的杂志。

朋友们，支持《人间》！因为我们心中的关怀、希望和爱，正急切地需要一个再生和滋长的机会。

新种族*

去年年末，高雄和台北两个市政府，在教育指导机关的支持下，分别举行了几千人规模的高中、专科学生舞会。今年初，几十年来对中学生头发发式的严厉格禁，正式解除。

现代台湾青少年的舞，直接从美国输入。在电吉他、鼓、低音电贝斯、鲜明而快速的节奏、嘶喊似的歌唱和高音量音响……所组成的青少年音乐中，我看见过各自顿足、扭腰、摆手的样子。看来舞伴的性别，不，连舞伴自身，已经不重要了。在强烈、直接诉诸官能的、歇斯底里的音乐里，看到青少年群集却孤单地，各自闭目、狂乱地跳跃和扭动，我惊异地感觉到今日青少年一代令人心痛的空虚。

今天的高中生和专科生，大约是六十年代最后两年到七十年代初两年间，台湾的经济发展达到尖峰的时代生下来的。七〇年保钓爱国运动的风潮，紧接着台湾在外交上连续失利所带来的冲击，以及以杂志《台湾政论》重新发足的党外民主运动的展开，对于当时尚在襁褓中的这一代青少年，自然不会有任何影响。他们在台湾社会以全力奔向富裕的历史时代中成长。他们的家庭多半是由离开本家的父母组成的“分子化家庭”，为了挣得足够的现款，满足对于现代大众消费社会中各种商品的需要，夫妻一道出去上班，有计划地为购置房子、家电产品、汽车、把小企业搞起来……而奋力工作。

父母因为不能常在家中陪伴孩子，对他们的子女有一份负疚。用金

* 本文刊于《中国时报》(台湾)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八·鸢山》(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

钱购买各种子女所要求的東西、满足子女的需索，成了现代父母最方便的赎罪行动。

从小习惯于有求必应，习惯于只关心自己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就造成一代有强烈自我；不能理解别人的需要、立场和利益；不知道生活和自然中实际上存在的各种物质和义理的限制的青少年。

这一代青少年的第二个特征，是他们全是“电视带大的孩子”。

七十年代，台湾的电视早已普及，深入台湾每一个角落的家庭。在父母都上班工作的小家庭里，电视取代了过去大家庭中的祖父母、堂兄弟和父母的职能。他们听电视为他们讲故事；看东洋和西洋的卡通片；看电视学说话、唱歌、认字、画图；看电视学习各种知识；也让电视儿童节目中的食品和玩具广告，从小就刺激着他们对小商品的饥渴，终于也按照电视广告吃零食，玩玩具。

电视上的节目，毕竟大人的节目多。孩子们于是歌舞、连续剧、电视长片……无所不看。于是电视上那些虚构的七情六欲，那些城市的、青春的、健康的、美貌的、欢乐的虚构画面，构成了他们对人与生活的理解的全部。他们养成一个人单独地面对荧光幕去找问题的答案，去“学习”的习惯，过去由祖父母、由活生生的人和自然环境所带给幼小者的、最生动而富于启发的知识、情感和智慧，不但同他们断绝了，更不能取得他们的信赖。很多的时候，电视的权威，远远超过了父母和师长。他们成了生活、资讯和知识的冷漠的旁观者。他们坐在那儿，自己一个人在荧光幕上寻找和开发他们所要的情感和知识。因此，这一代青少年知道零细的常识不少，却永远缺乏参与、关心、研究和行动的热情。

现代青少年零细、分散的办法、常识多，却没有一个探索结构性、原则性思考和创作的心智。这除了因为从小受庸俗的电视的恶影响，主要的还因为他们在升学论和文凭论的教育体制中，花去很长的时间、用掉很大的力气，去记诵零碎的单词、公式、年代、人名和地名……入学考试阅卷“电脑化”以后，这种情况更为恶化了。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不看重创造、分析、调查、综合、批评……这些知识和文化生活最为必

要的训练，徒然养成只会考试，不会读书和创造的一代。教材、教学的功利化、零碎化，使这一代青少年对人、对历史、对世界、对自然和对生活，都只有零碎、不连贯的认识，为常识丰富、思想和知识低落的现代消费人的形成，准备好了条件。

这一代青少年的另一个问题，是过早地学会了用钞票解决问题的生活方式。小时候，他们学会了看电视、学别的小朋友来指定大人买零食和玩具，满足自己的欲望。再长，他们学会直接向父母索取零用钱，到市场上去选择他们需要的商品。现在，这些没有参与社会生产，却具有巨大消费力的人口，已经成为外来速食企业、美国进口香烟、地下舞厅、服饰、唱片、音乐带和音响设备等产业的主要或重要的诉求对象，每年的总营业额，可以高达数亿新台币。金钱关系过早地侵入青少年的生活，不但容易使青少年过早造成对钞票的饥渴，容易使他们不顾一切去取得现款；容易过早以金钱去度量人与事物，也容易让金钱削弱了他们在创造和学习上的努力。学生用钱买纸鸢、钓具；用钱买别人的笔记影印权；用钱去支使别人为他抄作业……是现代教师绝不陌生的问题。

最后，这一代青少年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的教育体制本身。不可讳言，目前负责中学到专科各级学校的行政主管，有真正的教育爱、教育热情、理想与负担的人，少而又少。把教育事业当成政治事业，也当做发财赚钱的事业的，比比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大众消费主义，对教育体制的渗透，造成校长、总务、教员和教育自身的商业化、腐败化。其中敛聚扣克，有不忍细说者。而在学校管理上，基本上还是五十多年前“训政时代”的作风，对学生，甚至对教员，基本上还是搞警察主义的管理态度：不放心、不关心、不尊重、永远怀疑。学校内教育精神、风气和伦理的颓坏，形成今日学生们面对的，最直接、生动的，恶劣的成人“典范世界”，形成学生与学校，良心教师与学校之间相当普遍的、暗在的矛盾与紧张。

从这些背景去看这一代青少年，或者比较能够更深入地体会到他们那种令人棘心的空虚感。年方十七、十八的生命中，就蛹宿着空虚感的这一代青少年，无论如何，是令人悲伤的。如果成人的世界再这样纸醉

金迷，不停下为富裕而狂奔的脚步，好好的反省，这成人的世界，终于不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没有现行教育体制根本的革命，没有在教育领域中，对师生进行课程、思想、学研、制度和创意上的全面解放与改造，只在学生发禁和舞禁上作文章，其实只是助长这一代孤独、强烈地自我中心，对人和生活不关心，对人类国家彻底冷漠，心灵空虚、言谈举止不逊而怪异，在服饰、性事 (sexuality) 和政治上号称“中性”化的“新种族”，奔向逸乐化、流行化和官能化的洪流中，浮沉而去，直到没顶。

大众传播和民众传播*

各位在香港的朋友、同胞，虽然已不是第一次，但面对着你们，我的心情还是难免激动，因为我半辈子生活在台湾，很少有机会见到台湾以外中国另外一些土地上的同胞。这几天我在香港走了一下，觉得特别就这里的人，或者年轻的学生来说，只要不开口，跟我们台湾的都很相像，可一开口我就听不懂，所以我觉得很亲。今天我十分荣幸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再次跟大家见面，与你们交换意见。

根据报纸上说，我是要来谈“民生生活和社会参与”的，但因为彼此的联系不够，在讲题的联系上没有做好。虽然这样导致今天的题目可能要有些改变，不过我的基本主题相信还是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主办单位要我说的话。如果容许黑板上的题目有一个副题的话，它应该是“大众传播和民众传播”。

为什么谈传播呢？我自己的专业并不是传播，只不过这两年来我在台湾办了一本《人间》杂志，深刻或者用“皮肤”去感觉了传播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想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会就下面几个部分讲一讲。第一是作为大企业的大众传播，第二是媒介的商品性和它引申出来的问题；第三是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媒体；第四是媒体和意识形态的强制；第五是思考所谓“民众的传播”，就是让我们来想一想可不可能有一种民众的传播；然后从我这一两年来搞《人间》杂志的体验报告一些心得；最后一个部分我们来谈谈新生代

* 本文刊于《八方文艺丛刊》（香港）第七辑，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十三·美国统治下的台湾》（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

的香港人该做什么。

作为大企业的大众传播

我所知道的大众传播，不管是台湾内部的大报纸，像《中国时报》、《联合报》，还是国际通讯社、跨国资讯工业，它们的“巨大”，我们都能够理解。不过我一直等到我自己办《人间》杂志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大的程度有多惊人。那大的程度，就是《人间》杂志所有的预算乘以一亿或两亿。

现代的大众传播必须要有非常现代化的通讯设施，如电讯、卫星设备、发射台、巨型印刷机等，此外，整个制作过程牵涉各式各样的人才、人员、编辑、记者，以至如果是大通讯社的话，它全世界员工的住宅及其他经费，都很庞大。

我曾经遇见过美国非常有名的画刊杂志——《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的人。他为了要做一个题目到台湾来，一搞就是半年，前两个月根本不用工作，只找朋友聊天，喝啤酒。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搞，他说要先进入情况，先在心里创造和台湾合拍的心情，于是两个月里住在饭店，吃、住、随便请朋友喝酒，全由公司付款。

我估计，他做一个题目便可以让我们起码要做三至四期。这里，若撇除非必要的浪费与低效率情况，在一般西方资本主义好的管理之下，大众传播的“品质”可以“翻译”成金钱——就是钱愈多，品质愈好。《人间》杂志所活动的范围只是台湾，由于经费的限制，我们还不敢跑得太远，总在台北附近遛，就算了，便是到附近，待的时间也不能太多，因为人派出去要食要住，要工作要底片，这些都是钱。有了《人间》的经验，我们更能了解大众传播在金钱上的意义。如果我们的记者能够为一个题目住在一个地方几个月，那拍出来的照片保证不一样。而有些题材，你一定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做出好东西。

大众传播由于代表着金钱资本技术的巨大性，它先天地占有一种非常不公平的独占性和排他性，个人对它们不服气也无法对抗，比如你觉

得西方通讯社以白人中心，你不服气，难道你能自己弄一个来跟它拼吗？这就是说，你必须要有钱，才能掌握这样一种意见上、价值思想上的重要武器。

另一个问题，大众传播是单向的，大众传播的“产品”就像多数资本主义商品一样，由大公司研究企划部门精密设计，再由分工细致的生产部门生产，经过包装、宣传、营销零散地卖给个别消费者。资讯要怎样传达出去？怎样“剪接”？通过怎样的制作过程？它的目标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效果？产品本身有什么缺点？对人有什么坏处？传媒的企划部门都非常清楚，但我们作为受众，对此只有接受的份儿，完全没有批评的能力。

我觉得，当大众传播作为一个企业而巨大的程度如此惊人，又是那么单向时，问题已经不在反不反对资本主义或者反不反对大企业，而是要保卫我们对资讯、常识、知识和这个世界理解的权利。这是我办《人间》杂志的一种深刻体会。

媒介的商品性和它引伸出来的问题

另一点我体会到的便是，大众传播并非一大群热心传播的人开几个频道或办几个杂志、报纸让你们看那么简单，实质上，它背后有一个很坚强、巨大的商业动机。而大众传播的“商品性”又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媒体本身的商品性，一本杂志卖得愈多，它的单位成本便愈低，而商品价值愈高；二是大众传播有一个重要的商业功能，就是里面可以做广告，发行量愈大的媒体，它每个单位的广告价钱愈高。传媒具有这两方面的商品性，它所引伸出来的各种限制，便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每个媒体都希望发行量大，因为这样可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可是当所有媒体都追求高的阅读率时，就会对产品的品质造成一定影响。

这个我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台湾有一个非常杰出、优秀的编辑人高信疆，他对台湾的副刊文化有很大的贡献。他把报屁股的、可有可无、消遣的副刊变成一个思想、文化、艺术、文学或者是学术的刊

物，吸引了当时岛内外优秀的年轻作家、文化工作者、学院工作者投稿，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读者。可以说，高信疆的《人间》副刊促进了《中国时报》的成长。这些读者再把副刊介绍出去，报纸的销量更加大大增加。

可是，当这个增长程度超过某个限度时，发行量本身又会回过头来制约、限制这个副刊品质的成长。

但是，只有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兴趣比较高，他们以外的更大部分人口对此不太感兴趣，而老板永远希望网罗更广大的读者群，这时广告部便要向编辑施压了。这样一搞，编辑不得不让步，而报纸的副刊便发生一种犹豫的现象，文不文、武不武、高尚不高尚、通俗又不通俗的，两面不讨好。所以，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媒体追求大的发行量，一定会带来产品品质的下降。

这在逻辑上有一个矛盾。你可以问，为什么认为群众就没有文化。我不是说因为群众没有文化，所以发行量增加时产品品质就非下降不可。但客观上，这个社会的确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精致的文化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大部分人长期做着简单地重复、不能使人进步的工作；而管理、设计的人，只占少数。后者会“进步”，会看到“全面”，会懂得分析，但前者一大部分人就是拿薪水、回家，这样过一辈子。他们没有办法享受更精致的文化或者更深刻的文化趣味。这种情况，是一个很复杂的循环做出来的。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杂志或媒体向下走，为了追求量，它非降低品质不可。

大众传播希望增加受众，还有广告的考虑。一份销量一百万份的报纸，可使广告公司的人乖乖排队，身携现款还要说拜托你，为的只是要买你一个版面；但一份只能卖出三、四万份的刊物，你开个低价，别人还要你打个两折，有时理都不理，他们重视前者，因为产品在那里登广告，可以吸引更多不同的对象，这是商品化的必然过程。本来这样也无所谓，人家做生意嘛。但最重要的，是这对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有什么影响呢？第一点，就算在言论再自由的国家，美国吧、日本吧，对企业的批判十分困难。你可以骂政府，可以骂中曾根康弘，你甚

至可以骂“亲爱的”雷根总统，可是当你骂到一个企业的时候，编辑部会发抖。为什么？因为大的企业在大众传播广告中占一个很大很大的部分。我们都知道，媒体的最大收入是广告，他们是不愿意得罪广告商的。所以，企业其实对言论、对编辑方针有很大的干涉。

第二点是企业对媒体内容的要求。这点是我比较有亲身体会的。像我有这种背景的人能在台湾自己办一本这样的杂志，我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我们办到现在，真正自觉的压力，还不算是来自警备总部、政府或者是我们贵党——国民党，而是来自商业。

我们有四个客户主任在跑广告，很多公司的有关部门人员都喜欢《人间》这本杂志，想尽办法向老板说，这杂志声望很好呀，销量有三、四万份呀。若遇上懒惰的老板，他可能说好吧，给他一两次吧。但若是认真的老板，他把杂志一翻，便会皱眉头，说：“怎么黑嘛嘛的！一个房子卖两、三百万，把广告插在里面，不适合吧。”这算是客气的了，下面的职员便不敢说话了。万一题材用大陆的说法是比较尖锐，我们台湾的说法是比较敏感的话，那就很麻烦。

我们有一个现成的经验，就是最近一期刊登了有关五十年代“二·二八”事件的“民众史”，里面提到在政治肃清中被杀死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有些人说“二·二八”是中国人杀害台湾人，我们觉得好像不是这样，便查访了一些当时的人。这东西出来以后，我自己心里就蛮嘀咕的，想这一期一定禁，非禁不可！可就是没禁。警备总部还只间接地挂电话给台北市政府的新闻科，叫他们打电话给我。新闻科打来，说警备总部要我下回最好不要登这样的文章。是最好不要登，不是绝对不能登（他说最好，我当然是觉得不好意思再登了）。

但这样的情况，广告客户反而直接表示：“你们怎能登这个，太尖锐了！”然后就要再多看两期，意思就是要留“校”察看，待我们有了改正才肯登。所以，实际上企业的自动制约也很严重。一本杂志若太尖锐，企业本身就算没有受警备总部命令，自己也会觉得不好，它们怕在这种杂志登广告会被理解为表示支持，那可不得了。引起这样的误会，毫无必要。至于更直接而浅显的例子便是：假如我们的杂志批评污染，那些

拼命在污染的工厂，又怎么会在这杂志上登广告呢？

以上所说的，第一是企业批判远比政治和社会批判还要困难，第二是企业对媒体内容的要求，这些都反映企业对媒体的干涉，也就是媒体商品化所带来的一些具体问题。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媒体

以下让我们来谈：作为社会控制的媒体。

媒体不是一种看完后丢了就算，对这个社会无甚影响的东西。它其实是一种直接的、间接的、非常精致的社会控制。这个问题，最近也引起传播学界的关怀。

我们这个商业社会最大的特点，是生产方式和科技的改变。今天人类的生产方式，已经使大量生产成为可能。由于我们已经能够在量上生产远远超乎人类自然需要的产品，所以今天开工厂的人不会像《旧约》或《新约》内描写的那些财主一样，看到满仓库的财宝便很快乐，很感谢主。他们必须把货销售出去，才能赚钱，然后再投资再生产赚更多钱。这样大量的生产，必须配合以大量的销售。

但大量销售怎样能够办到呢？生产者为了促进大众消费，必须通过各种行销（Marketing）、管理（Management）以至广告促销等方式，来制造、操纵或强制地加给我们一种新的需要。这种需要是超乎人类自然生理所需的，番话叫做“Forced Want”或者是“manipulated”。

这带来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就是欲望的解放。在人类很漫长的时期里，在各个不同的民族里，欲望是某种必须节制的东西，是一种羞耻。这不只是中国的儒家，各个宗教各个民族的传统相应于它们的生产力就有这样的道德，他们总觉得欲望是个很危险、很可怕的东西，甚至有时候控制不好，它会使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颠覆，或者说得更严重些，在宗教上会落落地狱，永远不能超生。可是面临着我们这样的时代，这种道德和价值观念便崩解了。换句话说，人在地球上物质和义理限制这种基本的道德、信念或思想，在大众消费的时代里崩溃了。

人类从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认为欲望是光荣的、正当的、是有能力的代号；享受也是光荣的、有办法、有能力的代号。

我这样说好像是老夫子在说教，叫大家不要享受，其实不是这样。我只比较来说，认为人类从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广泛、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崇拜一种宗教。这种宗教就是“需要”，就是在欲望的满足和饥饿之间循环过掉一生。人类过去总还有一个时期会想想问题，还想想事情该不该做，这个钱该不该拿，或者人跟天的问题，动不动就说这没有天理……但现在已经没有了。人变化了，出现社会学所讲的“消费人”的登场。那是一种新的人种，他们的生命目标为的是消费，他们的向度（dimensions）愈来愈少，失去爱、恨、抗议、愤怒，也失去了流眼泪、同情别人或革命的能力。

为什么要提及这些事情呢？就是因为所有这些都与现代媒体有巨大的关系。

我们的电影、电视与广告业都在形构一种虚幻的人生。他们从有钱人、有消费能力的人，以及健康、漂亮、英俊、幸福的人的立场，去描绘这个世界。例如台湾的电视剧，明明角色是个公司小职员，但他的客厅总有我的三倍大，后面还有一个木做的楼梯，像《飘》那个电影一样，好过瘾啊。然后先生一定是英俊得不得了，太太一定是娇滴滴的，小孩则可以在院子里摘下无数的苹果……那人电话拿起来一开口就是两、三百万，好像两、三百万就是现实一样。

广告片呢，现在愈做愈好，抽开背后的意义，我还蛮欣赏的。例如洗发精，我们过去看的广告总是一个女孩把头发一甩，慢动作，然后告诉你那洗发精有多好等等，渐渐便老套了。可是最近看到的一个就不一样，它的包装不同，卖的是一种情调。那广告的对象是少女，所以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少女在发呆，然后老师走到她面前，她觉得老师来了，就留心，这是每个人都熟悉的。然后她就打电话，不晓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不把电话挂上去，由它吊在那里就跑掉了。她跟一个男孩讲话讲得很生气，啪的一声便一个耳光甩过去……一会又偷偷地在看情书，甜甜蜜蜜地笑……最后才一个产品大特写，告诉你这一种洗发精是“我们

的”，是“我们这个年纪的”，跟妈妈用的不一样。于是这种产品好卖到不得了。一个虚构的世界，就这样产生。

电视不断重复宣传，改造的力量就非常大。生活变成每天看电视，我们的小孩，更是这样，因为爸爸妈妈都忙着赚钱去了，而且把门锁起来，没事做唯有每天与电视见面。他们冷冷的对着荧幕，变得非常被动，有新奇的他眼睛亮一下，到第二次出现时又失去兴趣了。在这样被动的人生里，小孩从小就看见各式各样小朋友的广告，他们太早了解这个世界有很多商品是可以拥有的，太早了解有一种叫做“钱”的东西可以换到他所欲望的。他们从小就被塑造成一大批消费人的预备军。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

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瑶（我不作人身攻击）的那类小说盛行不衰？为什么那么多人关心股票消息？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跑马的消息有兴趣？为什么明星恋爱、结婚、离婚、再婚、同居的故事，永远引起人们不会疲倦的关注？为什么？如果只是这样还好，可是办《人间》的经验告诉我，别的消息就不能受到同样的对待。例如污染，若香港第一次发生污染，报纸也可能只给你半版或四分之一版来刊登消息，第二次再发生他要先去看看，看完说：“跟上次一样嘛，不报导。”到下次告诉他们又有污染了，很严重，还有人受伤呢，它们给你报导，再下次可能就要有人死才肯报导，然后又要死亡人数多才肯报导。所有这种社会底层的问题，他们都没有什么兴趣，最多只有一次被发表的机会。媒体有兴趣的，是苦难的商品价值，若遇上意外中有人快断气，那就得赶快拍下来，这样报社一定会登，标题还要强调这是断气前四秒钟的照片，报社给你奖金。因为只重视资讯的商品价值，他们已经对这种事情失去同情。我认为这问题是挺严重的。

美国三十年代有很多进步的报导摄影工作者，他们大多为逃避希特勒的控制，像许多科学家一样，由欧洲逃到美国，产生了像《生活》杂志（Life）那样的集团，聪明的罗斯福总统还利用他们去采访民间疾苦，例如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农村问题，好向政府汇报，于是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报导摄影者。日本也是一样，一九六〇至七〇年这个进步的

年代里，在反对安全保障条约这旗帜下集结起来的知识分子，有许多都跑去搞报导摄影，像我的朋友三留理男、高桥章三和樋口健二等，全属“安保时代”。那个时期，有志于摄影的日本青年十个有八个想投入报导摄影的行列，但一九七〇年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发展，这个比率颠倒过来，搞摄影的十个只有两个愿意继续参与报导摄影，其他八个都希望投入商界。报导摄影在日本及西方正在步向死亡。

所以，《人间》杂志出现后，引起了一些外国人特别深的感触。有些日本人甚至说要反输入，因为日本向台输出很多东西，但像《人间》这样的杂志，他们现在却反而没有。他们很热心地一有机会便到处介绍《人间》，向国人说：“你们看看，台湾竟有这样的杂志，你们能相信吗？我们日本人丢脸死了。”真的，这不是广告。

问题是，我们常常以为，在某些国家，媒体是自由的，言论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它有其客观的运作规律。例如在美国和日本，现在已经没有人看报导摄影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已经没有问题？恰恰相反，他们的问题不断增加，不断复杂化，但因为没有人看，已经引不起媒体的关心。很多富裕了的社会的人，已经不愿意看那些问题。他们想，空气污染有什么问题，把门一关开动空调不就好了吗？只要问题不在他们的后院，什么事情都好办。他们对富裕发展底层人的被害、自然的被害不关心，致使像《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及《产经新闻》等这样“先进”的媒体都对那些问题失去兴趣。这样就产生了很大、很值得深刻反省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媒体或者报纸看成是公器的话，它们是否适当地扮演这种角色，是很值得检讨的。在没有戒严法，没有出版法的条件下传媒还表现如此，这问题才是严重的。因为传媒和读者再无处可投诉和埋怨，是他们自己不愿意登，不愿意看某些消息的。

在过往以出版大部头书出名、以读书风气扬名的日本，如今比较严肃的杂志如《世界》、《中央公论》、《改造》已经没有人看，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揭露丑闻的偷窥的杂志，如*Focus*、*Friday*等，另外大行其道的是漫画。大学生从前走在校园还会在腋下夹两本马克思、托洛斯基，以示进步，这个还蛮不错嘛。可现在连这个也没有，他们看的是告诉你可到什

么地方打网球、怎样可把皮肤晒成棕色，好跟同学谈，有什么地方可与男、女朋友去怎么样一下子而又不被人发觉的杂志。

这就是媒体的社会控制，是媒体对于物质富裕化后社会精神贫困化所起的巨大作用。这点是很值得我们再思考的。

媒体不断在告诉我们，巴黎现在流行什么东西，什么地方又发明了什么东西，有什么新车出产了，新屋要出售了……它在创造一个“强迫”性、制度化的消费体制上帮了大忙。它虽然没有用枪指着我们，但在精神意识上，这无疑也是一种强迫消费。在媒体推广的各种商品的包围中，我们很难不受引诱。所以，我常常说，媒体作为一种甜美的社会控制，比十个警备总部还有效，而且不会引起任何埋怨。

媒体和意识形态的强制

第四个部分让我们来谈：媒体对意识形态的强制。这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谈，首先是报纸集团或者是杂志集团的意识形态。例如我们说那个报纸是比较进步的，那个是比较保守的，那个是国民党的，那个是某方面的等等，这是报纸集团在价值、政治和文化上采取的立场，每个报系都会通过其有力量、有效率的方式来推销、传播它的思想，意识形态，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强大的影响，这个我不必细说。另外一个方面对我们亚洲人，或者其他弱小国家有切身关系的，则是强国或者是强势的民族对弱势国家、弱势民族的影响。

我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我常常想起一个小时候的经验，觉得很难过，或者可笑，那就是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看西部电影。我们那时候的西部电影可好看，现在的电影还斯斯文文的演一段时间才开拳打架，我们的不是，我们的银幕一出来就是火车一直在走，人在火车厢顶上互相追逐，精彩得不得了，然后就开打，然后字幕完后，那个英雄就跑到一个小小的镇上来，镇上人知道他要来复仇，所以鸦雀无声，只剩西部的风在狂啸，笼子和纸张到处飞，那个瘦瘦的、很帅的西部武打明星在落日的小街上走，走着走着，只有脚步声，突然他目不转睛地，把枪一

拔，往上一摔，一个人就掉下来，你看过不过瘾！就是有人暗算他，他眼睛一霎就知道，枪又快，“啪”，就下来了，然后走几步，“啪”，又下来了。

总是有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很好心的骑兵，很虔诚的相信基督，然后在一次任务中捡到一个红番的小孩子，这个人是那樣的正直、蛮有爱心和敬畏上帝，以至于把这个红番小孩当作自己的小孩一样养大。可是凑巧引起很大的误会，原来这是个数代单传某个族的酋长的儿子，这个民族找了很久很久后，在这个白人人家中找到这小孩，于是全族来把这白人围起来，危机就在旦夕，那个善良、美丽的白人就跪下来祷告，希望上帝给他一个奇迹……我们小朋友都很紧张，认为这好人受到误会，可能快要被乱箭射死了。就在这时候天边一声清脆的号角，一看，哗，满山满谷的白人骑兵队来了，我们的小朋友干吗？全场掌声雷动，觉得好人来了，不得了，坏人可倒霉了。然后接着就不用说了，那轮盘式的机关枪一扫，所有红番们一一栽下来，血流成河。我们的小朋友又一次鼓掌。

这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一个小的事情，可是在东方黄色脸孔的小孩，很小便因为这个电影认为白人是了不起的，是好的，是敬畏上帝的，是美的、漂亮的，那红番就是丑恶的，凶恶的，野蛮的，食小孩子的，杀好人的——建立了这样的观念。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提醒我们去想想：当我们的资讯系统完全掌握在一些强国或者是强势民族手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担心？我们把理解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解释权交给少数的强势国家和民族。在台湾来说，我们总是搞不清楚那些各个地方的内战，什么反叛军，一时又反抗军，搞了半天都没搞清楚，于是相信那个跟美国亲近的就是好人，那个跟美国作对的就不是好人，像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我们可能对我们的社区，台湾小小的地区，例如鹿港发生什么事情，不甚了然；杜邦事件也不怎么了解，可是我们常常看到我们“亲爱的雷根总统”歪着脖子跟我们讲一大堆道理，解释他为什么不跟苏联达成限武的协议，然后我们又很了解在维珍尼亚州某个乡村里的老太太很喜欢收养小猫，现在已经有五十九只，最近又收养了三

只……。这些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很少看见蒋经国“总统”，雷根一出来，小朋友却都知道，就好像雷根是我们的“总统”一样。像这样的情形是挺严重的，我相信这种情形不只台湾如此，全世界很多弱势民族也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从小就从各种频道接受了这种以白人中心，以强势国家或者民族为中心传播出来的各种价值观念，渐渐便有人提出不要做中国人，要做国际人的问题来了。

总而言之，强势民族将他们强者的形象及世界观、生活方式、伦理观、审美标准……传播开去，令弱者也迫得要去适应。这不只是理论问题，我个人在采访的时候就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台湾的少数民族也面临这个问题。你不晓得他们原来的歌声有多么嘹亮，多么美啊，可是现在他们以唱那种歌为羞耻。他们唱什么？他们唱我们平地人编写的，烂得不得了的歌，什么“浪花的手啊，破碎的脸啊”，文字都不通的歌，他拼命一定要唱那个给你听，自己原来那种嘹亮、开阔、美的歌曲他们不要了，以至于价值都混乱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受到强者支配的情况，恰恰可以在台湾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汉人跟少数民族的关系中看得非常清楚。他们也看我们的杂志，读我们的书，知道兴安岭在哪里，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几个民族，不知道自己的语言，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此外，世界两极对立下的传播，也产生了很大很大的问题。为了宣传两个体制的优越性，双方会在传播的内容上有所歪曲，例如从说谎的方式夸大各自的优越性、积极性，其他如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侵略和反侵略的问题，两个体制也因为各自的立场不一样而有不同的报导，这就让夹在中间的我们这些小国家无所适从，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事情到底是什么一回事都不了然。两极体制对科技工作、对经济、分配、生产，以至教育、文化、思想的问题都起着很广泛的作用，其中传播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民众传播可能性的思考

跟着，让我来讲讲我对“民众传播”可能性的思考。第一，我认为

民众要介入作为大企业的大众传播是不可能的。前不久我们台湾搞过“另一种电影”，主要是觉得电影界拍出很多烂片。很多有才气的、有创意的人却没有机会拍片，所以提出这个概念。电影是一种工业，不像我们穷小说家，买两刀稿纸、四支原子笔到底没多少钱，我写了你不发表拉倒，我放抽屉里。拍电影是台币八百万、一千多万的事情，那个有钱的人会走过来对你说：“你非常有才气，我拿一千两百万给你玩玩吧。”当他给你一千几百万玩玩的时候，他看见剧本一定皱眉头，要求你加个钟楚红什么的，因为他就算不赚钱，最少不希望亏本，就是亏也不能亏得太多。所以只有离开这个原来的资本主义电影逻辑，才有生路。因此我们就主张，是不是在录摄机愈来愈便宜，机器愈来愈好，效能越来越好的时候，有理想的人可以以此来搞一些记录的东西，或者以电影机来拍短片和发展动画，这些都是我们这些自以为有才气的人可以走的路。如果你巴巴的请邵氏给你一个机会，大概没有什么希望了。

前面我已提过很多大众媒体的问题，里面存在着蛮强大的矛盾，那都是我们难以解决的。商业社会里的媒体，恰恰好是你我这种小百姓一份一份给它买，买成一个大媒体的，可是这个媒体却反过来背叛了我们，不站在我们的利益立场上，不为我们的好处说话，不为我们着想。这个问题就挺严重了。这个矛盾就像世界上一切的矛盾一样，理论上说一个政权是人民的公意所托付的，可是它成长起来后就跟你蛮不讲理，你拿它没有一点办法。大众媒体也是一样，你毫无办法。

第二个我想提出来的民众的机会在哪里？我认为，我们的机会在于创作好的、重要的东西。我不晓得怎样说这一点，主要是当所有大媒体对我们很傲慢，置之不理的时候，若要引起它的关心和注意，我们就要认真的想，认真的提问题，谈问题。如果是创作，要创作最好的小说、戏剧或者舞蹈……使他们无法忽视你。因为从市场价值来说，只要你形成有分量、够重要的组合，记者一定会来找你。《人间》杂志就有这种经验，有些题目他们没有找到，便态度也很傲慢地要求转载，但转载时又不提《人间》杂志，或只说某杂志，这个很伤脑筋。让你报导也没关系，但我们花了很多心血，希望搭你的便车，让更多人知道有一

本《人间》杂志，对这个故事有所交代。它不，理由还很冠冕堂皇：为免图利他人，助他人广告之嫌，可它根本是剽窃别人的成果嘛。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是全没机会的。民众是分散的，关键就是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就一个小的题目，在短暂的过程中团结起来，做好事情。大媒体因为大就傲慢、懒惰，我们应该不一样。我们要做出好的，有创意的事情，使他们无法忽略。

第三，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媒体，那当然是小型的。虽然刚刚讲的是在巨大媒体下的绝望性，可是小媒体还是可以在媒体结构上所谓非正式部门 (Informal structure) 里找机会，形成一个专业的，好的，品质令人信赖的小型媒体。它所索求的可能不是大量的群众，而是关心的，或者是读书的，或者是有理想的少数，至少可以借助这个媒体有个团结、沟通的地方。那么这就比没有要好很多。当这个初步的团结形成以后，它本身还会发展，所以这是个机会。但条件是我们要把小的媒体，例如杂志办好，别人为分广告而办，可我们不是，我们是有话要说，这样，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有主动、领导的性格，清楚自己要怎样带领一些人往某边走，另一方面也必须像现代商人一样，对现代的市场有所了解，对流通一定要有了解。杂志一定要办得好，而且里面常常要有最优秀的、关心的读书人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写得那么好，写得那么容易被人接受；它的图片是那么生动，然后慢慢有计划的在四五期、五六期里面，一期一期把声望打上去。我们一般办小杂志是凑着凑着，这期不错，有四篇文章，上吧，下一期缺一篇，怎么办？抄一段吧，或者到大陆偏僻的地方拿一篇充数，但这样的话，品质就会下降。你要像一个船长一样，你知道你要去的方向，知道你的航行日记，几月几日要到什么地方。

必要的时候，我觉得小众传播或者小的居民运动团体应该工作到让它的重要性引起国际注意。我这样说不是挟洋自重，而是许多问题，例如生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童工等等问题，也许我们这个社会真是这样的迟钝，或者还没有先进到了解这些问题，你与其他国家关心同样问题的团体取得联系，经过他们肯定，从国际传播回来，在某些洋奴买

办的社会，这样还挺有效的，也是个途径。至于在一个比较上轨道的国家，应该用好的工作争取一些国家或社会提供的条件，但不要乱用这些条件。

第四，对传播的批判也很重要。应该有些知识分子来谈一谈最近的电视节目，最近报导的方式，教育人民传播有什么问题。香港我不知道，在台湾，对传播的反省和批判很少。在日本和美国，有一群人专门在注意媒体传播的讯息，分析传播对社会、对人的影响。

最后一个是比较安慰的话，但也是事实：不要忽略小。世界上流传的东西往往是小的东西，例如《新青年》杂志吧，它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 *New York Times*, *Washington Post* 那样大，可是它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留下来了。往往就是很多小的运动，小的杂志，在我们的历史、艺术史里面留下来的。所以，不要因为它大，自己小，就觉得自己没办法，就冷嘲热讽地去大报去上班，然后回来喝啤酒又消遣两句，这个是比较不积极。

《人间》的经验

接着我来介绍一下《人间》杂志。首先，它是一个用文字和图片从事报导、记录、发现和批判的、反省的杂志；第二，它的宗旨是从弱小者的立场看台湾的人、生命、生活、自然和世界；第三，它是希望对台湾二十多年来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化或者是富裕化提出反省的思考和批评，想想我们究竟为这现代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有好多人对我说：你好像很关心社会底层的人，但你们的杂志那么豪华，不是很矛盾吗？这是革命青年最喜欢问的问题。我在台湾每次听到这个问题都很高兴，因为这种批评虽然是骂我的，但在台湾挺难得听到。在这里我的感觉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不晓得这是个怎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其实牵涉到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应该有先进的、进步的中产阶级，其他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当我们的学生还是只重享受、玩乐，国家事管他娘的时候，其他的问题就动不起来。所以必须要有开

明的、先进的、自由化的中产阶级，社会改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有希望。

另一个我感受到的，是编辑自主性和商业社会规律结合的问题。在台湾，唯管理论十分流行，像我初搞《人间》杂志，很多人就说：“这个家伙无可救药了，人是不错，但一定失败。现在给钱支持他是没有用的，等他垮了才帮助他吧。”他们连我的后事都办好了，因为他们觉得有理想的人总是不懂得管理。在这个商业社会里，人们动辄就讲行销、管理，他们把管理看成是一切知识的起源，哪有这种事？管理甚至不是一种知识嘛，也不是一种科学，只是生财有道、量入为出那么一回事而已。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工作者，一方面要理解资本主义社会里作为一个商品的出版物流通的整个过程与机制，可是也一定要保存一个文化生产者的自主性，他到底要对这个时代说什么，做什么。许多人却将这两样东西对立起来，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只要是讲理想的就是浑蛋、傻瓜，注定要卖房子，到时候要捐钱助他的那种人；另一方面又有些人认为只有傻瓜、浑蛋、过时的人才会做没有市场价值的事情，现在搞文化也是搞行销、管理而已，这两个偏向一定要纠正过来。其实是我们自己将两样东西对立起来的，事实上它是可以很好地结合。根据《人间》杂志的经验，至少直到目前为止我还能比较谦虚地说这想法是对的，以后就不知道。

此外，《人间》杂志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现场给我们工作者和编辑的教育。有很多人误会认为陈某人是很有爱心、特别关心社会、动不动就流眼泪的一个人，他在大家都没有爱心的时候把爱心当饼干一样到处发，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我和我的同事受我们所采访的题材和对象的教育很大。是他们教育我们怎样爱，怎样关心，怎样去面对人的生命的尊严。而不是我们像耶稣在山上把饼跟鱼一样到处分，不是。是他们分给我们，而且分得富足有余。我不能记述我们采访工作的经验给了我们多么多么大的、多么多么丰富的教育和启示。我想作为一个作家，或者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这真是一生难忘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职员薪金非常少，可是他们不愿意走。有很多现在在台湾是金字招牌

的某某杂志，他们的记者两三个月就不想做，想要过来《人间》。这可以看到，这个年头找寻意义重于金钱报酬的年轻人还是有的，这使我们很快乐。

我们在采访中受到教育的例子很多，我举一个有关雏妓的吧。台湾的雏妓，很多在思想和身体上都未曾成熟，却已要过着那么暗无天日的生活，这样的悲剧引起我们的关心。为了采访的方便，我们杂志派了一个女同事去。她回来以后，照例告诉我她采访的收获，与我商量商量要怎么样写。当时我已经很忙，就一边工作，叫她一边告诉我。她开始讲了，我没有看她，只耳朵在听，但突然间，她停了，我觉得奇怪，抬头望望，啊，她在哭！我就假装不知道，没有说话，我知道这哭对她非常重要。再过一会儿她还很激动，但却继续说：“到现在还不能忘记那些女孩子，我感谢她们。”我问为什么感谢她们，她说：“我听着她们的故事，总觉得那些女孩子随时可以跟我拍桌子，把茶泼到我脸上，问：同样是女孩子，凭什么我比她们幸福，而且坐在这里让她们把故事讲给我听。可是她们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还那么亲切、那么信赖我，把她们心灵最大的苦痛告诉我。”她说她采访时与女孩子们一起哭，她说经过今次的采访，觉得自己是真正的长大了。

另一个是汤英伸的例子。我们一直很关心这位山地青年被判死刑的事，可是等到最后高院判下来的是死刑的时候，我们负责采访这件事的年轻记者已经不只是同情，而是有点悲愤，他甚至怀疑我们把事情报导出来，使他们判这样的严刑。后来我们尽最后力量再展开营救，在短短几天里起起落落的，一会儿觉得有希望，一会儿又觉得没有希望，然后又……最后还是收到叫赶去领尸首的电话，于是我们陪汤老先生奔走汤英伸的身后事。整个过程中，我们的记者变化很大，对这件事又悲伤、又愤怒不平。

然后我们又与死者家属陪着成骨灰的汤英伸上山，参加了他们整个曹族为死者办的一个仪式。经过这事，我们的记者再又有了变化。他回来后跟我联络，问我要怎样写。我问他自己觉得呢，他说，他本来是要写什么什么什么，他找谁签名时他不答应，然后这是一个司法上的什么

问题，本来要找很多资料去“打仗”、去“攻击”的，但他最后在那个曹族的部落内看到他们的葬礼后，觉得已经可以超越所有的恨和不平，因为他看到整个民族那样庄严地面对这悲伤。他说写这个已经够了。

于是我说：“好，你能够这样想我就放心，不是因为怕警备总部来找麻烦，而是我本来就这样想。如果我叫你这样做，你可能就很不愿意，你会觉得，这个老板怎么样搞的，这个事情明明这样，你坐在办公室不了解却这么吩咐，不是妥协的修正主义了嘛。可是既然你自己这样想，那很好。时间紧迫，你用日记体写吧。”像这种事情，得益最大的是他自己。

所以，我要在这里说的是，事实上，并非我们在付出、奉献啊那么伟大，而是社会给我们的多。什么时候给我们多呢？是在我们到现场去的时候。在办公室、在教室、在漂亮的讲堂内大概没有什么收获。因此，我对于青年的朋友们有一个感想就是：不要把教室只当作是建筑物内的东西，听台湾来的这么一个在台上胡说八道，是没有什么用的。香港是这样小，我建议大家寒暑假去地下铁走一走，去什么地方住一段时期，跟某些人接触，带着问题去，晚上一起讨论，或者带着问题回来问老师，自己找资料……这样的教育，恐怕会生动活泼得多。而且老师也不限于坐在这里的人，往往在台上的人十个有九个半是浑蛋，包括我在内，所以应该去找那些小师傅啊，或者是贫民窟里面的老百姓，他们往往会给你很深很深的启发，这是我们《人间》杂志工作的一点经验，贡献给大家。你们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跟社会有接触，对这个社会比较有认识后，也许才知道自己应该学习什么专业，读什么对香港社会较有帮助，而不像过去那样，想着医生赚钱比较多、工程师也不错啊、建筑师也不错，就依此作决定。

给香港新一代的建议

最后，对新一代的香港年轻人，我有几点建议。

第一，把认识香港作为知识的开端。在面临着一九九七的问题时，

我建议从香港的殖民地历史搞起：当时这个历史是怎么一回事，然后香港社会的变化，社会史的研究。例如香港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香港文学史的研究，以至不同阶段的香港人民，香港社会的阶级分化等，都可以搞搞嘛。因为香港有其殖民地历史，你们或者会把眼光放在更远的地方——要到美国、英国去学习，但我想，从认识香港起头，可为你们的知识生活和文化生活取得更扎实的土地。

第二点，在这个整理的总结里面，我们应该做一点反省和批评：香港的知识分子过去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做得不足？多少年来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什么？在此面临一九九七之际，与其坐在那里埋怨、惶恐、巴结、奔走而没有更积极的作为，不如在这样的研究里取得自主性和自己定位的认同，如此工作起来，恐怕才比较有力气。

最后一个建议是要注意创造和发展。香港知识分子对台湾有很高的评价，我觉得很光荣。可是我觉得台湾有些问题，是与经济相关联的。台湾的经济是拼凑的工作比较多，例如机器进口后由我们做个铁皮便变成汽车。在知识生活上，我们也有相似的地方。外国有存在主义，我们也把它拿来过过场，然后外国有个什么玩意，我们又把它拿来过过场，哗啦哗啦的，热闹得不得了，但它根本没有坐台。我们没有把这个东西与台湾的具体现实联系起来思考，写出来的论文、文章也是读几本书拼拼凑凑的，还冠冕堂皇。我就干过这种事，例如《剧场》、过去的《笔汇》，甚至还没有读懂的论文都翻译得很过瘾，译完后还觉得自己好像有所进步。这种事情应该停止。这里我不是为谁作宣传，但我最近看到大陆一些比较注重思考的知识分子，他们不管水平怎么样，压力有多大，“自制率”是蛮高的。《人间》杂志勉强说也是“自制率”比较高的，例如照片都是我们自己拍的，很多文章都是我们自己去采访得来的，而不是抄书本、抄理论。在香港，个别的优秀的文化人也很多，可是我想是不是应该开始在小题目上搞团结了，年轻一代也要开始作准备，因为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十年以后你们就是人才。

今天还是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讲话，而且看见很多前辈来捧场，我觉得非常惭愧、不安，感谢、谢谢大家。

答 问

问：第一点，陈先生讲到传媒把假的说成真的一样，但我觉得，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纸包不住火”，你怎么看？第二点，你对香港社会，有没有注意到一种由高度自治变成自主的倾向，当然，高度自治是我们香港已经公认的，而且是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写出来的，但你有没有想到，怎样才能收回主权，保持繁荣以后还有高度自治？这个高度自治，是应该创造出来的呢？还是应该坐享其成？

答：第一个问题我很有同感，那位朋友提出了一点我刚才忘记补充的，就是说大众传播也有限制，有它道德上的限制，一旦破产之后没有用。我愿意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也是我为台湾觉得很高兴、很光荣的事。那就是上次的机场事件，因为那一次台湾所有大报都没有讲真话，只有一个《自立晚报》说了真相。一份销量只有两、三万份的报纸，却打倒了各自认为销量有百万份的报纸，使整个舆论转变，整个选举形势转变。

另外一个情形是小众媒体的产生，例如我们台湾的所谓民主运动也掌握了电子录影机，在各自选举单位里面有荧幕在播放拍出来的真相，这也在反抗大众传播的垄断上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大报并不是万灵药，特别在它过分违背真相的时候，它会垮的。也幸好它有这个个性，要不然这个世界没有希望了，是不是？

第二个问题你容许我不发表意见，因为我对这个问题不挺了解，而且这对于我这个还想回台湾去的人，是挺尖锐的问题，所以谢谢你容许我不回答这个问题。

问：陈先生，首先我想请问你办《人间》杂志有没有受到你年轻时候的宗教思想影响？第二，你认为台湾的民进党能不能解决台湾面对的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应不应该在这个场合问你，几年前，我在台湾听过你一次演讲，你当时对搞改革和社会参与似乎很灰心，你说只要搞生活就好了，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

答：第一个问题有很多人问过我。我必须说的是，我小时候曾经有过一段宗教生活，我的父亲一直到现在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恰恰好是跟着我的父亲，使我至今一直不敢看轻宗教，因为我看见我父亲的生活里有活的信仰。他每天祷告真的是向一个人说话一样，早晨谢饭时就说：“感谢你又给我新的一天，请你帮助我在这天……怎样怎样……”我在旁边听着也觉得挺感动的，感到一种宗教的力量。我个人在漫长的少年时期也于教会待过，后来因为自己思想的变化，以及觉得台湾教会的特别软弱，所以我离开了教会。最近有些教会找我，他们说我是“出走的教徒”。

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影响还是有的。最近有一位澳洲的学者，他把我所有作品里面的基督教成分写成了论文，我很讶异我居然写了那些的确是我说过话。所以，我料想大概童年那段宗教生活对我是有巨大影响的。台湾有些朋友说，你怎么搞的，老改不了，什么信、望、爱那一套。我想是的，大概是有影响的。

第二个问题是民进党能不能解决今天我们台湾所面临的问题，我的第一个答案是我非常虔诚的希望它能够，相信很多台湾和岛外的知识分子都跟我一样，因为它是历史上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第一个反对党，这是非常令人庆贺，而且寄以厚望的一个党。

可是，我必须说出我的一点忧虑，就是似乎这个党还挺不注意文化的问题。在我父亲抗日的时期，不只有政治的反抗，也有文化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等，这个党却不太注重这些，它不注重不是它差劲，而是台湾社会四十年来对哲学、社会科学或者教育等问题，是比较抑制，所以我们暂时还未有条件。我们的民进党跟国民党一样只注重选举等政治方面，对这些都不太留意。另外因为民进党阶级代表性的限制，它对公害、工人、对少数民族基本上是不很关心的。它跟国民党一样，在政纲中是有把保护少数民族、保护工人等条款列进去，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真的从心里关心这些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从社会科学来讲，他们是属于同一个阶级的代表，他们互相争得很厉害，但争的恐怕是政治上的席位和地位，而不是意识形态。例如工党跟保守党会有基本的不同，但

他们之间好像并没有这种基本的不同，他们同样是反共、拥护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这套……大概是这样吧，我想这个说多了就变成我在海外攻击民进党，就不太好，但我真的没有攻击的意思。

至于第三个问题，我可能讲过那样的话，我想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台湾工作有时候很疲倦，有时我会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用，我就什么都不想做了，只想好好睡一天的觉，谢谢你提醒我。那恰恰是我最软弱的时候，我这样的时候蛮多的，所以不要误会我是个“大力水手”。谢谢你。

问：你认为台湾是不是一个民主社会？

答：一个社会是不是民主，恐怕这在学术上是要具备某些条件的。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其讨论它客观上是不是一个民主社会，不如说我具体地感到了这个社会巨大的变化：有很多过去说了、写了非被抓起来不可的话，现在说了、写了就不抓；很多事，例如“五一九”事件，以前相信决不会只这样把他们围起来就算了，现在却是这样便算了；一边说不能组织反对党，但它组织起来了，也没有抓；或者说，现在已经开出一个具体的行事历，说要开放报禁，要解开党禁，我们就这样等待着……我想，毫无疑问地，台湾在最近一年多来的民主化步骤，虽然是由上而下，但是非常巨大的，巨大到有时候我们还不能理解它的意义。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若按照国民党过去的一般逻辑来说（现在我不是攻击它呀，请在座的同志要注意听），它绝对还没有到了非让出这自由不可的地步，它还没有到了马可仕面对菲律宾“人民力量”那样的地步，就是说：好多千万的人上街，然后坦克开来，他们在坦克面前唱歌、丢花朵；或者是农村破产，大量人口集中在马尼拉；知识分子没有出路、痛苦、烦闷等。我可以断言，如果民进党宣布组党那一天，政府啪一下就抓去两百人，台湾该娶媳妇的还是照娶，该嫁女儿的照嫁，吃饭的照吃，该跑三点半的还是会照跑……我这样讲不是说国民党恩重如山的意思，但客观来说，国民党只要不允许，是有条件再阻止一次的，但它没有这样做。我想，这是显示出它的力量，它的成熟。

我不希望我说这些话是为国民党张目，但我应该说些公平的话。例

如像我有这样的政治记录的人还可以自由办杂志，有问题还转弯抹角地叫我下次不要再做，这对我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过去只是读点书就被关了七年，这个差距对我来说是很亲切，很现实的。

问：第一，请问你对《中英联合声明》有什么看法？第二，我们香港这里大部分的民主人士都希望维持资本主义的现状，你对此有何感觉？

答：第一个，我很惭愧很惭愧地说，我没有读过《中英联合声明》。我不晓得这是什么时候发表的，最近吗？台湾没有……

问：声明的主要内容，是香港可以维持资本主义现状五十年不变。

答：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你们怎样看，才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在台湾，而且我应该不是那么傲慢地要来表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过，我还是不晓得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试着说：与其讨论这个声明有没有意义，不如尽早动员香港人民自己的主动性、自主性，自己找到自己的历史定位跟身份的认同，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这恐怕比问一个来自台湾的人怎么看得重要，是不是？我这样不是逃避问题，我是真的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最悲观的看法是我们的努力到时还是没有用，不过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不作此努力，工作反省和自我批评，或者不重新去面对历史和自己的话，那是肯定没有前途，只能埋怨，或者到时候到英国去，但如果我们做了，可能一样没有用，但这种没有用对我们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心里有个底子，将来我们还有机会说话。而且，若真正能够代表香港的人民发言，有很多意见，这极可能会有用。这是我的看法，可能有点文不对题，可是一定要请你原谅，因为我对这不了解。

问：第二个问题呢？

答：我想这跟第一个问题一样，是不是？

问：你说，要先有一个自由自主的中产阶级力量，社会改革才有希望，那你看看台湾有没有这个力量？如果没有的话，该怎样去建立或培养这个力量？

答：这个问题台湾跟别的社会不一样。台湾社会有个比较大的特点

就是，一九五〇年以后，它被编入全世界二体制对立下的最前线，它又是个“岛国”，所以冷战的结构性价值观念，统治了台湾相当长的时间。这个冷战结构下的所谓自由世界思想体制，就是反共；就是美国作为老爷的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繁荣发展那套。这些观念有没有问题是另一个问题，但离开了一九五〇年这么久的现代中国人民，应该有智慧重新按照我们具体需要的立场，去面对整个冷战的价值观，而不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世界”的体系，我们就毫无疑问地接受它。因为这个结构的影响，我们的中产阶级一般是比较弱的，相信香港也有同样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一九五〇年后，我们的文学、文化跟香港颇有交流，很长期都是加工出口的知识活动比较多，自制率低，也没有联系到台湾或香港具体情况来思考问题或者搞创作，可以说，我们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是比较弱的。

可是，我想，上面讲的话是有点冒险的，冒的不是政治的险，而是判断的险，就是，忽然之间我们觉得好像有点意义。这意义不只是我们感觉到，海外也一样感觉到。

首先，为什么《人间》杂志会产生，而且受到那么大的注意？为什么？在一个富裕化或者物质化那么厉害的地方，为什么《人间》杂志产生，而且能够存在、被接受，并获得一定的评价？第二，《当代》或《文星》那样的杂志在一九五〇年末期以后经过二、三十年的空白，为什么现在又会产生？虽然它们的读者不是很多，但是为什么还是有一定的读者，包括你们香港的读者，等待它们每期出版？为什么？有人在问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我想这个时候做答案恐怕是很冒险，但这个现象值得我们问。第三，台湾的大学生在战后四十年的今天开始在动。怎么动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可能是美国的学界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参考书设计了一些比较所谓前进的学术著作，例如他们也开始读一些像马尔库塞等人的东西，虽然基础不好，半懂不懂，但总是产生了一些词语上的变化、语言上的变化、思考方法的变化，和具体地在各大学之间有一点微弱的变化。例如学生开始搞地下刊物，开始要求自治等。而更重要的，是当局对这些没有采取断然的抓人、审判等事情。这一切都很值得

我们去想：可能它是一个开始。这是我的回答。

问：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现代化所要付出的代价。我看过例如以台湾为主的《人间》杂志及一些小说，都对这个问题有所反省，但在香港，我就觉得反省没有来得那么深刻。我希望陈先生就在台湾看过的香港小说、香港电影、以至这几天来到这里短短几天对香港的印象，谈谈你对香港现代化所付出代价的体会，好作为对我们的一些提点。

第二个问题是我在浸会学院听陈先生的讲座时，你提到我们要对殖民地化过程带来的社会文化转变作出反省，于是我想到我们今天看报纸上大谈政制改革的时候，常常会说香港已进入一个过渡期，我记得七十年代末期有人提出非殖民地化，但似乎这几年我们都不再提及这个名词，现在陈先生重又提出这个问题，我希望你能比较详细地解释一下我们可以在对殖民地化过程的反省中做些什么？

第三个问题是我看了一份报章对陈先生的访问，你在那里提到政治运动跟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化、思想和文学运动并进的关系。我知道你是从台湾的经验出发，但我仍希望你解释一下这个关系，使我们在今日讨论政制改革，但可能忽略文化思想方面启蒙的情况下得到启示。

答：我很遗憾听不懂她的广东话，她讲得很好听，使我觉得广东话是好听的话，我只听得懂“深刻”、“睇报纸”……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请不要把我看成好像一个专家似的，以为我能为你们解答很多问题，那是绝不可能的。其实我走在台北街上还没有人理我呢，不会像现在这样子。对于这个问题，我目前有的唯一印象是香港的资本主义文明远比我想象的还要高、还要精致。在中国人建立的资本主义地区中，从我表面见到像香港这样一个“建筑”跟一个“建筑”之间的关系，它的效率，以及彼此的关联；这么一个大的机器运转的时候，人民也遵守这个机器运转，从这个情形来看，香港的资本主义是远远超过台湾。台湾有点乱，软体硬体间有点矛盾。可是我也想过，香港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恐怕问题也不少，所以我第一个感受是有可能的话，香港也应该办本《人间》杂志，应该发展摄影报导。在大众传播

媒介以外，应该去看大楼高厦阴影底下的现实，否则香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比台湾用番话说是更加 Spectacular，太过目迷五色，真是不得了。

几乎可以说，所有现代化过程都会带来一些被害的问题，不论日本或是各个地方。我想，既然香港的中国人民有能力建造这样一个物质文化的话，我相信他们应有更足够的力量暂停下来，回过头，反省，找问题。这绝对不是难的事情，不必要我来提示。只要大家带着这样的反省态度到各角落去看，不要看表面的、比较虚构的，而是到舞台背后去看，一定会有收获。到后台去看并不是要揭发黑暗面，绝对不是。当我们关心黑暗面的时候，恰恰好是我们对光明有很深刻很深刻的信念，不愿意放弃对光明的信念，所以我们才关心跟光明对照的黑暗，对不对？如果我们专门去找一些问题，或者不公平的事情，恰恰好是因为我们对于公平的“饥饿”还没有“死掉”。所以应该去看。我相信以你们香港人民能够建设这么了不起的文明，一定更有智慧去看香港繁荣已经付出了的人的代价、自然的代价、文化的代价。我相信你们能，一定能。不要说一个台湾来的老头子能给你们什么指示，绝对没有这回事。

第二个问题我就很抱歉，因为我对香港的情形不了解。如果我作为一个台湾来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九九七年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对不对？那么，香港过去的一段历史就要结束，不管说那是殖民地也好、新殖民地也好、半边睡地也好，名词并不很重要。问题是我們是不是应该停下来回顾这段时间，香港与中国的关系是怎么样？英国人怎样介入？香港有什么发展阶段？我只是觉得，面对这么一个巨大的历史时期，反省和回顾是必要的。而且这个反省和回顾，是需要有一点品质的，要从社会学的观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从历史的观点、从文学的观点、从生活的观点、从各方面去看，就好像我一直觉得大陆的“文革”应该也有这样的反省一样。该从各个角度，从心理学的观点、从人类学的观点、从文化的观点、从社会学的观点、从共产党本质的结构等各方面去看这个所谓浩劫的十年。

我想这样的回顾是对任何人都有意义的，这样才能够积累。香港人对历史作出反省和回顾，至少可以有两个目的。第一可以知道自己的定

位，知道香港的中国人民在整个中国发展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第二是香港的中国人民身份认同的问题，到底我是中国人？香港人？还是在香港的中国人？还是什么都不是？我应否独立？这样厘清以后，对前去的道路会有帮助也说不定。不过，千万记着这只是一个外来人很肤浅的建议，可能会有很大的错误，只不过因为我用我的诚恳报答你们对我的热情，所以我把我心里觉得应该说的话说出来，只能作为参考之用。

第三个倒是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向来的抵抗运动都不是片面的。例如甘地吧，甘地绝对并不只是饿了肚子跟英国人作战，他的饿肚子、自己纺纱的本身，就有非常非常深刻的文化和思想的意义在里面，如怎样促进印度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团结，怎么用爱而不是用恨去报答压迫者的拳头和枪刀，这些背后都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及宗教背景。政治只是一种行动，它是整个文化结构的组成部分，所以所有抵抗殖民地的运动都不会只是打游击战，或者是在政治上的反对；它也会发展成文学运动、戏剧运动、思想抵抗运动，台湾的抗日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不只是有一些人在搞党外，或者对日本人丢石头，它有台湾民众党，但也有台湾文化学会、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在各个不同的角落和范围用作品、用戏剧、用艺术、文学、思想抵抗运动，作为整个被压迫人民的对抗。只有有文化背景的抵抗运动才有生命。如果面对有武力、有强制力的支配者，你赤手空拳跟他搞大概不行，我想被压迫者所依恃最大的力量，恐怕一个是知识，一个是道德。因为知识比较高，道德比较高，所以那个瘦小的名为甘地的老头子，只要饿几天，便使大英帝国的统治动摇起来，他凭什么？不是因为他登高一呼，有几千万红军出现，不是的，而是因为他那道德的力量，爱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使他的挨饿引起全世界注目，不得了。这就是知识、文化、道德或者宗教的力量。

问：陈先生，你是一个文学家，而可以这样说，文学是反映社会的问题和现实。现在中国共产党想跟台湾国民党再来一次合作，出现了台湾的前途问题，你可不可以用你的“文学眼光”，来看这个问题？

答：我觉得很快乐，因为忽然间我发觉我在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不过，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挺公开的。恰恰好承蒙你抬举说我是个文学

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所以我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文学家，首先，他所关怀的中国恐怕是比较抽象的，例如我认为中国这样一个概念，是联系着它长远、复杂的文化、历史或者文物的；想起中国时，我们会想到一大堆中国的事物，它的出土文物、它的诗词歌赋、它的历史、它的人民怎样创造出来的文明。因此我们不能说，当我们讲到中国的时候，唐朝才是中国，元朝不是中国，我不要；清朝更不是，那是满洲的，汉朝就过瘾，好，这是我们的中国。我们对中国的概念，是超越比较短暂的政权理念，所以在这基础上，我基本上明显主张中国是一定要统一的。除了上述的理由外，我觉得中国的分裂，跟我刚才说到两极对立的世界战略有很大关系。我们中国没有道理按照别人的战略来分开，要分开我们可以重新想想，到真觉得要分离再分离也不迟嘛。这个问题不解决，为什么要分开？至于说两党之间怎么弄，我觉得我现在没有足够的知识发言，也不便发言，不过我要深切地提出一句话，就是不管怎么样统一，一定要把中国人民放在他们心中。没有中国人民同意、欣然接受，或者是热情欢迎的统一，我想对两方面都没有好处。这是我的看法。

问：刚才陈先生说到一个是宗教的力量，一个是文化的力量，但你前面也有提及，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不同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宗教、文化是否还有力量？

答：我们就以两个例子来谈谈这个问题吧，一个是波兰的例子，一个是菲律宾的例子。关于波兰团结工会的故事，当然一方面你可以说波共真是蛮了不起，它没有像史达林一样说这些工会中人是受帝国主义收买的反革命，然后派军队把这些人拿去枪毙。但另一方面我看到的是波兰工会后面的力量，那不只是有道德的力量，还有教会的力量，以至波兰一些前进的知识分子、戏剧运动家、文学家、电影导演等站在后面所引起力量的张力。

另外一个菲律宾的所谓“人民力量”(People Power)。当然我对“人民力量”没有很高很高的评价，可是对我们来说，这是有一点东西的：是什么力量，在一个统治者残害了像艾奎诺那样的反对派以后，使愤怒的火焰燃烧起来推动菲律宾那么贫穷，看来那么落后的人民唱着

歌，然后就是那样成群结队到街上使枪炮软了，使刀枪钝了，使统治者乖乖交出他的权力，然后临上飞机的时候还骂他的老婆：“都是你啦！”这是什么道理？这当中一定有一个力量。

还有像黑人解放运动中，马丁路德·金引起的力量。据我在美国的朋友告诉我，这还不是长远以前的事情，他使得黑人的处境好了很多很多，虽然目前还存在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我不能正面告诉你这个道德的力量还有没有用，而且你的议论也是非常有理的。与其给你的问题一个确定的答案，倒不如让我们更多的人愿意去相信，当赤手空拳的人民无所凭借的时候，我们手里还有一个力量，那就是道德、知识和文化。否则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没有希望了吧。

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陈先生你提到关于自主性的问题：为什么《人间》杂志的目标不是希望每一个阶级都关心自己的问题，而是将希望放在中产阶级身上？这会不会是个矛盾？另一个问题是，我想在座的大多数属于知识分子或中产阶级，但他们的的问题很多时候都反映出他们并不太有自主，他们总将很多的香港问题拿来问你这个台湾人，你会不会觉得这现象跟你刚才强调中产阶级应该自主这点有所矛盾？

答：第一个是挺好的问题，也是常常令我为难的问题。我想，我们也看到，甚至亦有一种理论提出，真正的力量来自人民，不只是中产阶级，甚至不是中产阶级，而是广泛的劳动人民，才有改变社会、创造历史的力量。实际上，这个问题我想分开两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是我刚刚忘记讲的，《人间》杂志有一个态度，就是关心民众的历史。我们为这个时代去采访、去看、去记录、去批评的，恰恰好是这个时代民众的历史。我们报导的，不是那些中产阶级，那些每天在俱乐部进出，或者挥霍千金的那些人。我们所报导的，恰恰好是这个时代的民众历史，以及民众眼睛所看到的台湾。

可是它为什么不诉诸民众？我并没有禁止收入每个月八千块以下的不能购买《人间》。可是实际上它的售价，以及它的设计的问题，阻止了这些比较低层的劳动人民的参与。这是有道理的，是因为我们的社会

在分工上已规定了这种不平等。我不是赞成这种不平等，但我们分工愈细密，我们广泛的劳动者可能一辈子要重复做最简单的工作。像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一样，每天都在搞相同的工作，他不是“傻子”也会变成“傻子”。他没有办法接受文化，没有办法思考，没有办法去想，这是制度造成的。可是却有一批人被分配成为看比较全面的，例如他若是监工，那就好一点，他知道整个流程是怎么样，一个经理又不一样，一个总经理就更不一样。所以这个社会原来就是这么不公平，被分配到一定水平的阶级上的人就掌握了比较好的认识这个社会的地位，可是恰恰好这些人是为了维持这个秩序而存在的，因为他们没有反省的力量。但当他们接受这个东西的时候，首先是要表示他要背叛他自己的阶级。这些事情很多嘛，例如在王公贵族以他的背景和出身为羞耻的，像托尔斯泰认为自己拥有那么多财产是一种羞耻，拼命要把它们分给农奴，他老婆不答应，于是两夫妻常常吵架。所以，是要由这个阶级的觉醒，然后由这个阶级到民间去，去帮助崩坏的这个体制，才有希望。

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强词夺理，但这是我的理解。在辽阔的第三世界有很多大学，都是激动的东西，例如马尼拉大学、以前的东京大学、现在的汉城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很多很多都是改革者、革命者的温床。这些人的出身难道是农民吗？我想不是。他们一定是律师、地主……中国过去的历史也是这样，很多例子都是地主的爸爸弄不清楚儿子为什么搞这个东西。这些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首先有机会觉醒，然后他才到民众里面去，最简单的如共产党吧，像俄国的民粹运动就是一个很大的例子。

我这样讲不是说农民和工人都是傻瓜蛋，不能负起改革的任务，而恰恰相反，是要当所有中产阶级的心跟你所说的农民等同时，这个社会可能才有希望。这就像沙特为一本书写序时所说的一样，白人最大的问题是必须面对黑人的愤怒，必须让心变成黑了，在一个黑人对立的暴力中看到白人所作的罪恶的时候，白人才得到解救。就是一方面黑人需要革命，二方面是白人自己的变革，才能使革命成为可能。你的问题蛮严厉的，我希望我没有说错话。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想所谓对中产阶级的寄望，只是……这样说吧，恰恰好是我们台湾中产阶级反省不够，所以这个杂志出来以后引起他们的惊异。当然我们不是像传教那么顺利，风起云涌，人手一册的。问题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我们看到大家的惊异，他们的认同，与我们一起流泪、一起愤怒、一起感谢，当然也有些人是骂我们的。正好是因为我们大家不关心，所以需要来提倡关心；另一方面，我们不关心是有很多客观的理由，对不对？因为香港战后整理思想、文化价值的结构，因为它为自由港、殖民地、半边陲地区等的条件，都规定了我们不太关心这些问题。

我们《人间》杂志也是逆流而上嘛，因为所有媒体都不这样做，我们这样做。逆流本身就是说明有一个顺流。

我一点都不享受你们这样把所有问题要我来解决，不过我也并没有因为这样而觉得你们很差，我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是来自一个同样彷徨、大部分人不关心问题的社会，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并不是很特别。我刚才所说的自主性问题，是从现在开始，我只是建议，我们在面对九七问题时，是不是与其无奈地面对这个历史时期的结束，不如我们能自动地、积极地去回顾、总结香港的历史。这种总结可能会有帮助，可能为我们找到一个历史位置，另外找到一个可以认同的“身份”，两样合起来，也许可以做点事情也说不定。请不要认为这是个指示或什么的，绝对不是的。

今天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吧。

(林瑞含整理记录)

第五辑 | 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

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首先，我要先感谢我素所敬重的胡秋原先生方才一番透彻而极有见地的题解，和对我个人过誉的介绍。在胡先生主持下做这个演讲，是我个人莫大的荣幸。

今天，我的讲题是“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要做一些说明：

首先，去年获准出国到美国爱荷华大学所属“国际写作计划”三个月，有一点体验。今天的讲话，是就这个体验的一部分，向大家做一个报告。

其次，相对于已开发的富裕国家近十几二十年来在文学、艺术、文化和哲学上明显的贫困和无所生产的情况相较，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难深重、社会破产、民穷财尽的处境中，却在文学、电影、思想和宗教上，都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尤其在文学和电影上，就我在美国所看到极有限的作品而言，已足惊人。这些文学和电影，不但在主题上是强而有力的；是充满着对人的深刻信念的；是充满着对于建造一个合理的人间世界充满着坚定信念的，而且，在艺术表现的技巧上，因为技巧结合了对于人的高度理念，是动人的，杰出的，甚至是堪称为伟大的，很深刻地触动了我们的反省和思考。

再次，我曾多年来主张注意第三世界的文学、文化和思想，引起一

* 本文刊于《中华杂志》(台湾)第二四七期，一九八四年二月。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八·鸢山》(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

些争论。这争论中，有的是故意曲解，却也有人出于误解，甚至出于缺乏世界文学的知识。对于后者，我也想借着这个讲话的机会，做一些说明。

最后，题目中的“中国文学”，多半要谈台湾文学。这是因为我素来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因为谈到战后亚洲文学时，我对于中国大陆上的中国文学的发展，所知太少，不敢并论，因此，谈我较熟悉的战后台湾文学的发展，自然就比较多些。

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比较

在比较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文学的异同之先，先做两者在社会发展、经济情况上的比较，不但有其必要，也很能帮助我们理解今天所要探讨的主题。

从表面的、现象的层次来看，台湾的社会和经济，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与经济，有十分明显的差别。

台湾的国民平均所得，依据统计，高达美金两千五百元或以上。相形之下，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平均国民所得就低得多，有的只在三百美金上下。因此，社会的贫困，在台湾是属于慢性的，不可见的贫困，和其他第三世界社会中普遍、“急性”和可见的深刻贫困，有本质和数量上的差别。

就国际借款来看，台湾的外债债负，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中，是外债最小，情况最好的少数地区之一。但也不要忘记近年来债务增加速度的快速，和再过去三、四年就面临要偿还债务，从而对国民经济发生一定影响的事实。相形之下，若干国债深重的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菲律宾和南韩，国债之大，令人瞠目，几到了国家破产的边缘。

就外国资金的支配上来看，直接在台湾设厂投资的资本，在台湾总的资本中，占着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之间。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外资在整个资本中，占着高达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比率。在台湾，外国资本是通过规定台湾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角色，使台湾以自己的投资和

生产，依国际市场中买来转售者的需要（规格、数量、品质）而生产，成为各先进国自己中低等工业生产部门在台湾的延长。但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中，外国资本直接投资设厂、开农业庄园、开矿的比率极高，直接的、高额的榨取也深刻得多。

因此，台湾形成了加工出口工业结构，以低工资、高度劳力密集的性格，展开二十年来台湾社会依赖的资本主义经济架构。在出口品上，农产品和矿产品比率很小，初级的、中下级工业产品占着出口大宗。相形之下，其他第三世界则在国际分工中被分配了矿业和农业生产的角色。出口品以原始的矿物、农产物为大宗，以与先进国进行不等价交换。因此，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大小和向国内回流的程度，台湾远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大得多。

也因此，台湾达成或几近于达成“充分就业”。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因为外国庄园的扩张、传统农村解体，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涌向城市，而由于工业落后，城市无力吸收大量离地流亡的农民，形成庞大而无从解决的失业与贫困。

综上所述，若从国民所得、社会分配、贫富差距等几个表象上去看，台湾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地区差距之大，真不啻若干第三世界社会与先进国家社会的差距。

但是研究经济生活中支配和受配的关系，基本上，应该从资本、技术和市场三个基本方面去看。而如果从这三个方面看，即从世界范围的生产诸关系去看，台湾，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完全处于相同的被支配、榨取和控制的地位。

先说国际金融资本的支配。

自从美金公开地脱离了和黄金间的保证价值关系，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外汇储备，成为美国对各国的借据，形成了美国只要印钞票，就可以取得国际买卖、投资、借贷而来的利益。美金的贬值，也形成一种榨取。此外，以美金为主的国际投资和贸易，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进行直接和间接的盘剥。一般地，在国际上受支配于美金经济关系的，包括台湾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地区，同样受到国际银行团的支配。

其次，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地区，同样在技术上，居于受支配的地位。

科学技术固然因为需要庞大的资金和长久的知识和技术的积累，所以长久以来受到先进各国的垄断，但穷国只要有决心和信心，在正确的决策下，自力更生，花二十年、三十年工夫，力求发展，是可以建设符合自己需要的科技架构的。但是，长年以来，由于除了最精密科技外，整套技术、设备、知识，都可以向先进国花钱购买，使汲汲于迅速在经济发展上“翻”几“番”、走捷径搞工业的穷国，没有耐心发展自己的科技，花大把钞票，去购买现成的西方科技和设备，不但产生许多不适应和错误，而且基本上影响民族科技的生根与发展。

世界科技中心在先进国。因此，产生了世界性的科技的“向中心”改造。许多穷国的为数不多的科技专家，习惯于用先进国的语言思考，以“科技中心”的科技问题为问题，只关心和研究“中心”有兴趣、“中心”所拨出经费的科技问题，而无视于自己民族所现实需要的科技问题。穷国的科技学校，采用先进国的教科书，用别人的语言，教授别人关心的问题。落后国的学者专家用先进国的语言写研究报告，争在先进国而非本国的期刊上发表；穷国花费了人民巨大的血汗钱，买技术、买工厂、设学校、派遣留学生，但自己的科技却长期建立不起来，长期成为西方“科技中心”的附庸。

派遣留学生，向先进国学习科技，一般地并不能十分改善这种悲哀的情况。留学的过程，其实是留学生的“向中心”改造的过程。学成后，留学国的优渥待遇，理想的研究环境，使留学生滞留不归，结果自己的人才为先进国所用。有的学成回国，但因为经过了“向中心”改造，对祖国的落后情况不满、不耐，成了一种“回到自己故乡，却发现自己是外国人”的特殊人种，终于投入设在各穷国内部的多国籍企业，为他人所用。有些留学生在回国后负起本国科研、经贸机构的领导责任，也因为“向中心”改造，而成为外国技术、研究、投资的买办，对自己国家科技的独立发展，不但没有帮助，反有阻害。

第三世界和先进国在科技上的差距，从下面的统计可以窥见。占人

口不到三分之一的先进国，在全世界科技研究发展的总花费中，占着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的比重。换言之，占着全球人口三分之二强的落后国家，几乎没有钱可以搞研究发展，因而无法发展自己的科技研究。科技的支配和被支配的构图，极为明显。随着电脑的发展，而发生先进科技积累和发展上相乘相加的效果，第三世界和先进国的科技差距、以及以这差距为基础的科技垄断与支配，可以说到了变本加厉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台湾所处的在科技上被支配的地位，与其他第三世界毫无二致。台湾所略胜于其他第三世界者，是“技巧”、“技艺”，而绝不是“技术”。

再次，谈到市场的垄断。

先进国资金、技术的垄断，自然形成对贫穷各国市场的垄断。在世界分工、国际生产诸关系中，后进国被派予和被指定去扮演先进国所规定的角色。有人在世界分工中，扮演着农夫和矿夫的角色；也有人扮演着电子工、纺织工、初级机械制造者、日常中低级消费产品制造者等角色。他们不是独立自主地从事生产，而是按照别人的订单中预先规定好的品质、规格和数量去生产，而发展出有高度依赖性和受命性的工业体系。他们的市场，是进货的卖者的市场，而不是直接诉诸他国消费者的买者的市场。因此，有人以目前第三世界的“订单工业”和“加工出口工业”形成的社会，为“分厂社会”，以说明若干第三世界工业无非是别的先进国中下级工业生产部门的“分支”部门，成为别人附庸的性格。这又恰好和十九世纪殖民地的“庄园社会”，形成对称的结构，表现出两个不同阶段的殖民主义和殖民地不同的构造和性格。从这一点来看，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是处于完全相同的地位的。

最后，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共同点，是在于以跨国性企业全球性活动为基磐的营销活动中，同处于文化解体、生态崩溃、精神荼毒的过程中。国际银行集团的形成，在现代传播科技上不断精进的传播技术之形成，以全球为范围的营销管理知识的快速发展，对于阻碍国际商品销售的各地传统文化、价值系统，进行空前的侵蚀、解体和改造的过程。另一方面，随着先进国本土资源和生态保护政策的发展，一些高度资源

耗费和生态摧毁的工业、技术和产品，大量涌向辽阔的第三世界，造成巨大的灾害。除此之外，文化传播的垄断，教育、知识和文化的“交流”计划，长期制造了第三世界人民失去民族自信心，依强者的眼光解释世界知识，对自己的社会、历史、政治产生鄙视怨毒等精神上的毒害。最后，为了保护日益扩张的跨国性大企业，抵抗第三世界人民汹涌的民族主义抗议的浪潮，先进国通过国际特工、贿赂、腐化和镇压，为第三世界各国制造长期的颠覆、政变和内战，使一些穷国处于连年的战乱、饥饿、恐怖和混乱之中。在这个情况下，台湾在不同的程度上，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命运和地位，是完全一样的。

总而言之，若只从国民所得，从贫富差距等方面来看，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有十分明显的差距。但如果从世界分工和国际的生产诸关系去看，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共同处于被先进国家在资金、技术、市场和文化上支配的地位。

台湾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的共同点

台湾在社会、经济条件上与其他第三世界的共同点，和它们自十六、七世纪以来直到战后世界发展的历史中，有共同的命运和经历，是有深切关联的。因此，在台湾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十分令人惊异的共同点：

在台湾的现代中国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现代文学一样，是作为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文化启蒙运动之一环节而产生。

在中国，著名的五四运动，是源于当时在列强压迫下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运动。为了唤起民众，提高民众的文化和知识以对抗强权，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的自由，以鼓吹新思想为主要课题的思想启蒙运动，成了运动的主要方式。在这广泛的新文化、新思想启蒙运动中，提出了文学的改造问题，主张以大众能懂的白话从事文学创作，以相对于只有少数读书人能懂的古文写成的、传统的士大夫文学，从而诞生了中国的现代文学。这个五四运动，给予当时日本殖民支配下的

台湾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冲击。白话文运动、新旧语言和文学的论争，在台湾泼辣地展开，并且在创作实践上产生了赖和等人杰出的抗日民族文学作品，在台湾的现代中国文学，遂宣告了它的诞生。

在菲律宾，十九世纪末叶菲律宾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伟大的菲律宾爱国者和文学家 Jose Rijal 发表了 Noli Me Tangere。这是写于当时反西班牙殖民主义的启蒙运动（非史上称为 Propaganda Movement）中、描写西班牙在菲殖民统治的苦难和腐败的第一本现代意义的小说。在这本小说的鼓舞下，菲律宾人不但觉醒，并奔向民族独立的革命，并且也宣告了现代菲文学的产生。一八九六年，反西班牙的菲律宾民族革命爆发，产生了一大批以菲语（Tagalo）写作的作家，成为第一代以民族语言写作的菲律宾民族文学作家，也成为一九七〇年以后菲律宾文学回归民族与乡土的运动中重要的启蒙。

在长期荷兰殖民下的印尼，要等到二十世纪初叶，一批留学归国的印尼青年知识分子，才开展反帝救国的文化启蒙运动。一九二八年，他们发表了“青年印尼知识分子宣言”，在许多政治、社会和文化内容中，喊出了一个口号：“一个民族，一个语言”，要求在两百多种印尼地方语中，设定一个共同的民族语言，以利建设一个独立而统一的印尼民族和国家。而在这民族语言建设的呼声之中，印尼文学家热烈地起来，抛弃荷兰语的文学，改用自己人民的语言，写出不少佳作。而现代印尼文学，也于焉产生。

综上所述，诞生于反帝爱国的文化启蒙国民运动的第三世界文学和台湾文学，有这些共同特点：（一）解决语言问题：一方面是以大众语言代替传统的贵族语言，另一方面，是以民族的大众语言代替殖民者的外国语言；（二）在内容上主要是揭发和控诉殖民体制下的黑暗与痛苦，或批判国人自己的落后与无知；（三）在性质上批判并脱离传统的贵族、僧侣和殖民者的文学。

民族的语言和文学在长期殖民体制中， 受到严重压抑

在日据时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向亚洲的扩张政策的形成，日本人对台湾的汉语和汉语文学采取禁绝、压制的政策。在其他早自十六世纪就开始沦为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亚洲各国，民族语言遭到长时期压抑和破坏，停滞不前，更无法通过文学作品使语言美化和精确化。事实上，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语言的停滞、粗俗化和受破坏的情况，真是到了满目疮痍的境地。因此，在第二次战后，许多前殖民地在形式上获得独立以后，重建民族语言和文学，成了他们十分艰难、痛苦的工作。

从文学上看，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殖民历史长（有的长达二、三百年！），在殖民地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中，养成了一批惯于使用殖民者语言去思考和写作的人。他们的作品，与其是诉诸本国同胞，不如是一贯诉诸西欧、殖民母国的评论家和出版家，而形成与本国风土断绝的殖民地的文学。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而这种“向殖民母国”、“文明”的文学看的风尚，不但加强了对自己民族文学的自卑感，还间接地压抑了以民族语言写成的民族文学的发展。

第二次战后向西方“现代”文学模仿的时期

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随着美国势力在第三世界中的扩张，随着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对第三世界各国强大的支配，形成第三世界各国对从美国输入的“现代主义”文学的长期而广泛的模仿时期。西方有詹姆·乔哀司，在台湾、菲律宾、印度就各自产生许多模仿者；在西方有“意识流”，在广泛的第三世界各国就会出现各自意识作品。其他在音乐、绘画、诗……的范围中，莫不如此。

在台湾，现代主义的诗、小说、绘画、音乐，统治了五十年代和六

十年代的文艺界。这是我们至今记忆犹鲜的事。

就这样，在广泛的，包括台湾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中，产生了大量的拜以各地美国新闻处和留美教授学生为中心而输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为师的，所谓的“模仿的文学”或艺术。文学和艺术，自此完全脱离了当地人民的和社会、文化的风土，成为一种奇怪的、孤立的东西。这种情况，在许多文学家可以流利、自由地阅读和说英、法语的第三世界中，尤为彻底。

附带一说的，是台湾五十到六十年代的现代派，比较上英文好的不多，因而“现代主义化”的程度比较歪扭，也比较不深入。在其他第三世界各国，因其知识分子可以畅读英、法原书，一方面是西化得比较彻底，另一方面，有一些人也比较深入地理解了西方（现代）文学的真髓，到了七十年代以后，遂能入出自由，以过去西化的体验，丰富了自己民族的文学。格拉西亚·马奎兹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

七〇年的爱国运动激起新的民族回归运动

一九七〇年，留美的战后世代中国留学生展开了保卫钓鱼台的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历史地看来，这运动和六十年代末全球性学生反乱、美国的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和美国价值批判的运动有深切的前因性关联。保钓爱国运动，基本上是反对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却在台湾青年和学生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广泛的反省运动。政治、社会改革思潮兴起，社会意识苏醒，是当时的一个特点。保钓运动在文学上的反应，便是一九七二年在台湾展开的“现代诗论战”，对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文学恶质西化的典型产物“现代诗”展开批判。在论战中，文学的社会性格、文学关怀民生疾苦、文学的民族风格和形式、语言的平白易懂……这些问题首次在战后台湾文学思想中出现，基本上打倒了过去二十多年来西化的、模仿文学的威信。五年后的一九七七年，著名的“乡土文学”论战展开。但在思想内容上，其实是一九七二年“现代诗论战”的一个延长。不理解一九七二年的现代诗论战，就无法理解以“回

归乡土”为口号的乡土文学论。

菲律宾的情况是怎样呢？

极为有趣的是，也在一九七〇年，从元月到三月，爆发了著名的“第一季暴风”。十九世纪末，西班牙直接和美国交易，出卖了菲律宾人民的独立革命，使菲律宾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二次战后，美国给予菲律宾形式上的独立，却在军事、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对菲律宾进行广泛的干涉和支配。不满美国新式殖民主义的菲律宾人民，在一九七〇年元月，展开了为期一季（三个月）的抗争。这个抗争的结果，是菲律宾语首次在法律上取得民族语言即国语的地位，取得了以菲语为各级教科书、出版报纸、电视和电影中语言的权利。在这项胜利下，菲语文学取得了广泛的主导地位，使过去以英文写的、讨好西方的菲律宾文学，和以菲语写的、主要以广泛菲律宾人民为对象的“乡土文学”，主客易位，形势“逆”转，也使得菲语乡土文学在接续十九世纪反西独立革命时代之后，取得又一次极大的发展。

六十年代，印尼总统苏卡诺下台，结束了他企图结合民族主义、传统宗教和社会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倒苏卡诺政变后广泛的反共肃清，在印尼文学上展开了不干涉生活的、唯美主义的、西化的和保守的风格。七十年代初，由于长年来日本资本在印尼的盘剥，终于在当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印尼时，爆发了反日爱国的国民运动。

西化文学和乡土文学的争论

这个运动，在印尼文学上的结果，是对于“后苏卡诺”时代保守、唯美、西化文风的批判，重新由新一代印尼文学家提倡现实主义的、革新的、回归乡土的文学运动。不只是在台湾，即在广泛的第三世界文学中，都存在着长期的西化文学派和乡土文学派的争论。在印度、菲律宾、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一样存在着以西欧为师、以西语为写作语言、以西方读者为对象的西化文学，和以自己母语为写作语言，以自己国内同胞为对象，描写具体的民族生活为怀抱的“乡土文学”。一般而

言，第三世界各国内西化派和乡土派，有这些共同差别：

西化派

- 以西欧、殖民者语言写作和思考。
- 以国外评论家、出版家、教授和大学文学系为诉求对象。
- 题材、内容主张文学的“宇宙性”、“国际性”，反对民族风格和内容。
- 主张文学只有少数精英可解，力求文学的精致，主张各式各样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力主文学不屑于使用“粗俗”的社会语言。
- 作家在风格与思想上，与体制比较亲近，同时也受到体制方面的优遇。
- 作家以不涉入政治为尚，而常得体制的奖掖与尊荣。

乡土派

- 以自己的民族土著母语写作和思考。
- 以自己同胞为诉求对象。
- 题材和内容上强调文学的民族风土、民族风格与现实内容，反对西化。反对西方对第三世界的同质化改造。
- 主张文学应为广大民众而写，力求文学的普及性，主张内容与形式并重，基本上主张文学的现实主义和革新性格。
- 在风格与思想上，一般地是体制批判的，同时一般地受到体制方面的猜忌和压抑。
- 大半投身于政治改革或民族运动，甚者常因而被驱逐、投监……

西化派和乡土派，从南韩一直到整个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进行了长期争论。七十年代以后，其他第三世界文学的乡土派以强有力的感情内容的思想而在艺术上杰出的形式，以“第三文学”、“第三电影”之名，受到国际文学的注目。当然，在语言问题极端复杂、民族语言有待建设的地方，乡土派文学家也以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写作，但在内容、精神和思想上，则与乡土派毫无二致。相形之下，台湾的“乡土”与“西化”的讨论，显得时间既短，讨论也不够深入。而当时这又另有原因的。

台湾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学的不同点

正如同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在历史发展和国际生产诸关系中的共同性规定了它们在文学历史发展上的共同性一样，其历史发展和在国际生产诸关系中的殊异性，也规定了它们在文学发展和性格上的殊异性。

台湾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学第一个殊异点，是台湾文学具有比其他第三世界文学远为完整的文化和语言传统。

相对于经过二、三百年殖民主义统治，土著文化和语言遭到深重破坏、停滞的其他第三世界，台湾则由于殖民时间比较短，母文化的悠久、丰富和完整，文学传统的深厚和语言文字系统的完备，日本殖民者败北离去之后，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家，得以有丰裕的资源，很快地恢复民族文学的生产。在菲律宾，据我在国际写作计划认识的朋友告诉我，作家必须一面用菲语创作，以重建菲律宾民族文学，却同时要花费同样或更大的努力，去复兴经数世纪新旧殖民主义严重破坏的菲律宾语言。作为文学的重要基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在其他第三世界各国中，因新旧殖民主义的摧残的悲惨状况，没有和第三世界作家谈起，是无法想象的。我因此深切知道中国完整的文化和语言系统，是多么值得珍视和宝贵，而愈益决心重新向自己的文化、文学和语言传统去学习，以善用这可贵的文学资源。

台湾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学的第二个不同点，在于台湾文学面临着逐渐失去其社会与人生的指导性格。

和第三世界文学作家相谈，最引我注意的是，他们的文学与民众的生活密切的性格。无数的民众围绕在他们的诗歌朗诵会上，涌进乡间戏院看他们的戏。民众总是在他们这些作家的文艺作品中，去寻求许多民众心中亟待解决的诸问题的解答。描写和反省文革浩劫的创伤的大陆作家，每周收到两三百封来自大陆各地读者的来信。人们通过文艺作品去关怀和探讨社会和民族的前途，去寻找革新的方向，去反省和检讨民族的历史进程。

然而，在台湾式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期的台湾，消费的文化和文学

的艺术，随着与物质丰裕相对的精神贫困的深化，代替了严肃的文学。文学，越来越成为少数文学青年、大学课堂中的东西，从而完全失去了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指导性格。这种趋势，和美、日“先进”的，完全的大众性消费社会完全一致。在日本和西欧，近二十年间，一直没有产生成为话题的新作家。电视、录影带和通俗的、平装的、看完就丢的 Romance，完全在消费市民的生活中取代了严肃文学。严肃文学的纤小、肉感化，是富裕的大众消费社会的另一个结果。

台湾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学的第三个殊异点，在于台湾文学一般地显示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贫困。

相形之下，我觉得其他第三世界的文学家，对于文学与人的关系，文学家写什么，为谁和为什么写作，如何去写等诸问题，具有明确的历史的、文化的和哲学的焦点。相形之下，三十年来的台湾文学，一般而论，显出历史、文化和思想上的贫困，从而有普遍的焦点丧失的现象。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举出台湾在历史上、文学上和思想上的断层，人文科学和哲学的长期检阅，以及近十五年来台湾型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等诸原因。

第三世界文学和台湾文学间第四个殊异点，是台湾文学与政治间，保持着比较疏远的态度。

特别是在二次大战以后，台湾文学一般地回避着政治发展的脉搏。在其他第三世界，政治和文学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人们从文学作品理解了祖国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现实，文学运动和政治上的革新运动一直保持着直接而具体的关系，许多文学家也直接地间接地涉入自己祖国的思想、历史、社会或政治运动中，驯至使外人离开了各该国的社会和政治历史，几乎无从完整地理解第三世界各国的作家和作品。

理解和研究第三文学

各位先生，现在我要用几点结论，来结束这个比较粗糙的讲话。

二次战后，台湾的文学教育，一般是向西欧看的。在我是大学外文

系学生的时代，我们背诵和熟记许多英美文学的历史、人名和书名，对于中国自己的现代作家和作品，却毫无所知，更遑论我们对与我们有着相同历史的亚洲文学、非洲文学与拉丁文学的认识了。我们被这样教育：只有先进的西方，才有文学。整个落后的第三世界，是没有文学的！

说到这里，让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几年前，有一位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对我说，他十分“感谢”乡土文学的作家们。我问为什么，他说，在大学外文系里，老师告诉他，台湾是没有文学的，高等伟大的文学，只有西方有。有一天，他读了黄春明的小说，不知不觉间受到深刻的感动。但在受到感动的同时，他突生惊恐，自己问自己，为什么竟被黄春明打动了呢？老师不是说台湾没有文学吗？难道说自己在文学上的品味力竟是低下的吗？他于是开始遍读台湾的当代作品，才满怀信心地对自己说，台湾是好端端地存在着文学的。

这故事告诉我们：长期以来，在第三世界，存在着两个标准。一个是西方的标准，一个是自己民族的标准。用前一个标准看，第三世界是落后的，没有文明、没有艺术、没有哲学也没有文学的。用后一个标准，可以发现每一个“落后”民族自身，俨然存在着丰富、绚烂而又优美动人的文学、艺术和文化的。

现在已经是我们有计划地去研究、译介第三世界文学的时候了。近十年来，所谓“第三文学”和“第三电影”惊人、强力而优秀的成就，使日本和西方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对第三世界历史、社会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台湾在七二年开始的西化文学批判，并不曾适时地提出理解、研究和译介第三文学的问题。由于长年来，台湾外语教育以英语为主，忽略亚洲、非洲和西班牙语的教学，使我们无法直接译介第三文学。但从现在起，我们可以初步从第三文学的日译和英译中，开始认真、严肃地认识研究第三文学。

在第三世界中的台湾文学及其中国属性

几年来，我主张注意、研究和学习第三文学，引起少数一些人的批

评。他们喜欢谈台湾文学“独特的特性”，遍读其论文，却没有一个人清楚地说明了这“独特的特性”。

当我们谈到某地文学的特性，至少应该提到例如爱尔兰文学之于英国文学，拉丁美洲文学之于西班牙（或葡萄牙）文学那样的水平。爱尔兰文学中独特的方言，非基督教（异教）的因素，神秘主义，宿命的、悲剧的生命观和爱尔兰贫困、艰难而又神秘的高地风土，和英国文学有太鲜明的对比。拉丁美洲文学的浪漫主义、迷信、巫术、民俗主义和糅合荒诞、怪异与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具体现实的所谓“巫术的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一译“魔幻现实主义”），和传统的西班牙文学，有着太明显的差别。台湾文学相对于中国文学的“独特的特性”论，是经不起这一层次上的比较的。我因此对于台湾文学独特论者指出，在历史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台湾文学的“特性”，和第三世界文学的诸特性比较之下，就无独特之可言了。在反帝、反封建、民族主义这些性格上，台湾文学不可辩驳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台湾文学，到底是不是中国文学？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到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去寻求解答。日本一位年轻的台湾文学研究者松永正义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有中肯的见解。

他首先说，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究明在台湾形成的汉人社会，和在北美、新加坡、南洋的闽粤华侨社会之间有什么异同。他发现：台湾和其他华侨社会间最大的差异点在于，台湾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探求“中国往何处去”的全民族的运动中，在关于中国未来去处的方向性和可能性的探索上，一直活泼而密切地参与和感应着。清末的维新自强运动对台湾现代化有直接影响；辛亥革命激起在日台湾知识分子寻求台湾从日帝下解放的希望；五四运动直接促成台湾现代文学的登场，其后台湾的一切政治、文化和文学发展，一直到今天台湾与中国关系的争论都直接、间接，这样、那样地和中国全民族在帝国主义下为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胎动，发生十分密切的关联。恰好是这参与中国近代化史上民族出路的方向性和可能性的历史性格，显示了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鲜明属性。

所谓“台湾人意识的文学”

近一年来，不曾参与一九七二年“现代诗论战”，又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噤默不语的少数一些评论家，提出“台湾乡土文学是台湾人意识的文学”的宏论，主动地为论战当时控诉乡土文学是台独意识的文学的控方，提出不智的佐证。

在一九七七年的论战中，我们坚决反对控方对乡土文学为“普罗文学”和“台独文学”的诬陷，决不是空言辩饰的言词。因为所谓的“工农兵文学”，所谓“普罗文学”，不能指徒写工人和工厂的文学，他还要写出一个有阶级意识，和作为一阶级的工人可以改造明日历史这样的思想内容的文学，才是所谓“普罗文学”。以这标准来衡量，杨青矗、王拓的小说，和拙作《云》，都不能被指为普罗小说。

如果我们用同样的论理，寻求“台湾人意识的文学”的定义，那么，徒以描绘台湾的人和社会是不足以称为“台湾人意识的文学”的。它应该描写一个一向自以为是中国人的台湾省人，经过一定的生活过程，觉悟到自己原不是中国人，而是新兴“台湾民族”的一员，并觉悟和深信这台湾民族要创造自己的历史。如果以这标准去看，从日据时代以迄于今日，我们还找不到在文学专业上可以成立的这样的作品。我们是据此而云台湾乡土文学，断然不是分离主义文学的。

台湾分离主义，和战后台湾新兴工商阶层要求参与台湾政治、和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缺点、和中共政治上的失败、更和美日两国内一小部分对台湾抱着政治的、经济的野心，企图中国永久分裂的野心家有复杂而细致的关系，而台湾文学的分离运动，其实是这个岛内外现实条件在文学思潮上的一个反应而已。

我们主张，尤其是在文学艺术的范围内，台湾的文学和艺术工作者，一方面力求自己在历史、文化、知识和思想上的充实与进步，一方面存异求同，把更大更多的精力，摆在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上，以写出较好、更好的文学作品相勉，并且学习在世界的视野上，在中国和台湾

近、现代史的架构上，在南北对抗的今日世界政治经济构图中，思考台湾和中国未来的方向与可能性，从而在大家共同关心、爱读的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上，寻求民族团结与和平的坚实基础，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做出我们可能的贡献。

谢谢大家。

反讽的反讽*

——评《第三世界文学的联想》

台湾在五十年代以迄六十年代的文学，尤其在诗的创作上（连带地是绘画、音乐等艺术分野中），特别在目前回顾时，有无可否认的全盘的、恶质的西化这个事实。这是即使当年现代派的锋头悍将，也难于否认的。从世界的范围看来，这却不是单独、孤立的现象。整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亚洲、非洲和拉美、欧美，尤其是美国和通过美国导入的现代主义，成为文学的主流。从而，未待“文学泛欧（美）中心主义者”之来，即台湾本地的诗人、文学教授，便率先把自己的文学，尤其是五四以降的新文学看成“开发或开发中文学”，诗人以模仿“波特莱尔以降”的牙慧为得计，大谈“横的移植”；文学教授则为晦涩难懂的台湾现代诗，丈引西洋文学的理论之经，和西洋文艺思想之典，强为解人，大搞释经学似的注释工作。七十年代以后，经过保钓运动，文化的、政治的中国民族主义，在战后世代的台港青年中复燃，从而展开了对于五十一六十年代台湾西化的、附庸的文学的批判，又从而在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了对于第三文学的，初步的关怀。台湾在文学上的反西化思潮，恰好是理解到中国文学自有传统，自有风格，而且自有尊严。一个劲儿想摆脱这个风格，传统依靠美新处和一小撮留美的买办文学教授转贩而来的“横的移植”说，往第一世界文学认同的五十一六十年代以现代诗为代表的台湾模仿文学，才把中国文学“视为未开发或开发中文

* 本文刊于《自立晚报》（台湾）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十二·西川满与台湾文学》（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

学”，又何曾理解到“中国文学是一个即使不超越，至少足以与西方文学传统分庭抗礼的伟大传统”呢？

第三世界买办知识分子，和“泛欧（美）中心主义”的欧美知识分子一样，有一个严重错误，那就是把经济、社会“落后”或“发展不足”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也理所当然地视为“落后”和“发展不足”的。他们以为，经济富裕、“现代化”和科学文化上发达的国家，原来就是富裕、“现代化”、文化发达的；而经济上“发展不足”、落后、贫困、文化上也落伍的民族和国家，是自来就下等而落后的，此所以一些买办的文学教授，对于中国文学向第三世界认同，很期期以为不可。

事实上，中国文化和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化和文学一样，有过辉煌过去。在今天的欧美还在茹毛饮血的时代，辽阔的今天“第三世界”，有过伟大的精神和物质的文明——例如宗教、哲学、经验医学、文学、艺术、音乐、雕刻、舞蹈。十六世纪以后，欧洲从商业资本向着工业资本“发展”和扩张的历史展开，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相应地形成。而整个第三世界，也便在这个世界结构的形成运动中，沦入万劫难复的贫困、落后、失业、疾病、文盲、早夭和饥饿的泥淖之中。今日富国之富，是在这世界体系的形成运动中富的！贫国之贫，也恰好是在世界体系的形成运动中破落下去。而今日“文明”国之文明，以及今之“落后国”之落后，也是一样。

而正是在对抗新旧殖民主义的反抗运动中，第三世界展开了各自的现代文学。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运动，便与反帝、反封建这个各殖民地自求解放的思想和政治运动分不开。但五十一六十年代，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支配的绝大部分第三世界，却开展了一种广泛的“模仿文学”。没有比台湾同时代的现代诗更能生动地描述这恶质西化之模仿文学的特点了。正是这模仿的现代派，才把自己的文学传统看成“弱势文学”，拼命想从语言、内容、形式上，把自己按照西方的式样，加以彻底的改造。这只要看五十一六十年代台湾现代诗创作、理论和评论就很明白了。而正好是这些模仿的文学家，把台湾的文学“依附”在西方文学价值之下，构成了“被”西方“统治”的、和西方发生

了“主从”关系的文学！批评五十年代以迄六十年代台湾文学在创作上，在评论上，在教学上的恶质西化的人们，恰好是对自己的文学构成“一种敬畏的情绪”，反对模仿的、依附的、从属的买办性文学的人。他们说中国现代文学“属于第三世界文学”，是因为从“世界体系”看来，中国近两百年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对“世界体系”形成依赖的发展，是相应于西欧的发展和扩张的中国之“发展不足”的形成过程。相同的历史发展，相同的受支配于新老殖民主义的命运，使中国——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的台湾现代文学，经过了“模仿”和“反抗”（以西化文学与乡土文学间的争论为共同的特征）这个第三世界文学共同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文学，是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行程，客观地规定了它的第三世界的属性，而不是有谁主观地主张“认同”于第三文学。认为向第三文学认同是一种“自弃”的“行为”，其实便包含着“文学泛欧（美）中心主义”的思想，以为第三文学和第三世界当面经济上的落后一样的落后。

说“语言本非中性”；说语言总是“负荷着意识形态”，这是对的。但许许多多批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思想著作，虽为第三世界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却泰半用英语写成。然而，它却丝毫不损于它原有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语言的意识形态，主要从语意中去分析。用中文写成的“第三世界文学的联想”，一样充满着“文学泛欧（美）中心主义”，一样充满着西方“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啊！

《第三世界文学的联想》的作者，讽刺了台湾译介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的出版。“在语言的权力结构中，第三世界始终扮演着一个失败的角色”，说得真对。其所以然者，正是从十六世纪以来不断地贪求廉价劳力、原料和市场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中，随欧美支配地位的确立，相应地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形成抑压、蔑视的结果。译介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并不等于不能“自我肯定”。远景版的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的序中说：“当诺贝尔文学奖迅速地成为各强国为了增添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光荣的重要工具时，由谨慎、保守而力维中者的瑞典主持下，阿弗烈德·诺贝尔原初的理想和愿望，遭到愈来愈严重的困难。当我们回顾

授奖档案显示了某种国际间的‘配给’倾向。在世界大战中、在国际强权政治下，任何挑剔的人都可以找到审慎而力求自保其‘中立’的瑞典学院，是如何让意识形态的好恶，以及国际政治的无可如何的压力，渗透到文学桂冠的选择。”又说：“如果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给予过高、过大的评价，是一项错误，那么，对它做过低或者过小的评价，也同样是一项错误。”出版诺贝尔文学奖全集，是基于这认识和需要的：“……一种反省的思考，正在成长。在台湾的中国文学，是不是应该有更广大、辽阔的视野；是不是应该有更纵深、丰富的思考这些问题，以日甚一日的问题性，提到全中国作家面前来……也就在这时刻，有态度、有条件而且虚心地阅读，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来，世界文学的心灵、智慧和创造性所走过的步迹，成为当前我们中国作家和读者共同迫切的需要……”

至少是远景版的编辑群，从来没有接受过“诺贝尔价值观”。在台湾的西洋文学教坛上，是哪些人在一面倒地宣传着“囿于欧美传统或名著史”的“世界文学视野”呢？是谁鲜明昭著地转染着西方堕落的、“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产物”——现代主义呢？答案是：第三世界内部与西方国际“中产阶级”有共同语言和利益的买办的知识分子，亦即法兰滋·范农所说的“鬼影子知识分子”（Phantom Intellectual）！

这些“鬼影子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欢用“理性”、“学术”来装扮自己，使自己看来讲学问，讲道理，而其实率多曲学阿世，尸位误人。第二个特点是，一旦遇到争论中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本能地给别人扣上“马克思”或“左派”这些本来没什么了不得，却在台湾还有一定陷诬作用的帽子。渔父是这样，《第三世界文学的联想》的作者也不例外。这是买办读书人良心的堕落。

第三世界特殊的历史、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情况，根本不需要什么“意识形态定位的标签”，只凭活生生的历史的、经验的事实，就可以把握得清清楚楚的。一个身为第三世界中的知识分子而谓“第三世界定义颇有争论”，根本是“泛欧（美）中心主义”的茶毒下的糊涂。何况说“语言本非中性”，说语言“已经负荷着意识形态”，似乎和“左派”、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脱不了关系。渔父和《第三世界文学的联想》

的作者最教人齿冷的，是他们因优渥的机会比别人多读了一点书，却偏偏喜欢把一切人当成白痴，恶用知识，大卖特卖他们自己一套买办主义思想。而反制之道，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力争自己在知识和思想上的进步，对买办“学人”的买办行径培养分析和批判力，必要时加以适当的挞伐，才能避免他们的污染。

不断地卖弄着“反讽”的《第三世界文学的联想》，其实是自始就“蹈入”“反讽”的“反讽”底“陷阱”了。

“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

——评渔父的发展理论

无的而放矢

由于曾经读过几次有些作家费力、忿怒而又无状地为自己的作品做解释、说明的文章，深深以为不堪、不可，就时常告诫着自己，千万不要强做自己作品的解人。近来拜读渔父的大作《愤怒的云》，敬服之余，自然也犹不至于打破向来对自己的诫命。只是和许多明眼之人一样，觉得渔父的大文，谈文学，其实是假的，其实只是个幌子；谈有关第三世界发展理论，才是真的，才是他“用心急切”的本意。对于社会科学，我真是一个只在“业余”之时，偶而一年只读一、两本书的人。溷迹商场，面目可憎，原是“既无能力也无资格”就有关第三世界发展问题发出议论的人。然则渔父的大文，却无端地引起了我的兴味，因此在绝不触及渔父对我文学作品的批评这个原则下，单就第三世界发展的理论提出几个和渔父颇不相同的意见。如果因而引起台湾年轻的、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评论，未始非为美事。

渔父的大作中，贯穿着一份出奇的焦虑。这溢乎言表的焦虑之情，使他迫不及待地吧小说集《云》中的几篇小说，判定是“显而易见”地为所谓“依赖理论”张目的小说。其实，倘若渔父不那么“用心急切”，

* 本文刊于《中国时报》(台湾)一九八四年四月八—十三日。后收录于《陈映真作品集十二·西川满与台湾文学》(台湾：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

他应断乎不至于留下这于他为绝无必要的破绽的。

《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和《云》，主要地只写出在现代企业结构下，受薪的企业人的形成以及与此形成过程相应的人的异化的过程。因此，这三篇小说中企业体的老板，即使换成中国人，依然是可以成立的。《夜行货车》末尾一场宴会中，如果是一群买办的中国企业家的辱华性的谬论气走了詹奕宏，故事的精神，依然不会有什么改变。这三个故事的背景是不是跨国性企业，其实和小说的题旨可说是并无关联的。则它们和渔父所急于打倒的“依赖理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唯独在《万商帝君》中，我比较用心地写了一个跨国性企业，以它全球性的行销管理（marketing management）活动，如何对地主国的价值和思想进行深刻的改造运动。在现代传播技术和国际范围的管理技术下，即使土著企业的行销活动，对人的行为、思想和价值的强大影响，是生动活泼的台湾生活里每天中的真实。我只是因着自己曾经在台湾的跨国企业中负责过中级管理者的工作，参加过几次亚洲级的管理训练会议之体验，更加深刻地注意到，以整个地球为企业管理的基盘的国际性企业，其行销管理对于全球土著文化之令人震惊的改造力量罢了。

然而，严格地说来，即使这《万商帝君》的主题意识，和理论结构上的“依赖理论”，以及和下文将要逐一分析的，显然为渔父所理解错误的“依赖理论”，毫无必然的关系。理由是简单而明白的：批评跨国企业的行销活动，对落后国家文化的解体和改造，只是“依赖理论”中对跨国企业活动之批判的一小部分，更何况由于跨国企业的行为越来越引起世界经济学家和政治学、社会学者的注意，各从各自不同的专业角度研究跨国企业者越来越多。有人搞跨国企业与全球性生态、污染的关系；有人搞跨国企业中个人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有人搞跨国企业行为与各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间的关系，等等。然而，据我所知，“依赖理论”中对跨国企业的批判，似乎更着重在跨国企业倚仗其本身雄大无伦的资本力和超强母国的政治力，对落后地主国购买和施加政治力和军事力，从而以落后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不足”为代价，稳固和扩大企业的超额利润。ITT 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共同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

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据此以观，即使是拙作《万商帝君》，又和渔父所急于扑灭的“依赖理论”之间，殊无形式内容上的关联了。因此，不能不说：渔父在一开场，就犯了议论所忌的“无的放矢”之过吧。

从史的展开去理解依赖的形成

虽然极不愿意谈论自己的作品，但是在与本文绝对相关的范围内，把截至目前为止，拙作与依赖理论之间的“显而易见”的完全无关性，做了概略说明如上。

接着，我想检讨一下渔父对于依赖理论的理解，以及基于这理解所做的反论。

首先，渔父似乎错误地把依赖理论中的“依赖”这个概念，看成是静止的和外加的东西。渔父开宗明义地说道：

“依赖理论”认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国际分工秩序，来操纵、剥削和控制落后国家，由此形成一种“中心”和“卫星”的经济关系。不仅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有“中心”和“卫星”关系，环环相扣，最后连成一条上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下贯落后国家边陲乡村“卫星”的环索。在体系之内，资金和资源的吐纳，所依靠的运作工具就是跨国公司。

渔父和一些现代世界体系的辩护士们，总是先把“依赖”理解成一个既有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国际分工秩序”课予落后各国的锁链，从而加以批评。事实上，依赖理论的主要精神，在于它历史的、开展的性格，认为“依赖”是早在十五、十六世纪就开始的西方殖民主义历史的展开，和近、现代世界史中帝国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历史的展开，在落后国家所造成的一种情境（D.L.Johnson）。正好是在这种制约性的情境中，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行程，和广泛的后进国“发展不足”的历史行程，互为补倚，使广泛的后进国经济，受到少数先进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扩张所制约（T.Santos）。依赖，是这四百多年来的新旧殖民主义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历史的情境，决不是渔父所说富者原富、

贫者自贫的贫富天定、天成论。

例如以非洲各族人民今日的悲惨情况的形成来说，就可以追溯到当年的奴隶贸易和殖民帝国主义。欧洲人在一七八三年到一九七三年间不但从非洲掠夺了无数象的象牙、钻石、香料、黄金、白银和兽皮，并且抢掠了数百万人以上的非洲奴隶。没有人能否认，在两百年内，黑色非洲以她富饶无比的宝藏和数百万奴隶的强迫、无偿劳动，为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展开。同样，有谁能否认，今日雄峙寰宇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形成过程，正是以北美印第安和黑奴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歧视、奴役和压迫作为代价？

如果中国曾幸而在十七、八世纪中免于西方殖民者的占领和奴役，则对于十九世纪列强帝国主义的侵侮，我们应有太鲜明的悲伤的记忆。几万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在羞辱性的“赔款”项下，流出了中国。几个重要的港口都邑，被强迫开放，成为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资本和商品肆无忌惮地闯过中国毫无准备的关口据点。势力范围的割切、租界的割让，并吞台湾、控制税收和海关，干涉司法和主权的独立性……难道说，中国这一切悲惨的命运，不正是中国受制于西方列强“发展”和“扩张”的历史过程中，一个相应的崩溃、解体和沦落的生动的说明吗？

二次大战以后，亚洲、非洲和拉美一些只取得形式上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情况非但没有根本的改善，而且有些地方、有些情况，远远比过去还糟。总督、警宪和殖民地官僚走了，却换来傀儡政权和一批里通外国主子的买办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一仍通过复杂的国际政经关系，控制和掌握着今日各落后民族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原始原料出口和工业品不等价交换；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落后地区内部资产阶级的勾结下，进行对后进国劳力和原料的榨取和先进商品大量倾销，更不必提国际产业—政治—军事复合体为了保持和增加跨国企业的利益对落后国家明里、暗里进行的各种干涉、威胁、颠覆和暗杀的罪行了。渔父和同他一般为十六世纪以来不断扩大的“世界体系”辩饰的人们，例如发展论者和现代化论者，在喋喋

不休之余，尽管他们有些相互不同的说辞，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全都绝口不提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与今日世界“先进”与“落后”的结构之关系；总是要去强调别的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其他因素”，例如“决策人所扮演的角色”，也例如“企业精神”、“基督教文明的影响”、“成就动机”，等等（Cheddo, McClelland）。

问题不在于关系，而在于关系的性质

其次，渔父显然对于依赖理论中“发展不足”的形成论，有错误的理解。试看渔父是怎么说的。

依赖理论有几个主要命题：落后国的发展不足（underdevelopment），正是由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落后国家的贫困，是因为它被纳入了“体系”之中。如果它们能摆脱依赖，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成长一定会加快。

渔父在这短短的叙述中，犯了这几个“显而易见”的认识上的错误：

首先，由于渔父把依赖看成是一种自存、既存的情境，而不是将“依赖”理解成一种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情境，因此认为别人主张的是“落后国的发展不足，正是由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结果”。据我有限的知识，几乎没有一个依赖论者有过这样的简单化的机械的主张。从十六世纪开始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历史发展去看问题的依赖理论，是从新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四百多年的历史行程中，去看依赖和支配的互动关系。落后国家的发展不足，非仅是“由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结果”，也同时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原因。同样，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不但是“落后国”“发展不足”的原因，也是其结果（D.L.Johnson；D.A.Offiong）。

渔父对依赖理论的另一个错误理解，是说“落后国家的贫困，是因为它被纳入了‘体系’之中。如果它们能摆脱依赖，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成长一定会加快”。

实际上，依赖理论说的是，落后国家的发展，往往严重地受到世界经济体系或国际市场中支配性经济的制约与限制。依赖理论者绝对承认落后国家，在被“纳入体系”以后个别地、特殊地、局部地“成长”的可能性。问题在于，这有限的“成长”和“发展”，是作为“先进资本主义国”更为巨大的发展和扩张的一个反映而存在的。依赖理论清楚地理解到：国家不论贫富，没有一个国家能脱离世界市场而“独立自主地发展”；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订制和选择繁杂的发展政策时，能够完全“独立自主”，不受任何因素的拘束。然而，不同的在于，贫困国家的“发展”和“成长”，是“先进资本主义”支配国扩张的一个反射（reflex）时才发生，而且这“发展”和“成长”，是更多地按照支配性的外国经济而不是本国经济的需要所促成的（I. Katznelson et al.）。在一个依赖性的社会里，类如资本和技术等外国的生产因素，一直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因着在这“世界体系”中世界市场上的若干重大决策的决定权都操纵在大国的手中，除了屈从之外别无选择的贫困国家的发展，就不得不受到大国的支配和限制了。

以现实的历史实例来说，帝国主义的资本、技术和商品，有扼杀中国和印度的自发性、土著的萌芽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当然也有介绍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化公共设施、交通、电讯、教育制度、卫生机构和银行体制等的一面。但这一切相对性的“成长”、“进步”和“发展”，是作为英、法、美、俄帝国主义支配经济在中国和印度的扩张与发展的一个组织部分而发生。如果我们不曾忘记当时税收、海关、法律、价格、市场和原料等等全操在列强之手，依赖理论的历史解释，特别是从一个落后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去理解，就会有极为清晰的认识了。

国际规模上的“贫富天成”论

自古以来，关于贫富不均的社会事实，一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贫富天成论，认为有钱的人原来就有钱，或因祖宗积德，或

因命中富贵，或因本人贵重，总之，富贵者天生就是富贵。同样，贫者、贱者，原就贫贱，或者因原命轻贱，或者因其好逸恶劳，总之，贫困者自始就是贫困。当然，另一种看法，就包括在一句极为普通的话中：“为富不仁”。意即富者之所以致富，总是以不同程度的“不仁”，完成了财富的蓄积与集中的。

在国际范围内，渔父和一些其他类似的理论家，是深信着富国自富，与贫国之困窘无关；贫国自贫，与他国的富强无干。很有一些西方种族中心论的学者（例如 D. McClelland），认为落后国原就在文化和经济社会落后，而把西方的“先进”和“发展”看成原就“先进”和“发展”，从而把社会发展阶段分成“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把落后国——例如非洲各国之所以落后，归咎到落后国自己因为本身这样、那样的因素而跳不出“传统社会”阶段，对于西欧对非洲长达五个世纪的殖民地凶残掠夺、榨取和摧残，只字不提。而渔父正好也是这样一个理论家。他说：

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未必是由于“殖民经济”。北欧国家、瑞士、加拿大、澳洲，从未向未开发地区抽取任何资源，甚至毫无经济接触。它们之所以富裕是因为自身的资源丰富，生产力发达，特别是人力资源的丰富。那些与落后地区接触的先进国家，在最初接触时，已经十分富裕。它们的富裕，和落后国家的落后，其实没有因果关系。

这不是典型的、国际规模的“贫富天成论”又是什么呢？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举出凡殖民地知识分子无不熟悉的这些历史：横越大西洋的奴隶买卖、殖民主义、割地、开埠、通商、赔款和干涉，是怎样重大地构成先进国血腥的原始积蓄，构成从商业资本向着工业资本飞跃的物质诱因，直接触发了西欧工业资本主义全面发展的工业革命。四百年来的新旧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开展的“世界体系”形成的历史，说明了早期英法的发展和今之美俄的发展，恰好是同样一些国家发展不足相辅相应地展开，岂能说“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未必是由于‘殖民主义’”呢？

殖民主义就是殖民主义，是历史的、经验上的真实，我们是绝不在

引用时加上括号的。依赖理论所剖析的，如前所言，是十六世纪以还的英法美这些殖民帝国的发展，自然不论“北欧国家”和“瑞士”等。发展的取样上，不成一个典型，在国际经济学上，几乎没有讨论价值之国。关于“北欧国家”和“瑞士”的原始积累如何形成，我惭愧毫无知识，不敢妄论。但今日它们皆以最尖端、精密之工业产品与世界其他地区——应该也包括贫困国家吧——进行不等价交换，也是周知之事。

说到加拿大和澳洲，渔父似乎竟忘记了这两个地方，不折不扣地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所建立的白人的殖民地。渔父难道真不知道，这两块白人的大殖民地的发展，明明白白地是由于英国、法国对非洲、拉丁美洲和东亚殖民统治所搜刮之剩余（surplus）去建设的吗（A.K. Bagchi）？再者，加拿大和澳洲的“富裕”，难道不是以这两个地方的原住民族、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和大洋洲上才离开新石器时代不远的土著民等的种族绝灭这个残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血腥的“富裕”吗？渔父似乎刻意漏列了美国。今日美国的形成，和英国从亚洲、非洲搜刮所得去投资经营，和起初是印第安人的灭绝和对于黑种人奴隶的强迫性无偿劳动之掠夺，嗣后是无远弗届的“五角大厦—国际企业—CIA”复合体向全世界的扩张，当然有密切的关联。

然后，渔父不惮乎孜孜不倦地告诉我们：富国的双手是绝对神圣而洁净的。渔父说道：“它们之所以富裕，是因为自身资源丰富，生产力发达，特别是人力资源丰富。”

而倘若说到“资源丰富”、“生产力发达”和“人力资源丰富”，今天散列在辽阔的世界南方的落后而又贫困的中国、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早在今天“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尚在茹毛饮血的时代，不是都创立过辉煌无比的中国、印度、印尼和衣索比亚、埃及的精神和物质的文明吗？从十六世纪开始，正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的货物、织锦、黄金、白银、工艺、兽皮、香料、宝石……吸引了贪欲的西欧航海探险的殖民主义者。准此，谁也不能说第三世界资源不丰富、生产力不发达、人力资源贫乏。渔父们这些欧美系社会学者规避从十六世纪展开的欧洲新旧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世界体系，想来大约只

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笨拙地为“先进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全球性的支配做掩饰和辩饰，因为如前文所不断地指出，“那些与落后地区接触的国家”，如果没有奴隶贸易、没有对于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掠夺，就没有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不能或缺的原始资本积累和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也就没有今日“十分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了”。说这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和落后国家的落后，完全没有“因果关系”的欧美系社会科学家，总是认为贫穷国家的贫困与落后，是自生、自有的；是源于这些落后国家自身的“落后”和“传统”性格，与世界体系的开展，“没有因果关系”，从而认为只要扬弃后进国社会自有的“落后”性与“传统”性，吸收“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社会自有的“进步”性与“现代”性，就是后进国家开始文明开化，开始发展和成长之日（W. Moore）。站在西欧“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制的立场，做这样的论议，至少还是比较上可以理解的。但不知也跟着欧美社会学者学舌的渔父，究竟是什么样的立场而云然呢？

“没有发展的成长”

渔父的论点，开展至此，终于迫不及待地显露了他热烈拥护和支持当面世界体制的亲体制性格了。他说：

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如果拒绝纳入“体系”而独立自主地发展，是否经济成长就会加快？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统计资料显示，彻底参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长期来说，经济成长率要比不参与的国家高。以东非共同体的国家肯亚、坦桑尼亚、乌干达为例。在独立之前，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资源也比较丰富。但独立后，坦桑尼亚实行独立自主的乌伽马主义发展路线，乌干达采用一种改装的部落主义经济，肯亚则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但如今坦桑尼亚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乌干达的经济也一塌糊涂。对照之下，肯亚的经济倒是走在前头。

我们在前文已经说过，依赖理论认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落后

国家，各别地取得一定程度内的“发展”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这“发展”的性质。依赖理论认为，在世界体系中的落后国家，是作为先进国发展和扩张的一个反射而有局部、各别的成长，是在先进国家发展和扩张的全盘计划中，作为这计划的一个附庸而发展，而不是以后进国本身为主，以自己需要为导向的发展。而落后国家这极为有限的“成长”与“发展”，又回过头来成为先进国更大发展与扩张的工具和条件，使落后国对于世界体系之依赖的结构，更形加深与巩固，从而是抑制而不是促进了使一个国家经济获得真正发展所必要的结构性的改造（S. Amin）。像这样，仅仅是在“统计资料显示”的“成长”，而没有伴随着往更大、更长远、更实质性的自然发展所必须的社会经济构造的变革，也没有以自己民族现实需要为中心、由自己参与、指导和计划的活力的“成长”称之为“没有发展的成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一译“矮化的成长”）。

在若干第三世界国家纳入“体系”后所取得的“没有发展的成长”中，往往一方面是一大堆“统计资料”和一般性经济数据上所“显示”的“成长”，而另一方面却同时并存着较有活力的经济部门和更广泛的停滞、解体的经济部门，和逐渐深化的贫困；在在缺少生产上的结构改革；政府部门和经济部门中缺少熟练技术和缺少本国人对高层经济和生产部门参与；缺少一种自力更生和奋发图强自立自主的信念、展望和决心。事实上，一些“彻底参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世界“国家”，为这“没有发展的成长”所付出的代价，便是对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扩张的高度依赖。象牙海岸和赖比瑞亚就是其中典型的成例之一。

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以共同投资形式，“彻底参与”了法国和欧洲共同市场“资本主义体系”的非力·胡费·白格尼总统的象牙海岸，经济成长率在百分之六以上，国民平均年收入也高于平均的非洲一般其他国家者。投资保持稳定地成长，政府有钱从事发展和建设，政府在行政上的花费，较许多其他非洲国家低得多。但在另一方面，整个象牙海岸的经济结构和它在殖民时代者几乎完全相同，国内富裕的少数精

英与广泛的、贫困的农民间的巨大差距，依然没有改善。确实，在农业生产上，象牙海岸有显著提高，但在基本结构上，依然是外国不在地主投资的大庄园经济。除非根本上废除形成一种倒退性的社会结构的、由外国地主付薪的农业劳动体制，在整个农业生产部门中进行结构性改造，象牙海岸的农业就无法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S. Amin）。

在资本和财务上，象牙海岸采取了与法国、欧洲共同市场合作的政策。但这种合作投资的政策，是以损害自主性地设计自己的发展计划的权利和以损害主权的独立为代价的。在象牙海岸，外国资本对于全国经济取得绝对性支配的地位。外国资本在象牙海岸所获取的高度报酬，恰好说明象牙海岸经济成长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程度。“统计资料显示”：象牙海岸的雇主资本家，在数量上大有增加。但其中真正的土著的、民族的资本家却微乎其微。即使有人可以说：今天，资本主义在象牙海岸确实有长足的发展，但人们却不能据以说明：象牙海岸自己的资本主义有所成长。虽然象牙海岸不受法国和欧洲共同市场的统治，但在经济上，今日象牙海岸与它在殖民地时代者殊无二致：如果一切劳动者是象牙海岸的黑种人，那么绝大部分的、真正的象牙海岸资产阶级，是远远居住在欧洲，只是提供技术、资本和管理的欧洲人“不在资本家”（R. W. Clower et al.）。

再举赖比瑞亚的例子。

比较上是“民族主义者”的托伯特总统在一次政变中被推翻以后，继任的塔布曼总统采取了一种“门户开放政策”。为了“彻底参与资本主义体系”，赖比瑞亚开门允许外国资本和土著资本无限制地发展。根据“统计资料”，在一九六〇年代中，外国资本涌入赖比瑞亚平均每年达七千五百万美元。赖比瑞亚的国家总预算，从一九四三年的七十五万美元升高到一九六三年的五千万美元。但这一切改变，为赖比瑞亚带来什么样的发展呢？美国国际开发总署（AID）的专家指出：整体看来，赖比瑞亚人从事政府工作，经营橡胶园、运输业、建筑业和法律服务业。有少数一些赖比瑞亚人从事医疗工作和工商企业。外国人则绝大多数从事铁矿、橡胶工厂和木材厂的经营。在重要企业和工业中，有一小部分

赖比瑞亚人因法律的规定，受雇于外商机构，但他们大多只从事企业中公共关系、法律事务和广告业务，不能参与真正的高层管理工作（C. W. Clower et al.）。正是由于缺少一种结构性的改革，“彻底参与”了“资本主义体系”后的赖比瑞亚，即使美国开发总署专家们，也观察到这些缺点：庞大的官僚特权集团放弃了许多发展的机会，外交花费过高，教育预算偏低，殖民地时代的政治经济残留太重，政府部门官僚、家族关系影响效率。这些情况一直到托伯特总统时代依然没有基本上的改变。赖比瑞亚少数一些买办的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合作，经由外国资本和技术，对于本国进行盘剥和掠夺。在“统计资料”上，今天的赖比瑞亚比起托伯特总统的时代，固然有若干可以看见的“发展”，但是对于广大的、贫困的赖比瑞亚人民，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即便是在渔父所赞美的肯亚，欧洲殖民者所残留的数百英亩土地，在“独立”后由欧洲银行贷款给富有的肯亚农民去购得这些土地，或由特权关系的肯亚农民取得，形成富裕的肯亚地主和贫困的佃农所构成的社会结构。“独立”后肯亚土地所有关系在根本结构上的改革之阙如，和肯亚农业对于世界“先进资本主义”体系的依赖，使肯亚持续存留着类如殖民地时代暴露在强大榨取下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农民（subsistence farmers）。

该死的民族主义者

渔父以非洲一些不愿意“彻底参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如坦桑尼亚、乌干达在经济上的失败，作为受到“资本主义体系”应惩的例子，来说明如果穷国不依赖富国，不但无从图发展，简直在这世界体系中无地容身。

在某种意义上，渔父所举的例子虽然令人沮丧，却是真实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下，弱小国家追求“经济独立”的困难（注意渔父以引号来表现“经济独立”这个理念时所传达的深度揶揄意味），也许可以用奈及利亚的经验来说明。

由于深深地体会到要从几世纪来的殖民经济上自求解放，奈及利亚

先要真正掌握自己的经济，以期在经济上而不只是政治上获得独立，奈及利亚军人政府进行了经济上的国有化和本色化（indigenisation）两个政策。所谓国有化，是由奈及利亚政府将若干重要的外资企业和工业收归国有，由政府接管。而所谓本色化，是政府经由法律的强制，迫使外资厂商接受奈及利亚人参与其管理和营管过程。奈及利亚政府分阶段、有步骤、有规划地进行了国有化和本色化的工作，并举行各种训练，期以提高奈及利亚人在管理、技术、生产和经验上的能力，为培养和发达民族的资本而努力。但奈及利亚为了追求“经济独立”的努力，却遭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复杂而巨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来自内部。长达四百多年的殖民经济结构中，奈及利亚的民族资本无从发展。一切重要的企业、贸易和工业，长期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自己的民族资本积累无从形成，没有自己的管理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源。在科学技术上，更是被掌握在外国厂商的手中。奈及利亚“经济独立”的努力，最先就碰到这些源于数世纪奈及利亚殖民地历史所带来的现实困难。而这些从数世纪殖民历史所沉积下来的困难，即使是国有化、本色化，用国家力量强迫增进奈及利亚人接管既有外国企业，并由国家融资中小企业这些“民族主义者”的手段，也一时难以解决。

第二方面的困难，则来自外国企业的百般阻挠，企图破坏奈及利亚的国有化和本色化的努力。收买奈及利亚人出面顶替，利用奈及利亚人出面购买一些政府规定不能由外国人经营的企业，以利实际上由外国人控制那个企业；收买奈及利亚特权人士，请他们当公司虚有其位的董事，却把管理实务性位置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迟延或抗拒政府的国有化和本色化改造……这些外国商社的阻挠和破坏，生动地反映在奈及利亚政府颁布的许多禁令之中（D. A. Offiong）。

但是，相形之下，奈及利亚在力图“经济独立”中所遇见的困难和挫折，比起其他同样为自求解放而努力的国家所遭遇的命运，还是十分幸运的。新殖民主义，正是通过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蛮横的干预，发挥它维持并强化旧殖民地时代的超额利润的功能。因此，对于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国际新殖民主义总是要千方百计地维持住原殖民

地社会的法律系统、政治结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以利其遂行新殖民主义的榨取和掠夺的转机。任何对这些旧结构和系统的革新和改造的企图，往往带来来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蛮横干涉；收买当地政治和军事势力、反对“民族主义者”的改革、政治暗杀、经济封锁、军事政变、支持最苛刻的独裁统治……不一而足。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三十年间，这些无情干涉和镇压贫困国家自求解放和力图“经济独立”的事例，几乎无年无之。而且在六十年代，渔父所任职的联合国，就曾经参与过几件颠覆和暗杀非洲几个企图挣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政府及其领袖的罪恶案件。恩克鲁玛、鲁孟巴，只是这些该死的“民族主义者”中较为倒楣而著名的两个人罢了。

渔父还举了印度的例子，企图破灭一切想要挣脱国际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控制的民族主义者争取自力更生的希望。渔父说道：

有些国家在发展之初，为了追求“经济独立”而大力推展基础工业，结果适得其反。印度在五十年代不惜代价，不顾产品需求情况，大规模投资重工业。这个政策使它从六十年代开始，不得不长期“依赖”大量的外援食物和资金援助。

渔父想说的是这样的结论：“追求‘经济独立’而大力推展基础工业”是使印度“从六十年代开始”“不得不长期‘依赖’大量的外援食物和资金援助”的原因。但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印度的问题之复杂，到了不必是搞世界经济的人都能想象的地步。但是把印度今天悲惨的境遇，简单地归罪到印度妄自“追求‘经济独立’”的渔父的宏论，恐怕绝无仅有吧。

“独立”后的印度，制造、农业庄园、金融和批发生意，早已分配在以英国为主的外国人手中，即使在“独立”后大量涌现的印度企业如炼油、制药、人造纤维、各种耐久消费品等技术密集的工业，外国人私人资本和技术仍占有支配性地位。美国企业在印度的发展，更受到美国援助计划的支持（PL 四八〇贷款基金）。早在六十年代初，印度建立了两个“基础工业”的炼钢厂，但都在资本上和技术上依赖于英国和西德的炼钢资本。许多其他印度“基础工业”，一开始就倚重西欧和苏联的资本

和技术。但为了这种依赖，印度必须付出重大的代价。每一个“合作”计划，都有数不清的各种课加在印度身上的限制，例如限制产品输出的地区，限制把某种技术许可给第三国；规定不经参与投资的外商允许，印度方面不准从事研究发展工作（A.K.Bagchi）。

由美国福特基金会推动的“社区发展计划”，在印度渴望发展粮食生产的背景下，使美国农业资本和技术深入地渗透到印度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教育各部门。但喧嚣一时的“绿色革命”，根本上失败了，并没有为印度解决严重的粮食问题（Punjab et al.），从而使印度市场更加狭小化和毫无生气，连带地引起了公共企业资本财生产的颓落。一九六七年以后印度经济危机，在资本财需求下跌的同时，产品输出的必要，引动了极廉价产品的输出。而出口工业的复活，又深化了对于西欧和苏俄市场和资本的依存。一九七五年间印度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上的危机，使国内市场疲弱，外销竞争乏力的印度经济，成为重大压力，迫使印度政府一步步放弃“经济独立”的方针和政策，更深地被组织进世界“先进资本主义体系”，愈陷愈深地落在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各国的支配中（A.K.Bagchi）。

“印度在五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大略已如上述。印度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在政治上取得形式上的“独立”的各国，在经济上是如何地难于从旧殖民地残留的枷锁和新殖民地缜密的网罟中解放出来，从而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恩克鲁玛所说的：“第三世界除非彻底地打倒、摆脱新殖民主义，永远无法取得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真实的独立。”渔父，正像一切欧美资本主义体系的代辩人一样，把落后国家落后的原因归咎给这样、那样的理由——例如说什么“追求经济独立”、“大力推展基础工业”、“不惜代价、不顾产品需求情况大规模投资重工业”(!)，却独独只字不提新旧殖民主义破坏性的影响因素。

是谁做主的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

时常有一些出生于贫困的第三世界，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受

了教育，看见“先进资本主义国”目迷五色的繁荣和富裕，便对于自己祖国的贫困、落后起了深刻的轻蔑和仇恨，尤其如果看到长年以来祖国力图“经济独立”，挣扎着摆脱“先进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却不但一事无成，似乎越搞越穷时，这些知识分子的“先进资本主义”的“唯成长论”，竟可以达到不惜以重做那“世界体系”的奴隶，但求一口饭吃的彻底的买办主义的程度。

然而，像渔父和类如渔父的一些欧美社会科学家，似乎永远无从理解：第三世界的人民再穷、再饥，也还有人的尊严。他们绝对不只是几亿让渔父们看了心烦的，因了饥饿而彷徨、挣扎着的牲口。依赖理论所不惮于陈辞的，是四个世纪以来世界体系发展，正是新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世界结构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在完全没有准备、没有预备好条件的情况下，硬生生地被推进“世界体系”之中，身不由己地随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贪婪的发展、扩张的节奏和需要而运动，形成对于“世界体系”无奈的、苦痛的依赖。在这依赖的结构中，第三世界国家许多重要的经济发展的计划和决策，因着殖民地历史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关系，因着高度发展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大众传播技术所形成的跨国性巨大企业，都是在欧美、日本的办公室而不是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和经济机构所自动自发制订，从而第三世界一切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方针，无不是为了“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扩张与成长的利益，而不是自己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了达到此目的，“先进资本主义”各国，有时不惜以贿赂、威胁和收买贫困国家内部的特权官僚，来支持和增进大国的掠夺。不少的时候，大国可以直接通过公开的政治或武装干涉、暗地里的选举操纵、政变和暗杀，甚至利用貌似中立的国际组织如六十年代的联合国，进行暗杀、颠覆和武装干涉来支持“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利益。此外，外来的“先进资本主义”在贫困国内所培养的新兴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国外的国际垄断资本阶级，在这“世界体系”的运动过程中形成自然而且牢固的同盟，在贫困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活上，发挥对于外来支配势力的呼应和认同的作用。在意识形态上，贫困国家的一些买办知识分子，也会自然而然地挺身而出，以“资

本主义体系”无害有益论和“追求经济独立”该死之论教训国人，更是不足为奇了。

必须指出：依赖理论从来不曾主张“摆脱”和世界的经济与市场间的关系。依赖理论所批评的，是这关系的不平等的、受制于人的性质，从而要求改变这个不合理、不公平的关系。依赖理论不是只知“不惜代价、不顾产品需求状况大规模投资重工业”的傻子。恰好相反，他们心忧虑烦地希望祖国的发展，是真正为了自己民族万世千秋的利益所做的发展，是自己真正当家做主，自己按着自己现实需要和具体利益制订发展计划和政策，而不是永远做别人的利益、别人的发展和扩张的工具，追求剧毒性的“没有发展的成长”。退一千一万步说，即使“追求经济独立”，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是难到近乎不可能，第三世界人民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的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无论如何，是第三世界人民神圣不可侵夺的权利，不容轻侮。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具体条件，按照自己的理想、良知和道德，选择和决定自己民族发展的道路，并且有权反对和抵抗任何压制和阻碍自己决定的发展道路的恶势力，与之做坚毅不拔的斗争。

当渔父以殷惠敏的笔名，在香港一家杂志元月号发表《台湾与依赖理论》，状似不经意间提醒人们，依赖理论是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发展出来时，无非是用心深刻地想告诉人们，依赖理论的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性格。除了对于渔父在落笔片刻中表现出来的灵魂的堕落，感到伤痛，我想引用美国一位保守的社会科学者——他的“穷国之穷未必肇因于富国之富”论，以及“即使没有掠夺穷国，富国照富不误”论，和渔父的壮论完全雷同——彼得·柏格的话，供渔父和一切第三世界买办的知识分子们做个参考。彼得·柏格说道：

……资本主义在今日第三世界的渗透所造成的实际效果，大部分是有事实为证的。此种资本主义所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和政治代价，绝不是单靠武断的信念，而是有事实根据的。富国与贫国之间的两极化，贫国之内大多数贫民与极少数显贵之间的两极化，悲惨状况的增加，第三世界外债的不断增长，贸易与收支平衡的不断恶

化——这一切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杜撰出来的，而是有其客观事实为根据的。（Peter Berger，蔡启明译文）

保守的、亲体制思想的代辩人，不论其古今中外，都会死抱着一个不智的立场，那就是把只要一般的良心和道德就可以清晰地理解的道理，也气咻咻地归咎于这样和那样的“危险思想”的煽动。更何况，依赖论者，在深入检视第三世界悲惨的现况之后，也知道除了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还有来自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垄断的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帝国主义”，并且不惮于对他们发出深刻而尖锐的批判。渔父企图向着台湾的同情依赖理论的人们飞来的“列宁主义”的帽子，不论在主观的理论本身，和客观上台湾言论政策的合理化迹象中，恐怕注定是一场徒劳的心机吧。

好一个无辜的跨国企业

渔父当然不免于要为被称为国际巨无霸（International Giant）的跨国性大企业说尽好话的。他说道：

……人们往往忽略了跨国企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投资与贸易量所占的重大比例。它们并非一定要靠第三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才能生存。

依照“统计资料”，一九七四年美国在海外投资约一千亿美元中，有三分之二是在拥有高度科技的国家中投资。在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只占美国海外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七五年美国国会听证会记录）。但是，任谁也无法否认，跨国企业对于落后国家的投资，利润率最高、最肥厚，远远地超过了资本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投资报酬率。理由是明白的：第三世界劳动力的价格低，在台湾十个月的工资，只能抵得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一个月的薪水。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智利、巴西的工价还远比台湾便宜得多。此外，第三世界国家在税额、投资优惠、财政优待上所给予的利益和特权，尤为可观。因此，一九七四年，以美国为基地的美国跨国企业从埃及吸回的利

益，等于同埃及一年国民生产毛额的四倍之高。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间，美国从第三世界汇回的利益是两百三十三亿美元。在过去三四十年中，跨国企业 De Beers 从坦桑尼亚汇回美国的利益，是当年它在坦桑尼亚投资金额的三十倍 (E. Onwumere)。

这些价值，恐怕还没包括跨国公司以不正当手段千方百计地把赚自贫困国家的钱“盗”回本国的数目。这些不正当之手段，包括高回报投资用的机器、设备和高等原料，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间各种不按国际市场价格，而以所谓“移转价格”的买卖；包括出口给相关公司时低报价格逃税，包括国际管理人员差旅费、薪资的浮报等等。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海关、税务、会计的不发达和容易收买贿赂，这种不正当的手段几乎是各跨国公司高层财务会计人员所熟悉的看家本领 (D. A. Offiong)。

尽管渔父和其他欧美系社会科学家老是装着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以各种不同的语言说：跨国企业“并非一定要靠第三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才能生存”。但几十年来，驻在第三世界各国的跨国企业，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惜以超强大国的政治力、外交力、经济力、军事力和特务力，公然破坏国际法律和和人权、道德与良心的制约，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以观，对于第三世界的榨取和掠夺，依然无可否认地是西欧跨国企业甚至政府的重大利益。当然，对于这一点，渔父还是要做困难而技穷的狡辩的。他说：

跨国企业进入第三世界，未必会造成后者的贫困化。但跨国企业的主顾时常是一国的政府。为了追求利润，维护垄断的经济利益，跨国公司往往发觉它和专制政权是利害与共的。可是由此建立起来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可以保障眼前的利益，但同时也可能成为一个必须在未来付出重大代价的政治陷阱（伊朗就是一个例子）。一般而言，随着所在国政治的多元化及各种不同的社会压力集团的出现，跨国公司所扮演的角色也会发生变化。认定它们必然地与专制势力“狼狈为奸”，本身就是一个专断的看法。

“跨国企业进入第三世界”，会不会“造成后者的贫困化”的问题，是应该摆在整个“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新殖民主义结构中去思

考，而不是单独、孤立地问“跨国企业”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即使前文举过的保守派社会学家彼得·伯格也不能不打着未死的良心这样说：

……在新殖民主义形态下，外商通常将新产业的利润转回母国，而使第三世界国家的支付逆差不断增加。而推动耗资而不经济的工业化所负的债务更会使支付逆差的压力显得格外沉重。发展所谓的“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e）工业的策略，在一九五〇年代及一九六〇年代初在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曾被广泛推介为发展的标准处方。但它应用下来的结果，几乎在任何地方皆招致失败。由此可见，新殖民主义正是意味着愈来愈穷，以及对外国势力愈来愈依赖。（Peter Berger）

彼得·伯格并从而印证，以跨国企业为主要的作机转的现代新殖民主义在第三世界中所造成的，是一种使第三世界不断地奔向愈陷愈深的“发展不足”的形成过程（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也就是贫困化、解体化、附庸化的过程。

其次，既然渔父自己谈起了，让我们也约略地看一看跨国企业和“专制政权”的关系。为了免于理论的冗繁，我们就以美国参议院自己的调查报告为依据，谈一谈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简称I.T.T.）、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怎样以周密的计划，推翻了智利阿连德政权。

为了阻挠、破坏主张把美系铜矿企业、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的智利总统候选人阿连德当选，早在一九七〇年，I.T.T.的总裁（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约翰·麦康就曾出资数百万美元，找智利人进行阻挠阿连德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同年八月，国务院正式训令美国驻智利大使柯尔利，要他采取由美国出兵干涉以外的“任何方式”，挫折阿连德在普选中成功的机会，并拨出美金三十五万元贿赂智利国会议员，促使他们推翻总统选举后阿连德当选的结果。后来，另外一位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长达三十五年，当时任职I.T.T.高阶管理工作的尼尔，向国务院呈递了一份包括了十八个行动要点的政变计划，用以推翻智利新政权。美国政府完全接受了这项周密的计划，开始了长达五年的部署，由当时尼克

森政府的财政部长康耐利主持其事，并派遣国务卿罗哲尔和几个美国大跨国公司 I.T.T.、福特、Anaconda、Purina、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的最高决策人举行秘密简报，一再保证“尼克森政府是企业界的政府”，它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在于“保卫美国企业的利益”。这以后，美国政府联合跨国性企业、国际性银行团对智利进行周密、无情的打击、孤立和掣肘的行动，企图造成智利的经济混乱、瘫痪其贸易，并收买智利报纸、工会和国会议员，造成强大的反阿连德的舆论和政治反对力量，终至于以军事政变，一举击溃了阿连德政府（R. Barnet and R. Muller）。

不错，阿连德是个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跨国企业和美国政府、中央情报局合力以长达将近十年的时间，花费高达一亿三千多万美元，处心积虑所打倒的阿连德，无论如何也无法用单纯的意识形态动机去解释这件举世著名的政变，从而去掩盖这次大手笔政变背后隐藏的经济动机。“尼克森政府是（美国）企业界的政府”这句话，正好道尽了倒阿政变的根本性格。如果渔父们依然不服，那么我们随随便便地便能举出另外的好几打这种国际企业、超强政府、超国界特务甚至国际机构——如六十年代初的联合国——共同合作，颠覆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胆敢“追求经济独立”、胆敢搞经济国有化和本色化的政府之实例。多明尼加、刚果（萨依）、索玛利亚、玻利维亚、希腊、巴西只是这些倒楣的政权的一部分罢了。至于卢孟巴和卓姆贝，那只是几个倒楣的、被暗杀的领袖中的两人而已。也许渔父们终于还要说，这些人不少是“左派”、是“共产党”。那么，我们仍旧以坚定相信着资本主义优越性，对于曼坎（H.L. Mencken）的名言——“若果相信苏联已经摆脱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的话，那无异于像是相信圣灵降临派教友们的确是摆脱了一切的罪恶一样的荒谬”深为共感的彼得·伯格的话，来回答他们：

在第三世界里，资本主义在对付满足人类的需要上，几乎完全失败……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可能会面临愈来愈令人灰心的情境，而社会主义便在表面上看来是唯一剩下来的可靠的途径。即使资本主义最后仍然行得通，但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有些短期的社会紧张与

压力，已经愈来愈难令人忍受了。……但在此种情况下，革命可能是一触即发的。通常，这种革命都会揭起社会主义的旗帜，特别是资本主义渗透得十分强烈的国家里，譬如拉丁美洲。正如一位著名的（天主教）主教阿西欧（S.M. Arcéo）本来是反对基督徒参与任何政治主张里面，但自从参加一项在智利召开的“基督徒与社会主义”会议后，对社会主义却表示完全支持。他说：“除了社会主义以外，别无其他解决之道。”此种结论将来极可能广布到所有第三世界国家。（Peter Berger，蔡启明译）

任何读过彼得·伯格的《牺牲的金字塔——政治伦理和社会变革》（台湾译：《发展理论的反省——第三世界发展的困境》）的人，都清楚知道上引彼得·伯格的一段话，绝不是在为“社会主义”张目。恰好相反，伯格试着告诉我们，在新殖民主义支配下的第三世界一片灰暗，令人绝望、沮丧的情况下，任何忧时爱国之士，即便是一个有神论者，终于是难于不被因“资本主义”“十分强烈”的“渗透”而“愈来愈令人难以忍受”的情况所激怒，而奔向“社会主义”的。伯格的话，是要求那些动辄“一味归咎于左派的批评”的，对于市场功能的理性和社会发展或成长怀着高度迷执，并不惜以生命的意义去交换的人们一个反省的角度，从而去探索伯格自己的政治伦理。至于他国是否有权以国际范围的力量去干涉别国自己选定的经济发展路线和制度，就不必我在这里饶舌了。

渔父善心地谈到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安静地等候一些具体条件——例如“政治的多元化”、“各种不同的社会压力集团的出现”——的形成，更加安静地等待“跨国公司所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关于这，我们只举出两点：在上举的，动人心魄的超强国、国际企业、国际特工、国际组织联合起来的封锁、打击、暗杀、政变和颠覆下，世上又有几个国家能不为之粉身碎骨？更何况，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没看见一个现实具体的实例，告诉我们跨国公司怎样变换了“所扮演的角色”。跨国企业，绝不是像渔父所称那么无辜地忽然“发现”了它与结构性压制和改革势力“相互依存”。不，容我们说，早在“东印度公司”时代，跨国

企业便发生在当初带有无可辩饰的掠夺和压抑的性格！

在台湾，我自己亲身的体验中，曾经遇见过不少素质优秀、练达、勤勉、正直的跨国企业干部，赢得我真诚的友情和敬意。跨国企业的一切缺点，源于它内生的体制机转。依赖理论在批判这些显著的经验上存在的事实之余，没有人反对过与跨国企业合作。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要求跨国企业应该本于企业伦理，和地主国合作，遵守地主国的法律，理解和尊重地主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与理想，严格整肃自己的纪律，绝不从事和参与破坏、干涉和颠覆他国以增大企业利润之事。跨国企业总有面临这样的选择之一日：真正“改变”它所“扮演的角色”，做一个殷实的国际商人，或者是在广大正义的世界人民之前轰然倒塌。

“忍辱负重”——问题在于要忍到几时？

欧美系为世界体系百般辩护的社会学家，不时地告诉人们，第三世界应该乖乖地在世界体系之内，欢迎外来投资，鼓舞自己的资本主义。虽然在整个过程的初阶段，贫富差距扩大，失业大量产生……但这是奔向发展的必要的阵痛。要在这段痛苦的时期，赶紧形成资本积累，准备“经济起飞”时代的降临。等到资金积累到某一个程度，自然能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欧美资本主义，便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如今不但社会富有，而且分配也一般平均了。这些学者因而要人等待，要人忍耐。用渔父的话来说，就是“不惜暂时地忍辱负重”，要从“具体的生产因素着眼，在资金、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发展加工形式的出口导向成长”，等等。“不惜暂时忍辱负重”，时间一到，经济发展的利益终于能均沾到每一个国民之说，便是类如渔父所说的所谓“布泽效果”或“扩散效果”(trickle down effect; spread effect)。但问题在于：当前第三世界的具体经济经验中，根本没有任何最轻微的迹象显示这种“布泽”或“扩散”的效果。贫富两极化、饥饿、疾病与失业状况，在过去十年间不但没有改善，甚且反而呈现恶化的现象。没有人能确切地告诉人们，大约再过多久，在什么具体条件下，情况会必然地好

转。忍辱负重，对于苦惯、穷惯了的人民，那是毫无问题的。问题是忍辱负重到什么时候？瞭望那辽阔的贫困、绝望的第三世界，没有一个渔父那种经济学家可以举出一个——只要一个——实例，作为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走向起飞，奔向富裕的国家的例子。相反地，我们却看见巴西、看见墨西哥……这些在贫困、失业、破产中逐年下陷的国家；看见跨国企业越来越相互合作，进行着垂直的和水平的兼并，进行着管理上的长程计划、最大限企业风险安全和有效保持有利于跨国体制的氛围等这些全球管理技术的发展。

“出口导向的成长”——另一剂灵药？

在六十年代向广泛的第三世界推销过以“进口替代工业”促进发展与成长的“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学者们，当“进口替代工业”在整个第三世界范围内全部覆灭以后，到了六十年代，又大力鼓吹起“出口导向的成长”（export-led growth）的法螺来。因此，渔父说道：

在资金、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发展加工出口形式的出口导向成长，无疑是海岛经济形态下的一条合理的出路。面对着人民生活真实的改善，指责这样的发展模式为饮鸩止渴，并不公平。

从台湾的经验看来，渔父的话似乎有一部分道理。但依赖理论所谈的，是一个世界体系的历史发展下对于整个第三世界当今处境的分析。因此，从整个第三世界的背景去评估，所谓“出口导向的成长”，至少存在着这些问题：

首先，是在世界市场上，第三世界出口原始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加工品的国家，由于完全缺乏国际性政治组织和复杂的供需规律等因素，所以完全缺乏议价的能力。先进国新的化学合成物质，不断地取代了第三世界所出产的原料（如色素、染料、橡胶、樟脑、合纤等），使价钱暴跌。咖啡、茶叶的市场早已饱和（Helleiner）。面对着垄断性的国际采购公司，第三世界的出口商人往往被杀价杀得片甲不留。近十年来台湾的

出口商最知道个中的滋味。

其次，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对第三世界出口品的严格设限 (Mas-sel)。有些先进国对于自己国内生产的农产品如肉类、粮食都以法律加以保护。其他工业产品如纺织品、电视机、皮革制品等，常常受到所谓“配额”的限制，或者动辄宣告某项工业品违反了他们的“倾销法”。但在另一方面，却以政治压力强迫向第三世界倾售他们过剩的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好几年来台日间为香蕉输日数量和价钱的争议，日本拒绝增加台货输日的争议，只不过是全第三世界在近十年来越来越常见的景象的一小部分罢了。

再次，近十年来，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一些国际性企业，在广泛的墨西哥、巴西、菲律宾、印尼、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韩甚至南斯拉夫（包括最近的中国大陆）等低工资地区，或投资设厂，或转包给当地工厂，按照他们规定的数量、规格和品质，生产若干中下级产品，输往本国或其他先进国家，形成一个辽阔的国际性转包结构 (International Subcontract)，而被像渔父这样的经济学家夸为第三世界飞向发展之道的一列快车。然而，研究已经指出，这国际转包的规模，是极为有限的。如果从墨西哥、台湾、南韩这些重要转包经济区看来，国际转包出口毛值，是各地区出口额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再细分而论，这种国际转包又分两种：一种是转包给第三世界当地制造商，另一种则由各贫穷国内的跨国企业分公司自己承包。如果把后者扣除，国际转包在第三世界的生产总值比率就相当低了。至于类似而可以相互取代的产品，贫国自己设计生产外销的产品，比起在国外设计，转包到第三世界当地厂商或跨国公司子厂商的转包业务量，就更加地少了 (Sharpston)。

台湾是出口导向经济的一个典型。台湾的一切进口，主要是为了再加工后出口。出口品又多属手工、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也多属上述从欧、美、日转包过来的业务。但是，越是附加价值高的产品，越是受到跨国企业的觊觎，受到跨国资本支配的程度也越高。因此，台湾本地设计、生产出口的商品，多属劳力高度密集、业务量小、资本积累困难的产品。近来，经济部要求台湾工业“升级”，使资本技术都更上层楼。这

个政策，是好的、正确的。但这个政策也碰到过考验：跨国公司肯不肯把生产高技术产品的机会礼让给台湾本地厂商？十几二十年来，台湾的摩托车、汽车、电视以及近来录放影机、电脑周边设计等工业发展上所遇到的困难、掣肘，生动地为像渔父那样执迷“出口导向的成长”的经济学家，提供了另一面的答案。在依赖体制下，第三世界贫国，几乎永远也无法在资金、技术上获致独立的（Y.C.Chen）。

有人说，为了要发展出口工业所引进的先进技术，可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在技术上飞跃。但是事实上，这些技术全是低等、简单的技术，而且率多皆需佐以大量人工，再不然就是一些迅速报废过时的技术。至于出口导向的成长政策，往往招来别人所不要的高度污染工业和技术，更是一项负面的结果。

“先进资本主义国”的工业资本阶级，尤其在连年全球性不景气下，积极向着辽阔的第三世界劳力低廉地带寻求转包设厂，将是一个有增无已的趋向。但这只有使第三世界更进一步经由外国资本、技术和市场的机转，更加深刻地组织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从而加深对于世界体系的依赖罢了。看来第三世界永远在扮演着搭错班车的人的角色。从殖民地获致形式上的解放后不久，第三世界马上模仿西欧的技术和生产，大搞“进口替代工业”，而全盘失败。现在，第三世界又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学家的指导下，大搞“出口导向的成长”。它会不会像当年大搞的“进口替代工业”一样，走向原始目标的反面去呢？目前的经验正在一点一滴地告诉我们真实的答案。第三世界国家如果没有结构性的、内面的根本改革，以利源自内在的真正经济成长，从而使自己可能从世界体系中一步步获得自由，随着外国的经济学家，无反省地奔向“出口导向的成长”，则终究不免要再次遭到挫败的命运，也未可知。

台湾经验的特殊性

反对依赖理论的人，最喜欢拿“亚洲四小龙”，作为第三世界应该组织在“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才能获致经济发展的证明。渔父

自然也不例外。而且渔父以台湾为例，是有着不可言喻的十分细密的用心的。渔父说道：

至于所谓外资的比重同经济成长以及收入分配的平等成反比的命题，已有许多实例可以证明它并非普遍的真理。以台湾为例，台湾不仅持续保持很高的经济成长率（平均为百分之九），而且同一时期反映收入不平等的基数，从零点五七下降到零点二九。在这方面，决策者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台湾奇迹似的发展，不但举世闻名，对于跨越了窘困和丰富两个时代的我，感受尤其的深刻。离开台湾的社会生活只七年许，一九七五年，当我回到家园，觉得台湾真是由沧海变为桑田，有些街市到了无法确认的地步。物质生活内容变化之大，实在不可以道里计。任何数据，都没有住在台湾的人鲜活的感受更具说服的力量。问题在于：台湾成功的例子，是可以放诸全第三世界而皆准，可以复制，可以仿效，可以作为样板呢？还是它是由好几个条件凑合起来的特例，为一般标准的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适用？答案，依照一般研究第三世界经济的学者的意见，属于后者。那么，台湾有哪些特殊的条件呢？

首先，在五十年代，由于东西冷战的高峰韩战，美国政府大量、持续地对南韩和台湾投以援助。这种为了配合美国全球战略巩固台湾的政策性援助，和美国在其他地区名为援助，实为增进美国企业利益，倾销剩余农产品的外援，在数量和性质上，颇有部分不同之处，而这是其他第三世界所不曾获得的。六十年代的美援，对于当时战后残破期台湾经济、金融的稳定，有巨大贡献。其次，台湾成功的土地改革，造成台湾广泛农村财富的再分配，形成一时稳定、有生产意欲和购买力的农村，对日后台湾工业发展，有重大帮助。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有严重的、封建的、殖民地的土地关系问题，也都有各式标签的土改，但很少或根本无法和台湾比较彻底的地制上的改造相比拟。原因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当地和外国地主阶级，阻力很大，和官僚勾结，千方百计破坏土改（R. Barnet and R. Muller）。最后，台湾面积小，人口绝对数少，和印度、巴西等巨大第三世界国家比起来，只不过是他们境内的一个小区

域。巴基斯坦人口七千一百三十万人；印尼一亿三千多万人，而印度有六亿二千多万人。台湾只有一千八百万人，把香港、新加坡、南韩其他亚洲“小龙”加起来，才五千九百多万人（A.K.Bagchi）。亚洲“四小龙”何况还有其他为其余第三世界国家不能有的特殊国际政治、地理和地缘等诸因素。但是，不论如何，从基本性格、从世界体系的国际生产关系上说，台湾在市场和技术上，不可否认地对美国、日本和欧市有典型的依赖关系。而台湾在财政上、资本上的依赖，比较上要较其他第三世界为低（A.K.Bagchi），但也要注意外国金融资本在近年加强了对台湾的渗透这个事实。在大观园这个“体系”下，在大观园外租佃大观园的土地而劳动的贫困农民刘姥姥，和在大观园里老夫人跟前穿细喝辣的丫头，尽管生活水平有很大不同，但其同为奴仆则一。台湾经验，明显地不可引用在其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其理甚明。至于台湾的“决策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类的颂声，在台湾的文献中，可说汗牛充栋，相形之下，渔父的“发挥了重要作用”，只不过是一句无足轻重的空话罢了。随便举个例，台湾的“决策者”从历史经验中积累了宝贵政治技术，使美国三十年来各种直接、间接对台湾的渗透、支配和颠覆，难以得逞，避免了社会政治的不安，对于台湾的发展，贡献就很大。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万一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决策者”的意识形态、经济政策和大国意识形态相悖，和大国的跨国企业利益相左，从而违反了大国的全球战略，则以许许多多冤死在暗杀、政变、阴谋的非洲、亚洲、拉美的“民族主义”的“决策者”为殷鉴来看，怕是再贤明，也难以“发挥”“重要作用”吧。

关于“利用外资外援”、“价值观念的交流”及其他

主张依赖理论的人，并不曾像渔父所说，绝对地拒绝“外资外援”。依赖理论所指责的，是这“外资外援”，不论来自西欧和美国，或是来自苏联，大多带有令人无法忍受的、对于受援国的支配、控制和榨取的性格。跨国企业资本对各投资设厂当地的发展，并不是绝对不能发生正面

促进的作用，而是它不正当的营运，对于它自己巨大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恶用，破坏了它所能发挥的正面功能（O. Akinmolandum）。一项联合国调查报告这样说：

由于能够发挥巨大的经济力，跨国企业也能发挥政治力量，不时干涉公司住的主权国家之内政。这种行为，是对于住在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拒否，从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自己的自然资源和自己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若干跨国企业在其支持若干落后国家中的殖民主义的、种族歧视的、种族差别主义的政策上所扮演的重大角色，构成对于世界和平、安全与缓和之威胁。……跨国企业阻害了（落后地区）工会的充分发展。

——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报告，一九七六

如果渔父们肯花一点工夫，就近到联合国档案中翻一翻资料，他们一定能在同一报告中找到更多关于跨国企业如何干涉和破坏各地主国金融、法规、投资政策、外汇政策和劳工政策等，如何对各地主国法律和司法拒不服从，对各国内政进行直接与间接的干涉，并要求其母国为了跨国企业的利益，对有关的各地主国进行政治和军事干预和威胁；跨国企业如何成为其母国“外交政策之工具”，从事于为害各地主国的情报、颠覆和阴谋活动；跨国企业如何做有利于各地主国中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差别主义和外国占领的活动……这些事实。但即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企业基地的美国，它的国会为了警觉到这些“国际巨无霸”对美国某些长程利益的危害，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如果渔父对这件事不去故意遗忘的话，他就应当想到，如果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如果美国自己的国会都对跨国企业深怀戒慎恐惧之心，渔父又凭什么要别人相信“只要”(!)“顶得住”(!)“外在的经济逆势而维持下去”，就可以“利用”(!)“外资外援”？

其次，我们也来谈谈“外援”。第三世界各国不但不拒绝“外援”，还曾主动向富国和强国要求外援。依赖理论不批评“外援”的本身，却惮于诘问这“外援”的性质。第二次大战以后，一切穷困受援的具体历史经验，几乎没有例外地告诉人们这外援的支配、干涉性格。三十年

来，受援国人民对加援国产生越来越深刻的仇恨情绪，恰好是一个生动的佐证。

关于“外援”，我们还是先看看联合国的资料：在一九六〇年代，联合国在西欧经济学家与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家的指导下，搞过几个促进落后国家进步与发展的组织和工作。说过许多漂亮的话，做过无数慷慨的允诺之后，美国和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各国，不但不肯承认以自己国民所得的百分之一，来援助落后各国的经济发展的先前的承诺，还大打折扣，把百分之一降到零点三五左右。对于缓和落后国债务压力，开放部分市场给贫困国，增加贫困国船运在世界船运市场中的比率，对贫困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援助……这些承诺，不但不遵守，而且实际上大搞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市场垄断，并把大量的金钱投到花费惊人的武器竞赛中。因此，联合国的一项报告沉痛地指陈：

把当前世界武器费用挪用其百分之五，用于联合国原先计划中的援助（落后国家发展的）目标。只要对军赛费用做实质的限制，会造成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的移转。一九六九年，落后国家所需要的固定投资总额估计为六百五十亿美元。只要把世界军事开支的百分之十移作投资，就能提供更充分的资源。（C. Waterlow 所引）

其次，“外援”总是带着深刻的政治、经济上的苛刻条件的。有些“外援”往往不是因应受援国人民自己的现实需要，而是按照援助国的意识形态和它的国际体面而给予、执行和监督的。二次大战后，所有这些对贫困国家的外援，只留下一个共通的结果：失败。农耕机废置在荒旷的大地上生锈，许多于民生无补的“面子”工业和建设比比皆是，浪费、技术知识不足、政治上的腐败贪污，充斥着受援国的社会（C. Waterlow）。大部分的“外援”往往和受援国真实、基本的发展脱节，只让少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获益，而广大的民众却一仍无法获得“外援”的利益。尤有甚者，这些“外援”往往支持和强化一些军事专制政权，以维护加援国在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军事上的利益。而且即使是来自形式上比较非政治性的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援助，也被一定的意识形态所支配，成为大国达成其外交、政治、经济和军事目

标的工具 (C. Waterlow)。美国对伊索比亚专制政府长年援助、支援葡萄牙政府在非洲的殖民主义战争，在安哥拉、萨依、南非的各项“外援”，只是这种模式的“外援”典型之一。此外，苏联和东欧集团对第三世界的“外援”，也同样带着帝国主义性格。苏联的援助，目的也在把受援国的经济和它自己的经济圈连带起来。接受苏联援助的代价，是把当地农产品和其他产品以低于世界市场价偿还——例如埃及和苏丹共和国的棉花。苏联以贱价获取，却以高价在国际市场出售，使受援国失去获取外汇的机会。因此，问题不在于“接不接受外资外援”，而在于接受什么性质的“外资外援”。正如一位非洲国家的领袖说的：

……倘若我们要建设国家，我们非但需要技术资源，更需要资本资源。如果我们能够在国际社会上获得所需最小的外援，我们就会接受它。如果有现成的公共资金要帮助我们，我们就要。但是，我们要问接受这些外来投资的条件，问这投资的计划上的条件。除非我们在经济计划、在法律上真正是自己的主人时，我们对任何公共和私人资本所做的让步，才是我们在自由、独立的条件下所做的让步。(Madeira Keita)

这些话真是道尽了大多数第三世界人民心中对“外资外援”的看法，也道尽了二次大战以还一切“外资外援”所具有的帝国主义的、自私的性格。

渔父在为新旧殖民主义的物质支配辩护之余，当然不忘为它的精神支配说话。他说：

国际经济是相互依赖的。除非采取一个封闭的发展模式，否则就不能避免经由商品贸易所引起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交流。即使没有跨国公司的存在，以出口贸易为主的国家，由于大量生产外国订购的商品，也自然而然会受到这些商品所反映的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影响……

当渔父说“国际经济是相互依赖的”，他似乎企图说明这“依赖”的“相互”平等的性质。这当然是欧美经济学家的谎言。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贫国的经济和社会，是作为富国经济和资本的发展与扩张的

反射而运动的，已如上述。至于说到“文化价值观念的交流”，渔父也想用“交流”这词，来表现交流的相互的、平等的性格，这当然又是欧美经济学家的谎言了。

跨国公司为了在全世界推销产品，它的行销计划，也是以多国为范围的。在整个行销过程中，跨国企业以雄大的财力和人力，对第三世界市场国文化进行依乎行销目标所必要的利用、改造、解体的工作。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国际性行销管理如虎添翼，透过各种行销传播，达成塑造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改造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利商品的倾销。结果，许许多多欲望解放主义、享受主义、消费主义破坏和取代了许多古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例如与天、与自然相和谐，欲望的适当节制，知足知限的哲学与伦理——以利创造和操纵人类超乎自然的需要和欲望，达到商品的国际范围中的推销目的。

通过成本很高的各种大众传播形式，例如电影电视节目、广告影片、报纸和杂志，大国的“文化价值”在广泛的第三世界中所向披靡。种族偏见（例如美国西部片中的印第安人，外国电影中的中国人），殖民主义，白人种族中心主义，对商品的夸大过的饥饿，从美国、西欧的观点和偏见去报导和解释时事新闻……都通过西方强大的大众传播打入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灵中。

大国设备完善的教育机构和研究发展单位，每年吸引了大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前往各大国受教育、研究和训练。其结果是最大规模高效率的洗脑工作，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进行向着文化、科技“中心”改造的运动。人才外流、在第三世界内部培养了一大批和大国的国际资产阶级有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的买办知识分子，或如法兰滋·范农所称的“鬼影子知识分子”（phantom intellectuals），不但向他们的国人大肆转贩新殖民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例如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依赖理论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反抗论——还协同外国支配者对自己祖国进行剥削，为巩固本国军事独裁政治拿主意、出点子。

这是什么样的“相互依赖”、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交

流”啊！

至于说把可口可乐工业、麦当劳工业，同散在外国的中国餐馆相提并论，则是渔父的另一个笑话。可口可乐、麦当劳，是不折不扣的世界性企业，有全球的管理观点，都没有自然或政治的边界，都利用它的跨国性规模、财力和力量，通过国际银行团、现代通讯、传播技术、现代企业组织和管理，有效地获取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利润。渔父怎么能把这“世界巨无霸”级的企业，和一些苦哈哈的中国人在西方开的中国餐馆相提而并论呢？

麦当劳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在口味精巧的台北中国社会中造成轰动、造成一日数百万台币的生意，决不是它的东西好吃，而是由于它品牌的“威名”、由于美国大众传播长年来在台湾所造成的广告效果、崇洋媚外的气息……在赤贫的中南美洲，农民甚至可以积存小钱，为了去买一瓶从美国进口的糖水——可口可乐。如果可口可乐在拉美贫困的大地上，经由广告和行销，创造绝非必要的消费，造成大量外汇的丧失，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者”（注意渔父用引号表现的，对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的轻蔑和仇恨的情绪）当然有权反对他的人民继续喝别人的可口可乐，特别当他们也有自己的“黑松汽水”的时候。

“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

如上所述，所谓“发展不足”，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发展，在发展性质和层次的比较上，“发展不足”始有了意义。一个落后国家被组织到“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落后部门愈久，这些“发展不足症候群”就越为明显；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差距和不平等增加，城市中贫民窟蔓延；文盲人数增加；农业生产停滞；国民营养不良情况每况愈下；疾病普遍，生育率居高不下。在某些地带中，甚至死亡率也在增高。国债日增，财政赤字增加，军事开支有增无已，而警察的压制不断强化。外国企业榨走大量的原料和利润……总之，落后国家的发展，是一种不均衡的发展，忽略了绝大多数最急切的社会需要，却满足了境内一小撮

富裕的消费阶级和外国公司的利益 (C.H.Anderson)。除了新、老殖民主义,外来的文化、军事和经济干预,第三世界“发展不足”的动力性原因,在于“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对于成长的狂嗜所造成的对于经由控制原料、廉价劳动、出口市场、关税优惠和特权、价格操纵和财务利润的系统性的贪欲 (C.H.Anderson)。而正是在这“发展不足”的形成过程中,在广泛的第三世界内部,产生了与外国的国际布尔乔亚相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正是这一层人,在前殖民地获致形式上的独立之后,取代了殖民者官吏和商人,使国内和国外的国际资本加强了彼此的连带,往往在经济上、政治上进行着违反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行为。为新殖民主义辩饰,打击和密告“民族主义者”,宣传“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光荣繁华、之不可抵抗论,以为国际资本在地主国内预备良好的意识形态气候 (ideological climate),只是依赖理论中所说的这些“买办阶级”/“买办知识分子”/“精英布尔乔亚”以及法兰兹·范农所谓的“鬼影子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属性和日常工作罢了。在充满着革命与反革命、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复杂斗争的近代、现代第三世界历史运动中,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间发生着相应的、复杂的分化。有一部分人投入祖国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有一部分人成为外来势力的傀儡,而另有一部分人从反抗者转向,成为买办和鬼影子知识分子。渔父所引的韩国抗议诗人金芝河,正是韩国革新的、抵抗的诗人。然而,深入地理解金芝河思想,人们不能不发现,金芝河那“充满着人间爱”的“眼里”所看到的“一幅交织着血与泪的构图”,正是直接向着支配着韩国的日本新帝国主义势力,以及与这势力相勾结的军事独裁体制所发出的强烈控诉。离开了韩国的“发展不足”,就不能真正理解金芝河。金芝河,是反对一九六四年六月三日“日韩会谈”的学生干将,并且因而在六四年和六五年投狱。在他手写的“民青学连宣言”中,对于韩国的繁荣与发展,金芝河是这样理解的:

以饥饿输出立国,以 GNP (译注:即国民生产毛额) 信仰为教理,以促成民族资本的压杀和买办化,把数十亿美金的外债转嫁给国民以榨取血税,把绝对性权利奉呈到独裁者的手中,把包括基干

产业在内的经济部门化为阀族私有的韩国买办阀族，是造成今日韩国无从缓解的悲惨的元凶。极少数的特权军阀，把国民经济引导向全面的破绽状态，却把责任归咎到国际性原料的大暴涨，而企图掩盖真相。

对于当时韩国经济的认识，金芝河是清楚地具有结构性的理解力和分析力的。金芝河紧接着就说道：

而这一国民经济的全面性破产，正是将资源和劳动力廉价出卖，把外国独占资本当做宗主并使之在本地生根的买办特权体制，和由于不正腐败的余波所扩大再生产的娼妇经济构造（译注：指韩国以色情观光赚取外汇）的总的产物，至为明显……

……在民众悲惨的状态中，反而提倡豪游和放荡，难道不知道无数的民众正流着血汗！在饥饿工资残酷役使下的勤劳大众和在封建榨取下呻吟的农民，使韩国内部一个被隔离的世界中，扩大着贫民窟——这就是十三年来我们祖国“现代化”的业绩！

金芝河对于自己生活的社会的分析，恰好生动地为依赖理论有关“发展不足”的论点，提供了支持的证据。也许渔父会说：金芝河据以理解韩国的“理论”（据上引文章以观，金芝河是有着广义的理论训练的）是“有缺陷、有破绽”的。金芝河的价值和好处，在于他没有“横眉怒目地跳出来”写出“说教的味道”“浓”，“文学的成分”“稀薄”的作品。那么，就让我们引金芝河的另一首震惊了世界良心的长诗《人民的声音》的几句：

揭开来看看五·一六政治
流氓的卖国行径：
想当年
帝国主义日本鬼压制民族
独立
他就加入日本军队
不打杀民族独立
到如今

美国佬往哪走，他就往哪靠拢
在绳索上来回晃荡
哪儿有机会他就往哪儿晃啊
……

高举“革命公约”，说是
为了解除民众的疾苦
宣传着搞“民生复归”，
却只把军装换成了西服
这就是现代化、就是建设啊
为了给对外依赖找个托辞
搞什么韩日建交
违背民族利益才是真实！
引进外国资本
使民族经济破产，奄奄欲死。

这首长达两百七十五行的长诗《人民的声音》，对于政治独裁、买办祸国、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危机、沉重的国债、豪游冶荡的社会风气、农村的破产、对工会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抑压、苛捐杂税、买办知识分子的曲学阿世等，有痛烈的抨击。对于当局不公正地优容“外资外援”，金芝河似乎也“横眉怒目”地“跳出来”唱道：

外资企业暴利，怎能视若无睹
整备外资投资环境
发扬那买办的根性
把免税特惠大把钞票
孝敬祖宗似地送到出口免税区
外资企业的利润，每年两亿美金还不止
国内企业的利润总额，连那零头儿都比不上
加工出口区，使国内地域格差更扩大
在资本集中的逻辑下
大户享尽特惠特权

中小企业啊，连片地倒……

对于渔父，金芝河的《人民的声音》，恐怕不但“用心太过急切”，也是“野心太大”、“所要探讨的问题太多”、充满着理论文章式的“长篇大论的铺述”之“败笔”吧，但对于为了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革新的韩国人民，是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韩国“全国民主青年学生总联盟”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争议中起了感召、控诉和鼓舞、感铭的作用，成为第三世界抗议的、良心的、人道主义文学的重要典型。

如果在认识上和情感上不同意大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对小国的支配，不承认国际资本和国内一小撮“买办阀族”的结托对国内独裁专制政治的支持作用这些经验的历史的事实，就不能认同金芝河作品中所表现的、韩国在“发展不足”的形成过程中，韩国人民的“苦痛和挣扎”的“血与泪的构图”。如果一个人认为服从于“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对的；认为落后国“发展不足”与富国的扩张无关；认为落后国家纳入世界体系经济才有发展，反之则会搞得经济“一塌糊涂”；认为跨国企业不是“必然地与”地主国的“专制势力‘狼狽为奸’”……他会对金芝河的作品和思想产生共鸣，断然是欺罔的。那么，在经济理论上明显昭著地是保守的渔父，何以竟表示尊崇金芝河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的文学呢？这就要从所谓“转向症候群”（conversionist syndrome）加以分析了。

在宗教心理学上，对于信仰转向（一称“改宗”或“叛教”）的心理，做了分析。一个转向者总是从一个激烈的价值，改变为与前一个价值完全对反的一组价值，并且保持原来的激狂，或者比原来更为激狂。这是为了为自己的改宗转向以真实或欺罔的道德与良心的正当性之所必须。因此，改宗转向后显示对前一组教义的真实或虚构的仇恨与畏惧，迸发而为激烈、残酷的攻击行为（例如宣判他前此所信的教义为“异端”而加以迫害）。而这又是对于自己改宗转向的潜在的羞耻心和负罪心的攻击性掩饰。这种掩饰和伪装，还表现在对于公认的道德、人道的关心。在另一方面，有些激烈的转向者，往往成为原信仰的热心的逼迫者，成为原信仰最热情的警探和行刑人。

在某种意义上，渔父的心态，恐怕与“转向症候群”有一点关联。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有一些北美留学生，在保钓爱国运动中向左回旋，不一年，又向着“统运”飞跃，“四人帮”时代，他们目睹了中共政治的黑暗，这些人经历了幻灭的痛苦，思想转变，开始以另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即资本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价值，批评和嘲讽中共。最近以来，看着大陆向西方资本主义开门，心中窃喜，企图在大陆和台湾进行双向的买办活动。他们疑心，台湾似乎有几个死不悔改的“民族主义者”，于是，抛出类如《愤怒的云》一类的文章。谓予不信，则让我们看看渔父“用心急切”的几段话：

然而，关于（陈映真）新的信念的具体内容，仍然语焉不详……

又说：

“典型”已不复存在。但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纽带却是魂萦梦牵的。因此苦闷也必然会继续下去。这不是靠理智的决定所能终止的。

前一段话和数年前某一篇对我点名批判的文章，颇为相似。那篇文章，也指责我“语意暧昧”“莫知所云”，也一样指控我的小说是“带着褊狭的公式去写”的，一前一后，互相辉映，颇有异曲而同工之美。

“四人帮”崩溃后的中共所暴露出来的大陆政治的严重失败与错误，不要说对中国革新的知识分子，即在全世界左翼知识分子中，也引起了广泛的自己批评和反省的思考。但这反省却决不致后退、又回旋到了否定反帝民族主义、否定“世界体系”四百年对落后国的支配和榨取这个历史的、经验上的事实，到了肯定帝国主义压迫有理论，主张穷国必须接受富国支配才能发展论，和跨国企业无罪论的地步。

彼得·伯格在论及所谓“革命的神话”（指第三世界反帝、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之所信）和“成长的神话”（指欧美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者之所信）之间的差别时，并且饶有兴趣地指出了它们之间互相关联和互相结合的特质。则一度狂信过“革命神话”的渔父，在理论贫困的原点上，迅速地向着“成长的神话”狂热地转向，也就丝毫不难于理

解了。

渔父引用的西隆尼的话，确实是大幻灭、大反省、大探索的时代中，发人深省而又鼓舞着人们向前跋涉的话语。不错，还在发展、修正和充实的依赖理论，也许不免于还是有它的“缺点”和“破绽”，而有相对的、“一时”的性格。但它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弱小民族追求经济、政治真实的独立、反对强国和大国欺凌和支配弱国和小国，要求打破目前世界体系支配下的国际经济结构，重新探索一个平等、自由、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公正的国际经济关系，“却是永恒的”。而在“这一组价值上”，世界上凡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们，可以努力去“建设”一个新的、大小国家和民族一律平等的“文明”，一个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新方式”。

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

整个亚洲之中，各民族各有它们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然而，今日亚洲各族人民所面对的各种严重问题，却有高度的共同性，那就是被外国独占资本和与之相结合的国内支配阶级的掠夺所产生的贫困和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从十九世纪的旧殖民地时代以后，贫困在古老的亚洲大地上一贯地再生产着。几百年来，贫困的差距、穷人的数量，在广阔而古老的亚洲只有愈加恶化的倾向。

新殖民主义荼毒下的亚洲

二次大战后亚洲前殖民地的“独立”，其中绝大部分并不真实。因为今日的亚洲“国家”，许许多多都是过去西方殖民地主义直接的产物。如果亚洲不曾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入过，亚洲人民所建造的国家，肯定和今天的国家在性质和形式上完全不同。亚洲的贫困之再生产，基本上这是历史上新旧殖民主义本身所再生产的，新旧殖民主义，对于亚洲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构造往往不是加以现代资本主义的改造，而是依据殖民主义的利益，时而和传统的社会构造体相温存，巧加利用；时而竟加以固定化。今日广泛存在于亚洲的半封建甚至封建的殖民时代大庄园制度和其他的落后而残酷的生产关系，便是显著的例子。契约栽培、保税加工特区和企业农庄等巧妙的手段，是今日外国和本地殖民地统治阶级，超越了国境的限制，经由其“国际的结合”而完成的。

* 本文刊于《海峡评论》（台湾）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通过国际借款、援助计划、合作计划、引进外资以求“发展”的过程，在亚洲地区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以压制人民自觉选择和参与；以强权的暴力抑压人民在这被迫的“发展”计划中遭受损害所引起的反抗的过程。“绿色革命”的技术改革过程，由于没有和农民充分沟通、讨论而强加于人，从而产生巨大的损害。在生产性比较落后，无法吸收“绿色革命”技术改革的偏远山区的稻作农民，因无法生产廉价的稻米，而被迫从市场原理中剥离，陷入更严重的饥饿与贫困。马来西亚的稻作农民和橡胶农民的遭遇就是例子。

急于通过资本主义改造而追求发展的亚洲，由于殖民主义掠夺机制残存，不但没有创造出均质的、主动积极的工人和农民，反而从工人和农民的分解体中产生更多的贫民。统治者利用亚洲复杂的文化、人种、宗教和语言的矛盾，使这些穷困的人民互相对立，互相敌视。穷人歧视穷人，穷人敌视穷人。亚洲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累积过程所大量产生的贫困，因贫困人民间的矛盾而掩蔽了贫困本身的剧烈痛苦。

许多亚洲自觉的政治经济学家认识到：这亚洲贫困的再生产进程，同时也是富有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富裕的再生产进程。北方的先进国家固然也有贫富阶级的分化，但通过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从广泛第三世界吸收的财富，使先进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镇静化和缓和化，是不争的事实。对大多数的亚洲社会，由于殖民体制的残留，使得工业部门的现代工人阶级、自营农民阶层、城市白领阶层的产生受到扭曲，而使贫困更为尖锐和严重，从而在亚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强化了由西方支持的、“政府”的权威主义的个人，使亚洲各地人民的民主、人权和自由，遭到严重损害。在过去四十年冷战的年代亚洲法西斯军事政权，以反共国家安全之名，以经济快速成长为饵，进行对于亚洲人民长期独裁、腐败的支配。另外，还通过军援、贷款、合作开发……向亚洲大地渗透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使亚洲国家在输出市场、资本、技术、半成品……方面，无可自拔地依赖外国资本。先进国繁荣富裕过程，成了亚洲第三世界贫困停滞的过程；先进国“民主”、“自由”的过程，也和贫困国家专制、戒严反共法、国安法结成密切的关系。

大陆知识分子的变貌

亚洲的故事，其实就是广泛第三世界的故事。

以这样的故事为背景重新认识、评价和批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不但是四十年极端反共、极端受到冷战学术和价值所支配的台湾所没有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后，似乎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也不可思议地失去了这样的视角。八十年代以后，大陆上越来越多的人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留学；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被组织到各种国际性“基金会”和“人员交流计划”。西方正以高额之汇率差距和低廉的费用，吸引大量的大陆知识分子进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脑。和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台湾一样，大陆知识分子到西方加工，被塑造成一批又一批买办精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Compradore litebourgeois intellectuals），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却满心向往和推崇，把资本主义发展以前的和新的殖民主义，其对第三世界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支配的事实，斥为共产主义政治宣传；对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以来的一切全盘否定，甚至对自己民族四千年来文化一概给予负面的评价。在他们的思维中，完全缺乏在“发展—落后”问题上的全球的观点。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大陆的“落后”，缘于民族的素质，缘于中国文化的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当然尤其缘于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和“锁国政策”。一样是中国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取得令人艳羡的高度成长，而中国大陆之不能者，就成了这种逻辑的证明。开放改革以后，即使从海外看来，却能生动地感觉到中国大陆因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摸索，相应于社会生产关系上的巨大改变，而产生了思想上的“两条路线”的分化。《河殇》系列以国家体制派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推出，在大陆全国范围内引起激烈的震动和争论，更是形象地表现了这个思潮上的分化。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何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在《人民日报》用巨大篇幅刊出，就尤其值得注目。

地球规模的观点

何新的文章，据说是一次和日本经济学家、中国事务评论家矢吹晋的对谈记录发展起来的。因此，他当然和一般结构、逻辑严密的学术论文，有本质和形式上的不同，尽管何新在关于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与问题上所作广泛的谈论中，有不少地方还可以更周密、更深入、更构造性地展开，然而，由于这是一次广泛对谈的记录，因而读者广泛注意的，是何新所提出来的论述的总的观点和角度。和大陆、海外一般比较西化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相比较，何新，作为第三世界中充满机会与问题的苦恼的大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世界和中国大势，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突出的观点：

一、全球性的、结构性的观点

许多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论影响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深信世界的发展有无限的前途，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继续开发与发展，即新技术、商品、物质和市场持续的开发和扩大，抱持着乐观主义的态度。但何新看到在地球资源有先天极限的世界，以对于人和自然的剥削来满足利润的无穷嗜欲的资本主义的最终极限性。何新看到在霸权主义、超国界的独占资本主义和新旧殖民主义支配下世界经济秩序和体制中长期、不断增大的不公平；看到世界范围内贫困在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看到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国际化条件下，贫困向古老的第三世界广泛的人民生活中“移转”。

何新也把一个社会的发展与不发展，突破了在一国之内的框架上思考的方式，而提到世界资本主义机制框架上，找到参照思考的角度。何新指出，十六七世纪以来残酷的殖民主义掠夺与当前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大关联性，指出在目前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机制中，富国以资本的剩余和巨额贷款的累计利息，维持和扩大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的差距。何新指出，贫国之贫，除了发展政策的错误，还缘于当前已发

展国家阻止贫困国家的发展。关于后者，何新仅仅以富国的保护主义限制穷国举国债搞资本主义工业化所生产的轻工业产品，造成加工出口以汇还债和累积的计划破灭……但何新没有指出，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精英资产阶级”互相联手，为了他们的私利，阻碍贫困国社会的结构性改革，继续维持贫困、落后的现状，以贫困、依赖、压迫的扩大化和长期化，维持国内外支配阶级的最大限度利益。

二、第三世界的观点

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无疑地有它的世界规模的、全球结构性的观点。何新的全球性观点，当然与之有别。何新采取了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中边陲国家——“依赖的、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观点。所以他看到国际贷款、跨国企业对落后国家造成制度性的贫困所起的影响；他也看到贫困的世界政治经济学（global political economy）上的意义；看到先进国家对贫困国家力争发展过程致命的掣肘。

第三世界的角度

这些观点，历史地看来，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在吃尽苦头的第三世界中，以依赖理论、世界体系论和世界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展开，且有相当丰富的累积。事实上，中国大陆也早已有同样的思想，并在自己艰苦和充满波折的发展道路上付诸实践。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克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副外部和内部的枷锁，断裂了第三世界至今引以为苦的外来殖民主义与内部买办主义、封建主义勾结所造成的锁链，从而坚定地帝国主义长期、紧密的封锁下探索促进生产、改善生活和经济独立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颠簸、错误和失败，也取得了极为难能的成就。自居于第三世界，坚称反霸而不称霸，对更贫困的国家给予最无私的援助，这犹是中国昨日的生活和信念。远的不说，我手头上就有一九八二年第十四号《红旗》杂志上当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所长李琮山的文章：《关于未开发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就

很有这样的视角。然而，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更尤其在踟居西方社会的中国“民主知识分子”之间，早已失去了这样的视野。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只看见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明和开化，对于世界的政治经济，只有横向的视野，去看表面的高低，却没有纵向的观点看到富裕—贫困、发展—不发展过程之历史性展开。在录影影集《河殇》中，甚至嗟怨中国文明的限制性，使中国没有在郑和的航海事业上发展成从贸易而向外殖民，以收夺南洋民族走向帝国主义！而这样的世界观，竟而曾经一时成为中共官方的世界观，令人震惊。因此，这一次《人民日报》不惜以显著而巨大的版面，全文刊登何新的这篇文章，是否意味着中共在“六·四”事件以后权力体制方面的思想有一个转折，就无法判定了。然而，从《河殇》到何新《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的转折，难道不也在说明中国大陆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经济改革理论的不足吗？

总的说来，何新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基本上没有超出战后以第三世界为中心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的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的范围。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西化派、买办化“智囊”统治了十年后的中国，以官方立场和地位出现何新的这篇文章，就不能不令人瞠目凝神了。

何新也以相当大的篇幅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苏东波”风潮之后，当全世界资产阶级媒体齐声讴歌“资本主义历史性的胜利”的时候，何新的发言是引人兴味的。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绩

何新当然谈到中国社会主义的优点。但具体而言，何新在这方面恰不是说过了、说大了，而是说少了，颇为自制。一九八七年，世界银行对一九六五到一九八五年的中国大陆和印度的经济，做了比较。在这一段时间，大陆国内生产毛额的增长率比印度多百分之四十。从一九八〇到一九八五年，大陆国内生产毛额的增长率每年为百分之八点九，印度为百分之五点二。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每单位粮食收成高印度一

倍；一九七九年，大陆每公顷米、麦、玉米的产量是印度的一倍或一倍多。一九八五年，中国大陆的平均寿命、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人均热量摄取量，仅次于日本、台湾和韩国。十亿人口的中国，这样的成绩，相形于广大第三世界长期、慢性、严重的贫困和发展不足，即使是对中共最苛评的经济学家，都不能不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得了无法否认的成绩。比起其他采取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忽视农村福祉、追求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对外国资本与技术高度从属化，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而完全牺牲独立自主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的其他落后国家，中国大陆围绕着她的广大农村，广泛动员长期贫困无助的农民，最大程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坚持自力更生、平均分配的发展，显出独特的风格与成效，而广受赞扬。而即使有过一九五八年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那样重大的起落和转折，到七十年代末，中共还是取得了这些不平凡的成绩（M.Selden，一九九〇）：消灭了以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在城乡内部缩小了不平等；快速而巨额地增加累积和投资，使工业显著发展，打下了重工业发展的技术和总体经济的基础；消灭了外国资本对中国现代贸易、工业、金融和财政的支配，农业生产率初步超过了人口增长率；工人阶级获至实质和精神上的解放，收入、社会地位及福利有巨大增长。

集中与放权的回圈与矛盾

这些快速累积和生活改善，尤其在帝国主义重兵包围、与市场隔绝中，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取得的成长，毫无疑问，是在一个对广泛翻身贫民有高度道德威信（至少在一九七六年以前）的党、魅力领袖和社会主义理想（vision）的条件下，以“动员性的集体主义”（mobilizational collectivism），以赤裸的人海劳动所完成。在广泛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绝望性背景下，自有悲壮、宏伟的评价，是不容抹杀的。然而，正如何新指出，优点的延长部分往往成为缺点。何新指出了社会主义体制的高度集中性，产生了“国家权力的盲目扩张”，把一切管得太紧、统得太死，也

从而产生了官僚主义和腐败；而一旦最高层决策错误，容易造成大患。

事实上，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史看来，“高度集中”并不是常态。具体说，一部大陆经济计划和政策发展史，是不断地重复“集中—放权”的回圈。而在管理、计划、分配权的下放时期，有时同样也产生和集中主义时期一样的经济结构重大失调的问题。“一五”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受到无法避免的苏联模式的影响，搞高度集中计划，甚至放弃了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之前长期、丰富的农村经验，急切地搞强迫性合作化。结果工业积累固然陡增，农村贫困情况没有太显著改善。“大跃进”（一九五八—一九六〇）搞放权、鼓动群众参与、大办公社和炼钢，结果因分权过滥，基建膨胀，本位主义和过度平均主义的发展，使生产积极性最终下降，甚至在部分地区产生饥馑，但为日后农村工业化打下可贵基础。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五年的“调整时期”很像一九八八年以后的“治理整顿”和一九七八、一九八四年的农村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于“大跃进”时期的放权，这时又搞集中、上收和调整（不当的下放企业之裁、停、并、转），发展小规模私有和“一自一包”。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又恢复“大跃进”时期的“鼓动人民参与，大幅放权”，并且在准备世界性战争，发展内陆的大地区独立作战、自主的工业和经济体系遂又产生地方发展和权力的过分膨胀。一九七六到一九七八年的“洋跃进”，基本上沿“文革”的躁进发展，却同时大量引进外资。改革开放时期（一九七八年）前半，基本上是经营和权力的下放（所谓“放权改革”），至一九八七年，空前的本位主义、“过热”发展、基建膨胀、超发工资、奖金和集体消费膨胀，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一九八八年后又搞收缩、调整、上收。但旋即受到“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冲击，在中国沿海地区刮起大规模“建设”，调整的计划停顿，经济进一步失调，基建过度膨胀、资金相对短缺，需求却因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的膨胀，物价陡升，而官僚体制则进一步肥大化和腐败化。至北戴河会议，又搞集中、调整、裁并。

用最概括的话说，大陆经济政策一旦往上收，往上集中，企业就受到层层紧严的制约，地方的、个性特征的企业管理和计划就无法发挥主

观能动性，积极性下降，官僚主义膨胀，“统得过死”，造成生产力和产量下滑，经济失调。但是工业高度累积的达成也往往在这个时期。而经济政策在往下放权的时候，由于放的末端不是个别企业负责人而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法解决经营下放、放权的原始目标：增加自主性、增加效率，结果还是发生另一种（地方）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急功近利主义，失去宏观视野而流于短视。但这个时候，往往是生产积极性比较提高，生产力和生产量比较上升的时候。然而基建膨胀、发展“过热”、经济失调也是这一时候几乎共同的问题。

因此，把社会主义的弊病片面归于过分“集中”，并不准确。而决策“上层”发生错误，也未必全是高度集中所造成。例如毛泽东威信如日中天时的“大跃进”，其实是中央“高层”相当一致同意的政策，在“大跃进”初期，甚至也取得人民广泛、热情的支持与参与的。过去四十年中国社会主义的难题，在于经济显然有它的客观规律。而中共革命的传统中，反对帝国主义、力争独立自主；力争迅速发展工业，振兴中华，是一股十分强烈的主观上的意愿和动力。这主观上的宏大意愿（其实也是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民族各自的意愿）如何与经济的客观规律比较好、比较科学地结合起来，就需要大量、长期的研究调查和实践的累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实践和知识支配着向来的经济学的世界上，社会主义必须在一个充满强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物质与精神世界中，独自艰苦地探索——并付出昂贵的代价。

人谋不臧和“社会主义经济周期”

因此，当何新把一九八七年以后的停滞膨胀（stagflation）看成“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恐怕只对了一半。这一半，就是一九七八年以后的经济改革，是大陆一次有意、有计划地把市场和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改革。这与毛泽东在“大跃进”以后基本上要消灭市场、消灭商品的年代，相去不啻千万里。中国社会主义头一次有这么高比率的商品性质和市场机制，自然就会产生它的“周期”。然而，不能否认，一

九八四年以后，中共当局的“智囊”们在体制改革中大搞“放权改革”的结果，工资、奖金、管理费用和集团消费狂飙超发，地方争夺基建资金，乡镇企业争夺原材料和资金，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泛滥……恐怕是计划、战略、知识不足、体制不良这些主观上人谋之不臧的因素，也不亚于客观的“周期”之出现吧。

其次，改革开放固然带来了进一步累积，商品比往时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基建有长足的发展，生产力有所提高。但同时中国大陆社会的生产关系却已经和正在进行着一九四九年以来头一次重大的逆转。家庭承包、市场和私人创业范围不断在扩大，对雇用外村劳力的限制松弛和减少，极大地恢复了私人、家庭对土地、劳力和资源分配的控制。私人经济机会惊人地扩大。

新的阶级分化

这些巨大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城市和农村范围中阶级分化的开始。越来越庞大的人口在私人部门中谋生，独立商号、雇用劳工的企业家、承包和承租土地的农场经营者倍出。从五十年代集体化以来，中国大陆社会阶级从同一化的趋势到此而逆行转变为阶级的特殊分化。以财产为基础的差别……甚至不平等，在革命四十年后重新出现。如果前四十年的中国是国家集体的扩大，市场和私人经济的缩小。到八十年代，这一切都起了根本的变化。雇佣劳动者重新出现，雇用十几个、几百个劳动者的雇主阶级重新出现。M.Selden 引用的一份资料揭露了在一个迅速工业化的浙江乡镇，童工制度重新出现。多达七百名农村儿童和十一十五岁的青少年，每天在铝厂、印刷厂、塑胶厂工作十一十二小时（最坏的有长达十六小时）。这些童工工资每日一元人民币。成人为三元。“改革”促成了儿童和青少年辍学率的提高。经济上的渴求，使家长鼓励儿童和青少年辍学投入私人部门成为童工，以增加家庭收入，却同时为社会扩大了半文盲的人口。Selden 也指出家庭为了增加劳动力增加收入，促使人们极力多生孩子，对中国的人口问题投下了重大威胁。国家因扩大对

工业的投资而大幅减少农业投资，影响农业的持续发展。农家经济的发达，相对危害了农村的公共设施。过去累积下来的土地平整、灌溉系统、通讯网和村路系统已经无人维修或新建。去年九月，我因文学上的交流访问了广东、东莞和深圳，即使是一次简短匆促的旅程，东莞、深圳的巨大社会变化，已十分令人惊异。据说有六十到八十万“外省人”流入广东、东莞、深圳地区，为人代耕土地，从事社会较低层劳动。农村中兼营私人工业（例如砖厂）的农民雇主，和企业家、华侨、党支部（书记）兴建新楼房，聚居一处，俨然形成一个高收入阶层的特别社区。“外省人”劳工在私人企业工厂中劳动，完全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工伤（例如手指轧断）没有任何医疗救助。当地农民将土地交给“外省”农民耕作，自己从事工商业（例如土木、装潢、商贸、砖窑）而又收取一定比率的地租。新的、拟似地主—佃农的关系出现。

阶级分析论的消失

当然，我无意忽视国家和集体仍然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构造中占有不仅仅是举足轻重的比重。国家和集体仍然拥有土地终极的所有权，国家和集体是承包内容的最后决定者，并且掌握农村工业、副业生产的大部分资产。国家决定家庭对于所属村庄以及国家的财政上的负担。尤有甚者，国家和集体控制着中国大陆经济最为重要的部门——现代化巨型工业、银行以及国际贸易，等等。然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制度所造成的新的阶级分化、新的剥削制度、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往往因政策的高度权威，而无法使大陆社会科学界对当前政策所产生的暗部，加以科学的调查、研究，并上报于中央决策部门，据以改善、补救。一个饶有兴趣的事实是：中共自取得政权以后，从未对革命以后不同阶级的中国大陆社会，做过社会性质和阶级构成方面的分析，科学地分析社会矛盾的本质。说目前的中国大陆社会已经有新生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说中共党内已形成资产阶级官僚阶层；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上俨然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比起“文革”时代，已经更

有客观的、明显的事实支持类如这样的想法。我们当然无意建议人们应该以“文革”时代高亢的“阶级斗争”去面对这些新生问题，但人民和中国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认识改革历程中产生的阶级分化、剥削、城乡差距的矛盾、体力和精神劳动的矛盾；如何与这些问题相处；怎样看待这些矛盾的发展前途；如何最终解决之……这些，中共党的理论家都应该明白、仔细、正确地告诉全体人民。何新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触及，不仅仅是这篇“谈话”的缺点，是否也反映了当前政策在大陆还缺少民主、科学的批评与讨论的条件，则无从知道了。

失去的第三世界视野

一九四九年中国的革命，对于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不发展国家，是一个仍然必须付出艰难而巨大的努力犹难于取得的成绩。帝国主义的支配被彻底驱逐。和帝国主义内外勾结荼毒民族发展的国内反动势力被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过了根本性构造变革。中国成了她自己的主人。民族和国家的完全独立自主，即使是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化国，在战后一段长时期中也不曾获得。日本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是在美国开始衰落的最近几年。战后不久，法国、(西)德……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美国在欧洲的冷战战略的从属国家。

然而，似乎不论朝野，在中国大陆，已经不知不觉地失去了第三世界的视野——虽然中国在第三世界拥有许多最真诚的朋友。这些朋友，还在广泛残破的第三世界丛林、贫民窟和城市里，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与它们在国内的代理人作极其艰苦的斗争。他们热爱着中国，因为在民族解放的事业上，中国是他们的标杆，从而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些缺点怀抱着严重的关切与严厉的批评。但今天大陆上许多知识分子却只知道看西方国家的“文明开化”，不屑于一顾那些为民族的骄傲，民族的认同、解放和独立发展而奋战的世界的穷人。中国大陆请了若弗利曼之类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到中国，奉若特别会念经的远道和尚，却从来不注意拉美、印度、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杰出的政治

经济学家或世界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Paul Baran, A.G. Frank, E.Feder 和 P.Rey 等。为了革命以后的经济建设中国埋头于越来越复杂而困难的发展计划，而逐渐失却了与世界穷人同舟一命的认识。这是十分令人扼腕的。而这也是何新的这篇长文值得我们关注和期许的理由。

寻找失去的视野

清末各种救亡运动以来，革新救亡的知识分子，从思想、文化、历史的角度发言的人远远多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发言的人；多于从中国社会史和经济构造的角度发言的人。《河殇》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追求“发展”的两条路线，也就是追求工业化积累的两条路线。然而，对于“发展”的饥渴，对积累的饥饿，两者几乎不分轩輊。社会主义的发展，千条万条，是以人为中心的、以人的真实的解放为中心的发展。因此，对发展的定义、内容和品质，应该有通盘的异于资本主义发展论的新内容。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挑战——为谁、为什么、什么内容的发展，决定着发展的方针。何新要中国面向世界市场寻求中国的社会主义积累，呼吁和国际独占资本主义化的日本的合作时，如果没有在发展的根本哲学与具体知识上有清晰的认识，那么在“国际货币基金”、“布列顿乌兹协定”、“关税及贸易协定”这些世界独占资本主义体系严格周密的支配体系下，何新重回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片善良的愿望，不免要遭到严苛的考验。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四日，智利工人和农民最优秀、勇敢、正直的领袖萨瓦多·阿连德（S.Allende）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演说，对于国际帝国主义、跨国企业对智利人民追求独立解放和发展的艰难而充满决心的事业，横加卑劣的干涉、颠覆和威胁，提出痛烈的批判。阿连德和他的革命，不旋踵仆倒在国际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屠刀下。今日读之，犹不免心悸。无论如何，今日的中国，终究已经有力量

免于这种来自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可置信的压迫、掠夺和凌辱。当阿连德说，“有这样一个极为清楚的辩证关系：帝国主义存在，因为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存在；而不发展存在，因为有帝国主义”时，他并没有忘记对北自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迄南至西班牙的欧洲对于智利革命、改革的理解与同情，表示最真诚的感谢。今日的中国，固然不应该、也不能重又回到冷战历史中充满极端焦虑和忿怒的反帝、反霸的过小的战壕，却也决不能失去从世界数十亿穷人的角度去理解世界，反对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立场，但同时又有更多的自知和自信，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容、放胆地出入，却永远不失去自己。而这就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自觉地以大量的劳动，依据自己宝贵的经验，发展和累积亟欲改变和创造自己命运的、世界被压迫人民自己的政治经济学。阅读何新文章不免为之动心，其理由也在于此。

同一个民族，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斗争*

——台湾新文学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联系

八十年代以后，台湾刮起一股民族分离运动的邪风，主张有一个异于中华民族的“台湾民族”，以台湾为独自的共同体而有别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主张有别于中国意识的“台湾意识”。从而在文学问题上，他们主张有别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相对立的台湾独自的文学。在台湾现代文学史问题上，他们否认中国现代文学与台湾现代文学的深刻联系，当然，他们也急于否认“五四”新文学运动与台湾现代文学的深远密切的联系。

然而，意识形态和政治不能替代具体的历史真实。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和发生在时序仅仅相差三四年的、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台湾现代文学运动，有着深刻的关联，是历史本身早已做好的结论。

殖民地台湾的白话文运动和“五四”

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发生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间。此时台湾被日本割占已达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台湾殖民化以后接受殖民化现代教育而成长的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正值青壮之年。然而这一代人不但没有被日本同化，反而在殖民统治下，公开提倡并实践以祖国现代白话文当做共同的表述语言和文学创作语言。而作这样主张的各种论述，都

* 本文刊于《台声杂志》(北京)一九九九年五月。

明确地以中国的白话文运动的经验、成效和理论为榜样：

陈炯在《台湾青年》上发表《文学与职务》，认为文学的“职务”（任务）在于传播新的思想，从而改造社会。因此，在语言工具上，主张应该使用中国的白话文来表述。另有陈瑞明说明祖国大陆内地已经在使用白话文，取得了“言文统一”的效果，主张台湾也应效法内地，“废累代积弊”，使用中国现代汉语白话文。有一位甘文芳写《实社会与文学》，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因为改用白话文写，大有进步，为世界文坛所注目，所以台湾文学也应使用白话汉语。

一九二三年，黄呈聪在杂志《台湾》发表《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说明他到中国大陆考察，眼见白话文的普及的好处。他认为台湾也大可效法，因为台湾读书人平素也看中国白话小说，如果能在平时再多读大陆新刊科学、思想性杂志，很快也能掌握白话文的读写。

黄朝琴写文章认为中国为了普及教育和启蒙，“图国家之统一”，而成功地推行白话为共同语，因此，台湾应该像“本家中国”一样，“改做言文一致的白话文”。

从以上所引，台湾推行白话文，是受到中国“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经验、效果和理论的深刻影响，至为明确。

殖民地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和创作范式与“五四”

殖民地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不仅在语言改革问题上深刻、自觉地受到祖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在文学理论、文学作品的范式上，也受到祖国“五四”新文学运动深刻、自觉的影响。

蔡孝乾写过文章《中国新文学概观》，介绍中国“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历程与未来的趋向，对中国文学革命的理论、创作实际，有概括的介绍。秀潮写《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未来》，着重介绍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思想、主张，也介绍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概要。苏维霖写《二十年来中国古文学及文学革命》，是胡适的《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的概括。张我军也写文章介绍胡适的“八不主义”和陈独

秀的“三大主义”。

有了理论和思想，还得要有创作实践。怎样使用白话文，以丰富的形象、新的感情和思想，以新的结构和叙述，表现为文学作品，需要有作品的范式（PARADIGM）。中国新文学运动从域外文学中寻求写作范式，如鲁迅之于外国小说，徐志摩之于英国浪漫派诗人作品。但台湾似乎更幸运一些。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作家，直接从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中取得写作范式和灵感。

以《台湾民报》为中心的报刊杂志，在这个时期，刊介了很多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作品。据研究，这些作品有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和《故乡》；冰心的《超人》；郭沫若的《牧羊哀歌》、《仰望》、《江南即景》；胡适的《终身大事》和徐志摩的《自剖》。

这些大陆新文学作品在台湾当时知识分子所瞩目的《台湾民报》刊载，如何地引起殖民地台湾知识分子的关切，从而对台湾新文学的创作实践发生巨大影响，不言而喻。

割让的殖民地

四十年代台湾的文学评论家林曙光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在本质上“始终追求着五四新文学的倾向”，台湾新文学“发源于中国新文学主流中的一个光荣传统与灿烂的历史支流”。评论家叶荣钟也说，台湾新文学在“精神上与祖国发生交流”，是“台湾向祖国的‘文化归宗’……”。

两岸文化、文学在“本质”上、“精神”上非比一般的密切联系，决不是台独文论企图将台湾文学受中国文学的影响，歪曲成一个“民族”受其它各民族文化影响之一的说法所可抹杀的。那是因为不仅台湾人民和中国人民同为中华民族，还因为台湾的殖民化不是一个自来独立民族的殖民化，而是全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化过程中，局部的台湾的殖民化。对于台湾而言，祖国和民族并不曾覆亡。对台湾人民而言，还存在着一个残破、半殖民地化的祖国中国！

因此，台湾的殖民化，和韩民族的殖民化不同。后者是全民族的沦

亡。对朝鲜人民而言，克服殖民地化的斗争，就是打倒日帝，恢复民族沦亡前的独立。但对于台湾人民而言，则是打倒日帝，复归祖国。

台湾遭受殖民统治，在日据下长达五十年的反日民族解放斗争中，强烈的“中国指向性”，一直起着重要作用。遭受日帝殖民统治的五十年中，台湾人民不但“始终热烈地想念祖国……非常关心祖国，无时不尖着耳朵打听祖国的消息”，而且一直把台湾的解放，台湾的复归祖国，寄希望于中国的革新运动和革命运动。历史地看来，二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三十年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四十年代的和平、民主、反潮流内战运动，都对台湾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牵动几百万台胞的心思。

两岸的民族解放斗争与新文学运动

一八四〇年以后，中国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台湾也在这个过程中先是沦为半殖民地，与大陆同样遭人强迫开港，开放海关，让外国商业资本长驱直入。甲午战后，台湾进一步遭受日帝殖民统治，整个中华民族陷于豆剖瓜分的危机。

民族严重的危机，使有识之士，对“现代性”张开了眼睛。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代表现代科学、技术、产业的力量，也代表西方新知识、新文化、新道德、新思想与教育的力量。民族史上空前的挫败与浩劫，使有识之士反省和检讨传统社会、制度、文化、思想的破绽。人们既见识到帝国主义现代性的无比威力，也身受了帝国主义现代性的凶暴，于是就兴起了对内清理传统思想文化和制度的落后性，提倡依西方的现代性进行变革以自强的运动。“师夷”（现代化）的目的在于“制夷”；“师夷”是“制夷”的手段。而“师夷”又必须对传统中腐朽的东西加以批判。这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社会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的本质。

于是伟大而丰富、深刻的中国文学传统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克服民族工作者重大的危机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迫切地要求对广大民众进行宣传鼓动，对作为民族成员的广泛人民进行思想、文化的启蒙。人

们于是发现了使用中古汉语（文言文）作为书写表述工具的艰涩性和局限性，这就要求改用“文言一致”的白话文。在文学思想上，要求文学“传播（新）思想，改造社会”，批判传统旧文学“陈腐颓丧”，搞文字游戏，把文学当做个人沽名钓誉的工具，和生活现实脱节，是僵死的文学。

从全局看来，两岸的新文学运动都是帝国主义压迫下，为反帝自强而改革改造的新的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革命运动，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样，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五年间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也是台湾反帝、反封建、复归中国的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的一部分。由于时间先后只隔数年，加上作为“割让的殖民地”台湾强烈的“中国指向”，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就自觉地取法、并受影响于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了。

殖民地台湾的反帝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母体。一九二一年的“新民会”，主张殖民地台湾的政治与社会改革，主张促进“与祖国同志联系”。同年的“台湾文化协会”主张促进殖民地台湾文化的进步、发展，宣传反帝民族主义，革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创行新的（现代的）道德。杂志《台湾青年》、《台湾》主张“厌恶黑暗、仰慕光明”，“反抗横暴、服从正义”，建设新的文化和思想。这些组织、运动和刊物，不时对文学问题表示深刻关切，常有讨论。尤其是一九二三年作为文协机关报纸的《台湾民报》（一九二三年始刊）更是以中国白话文为全报语言，并特辟文艺专栏，定期性刊载文学论文和作品。这对白话语文的普及和以白话文为叙述工具的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

共同的命运 共同的斗争

发生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五年间，台湾的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斗争，新旧文学的争论，不论在理论上、书写和创作实践上，都深刻地、自觉地受到祖国“五四”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的影响。

这样的影响，绝不是一地的文化、文学思潮受到另外其他地方文化

思想影响的一般状况。台湾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之受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是本于同一民族同在帝国主义时代同样遭受到列强横暴时所爆发的民族自强改革运动而来的影响。半殖民地化的中国，在一九一七年展开语文和文学改革运动，在一九一九年发展为全面性反帝自强改造的文化、思想运动。一九二〇年开始，台湾自觉地、勇敢地、旗帜鲜明地把祖国“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火种，在殖民统治的台湾点燃。虽然日帝借着割占台湾，把台湾从母体中国分断，但台湾人民始终把中国的斗争看成是自己的斗争，把中国变革图强的目标，当成是自己的目标，把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经验教训，也当成是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台独文论企图在文学和文学史上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谬论，是站不住脚的，是经不起具体历史事实的驳难的。

天高地厚*

——读高行健先生获奖辞的随想

现代主义

凡稍许知道西洋文学的人，读高行健的作品和他的文学主张《文学的理由》，都很容易看到高行健明显地受到五十年代中期法国“新小说”（Nouveau Roman）和“荒谬剧场”运动的影响。

被萨特说成“反小说”（Anti-roman）的法国“新小说”一派的主张，概括地说，要反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们反对作家在小说中表现社会关怀，不主张小说要有完整、合逻辑的情节与结构，反对小说家以全知的观点去刻画和分析人物的心理面貌。他们要表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荒废紊乱的生活和世界。他们的小说没有清晰的主题和意义。他们刻意破坏叙述的逻辑秩序。他们反对客观、精确的、对于客体世界的描写。“新小说”公开反对有意义、有道德的或价值判断的主题。当然，他们也憎恶明确的政治或社会倾向。

反小说强调描写和表现人的心灵的、心理的“内在世界”，因此不注重人物的外在的可辨认性。他们也不费心描写人物的职业、地点、背景和形容。他们专心于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意识的浑沌和片断，只描写人物在当下、即时的生存状态。

* 本文刊于《联合报》（台湾）二〇〇一年一月十二日。后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二〇〇一年第二期。

然而，熟悉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人都知道，所谓“新小说”的这些主张，其实就是二十世纪初叶“现代主义”诸派的文学艺术主张的综合。表现主义就反对描写客观世界的外部形貌，而主张表现晦涩的、心灵的、事物“内在的真实”。表现主义文学作品的人物，也没有鲜明的个性与面目。未来主义也反对现实主义，主张表现人的潜意识。抽象、幻觉和想象是未来主义艺术的关键词。超现实主义主张文学上极端的个人主义，主张文艺创作不受任何美学、道德、利害的羁绊。

只要理解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理解法国“新小说”的主张，就容易看透高行健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主张之所从来，就知道高行健的文学是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西方的文学思想，似新实旧，若有独创的玄机，而实际上大部分是前人的老词。

因此，高行健说文学“从来”“只能是个人的声音”，而写作是为了个人“排遣”其“寂寞”，“为自己而写”；说“文学是人对自己的关注”。他说文学在作家抛弃“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的提问时，这写作才成为“必要”，而文学于是诞生。象征派的诗人马拉美就说“文学完全是个人的”，说“诗人只是一个为自己掘墓的孤独者”。事实上，现代主义文艺思想的共同特色，是否定文学的社会性，强调文学的极度的个人性。

各派别的现代主义都反对现实主义，反对作品有明确主题，反对故事性，反对情节与结构。高行健的小说和戏剧莫不如此。现代主义文学不强调人的社会和历史脉络，面貌模糊，不可辨识，而强调人的没有社会与历史逻辑的“当下性”和“现时性”。高行健也说“人活在当下”。他侧重“此时此刻”和当下现时的“自我”。高行健的文学极端个人主义，是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想保持一致的。

反对文学表现现实中的生活与人，反对意识，反对叙事结构，也就是反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和感情的内容。而内容的消解，相对地造成形式的夸大化。因此形式和技巧上的“先锋性”、“实验性”成为现代主义文艺的共同特色。高行健的作品不单于寻求语言、形式（小说和戏剧）的实验，强调文学不外寻找“新鲜的表述”，强调作家的工作是

去“发现”和“开拓语言蕴藏的潜能”。

现代主义各派不承认可知、可见、可感的客观现实，而极力主张表现主观的、心灵的、“内在的现实”。高行健反对“现实的摹写”，主张要触及“现实的底蕴”。他主张文学作品之故事性、人物和情节的重要性，还不如语言的艺术。高行健的文学思想，其实早在五十年代到一九七〇年间风行于台湾，于今却很少留下重要的作品。

深沉的怆痛与绝望

但是出身于中国大陆的高行健的现代主义精神本质，与二十世纪前半以降西方的现代主义精神颇有不同。

西方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时的文化现象。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被卷入快速、无情、紧张和高度商品化、物化的社会运转中，使人的精神和心灵受到深刻的创伤。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他自己之间，人和社会环境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异化和矛盾。这个精神与心灵的危机，正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反射，使人们陷于彷徨、孤单、惊慌、恐惧、绝望和痛苦。人生失去了意义。生活中没有理想，生命失去了展望和希望。生存显得虚无而又荒谬。处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下的现代人，对强大无情的生产体制产生强烈的忿懣、憎恶和无力感，但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又对革命和改造也彻底失去了信心。现代人失去了一切的依恃、寄托与归宿。异化、疏离、虚无、绝望，至深而又无法疗愈的怆痛支配着现代的灵魂。而各派别的现代主义文艺，正是这受创的现代人心灵的反映。

因此，西方现代派杰出作家如卡夫卡、乔哀思、艾略特和福克纳，确实深刻地表现了现代人深沉的怆痛与绝望，震人心弦。

在高行健的精神思想中，八十年代末期从发展中经济“逃亡”到高度发达的法国，毋宁对于法国物质上的现代生活是钦羨、崇慕多于批判的。他移居法国的心情，毋宁是幸福感远多于异化的怆痛。他在受奖辞

中说“感谢法国接纳了我。在这个以文学为荣的国家，我取得自由创作的条件，拥有读者与观众”。这虽然是高行健为个人“自由创作的条件”的颂谢，但可以理解成高行健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对人类心灵的戕害缺少或没有体会。高行健的现代主义中，基本上没有高度工业化下现代人深沉的苦痛与孤绝，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的人文质素。

那么，高行健的现代主义的根源在哪里呢？

和台湾的现代主义根源不是在五十年代的台湾尚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社会，而是根源于外来的文化意识形态一样，高行健的现代主义来自一九七九年以来，大陆文化界对于其前几十年极“左”思想和文化的反动，表现为八十年代初，大陆知识分子向西方五花八门的文学创作方法张开了惊异的眼光，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思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现代主义的创作方式，以朦胧诗为代表，对中国青年的文坛发生了影响，可以估计高行健也在这个时期通过法国文学接近了现代主义。这外铄的现代主义，缺少了西方现代主义中优秀作品的深沉的怆痛，无乃是极自然之事，但也不免失于既轻且薄。

意识形态和文学

高行健对现代主义的选择，极大部分是对大陆在一九七九年以前，尤其是十几年极“左”路线的反感而来。中国在极“左”年月中的经验与错误，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运动中共同的经验教训，应该深刻、科学、深入地总结。但由于复杂的原因，至今正确的左翼——代表进步的、正义的、民主主义的、改造的思想与实践，与极“左”的、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封建法西斯的、官僚主义的、绝对化的阶级论的路线与实践混淆不清，从而使真正进步、正义、民主和改造的思想和运动被涂黑，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反对改造的甚至是腐朽的东西却反而被披上了前进、新颖的外衣。在今日，大陆社会科学、文艺批评等领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逐渐成为霸权性论述。知识分子无不敏感地避免自己的思想与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同左派联系

到一起。“左派”变成了骂人的脏话。在文学上，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基本上被看成“保守”“过时”的。因此，高行健的选择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所以，尽管高行健不断强调文学的个人性，强调文学的非政治性和脱离意识形态，但他的现代主义选择的根柢仍不能不带有显明的政治性。他控诉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戕害，他反对“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他反对民族主义——反对文学的民族认同与民族忠诚。这样的思想，占去了他的受奖辞的很大一部分。法国对他的受奖辞的反应恰恰是说其“政治性”很浓厚。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家依其在社会存在中的不同地位，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艺术地反映社会生活，形象地表现了作者对人与生活的态度——即反对、鞭挞、否定什么，又支持、赞扬、宣传和肯定什么，从而集中表现了作者思想和感情，即表现了作者的意识形态倾向。

因此，主张“文学仅仅是个人的声音”；“文学一旦成为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阶级或集团的代言，文学就失去其本性”；主张当“政治主宰了文学”文学就被置于死地；“文学只为排遣寂寞，只为自己而写”；说文学家强调作品的民族性是“可疑”的；文学超出国界、超出民族意识和意识形态；主张文学对大众“不负有任何义务”；反对革命、反对乌托邦……这一切，本身其实就是一种鲜明昭著的意识形态，一种鲜明昭著的政治倾向。在文学问题上，高行健的受奖讲话，充满了这些具体的、赞否的主张，亦即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选择。这与主张文学为被压迫人民代言；主张文学应该干涉生活；主张文学应该揭露生活中所存在的矛盾，让人民知道这矛盾的本质，从而鼓舞改造的意志；主张文学应该给被侮辱的人以雪耻的勇气，给伤痛的人以安慰，给被压迫的人以反抗的力量，给幸福的人以同心的喜乐……一样地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也是一种政治倾向。而且即便是在现代主义内部，毕加索曾以他前卫的技法表现了对韩战中美军集体屠杀韩国普通百姓的强烈抗议和对西班牙内战中的左翼的同情与支援。诗人阿拉贡放弃了现代

主义，参加了革命，回到现实主义。公开主张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布莱希特、萧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高尔基、鲁迅、茅盾和音乐家萧斯塔科维奇都留下了西方所无法否定的伟大光辉的作品。因此，文学超出意识形态，文艺脱离政治的说法，只能是一种神话。

“逃亡”的不同姿势

其次也说一说作家的“逃亡”。高行健说，当政治主宰文学，作家便陷于死地。为了获得思想的自由，作家只能“沉默和逃亡”。沉默意味着“自杀”与“被封杀”，因此作家必须逃亡。逃亡是争取思想自由的作家的命运。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卡缪在法国被法西斯占领的时代毅然参加由法共领导的地下抵抗运动，没有逃亡；获得却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萨特，也在二战中参加了反法西斯的地下战线，没有逃亡。身处反法西斯斗争的严峻的处境极限，对两人的哲学与文学作品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和日帝欺凌下的极限中，如果中国作家全都逃亡以换取“思想自由”，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就要空白一片，台湾也就没有赖和、杨逵等作家。马奎兹和聂鲁达都在军事法西斯压迫下被迫“逃亡”。但他们在逃亡中不断地战斗。逃亡没有使他们主张文学只是作家个人排遣寂寞的工具，是作家对自己的喃喃自语。

而高行健的反民族主义，他的某种“国际主义”，其实和他这个“逃亡”有理论是有密切联系的。这突然使我想起另一种“逃亡”，另一种“流亡”。四百多年的殖民主义历史，造成了几代被殖民地人“流寓”（Diaspora）于宗主国的状况。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受到完整的宗主国精英教育，在宗主国文化环境中生活、成长。这些人当中曾有极力要按照宗主国的文化改造自己，却往往碰到无法超越的冷墙，无法为西方所接纳。另一方面，其中也有人又从西方前宗主国的文化论述中，经过一番反省，看见大量的对于自己本民族——“东方”——的复杂、根深蒂固

的歧视和成见。从“东方”因殖民主义历史过程而流离漂泊于西方的东方知识分子，对这些歧视与成见、偏见的批判，成为萨伊德的《东方论》，成为后殖民文化批评的骨干思想，为寻求西方现代性而从殖民地母国向西方宗主国“逃亡”（流亡，流寓），经过一番反省和批判的思维，回顾去抵抗和批判西方对东方的、殖民主义的文化偏见，进一步批判当前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帝国主义，是民族主义意识的辩证的复归。这又与高行健的“逃亡”、他的放弃民族主体认同，他的文学的“国际主义”之缺少深刻的批判与自省，就很不一样了。

天高地厚

如前文所指出，现代主义的各派，基本上是极端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因此，其各派在二三十年代发表的宣言，也充满了非逻辑的、理性以外的思辨。如果人们把高行健的获奖宣言当做他的文学论、文学宣言，也同样会发现不少相互矛盾之处。例如高行健既认为真相、真实难以知晓，又说真实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性格”。既说文学不为谁、不为什么而创作，又说文学表现“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说审美的标准因人而异，但也说这主观的审美判断又“确有普遍可以认同的标准”。说文学只为排遣个人的寂寞，又说文学作品是“对于社会的挑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自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报章杂志上不免有诠释高行健、解读高行健的文章，我也读到了一些。我就觉得，任何作品，只要批评家、学者、知识分子读者在主观上都以同样的专注、绞尽脑汁去品味一个特定作品的好处和微言大义，则任何作品都能扯出这样那样的启发甚至感动。这使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吃了狗肉的往事，吃完了一大碗狗肉，朋友问我，香也不香。那确实香。后来我问到狗肉的做法，朋友告诉我不但加了许多香料，而且烹煮手续和过程无不讲究。那时我心中就想，烹煮任何肉要都这么讲究，则无肉不香了。

从五十年代起台湾现代主义文艺大大泛滥的时代，当我面对一首现

代主义诗，面对一幅现代主义绘画，听现代派音乐演奏，我就觉得，如果这些作品引不起我们审美的感动和欢悦，我们就应该诚实地、充满自信地说这不是好作品。慑于一些思想空白的现代派作品之不可理解，以强辞曲说来压制我们审美素养的排拒情感，这是对于自己审美素养和本能的屈辱。对待高行健的作品，我也持这种比较客观的态度。特别是有一定审美训练和素养的人，一定要勇于对一些威名在外的，却事实上并非杰作的作品直率地说个“不好”。

黄春明兄说过一句很有启发的话。他说，一个作家最大的荣耀与喜悦，首先是自己民族广泛人民的赞赏与爱读。“国际”的肯定是其次的。

虽然有众所周知的政治的、历史的极限性，应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相对有威望的文学奖，选择过举世钦仰的文学泰斗。但是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无法加添原所没有的光荣，许许多多获奖的文学家并不曾因获奖而特别闪亮，得奖后一仍无藉藉之名，诺贝尔文学奖也无法剥夺一个大作家原有的光荣。托尔斯泰、鲁迅、高尔基等世所公认的大文豪没有得奖，却无损于他们的成就。

很有一段时期，海峡两岸的文坛都为了中国作家何时获得诺贝尔奖，热情议论。据说鲁迅先生在世时，曾有一度盛传要推荐他得诺贝尔文学奖。听了这风声的鲁迅先生，却期期以为不可，理由是“中国人要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会让中国人从此不知天高地厚”。

初读这一轶话，我还只以为这是典型“鲁迅式”的讽喻。今天想来，却似乎更深地体会了个中神髓，而对这位在我出生前一年逝世的伟大作家又增添了一分敬畏。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华文化和台湾文学*

一、前 言

一个民族的文学，是那个民族的文化的一个璀璨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学，以那个民族的语文之审美的形式，表现其民族文化的心灵；而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酿造了那个民族的文学独特的风格与特色。这都是毋庸赘言的共识。

而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民族，中华文化和与之相应的中华文学多彩多样，丰富繁荣。其中既有鲜明的民族共性和同一性，同时也有突出的地方的、历史的独特性。

时间的限制，不允许我们在此论及台湾原住各民族的文化 and 他们的口传文学。

中华民族最早在台湾留下劳动与生活的踪迹，可上溯到第三世纪的三国时代。然而中华民族的典章制度和文明教化在台湾岛上实践，要等到明郑入台时的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设立府、县，任命府尹、知县。同时，随着郑成功入台的大陆著名文人学士，借着明郑当局广设官学，积极建设以科举为经纬的文化教育体系，大大提高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影响。由较早的沈光文及后来的沈佺期、辜朝荐等人的创作，留下了台湾第一批台湾地方文学作品，动情地表现东渡流亡之人对故园乡关的怀思和立志恢复明室的情怀。

* 本文刊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江苏)二〇〇五年第四期。

一六八三年，与清王朝对峙的明郑败亡，台湾收复后，大量的大陆闽粤移民涌入。在清朝治下，官学更加普及，而科举制度更加正规化，中华文化和文学更加昌盛。此时大陆来台的游宦作家，例如郝永和，留下杰出的游记、诗歌、散文和地理学笔记。而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国势遭到沉重打击。这期间的各家作品，或关怀民生疾苦，或歌咏亚热带宝岛乡土风光。另有姚莹、沈葆楨、丘逢甲等文武双全的知识分子，写下了保国忧时、抗击帝国主义的视野空前开阔的作品，表现了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感情，壮怀激越，动人心弦。

二、台湾的殖民地化和台湾新文学的发展

一八九五年，台湾依耻辱的马关条约割让日帝，沦为殖民地。在异族统治下，遗民作家如丘逢甲、洪弃生和连雅堂等人，留下了哀国破之惨痛、砥砺汉节的作品，使他们成了殖民地台湾的第一代反帝抗日作家。

一九一五年，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台湾农民武装抗日斗争全面失败。一九二〇年左右，台湾人民改变抗日策略，展开“非武装抗日”时期。与之相适应，台湾新文学运动便在这一波现代抗日民族、民主斗争中发轫、成长与成熟。受到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以东京为基地，以汉语白话文为主要语文，由留日台湾知识分子先后编刊的杂志《台湾青年》、《台湾》和《台湾民报》等为言论阵地，发动了一场台湾的新旧语文革命和相应的新旧文学革命。在理论资源和文学创作上，台湾新文学直接受到陈独秀、胡适之、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影响。岛内主张以汉语白话文和新文学体裁创作的阵营，与主张仍然使用文言文和旧文学体裁的一方展开激烈的争锋，结果旧派不敌新派，台湾新文学在日帝统治下的台湾宣告其胜利。

台湾新文学的登场，是作为台湾反日民族、民主运动之一翼而发展的。而在日帝强权统治已经二三十年，强行日语同化教育的环境下，台湾新文学作家赖和、杨云萍、杨守愚、朱点人、杨华、张深切、吕赫若、吴浊流等小说家，绝大多数仍坚持以汉语白话文写作，在题材上一

律宣扬反日帝、反封建的思想意识，表现了他们在日帝统治下坚守中华文化、顽强不屈的抵抗的英姿。

三、殖民地下坚决守卫民族精神和民族语文的斗争

台湾居民泰半为大陆闽粤移民，口说闽粤方言，与以中国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颇难相通，加以日帝据台，使台湾人民无法共有中国现代共同语形成的经验，又加上日人处心积虑收夺台湾的闽客方言，以强制教育灌输日本语剥夺台湾人民的母语，有识之士痛感到在殖民地下丧失民族语的危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台湾抗日进步文坛内部，为了文学大众化和提倡大众语文，发生了所谓“台湾话文”论争。

以黄石辉、郭秋声为中心的一派，觉察到白话文对一般台湾劳动人民无异新的文言文，因而主张把闽南方言文字化。这显然是当时“文艺大众化”和“大众语文建设”在殖民地台湾条件下特殊的提法。另外则有以廖毓文、林克夫、朱点人等为中心的，坚持自觉地推广汉语白话，使白话文进一步大众化而以“台湾话文”的建设为多余的一派。这使人想到鲁迅和瞿秋白也主张不同策略的大众语方策。

值得一提的是：汉语方言的表记和表音从来会遇见难解的问题。激烈主张建设“台湾话文”的黄石辉、郭秋声皆反对以罗马化解决，避免母语脱离民族语言表现系统，主张以传统六书的原理研究方言表记，也主张方言文字化最终形成全民族可以共通的表音和表记。激烈的语文革命，目的在解决殖民地下的大众语问题，以寻求对广泛大众宣传、教育、启蒙和煽动手段的答案。而欲达到此目的，又决不牺牲中华文化的语文资产与传统！

八十年代“台独”文学论起。其论者以“台湾话文运动”为“台湾文学抗拒中国白话文”，是“台湾文学主体意识”之表现。但新的数据显示，黄石辉在面对白话文派究问台湾不是一个独立国，何需倡导“台湾乡土文学”时，黄石辉明确回答，正因台湾非独立国，才倡导“台湾乡土文学”而未倡导“台湾文学”。“台独”文论的曲解捏造，在史实前成为徒劳！

四、在残暴的“皇民文学”高压下坚持 中华文化的民族气节

殖民制度带给被殖民民族最大的灾难是收夺其民族母语，以制度化的民族歧视挫折其民族自尊，迫使被殖民者在社会、政治和精神上奴隶化。

一九四〇年后，日帝扩大对华南及南太平洋的侵略，除了强化对台湾、朝鲜及其在华日占区的劫掠与镇压，并在这些地区施展各种精神和心智的控制，强力宣传日本皇国思想与战争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则在台湾等地推广支持和宣传向日同化和日帝侵略战争的“皇民文学”。

但是，“皇民文学”除了周金波和陈火泉等极少数汉奸文学家，日统下台湾作家都采取消极不合作态度，引起日本当局与在台日本官方作家的不满。一九四三年以西川满、滨田隼雄为首的战争派作家，公开抨击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鄙陋”和缺乏为“圣战”服务的意识，为“狗屎现实主义”文学。在严峻形势下，以杨逵为首的一些台湾作家公开反驳。杨逵发表《拥护狗屎现实主义》，为台湾人现实主义文学辩诬，维护了战时下台湾文学的尊严。

环顾当时日帝支配下的东北亚，在日本法西斯主义威暴下，在日本、朝鲜和伪满都有大量的作家——包括曾经抵抗过日本侵略政策的左派进步作家，大面积向日本法西斯军部“转向”投降，写下不少支持日帝扩张政策的作品，至今成为日本与韩国文学史的耻部与痛处，无法清理。相形之下，台湾的转向附日作家只有周金波、陈火泉等极少数，作品粗糙、数量极少，影响不大。应该指出，自鸦片战争及日帝据台以来，“帝国主义加诸中国最大的伤害在于台湾，中国文学中反映对帝国主义之抗争最为动人的作品也在台湾。”（陈昭瑛，一九九六）

五、克服民族内伤，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华民族属性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帝战败投降，十月，中国政府代表在台北正式受

降，台湾从殖民地枷锁中解放。台湾人民在欢庆之余，自动地提出了去殖民化，积极地推动“中国化”和“把我们的母语抢回来”的运动。在语言政策上，主张“恢复闽南话作为中国方言的地位”，予以尊重与复权，禁止日语，从而在民族方言基础上推行“国语”（普通话）。

可惜国民党当局无心顺应当时全国性要求“民主化”、“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广泛舆情，加上接收日官贪渎成风，朋比为奸，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打响国共内战，致社会动荡、政治不安、民生凋敝。一九四七年二月台湾爆发“二·二八”事变，民众的要求也是民主化、反内战、高度自治、和平建设。三月，国府当局以武装镇压，造成流血惨变，两岸民族团结与和睦受到重大内创。

但就在三月流血镇压后八个月，来台进步的省外知识分子歌雷、雷石榆、骆驼英、孙达人、萧荻等人，与团结在杨逵身边的本地知识分子欧阳明、赖明弘、周青、张光直、赖亮等人，以当时《新生报·桥》副刊为基地，热情洋溢地展开“如何重建台湾新文学，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学无愧的一部分”的议论。经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长期议论，取得了这重要成果：

(1) 参与议论的省内外人士，即使在一九四七年三月血洗后，也取得了这重要共识，即：“台湾和台湾文学是中国和中国文学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2) 省外作家和文论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三十年代以迄四十年代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的理论。

(3) 对杨逵先生所主张深入台湾社会、深入台湾民众、写台湾人民生活与心声的作品，为当时所急切需要的“台湾文学”这一见解，议论各方都取得了共识。

(4) 杨逵高瞻远瞩地提出坚决反对台独，反对国际“托管”台湾，说凡有为“台独”、“托管派”服务的文学是“奴才的文学”，今日视之，尤有重大意义。

可惜的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国府在台当局发动“四六事件”，逮捕台北进步学生和《新生报·桥》副刊的重要作家。杨逵被捕入狱，判刑

十二年，给予当时校园内和文化界民主力量巨大的打击，“重建台湾新文学”之议论戛然而止，至今绝响。

六、反抗文学之恶质西化，主张台湾文学复归于中国人立场和中华主体

反共文学和现代主义文艺自一九五〇年后支配了台湾文艺界长达二十年之久，而弊端丛生：即极端的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对西方文论、西方创作技巧的恶质模仿，表现语言的晦涩，失去文艺创作上的民族风格和形式等，使文学走进了死胡同。

一九七〇年保卫钓鱼台运动在海外激发了左右分裂。保钓左派推动重新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三十年代以降文学和文论的运动。这运动头一次冲破了内战与冷战文艺的统治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大众文学、民族文学的理论冲击着一代被西方现代主义统治的知识分子。一九七一年，留美回台的知识分子唐文标向台湾现代主义诗提出了严厉批判，主张诗歌的大众性和民族性，引起轩然大波，沉重地打击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威信。

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国府当局以有人主张“工农兵文艺”的红帽子，扣向主张现实主义、文学的大众性、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反对外来殖民性文学的一批人，在大报上搞点名批判，并筹开“国军文艺大会”，准备全面镇压。后来经过胡秋原先生、徐复观先生、郑学稼先生向当局力谏，才阻止了一场大的文字狱。

在这一场论争中，“乡土文学”派主张在思想上、创作方法上反对外来西方文论的统治，使台湾新文学复归于中国人立场和中华文化，在创作方法上要深化现实主义，表现中华文学的民族特质与风格。

七、反动、反民族的八十年代及其斗争

一九七九年，在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与中国民族经济脱钩，而以独自の“国民经济”在依附外资下成长出台的台湾资产阶级，

有要求其阶级政治份额的“党外”反蒋、亲美、反共的“民主化运动”。一九七九年，这运动在高雄点燃了“高雄美丽岛事件”，冲毁了国民党长期的排外独占的政治。而由于美国护航，加上运动本身反共亲美性格，台湾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很快浸染了同样具有反共、亲美、反华性质的“台独”倾向。

一九八七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位，出人意外地利用政权资源全面推动“台独”反民族进程。二〇〇〇年陈水扁取得政权，把反民族“台独”政治又推上一个台阶。

与之相应，“台独”思想和意识形态在台湾有显著发展。“台湾民族论”、“爱台湾论”、“台湾土地与血缘论”、“台湾意识论”、“台湾主体意识论”等，一时沸沸扬扬，一定程度冲击了台湾政治和社会生活，取得论述霸权。

而台湾文学界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在文论上“台独”派提出了“台湾文学独特性论”、“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无关论”和“台湾文学主体性论”，基本上是“台独”政治在文学上的反映。在文学教育上，受到“台独”当局的直接支持，广设独立的台湾文学系所，宣传和教育反民族的台湾文学论，形势是严峻的。

另外，台湾当局“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也以丰沛的资金与资源，组建“国家台湾文学资料馆”，以台湾文学为“国家文学”。此外，并结交外国、特别是日本右派学者为反民族“台独”文学写书写文章、出版书刊，办“国际研讨会”，出钱出力为“支独”外国学者出书，鼓励他们为皇民文学史翻案，为“台独”文学论的建构出谋献策，形势也比较严重。

然而，十多年来，在反对净化和美化皇民文学的批判上，在反对以日本藤井省三为首的日本支独台湾文学研究上，在反对“台独”派以“台独”台湾史观炮制台湾文学史分期理论的斗争上，我们坚持了及时的，切中要害理论和学术的批判与斗争，没有让“台独”派占上便宜。

八、结 论

大约在一九三五年，即日帝窃据台湾已四十年，离日帝自台败退仅十年之时，台湾总督府编纂了《台湾警察沿革志》。其中第二大卷依据殖民地大量公安档案，历述自一九二〇年代以降台湾反日抗日思想启蒙运动、民族运动、政治运动、阶级暨社会运动。在其总序中说，台湾改隶日本已四十年，但人民反日抗日运动前仆后继，殆无间断。究其主因，乃在台民有强烈（中华）民族意识，以中华五千年文化为荣。其原文如下：

……关于本岛（台湾）人的民族意识问题，关键在其属于汉族系统。汉族向来以五千年的传统民族文化为荣，民族意识牢不可拔……虽已改隶四十余年，至今风俗、习惯、语言、信仰等各方面仍沿袭旧貌，可见其不轻易抛弃民族意识……本岛人又视（福建、广东）为父祖坟墓所在，深具思念之情，故其以支那为祖国的感情难以拂拭，乃是不争之事实。故自改隶后，……仍有一些本岛人频频发出不满之声，以至引起许多不祥事件，此实为本岛社会运动勃兴之主要原因……（《台湾社会运动史》卷一，创造出版社，台北，一九八三）。

这说明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为什么表现出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之根源所在。

中华文化独一的特质，在于它以汉字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典章、典律、人文、思想体系。

这一文化体系，在境内成为强大的文化、思想及感情的凝聚力，藉以将以汉族为中心，边境各非汉族民族群体为成员，化育凝合起来，创造一个大汉族共同体的想象，而逐渐形成一个古典意义上的中华我族意识。而在境外，一直达至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势崩解之前，在东北亚的朝鲜和日本、法国入侵前的越南，都形成以汉字、汉语音及中华文化为主要根干的汉文化圈，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前面说过，中华文化泽被台湾始于十六世纪的明郑。自斯三百余年

以来，历经中国统一，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港，日帝割台后沦为殖民地，光复后又成为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的前沿基地，至八十年代又吹起一股自一九四〇年初日帝“皇民化”运动以来未曾有过的反民族的分裂主义风潮。然而正是在这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磨难中，特别激起了台湾近三百年来历代遗民和移民，以数千年中华文化的积淀和基因，抗击外来势力，坚守民族文化的主体认同，发而为历代不息的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

而从台湾文学史以观，台湾是帝国主义侵袭中国最集中、最严重的受灾区。因此，在国破家亡的现实中成长的台湾文学，不论是以传统体裁或现代体裁表现，其反映了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誓不臣夷，而奋力抗击帝国主义的艺术表现、最大无畏、而且最动人的作品，较诸包括伪满在内的广泛日占区，也以台湾最多。

台湾文学有伟大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有强烈的以中华文化为根柢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台湾文学的骄傲。虽然在当下台湾文学正遭逢自四十年代日帝“皇民文学”压迫以来未曾有过的反动，即反民族“台独”文学的逆流，但只要 we 坚持台湾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精神不动摇，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克服一时的横逆，取得胜利！

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

我生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台湾。到了世界冷战高峰的朝鲜战争，我正等小学毕业，报考初中。朝鲜战争引来美国大舰队封断了海峡，台北的国民党政权在对内残酷肃清“共党奸匪”和美国对中国内战的干涉后，正式成为了美国在东亚冷战的战略前线。在当局和美国遍布在台湾的“美国新闻处”(U.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的宣传下，世界的构造被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代表富足、国力强大、民主、自由、人权、对他国没有领土野心、科学倡明，而且又到处给穷国小国各种慷慨的援助；世界的另一个部分是“共产世界”或“铁幕”、“竹幕”，指涉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世界”，代表独裁、特务统治、贫穷、发展军事力量，是“自由世界”邪恶的威胁……因此，中国在冷战宣传中也被分成了“共产中国”或“赤色中国”，以区别于“自由中国”台湾。而上世纪五十年代经济还在混乱的局面中挣扎的台湾，也成了意识形态上“自由”、“民主”、“民生富足”的社会，而大陆则“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六十年代以后，台湾因冷战体系的地缘政治、美国的“援助”和以美、日、台“三角贸易”架构上的加工出口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台湾的官僚和满脑子西方“现代化”论的知识分子精英，都宣传台湾的发展、“自由”和“民主”，在思想和政治上紧紧跟着美国，心目中从来没有一个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为中心的“第三世界”，当然也绝不把自己列为“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的一员。在高等院校的外国文学

* 本文刊于《读书》(北京)二〇〇五年第十期。

系所中只侧重教英美文学，不但绝无“第三世界文学”的课，连欧洲文学的课也绝无仅有。而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台湾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对于邻近的日本、韩国、东南亚文学知之极少，就更不用说亚、非、拉和中近东的文学了。在台湾，大部分知识分子脑中的世界只有两大块，一个是北美的美国，另一个是放大、易位了的台湾岛。欧洲、东南亚则在一些有能力出境旅行的人的脑子里有一点走马看花的印象。至于以亚非拉（和中近东）为中心的“第三世界”，遑论一般大众，也绝不在知识分子的世界史的、文化的、文学的与政治的研究射程之内，至今依然。

在这“第三世界”问题意识极端荒废的台湾，虽然有可能是我在一九七六年（我出狱的隔年）因和叶石涛先生商榷有关台湾新文学性质的文章（《乡土文学的盲点》）中，第一次在台湾提出“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学”这两个词，但实际上并不能因此说明当时我对“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文学”的洞见或“先见”。一九七六年，我通过日语读物，知道了韩国正在进行着关于唯美文学论的“纯粹文学”论和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参预（干预）文学”的论争，不久又扩大为“民众文学”和“民族文学”的论议，而在论述文学的民族性和大众性时，提出了参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地处境中，尚在为民众（=民族的构成分子）的解放、国家的独立而斗争的亚、非、拉世界，即“第三世界”及其文学的斗争问题。

一九七八年，海外保钓爱国运动的左翼论坛，也出现了“第三世界”的词和概念，可惜思想检查严苛的台湾没能受其影响。后来的阅读告诉我，“第三世界”的概念有一个发展的结果。西方人有以生产方式分类的办法，即以“自由经济工业化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一世界”，以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二世界”，而以世界上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为“第三世界”。西方的这第二种分类，有意识形态色彩。“自由经济国家”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是“中央计划经济”即社会主义国家，而“不发达的自由市场国家”为“第三世界”。

而毛泽东的三个世界论，也由五十年代的“中间地带”论逐步发展为以美苏超强为“第一世界”，工业发达的各国为“第二世界”，其余国

家为“第三世界”。对毛泽东而言，“第三世界”不是贫穷、落后、弱小、疾病、战争的同义词。毛泽东是把“第三世界”摆在共同反对美苏宰制的霸权之有生力量这个战略角度来思维的。

理论的思维令人疲乏。事实上，我对“第三世界”的难忘的体会，不是读理论出来的，而是源自几次具体的感性经验。

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被当局批准出境（一九七五年出狱后有几次受邀参加一些“国际性讨论会”皆被“出入境管理局”驳回），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工坊”。

在这为期三个月的“工作坊”中，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来自自我分裂的祖国彼岸的作家同胞和同人：茹志鹃女士，如今已成长为中国最优秀的女作家之一的、茹志鹃这位十分杰出的革命作家的女儿王安忆女士，和著名的进步剧作家（虽然见面时已倾向“自由化”了）吴祖光先生，使我激动不已。

“工坊”开始不久，有一个来自全世界各国作家介绍自己和自己国家的文学概况的会。报告人有的诙谐，有的木然读稿，有的潇洒大方……于是我看到据介绍是来自南非的、看来是白人的、神态很优雅的老太太，她一开始就这样说：“我方才倾听许多来自各国的作家同人，不禁十分羡慕你们都那么幸福，可以自在地写婴儿的笑靥，可以写清晨初绽放的玫瑰花……”

她接着说，在实行残酷的黑白种族隔离统治下的南非作家却没有这样的幸福。“因为作家在南非，苛酷的生活要求作家必须，而且只能为自己和同胞的解放，为反抗只因肤色不同就对人横加歧视、凌辱和不能置信的暴力的种族主义造成的苦难作斗争。”

“写作的时候，南非作家不能只是考虑表现技巧，考虑文学效果。”她沉静地说，“我的同胞，在殖民歧视统治下，识字率不到百分之十。在南非，抵抗的作家作品没有人敢出版，出版了能读的人也极少，何况还有作品查禁、作家被捕的危险。”她说，南非抵抗派作家的“出版”，是在半夜的反抗性群众的秘密集会上的朗读。“我们的作家写作，考虑的是听觉而不是阅读时的效果。”她说，“这要求音乐效果，要求明白易

懂，要避免空虚的文字游戏……”

老太太的话很大地震动了我的思想和感情。我自盼是为批判而写作的人，却从来不知道还有作家的处境和命运远比我更艰难，创作时和生活、民众和国家的苦难挨得那么近，写作的哲学有这么不同。一个南非的白人作家的良心的力量使我对她满怀敬意。在大家的掌声中，我趋前向她握手致意。我说她做了令所有听众的良心震动的报告。“特别是身为南非的白人作家，你的正义和勇敢将使我毕生难忘。”我说。

她笑了。笑得优雅、谦抑。“在南非，还有很多比我勇敢又有才能的作家和诗人。不过，我并不是个白人。”她睁开美丽的眼睛说，“I am what the racists called a color”（我是那些种族主义者说的“混血种”）。

我诧异地望着她，一个外表上对我而言是过了中年的白种太太，感到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对白人血统“纯净”的法西斯恐怖嗜欲，为之毛骨悚然。几天后，她邀请我到她的房间，告诉我所知极少的种族隔离主义（apartheid）的难以置信的横暴和黑种人民的斗争。“Chen, but we will win in the long run.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is, I can tell you...”她坚定又自信地说，“陈，我们最后还是要胜利的。没有疑问，我告诉你……”——这就是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作家与文学啊……

辞别时，我的内心这样呐喊着。

也是在一九八三年爱荷华大学的“工作坊”。

我很快就认识了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年轻人。他中等略高的身材，穿着旧的军便服，头发鬈曲，戴着一顶黑色的工人帽。他留着胡子和浅髭，如果那两撇唇髭深些、密些，就有切·格瓦拉的味道了。我们很谈得来。我向他介绍了一九七八年台湾的乡土文学斗争，他也向我介绍了菲律宾文学界民族派和崇洋、仿洋派之间，现实主义和学舌的“现代主义”派的斗争。我们也聊起“第三世界的超现实主义”和“国际文学奖”例如诺贝尔文学奖的诱惑问题。使我们共同感兴趣的是来自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他们常常以礼貌的笑意对你，英文似乎不大灵

光。“去他娘的英语！”有一次，当我和那来自菲律宾的诗人阿奎诺谈起东欧作家时，他忿忿地说，“我们为什么让英语阻碍被压迫人民之间的交流？”他崇拜毛主席和他的革命，对“改革开放”，他赞扬改革发展了经济，却担心长此以往“革命不见了”。我们决定找一天“自动自己上门去”找东欧作家们。

有一天，阿奎诺抱了一堆罐装啤酒来找我。“他们在其中一个人的房间里喝啤酒。”他眨着一只眼睛示意我随他去造访。房门打开，在香烟的迷雾中，发现了东欧作家因酒酣而酡然的几张可爱的脸孔。他们中有两个人英文讲得比我们想的好。互相自我介绍后，就在不大的客厅里聊开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东欧作家都说他们“喜欢看西方（美国）电影”。

“为什么？”阿奎诺友善地笑着问。东欧作家说，西方的文学和电影可以写个人的感情和欲望，可以描写身体和官能的需要，没有政治框框。我们听着听着，目瞪口呆。阿奎诺嘣嘣地打开易拉罐啤酒，大口大口喝。

我开始说，我在台湾看饱了美国好莱坞的暴力和色情片。“那些电影愚蠢、低级趣味，只能消磨人的志气……”我说。东欧作家们不同意。他们说“人性里原有的东西就是真实”。他们也羡慕银幕上表现出来优渥的美国式生活……

阿奎诺用力把喝完的啤酒罐措在小茶几上。他红着脸，开始讲菲律宾各民族人民悲惨的历史和当前美国在菲律宾的新殖民地统治。“美国人带给我们反共军事独裁统治，带给我们军事大基地，连带就带给我们强奸、车祸、性病，使贫困乡下来的少女变成娼妓，并且以共产党的罪名讨伐和歼灭菲律宾农民的反抗。”阿奎诺说，好莱坞电影像鸦片一般麻醉菲律宾人。“但我们教育他们不要让好莱坞消磨我们的志气。”他说，“美国人不但夺取我们的物质，还收拾我们的灵魂。”

东欧的作家对阿奎诺所说显然是惊讶的。但他们还是为自己辩白，还是讲“人性的本然”，阿奎诺生气地说，好莱坞和资产阶级的东西空虚、腐朽、败坏。有一个东欧作家奇怪地问，“怎么会？你们两人讲话像

我们的政治干事？”却一边为阿奎诺斟啤酒在一个玻璃杯里。“我也在想，怎么会？”阿奎诺赌气似地说，“怎么会？我在想，怎么社会主义东欧的作家居然迷上美帝国主义最腐朽的电影？”

小客厅忽然沉默起来。但是就在这时，有一位东欧哪个国家的作家用被啤酒泡厚了舌头的声音哼唱了起来。不等他哼上两节，大家就听出那是《国际歌》！其他的人一个个跟上来，用不同的语言唱起《国际歌》，我用汉语，阿奎诺先用英语、后用塔加洛语，声音越来越大，有些走调。但渐渐地一个个人的眼睛开始飘着泪花儿。阿奎诺哭了。抱住一个肉白的东欧小说家。我也流着泪，歌却越唱越觉得好听，有精神……

一直到今天，那个爱荷华的下午的情景历历在目，但却一直没能理清清楚那歌、那眼泪、那拥抱的意义。太复杂了吧？为了一个过去的革命？为了共有过的火热的信仰？为了被唤醒的、对于红旗和国际主义的乡愁？

如果没记错，那是一九九一年的夏天。日本的一些“革新”团体和个人（即进步的、左派的个人与团体）由武藤一羊等人推动了一个叫做“二十一世纪人民的运筹”（People's Plan for 21st Century），广泛邀请了东亚和东南亚的左派个人、团体或组织的代表到日本开会，把分组会设在不同的城市或地方，虽盛况空前，但会议场所、食宿简朴，不搞豪华会场那一套，给人很好很深的印象。我个人不知什么原因，是来自台湾的惟一的受邀人。

会议进行了约三天，最后一天赋归之前，把散在各地的分组会成员汇集到一起，等着通过大会共同宣言。

据说共同宣言起草小组彻夜未眠，大家忙着相互认识，交换与会心得。终于宣言草案印发下来了。

依往时经验，对大会宣言一般很少有异议，主席宣读过，全体鼓掌通过是常有的形势。

我漠然地读着英文的宣言草案，不料第三段专门提到一九八九年北京风波，并有严辞谴责。这个会没有大陆代表，宣言变成了缺席审判。

我读了几次那一段文字，开始坐立难安。一九八九北京事件刚过，在全球范围内舆论完全一致，真没料到这个由东亚、东南亚“左”派开的会，也套用右派的语言和逻辑。

正焦虑踌躇间，我发现自己已高举右手要求发言！主席是个泰国籍教授，台下聊天时才知道他与我的老友老同志苏庆黎同在美国纽约宾汉顿大学一起学习过。他远远看见我举手立刻招我上台发言。

我在恍惚中上台，但觉头皮发麻。我自忖自己的发言很难不招来大会的嘘声吧。我硬着头皮说，北京的事件应该关心、应该批评。但我们的会是东亚、东南亚进步人士与团体的会，批判北京风波，应该有左派自己的观点、价值、语言和逻辑。宣言上这一段，和世界上一切反华反共的文章在修辞、观点、分析和政治上毫无二致。

“因此，女士们先生们，受到时间的限制，我提出两项建议。”我说，“第一，第三段在文脉上与本宣言主要内容无关，把这一段删除，无损于宣言文脉的完整性。第二，如果必欲在宣言中批判北京事件，建议起草小组以亚洲左派的观点和分析，以我们自己而不是世界资产阶级的修辞和语言重写，补寄给我们。”

我在台上望着台下，等候愤怒、敌意的挑衅。但台下片刻的沉默后，传来部分人的掌声。掌声鼓励了另外的掌声，却没有任何挑衅和嘘声。这很出乎我的意料。主席当机立断，提议交由起草委员会重新考虑，然后继续宣读。

会议结束。不料有来自东南亚、穿着不同民族服装的人，两两三三、三三五五地来找我握手。“谢谢你。我们不知道北京事件是怎么回事。但我们习惯地不信任西方的报道和评论。”一个肤色较深，穿着大约是东南亚的民族服装的、白了胡子的人说，“我们很关心北京事件。但我们不知道情况。你说对了，我们要用自己的语言和感情说北京事件。”然后他摇摇手向我道别，独语似地说，朋友家，到底出了什么事？

有年轻的韩国代表两三人来，他们说他们根本不同意大会宣言将韩国学生的反独裁民主化斗争和“天安门广场上的事”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其中一位用力握我的手，“谢谢”我的发言。

中国应该不会忘了，在穷困的第三世界，她还有不少的真心朋友吧。望着走远的韩国朋友，我这样对着自己独语。

过了一个多月，大会的文件寄来了。我翻阅大会宣言，那一段批判北京事件的文字原封不动地留在那儿。但我一点也不觉得沮丧。我回想到大会结束那天那么多向我伸出握手的、不同肤色的手，想到“第三世界”中，也有精通英语和“理论”的精英和在日常实践中斗争着的大众的区别。这区别自然也反映在思想和政治上。

从理论上讲，“第三世界”乃至第三世界文学论一直存在着复杂的争点。但在日本的直接的感性经验、上述第三世界朋友谈说北京事件的真实声音，对我而言，却是深刻而难忘的“第三世界”论。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日 中和

从台湾看《那儿》*

朋友如获至宝似地拿了从网站上下载的、大陆作家曹征路先生（以下礼称略）写的中篇《那儿》来。后来又取得李云雷先生（以下礼称略）新写的论文《转变中的中国和中国知识分子——〈那儿〉讨论评析》。

一九三七年，我生于日帝窃占为殖民地的台湾。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台湾才结束了五十年与中国分断的历史，重归于故国。但一九五〇年韩战爆发，美国强以它所操控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台和约》，以“台湾地位未定论”再次将台湾与解放后的中国分断。一九七九年，美国干涉主义又以它的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强行干涉台湾与中国本部的民族统合。在外来势力干预下，虽然不曾完全阻隔两岸政治上、文化（文学）上、思想上相求互应，但民族长期分裂的构造，毕竟不免于产生彼此的生疏与理解上的差异。读完《那儿》，心情很激动。读完云雷的大论，也让人思潮起伏。《那儿》在祖国大陆的读书界讨论，已阅两年许。为了免于狗尾续貂，想从一个半生生活在台湾的老作家的视角，说一说一些不成熟的感想。

一、关于“左翼文学”的表现艺术性问题

读云雷的文章，发现大陆对《那儿》的广泛讨论中，对其“艺术

* 本文刊于《二·二八：文学和历史》（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十，台湾：人间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二月）。

性”的质疑之声很不少。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严苛的反共戒严体制下的台湾偷偷搜读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书成长的。及长，也涉猎了三十年代“文艺自由”、“第三种人”论争的不完整的内容，知道反对“左翼文学”的人最常质问的是“左翼文学”的“艺术性”，指责其粗糲、教条主义、刻板描写。但事实上，左派内部对革命文学的革命加恋爱、刻板形象和教条化是进行过多次自我反省与批判的。然而鲁迅、茅盾、高尔基、布来希特、萧洛霍夫这些世界“左翼文学”家及音乐家萧斯塔科维奇在文学与音乐艺术上伟大的成就，即便在资产阶级的世界，也绝难于抹杀，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有异于资产阶级的独特审美和思想上的成就。曹征路的《那儿》引起长达两、三个月，遍及全中国的阅读、讨论、正反评价的争论本身，绝不是仅仅因为单纯的题材——当下国企改革过程中资本对直接生产劳动者的掠夺——云雷的大论，已经为人们整理出了《那儿》现象的广阔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原因，但如果不是作品本身以它不同于当下趋附市场，只顾孜孜于描写个人生活和感情、或苦心揣摩进口的文论所写的，回避历史与生活中逼人而来的矛盾的作品之独自的艺术和审美，就绝不能成为小说的拥护者和反对者热烈讨论的焦点。我读《那儿》，深受感动。对于我而言，《那儿》在思想和审美上的成就是显而易见，完全不必在文论上多所辞费。但云雷的大论告诉我们，有不少大陆文评界或从否定《那儿》的“艺术性”而低度评价作品，或虽然低度评价作品的“艺术性”，却有条件地对小说《那儿》的现实意义加以肯定。从台湾看来，大陆文学研究界——包括广泛的思想界，对于“左翼”、对于和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东西，似乎普遍表现出明显又强烈的、病理意义上的过敏症（allergy）。

一九四三年，在日本法西斯最嚣狂的时代，日本皇民文学在台湾的大总管西川满，发表了题为《狗屎现实主义》的文章，百般抨击自二十年代发轫，以反帝反封建、民主与科学为言，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台湾新文学粗鄙不文，题材上在（“决战”时期）看不见“圣战”的主题，却净写台湾封建大家族的颓废与葛藤，而讽刺之为“狗屎现实主义”的文学，不像日本文学之纤巧唯美。这在骨子里其实也是对台湾左

翼现实主义文学缺少“艺术性”的诋毁。著名作家杨逵立刻写了《拥护狗屎现实主义》，对西川满的台湾左翼、现实主义文学没有艺术性论以灵活的辩证逻辑深刻而从容地提出了针锋相对的驳论。

一九四七年二月，台湾爆发了民众的民主抗争事件，在三月初遭到国府铁血镇压。但同年秋到一九四九年四月间，台湾进步作家（以杨逵为首）和大陆东渡来台的进步文化人在《台湾新生报》的《桥》副刊上热情共话建设战后台湾新文学。大陆来台的文评家开始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三十年代以降大陆左翼文论；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辩证统一等论述，丰富了台湾左翼新文学理论的向度。不料一九四九年四月，杨逵和当时进步学生同时被捕，文学议论突然中挫，接踵而至的是国府在台湾全面性的反共肃清，台湾优秀的小说家吕赫若和朱点人，戏剧运动家简国贤等人潜入地下，最终牺牲。

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〇年间，在反共肃清后的不毛之地，输入了极端强调“艺术性”和脱社会、脱政治的美国的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和反共国策文学孪生并存至一九七〇年。受北美保卫钓鱼台运动间接影响，台湾在一九七〇年至七三年间展开批判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的运动，强调了文学的人民性和民族风格。一九七七年，国府官方发动大批判，反对主张文学为大众、写大众，反对晦涩、脱离生活和民众的、舶来的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强调文学复归民族特色的台湾乡土文学。而当时以彭歌、余光中为代表的官方论客，即以乡土文学写社会底层，别有用心，“没有人性，何来文学”，而况又包藏着工农兵文学的左翼之祸心！他们咬定乡土文学是“左翼文学”，有“危险的政治目的”，背叛了艺术对纯粹审美的要求。这样的逻辑，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在艺术性上过不了关论。在台湾读《那儿》和相关联的讨论，不免想起台湾文学思潮史上的种种。而揆诸大陆从二十年代发轫，勃然繁荣于三十和四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和创作实践的伟大遗产，今日大陆对《那儿》的“文学性”议论，说明了不少难于思议的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变化。

而事实上左翼文论自始就特别注重文学艺术的艺术性，强调文艺有其相对的自主性，要求更多表现上的民主和自由，反对左翼文学的刻板教条化，又力言革命的文艺要有“更多的莎士比亚”（艺术性），少一些席勒（教条和刻板化的意识形态）。既然大家似乎忘了这些左翼文论先行者的反思与叮咛，则借着细读《那儿》后的议论重新温故以知新，也不是无益吧。

二、工人阶级意识

讨论《那儿》时，有人指出小说“表现了一种无产阶级意识”。在台湾读《那儿》这一点更觉鲜明。台湾的工人运动最初勃发于日据时的三十年代，在“台湾共产党”和“民众党”领导下形成。由于殖民地台湾的现代产业劳动者数量和力量单薄，也由于台共和民众党有分派矛盾，加上日帝于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而全面镇压岛内社会和政治运动，台湾第一波工人阶级运动溃灭。一九四六年后，中共在台地下党在林场、“国营企业”（如邮电、铁路）布置党组，但都在一九五〇年代的反共大肃清中溃折。及至迎来全面反共戒严体制，台湾的工人运动遂寝。一九八九年戒严体制解除后，曾爆发过远东化学纤维公司的规模较大的罢工事件，但由于历史传统的单薄、组织的弱质而失败。六十年代后中小企业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尖兵，但由于工厂规模小，工人流动性大，很难于培养阶级自觉。台湾产业工人对自己社会地位和命运多半持有消极态度，也有不少人在大众消费体制中自己欺罔地与中产阶级认同。另外，八十年代的统、独矛盾中，台湾工人被台独反民族的政治所分化，对阶级意识的形成，雪上加霜。

五十年代后，台湾文坛被舶来的“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所统治，工人阶级与文学的距离遥远。只有在七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国企”厂出身的作家杨青矗，可惜受到自己思想意识的限制，作品中表现以改良主义——老板多体恤工人，不要过分扣克工人。而工人多体谅工厂主，双方妥协合作——来解决劳资矛盾，这当然对于使工人阶级从自

在的阶级向积极自为的阶级进行意识化没有帮助。

《那儿》的成功，显然和作者曹征路在工厂生产劳动的实际经验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大陆工人阶级在历史上参加过革命斗争，取得过胜利，经验了自己的解放与翻身，曾经“作为……一个强大的历史主体”（陈晓明），也曾经作为中国工农联盟的一员成为党和国家的基础。这一集体的记忆，尽管在近二十年中不断的风化，却无可置疑的成为一代人难以忘怀的生命信念与回忆。曹征路写的小舅，是一个极平凡的工人，但潜在于他心头的信念——坚不相信工人阶级集体的联署斗争唤不回正义与公平——使朱卫国从一个平常工人变成伦理上“高于常人”的人物。而正是他“高于常人”的执念，像希腊古典悲剧中之英雄，一步步在残酷的现实与宿命走向毁灭，从而震动了无数犬儒化了的读者的心。

我自己写过一篇受到外国人跨国企业主的改良主义所欺骗的女工组织独立工会失败的小说《云》，但材料只是从事后的采访来，自己完全没有下厂直接劳动的经验。作家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与生产劳动的巨大距离，和台湾工人集体记忆中缺少斗争与胜利的记忆，使台湾产生不了像《那儿》的作品，也产生不了像曹征路的作家。而众所周知，无产阶级文学离不开无产阶级自求解放的运动。在可预期的一段时间内，不要说台湾，连有过六十年代工运的日本，有过七八十年代的军事独裁下崛起的韩国工运，如今都已沉寂。大陆的情况我很不熟悉，不能说。但把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公开、显著地写进党纲和国家宪法的中国，无论如何总令人寄予一线希望吧！

另外，曹征路在小说开头就写杜月梅因下岗生活困窘下沦为私娼，但在工人社区中却不见有人因而对她讪笑、讥讽、歧视。偌大的工人社区只有对她寄予理解与同情，仍然平等待之。这在台湾看来是很不能思议的。这是不是中国工人集体对阶级姊妹的、源于阶级意识的支持和同情呢？我很受感动，但不能充分认识与理解。

三、事有必至

读《那儿》后的激动中，也有“这样的作品终究出现了”的感觉，觉得事有必至，理所当然。一九九〇年代初，中国的改革深刻地改变了四九年以后推动的生产方式，自然也改变了社会的下层建筑，而社会上层建筑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相应的巨大变化。隔着遥远的海峡，我虽然关心这些变化，却无力掌握具体的资料，仅仅朦胧地知道有影响深远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告别革命”论和承认革命的合理性论的争论；反对重返五六十年代极“左”文学和对于中国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再认识，重新评论文学与社会、与政治的关联的争论……《那儿》的出现和相关的讨论，在少数的文脉中，激动人心地、艺术地表现了当下中国生活中最抢眼的矛盾，促使人们沉思问题的解答。究其原因，曹征路恐怕是最后一代怀抱过模糊的理想主义下厂下乡劳动过的一代。这一代人要打倒资本主义，却在资本主义太少而不是太多的社会中从未真正见识过资本的贪婪和残酷。而九十年代初以后的巨大社会变化，既催促一批作家随商品化、市场化大潮写作，也促使像曹征路这样的作家反思资本逻辑与人的辄铄。而在台湾，七七年乡土文学派呼唤作家写农村、渔村、写劳动人民，关怀社会低层人物，但八十年代中期掀起的“台独”反民族思潮卷走了不少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鼓吹没有阶级的“台湾意识”，制造同民族间的憎恶。台湾社会的阶级矛盾被地方主义激情掩盖，“次文化”层次的“台独”取代科学性的社会分析和研究。而在创作实践和学术理论发展上，“台独”派文坛却久久乏善可陈。

四、外来文论的失效

从云雷的大论看出，两年多来围绕着《那儿》的讨论和争论显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支配两岸文论界的诸主义——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都失去了理论分析的效力。这似乎暴露了这些外来论述基本上不具备解决和评说当下中国最突出、最具体、最急需解答的诸问题的能力。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台湾的文论就受到主要来自美国保守学园输入的诸“理论”所统治，至今依然。然而我期待不久的将来，大陆思想界能在熟知外来诸“理论”的基础上，宣告外来流行理论在中国的失效，激发中国思想理论界的“自力更生”，建设独立自主的文学和发展社会学体系，解释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并提供给我们一样受到列强为自己打造的世界秩序服务的思想文化理论体系统治的诸民族作为参考。

五、光明与希望之必要

对国企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阴暗面，以尖锐的笔触和火热的心加以表现的《那儿》，非但能公开发表，而且还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犀利深刻的讨论，从台湾望去，是十分激励人心的。台湾一贯宣传大陆“没有言论自由”但从准许刊出小说、准许自由讨论围绕《那儿》的诸问题（类似的事在一九八七年解除戒严以前的台湾是绝无可能的），也从一九八〇年代以来大陆极少因干犯政治而禁止作品或文章的公开发表和讨论看来，思想言论的民主主义有相对的宽松。对于《那儿》的评说，有人直截地说是新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有人不无憎恶地说反对把文艺“倒退”到五六十年代的极“左”道路（对诗剧《切·盖瓦拉》的公演，也有人感到类似的惶恐）；当然有人以“以深化改革解决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为言；有人以否定《那儿》的“艺术性”和“文学性”而全面否定了作品。而有人从更根本（radical）的角度批评小舅朱卫国的抗争“没有上升为一个阶级的自觉”。从右到左，准许自由发言。这对于可能继之而发表的新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值得珍惜和赞扬。

据台湾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南方朔指出，在“全球化”行程中，随着媒体“扒粪”功夫的增进，银行保密制度的松解，司法独立办案力度增

加，揭发了先进“民主”国家权力高层惊人的腐败。其手法也是将国家资本主义大企业依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民营私有化过程中，权钱交易、化公为私、掠占厚利据为己有，或挪用为一党所有。一九八〇年代欧洲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私有民营化过程产生的贪腐掠占事件，多到了不可胜计。一九九〇年初，俄国叶利钦主持下变卖前苏联国有企业风潮中，制造了叶利钦身边亲信十几个新兴大款。此外国家巨额采购的委外承包过程中巨额回扣的流通，不是落入私囊就是成为政党的库银。比起西方媒体经常渲染的“贫困”、“落后”、“共产主义”政权的贪渎，现代经济发达、号称民主公正的西方国家的贪腐更为黑暗与贪渎。一九九二年，意大利爆发集体贪渎丑闻，涉案大小官员商人多达三千人，位阶扩及总理二人，三个党的党主席，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有十个官商畏罪自杀。然而其中就没有产生过一个从工人阶级出身，以工人阶级立场揭发和批判这些“先进”“民主”“自由”国家权力和资本高层的黑暗与腐败的文学作品。

《那儿》的结局以朱卫国悲壮的自残结束。以这沉重的代价，换来盘踞在矿机厂无法无天掠占剥削的团伙因东窗事发而溃灭。我们不以为曹征路的安排是妥协性的“光明的尾巴”。手边有今年元月八日出刊的《亚洲周刊》，就刊出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中国农村艾滋病重灾区——县委书记杨松泉放肆大胆私吞中央拨给医治艾滋病的各种公款而被罢官候审的记事。贪官不绝是现实，人民纠举贪官而促成罢官也是现实。

但曹征路在故事结尾处丢下了上面来查案办案的人两句“没想到”的话。他们一“没想到”“停厂九年的工厂保养得那么好”；二“没想到”“矿机厂的队伍还这么的整齐”。这两句令人震动的话，简洁生动地表现了被私有化行程抛弃了几年的中国劳动阶级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崇高品质和工作纪律，也反驳了工人阶级没有能力治厂办厂的谎言。在我读来，这两句话更是苦斗中的中国工人的自觉与自尊的宣言，又岂能以简单化的、犬儒主义的“光明尾巴”尽之？

二〇〇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编后记

陈映真先生的小说早在一九八〇年代初就被介绍到大陆来了，他的评论文章则迟至一九九〇年代中后期才受到大陆文坛的关注。而对陈映真先生来说，文学与社会政治的评论一直是他整个文学活动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从来不是一个对文学之外的世界毫无兴趣的“纯”文学家，他自觉继承了鲁迅与中国左翼文学传统，并且创造性地激活了左翼思想对时代的批判能力，在这方面，他与一九八〇年代大陆作家的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时至今日，恐怕还会有不少作家觉得陈映真先生的思想是落伍而陈旧的。但是，时代的变化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在很多人对此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年以前陈映真先生已经开始认真严肃地分析和应对这些问题。正如台湾学者陈光兴先生在论及包括陈映真在内的一些思想家时所说的那样：当我们自己的知识方式及状况出了问题，要寻找其它可能性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早就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走在那条路上，等着我们继续接着棒子往前跑。

二〇〇六年陈光兴来上海，我们一起讨论“其它可能性”的时候，话题集中到了陈映真先生身上。我们都觉得，仅仅将陈映真的创作归入台湾文学范畴，或者忽略他作为思想者的存在而仅仅强调他的小说创作的价值，都无法彰显他的独特性。陈映真对台湾文学有着深刻的意义，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他对台湾的思考，是与他对中国、亚洲、第三世界在全球现代进程中的独特体验与思考高度结合在一起的。在他与台湾形形色色分离主义文学与思想的斗争中，充分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以及他对第三世界的认同与关怀。陈光兴建议在大陆全面介绍和出版陈映真作品集，此议得到了上海作家王

安忆女士，上海学者王晓明先生、陈思和先生以及出版家的支持，我被指派编选陈映真评论集。虽然该计划最后没能实现，但也因此积累了大量材料，并初步形成了编选思路。

二〇〇八年六月，三联书店邀我编《陈映真文选》，因时间和精力问题，我希望三联另找他人，我可以提供我所积累的材料和原初编选思路，以供参考。但三联坚持要我来完成这项工作，我只好勉力了。

由大陆人来编选，当然可以显示大陆的主体态度，但也会遇到很多困难，首先是资料的甄别，文章出处的考订，版本的选择，都不可能由我一个人来完成：其次是文章的选择，需要考虑到文章发表时的语境，以及它在台湾历史上的作用，这也需要台湾文学研究专家的帮忙。幸得海内外学者特别是台湾学者的鼎力相助，才使本书得以顺利编定。《文选》的第一辑主要是陈映真的自述，来源于他为自己的作品集写的序言，以及他的自我评论。根据台湾学者吕正惠先生和陈光兴先生的提议加入了三篇散文作品。第二辑收录了陈映真参与乡土文学论战，以及对论战的回顾文章。吕正惠建议将写于一九六〇年代的四篇文章放入其中，因为它们记录了陈映真走出“现代主义风潮”的心灵轨迹。第三辑的主题是批判台独分离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幽灵。需要说明的是，首篇《乡土文学的盲点》也是乡土文学论战中的重要文章，对分离主义的批判原是乡土文学论战中的一大主题，陈映真随后结合对殖民主义的当代幽灵的揭示，深入论述了这个主题。第四辑体现了陈映真对当代消费社会的思考，他创办《人间》杂志的经验非常值得大陆文坛借鉴。第五辑选收了陈映真阐述海峡两岸文学关系的论文，他作为台湾人对大陆文学现象的批判性思考是颇为独特的，他对第三世界视野的强调发人深省。

《文选》的编辑方式得到了吕正惠先生的极大帮忙。由于篇幅所限，陈映真先生的不少书评和访谈没有编入。文章的版本，凡收录到文选或作品集集中的，以后者为准。如有文字上的问题，以期刊原文校订。翻译上的疏漏，则核对英文原文。

全书的编目还交与台湾学者赵刚先生、曾健民先生、蓝博洲先生，

北京学者贺照田先生、赵遐秋女士审阅，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台湾学者陈筱茵女士提供了她汇编的《陈映真文章分类明细》，吕正惠先生提供了《陈映真杂文、论文目录》，台湾学者黄文倩女士、香港学者谭帕儿女士提供了资料，上海博士生李晨女士协助我搜集了陈映真发表在大陆的文章。在此，向诸位表示感谢。也感谢陈映真先生的夫人陈丽娜女士对本书的支持。感谢责任编辑冯金红女士，她的精心、细致的工作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最后，向陈映真先生表示敬意！

薛毅

二〇〇九年九月七日，上海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辑 关于陈映真

试论陈映真——《第一件差事》、《将军族》自序

关于陈映真

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

鲁迅与我——在日本《文明浅说》班的讲话

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

祖祠

父亲

生死

第二辑 乡土文学论战

现代主义底再开发——演出《等待果陀》底随想

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

最牢固的磐石

知识人的偏执

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

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

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回顾乡土文学论战

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七十年代文学论争在台湾文艺思潮

史上划时代的意义

七十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以《莎哟娜啦

再见》、《小寡妇》和《我爱玛莉》为中心

第三辑 分离主义的盲点

“乡土文学”的盲点

原乡的失落——试评《夹竹桃》

台湾长老教会的歧路

追究“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论

西川满与台湾文学

美国统治下的台湾——天下没有白喝的美国奶

从台湾都市青少年崇日风尚说起

从一部日片谈起——论《联合舰队》

台湾内部的日本——再论日本战争电影《联合舰队》
“台湾”分离主义“知识分子的盲点”
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
被出卖的“皇军”
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批评陈芳明先生的《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
论“文学台独”
警戒第二轮台湾“皇民文学”运动的图谋——读藤井省三《百年来的台湾文学》：批评的笔记
第四辑 消费社会和文学问题
色情企业的政治经济学基盘
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
大众消费时代的文学家和文学
《人间》杂志发刊辞
新种族
大众传播和民众传播
第五辑 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
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
反讽的反讽——评《第三世界文学的联想》
“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评渔父的发展理论
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
同一个民族，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斗争——台湾新文学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联系
天高地厚——读高行健先生受奖辞的随想
中华文化和台湾文学
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
从台湾看《那儿》
编后记薛毅
插页页
附录页
封底页